

南菁文化丛书

杨培明 主编



南菁书院志



赵统 著

南菁文化丛书

杨培明主编

南菁书院志

赵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菁书院志 / 杨培明主编; 赵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0

(南菁文化丛书)

ISBN 978-7-5458-1179-7

I. ①南... II. ①杨...②赵... III. ①书院—教育史—江阴市 IV. ①G649.29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891号

责任编辑 孙 莺
封面设计 郦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南菁书院志

杨培明 主编

赵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42.75 插页 8 字数 600,000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79-7/G.92

定价 88.00元

《南菁文化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及编委会主任

杨培明

编委会副主任

周 源 赵长缨 戴加成 马维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维林 冯德强 印晓明 孙远景 刘正旭

杨培明 张敏军 张静慧 周 源 赵长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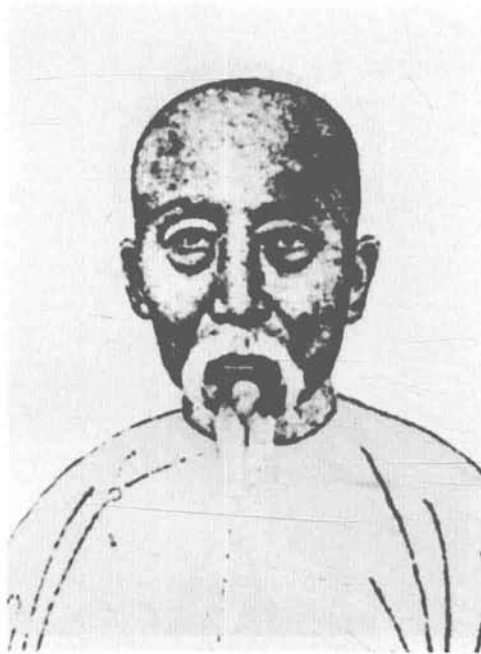
赵 统 戴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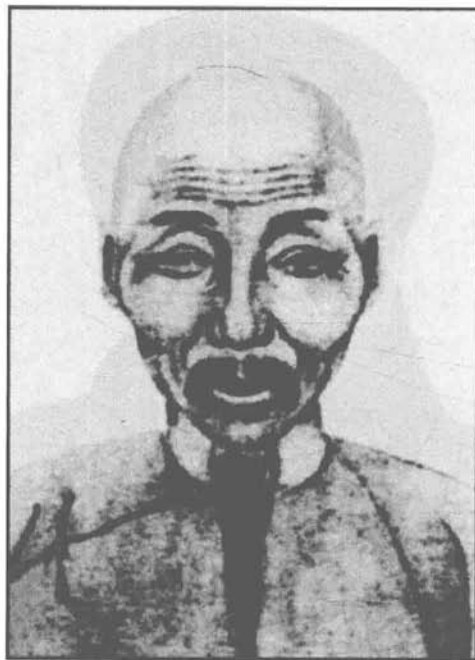
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



南菁书院奠基人左宗棠



南菁书院学术倡导人王先谦



南菁书院经学大师黄以周

欽命兵部左侍郎江蘇全省督學部院黃

勒石永遠事取傳奉部院前因江蘇自兵燹以後士習文風漸次復舊特於江陰縣所創設南菁書院專收遺書士子輝若炳耀刊書通行然則在書院此決定是書院又兼修書之各項公費係由本部院倡捐廉俸甚巨詳未者外省督撫陸續監司州縣諸公捐廉所集中雖熱衷來書院之款其蓋足此擬一開則士紳民推服轉喜大下傳不難為持範以期久遠通行除將各官銜石捐數支存另勸一石外合刊明白曉示嗣後如蒙人獻錢前益或種費實在不敷經費者不特捐實陳明存儲款酌其積有整民間款項者無論何名目概不推捷或即可轉購由社府廉亦亦一律不准收受誠以書院為通省所關有取多取寡之分必有端重條經之弊且權歸於上則公而無私事涉於民則難而為種本於院法過營謀其有若未謀世以限制之為最宜其理極之而臨也其書院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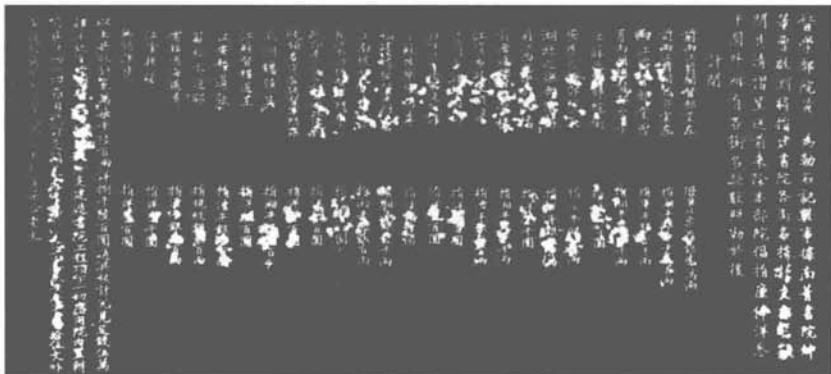
光緒 年八月二十九日示



南菁書院頭門勒石

為

黃體芳《南菁書院頭門勒石》



黃體芳《捐建南菁書院各街名款數碑》

南菁書院田記

南菁沙田記 南菁沙田者松江府華亭縣海中沙灘也...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夏六月

王先謙《南菁沙田記》

南菁書院碑記

南菁書院記 體芳以光緒六年繼仁和夏公督學於江蘇八年... 光緒十四年九月

黃體芳《南菁書院記》



南菁书院藏书楼



南菁刻书



黃以周手批張錫恭南菁書院課藝



南菁书院时期同学聚餐留影。(1941年摄于上海)

序 一

杨培明

教育，是照亮民之心灵的第一道阳光。

南菁书院，正是这七彩阳光中闪亮的一缕，升起在晚清的天空。作为清末时期江苏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建院伊始，书院创始人黄体芳就十分重视营造宽松和自主的学习氛围，提倡研讨和辩论，初步为书院定下了崇尚勤读、提倡朴学、知行并重、关注社会的独特文化品格。王先谦、张文虎、黄以周等先辈秉持开放的学术态度，汉宋兼采，义理融通，塑造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使得南菁书院在晚清学术界名重一时，风骚独领。

南菁书院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书院当年的讲堂、藏书楼、观星台，也已无迹可寻，但书院时刻印的《皇清经解续编》，依然散发着香远溢清的浓郁书香，留存至今的书院古井，也依然清冽甘甜。南菁的精神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南菁风雨兼程，虽几经烽火，校名几经更改，从书院、到高等学堂、到新型中学，但“南菁”二字，一直岿然不动；校址几经搬迁，曾经辗转沪校，回归故址，又搬迁至今天的敌山之侧，但“忠恕勤俭”的校训，伴随着开放包容、自主自由、经世致用的书院文化，跨越了三个世纪，依然代代相传，是南菁人受用至今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根砥。

今天的南菁，力求择高处立，寻平处坐，向宽处行，务实求进，励精图治，以成就南菁更崭新的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南菁文化精神的滋养，从历史中获得智慧，方能传承、创新和超越。

作为南菁文化研究众多专家学者中的一员，赵统先生以一己之力，几易其稿，几番增修，穷经皓首，完成了这沉甸甸的《南菁书院志》，对书院时期和高等学堂时期的南菁，从制度沿革、治学方式、人物列传三个方面，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梳理，使得南菁书院的格局嬗变和文化影响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呈现。

赵统先生是一位热爱教育、对南菁倾注满怀深情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精益

求精的严谨学者。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对清代的书院制度、科举教育制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记述南菁书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言简意赅,脉络分明,记述南菁的治学理念、社会背景客观中肯,对师生交往的刻画栩栩如生。赵统先生读千册书,行万里路,走过很多地方,翻阅过大量资料,进行过多方考证,夙兴夜寐,多年如一日,才能拂去历史尘埃,透过沧桑之变,完成这部资料性强、科学性高、内容丰富、考证精密的志书。赵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南菁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对南菁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改进美育教学。教育部也将“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列入近年的工作要点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其自强进取、诚实守信、兼容并包、强调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等精神内核,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南菁高中也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施学校德育和美育的重要途径。

探源索泉,书院文化是南菁独特的宝贵财富与精神根基,书院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一代代南菁人。传承南菁书院文化,让南菁文化的火炬照亮学生成长的道路,培养学生独特的南菁气质,是南菁管理者的使命。“南菁文化与南菁人物研究”,是学校十二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的赵统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完善,增修到的五十多万字的《南菁书院志》,是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南菁高中是江苏省美育课程基地。美育,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气质、胸襟,将帮助学生实现生命的完整与幸福,这是单纯的知识教育难以达到的。南菁将学生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纳入了常态化教学视野。学校不仅利用独特的艺术馆资源,开设了名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审美”的美育系列课程,更以潜移默化、熏陶浸润的方式,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现在日常的教学与活动中,《南菁书院志》也将是学校美育的校本教材之一。

感谢赵统先生和众多的南菁文化研究者,他们的工作,不仅对南菁书院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与传承,为后人留下一部系统、翔实的书院研究史料,也可以让新一代学生更详细地了解学校历史,学习南菁先贤的品格,使一代代南菁人探幽钩沉,熔炼出的永不磨灭的南菁精神——人文与创新,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序 二

王伊同

清代学政，舍省城而驻节他邑者，裁三，吾苏其一也。光绪壬午（1882），学政黄体芳，因地制宜，师杭州诂经精舍规范，创南菁书院于吾乡，考课调取通省举贡，入院研习，并先后延聘经学名宿张文虎、黄以周为教谕。黄体芳去，王先谦继之，建南菁书局，刊《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三十卷，尤集晚清经学之大成。

顾同光以降，国事益衰，孔孟程朱之学，迂远疏阔，无以救燃眉之急。历届课生，渐舍旧而就新，去虚而务实。唐文治精于经传辞章，后乃监督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兴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及私立无锡中学。胡玉缙长于目录学、说文、穀梁，参张之洞幕，嗣更掌教京师大学堂。汪荣宝治扬子法言，然出使东瀛。丁福保纂刊说文解字诂林，然毕生以医术名海上。徐若孟森之于明清史，孙毓修之于童话，蒋维乔之于佛学，张一麀、吴稚晖、钮永建之从政治兵，硁硁焉一以经世致用、国家兴亡为己任，而南菁书院之名，益大振于长江南北矣。

书院无志，故事旧闻，日趋晦冥。丁丑（1997）校友会成立。后五年，决议修志，延同邑高级中学文史教习赵统主其事。君父荣长，少肄业国专，从唐文治游。君之于南菁三传矣。既受命，患文献之不足也，数走上海、苏州、无锡间，访辑遗佚，历一年有余而书成。凡八章，二十馀万言。搜罗广博，考订精详。

余维南菁之名书院也，裁十六年耳。其后两变：曰学堂，曰学校。论品类，则有公立、私立之殊。论学制，又有三年、六年、文科、农科、文理科之别。然而南菁之名，固屹然不稍撼。予以壬申（1932）卒業南菁高中，七十有一年矣。今以衰躯，获窥宝库，喜而奋笔为之序。

癸未（2003）四月既望，江阴王伊同，时年八十有七。

序三 斯楼应许附千秋

吴 飞

赵统先生的《南菁书院志》终于完稿，洋洋洒洒五十万字，我拿到电子版后，迫不及待地将它读完，颇多感慨。

我对南菁书院的兴趣，始于对张闻远先生学术资料的搜集。因为闻远先生肄业南菁，我2011年开始四处搜索关于南菁书院的资料，就在旧书网上买了一本南菁中学自印的《南菁书院志》初稿，大约二十万字，对南菁书院的历史沿革、教育制度、学术传统、主要人物都有简洁但清楚的介绍，读毕有很大收获，但也萌生了许多困惑，对南菁书院更是心向往之，就有了看看南菁旧址的想法，于是在这年秋天第一次来到了位于江阴的南菁中学（即清末的南菁书院所在地），见到了它的作者赵统先生。

赵统先生已过六旬，清癯朴素，极为谦和，是江阴的一位退休语文老师，读书极多，有着很高的学识，对清代书院制度、科举制度、学政制度等有很深的研究。他本非南菁中学的老师，却被南菁中学特意调来修志。赵先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翻阅了相关人物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数百种，先写出了这部初稿。初稿虽就，但他对南菁书院的感情很深，陆陆续续又看到了大量资料，期待能够完善成更丰富的一部书院志。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好像自己就是从当时的南菁书院走出来的，无论为人为学，都散发着清代江南学者的书卷气息。后来得知，赵先生的父亲蓉裳先生是唐蔚芝先生在无锡国专的亲炙弟子，果然是南菁学人的嫡系后裔，江阴数日的交谈就带我回到了光绪八年的江南学界。

江阴虽是小城，却扼长江天堑的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且位于人文荟萃的苏南正中央，极富舟楫之利，故明清两代的江苏学政衙门都不在江宁或苏州，而常驻江阴。光绪八年，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瑞安黄漱兰既有感于科举制艺难以培育人才，又期待曾文正、左文襄这样的大贤出现（支持建立南菁书院本就是左文襄晚

年的一大善举),在此建南菁书院。

黄濬兰最初为书院延聘的院长是南汇张啸山,啸山先生却很快谢世,其后定海黄元同先生主持南菁教席十五年,成为南菁学术的灵魂。濬兰自己也很快离开了江苏学政的位子,继任者是著名学者长沙王益吾。王先生在南菁刊刻了《皇清经解续编》,而且对南菁学术有着更实质的影响。元同、益吾二位学问大师真正确立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他们没有像黄濬兰最初预想的那样,培养出曾、左那样的经世之才,却培养出了不少相当优秀的学问家,使南菁书院成为清代学术和传统书院制度的最后辉煌。

濬兰在位时间虽短,但言南菁者必推始濬兰,因为他在几个重要方面塑造了南菁书院的风格。其创始之功,首先在于为这座书院命名“南菁”。在建院之时,濬兰的老师孙琴西先生(即孙仲容之父)曾建议以“崇让”命名,濬兰却未接受,而是命名为“南菁”。关于此书院何以如此命名,赵统先生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张啸山认为此名取自《诗经》“菁菁者莪”之语,濬兰则解释说:“乃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曰‘南菁’。”说得虽明,却隐然有鄙视北方之学的意思。在清代汉、宋相争的学术语境下,以此命名,南北之分似乎就是汉宋之分,《北史》李延寿所说的“南人约简,得其菁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合此意。于是,元同先生辨析说:“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今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翦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元同以为,南菁书院的旨归,是要以枝叶培养菁华,以菁华继其枝叶,即“博文约礼”。濬兰、啸山、元同均为南菁书院创始者,经他们的层层解释,南菁书院的学术取向清晰地呈现出来。而这正体现在濬兰先生并祀郑君、朱子的安排中。

濬兰在南菁书院立郑君、朱子二先生木主,又在藏书楼上撰长联云:“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此联气势豪迈,胸襟博大,已成名联,而它最好地诠释了祭祀二贤木主的安排,也为南菁书院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初,仪征阮芸台在杭州立诂经精舍,并祀许叔重、郑康成二君木主,展现了乾嘉之际汉学兴盛时的学术取向。而今,南菁书院并祀郑、朱二主,鲜明地揭示出汉宋兼采的倾向。南菁虽未培养出曾、左那样的经世之才,却继承了曾、左汉宋兼采的思想倾向并发扬光大,也算不负濬兰起初的愿望了。

嘯山先生云：“夫高密博极群书无论矣，新安于百家杂说，无不究其指归，晚年定《仪礼经传通解》，一以高密为主，然则其学已汇于同，而訛訛者犹强辨之，多见其不自量矣。”其弟子，南菁书院最早的课生闵颐生亦在《南菁书院祀郑朱二公祝文》中写道：“曰若二公，大道之宗。距千百年，一以贯通。”此后的黄元同与王益吾的学问都是偏重汉学，但对宋学不仅非常尊重，而且相当强调，体现了汉宋兼采的取向。王益吾在《皇清经解续编》中对宋学和今文经学都持开放态度，就是与阮芸台的学海堂《皇清经解》最大的不同。

汉宋之间的门户纷争是乾嘉时代重大的学术公案，而在晚清学术界，汉宋兼采已经成为相当公认的一个方向，究竟该如何兼采，大家却有非常不同的见解。汉学、宋学毕竟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强为兼采，谈何容易！晚清提倡汉宋兼采非常有力的陈兰甫被章太炎讥为“鸠合汉宋”，“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赵统先生特别点出，陈兰甫逝世之年，正是南菁书院建院之时，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元同先生对南菁弟子学问的塑造，乃至他对清代学术实质性的影响，就在于他兼采汉宋之道。

自梁任公治清代学术史，论者多以为清代仅有学问，而无思想，以为清人仅仅钻在故纸堆中经营饴苴之学的雕虫小技，实是未能体会清人转向经学的真正用意和深刻思考。清代学界的汉宋之争，起于明遗民对明代学术的反思和纠正，并由明学上溯宋学，此于船山、亭林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出来。顾亭林提倡读经，主张经学即理学，开创了清人训诂考据之学的先声，尤重礼学。其后经学研究日渐昌明，更有徐健庵、秦味经、江慎修等大家在礼学上的不断努力，至乾嘉诸老，清人的经学和礼学成就都已经非常可观。江慎修虽为汉学宗师，但他的《礼书纲目》深有取于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他又为《近思录》做注，更是表现出对宋学的亲近。可见，即便在汉学最盛之时，汉宋兼采的思路也很重要。在思想上明确标出对宋学的批判态度的，乃是慎修的弟子休宁戴东原。东原猛烈攻击宋儒以理杀人，凌次仲、阮芸台紧随其后，提出了以礼代理的主张。论者多以东原为清代的大哲学家和思想家，殊不知东原之思想与其治经的学问本不可分，而程易畴之《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凌次仲之《礼经释例》，正是以礼代理思想的落实之处。简言之，清代汉学对宋学的攻击，不仅有其经学整理上的理由，更有思想脉络上的依据，相当有力，并不只是意气之争而已。戴东原将汉宋思想的实质差别明确揭示出来，其实是将顾亭林、颜习斋、李恕谷等人对宋学的反思以更集中、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从此之后，汉学

对宋学的批判就不仅是空谈性理、训诂句读不明，而且已经对其性理之说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其中心问题就是礼理之辨，即究竟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伦日用之外的天理。此后的学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后的礼学研究，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而绝不仅仅是考证名物制度而已。

数十年后，汉宋兼采虽已成为学者的共识，但若兼采，就必须克服当初汉宋分途时面对的问题，即必须回应戴东原等人对宋学的攻击，重新厘定礼学和理学的关系。陈兰甫的汉宋兼采方法之所以为后人诟病，正是因为他没能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兼采之路，看上去只是为兼采而兼采，失之于牵强调停。

在诸多兼采汉宋的努力中，定海黄氏一门脱颖而出。元同先生之父薇香夫子十分认真地对待东原一脉对宋儒的攻击，其《约礼说》、《复礼说》、《崇礼说》是对凌次仲《复礼》三篇更深入的展开，《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更是对东原思想的全面回应。薇香治经论学，非常认真地对待东原一系对理学的批评，却依然能够肯定宋儒。至元同先生，更将此一思路展现给了南菁弟子。与凌次仲、程易畴一样，元同先生是通过扎实的礼学研究来面对汉宋之间的思想问题的。其《礼书通故》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书，但非进入到礼学细部很难看出其中的思想用意。而理解元同先生思想的关窍，愚见以为当属《经训比义》。

赵统先生记录下了南菁弟子为元同先生刊刻《经训比义》的有趣经过。元同先生早年即有是书之作，秘藏四十年不肯刊刻，其南菁弟子欲索书一观，先生最后终于出示弟子，也讲了自己不愿刊刻的理由：“是书之作，条析字义，而读陈北溪书者，将谓我违异师说；读东原《疏证》者，将谓我调停宋儒。大道多歧，孰能是正？编辑旧闻，自求印证而已。”元同似很担心他人说自己调停宋儒，而其弟子却认为：“仲尼殁，微言将绝。读是书，炳如日星矣，可以发陈氏之墨守，可以砭戴氏之狂器，诚有功于先圣，大有益于后学。请早付梓，以供同好。”群弟子给此书如此高的评价，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可以对抗戴东原的挑战。在黄先生一再拒绝的情况下，诸弟子趁着老师暂时外出数月，竟自筹资金，为老师刊刻了此书。元同回来后木已成舟，他既为贫寒诸生给自己筹资刻书而自愧于心，更不可能再拒绝刊刻了，只好为它作了《弁言》。

南菁师弟均以为此书有对东原问题的回应，而若看《经训比义》的“理”字一条，却与东原之说一脉相承，完全不同意宋儒的说法。唐蔚芝也记录了元同对东原的评价：“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证》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其实无论薇香还是元

同,对理的看法与东原并无不同,他却又高张汉宋兼采的旗帜,这种汉宋兼采,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陈兰甫主张“理学即礼学”,黄元同主张“礼学即理学”,其区别似在毫厘之间,但这正是南菁派的汉宋兼采最不同于东塾派的汉宋兼采的地方。

元同先生为南菁弟子留下了著名的八个字“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反对以调停的方式兼采汉宋:“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脊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这对南菁弟子影响极深,而其中也正体现了元同先生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他虽主张兼采汉宋,于清代前辈对理学的批评,却是认真吸取的。但他又不肯像凌次仲那样完全否定天理,仍然认为理是一个重要概念。于是,他采取了以礼学来解释理学的方式。在《南菁书院讲学记》中,他说:“而不以礼为权衡,文章虽工,亦郑卫淫哇之声也;经济虽长,亦杂霸刑法之治也;理义虽明,亦庄老虚无之谈也。礼也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崇效卑法,有天地即有是礼。故典曰‘天叙’,礼曰‘天秩’,而谓礼为后起之物,岂其然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恭敬撝节退让,有不能自己者,是礼出于性之自然,而莫可遏,而谓礼为忠信之薄,庸非谬乎?”所谓“礼学即理学”,就在于以礼言理,而不再是前辈所提倡的以礼代理。南菁书院尊奉郑君、朱子木主,并不是要强行将郑君的训诂与朱子的性理牵合到一起,而是在礼学中寻义理,于理学中明礼意。元同一脉的礼学,乃是发明义理的礼学,而不仅仅限于名物制度的考证辨析;这种礼学就是理学,但所言之理,并不是虚灵不昧、在万物之先的天理,而是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体现在揖让进退之间的理。

南菁弟子张闻远在光绪十三年的一份课艺中写道:“天下学术之大端,理学、礼学而已矣。二者一贯,本末之谓也。学于此而能兼通之者,在汉惟郑氏,在宋惟朱子……盖郑氏为礼学大宗,而颇阐发性道;朱子为理学大宗,而尤博通三礼。”其后,曹叔彦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礼所以明人伦,理之不可易者也。汉师礼学,宋贤理学,皆所以修身立道,辅世长民。”二位先生皆深得元同真传。闻远之《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叔彦之《礼经校释》、《礼经学》,都继承了元同先生《礼书通故》的思想取向而发挥之,以探明礼乐之理为要指。其他许多南菁弟子,如唐蔚芝、胡绥之、陈善馥,甚至早期的吴稚晖,无不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黄漱兰将书院命名为南菁,安排对郑君、朱子之木主的祭祀,以及

写下气象雄伟的长联,已经初步奠定了南菁书院的格局与规模;王益吾苦心经营书院,编辑刊刻《皇清经解续编》,使南菁书院为清人近三百年的经学研究做出了一个相当圆满的总结;而黄元同礼学即理学的思想,更是南菁学人的精神所在。其他如缪筱珊、林晋霞、瞿子玖、溥玉岑诸公,也无不贡献于南菁书院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使它在更实质的意义上成为清代经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重镇。

面对书院林立的情况,南菁诸公一开始就为它设计了不同一般的制度。无论在江苏各县严格的课生选拔制度,以经古学为主的分科方式,坚持多年的双院长制度,还是自由研习的学术氛围,都使此书院在清末的诸多书院中脱颖而出。多年后胡适之先生还盛赞南菁书院的教育制度,以为它完全可以和西方大学的研究院相比。

但在愈来愈猛烈的西学冲击面前,南菁诸公虽然总希望能通经致用,却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翻看元同、益吾时期的课艺,多有讨论兵制、阵法、算术的题目,但对于如何应对西学,却仍然没有头绪。元同先生掌教十五年之后,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离开江阴,而当时的江苏学政正在讨论在南菁增设西学的问题。元同在《示诸生书》中告诫弟子们说:“夫中土士人文弱,必不能手执艺事如西人之不惮烦,即有知其法,亦能说不能行,曷若《大学》之教‘三达德’、‘五达道’,率我性分所固有,事事可见诸实践,无烦援其所不及,强其所不知,如西学凿智斫性之为哉!《大学》之法,具在六经,能谨守其教而审行之,人才自出,国家可兴,如谓非西法不能靖世,岂中国数千年之天下皆泯焚之世邪?如谓时势有不同,岂知与时变迁者,其术也,而道亘天地而不变。”七十一岁的黄元同先生归隐杭州,一年以后离世,没有亲眼看到西学带来的巨大动荡,更没有看到南菁以后的境况。

此后,南菁书院改为学堂,南菁的辉煌也就慢慢暗淡了。南菁书院最优秀的课生们必须面对他们的老师没有遇到的天下大变。南菁诸师本就与张南皮有密切关系,南菁弟子如陈善馥、曹叔彦、张闻远相继进入湖广幕府。根据陆胤的研究,南菁与东塾两派,是南皮幕府最重要的组成人员,而两派的共同主张正是汉宋兼采。他们在南皮幕中,也接受了中体西用的主张,其后叔彦经营存古学堂,闻远在家经营松江中学堂,都积极地推行物理、化学等西学教育。光绪末年,朝廷为配合立宪,准备修订《大清通礼》,曹君直、张闻远、钱复初、胡绥之等南菁弟子均入礼学馆,礼稿初订而辛亥之变发生。

面对辛亥鼎革,南菁弟子的表现非常不同。唐蔚芝审时度势,劝宣统皇帝下诏

逊位，其后主持上海交大、无锡国专，桃李满天下，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继承了南菁书院的精神；胡绥之入北京大学执教，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书，成为著名的文献目录学家；吴稚晖则参与了反清革命，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而张闻远、曹君直、曹叔彦、钱复初等人则矢志为清守节，隐居乡里，著书授徒，在他们的经学著作中，将元同先生的学脉发扬光大。曹君直于民国十二年谢世，弟子王欣夫将其遗著刻为《笈经室遗集》，复初作序，叔彦作传；张闻远于民国十三年谢世，其甥封衡甫为刊刻《茹茶轩文集》；钱复初在抗战结束后的民国三十四年谢世，严载如、王欣夫等先生将其文集《待烹生文集》与闻远之《茹茶轩续集》合刊为《云间两徵君集》，叔彦为作序，并为闻远作传；曹叔彦则于1953年去世，大概是辫子留得最长的人了，耿耿孤忠，晚景凄凉，朋友去世时他为朋友刊刻文集、作序立传，但这位活得最长的南菁经学传人、前清遗老却已无人为其刊刻文集了，所幸还有弟子王欣夫存其书，沈凤笙传其学，尚未完全中绝。

在当初元同先生执教、闻远、叔彦问学之处，赵统先生向我展示了南菁盛时的一个个故事。时至今日，除去建院时的六块碑刻外，南菁书院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惟有江边石壁，山间明月，或许还存留着一点前朝的遗韵。

几年以来，我数次赴江阴，平时亦与赵先生颇多书信往还。不记得是哪一天了，赵先生终于下定决心将他收集的这些写出来，重修《南菁书院志》。其间，我帮他查了《清代诗文集汇编》中的一些内容，也将我收藏的一些课艺发给他。赵先生治学极为认真、严谨，小至一个细节、一个标点，都必反复核实，不断推敲。比如，在我收集的课艺中，有光绪十二年九月闻远《读胡氏〈仪礼正义〉》三篇经学课艺，其中两篇收入《南菁讲舍文集》和《清儒学案》，课艺后的评语评价极高：“《读胡氏正义》详述渊源，穷搜根柢，菁华毕露，毫发灿呈，求之于古，则晁公武、陈直斋诸人未能如此精审；拟之于今，则顾千里、严铁桥、钱警石诸先生可与伯仲颉颃。阅卷至斯，喜甚佩甚。”既然是针对礼学课艺的，我想当然地认为这应该是元同先生的评语，足以证明元同对闻远的欣赏。赵先生对照其他课艺上的笔迹，却认为这应该是王益吾所写。我们就此争论了多次，最后赵先生告诉我，根据元同先生文章中所记，光绪十三年九月他应该不在江阴。我在反复思考之后，觉得还是他说的对。

赵先生也非常谦虚，他最后决定，将此书写成一部以资料为主的书，因为感觉保存资料似乎比他的评论会更有价值。因此，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保存了很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不少是全文抄录，因而会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

《南菁书院志》的体例很独特。全书共分三编：上编叙述南菁书院的制度沿革，非常清晰明了；中编叙述书院当中的治学与教育，不仅把元同先生的治学理念铺陈得很丰富，更把师生之间的交往描画得栩栩如生；下编则是部分南菁师生的传记，将南菁诸公的生平行事放在晚清民国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立体地呈现出来。在传统中国，方志本就是一门很精深的学问，好的志书很不容易修成。赵先生的这部书，考证精详，条理分明，非常好地继承了方志纂修“贵因不贵创”的传统；而作为一部书院志，《南菁书院志》又将学案与方志的写作结合起来，使南菁师生的治学理路、文化影响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读者们读其书，想其人，或者也能如我一般，在江边小径，听赵统先生娓娓讲述南菁的故事，追忆一百年前读书治学的每个瞬间，想象南菁诸子各自不同的风骨气象。黄漱兰虽气魄宏大地说“斯楼应许附千秋”，若无黄元同、王益吾、南菁诸弟子，此话就早已成为虚言；南菁诸贤皓首穷经、守先待后，若无赵统先生今日的工作，恐怕知道的人也已寥寥无几；《南菁书院志》帮助我们慢慢回到这早已毫无痕迹的南菁旧址，追溯每块碑刻背后的故事，但若无人能够把南菁的故事讲下去，几代人的努力恐怕也终将淹没在滚滚的长江之中。

乙未春于仰昆室

目 录

序一	杨培明	1
序二	王伊同	1
序三 斯楼应许附千秋	吴 飞	1

上编 南菁书院的沿革

第一章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	3
第一节 创建南菁书院的历史背景	3
一 江苏学政衙署设在江阴而使江阴成为全省的文化枢轴	3
二 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	6
第二节 黄体芳于光绪八年创建南菁书院	9
一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9
二 黄体芳在江阴另建南菁书院的原因	10
三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的因缘	14
第三节 南菁书院创建时的规模和设施	24
一 藏书楼和讲堂及斋舍	24
二 光绪九年书院落成并开课	27
第四节 建院经费	28
一 南菁书院头门勒石	29
二 各官街名捐数支存勒石	29
三 对两块碑记的一点考释	30
第五节 张文虎和黄以周先后主讲南菁书院	32
一 张文虎于光绪九年主讲南菁书院	32

二 黄以周于光绪十年继讲南菁书院	34
第六节 南菁书院的监院与经董	38
一 监院	38
二 经董	40
第七节 南菁书院专课通省经古	41
一 课生经甄别入院研习经学古学	41
二 课生膏火与奖金	42
第八节 书院命名“南菁”	43
第二章 王先谦开创书院的学术辉煌时期	45
第一节 王先谦接任江苏学政	45
一 劝学琐言	45
二 院课均遵旧章	51
三 增设院长	52
第二节 王先谦设立南菁书局	55
一 开设书局	55
二 筹集经费	59
三 刊刻《皇清经解续编》	61
四 刊刻《南菁书院丛书》和其他书籍	73
第三节 关于《皇清经解续编》	77
一 《续经解》概况	77
二 《续经解》与前《经解》比较	79
三 版本价值与留下的遗憾	81
第四节 王先谦与南菁沙田	84
一 王先谦《南菁沙田记》	84
二 费姚捐田	87
第三章 南菁书院的继续发展	91
第一节 杨颐扩充书院规模	91
一 王先谦离开江阴	91

二	杨颐上任伊始仍循双院长新章	92
三	继续处理南菁沙田事	93
四	杨颐扩充南菁书院规模和增加课生膏火	95
五	又恢复聘请一位院长之旧章	96
六	加试时艺	99
七	黄以周刊刻《南菁讲舍文集》	100
八	奏请书院院长常川住院	101
第二节	溥良遵循书院旧章	102
一	费念慈与溥良谈南菁事	103
二	溥良刻《南菁札记》	105
三	黄以周刊刻《南菁文钞二集》	106
第三节	龙湛霖对书院的“西化”改革	107
一	添课西学	107
二	整顿沙田经济与提高课生待遇	109
第四章	书院改办高等学堂	111
第一节	瞿鸿禛遵旨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	111
一	瞿鸿禛主政南菁书院	111
二	瞿鸿禛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	116
第二节	南菁书院再次奏改高等学堂	119
一	李殿林奏改“南菁书院”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	119
二	丁立钧由南菁书院院长改为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	125
第三节	李殿林、唐景崇相继主政南菁高等学堂	131
一	丁立钧、丁立瀛、刘奉璋应李殿林之聘相继出任总教习	131
二	唐景崇主政南菁学堂	134
第四节	南菁改办高等文科学堂	136
一	学政裁撤与提学使司的设立	136
二	南菁改办高等文科学堂	139
第五节	南菁书院之流风余韵	143
一	京师大学堂与无锡国专	143
二	南菁书院同学聚会	146

三 校庆活动与老课生手泽	149
四 胡适的最后一首旧体诗	153

中编 南菁书院的治学

第五章 学使主政和院长主讲	159
第一节 学使主政	159
一 历任学使	160
二 聘请院长	161
三 选拔课生	162
四 掌管书院经济	169
第二节 院长主讲	169
一 院长题名	169
二 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	170
三 学政与院长在院务中的交合	173
第六章 书院自由的治学风气	176
第一节 课生自由研习	176
一 吴稚晖《讲舍杂录》之入院回忆	176
二 唐文治《南菁日记》中初入书院的记载	178
三 入院肄业平等自由	182
四 自由研习经史词章	188
五 勤作日记和札记	197
第二节 治学之余	199
一 登临君山	199
二 瞻仰三公祠和睢阳庙	200
三 多才多艺	202
四 文人相轻	203
五 遗闻轶事	204
第三节 师生之谊	207
一 南菁诸生对张文虎的怀念	208

二 黄以周与南菁诸生之情谊	208
三 其他师生情谊之点滴	211
第四节 南菁同窗友谊的回忆	212
一 唐文治悼念同窗亡友之至情至性	212
二 吴稚晖笔下的南菁同窗	215
三 其他南菁学人的回忆	217
第七章 南菁书院的治学理念、方法和成果	220
第一节 汉宋兼采	220
一 “汉宋兼采”的学术背景	220
二 书院尊祀郑玄和朱熹	221
三 尤重郑学	222
四 不薄宋学	223
第二节 黄以周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226
一 “郑注”义理之精“引而不发”	227
二 经学即理学	228
三 治经当以经为主	230
四 为学贵在静专	231
第三节 黄以周与南菁诸生讲学论道	233
一 老师“讲贯”与学生“进讲”	233
二 师生合作进行学术研究	235
三 弟子校勘老师著作	236
四 指导诸生“馀不敢尽”的治学方法	237
五 与诸生讲学论道	239
第四节 浙东学术的影响	243
一 黄体芳创设南菁本意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243
二 黄以周与浙东学术	244
三 南菁诸生受浙东学术影响	245
第五节 南菁讲舍文钞	248
一 南菁讲舍文集	248
二 南菁文钞二集	252

三 南菁文钞三集 253

下编 南菁书院的人物

第八章 南菁书院名人传	259
第一节 师长	259
黄体芳	259
王先谦	267
杨 颐 溥 良 龙湛霖 瞿鸿禛 李殿林 唐景崇	276
张文虎	286
黄以周	294
缪荃孙	315
林颐山 王亦曾 陈昌绅 华世芳 丁立钧	326
第二节 院生	344
张锡恭 曹元忠 曹元弼	344
胡玉缙 于 鬯	367
唐文治	377
陈庆年 赵圣传	386
朱铭盘 陈玉树	404
谢钟英 孟 森 丁国钧	413
庄蕴宽 赵椿年 夏仁虎	423
吴敬恒	436
钮永建	444
汪凤瀛 汪荣宝	449
丁福保	458
蒋维乔	464
金天翮	469
第九章 南菁书院历年学友录	472
书院时代	473
光绪九年(1883)	473

光绪十年(1884)	482
光绪十一年(1885)	483
光绪十二年(1886)	495
光绪十三年(1887)	500
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1888—1890)	507
光绪十七年(1891)	525
光绪十八年(1892)	532
光绪十九年(1893)	538
光绪二十年(1894)	547
光绪二十一年(1895)	555
光绪二十二年(1896)	570
光绪二十三年(1897)	578
光绪二十四年(1898)	581
光绪二十五年(1899)	587
光绪二十六年(1900)	596
光绪二十七年(1901)	597
光绪二十八年(1902)	610
光绪二十九年(1903)	613
《学友录》补遗	616
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	616
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1886—1890)	620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	62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	623
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时代	625
预科第一届	626
预科第二届	633
《学友录》人名索引	640
参考资料	650
后记	663

上 编

南菁书院的沿革

第一章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

第一节 创建南菁书院的历史背景

一 江苏学政衙署设在江阴而使江阴成为全省的文化枢轴^①

(一) 学政

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黄体芳(1832—1899),在两江总督左宗棠(1812—1885)的鼎力支持下,于光绪八年(1882)创建于江苏省江阴县城内中街。

清代学政,每省一人,由皇帝钦派,到任后,不受地方督抚节制。学政的职责是“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②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③也就是说,全省的读书人,由童生考取生员入学,全要经过学政之手;而对各级学校中的老师(府学教授、州学正、县教谕和训导)以及各生员的考核,也全由学政一手操持。可见学政地位之清贵、权势之显赫。学政一届任期为三年。

清代学政往往还有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秘密向皇帝打小报告,即所谓“密疏”,其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④学政实际上也就成了皇帝在各省的耳目。

因为江浙地区文风最盛,所以,朝廷常常简派二、三品官员担任该地区的学政。

① 关于本小节所述内容,可参见拙著《江阴明清学政》,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历史文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案:岁试,为学政按临各府州甄别生员(俗呼秀才)优劣而举行的考试;科试,为生员应乡试考举人所举行的资格考试。岁、科两试必须在学政的三年任期内完成。童生考生员,也是三年两试。

③ 《清史稿·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45页。

④ 《清史稿》传一百六十一,李振祜“督山东学政,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白镛“督安徽学政,诏密询地方利弊”,史致俨“督河南学政,自滑县匪平,犹有伏莽,密诏侦察”,姚元之“督河南学政,……又密陈河南与安徽、湖北交界地多捻匪,陈州、汝宁盐运迥殊,土匪把持”。传一百六十四,顾莼“督云南学政,道经河南,见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密疏陈谓不早根治,恐酿巨患”。可见,学政在外,大都有“密疏”之责。

(二) 江阴乃江苏学政衙署所在

一般省份的学政衙门大都设在省城,但江苏学政^①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起,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裁撤学政止,近三百年的时间,却一直驻节江阴。^②江阴只是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小小县城,却怎么会成了学政衙署所在地呢?

明万历年间礼部侍郎常州孙慎行(1565—1636)说得非常简明扼要:“设为院(案:督学察院),则常(案:常州府)之江阴,以为地僻且道里均也。”^③两个原因:一是江阴地处偏僻,不似府城(如苏州、江宁)喧闹,有利于士子安心考试。另外,还可减少诸如请托、贿买秀才之类的弊端发生。府城中士绅多,关系复杂,由此产生弊端的机会就多。^④二是江阴的地理位置刚好处在苏、松、常、镇四府的中心。苏南各处士子赶赴江阴考试,道里大致均等。苏北虽然幅员辽阔,但经济文化自不能与苏南相比。这从行政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明代苏南有四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⑤而苏北仅有两府(扬州、淮安)一州(徐州)。^⑥所以,不大可能会将学署设在苏北。再说,苏南、苏北之间往来,从江阴渡江也极为便利。长江在今江苏境内,从南京滔滔东流,由沪入海,江阴适在其中,且因江面最为狭窄而成为便捷的过江渡口。古时的交通工具,南方以舟楫最为便利,学政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得外出按试各府州,舟遥遥以轻飏,江阴因其“地僻且道里均”而成为江苏学政的驻节之地,也就很自然的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因学政还须考核武生,所以要兼提督衔,而江阴形势险要,为长江咽喉,所以朝廷要派大员坐镇于此。^⑦这恐怕不太可信。

江苏学政以江阴为中心,四出按临全省八府三州共十一个考区,终年不息,竭尽舟车之劳。民国时期江阴老报人徐再思,曾对光绪年间江苏学政按临各府州的

① 明代或称南直隶苏松学政,清代前期则称江南学政。江苏学政之称谓,似至雍正四年(1726)才出现。

② 据商衍盛称,清代各省学署不在省城者,仅有三处:江苏学政驻节江阴县,安徽学政驻节太平府,陕西学政驻节三原县。另外,顺天学政驻节通州,亦不在京城。商衍盛:《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孙慎行:《新建督学察院碑记》,崇祯《江阴县志》卷五。

④ 案:关于此点,乾隆《江阴县志》卷四《宪署》,于学署建在江阴之原委,说得较为委婉,真有诗人温柔敦厚之旨:“澄江(案:江阴古称,沿用至今)蕞尔邑,独为文衡建节地,岂非以峰回川驰,足供儒臣吟啸,且地属阻僻,非轮蹄经历之孔道,可以息群嚣而资静镇与?”

⑤ 清代,南直隶改称江宁府。雍正以后,分置太仓直隶州。这样苏南有五府一州。

⑥ 徐州,清雍正年间才升为徐州府。但又分置海州(今连云港)、通州(今南通)。这样苏北有三府二州。

⑦ 何圣生《檐醉杂记·学政驻府县》:“各省学政皆驻省城,惟江苏学政驻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太平府,陕西学政驻三原县。学政因试武生,皆兼提督衔,当以三处地皆险要,置大员以资坐镇耳。”见杨寿桐编:《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情况,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学政抵江阴后的次年正月)由江阴出发,先考苏州府,次考松江府,次考太仓州,次考镇江府。(镇江行辕考棚在金坛县,余在府城中。)至五月回江阴,考常州府。考毕,学使在署歇夏。至七月,仍由江阴出发,先考江宁府,次考淮安府,次考扬州府(行辕考棚在泰兴^①),次考通州。考至十月,回江阴度岁。以上各府州所考者,皆系岁案。

至第二年开春,学使由江阴水道至镇江,渡江至清江浦,舍舟登陆,径至徐州,考徐州府属。先考岁案,次考科案,同时连续进行。徐州考毕,再由陆路往海州,考海州各属,办法亦与徐州同。徐、海两府州因岁、科两案连续考试,费时倍于他处,每处约须四、五十日方能蒞事。考毕海州,回至清江浦,乘船回江阴,约在五月初旬,开始考常州府科案,考毕歇夏。殆入秋,再考苏、松、太、镇四府州科考。待镇江考毕,已近岁底,学使回江阴过年。

至第三年春,学使渡江先考淮安属,次考扬州属,次考通州属科案。通州考毕,回江阴歇夏。七月,学使前往南京,考江宁府科案。考事结束,遂为全省各属贡监生员录遗。^②

学政在考试之日,点名阅卷,往往通宵达旦而劳苦不堪。清人梁章钜说:“掌文柄者,以学政为最难。各项试官,不过端坐较阅而已。而学政则兼有舟车之瘁,夙兴点名之苦,内外防弊之劳,且所阅之卷较多,而揭晓之期尤迫。”^③这“瘁”、“苦”、“劳”、“多”、“迫”五字,道尽学政之辛劳。

然而,朝中京官尤其是翰林们,对能外放试差(案:乡试考官)或学差(案:学政),却趋之如鹜,毫不嫌其劳累。原因是“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五十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份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金而已。”^④“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⑤所以,即使苦一点,而所得

① 按:泰兴,误,应是泰州。有清一代,扬州府考棚始终在泰州。且光绪时泰兴早已划属通州,不属扬州府。

② 案:徐氏年少时曾亲见江苏学政行事,年轻时又亲身踏勘学政衙署遗址,并查阅过学政废署内遗存零星档案,对于光绪年间学政行踪的描述应当真实可信。徐再思:《澄江旧话·学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61页。

③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四《官常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7年版,第101页。

④ 何刚德:《春明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版。

⑤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能“终身用之不尽”，便也觉得虽苦犹乐了。

由于江阴是江苏学政驻节之地，所以虽然是一个蕞尔小县，却成为当时全省的文化教育中心。近代学者丹徒柳诒徵就曾这样说过，“江阴者，提督学政驻节之地。故虽一僻县，而为文化枢轴”。^①

二 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②

(一) 清代江阴的暨阳书院

江阴之有书院，自元代始。经明入清，如同其他地方的书院一样，没有什么发展。这是因为朝廷害怕书院广聚生徒，评议朝政，对其统治不利，所以对书院一直采取了抑制的政策。然而，书院历经宋、元、明三代，在士人中有很深远的影响，朝野上下要求兴复和发展书院的呼声不绝。同时，清初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对士人又采取利诱笼络的手段，使得当时的书院已由明末的讲学为主，间又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完全转变成与科举融为一体的特殊的学校了。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朝廷逐步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③雍正十一年（1733），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上谕：

各省学政以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④

将原来的消极抑制，转化为积极兴办，并加强控制。这样一来，书院全由官办，

①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稿》，《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② 本小节所述内容，可参见拙著《江阴书院史话》，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③ 参见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④ 索尔纳：《钦定学政全书》卷七十二《书院事例》，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经费由政府拨给,书院的山长后来也由各省督、抚、学臣聘请,书院也就逐步被改造成官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鼓励,各地书院如燎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江阴当然也不例外。

江阴元代原有澄江书院,至清初早已废圮。直到乾隆三年(1738),即雍正帝发布“直省省会建立书院”上谕后仅五年,江阴知县蔡澍奉江苏学政张廷璐(安徽桐城人,张英之子,张廷玉之弟)之命,在城东栖霞精舍(禅寺)旧址上,重建澄江书院,并延请邑人沈涛(乾隆二年进士)任院长。^①蔡知县还拨出公田五十余亩,以供书院师生的膏火(生活补助)和奖金,不足部分,又与张廷璐一起拿出各自俸禄来补助。学政张廷璐与知县蔡澍对澄江书院有重建之功。张廷璐离任后,其后任刘吴龙也慷慨“分俸一如张公”,还“亲临书院训迪之”。可见,澄江书院一开始就得到了江苏学政的关爱,而书院培育士子也卓有成效,那些在岁、科两试中取得秀才功名,或者食饩补廪者,多出自书院。

过了几年,又将澄江书院从城东迁至学宫旁的旧讲堂地,重加扩建。乾隆二十年(1755)光禄寺卿李因培来督江苏学政,对澄江书院视察一番后,认为“规制未备”。于是经过三年的准备,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大兴土木,再次修整。李因培将落成的书院名字,由“澄江”改为“暨阳”(澄江或暨阳都是江阴古称)。还为书院请来著名学者卢文弨主持讲席。^②这样,从单纯培养八股人才、博取秀才功名的澄江书院,变成了也兼讲学术的暨阳书院。李因培如张廷璐一样,对江阴书院的建设都有首创之功,而暨阳书院处于江苏全省教育文化中心的江阴,所以暨阳书院也就等同于省会书院。^③

(二) 李兆洛主讲江阴暨阳书院^④

暨阳书院先后延聘知名学者如卢文弨、李惇、李兆洛等来主持院事,其中李兆洛的影响最大。

李兆洛(1769—1841)主讲暨阳书院十八年(1823—1840),成就的读书人最多,“四方舛舟问学者无虚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讲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

① 蔡澍在《重建书院记》中说:“桐山张公视学江左,雅意作人。余以雍正乙卯(1735)冬吏兹土,承张公指,延邑进士沈君次山主教席。”见光绪《江阴县志》卷五《书院》。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李因培:《兴建书院记》,光绪《江阴县志》卷五《书院》。

③ “江阴者,提督学政驻节之地。故虽一僻县,而为文化枢轴。‘暨阳’之资(格)地(位),视省会书院。”见柳诒徵:《江苏书院志稿》,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④ 参见拙作《卢文弨和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一体者。”^①民国年间，江阴籍学者缪荃孙主纂《江阴县续志》时，根据《国朝师儒统系表》，录为《江阴学案》入《续志》（见卷二十五），其中属李兆洛门下者，有缪仲浩、缪尚浩、夏灏、徐思错、承培元——陈熙治（按：陈为李之再传弟子）、宋景昌、夏炜如——子勤邦（按：夏勤邦为李之再传弟子）、六承如、六严、陈荣邦共十二人。缪原注：非江阴人不录。其实，即便是江阴籍弟子，非以学术鸣于后世者，缪亦摒除不录，如季芝昌（道光十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军机大臣，闽浙总督）、夏子龄（道光十六年会试第一名）、郑经（道光十七年丁酉江南乡试第一名）、曹毓英（道光十七年丁酉拔贡，廷试得七品小京官，后中举人，官至军机大臣）等。对于李兆洛在暨阳书院的讲学成就，历来评价很高，桐城学者姚莹甚至认为“东南讲学，先生一人而已”。^②

《江阴县续志》卷二十六《杂识》，对李兆洛“造就寒畯”之事有生动细致的叙述。穷书生宋景昌，生活潦倒，以“拆字糊口”。适逢“暨阳书院月考，杨舍镇董蔡某，未应课。宋用其卷作文，案发，取第一。会蔡谒山长，李誉奇文，蔡茫然。乃飭书办细查，知为宋作，李命其舍旧业，入院读书，食之教之，遂得历算真传。”又有申港缪尚浩、仲浩兄弟二人，“年甫冠，肄业暨阳。因家贫，各设馆训蒙。逢月考，恐荒馆政，轮流入城应课：兄往，代弟作；弟往，代兄作。寄宿张公书院，一席一被外，无他物。为李山长所知，亦令舍馆住院，给其饮食，后皆为通人。”修《志》之人不禁称赞道：“李掌教最久，造就寒畯亦最多，无怪至今犹啧啧人口也。”

《续志》又记有一事，乾隆年间，暨阳书院由卢文弨主讲时，曾悬有一块名为“辈学斋”的匾额。“四十年后，而李兆洛继之，寻是额而不可复得，乃补书之，并为楹语曰：‘薪木百年馀手泽，文章几辈接心传。’”李兆洛本是卢文弨主讲常州龙城书院时的及门弟子，如今又在老师昔年主讲的江阴暨阳书院，重蹈先师旧迹，不禁感慨系之。李以继承卢师讲学自居，而其培养寒畯，犹非他人所及。李兆洛掌教期间，是暨阳书院的全盛时期。

咸丰年间，战乱延及江阴。兵燹过后，书院“瓦砾榛芜，生师散处”。同治十一年（1872），江阴知县林达泉筹款重建，并改院名为“礼延”，有纪念延陵季子（季札）的意思。^③这时，书院名义上虽仍属江苏学政管辖，但实际过问书院事务的是江阴

① 包世臣：《李凤台传》，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三。案：李兆洛曾任过安徽凤台知县。

② 转引自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影印本 1991 年版。

③ 林达泉：《重建礼延书院记》，载光绪《江阴县志》卷五《书院》。

知县，已不可与昔日的暨阳书院同日而语了。

十年后，即光绪八年(1882)，南菁书院悄然崛起，“代暨阳而兴，彬彬焉为人文渊藪。”^①自此，江阴乃至江苏的文化教育进入了南菁时代。

第二节 黄体芳于光绪八年创建南菁书院

一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累迁侍读学士，频上书言时政得失。”弹劾大臣，“直声震中外”。^②

光绪六年(1880)八月，黄体芳以詹事府少詹事出督江苏学政。七年，在江苏学政任内，升詹事府詹事，又连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连任江苏学政，升兵部侍郎。就在这年，黄体芳为江苏士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那就是在学政驻节之地江阴筹建了南菁书院。建院三年后，当黄体芳于十一年离任时，写了一篇《南菁书院记》，叙述建院缘由和过程以及对书院士子的谆谆教诲，并将该《记》镌刻勒石。^③录全文如下：

体芳以光绪六年继仁和夏公督学于江苏。八年竣事，奉恩命仍留，益恐恐焉，以仍久不效为惧。而所见人士之秀萌而未达强，有其质而不能自立者，槩乎日营于吾之心中，于是谋就江阴建书院一区。

江阴在江苏四方为中，而书院附于学政，为士之所归，循而擅之可以久。体芳则以是告前总督左文襄公，公欣然许，奏拨盐课二万两，为束脩膏火之资。于是体芳与同官出资庀材为庐，择县人曹君佳实董其事。经始八年九月，成于九年六月。既成，乃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曰“南菁书院”。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祫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所

①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稿》，《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② 《黄体芳传》，《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总第12449页。

③ 该碑现存南菁中学校内。该《记》实为通州范当世代作，时范正在黄体芳学幕中。案：俞天舒辑《黄体芳集》，卷四《杂著》收有此《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页。据编辑者称，是据温州图书馆所藏杨绍廉辑《瓯海集·内编（卷三）》抄本所录，故该《记》中有不易辨认之字，编辑者则用空格代替。现南菁中学所存黄体芳亲书之碑，无一字漫漶，可用来校勘俞本。

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礼致训诂词章兼通之儒以为之师,而征求各行省官刻书籍以度乎其中。于是既敕既周,檄下诸郡,各以其异等诸生四面来至。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经史杂著之课,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以至于今三年矣。

人才之兴,无非为国家者。先圣先贤诚知夫国家须才之事日新无穷,而不能尽有以待之。故惟是充其本原,而强乎其不可变之道,以待无穷之变。乃其所以层累结缔以至于若此之伟者,亦莫善于读书。且古之人以弦歌之身,一旦出而绥天下,彼非倖天者也。彼通乎一经,则存乎三代圣人之心;而操乎一艺,则忘乎天下众人之利。心圣人而忘利者,与夫谈谋略、崇机械之人,为孰可冯焉?

今之事变,前代所未有,盖时务方兴而儒生左矣,要其所以不振,岂为攻乎夷狄者少哉,独少吾所谓儒人者耳。诸生生长是邦,熟睹乎乱败之由,而务为反经以求其实。要知从古圣人拨乱世反正之道,不能独穷于今兹,而本朝圣人经营之天下,事事足以万年,不能不归咎于儒术焉。

体芳且行矣,十年之后,庶有归唐之文、顾秦二王之书,^①复兴于东南者乎?然使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君子以为天也,而庶其有存焉者乎?非体芳之所逆睹也已。

光緒十一年九月,兵部左侍郎江苏学政瑞安黄体芳撰并书。

句吴钱邦镗刊石

二 黄体芳在江阴另建南菁书院的原因

(一) 欲挽江苏衰替学风,重现昔日暨阳书院辉煌

清代,江苏有很多著名的书院,如江宁的钟山、尊经、惜阴,扬州的梅花、安定,苏州的紫阳、正谊,享誉大江南北。然自咸同战乱以后,江苏经济、文化摧残至巨。至同、光年间,书院虽有恢复,然元气大伤,已无昔日辉煌。且这些书院大都课以制艺,不复以经古训士,学风衰替。

江阴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江阴有礼延书院,其前身为暨阳书院,因江阴是江苏学政驻节之地,所以暨阳书院的资格、地位等同于省会书院,自乾嘉以来,讲学风气盛行不衰,主持院务者均为讲习经史词章的饱学之士。张文虎说:“旧有暨阳书

^① 案:归唐,归有光、唐顺之;顾秦二王,顾炎武、秦蕙田、王念孙、引之父子。秦蕙田著有《五礼通考》。

院,余姚卢学士召弓、武进李大令申耆先后主讲席,流风余韵上下百年。”然而,自遭战乱后,“士族解散。兹虽规复,制艺以外,鲜治旧业”。黄体芳看到现在礼延书院肄业的士子,只知肄习制艺帖括,很少从事经史词章的研究,不禁喟然叹曰:“岂卢、李两先生之教泽止于斯乎?”^①极希望卢文昭、李兆洛等人的讲学风气能流传不替。因此,“议创是院,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②黄体芳于常州前辈学人中,极为佩服暨阳书院山长李兆洛。他在创建南菁书院的同时,还在学署中刊刻了《李养一先生诗集》四卷,并为作序,时在光绪八年(1882)。他在序言中说:

今江苏学术,视乾隆嘉道间稍衰替矣。江阴暨阳书院,先生撰杖都讲所也,当日训诂词章、天算地舆之学,因材而就,济济如林。自余视学下车,询访高第弟子,则亦零落鲜有存者。比方录先生及江苏诸先哲遗文逸事,上之史馆。复于江阴别建经古书院,思得如先生其人者,指授术艺,陶冶士林,徐进之本原之学,以备他日国家之用。语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逢。”此又余叙先生诗而低徊不能置者也。^③

黄体芳希望自己在江阴别创的经古书院,将来能重现昔日暨阳书院的辉煌;更希望能为书院聘请到一位像原暨阳书院山长李兆洛那样的经师人师。

(二) 浙东学派“重事功”的影响

黄体芳是浙江瑞安人,学术上承受永嘉学派,渊源有自。清人称叶适“其学问大抵熟于史事,偏重事功,不以义理之说为然”。^④此话虽说是针对南宋的叶适而发,但不也是黄体芳本人的真实写照吗?黄体芳早在京师时,便“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当他外放江苏学政时,终于将言谈付之于行动。他在江阴学署重刊乡先贤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光绪十年五月付刊,十二月刊成”,并在次年离任前三月为之写了序言,对叶适、陈傅良等永嘉学者不受主流学界的重视而深表同情:“盖朱子曰‘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独疑水心、止斋数人者偏于斯耳。若务以事功为不足重,则国家安赖此臣子?且所谓‘民胞物与’者,果何为者乎?体芳愿与读是书者论之矣。”^⑤而创建南菁书院,更是黄体芳在江苏学政任上的一大“事功”。论者

① 张文虎:《南菁书院记》,该碑今存南菁中学。该碑全文参见本章第五节。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

③ 黄体芳:《李养一先生诗集序》,俞天舒编:《黄体芳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50页。

④ 刘声木:《菴楚斋四笔》卷七,中华书局1998年版,总第817页。

⑤ 黄体芳:《习学记言序目·序》,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0页。案:中华书局点校本,用的底本正是黄体芳在江阴学署的刻本。

以为此举可与昔日阮文达公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力扶实学，造就大批两浙人才相媲美。不过，黄体芳与阮元不同，并不偏重于汉学的研究，似更重视对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在《南菁书院记》中说得很明白：“然使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

（三）认为书院乃造就人才之所

黄体芳身为学政，以造就人才为己任，但他对当时江苏学界的情况深为担忧，他说：“所见人士之秀萌而未达强，有其质而不能自立者，粲乎日营于吾之心中。”因此，他十分希望读书人能早日成才。甚至当“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而要涌现出众多经世致用的人才，自然只有读书一途，他说：“人才之兴，无非为国家者，先圣先贤诚知夫国家须才之事日新无穷，而不能尽有待之，故惟是充其本原，而强乎其不可变之道，以待无穷之变。乃其所以层累结缔以至于若此之伟者，亦莫善于读书。”^①而书院无疑是给士子提供了读书的最好处所。即便江阴已有专课制艺的礼延书院，但为挽救空疏士风，如今再建一所经古书院，犹如雪中送炭。这在他与江苏布政使谭钧培的信中说得很明白：“雍正、乾隆间屡奉谕旨，饬各省学政择一省文行兼优、秀异沈潜之士，读书省会书院。窃谓作养人才之道，惟此较有实济。”江阴虽非省会，但乃学署所在，所以南菁书院等同于省会书院，且“江阴无省会繁华之习，于读书尤宜。”^②

（四）有感于前任的忠于职守

黄体芳的三位前任均因劳瘁先后病故于江苏学政任上。^③

马恩溥（1819—1874），字雨农，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回族。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提督江苏学政，在任仅半年，便病故于太仓州试院。

林天龄（1830—1878），字受恒，又字锡三，福建长乐人。同治十三年（1874）春，因马恩溥猝死，林便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学江苏。“苏皖为江南大省，分任学政者，大半二、三品大员，林文恭公以四品任之，亦属罕见。”因林是同治帝老师，所谓“在弘德殿行走”。据说，林天龄在同治帝的数位师傅中，“最能持正”，同治帝贪玩，对他有点忌惮，“授读之时，有时休息，穆宗正与太监嬉笑，见林文恭公至，必正色而

①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② 黄体芳：《致江苏藩台书》，《黄体芳集》，第136—137页。案：此时，江苏布政使是谭钧培。

③ 以下内容，均摘自拙著《江阴明清学政》之下编《江苏学政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止”。所以，林之外放江苏，有人推测是“良由穆宗惮其持正，出之于外”。^①光绪二年(1876)，学政报满，奉命留任。四年八月，按试太仓州，病发，林仍带病视事。十月，至松江，刚入试院，“气逆上，不可止。”林怕耽误考生，执意不肯回江阴学署休养，试事如常举行，而终于不起。逝世那天，天刚亮，就起床，“手书四书文题四道，发提调官考试童生”，还对自己不能亲临试场而遗憾。晚上，刚上床，“奄然逝矣”，连后事都没有来得及交待。^②有神童之称的吴县张一麀回忆：“侯官林锡三先生天龄按试江苏，遇幼童辄拔置堂号，以便考察。”“先生造就童稚，爱才若命，惜翌岁即归道山。”^③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仁和人。夏与林一样，也是帝师，所谓“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四年(1878)。光绪四年十一月，夏以兵部左侍郎督学江苏，接替刚逝于学政任上的林天龄。夏将前任林天龄“通持各学禁士子吸食鸦片”的禁令，加以增删修改，成十二章，颁发各学。考试前，一一按验考生左手的食指，发现有吸鸦片的，履历中注为劣等。夏同善对生童十分爱护，覆试之日，“衣冠坐大堂，覆阅正场卷”。文章写得出色的，便命该生到学使案前，一一为他指出试卷中的“瑜瑕”，“海戒谆谆，一如师弟”。^④太仓唐文治回忆光绪六年春被夏学使录取入学情景：“奖赏之日，复通训考生宜崇文行，主忠信，勿干词讼，勿沾染鸦片。辞义至为严厉。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追忆微名所自，每饭不忘。”^⑤该年夏，因“变泻为痢”，逝世于江阴学署。与夏同善同授读光绪帝的翁同龢，在京“闻子松长逝，不觉失声。朝失正人，我失良友，伤哉。”^⑥

马、林、夏三位均能忠于职守，终因劳累而相继卒于学政任上，这应该会给黄体芳以极大的激励，成为他创建南菁书院的一个动因。而后来入南菁书院肆业的士子，有不少就是由马、林、夏三位拔取入学而取得入院资格的。

(五) 回报圣恩

黄体芳是在光绪六年(1880)因夏同善猝死学政任上而继夏督学江苏，临行前

① 刘声木：《莅楚斋随笔》卷八，“林天龄忧勤帝室”，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0页。

② 俞樾：《翰林院侍读学士林君墓表》，缪荃孙编纂《续碑传集》卷十八。

③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应童试得褒”，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夏同善传》。

⑤ 唐文治：《夏文敬公年谱并遗诗后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⑥ 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

晋见两宫皇太后，黄自言：“陛辞之日，蒙谕：‘尔虽在外，有见必言。’臣俯伏敬聆，莫名钦感。”^①至光绪八年（1882）秋，黄体芳按临全省科试和录遗结束，本应卸差回京，不想“奉恩命仍留”，再任江苏学政三年。且在任上屡受升迁，由光绪六年刚上任时的少詹事，至八年留任时已升至兵部侍郎了。黄体芳当然对朝廷的恩典感激涕零，但又“益恐恐焉，以仍久不效为惧”。^②总得做出点成绩，来报答圣上的知遇之恩。于是，这南菁书院的创建，便是他回报圣恩的具体行动。

三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的因缘

（一）左宗棠的鼎力支持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得到了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大力支持。当光绪九年（1883）六月南菁书院落成，并于秋季招生入院肄业时，左宗棠于该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与黄体芳会衔上奏《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动拨盐票项下银两片》：

再，臣前接江苏学政黄体芳函称江阴创建经古书院，名曰“南菁”，仿“诂经精舍”之例，专课通省经古。惟经费不敷，落成有待，请拨款接济，并请筹常年膏火之资等因。臣以学臣倡建书院，系为嘉惠士林起见，用意深远，通省士子如愿入院读书，就正经史之学，概予收录，将来积学之士发名成业者必多。黄体芳夙负文名，幼学攻苦，一时人望攸归，尤宜量为协助，以慰士情。臣比捐廉银一千两，佐书院工料之费，并札两淮运司，于库存淮北票费项下，提银二万两解由学臣饬交江阴县发商生息，以为每年膏火之资，官为经理，年终结算，申报学臣衙门，仍移咨臣署备案，以专责成而便稽考。一面咨会凡有书局省份，将局刻官书各备一部，解发书院存储，俾学者得资翻阅。除由该学臣会商安定章程、以垂久远外，理合将江阴创建书院、动拨盐票项下银两缘由，谨会同江苏学政臣黄体芳附片陈明，伏乞圣鉴，敕部查照。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部知道，钦此。^③

黄体芳与左宗棠的相识，应该是在光绪七年（1881）十月左宗棠总督两江以后，以前两人“未谋一面，未通一书”。^④黄体芳赴江苏学政任还未满一年，便于光绪七

① 黄体芳：《大臣贤老宜令择人自辅折》，俞天舒辑：《黄体芳集》卷一，第22—25页。

②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③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光绪刊本，第9565—9566页。此奏片亦收于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1636页。

④ 黄体芳：《大臣贤老宜令择人自辅折》，俞天舒辑：《黄体芳集》，第22—25页。以下引语出处同。

年八月因左宗棠事上奏朝廷：“……正月间，大学士左宗棠到京，奉旨管理兵部事务兼值军机，数月以来，中外见闻，如开水利、议烟税、核兵册数大端，皆今日切要之图，前此诸大臣置之不论者。左宗棠抗疏直陈，迭蒙俞允。臣逊听风声，欢欣鼓舞，采之舆论，员弁士民皆勃勃有生气，一若我中国圣主贤臣聚精会神，隐有持此不恐之势。臣于是知左宗棠谋国之忠，而益叹皇太后皇上知人之明、任人之专，为不可及也。”可是，“近阅邸报，屡见左宗棠请假”，但“臣知朝廷倚左宗棠为左右手，必不令致位闲居，即左宗棠受恩深重，目击时艰，亦必不忍借口养痾决然引退也”。因此请求朝廷“谕令荐举人才有实足以参与机务者，召入枢廷相助为理”。应该说，这都是黄体芳的肺腑之言，而绝不是官场上的敷衍语。黄体芳此举应得到左宗棠的好感。两月后，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这时，督臣、学臣之间亲密如鱼水，学臣要办南菁书院，督臣自然鼎力相助，除奏拨盐课二万两为书院的束脩膏火之资外，私人还捐银一千贰百两，以佐书院建造工料之费。

黄体芳之子黄绍箕(1854—1908)，曾于光绪八年(1882)应左宗棠之招，谒见于江宁，左很欣赏黄绍箕的才华。黄体芳闻此，很是欣慰，在写给其侄黄绍第的信中提起此事：“恪靖一见汝哥，(渠先有所闻，令其往见。)辄叹为‘大学问，真人才’，赞不绝口。未审此公何所据而云。然正恐将来无以副之耳。”^①

又据当时号称“神童”的吴县张一麀晚年回忆：“余壬午(1882年)中副车(案：乡试副榜)后，十月间往江阴谒学政黄漱兰先生体芳。”“谈次，训小子须多读书，余对以寒士无力买书为苦，先生曰：‘吾已与左季高商定，奏设南菁书院，汝可以选入院中读书。’”^②可见，黄之创办书院，事先早已与左宗棠商定好的。而黄体芳在后生小子张一麀面前，竟然直呼左宗棠之字“季高”，亦可见两人关系此时已非同一般。

南菁书院于光绪九年(1883)夏落成，并于秋季招生入院肄业。南菁书院的奠基人左宗棠应书院的创办人黄体芳之请，为南菁书院亲书题额，并写了跋尾：^③

① 黄体芳：《与侄绍第书》，俞天舒辑《黄体芳集》，第141页。案：编辑者将黄绍箕谒见左宗棠之年定为光绪十年(1884)，疑误。左于该年6月入京，已不在江苏。据宋慈抱《黄绍箕传》称“湘阴左宗棠服膺洛闽之学，绍箕谒之金陵”云云，则绍箕谒见左宗棠应在光绪八年，时左正在两江总督任上，且该年(壬辰)亦是乡试年，黄体芳之侄黄绍第离开江阴学署，正返浙应试，故黄体芳有通信之举。宋慈抱：《黄绍箕传》，收入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十七，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③ 此据南菁中学所存之民国《南菁辛乙级毕业纪念号》所载整理。该文又见《左宗棠全集·文集》卷二《南菁书院题额跋尾》，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光绪刊本1986年版，总第14692页。

制艺代圣贤立言，于文体最尊。自明至今，以此名其家者，不少伟人，大氏依传注以释经旨，宗程朱以探源孔孟，阶级可寻，涂辙自合。望溪方氏奉敕评选四书文，兢兢于此者，盖有由也。

漱兰侍郎视学江南，恐士人之即于空疏也，创为书院，颜曰“南菁”，专课通省经古。余鸠官钱助之，并请各行省所刻官书善本各一部，俾学者得资肄习。讲舍落成，侍郎以堂额属篆，书此贻之。

《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夫子以学之不讲为忧。盖明于心而不宣诸口，则旨趣未畅，其必往复辩论，而后人已共浹洽于中也。博学、审问、慎思之，后继以明辨，义亦如此。惟自顷士习凌夷，狃于科第利禄之说，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其有志于学者，又兢于声音训诂校讎之习，以搏击儒先为能。或藉经世为名，谰闻动众，取给口舌，博声誉为名高，而学术益裂。求如李中耆先生暨阳讲席，训诲后进，恪以程朱为宗者，百不一二也。

侍郎兹^①立经古书院，惧承学者之确而迂，非博参经史，将流于陋也。惟博闻约礼，圣有明训，求博而不反诸约，流弊殆不可胜言，余昔序《马征君遗集》，与夏君弢甫详言之矣。^②今督两江，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涂辙而日跻焉，升堂入室，庶不迷于所向矣夫。

光绪九年癸未仲冬，湘阴左宗棠识并书，时年七十有二。^③

左宗棠亲笔所书“南菁书院”四字题额，今已不存。实际上，早在书院改学堂时，就已被弃置不用了。无锡程宏远晚年回忆光绪二十九年（1903）肄业于南菁高等学堂时所见情景：“‘南菁书院’四字额，笔力坚劲，世不多觐。近改学堂，将旧额易去，弃之一旁，甚属可惜。”^④

左宗棠在《跋尾》中提到他昔日曾为马三俊遗集作《序》之事。今读《马征君遗集·序》，见其不吝笔墨地赞扬桐城马瑞辰、马三俊父子，称他们为学“一以朱子为归”，当“粤寇猖獗”时，竟“先后殉难，何其节之伟也”。再看左宗棠为南菁书院所写的《跋尾》，可见左氏重视士人气节，倡导礼义廉耻，是一以贯之的。他谆谆教诲书院士子应以马氏父子为榜样，为学亦应“一以朱子为归”，并希望南菁书院也能培养

① 兹，案：《左宗棠文集·南菁书院题额跋尾》无此字。

② 马征君，指马三俊，安徽桐城人，马瑞辰之子。马氏父子均死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夏弢甫，夏忻之号，安徽当涂人。

③ 此跋末句，《左宗棠文集》无。

④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记四月廿三日事，1953年家印铅排本。

出像马氏父子这样的“崇礼义，重廉耻，通经学古之士”。^①

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拨银两万两，自捐一千二百两，助黄体芳在江阴建立南菁书院，是其晚年的一大善举。此一善举，并非是其一时兴会，而是由来所自。左宗棠操守清厉，他在癸亥年（1863）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②章太炎称其“身死无羨财，终身衣不过大绸，食不过一肉”。还说他虽官居高位，却不摆臭架子：“初举浙江，数厌卫从，时独行诸书肆间，问其名籍。主人或以一饭延客，饱而舒纸为作榜题，书成而退，主人始知其姓名。”又说他“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笋，言谈时及载籍文章”，而“山泽之仪不禁也”。^③

江苏士子很是感念这位南菁书院的奠基人。南菁书院早期课生武进刘毓麟（后改名可毅），于戊戌年（1898）八月在友朋家见到左宗棠的几通书札，不禁回忆往事：“文襄督两江，阅兵常州，可毅于小南门道旁观之，伟仪容，张须眉，哆口，声如巨霆，而惜未及以后进礼谒。”^④

附：左宗棠《马征君遗集·序》

余每与当涂夏弢甫丈言，皖南北民气庞固，崇礼义，重廉耻，通经学古之士往往而出其间，非它行省所及。今观桐城马氏父子兄弟先后殉难，何其节之伟也。桐城为皖北大邑，望溪、惜抱诸老传朱子之学，晚得植之方氏，箴汉学之膏肓，而一以朱子为归。儒者传道报国之功，顾不大哉！

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独皖中诸君子犹能谨守朱子家法，若桐城之姚惜抱、方植之，贵池之桂丹盟，皆有述焉。方粤寇猖獗时，徽州助饷杀贼，为数甚钜，如婺源、如泾县，如庐州，如桐城，如宣城之金保圩，当涂之二十一村，人自联结，与贼鏖斗，擗格数年，仗义死节之士，不可胜纪。其非朱子之教泽长而诸儒守正之功大欤？夫学术与世运为升降，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风厚，而礼义廉耻由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非细故也。

① 见后附之左宗棠《马征君遗集·序》。

② 《清代名人家书》，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③ 章太炎：《近思》，《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刘可毅：《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书后》，《刘葆真太史遗稿》卷下，宣统二年刊本。

征君之子复震，从余转战浙中，期年事定，将辞余归，请叙征君遗集，余乞改甫推论之如此。至征君忠孝大节，已经朝廷褒恤，平生志趣学行，又详存之鲁生《传》中，可无复述。征君死事时，复震才十六耳，乃能负遗书从贼中穿出，藏之荒谷。近复于军中，鸠手民，刊成此编，亦可谓难矣哉。^①

(二) 地方官员、士绅的大力协助

黄体芳创办南菁书院，得到地方官绅的实心协助。首任南菁书院院长张文虎说，当创建南菁尚在动议之中时，黄体芳就召集“邑廉陈君，张、吴两学师，绅士曹君”共商大计。^②

邑廉陈君，应就是光绪七年起任江阴县令的陈康祺。^③陈康祺“资禀瑰异，工词章”，“朝章国故，及记述时事之书，靡不披阅。前贤轶事，故老传闻，官牍邸钞，说部所载，亦一一搜览”。当时，其所撰笔记“《郎潜记闻》数十卷已风行天下矣。”^④

张文虎晚年来江阴主讲南菁，曾为陈著《郎潜记闻三笔》作过《序》，称：

鄞县陈钧堂大令，以高材擢甲科，浮沉郎署，载籍极博，裒集国初以来朝廷政要、播绅事略、忠节孝义、治术军旅，目览手披，随所记载，以为《郎潜记闻初笔》、《二笔》，择焉必精，语焉必评，间有异闻，辄加考正，诚恐流传失真，自诬诬世也。……君既不得于曹司，乃求改外，以县令来江苏，所至有声。……

光绪九年秋，予应学使瑞安黄侍郎之聘，摄席南菁书院。君适宰江阴，因得读其书而题之，以为非特杂谈琐闻者不能梦见，即本朝掌故之书，如新城、山阳、柳南、蕞塘诸家，^⑤无此博瞻精覈也。……

兹复以《三笔》刊成，属为之序。大抵仍前书体例而更谨严。凡考名人言行，政治得失，世事变迁，胥于是乎有取焉。语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传之后世，当为记载之最，夫何间然。^⑥

张文虎对其著作《郎潜记闻》评价甚高，可见，陈康祺并非一介官场俗吏。当黄体芳为创建南菁书院倡捐时，陈慷慨解囊，捐助大洋贰仟元。固然因陈是书院所在

① 《左宗棠全集·文集》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光绪刊本 1986 年版，总第 14631 页。

② 张文虎《南菁书院记》，碑今存南菁中学。

③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二《职官表》：“陈康祺，字钧堂，浙江鄞县人，进士，光绪七年至十年任。”

④ 董冲：《陈钧堂五十寿序》，《正道堂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5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⑤ 案：疑指王士禛《池北偶谈》、阮葵生《茶余客话》、王应奎《柳南随笔》、戴璐《藤阴杂记》等清人笔记。

⑥ 陈康祺：《郎潜记闻》，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地的父母官，又与学使同治一城，碍于情面，慑于威势，不得不尔。但学使创办书院、培养人才之雅举，对于以风雅自命，喜欢“以经术饰吏治，官私文檄皆出己手”^①的陈县令，自然会引起共鸣，捐出巨款，恐怕也不全出自勉强。可惜黄、陈两人以后关系并不融洽，令人遗憾。^②

张、吴两学师，当是江阴县学教谕张宝书和训导吴应生。^③按惯例，作为儒学教官，他们将是建成后的南菁书院的监院。监院的工作是“点名收卷，发放膏火”^④等具体的后勤事务。

绅士曹君，即曹佳，字镜云，咸丰五年（1855）乙卯入学，附贡生。“凡地方善举，如保婴、官渡等局，均尽心筹划，巡抚卫荣光奖给‘大义可风’额。”^⑤曹佳作为书院董事，自始至终参与并主持了建造书院的具体工作。张文虎追记前事：“是役也，自始至终，曹君实一人经理之。黎明抵工，向晦而去。一炊爨，不沾公，不告劳，不谢病。”^⑥曹佳总是黎明时分即去工地，直到天暗下来才离开。并跟施工人员一起用餐。从不沾公家的一点光，从不跟人说起自己的辛劳，也从来没有因身体不佳而请过病假。缪荃孙主纂《江阴县续志》特为立传，专记他为南菁书院的创建而做出的贡献：“学使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自营缮方式及课士规程，咸与商定。”可惜，黄还没有去任，曹佳便于“甲申九月，病歿”。黄体芳“哭临甚哀”，送上自制的一副挽联“广厦赋诗怜子美，疏篱酬酒哭渊明”，此联借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这里的“广厦”，当然指的是南菁书院，下联则将曹佳比作了陶渊明。曹佳歿后，当南菁书院学者追思黄体芳恩泽，“就书院设位殓祀”，以曹佳配祀。其子“五品衔候选训导”曹启渊，在其父死后，仍接任南菁书院董事，继续操作创建

① 董沛：《陈钧堂五十寿序》，《正谊堂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董沛在《陈钧堂五十寿序》中说：“君则以耻附门生籍，与学使齟齬，借他事被劾罢官。”这“耻附门生籍”之事，待考。而所谓的“借他事被劾罢官”，则缪祐孙致其堂兄缪荃孙一信中提起：“陈钧堂去冬因海疆事积请病假，今春和议成，即开假回任。（律以海疆规避之条，即应革职。）守土之官岂应如是。且去秋闻马江之警，即将家眷连夜送出远避，居民因而惊扰，纷纷迁徙，城闾之内为之一空。黄学使恶之，曾下札申斥，此通国皆知者也。（如作折料，此事在前。）至他劣迹，弟不在邑中，无从探悉。惟其嗜好之深，亦属有凭有据。”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

③ 查光绪《江阴县志》和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二《职官表》：教谕张宝书，光绪四年至十五年任。训导吴应生，光绪二年至十三年任。

④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梅花书院》：“延府、县学教谕、训导一人，点名收卷，发放膏火，谓之监院。”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六《人物·行谊》。

⑥ 张文虎《南菁书院记》碑。

南菁书院的具体事务。^①曹启渊精篆刻，现存的南菁书院的几块碑刻，大都由他篆额。

黄体芳还与省内外地方大员联系，以求资助。他曾写信给江苏布政使谭钧培：

敬再启者，苏省高材颇多，当以培植寒畯为主，□□^②县址近僻，尤以置办书籍为先。晚拟有章程二条，附录呈览，敬乞鼎力玉成，不胜厚幸。

一、学问之功，端资师友。查《学政全书》，雍正、乾隆间屡奉谕旨，飭各省学政择一省文行兼优、秀异沈潜之士，读书省会书院。窃谓作养人才之道，惟此较有实济。本省江宁有尊经、钟山、惜阴三书院，苏州有紫阳、正谊两书院，扬州有安定、梅花两书院，晚意拟酌调三郡属县及各府州县之高材生约五六十名，合以由督抚、藩臬、道府甄别前列，挑选若干名，由山长甄拔若干名，共计百数十名，则就其地之近便，分入三书院肄业，其近江阴者则调入江阴书院肄业，宁严毋滥。大约每处书院不过三四十名，膏火略令从丰，房屋亦须够住，当尚易办。不知苏州书院向章如何？敬求转飭毕太守妥速规划，晚当另函致之。老前辈听政贤劳，不敢重烦兼顾，惟乞一言为重耳。官师月课外，每季另由敝署札发经古题一通，限一月交卷，以尽其才，阅定后由晚捐廉优奖，俾资观摩激劝，于士习文风不无小补。

一、江阴无省会繁华之习，于读书尤宜，独憾邑少藏书，借甌无地。现拟仿江宁官书劝学局之例，本省三书局，除江宁、扬州局书咨请制军札发外，苏州局书应□□□，请贵署札飭该局员，将已刊书籍各发□□□，以资讽览。惟书院现未毕工，榭架亦未办齐，俟来春晚按试苏州时，备咨请领，顷先奉闻。^③

想来，黄体芳请苏州书局将已刊书籍发来江阴，藩台大人自无不应之理，这本是公事。后来勒石成碑的南菁书院捐款名单上有“苏州布政使司谭”，谭私人还捐了数百元大洋（见下第四节《书院经费》中《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勒石》所载）。

（三）父子叔侄与人才济济的学幕

黄体芳督学江苏五年，其子绍箕与侄绍第一直相伴其旁。

黄绍箕字仲韬，光绪六年（188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一等一名，授编

① 黄体芳《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勒石》碑记中，有“据南菁书院绅董曹启渊将捐建书院各衔名捐款支存□数，开具清折呈送前来”云云。

② 此两字当是“江阴”。

③ 黄体芳《致江苏藩台书》，俞天舒辑《黄体芳集》，第136—137页。案：据书末所称“惟书院现未毕工，榭架亦未办齐，俟来春晚按试苏州时，备咨请领，顷先奉闻”云云，则此信当写于光绪八年下半年。

修,后充翰林院撰文兼会典馆提调。然而数年中,黄绍箕在京师供职的时间并不多。当绍箕中进士入翰林院数月后,其父江苏学政命下,于是他便跟随父亲南下到了江阴。^①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堂弟黄绍第(字叔颂)。兄弟二人在江苏学政幕府内,居中调定,出外应接,襄校阅文,交往学人,是黄体芳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黄绍箕的发妻刘氏不幸于光绪七年七月逝世于江阴学政学署。十年八月,黄绍箕续娶张氏(张之洞之侄女),成婚于江阴学署。^②

吴县张一麇于光绪壬午(1882)乡试中副榜后,照例到江苏学署自填亲供,谒见黄体芳。张事后回忆当时情景:“时先生长子仲韬年丈绍箕,为先君庚辰甲榜同岁,以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馆,助乃翁校士。”黄体芳命张一麇明年可入南菁读书,“继命仲韬年丈出见,而先辞客人内斋矣”。^③

关于黄绍第助叔父黄体芳于江苏襄校之事,十年后,其乡前辈孙锵鸣,因贺黄绍第甲午年(1894)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还赠诗提及,孙特于“门前多少新桃李,半是君家手自栽”两句后自注:“令叔淑兰侍郎视学江苏,首尾五载,君与仲弢侍讲皆随侍襄校。”^④诗中“新桃李”,是指被黄绍第取中的新科举人,而这些人大都是十年前黄体芳督学江苏时,黄家父子叔侄栽培的人才。又因江南乡试合考江苏、安徽两省,故诗中称“半”,亦非虚指。

黄体芳学幕中人才济济。

徐定超,字班侯,浙江永嘉人,光绪庚辰(六年)随黄体芳来江阴,至癸未(九年)中进士,在学幕三年,深得黄体芳器重。黄说:“光绪庚辰秋,体芳奉命视学江苏,延永嘉徐班侯从摘铅次槩之役。班侯性伉爽,意所可否,质言无回隐,与余故甚相得也。既晨夕以文艺相商榷,见其宅心和易,而鞠躬履方,益爱重之。”^⑤

龚启荪,字漓田,浙江东阳人,中癸酉科乡榜。博通经训,精研算学。^⑥

王弢夫,名彦威,浙江黄岩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任工部主事、军机章京

① “同光时得馆选者,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日,始销假回京。”见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故黄绍箕能侍奉其父黄体芳于江苏学政任上五年,间而进京述职,但离开其父的时间不会很长。

② 俞天舒辑《黄体芳集》附录《年谱》,第403页。

③ 张一麇《古红梅阁笔记》,“黄淑兰视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④ 胡珠生编注:《孙锵鸣集》,“贺黄叔颂典试江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⑤ 黄体芳:《诰封恭人徐母金太恭人六十寿序》,俞天舒辑:《黄体芳集》,第403页。

⑥ 朱孔彰《半隐庐丛稿》卷一《龚藕田》,称:“壬午秋,藕田在江苏提学黄淑兰先生幕中。”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等职。著作宏富，有《清季外交史料》等。王弢夫与李慈铭交好，在江苏学幕中，时与李通信往来。^①龚、王二人在学幕时间都较长，大概都在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体芳去任时才离开。^②

包祖荫，字琴生，浙江镇海人，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举人。

林颐山，字晋霞，浙江慈溪人。林与南菁关系甚有渊源，容见下述。

还有一些江苏学人被黄体芳招致幕中，如通州范当世、范钟兄弟与泰兴朱铭盘等。^③范当世与朱铭盘两人分别为黄体芳代写《南菁书院记》，范是散文，朱是骈文，后刻石勒碑用的是范文。范、朱二人均出自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张裕钊门下，极负文名，《清史稿》有传（附于张裕钊传后）：“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吴）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于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④

黄体芳督学江苏五年中，学署幕友很多，去留不定，已很难一一钩稽考索，但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其子黄绍箕和学署幕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则是肯定无疑的。

附：朱铭盘《南菁书院记》

东南行省，吴中最为大区；郡县诸生，督学乃其祭酒。剡司横序，则綷纓视若父兄；比秩疆臣，则冠盖亲于昆季。足以丹青名物，弦吹声香。达文囿之句萌，拓词场之扇户。自昔升堂讲学，著录或至万人；本郡受经，徒众因而成市。况乎颺天衢之

① 光绪辛巳（按：原作辛未，误，径改。光绪无辛未年，辛巳为光绪七年，正黄体芳督学江苏之第二年也）十一月，李慈铭致王弢夫信：“八月之杪，获奉手书，知校艺淮阴，铅槩多富。楚州才藪，经生未绝，必有英异，足副搜采。比想已还学署，暨阳山水，秋暮冬初，橘柚将黄，枫柏已赤，亦游览之胜选也。”又光绪癸未十月信：“比已于役江阴，襄校试事，主宾相得，暂遣穷途。江山丽都，秋望尤美，亦一时之乐也。”见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骈体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1113页。

② 案：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与儿绍箕书》：“淮徐试竣，中木、曼君便当辞去，此外惟朱、龚仍旧。兹已请宁慈包琴生孝廉（祖荫，己卯乡榜）襄阅试卷，其算学一席，则汝弟书中所说林明经颐山。”则龚启荪于十一年仍留在学署中也。见俞天舒辑：《黄体芳集》，第140页。惟此处所说的朱，不知何人？

又，刘可毅《书王弢夫秋灯课诗图后记》：“甲申之秋，可毅始识弢夫先生于江阴，……先生初官工部，以乙酉十月入都。”则王彦威于十一年亦仍留江阴学署，至该年十月始离开。见《刘葆真太史遗集》卷二，宣统二年刊本。

③ 黄体芳于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与儿绍箕书》中称：“淮徐试竣，中木、曼君便当辞去。”案：中木，疑是中林之误，即范钟，范钟字中林。曼君，朱铭盘。时范、朱两人均在黄幕。

④ 案：《清史稿》所叙有误，朱铭盘所著乃《四裔朝献长编》，而非《朝鲜长编》。

元化，宣皇路之清风；铺礼阁之殊芬，耸庠门之高誉。轩轳所至，瑰林骈衍而来游；麾节暂临，玮士仿皇而不去。研艺业者，群奉教于民宗；言经纬者，咸折中于夫子。而仁朋德侣，不闻弛担之区；方领圆冠，未有悬轮之宅。

今兵部侍郎瑞安黄公，祇承简命，校士南邦。眷穆若以翘心，润断如而改耀。锤炉出铎，譬巧冶之铸干将；途术扬材，甚王良之御驥。欣腾姿之逾迈，闵执策之无栖。嗟揽往之成渊，惜緘滕之何托。遂乃经营奉入，散稷嗣之黄金；俶落权舆，分江陵之竹木。

东阁大学士恪靖侯湘阴左公，视师南服，澄清之轡同闻；作牧扬州，礼乐之涂遂远。郤縠元帅，寤寐诗书；平津相臣，流连儒术。语其闻望，则泰岱之于华嵩；论其交欢，则荃苾之于兰茝。钟鏞比律，并铿闾里之堂；桂柏方阴，双沐杏坛之雨。眷如林之子侄，析周轨之壶飧。义高田相之门，恩甚晏婴之府。

以光绪八年四月始，凡造屋八十余间，用功二百余日，用钱二万余千。因采朱子记子游祠堂之言，命曰“南菁书院”。昔太史公称子游吴人，今常熟虞山之上，盖有子游墓云。若乃海门连宇，炎汉毗陵之故皋；江水环襟，典午暨阳之曩邑。由是观泉向燥，揽云物以来祥；命斧催斤，对河山而裁秀。辟精庐于中壤，缀邻牖于旁寮。擢楼于旷闾之庭，导圃于淋漓之域。佗佗拾级，足闾侃于皋比；轸辘联巢，实波涛于圆海。八窗笼曜，即盛图书；五步平场，匪无麟翼。胞人千吏，供都讲之昕宵；假沐陈休，奉大师之节度。盖秋羽春干之则，已惠于襟裳；而佩贤戴哲之衷，弥光于笏俎。

议以汉高密郑君、宋新安朱子并祀于后堂，而左公为题讲舍之版，广斯指焉。汉宋分流，学术愈杂。明堂褫袷，词繁于相枕之薪；性道天人，味减于交输之水。言象数或伸传而黜经，论道学或援儒而归释。轩墀旋接，戈矛起于立谈；几席逢迎，甲盾成于杯酒。非夫鉴明任照，物靡细而可遗；衡石从程，质无轻而不堕。曷以包含众秘，陶铸群模，洗纓浊世之丛，挹藻芳风之宇者乎？王考城之月奉，旋姚仇览之声；蜀文翁之官僮，不让京师之彦。嘉晨高会，总岩岫于扶栏；暇日清游，送涓涔于驻杖。春申往岷，喜赠苍姿；季札丰楸，还通盛霭。是使荀卿教迹，沦涟于淹稷之间；太守学台，光景于豫章之地。^①

① 朱铭盘：《南菁书院记》，《桂之华轩文集》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四) 充裕的时间

黄体芳两任江苏学政,在江阴学署五年,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建院事宜,并调整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最后要强调的是,由于江阴南菁书院为江苏学政所办,所以,它以后一直由历任学政主管。^①包括书院院长的聘请,入院课生的选拔,经费的管理等等,学政虽不必事事躬亲,但大计方针由其决定,则肯定无疑。南菁书院与江苏学政相始终。

第三节 南菁书院创建时的规模和设施

一 藏书楼和讲堂及斋舍

南菁书院建在原本是长江水师京口营游击署故址上,处于江阴城内中街。^②“经始八年九月,成于九年六月。”^③即从光绪八年(1882)九月开始建造,而于九年(1883)六月建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凡造屋八十余间。”^④

南菁书院初建时,共有院舍七进。这些院舍的分布和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进,三楹,为头门。

第二进,三楹,为讲堂。堂后东西相对各七楹。

第三进,五楹。均为课生斋舍。

第四进,楼房五楹;楼上贮藏调取各省局刊书籍,中间设神龛,供郑、朱两先儒粟主,掌教率诸生朔望行礼;楼下为会客所。

第五进,五楹,为掌教住宅。

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江苏学政瞿鸿禨奏折称:“惟江阴南菁书院系从前学政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院中事宜专为学政主政。”《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4—275页。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案:据南菁早期课生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称:“书院在江阴县城内中街,为旧水师营协镇、游击两署故址。”与《江阴县续志》所载略有不同。这是因为后任学政王先谦设书局刻《续经解》时,扩充院区至院西的长江水师协镇署故址(见《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赵在这里是统而言之。赵《记》原载《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41年3月1日,北平出版。

③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案:张文虎《南菁书院记》则称“经始壬午之冬,落成癸未之秋”,书院经始、落成的月份有些微出入。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说同黄《记》,今从黄。又据朱铭盘《南菁书院记》,建院“以光绪八年四月始”,或许是指建院动议的时间。由动议进入九月份的实际施工,又过去了五个月的时间。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称“光绪十年甲申,江苏学政黄体芳捐廉议创是院”,将议创时间无端拉后了两年,大误。

④ 朱铭盘:《南菁书院记》。

第六进，八楹，亦为斋舍，合前三斋，编“德行道艺”^①四字，统四十四号。

最后，筑观星台一座，备诸生考察天文之用，未几拆去，增屋七楹，拟供黄学政长生位，黄力辞，遂移奉郑、朱二栗主于此。^②

南菁书院当时能有如此规模，实属不易，难怪当年课生赵椿年（1885年至1888年在院肄业四年）晚年回忆南菁师友时，不无自豪地说：“南菁书院之規制，视‘学海’、‘诂经’尤为闳美。光绪十年以后吾苏文献，几可取征于此。”^③

藏书楼

据赵的回忆，书院“建立院舍七进，为课生斋舍及掌教住宅。”“书院正中，楼上十间，下为客座，上为藏书楼，中奉郑君、朱子栗主。”这与《江阴县续志》所记完全吻合。楼上、下均有黄体芳所撰对联，楼上是：

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

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

上联对郑玄、朱熹二先生推崇备至，并告诫来学者于汉宋之学不要妄分彼此。因后来郑、朱的栗主，迁到了最后一进（即第七进，由拆除原观星台而增建屋七楹），而不在藏书楼上，则这上联所指的二先生好像也就没了着落。

下联是对藏书楼而言，倒是十分贴切。这藏书楼中的书，是由左宗棠“咨会凡有书局省份，将局刻官书各备一部，解发书院存储，俾学者得资翻阅”。^④黄体芳“檄江左右（江左为江苏、安徽；江右为江西）、浙江、湖南北（湖南、湖北）、山东诸书局汇所刻书，藏之中楼”^⑤的。

楼下是：

① 据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的回忆，应是“训诂词章”四斋。又据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引《江阴县续志》，在“德行道艺”下加注：“按：初立四斋曰‘训诂词章’，后增四斋，改‘训诂词章’为‘德行道艺’。”则书院初建时，应是“训诂词章”四斋。大概至杨颐主政时，才改为“德行道艺”。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以下引文出处同。“诂经精舍”为浙江巡抚阮元于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创建，“学海堂”亦是阮元任两广总督时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建立。阮元提倡汉学，故两书院不课八股，专攻训诂词章。

④ 左宗棠《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动拨盐票项下银两片》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十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光绪刊本，第9565—9566页。

⑤ 张文虎：《南菁书院崇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记》，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

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

南方豪杰之士，于兹为群。

黄体芳在藏书楼上下的这两副对联，体现了他的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与积极用世的永嘉学派的治学精神。

楼下还有左宗棠的一副对联：

绎志多忘嗟老大，

读书有味且从容。

对来院学习的士子充满殷殷期望之情。

讲堂

讲堂在书院的第二进，因第一进为头门，故讲堂实处于书院的最前位置。它前面是头门，后面以及左右东西两旁均为院生斋舍。讲堂悬挂左宗棠亲书“南菁书院”匾额，两旁则有黄体芳所书的两副对联。其一：

七十子六艺兼通，文学溯薪传，北方未先于吴会；

九百里群英毕萃，礼仪表茅茹，东林以后有君山。

其二：

南国菁英，于兹孕育；

江城忠义，由是裁成。

“君山”，在城北外里许，乃是南菁诸生日后常去登临啸歌之地。“江城忠义”，当然是指明末清初江阴守城的事，阎应元临终时所书“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取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三十字对联，也为南菁学子时常吟诵。

斋舍

光绪十五年(1889)吴稚晖初入院，对院生所住斋舍有所描述：

院中凡四斋。曰“训”字号，入院第二进之东廊共六号。曰“诂”字号，第二进之西廊共六号。此二处舍宇宽敞，前轩后窗，地亦幽僻。所居者皆历有年所，新至者不可得。

曰“词”字号，此处最冲繁，日夜人声不绝，其第三、四号密迩厨房，更觉喧闹。以一间六架分作两舍，仅仅和合窗两扇。循廊数号，下午昏黑不见。当院中第三进，共八号。

曰“章”字号，此处亦甚好，其制与“词”字号不殊，而清闲幽雅则远过之。

就近后院有石台，登睡甚便，尤据一院之胜。当院中第六进，院长住院之后，郑、朱二先生饗堂之前，共八号。^①

这第三进的“词”字号，环境最差。第二进东廊的“训”字号，和西廊的“诂”字号，以及第六进的“章”字号都很好，“章”字号“尤据一院之胜”。

第四进为藏书楼。第五进为院长住所。第七进（最后一进）原为观星台，后改为祭祀郑玄、朱熹的饗堂，原先放在藏书楼的两先生的木主也迁到这里。

此时吴稚晖看到的，还是书院创建时的模样，六七年来并无变化。但后来杨颐对书院有所扩充，将原先的“训、诂、词、章”四斋，改名为“德、行、道、艺”，又增添“礼、乐、诗、书”四斋，共八斋。

二 光绪九年书院落成并开课

书院在光绪九年（1883）六月落成后，由黄体芳赴松江按试时，躬延请来的院长张文虎，也于七月上旬抵达江阴。于是，黄体芳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即七月十九日（见下闵萃祥《祝文》所载），与张院长率领在事诸人，恭恭敬敬地将郑玄、朱熹的栗主，安位于藏书之楼，并郑重举行释奠礼。^②张文虎为此写《南菁书院崇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记》：

南菁书院既成，黄公以为士多枵腹，既责以读书，而使之自备，微特寒士不能也。乃檄江左右、浙江、湖南北、山东诸书局汇所刻书，藏之中楼，而秩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焉。

或曰：汉儒之学，训诂名物；宋儒之学，性命义理。且两朝之儒亦众矣，何独祀两贤？

曰：贤者著书，启迪后人，各从其诣力所至，不能以己徇人，亦不能强人从己。且汉宋两朝著述之多，孰有如两贤者？今各路所调书咸备于是，有出于训诂名物、性命义理者乎？夫高密博极群书无论矣，新安于百家杂说，无不究其指归，晚年定《仪礼经传通解》，一以高密为主，然则其学已汇于同，而訛訛者犹强辨之，多见其不自量矣。

① 罗家伦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五《山川人物》之《讲舍文录》，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2604—2606页。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称：“书院于光绪十年秋开课，掌教为南汇张嘯山先生文虎，到院两月，以足疾辞归。”案：赵是光绪十一年入院肄业，对入院前的书院之事记载有误；书院应是九年秋季开课，而非十年；张文虎在院主讲有四月，而非两月。

公于是以七月之吉，率在事诸人，安位于藏书之楼而释奠焉。^①

而张文虎弟子闵萃祥则受命作《南菁书院祀郑朱二公祝文》：

光绪癸未之秋，学使瑞安黄漱兰侍郎创设南菁书院落成，延吾师南汇张先生主讲席。萃祥从侍函丈，以七月上旬到院。院之中为藏书之楼，秩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学使筮以十九日行释奠礼，属萃祥为之文，曰：

通天地人，是曰大儒。自汉及宋，惟郑与朱。以言载道，圣经斯作。有经以来，说者纷错。曰若二公，大道之宗。距千百年，一以贯通。郑公雍雍，深思独运。奉道而东，诸经作训。阐幽抉隐，典礼备陈。非惟经师，实经之神。训诂何明，明夫义理。推而广之，吾朱夫子。遐哉鹿洞，遗教炳如。至道之蕴，乃洩无余。二公之学，增冰积水。睫见若殊，心传一揆。降及后世，学者途歧。曰汉曰宋，甚相诋媿。门户之见，遂成枘凿。夫岂二公，道心所度。语曰君子，和而不同。二公有焉，日月齐功。上下千古，纵横八极。光晖所烛，无间陋仄。惟我暨阳，僻处海疆。遗风可溯，季子之乡。卜地惟灵，讲堂聿立。南国之菁，群焉荟集。於铄二公，尚其来临。栗^②主煌煌，奠厥楼岑。清酌载中，馨香既荐。公灵髣髴，牖我邦彦。^③

以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书院诸生都要在院长的率领下，来祭祀郑玄、朱子一番。^④

至此，算是正式完成了书院的建设。

第四节 建院经费

书院经费，主要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奏拨盐课二万两，发商生息，以作日后入院肄业诸生的膏火。而书院的建造费用则全由江苏省和他省各级官员私自捐出，没有动用民间一丝一毫。书院建成后，尚有多余。黄体芳在光绪十一年（1885）

① 张文虎：《鼠壤餘蔬》，《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案：原误作“栗”，径改。

③ 闵萃祥：《式古训斋文集下》，清光绪三十四年海上刊本。

④ 案：据丁福保《重印说文诂林叙》，称“余年二十二岁时，肄业江阴南菁书院，瞻拜许、郑栗主”云云，似后来许慎也被奉为祭主了。该《叙》附《畴隐居士自订年谱》民国十八年下，无锡丁氏藏版，《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27页。丁此说疑不确，南菁供奉栗主乃朱熹、郑玄。

离任前，特勒成《南菁书院头门勒石》和《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勒石》两碑（实为一整体，后为前之补充），记述此事。两碑今存南菁中学。

一 南菁书院头门勒石

钦命兵部左侍郎江苏全省督学部院黄为勒石永遵事。照得本部院前因江苏自兵燹后，士习文风渐次复旧，特于江阴驻所创设南菁书院，专试通省经古，历经刊章通行，照办在案。

查此次起造书院及束脩膏火各项公费，系由本部院倡捐廉俸，并函请本省外省督抚、提镇、监司、州县诸公捐廉所集。寸丝粒粟，未尝取之于民。盖恐此议一开，则士颂民诅，厥弊甚大，不得不豫为防范，以期久远遵行。除将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另勒一石外，合行明白晓示。嗣后如果人数较前益盛，经费实在不敷经营者，不妨据实陈明，静候裁酌。其稍有系民间款项者，无论是何名目，丝毫不准提取。即有愿捐田亩、房屋者，亦一律不准收受。诚以书院为通省所关，有取多取寡之分，必有偏重偏轻之势。且权归于上，则公而无陂；事涉于民，则杂而易竞。

本部院谆谆告诫，具有苦衷，慎毋以限制之过严，遽议其规模之尚隘也。其各懍遵毋违，特示。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示。发南菁书院头门勒石。

二 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勒石

督学部院黄为勒石记事。据南菁书院绅董曹启渊将捐建书院各衔名捐款支存□数，开具清折呈送前来，除本部院倡捐廉俸洋叁千圆外，所有各衔名款数照勒于后。计开：

前两江爵阁督部堂左	拔淮北票费银贰万两
前两江爵阁督部堂左	捐湘平银壹千贰百两
两江爵阁督部堂曾	捐庠平银壹千两
署两湖总督部堂卞	捐湘平银壹千两
江苏巡抚部院卫	捐洋肆百圆
安徽巡抚部院吴	捐庠平银叁百两
湖北巡抚部院彭	捐汉平银叁百两
前江西巡抚部院潘	捐洋壹千圆

前漕运总督部堂杨	捐湘平银壹千两
江宁布政使司梁	捐漕平银贰百两
苏州布政使司谭	捐洋肆百圆
升任江苏按察使司许	捐洋贰百圆
江苏按察使司李	捐洋贰百圆
福建陆路提督军门唐	捐湘平银壹仟两
江南提督军门李	捐湘平银贰百两
长江水师提督军门李	捐洋叁百圆
统领南字营记名布政使刘	捐洋贰百圆
统领春字营提督军门张	捐洋肆百圆
瓜州总镇吴	捐湘平银伍百两
江苏督粮道王	捐洋叁百圆
江安粮道张	捐漕平银叁百两
苏松太道邵	捐规纹银叁百两
常镇通海道黄	捐漕平银叁百两
江阴县陈	捐洋贰千圆
无锡县裴	捐洋贰百圆

以上共收银贰万柒千陆百两，洋捌千陆百圆，通共核计兑见足钱伍万肆千玖百拾贰千贰百拾陆文，除支建造书院工程项下一切应用，院内置办器具什物一切杂用，统计支销足钱壹万伍千玖百拾捌千捌百肆拾五文外，存钱叁万贰千玖百玖拾叁千叁百柒拾壹文。^①

三 对两块碑记的一点考释

从以上两块石碑所记，可以看出，左宗棠拨款贰万两，私人还捐银壹千贰百两，奠定了书院的经济基础，后人称赞左宗棠是南菁书院的奠基人，从经济角度看，此话一点也不为过。

私人捐款最多的当然应是书院的创始人黄体芳。除左、黄外，其他本省（间有外省）督抚、提镇、监司、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约二十五人，应黄体芳函请，慷慨解

^① 《南菁校史》（1882—1997），南菁中学印本，1997年10月。案：苏州布政使司谭，《校史》误作“许”，径改。查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此时苏州布政使是谭钧培。碑记则漫漶不清。

囊。捐款数目多少不等,大致督抚身份的在一千两左右,如前任、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曾国荃(1824—1890),署理两湖总督卞宝第(1824—1893),前漕运总督杨昌濬(1826—1897)等。以下按官职高低依次递减,但有一例外,那就是江阴知县陈康祺,居然捐出贰仟元大洋,超出督抚的捐款,竟然是邻县无锡知县的十倍,或因黄学使对陈县令素无好感,借此机会惩罚一下,也说不定。(黄、陈之间有过节,说见前。)

本省官员是当方土地,捐款办学是分内之事。而那些外省官员捐款者,也大都与江苏有渊源。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卞宝第是江苏仪征人,江西巡抚潘霨(1826—1894)和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彭祖贤(1819—1885)是江苏吴县人,他们捐款与南菁书院,是出于乡梓之谊,盛情可感。卞宝第次子卞淳昌,后亦就读于南菁书院。非苏籍官员中,漕运总督杨昌濬,湖南湘乡人,驻节江苏淮安,漕督本是肥缺,捐款于南菁书院,亦在情理之中,只是黄体芳勒此石碑时,杨已调任闽浙总督,不及见碑上所列己名了。安徽巡抚吴元炳,河南固始人,曾抚苏多年,当黄体芳于光绪六年督江苏学政时,还在苏抚任上,故南菁建院,吴元炳人虽在皖,仍不忘故人,还捐于苏。

道一级官员中,捐款者大都衙署治在苏南,如江苏督粮道驻苏州,江安粮道驻江宁,苏松太道驻上海,常镇通海道驻镇江。两粮道辖属漕督,端是肥缺。其他两巡道,尤其沪道,素为官场中人艳羨,捐出数百银两,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江苏府县一级官员,除江阴、无锡外,黄体芳都没有去惊动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捐款官员中还有以军功起家者。这些提督、总兵之所以愿意助捐南菁,恐怕还是黄体芳乃其上司的原因,因黄体芳于光绪八年创建书院时,已有兵部侍郎的头衔。提镇中捐款数额最多者是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1833—1887),淮军统领,唐与江阴甚有渊源。咸同年间,与兄唐定魁率淮军与太平军鏖战,屡立战功,连克杨舍、江阴、常州。唐定奎自光绪三年(1877)至十三年(1887)一直率数千淮军驻扎江阴,后病逝于江阴,敕建“唐公祠”,现尚存。

据《各官衔名捐数支存勒石》记载,南菁书院“共收银贰万柒千陆百两,洋捌千陆百圆”,通共核计,兑现足钱约五万五千千文,扣除“建造书院工程项下一切应用,院内置办器具什物一切杂用”的费用,尚存钱约三万三千千文,发商生息,“分存常州府属八县各典中,月取息一分(有取年息一分者,仅靖江袁祥和无锡德大两典)”。^①以

① 《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

三万多千文的本金,存放在常州府属八县的典当内,以每月一分利息计,则每月可得利息钱三千多千文,以此作为发放书院课生每月膏火和课卷奖金,还有书院山长的薪金,以及书院的日常开销,大概也可够用了。

又据《南菁书院头门勒石》,“此次起造书院及束脩膏火各项公费”,全由各级官员“捐廉所集”,“寸丝粒粟,未尝取之于民。”这是为什么呢?黄体芳解释说,如果向民间募捐,“盖恐此议一开,则士颂民诅,厥弊甚大。”也就是说,如果用“取之于民”的方法来筹款,书院办成,读书人当然满意,但普通百姓却因无端加重了负担而会怨声不绝的,所以决不可轻开此议。以后,如书院确遭“经费不敷”困难,即便有民间愿捐款项者,也要抱定宗旨,“无论是何名目,丝毫不准提取。即有愿捐田亩、房屋者,亦一律不准收受”。

可能黄体芳的本意是不想扰民招怨,但这样一来,书院全由官办,一切由官府控制,读书人就不易滋生异端思想,朝廷也放心,这也完全符合雍正帝大力提倡兴办书院的旨意。

然而,仅隔数年,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南菁书院就接受了苏松富绅所捐的数万亩沙田(事见下章)。黄体芳之头门勒石,也就徒成具文。

第五节 张文虎和黄以周先后主讲南菁书院

主讲著名书院的学术大师,历来对他们的称呼有所不同,如“山长”、“洞主”、“掌教”、“院长”等等,“山长”尤为常见。乾隆三十年,上谕:“主讲席者,由山长改为院长。”^①但民间沿称山长的仍很常见。

一 张文虎于光绪九年主讲南菁书院

一个书院的盛衰,与院长的是否称职有很大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关系。黄体芳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乘去松江府岁试诸生之时,邀请大儒张文虎(1808—1885)赴江阴就任南菁书院院长,这时,离书院落成仅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张文虎年已七十六岁,有足疾,行走艰难,再三推辞。然而学使盛情难却,终于勉

^①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十年(1765)“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妥。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着于各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力而行，由其弟子闵萃祥陪同，于七月上旬抵达江阴南菁书院。张文虎掌教南菁，时论以“岿然灵光”誉之。^①可惜张在南菁只主讲了四月，便因足疾发作，于十一月回返故里，不再出。^②一年多后，便与世长辞。

张文虎，江苏南汇人，一生视名利如敝屣，而视学术为生命。他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甚至中西数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内，都卓有建树。但他命运多舛，大半辈子都寄人篱下，漂泊东西，孑然一身。当他晚年体衰多病，返乡退养时，已是妻亡子死，更见凄凉。然而，他并不以是废学，手一卷外，无他嗜好，老而弥笃。^③黄体芳首选张文虎，既认可了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对他的高尚人格的肯定。

张文虎虽在南菁书院仅四个月的时间，但其撰写的《南菁书院记》，却刻石勒碑，长留江阴。碑文如下：

江阴据江苏各府州县适中之地，督学使者驻节于此。旧有暨阳书院，余姚卢学士召弓、武进李大令申耆先后主讲席，流风余韵，上下百年。今以吴季子故封，改曰“礼延”。然自寇乱以后，士族解散，兹虽规复，制艺以外，鲜治旧业。

光绪七年，瑞安黄公来提督学政，^④喟然曰：“岂卢、李两先生之教泽止于此乎？”既而科试一周，奉旨留任，乃集邑廉陈君，张、吴两学师，绅士曹君而言曰：“士为四民首，教民以士始，教士以读书始，夫有士而不能教，官其地者之责也。上海亦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放浙江‘诂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肄业经史、古学，天文、算学惟所习，盍亦谋之？”

于是群情喜悦，以次解囊。曹君慨任其事。然费犹不支，乃求助于侯相左公。左公如所请。遂卜地于城之中街，经始壬午之冬，落成癸未之秋，不数月间，焕然毕备。请额，公曰：“南菁”，取“菁菁者莪”之意也。是役也，自始至终，曹君实一人经理之，黎明抵工，向晦而去，一炊爨，不沾公，不告劳，不谢病。三月辛巳朔，天乃雨粟，在工之人，竞拾以相告，噫！嘻！此何祥哉，盖公之精神与曹君之专壹，相为感召，而此间之士习民风，将日以转也。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二十七通：“江阴新设南菁书院，掌教者为张孟彪先生文虎，年逾八十，岿然灵光。”《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案：费说微误，张文虎掌教南菁时，年七十六岁。

② 闵萃祥记叙此事：“癸未，今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夏四月，按临松江，躬延先生主讲席，时先生足痿，艰于行，再三辞，不获。秋七月，赴江阴。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书请退，不复出。”闵萃祥《州判銜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式古训斋文集下》。

③ 缪荃孙：《州判銜候选训导张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④ 案：黄体芳提督江苏学政，始于光绪六年，张说微误。

予因是为诸生勖矣，夫德行，菽粟也；经训，菑畲也。百家诸子所以善此菽粟者也，俗好则蓂莠耳。苟尽力于菽粟，以要于成，而勿为蓂莠所夺，他时为丰年玉，为凶年谷，是天所以雨粟之意，而公之所以期多士也。虎老悖，承公淳命，尸师席，谨记其略如此。

候选训导南菁书院掌教 南汇张文虎撰文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翰林院修撰 吴县洪钧书丹

五品衔候选训导 江阴曹启渊篆额

光绪十一年岁在旃蒙作噩病月^①

句吴钱邦镛刊石

张文虎在这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碑记中，热情赞颂了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这一热心教育、关爱士子的举措，对负责书院建造的实际操作者地方士绅曹佳也誉扬有加。张文虎甚至认为，书院建造过程中，于光绪九年三月初一日，在工地上发生的一次自然怪现象：粟米突然从天而降（可能是龙卷风所致），也是由于黄、曹的精神感动了上苍而得到的回报，这也预示着江阴的士习民风将会日渐转淳。作为院长，张文虎希望在院诸生，将来都能成为黄学使所期望的“凶年之谷”或“丰年之玉”。

张文虎弟子闵萃祥也曾写诗一首《南菁书院记事》，记载“天雨粟”瑞征：

南国从今广厦开，菁莪棫朴一斋栽。群英尽擅登龙誉，小草居然附骥来。（时随嘯山夫子在院。）论道未容歧汉宋，取材更不废蒿莱。（院中崇祀郑高密、朱新安二公位，七月十九日行释奠礼，黄漱兰侍郎命余作祀文。）殷怀乐育天心感，雨粟纷纷士气恢。（院屋落成日，天雨粟。）^②

天人感应，亦云奇矣。

二 黄以周于光绪十年继讲南菁书院

张文虎于光绪九年十一月返里后，因病“具书请退，不复出”。于是黄体芳聘请东南大儒、礼学大师黄以周（1828—1899）来南菁书院执教。^③

^① 岁在旃蒙作噩，即乙酉年（1885）。病月，三月。张文虎逝于该年正月，已不及见该碑的刻成。

^② 闵萃祥：《八指诗存》上卷，光绪戊申刊本。

^③ 黄体芳在张文虎因病辞讲席后，曾欲延同乡前辈孙锵鸣，但未成。见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然先生晚悼远行，保定之莲池、江阴之南菁，亦皆海内大书院，皆曾固延不应，乃改延桐城吴先生汝纶、定海黄先生以周。”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4页。

黄以周，浙江定海人，家学渊源，专治三礼，经学精湛，粹然儒者。他在南菁书院的同事缪荃孙，是这样称赞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国朝家学，绍汉迈唐。元和之惠，高邮之王。鼎足其间，先生觥觥。”^①意思是说，清朝的汉学，父子兄弟，家学渊源，继承汉朝，超迈唐朝。苏州惠氏祖孙三代（惠周惕、惠士奇、惠栋），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都是汉学大师，绳绳相继，不绝于后。而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与惠、王二家，可算是鼎足而三，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

黄以周于光绪十年（1884）到院后，对南菁书院祭祀郑玄、朱子栗主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写成《南菁书院立主义》：

督学部院瑞安黄公创建南菁书院，落成，院长张啸山文虎与多士奉高密郑君、新安朱子两先贤主，已有成议矣，而或者又心非之。甲议曰：南菁课士以经解、古学，宜立明经之主，而以能文之士配之。乙议曰：否，阮文达建诂经精舍，亦以经解、诗赋并课，而立浚长、司农两主，谓不通文字训诂，经无由明，即文亦不能古，今宜遵之。丙议曰：否，解经自以汉儒为近古，而汉儒之能囊括大典、网罗诸家者，惟高密一人，文与艺皆末也，浚长之主可以立，可以不立。丁议曰：否，章句小儒，未闻大道，仲尼歿而微言绝，能绍厥传者，北宋诸子，能集大成者，新安一人。

其明年，张院长辞讲席归，以周承乏来兹，乃申其议曰：读其书，论其世，丁议是已，然亦未闻尚论古人之道。古《礼经》皆有记，亦有义，大小戴所传十七篇记，附经后，而冠义、昏义、燕义、射义、乡饮酒义，以及丧祭诸篇，别存于八十五篇、四十九篇中；为记合注例，义非注体故也。郑君康成所注书多散逸，其诗笺、礼注之存者，只释训诂，尚考据，而义理之精，引而不发，望学者寻绎而自得之，此汉师注例然也。洩至北宋，病古注之繁芜，而思以义理之说上之，往往有不看本文自成一书之讥。朱子有鉴于此，斟酌二者之间，所撰各经注，皆先叙训诂考据，而后数啜经意，惟恐义蕴之有遗，此宋后注经之例也。学者喜朱子注之详明，转嫌郑注简奥而以为陋且晦焉，此岂有合尚论之道。且学博说约谓之简，简非陋；极深研几谓之奥，奥非晦。郑注中阐发义理之言，有如布帛菽粟，服之而无斲，咀之而有味，读郑君粹言，自知之。经以载道，经学即是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读《日知录》可会之。考据间有未明，义理因之而晦，不

① 缪荃孙：《中书銜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读郑注，为害不细，朱子于宁宗持重服事，亦自言之，则学朱子之学者，舍郑注其可乎哉？

驳之者曰：是议也，似持平而实调停之见也。曰：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瞽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兹奉郑君、朱子二主为圭臬，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以求合于圣经贤传，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以此为驳，失察孰甚。

虽然，犹有说。南方之学，自吴季札、言子游二人而开。江阴旧有书院曰“礼延”，奉吴季子主。今欲持汉宋之平，似宜中奉言子主，而以郑君、朱子配享，则南菁与礼延两书院遥相峙，于命名之义亦更有合焉，未知瑞安黄公之意以为何如？谨议。^①

黄以周在文中重提清初大儒顾炎武“经学即是理学”的观点，认为南菁奉郑、朱栗主，真是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的体现，但为持汉宋之平，结合江阴书院的现状，最好中奉言子（子游），而以郑、朱两旁配享。不过此建议好像未被黄体芳采纳。

黄以周自光绪十年至二十四年，整整十五年与南菁书院相始终，为南菁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治学理念，深深影响了江苏的一代学人。黄以周继张文虎后，也为南菁书院勒成一碑，即《南菁书院讲学记》，全录如下：

瑞安黄侍郎督学江苏，创讲舍，命以“南菁”，语出李延寿《北史》，然侍郎命名之意当别有在。李之言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夫英华者，敛其全物之精气，而发于枝叶间者也。去其枝叶，有何英华？一言以为不知，此之谓矣。朱子作《常熟吴公祠记》，以为吴会之学，开自子言子，而子言子敏于问道，不滞于行器，因引李语，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盖自古已然。”侍郎命名之义，当在此，不在彼。且亦思子言子之为学乎？孔门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七十人，而文学之传，首推子言子。书缺有间，其详不可得闻，而考其言之轶见传记者，于礼独多，是盖谨守“博文约礼”之教者也。

今去古已远矣，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能了然于心目。不先博文，能治经乎？既治

^① 黄以周：《敬季杂著》之《文钞》卷六，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刊本。据黄以周自注，写作该文时间在《南菁讲学记》之前。

经矣，又当约之以礼。文章者，华身之物；经济者，泽民之具；义理者，淑性陶情之资。而不以礼为权衡，文章虽工，亦郑卫淫哇之声也；经济虽长，亦杂霸刑法之治也；理义虽明，亦庄老虚无之谈也。礼也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崇效卑法，有天地即有是礼。故典曰“天叙”，礼曰“天秩”，而谓礼为后起之物，岂其然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恭敬搏节退让，有不能自己者，是礼出于性之自然，而莫可遏，而谓礼为忠信之薄，庸非谬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号曰《士礼》，明此礼为士子所肄习，不可须臾离，而谓“礼岂为我辈设”，詎不悖乎？礼可以定命，可以节性，可以淑身，可以理家，可以治国，可以位天地，可以和神人。郑君序《礼》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体之为圣，履之为贤。”朱子注《论语》曰：“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又谓：“欲寻颜子之乐，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庶乎有以得之。”皆至言也。

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今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翦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惟子言子亲炙圣人，独得“博文约礼”之正传，陈其数，知其义，而敬守之以治天下，子言子有焉。

昔孔圣设教，分四科，所谓德行者，即乡三物之六德六行也；文章者，即乡三物之六艺也。六艺首礼，故子言子之文学，于礼独详。然颜、闵数子，专长在德行，非不深文学者也；子言子之文学，亦非不敦德行者也。分之则为乡三物，合之则曰德行道艺。且艺与德可分，艺与道不可分。艺无道，其艺疏；道无艺，其道虚。此朱子碑记所未及，惟读郑君《周官注》，可领会之。

侍郎奉高密、新安二主于讲舍，颜曰“南菁”，盖亦望学者参求郑君、朱子之言，而上取法乎子言子。多士勉旃。

定海黄以周撰文

江宁何荫栴书丹

江阴曹启渊篆额

光绪十一年六月朔

吴县钱邦鏗镌石

黄以周在这篇《南菁书院讲学记》中，约略阐明了他的治学思想。他说：“学者

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能了然于心目。不先博文，能治经乎？”恪守乾嘉汉学治学方法。又说：“既治经矣，又当约之以礼。”认为礼乃“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如果学者“不以礼为权衡”，则“文章虽工，亦郑卫淫哇之声也；经济虽长，亦杂霸刑法之治也；理义虽明，亦庄老虚无之谈也”。如以树作比喻，“礼”是树的精华，而“文”则是树的枝叶。研究学术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菁华，但也决不可剪去枝叶，因为菁华就蕴含在枝叶之中；然而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误认为枝叶就是菁华。所以，黄以周希望来学者，都能像言子（子游）那样，最终得到“博文约礼”之孔门正传。在这里，黄以周将礼学提升到近乎壁立千仞的高度，这就是为何他在来院之初就向黄体芳建议，要将子游作为南菁书院的祭主，而委屈郑玄、朱熹在两旁配享的一个原因了。

南菁书院创建之初，便由学政黄体芳延聘张文虎、黄以周这样在当时就已极负盛名的经师人师来院主讲，^①未尝不是南菁学子的幸运，因为一流学者是一流书院可靠的学术保障。

南菁书院院长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如前所述，书院初创时共建七进房屋，其中“第五进，五楹”，全供院长使用，这在当时应该是很宽敞的了。^②院长的薪水也不薄，一年收入可千金。^③另外，院长还有兼领异地书院的脩金。^④

院长的待遇丰厚，就在经济上保证了南菁书院能留住一流的学者执掌教鞭，从而也就吸引优秀课生在院肄业经学、古学。

第六节 南菁书院的监院与经董

一 监院

南菁书院的监院，与其他书院一样，亦由县学教官兼任。江阴县学的教官有两

① 宋恕《籀廬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寿诗序》：“当是时，海内治《诗》者有陈先生奂，治《礼》者有黄先生以周，……博治百氏者有俞先生樾、张先生文虎……”《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9页。

② 至今，南菁中学内还保存两口古井，据说，其中的一口便是为黄山长一家所用。

③ 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聘缪荃孙主讲南菁，便是年脩千金。见梁鼎芬致缪荃孙第四十二通信：“王先生欲于南菁书院添请院长一席，以兄当之，年脩千金。”《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黄以周任南菁书院院长的同时，“又兼课宁波辨志精舍诸生经”，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九《黄式三黄以周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缪荃孙主讲南菁书院时，还兼领江阴的西郊书院讲席。见《艺风老人日记》“己丑三月廿日，金小舸下西郊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又《艺风老人年谱》亦提及此事。

位，一是教谕，一是训导。两位教官轮番隔年充任书院监院。建院之初，江阴教谕是张宝书，训导为吴应生。张宝书，字鸿甫，仪征县人，举人，光绪四年至十六年在任。吴应生，字枚臣，元和人，附贡生，光绪二年至十四年在任。^①

以后做过南菁书院监院的，还有教谕秦毓麒和陈希濂，训导秦赞尧和周朝升等。^②

秦毓麒，字石麟，嘉定县人，举人，光绪十六年至三十年任江阴教谕。其子秦曾源、其侄秦曾潞都曾肄业于南菁书院。秦毓麒后官内阁中书，湖北咸丰县知县。^③

秦赞尧，字干臣，又字舜臣，号庸庵，奉贤县人，寓居郡城松江，廩贡生，曾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任江阴训导。秦深得江阴士子爱戴，歿后，《县志》为作《传》，称：“就署设‘味道腴斋’课士，手自评改，择奖其尤。署西沿河路仄，修砖路以便行者。旋病气喘，回松就医，卒于寓。遗言以是年新进文童贽敬银元四百，捐入江阴积谷。在学诸生就涌塔禅院为位而祭，至者百数十人。赞尧能书，间画梅，亦苍劲有古趣。”^④

周朝升，字旭初，江浦县人，岁贡生，光绪二十六年起任江阴训导，三十三年，升补教谕，光绪末年离任。

陈希濂，字龄诗，号麟书，又号琢孙，元和县人，举人，曾署宝山县训导。陈希濂在光绪二十年时曾肄业南菁书院，三十一年来任江阴教谕，是故地重游，不过此时，书院已改为学堂了，或许监院的名称已不存在，称为提调了。陈于三十三年丁忧离任，宣统元年回任，直至清亡，才离开江阴。

监院虽说在书院的工作仅是“点名收卷，发放膏火”，但因是教官担任，实际上也应算是南菁课生的老师。所以，当课生初进书院拜谒院长后，接着便要去孔庙旁的学校拜谒监院，好在南菁书院与孔庙相距不远。吴稚晖曾记下了他进南菁书院第一天的情景，他谒拜黄以周后，随即去谒拜监院：“谒监院，亦于至之日躬诣学署，并囑听差导引。”可惜学老师不在，“其进见礼数，以余往谒时，学师公出，不敢悬拟，俟问明续述”。再见监院的情景，吴后来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无留存。吴又详述监院的职责：“监院者，以江阴两学师每年轮为之，掌院中课卷收放，及发案给奖等

① 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二《职官》。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二《职官表》。

③ 见秦曾浩之己酉拔贡硃卷中所述履历，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

事。住院课卷，可从本生径交院长，不必送监院处。外来者，则或交监院，或嘱住院生面交山长亦可。监院用红禀，书南菁书院肄业生某某。”^①吴氏于光绪十五年入院的，此时的监院为张宝书和秦赞尧。

二 经董

书院经董，即管理书院经济的董事。经董与监院都是管书院的具体事务，只不过经董是管书院财务的收支，监院则管书院课生考务以及膏火、奖金的发放。监院是朝廷命官（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经董则是地方士绅。当过南菁书院经董的士绅名录，难以考索。凭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载，大概可以确定的有以下几位。

曹佳及其子曹启渊，父子两人都参与了南菁书院建造的实际事务，参见本章第二节所述，此不赘。

费学曾，号幼亭，武进人；姚文枬，号访梅，浙江嘉兴人；均是捐数万亩横沙岛沙地与南菁者。两人事迹见第二章第四节。

郑惇五，字澧筠，江阴县人，附贡生，候选通判。“为人通敏有干略，更事多，经验富，邑中事无大小，惇五无不与，有不与者，亦必咨之。”^②亦曾捐沙田与南菁书院。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秋主讲南菁书院时，来江阴的第一日便“径至郑澧筠先生宅”拜访。^③

沙从心，字循矩；冯箴，字徵若。两人都是江阴士绅，既同时肄业于南菁书院，为书院最早的课生，又是书院经董。缪荃孙刚到江阴，王先谦为缪荃孙接风时，沙、冯同席。后由沙从心亲送南菁院长聘书给缪。过数天，沙又亲自通知缪到书院正式履任。次日，即九月二十一日，缪“午刻到南菁书院，长沙师（案：王先谦）、监院秦（案：秦赞尧）、沙循矩、冯徵若率诸生入见，成礼。”^④

章际治，字琴若，江阴县人，南菁书院最早的课生。清末，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南菁高等学堂监督。章也是南菁学堂经董，“先后为南菁校经画不遗余力，或因校产琐事，赴江北、川沙横沙，泛一叶扁舟于洪涛巨浪中，风雪飘摇，罔所顾怯”。^⑤

清末捐沙田与南菁书院者，还有武进盛康（盛宣怀之父）、靖江陈美棠等，他们也

① 《吴稚晖全集》卷十五《山川人物》之《讲舍文录》，总第 2604—2606 页。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六《人物·耆旧》。

③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记戊子年九月七日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④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记戊子年九月十日、十一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事。

⑤ 唐文治：《章君琴若墓志铭》（壬辰），《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

应是南菁书院董事。盛康、郑惇五、陈美棠诸人，第二章第四节亦略有介绍，可参见。

第七节 南菁书院专课通省经古

一 课生经甄别入院研习经学古学

清代的书院大都专课八股，但南菁书院是一所经古书院，以经史词章课士，而不以制艺为日课。黄体芳在建院前，就召集有关人士商讨大计，就以上海的龙门书院为例，“上海亦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放浙江诂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肄业经史、古学，天文、算学惟所习，盍亦谋之？”^①明确指出，要把南菁书院建成像诂经精舍这样的书院。

书院“经始八年九月^②，成于九年六月”。张文虎于光绪九年七月在其弟子闵萃祥的陪同下，来南菁执教。这时入院肄业的应是南菁最早的课生，^③有华世芳、张锡恭、雷补同、万康、章际治、王廷樑、刘毓麟等。课生入院，常由学政调取江苏各府州连续数年在岁科试中名列一等的生员，但入院后仍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称为甄别。甄别都由学政主持。“每年正月，由学政分经古两场甄别录取。经学则性理附焉，古学则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④考试很严格，如江阴的顾宝畴“为学务求实际，学使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甄录通省经学，仅得优等者五，保畴与焉”。^⑤全省投考经学的，被取为优等的只有五人。

光绪九年(1883)、十年甄别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倒是十一年的入院甄别，南菁早期课生有过记载。唐文治说他于十一年“春，偕毕君枕梅、张君拙嘉(名树冀)诸友，同赴江阴南菁书院应试，取超等，住院肄业”。^⑥与唐文治同年进院的赵椿年

① 张文虎：《南菁书院记》。

② 据《南菁略史》(民国二十四年江苏南菁中学所编)称，“民国十八年三月七日，开(第四中山大学区南菁学院)中学部部务会议，商定国历十月二十七日(即南菁创立纪念日)”。“(民国二十一年)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南菁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则可推测黄体芳创建书院的具体日期或是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882年10月27日)。

③ 据民国24年(1935)所编《南菁学友录》，首批书院课生名录自光绪十一年(1885)起，光绪九年、十年学友名录阙如，大概这两年的书院名册及课卷早在那时就已散佚。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

⑥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也说：“书院首次甄别，以《南菁书院崇祀高密郑君、紫阳朱子栗主义》命题，因郑君、朱子抬头，写作两行，有误作两题者，传以为笑，惜未见其文，不知《南菁书院崇祀》一题如何措词也。甄别经学首选，忘其为何人；古学题为《七洲洋赋》，刘葆真首列，其时尚名毓麟，后改可毅。”^①赵椿年这里所说的“书院首次甄别”，不知是指九年还是十年的甄别，因赵一直误认为“书院于光绪十年秋开课”，而不知光绪九年秋张文虎就已开课了，九年的甄别才是南菁书院的第一次甄别。赵椿年后在南菁肄业四年，参加过四次甄别。

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离任时说：书院“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以至于今三年矣”。^②即便已取得举人的功名的，如江阴的章际治、太仓的唐文治，都是壬午（1882年）科举人，要继续留院肄业，也得参加每年正月一次的甄别。

每年录取的名额有限，内课生（住院生）只有四十人，研习经学和古学的各二十名，^③分居“训、诂、词、章”四斋，^④每斋十人，设斋长一名。如果一人同时考取经学、古学，则只算一个名额，余下的空额，就由学政调取各府州岁、科两试中连列三次一等者补充。^⑤早期课生中，兼习经学、古学的，据赵椿年回忆，有“盐城陈惕庵玉树，通经史，治古文”，“丹徒陈善馥庆年，治经小学、史学”，“宝应刘我山奉璋，治经学、词章”等。

二 课生膏火与奖金

入院肄业的内课生（或称住院生），待遇还是很优厚的，每名每月给膏火钱五千文，^⑥一年以在院肄业时间十个月计算。如果年底不归者，黄学使会特别优待，奖给一个月膏火，但不由书院开销，而是自捐廉俸了。斋长则另外每月多给三千文。

假如在院肄业诸生考试成绩优秀，则另有奖励。书院每月要举行两次考试，一次月初，一次月中，称为月课。每年有十次月课。因为每次月课分经学、古学两份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②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③ 此据赵椿年说，《覃研斋师友小记》：“课分经学、古学两门，各设内课生二十人。”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中则说：“所取内课：经二十名，古三十名。”古学名额增加十名，可能是王先谦主政南菁书院时的情况。还说，古学的奖金要比经学的奖金少一点，“因课卷多十本也”。

④ 在杨颐任内，扩充为八斋，改“训、诂、词、章”斋名为“德、行、道、艺”，所增四斋为“礼、乐、诗、书”。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⑥ 以后随着南菁沙田的出息，膏火逐步增加。杨颐主政时（1888—1891），增至七千文。十年后，到龙湛霖主政南菁时（1894—1897），翻番增至十千文。南菁沙田事见下章。

试卷，而住院生经、古都必须考，所以住院生每月至少要考四份试卷。学政也时出考卷，称为官卷。院长出题者，称为师卷。第一名给奖八千文，余依次递减。而非住院生（院外生，亦称在院生）则习经考经，习古考古。院外生考试成绩优秀者，一例发给奖金，^①只是没有按月而发的膏火。

第八节 书院命名“南菁”

书院落成，黄体芳为它取名南菁，含义何在？

张文虎《南菁书院记》中说：“南菁，取‘菁菁者莪’之意也。”“菁菁者莪”语出《诗经·小雅》，毛序：“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张文虎在这里乘解释“南菁”之名的机会，大大赞扬了黄体芳一番，说他是“长育人材”的“君子”，倒也名副其实。然而，在张文中，“南菁”的“南”字，似乎没有落实。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中则说：“（书院）既成，乃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曰‘南菁’。”原来，所谓“南菁”者，是“南方之学，得其菁华”的意思。

黄以周《南菁书院讲学记》中又对“南菁”的命名考证了一番，他说：“瑞安黄侍郎督学江苏，创讲舍，命以‘南菁’，语出李延寿《北史》。”然而，黄以周却认为黄体芳之所以为书院起名“南菁”，并不是取用李延寿原话的含义。我们先看看李延寿是怎么说的，李说：“南人约简，得其菁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黄以周很不以为然，他反驳说：“夫英华者，敛其全物之精气而发于枝叶者也，去其枝叶，有何英华？”黄以周又试着解释朱熹作《子游祠堂记》的原意：“朱子作《常熟吴公祠记》，以为吴会之学开自子言子，而子言子敏于闻道，不滞于形器，因引李语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盖自古已然。”最后黄以周下结论：“侍郎命名之意当在此（朱子之意），不在彼（李延寿之说）。”接着，又谈了自己对“菁华”含义的理解：“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黄以周又针对时弊，痛心地说：“今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② 《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左传》则杜元凯（杜预），《尚书》则孔安国；河洛，《左传》则伏子慎（伏虔），《尚书》则郑康成（郑玄），《诗》则并立于毛公（毛亨），《礼》则同遵于郑氏（郑玄）。南人约简，得其菁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剪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黄以周希望南菁书院的学者能参求郑、朱之学，直承圣门，效言子（子游）之法，博文约礼，终成菁华。

如今，这南菁书院历经一百多年的沧桑，已成了一所中学。但校名未变，校址未动，也可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可惜，原有的建筑，包括匾额、楹联等等书院遗迹，早已荡然无存。所幸六块书院碑刻还大致完好地保留在今南菁中学内，可供后人观赏研究。这六块碑刻是：

《南菁书院记》，张文虎撰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翰林院修撰吴县洪钧书丹，曹启渊篆额，光绪十一年三月立。

《南菁书院讲学记》，黄以周撰文，何荫柟书丹，曹启渊篆额，光绪十一年六月立。

《南菁书院头门勒石》，黄体芳立，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示。

《捐建南菁书院各衔名款数碑》，黄体芳勒石记数。

《南菁书院记》，黄体芳撰并书，光绪十一年九月。

《南菁沙田记》，王先谦撰文，沙从心书丹并篆额，光绪十四年六月。

除最后一块王先谦所撰的《南菁沙田记》外，其余石刻均在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离任前所立，记载着南菁书院创设的历史。

第二章 王先谦开创书院的学术辉煌时期

第一节 王先谦接任江苏学政

一 劝学琐言

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1885)深秋卸任,回京交差。接替黄体芳的是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奉旨:江苏学政着王先谦去。钦此。次日,具折谢恩。十八日,请训,蒙召见一次,束装就道。十月二十六日,抵江阴,驻署”。^①

督学江苏前,王先谦已编纂成皇皇大著《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又因是翰詹出身,学识渊博,所以常被简放试差,充任考官。据他自己说:“溯余通籍以来,凡五与试差之考;而三主省试,再校礼闈。”^②即做了五次考官,其中三次是去外省充当选拔举人的乡试正、副主考,另两次是充当礼部选拔进士的会试同考官。所以,王来江阴任江苏学政,对于学政所主持的考务,应是驾轻就熟,成竹在胸。他完全能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完成他刊印《皇清经解续编》的宏大心愿。

十一月,王先谦到任后没几天,按惯例,发给江苏各学观风题,同时还附上一册自撰的《劝学琐言》,每学仅发三十册。^③这《劝学琐言》是指导初学者如何做学术研

① 《葵园自定年谱》,《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葵园校士录存序》,《虚受堂文集》卷六,《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 由朱荣琴整理的萧穆《敬孚函稿·致王先谦》第一通,萧穆《与王益吾》,“……《劝学琐言》弟尚未见,惟闻人言各学仅颁三十部,分散不周,容再酌补。又闻凡例尚未细密,经学有不知所为者。闻诸道路,无容缕述。十四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按:王发《劝学琐言》给江苏各学,本有为作《尔雅》、《说文》、《文选》和《水经注》四种集注做准备之意,非专讲目录之书,故萧穆得之传闻“经学有不知所为者”,亦不足为怪。又据第二通信及王先谦按试各府行踪,此信应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

究的,但也体现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现据丁福保的有关记载转录如下:

《尔雅》为群经枢辖,国朝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大畅经旨,然待订正者犹多。臧庸辑汉注,黄奭辑古义(叶蕙心《古注斟》亦善),翟灏《补郭》,钱坫《释义》,严元照《匡名》,龙启瑞《经注集注》,并资参究。(《书目答问》板本略具,甚便初学,诸书可依以购求。若藏书不多,先就易购者访求考索,勿得因循,亦慎毋得少自足,不思博观。)宜荟萃众说,合为一书。每正文一节,首注疏,次古注,次诸家说,(逐条提行,低一格,冠以某曰。)全钞弗遗,此外有《尔雅笺注》,罕见传本。及非《尔雅》专家,而与本书相发明者,皆可胪列,再加案语,订正舛讹,推阐遗义,(案语冠以本人姓名,引书必注某书某卷。下同。)务期精密。

《说文》之学,近代为盛。二徐传本互异,楚金多仍旧书,鼎臣多所是正。乾嘉诸儒,总据《韵会》以求小徐之真,复据唐本、蜀本以正二徐之失,立说纷如。王绍兰《说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未见传本。拟萃众说,校正同异,推究义蕴,为《说文解字诂林》一书。每篆文一字一行,许氏元文,大小徐本歧出者,双行标注;次二徐音注;(正文及音注,各本有异同者,并详之。大徐以近日淮南书局重刊汲古阁本为主,以通行汲古阁五次剜改本、段氏《汲古阁说文订》,及朱、孙、顾诸本参校;小徐以祁本为主,以汪、马本参校。)次诸家说,(逐条提行,低一格,冠以书名,或二字,或三字。)其段玉裁《说文注》,王绍兰《段注补订》,纽树玉《新附考》、《续考》、《段注订》,郑珍《说文新附考》,徐承庆《段注匡谬》,徐灏《说文段注笺》,桂馥《说文义证》,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义》,严章福《说文校议》,钱坫《说文斟诠》,沈涛《说文古本考》,纽树玉《说文校录》,高翔麟《说文字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汪宪《系传考异》(本朱文藻撰),王筠《说文句读》、《释例》、《系传校录》,(《释例》宜散入各字下,《考异》、《校录》宜入校注下。)惠栋、席世昌《读说文记》,邵瑛《说文群经正字》,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吴玉搢《说文引经考》,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程际盛《说文古语考》,陈瑒《说文引经考》,皆宜全钞。段注为世推重,而疏舛甚多。而王、纽、徐诸家订补,尚非极至。此外倘得希有之本,胪举勿遗,再加补正折衷,宏畅厥旨。(凡纯体字,篇末注云:于六书为某体;兼体字,注云:于六书为某体,兼某体。)其声读之书,别为一册辑录,期于网罗详密,共成大观。

《文选》为词赋家之祖，李善注包举宏富，有俾考订。清代^①为选学者，愈益博通。今以胡刻本为主（《考异》散入各卷正文及李注下），毛、叶各本参校（正文互异者双行标注）。李注晋为大字，（提行低一格写，下同。各本互异及引书与今本不同者，双行标注。）次五臣注，（注逊于李，前人言之已详，然亦有可采，全列勿删。）次刘履《文选诗补注》，汪师韩《理学权舆》，孙志祖《理学权舆补》、《李注补正》、《文选考异》，李攀凤《选学规李》、《选学纠何》，余萧客《文选音义》，朱珔《文选集释》，叶星卫《文选附注》，梁章钜《文选旁证》，张云璈《选学胶言》，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胡绍焜《文选笺证》，钟驾鳌《选诗偶笺》，陈仅《读选意签》，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皆全钞，再加折衷订正，为《文选集注》一书。古人文辞递相祖述，而各具变化。熟精选理，自能洞彻源流。赋家皆宗扬、马，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至于句式，亦穷极摹拟，如相如《上林赋》云：“追怪物，出宇宙。”子云《羽猎赋》云：“追天宝，出一方。”《上林赋》云：“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太冲《吴都赋》则云：“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若此之类，难可悉数。将注选赋，拟先熟读扬、马诸篇，方能穷其根柢。叶本评语，取列眉端，区分段落，细加剖析，其字句摹拟因袭之处，悉为标出，庶无遗憾。其后阅二十六年，^②得日本影印《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无撰人姓名，引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陆善经注，有公孙罗所撰之《文选音决》及《文选钞》，皆吾国久逸之书也，全书宜一一辑入《文选集注》内。

《史》、《汉》、《国志》，湖南已有为补注者。《晋书》以下，惟《五代史》有集注之本，新、旧唐有钞校之书，其余诸史，人罕究心。夫历代各有事迹典制，并有益实用，无可轩轻，徒溺志文辞，非真通史学者也。典午一朝，事实繁富，当时著作凡十八家，断简佚文，未易摹采。贞观之作，遗议实多，宜仿裴注《三国志》例，从《初学记》、《文选注》、《六帖》、《御览》等类书中，搜辑曩编，分条补注。国朝郭伦《晋记》、周济《晋略》、毕沅《晋书地理志补正》、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钱仪吉《补晋兵制》、丁国钧《补晋艺志》，并资搜讨。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宜各为注。综其纲要，是有数端：一、毛本为主，殿本

① 案：“清代”，王氏原书似当为“国朝”。

② 案：“其后阅二十六年”以下关于《唐写文选集注》语，当是丁氏自云。董康于光宣之际在日本发现《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距王先谦于光绪十一年发《劝学琐言》，恰好时隔二十六年。

互校；二、殿本考证散入注文；三、参订本书记传；四、参证《通鉴》；五、参证同时列国史事；六、本书前半互校前代史，后半互校后朝书；七、本朝史学家宜兼采；（钱氏《考异》、王氏《商榷》、赵氏《礼记》、《陔余丛考》之类。）八、金石文字宜广搜；（以上八条，《晋书》并同。）九、《南北史》文字异同宜备列；十、《御览》、《册府元龟》诸书所载各代事实宜详征；十一、郑夹漈《通志》异文宜参订。（郑辑各代记传，有窜改，非元书，然亦有取资，能得宋本尤佳。）文字之间，更为阐发幽奥，厘正讹误，自有蔚然之观。晋、宋、魏、隋各志，最宜悉心考订，足征八代政教风俗之因革。辽、金二史，可用《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二书参校。元史时代较近，诸家载记文集可用旁参。钱（大昕）、毛（岳生）诸儒考订尤勤，并宜讨论。三朝事迹又可与宋明互勘。前举数端，不难隅反。《宋史》在诸史中最为繁冗失伦，前人别纂之书不称良笔，邵氏晋涵撰《宋史》百六十卷已成，闻前有浙人持呈江督，曾文正公已发局校刻，适曾公移督直隶，马端敏公莅任，无过问者，书遂为他人携去，海内留心文献之士，幸共访求之。^①

《水经注》网罗群籍，有功于两汉地志尤巨，为舆地家必应究心之书。官校宋本，袁集《永乐大典》所引，排比原文，出戴震之手，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而赵一清校本，先成于乾隆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始谋锓板。世罕觐《大典》原文，见戴校于赵悉合，疑为弋取，然安有此事？戴氏博考群书，赵氏覃精极思，遂尔合契古籍，情理宜然。（段玉裁、魏源、张穆各执一词，俱可存而不论。）隋唐以降，地名沿革，水道变迁，能为一书绍邨氏绝学者渺不可得。黄氏《今水经》简而寡要，齐氏《水道提纲》有今无古。或尊黄、齐而訾邨氏，不悟水道舆地依事乃立也。当博综史籍，贯穿古今地理水道，仿邨氏体例，为《水经注疏》一书。以各书疏订邨注，一也；依注绘图，参证今地，二也；补证各史关涉水地事迹，三

① 由朱荣琴整理的萧穆《敬孚函稿·致王先谦》第二通，《复王益吾》：“……《劝学琐言》近乃觅得一本阅之，惟所述邵氏晋涵撰《宋史》百六十卷云云一节，传闻失实，不免郢书燕说。邵氏之书，乃采取熊克、李焘、李心传、陈均、刘时举之书及宋人笔记等类，以续王偁氏之书，名曰《南都事略》，非另为全部宋史也。其云浙人特呈江督曾文正公发局校勘者，乃别为一书，实有二种，一为宋《中兴礼书》三百八十卷，是书久佚，乃大兴徐星白太守从《永乐大典》搜钞成之，为南宋一代掌故之渊藪。一为邵二云学士原辑《旧五代史》……今此二书原本尚存瑞安孙琴西太仆家，所云‘浙人特呈江督’者，乃太仆十余年前官江宁布政使时，曾商之书局为之刊布，后为某君所阻，孙公遂将二书收回，不知待之何时始有通人出而为之表章也。……”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案：萧穆与孙衣言之子孙诒让交往甚密，所言有据，驳正王误甚确。此信写于“六月十三日”，无年份，据王先谦按试各府行踪，当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

也；补《水经注》未备各书，四也。四者不备，不为完书。今拟每经注正文下，有戴、赵校语者并列之。（双行标注，勿删汰。）注低于经一格。疏提行，与注并列，上标疏字。注、文应离析者，即离析之。赵氏勘误，散入各卷经注下；有辨证者，入之疏内。张匡学《水经注释地》，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周婴《扈林析鄙》，汪士铎《订正水经注》，文宜备采，再加案语，逐节疏订补证。每数水合绘成图，用汪氏《水经注》图式，稽合省府县志，加绘今图。

治以上各书，果殚十载之功，便立千秋之业，励志之士，当有乐乎此。至所治之书，宜从容考究，不厌精详，非以速成为尚。夫治书之要，首在取正文、前训，亲钞一通。匪特记性不佳者，可以将勤补拙，凡书经手钞，即常读之书，亦生新义。且并列诸家，浅深显见，加以考案，折衷自出，如具两造，而听五辞，犀分镜照，自然神识倍充。宋以前及国朝类书，皆宜搜览。（《世说新语注》、《初学记》、《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类赋注》、《艺文类聚》可资校订。《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经籍纂诂》之类可资考索。偶经触发，当寻检元书，勿得依据。）梳栉字义，以《说文》为归；校订文笔，当一以高邮王氏为法。学人每患途径闇昧，欲从末由。苟徇斯道，决无歧误。如或惊为高美，病其难能，当思日知无忘，历久弗懈，积小高大，便成通儒。中材以下，皆可勉为，非必天禀异人，始可从事。每叹功名可遇而不可求，与其慕浮荣，希诡获，不若守其在我，早谋自立之地也。昔人任为一书，自非圣经贤传，何能毫无指摘？立名之事，争不胜争；前哲瑕疵，议不胜议。惟有自勤学业，方是实在受用。坐观徒羨，不胜结网；俟河之清，必非志士。

为学所以明心，所以养心。人之放心，最难收束，惟读书可以制之。穷年矻矻，乐此不疲，屏绝外慕，是真正人，即是真道学。切勿执汉宋门户之见，强作解人，束书不观，妄生议论。《大学》言诚正必先格致。夫子文章可闻，性道不言自明，得力只是好古敏求。朱子为道学之宗，其读书一字不放过，未尝空谈性命也。宋儒以后理学家书，亦宜博览明辨，既究知学派源流，愈以检摄身心归于定静。朱子《近思录》、刘氏《人谱》二书，言约旨深，尤当时置座（石）[右]。刘引古为证，间涉疏舛，须加订正，念台一代大儒，固不以此为轻重。能博采史传，增辑为书，亦宏道之一端。

经济非可空谈，人苟心术不端，意气不化，虽才美如周公，只足以作恶债事。能由正学生正识，以实心行实事，即绝大经济也。霸才客气，安所用之。

人之资质敏钝，固有天授，心激气定，可学而能。当熟览史书，以古为鉴，至当代掌故，尤贵讲究精通，奉为准则的，则道学、经济、文章，一以贯之矣。贺氏所辑《经世文编》及林文忠、陶文毅、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肃、左文襄文集奏疏，宜熟观，皆切于时用者。（曾、左书尤要，宜从其虚公镇静处留心。《经世文编》一书，当有高才通识、博览群书者续为之，近世所续，未佳也。）^①

南菁乃至江苏学人受王先谦影响很大。丁福保自称，通过学习《劝学琐言》，“余既知学问之门径，即拟笺注各书，先从《说文》、《文选》下手”。后来，丁福保编成皇皇巨著《说文解字诂林》，就完全是遵循王先谦的治学途径而取得的学术成就。

赵椿年则对王先谦《劝学琐言》中有关诗文写作的指导，尤为感佩。他说：

其言诗文尤扼要，谓古文之学，姚惜抱富于理，梅伯言富于辞，曾（公）[文]正公气主驱迈，神自朴洁，学者当由三家以求合《类纂》之绳墨。诗则当先读苏陆以充其才，次学孟黄以老其格，然后沈潜少陵以充其体，上溯《文选》以富其材，取昌黎之骨力，兼义山之典实。

直至晚年，赵还觉得愧对师门，称：“斯二说者，皆毕生所奉为圭臬而曾无几微之似者也。”^②

王先谦不但在理论上对学子予以指导，还付之于实践。王先谦将《尔雅》、《说文》、《文选》和《水经注》四种，分配给各府州学，要他们照此搜辑材料，为这四种著作集注，即将有关历代学者研究这些作品而取得的学术成果，集萃而成一书。据赵椿年回忆，具体分配情况是这样的：

如《尔雅》，则《释诂》、《释训》，江宁；《释言》，太仓。

《说文》，则“一”至“丨”，上元；“中”至“辵”，江宁、句容、溧水。

《文选》，则一卷，上元；二卷，江宁。

《水经注》，则“河水”，江宁；“济水”，上元。

各县皆照此分配。

①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刊于民国10年），《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1999年。案：该年谱于光绪二十一年下，回忆起他在南菁书院治学情景时，一再提起“吾闻之王益吾先生曰”，“吾又闻诸王益吾先生曰”，一若其曾亲炙于王先谦门下者。然丁氏第一次入南菁书院肄业，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而王发《劝学琐言》是在他上任伊始，即光绪十一年（1885），相差十年，丁福保时年十一岁，所以丁不大可能亲闻王之教诲，那么，丁之所谓“王益吾先生曰”云云，实际上就是《劝学琐言》中的话。《劝学琐言》今各大图书馆均应有藏。又，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所记王先谦《劝学琐记》内容虽极简略，但可与丁氏所云相印证。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以下引文出处同。

不过,这四种集注,当年均“未能有成”,只是“至师(王先谦)归田后,始自集《水经注释》为一书耳”。

缪祐孙致缪荃孙书中亦提及此事:“有《劝学琐言》颁行各学,将令诸生分纂经史疏注。(各学分派甚不均,以不知文风优劣也。)此则奢愿难偿,亦未审诸生谋食谋衣之况,百人中难得一真能著书者也。”^①缪祐孙早就预料四种疏注终不能完成。但王先谦此时正筹备刊刻《皇清经解续编》,也许,就是为了要在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这大有功于学术界的壮举,使得王先谦原先极想完成四种集注的学术计划只能搁置一旁。

二 院课均遵旧章

王先谦主政南菁书院,对于前任黄体芳所订之规章制度,尤其是书院中课生的学术研究和考核情况都无所改变,所谓“院课均遵旧章”^②。

书院院长仍是前任黄体芳所聘请的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又据赵椿年回忆,课生的阅卷,也常请浙江慈溪林颐山从旁协助,林是黄以周的弟子,当时在王先谦学署中作幕友。赵说:“益吾师幕中,有慈溪林晋霞先生颐山,元同师亦时请其阅古学卷。”其实,林颐山与其师黄以周一样,也是黄体芳任内所延请,^③王先谦接任,林仍留在江苏学幕中。

这时,在书院肄业的课生,也如前一样,均是从全省选拔的高材生。在院中,既有良师请益,又有挚友切磋,诸生学业蒸蒸日上。赵椿年晚年回忆他四年(赵于光绪十一年初入院,十四年尾离院)“与余同时住院者”:

娄县张闻远锡恭(光绪戊子举人),专精三礼,粹然儒者。

金匱华若溪世芳(光绪乙酉拔贡),算学传家,静深有本。

高邮王绍穆虎卿,英思壮采。

太仓唐蔚芝文治,通宋学,讲经济,治古文,坐言起行,不负所学。

盐城陈惕庵玉树,通经史,治古文,精义瑰词,必传于后。

江浦陈亮伯浏,惊才绝艳。

① 缪祐孙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289页。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③ 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即江苏学政任上的最后一年,正月十五与其子黄绍箕一信中说:“……襄阅试卷,其算学一席,则汝弟书中所说林明经颐山。”《黄体芳集》,第140页。

丹徒陈善馥庆年，治经小学、史学，博洽多通。在院至日晡始起，以读书终夜不寝也。

武进刘淮生翰，文章闳丽，益吾师有“韩潮苏海”之褒。

.....

书院的膏火也与前无所变化，据陈庆年回忆，“丙戌之秋，幸得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月得膏火五千文矣。久之，为斋长，又益三千文。其时，如庄君思緘（蕴宽）、钮君惕生（永建）^①皆同学至交，互相砥砺，以言贫为厉戒”。^②则住院生仍月得膏火五千文，如担任斋长，再加三千文。同窗之间，以学业相砥砺，而以言贫为耻辱。课卷奖金也如前，超等、特等、一等前列者得奖，超等第一名者仍得奖金八千文，余依次递减。

三 增设院长

（一）缪荃孙分主古学讲席

黄以周经学功力湛深，然于文学不甚用力。他自己也不讳其短：“以周于辞章之学，素未娴习。”“大凡人之学术有优绌，才艺有短长。知其绌而不言，何伤乎优；知其短而不用，何害乎长？”所以当有聘请他主讲书院时，总是慎重对待。他说：“湖湘校经堂课士之法，放粤之学海堂、吾浙之诂经精舍。学使陶太史、曹殿撰迭招我主讲，自揣不董辞章，欲转请长于此道者与之偕往，而难其人，卒辞之不就，深有鉴于此失，而欲藏其短且绌也。”^③而黄以周之所以会在光绪十年欣然接受江苏学政黄体芳之聘，来主江阴南菁书院讲席，或因他的学生林颐山亦跟随自己来江阴入黄体芳学幕，随时能在词章讲习上助己一臂之力也。

黄以周在南菁书院深受学生爱戴。黄体芳、王先谦主政时，从元同先生受业治经学者，如张锡恭、曹元忠、曹元弼、胡玉缙、陈庆年、陈玉树、唐文治、于鬯、缪楷等，日后大都蜚声于学术界。他们对于黄先生的学问，尤其三礼之学，敬佩之至，认为老师所著之书“竟无一可议”，“礼学至此为盛”。^④对老师的不擅词章，也从不曾有

① 钮永建为杨颐所取士，纽于己丑（1899年）入南菁，与陈庆年同学，然王先谦已卸任，不及见矣。

② 陈登丰《横山乡人年谱》，1912年2月23日，陈庆年复同盟会调查员邝天民书。录自“缘为书来”网，2008年2月3日，小绿天转帖。

③ 黄以周：《傲季杂著·文钞》卷三《答刘艺兰书》。案：陶太史，会稽陶方琦，光绪五年任湖南学政。曹殿撰，潍县曹鸿勋，光绪七年任湖南学政。

④ 胡玉缙：《傲季杂著·礼说·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版。

些微的不满,反而称赞老师为文“渊懿朴实”。唐文治说:“先生于文退然,自以为弗工。然渊懿朴实,古色苍然,实非近世经生所能及。盖先生之学,精于穷理,故其研求训诂,辨析是非,细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而其从至性中流出者,尤足以感动人心焉。”^①

然而,经学难治,如前所述,即便是在南菁这样的经古书院,创建不几年,录取的住院生中,治词章者就比治经学者多出十人。“院中高材生皆工辞翰,少通经之士”,这样一来,“优绌与元同正相反”,“故元同亦不乐就”。黄以周竟然有过辞职的念头,使得王先谦甚至为此还考虑过继任人选的问题。^②但王先谦毕竟是学问中人,对黄以周很尊重,也很钦佩他的人品学问,但同时也认为黄先生“不解词章”,甚至担心自己离任后,元同先生的去留。他写信给缪荃孙说:“元同品学实好,经术甚深,特不解词章。诸生尚佩服,兄亦敬之。明年则后任主持,非兄所能预知耳。”^③

既要留住黄以周,又要解决所谓黄先生“不解词章”的问题,王先谦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南菁书院增设一位专讲词章的院长。但聘请院长的费用不菲,年薪千金。恰好这时富绅姚文枬、费学曾捐给南菁沙田数万亩,^④书院又多了一项可靠的收入,聘请院长的经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光绪十四年(1888),缪荃孙因继母逝世,丁忧居家。王先谦与缪荃孙谊兼师友,^⑤平时论道讲学,素契于心。这时,王便亲自写信给缪,请他回家乡主讲南菁书院词章讲席:“奉到大讣,惨悼良深,尤望强节哀思,善自珍摄为幸。弟既遭大事,更不可无馆,决计于南菁增设一席,请弟主讲。”^⑥在王致函缪之前后,不少友人也纷纷通知了缪。费念慈说:“长沙师本拟延兄掌教南菁,拟请两山长,此举若成,终胜出游。”^⑦得知缪已应聘南下,又写信祝贺:“南菁闻十八日开课,经师人师,与段、孙

①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辛酉)·徽季杂著》,《茹经堂文集》卷二,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七十一通:“春间益吾师有延芾卿之意,芾卿补缺已近,又将直枢垣,断无劝其南来之理。吾哥虽可暂出年馀,亦恐有碍食俸。闻长沙师已拟延莼客,莼客有津门讲席,恐亦未必肯来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案:信中,芾卿,长洲王颂蔚;吾哥,指江阴缪荃孙;莼客,会稽李慈铭。

③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6—27页。案:此信实为两通,编者误合为一通。

④ 沙田事详见本章第四节。

⑤ 案:同治甲戌会试,缪荃孙在王先谦房,荐而未中,故王、缪有师弟之谊。

⑥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6—27页。

⑦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七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61页。

两先生主讲西湖，后先辉映矣。”^①将黄、缪共同主讲南菁书院，比作八十年前的段玉裁、孙星衍讲学于杭州诂经精舍。费念慈是捐田富绅费学曾之子，费氏父子与缪荃孙关系密切，王聘缪主南菁古学讲席，费氏父子应是大力促成者。梁鼎芬则将院长薪水数也告诉了缪：“昨从王先生署中，惊悉太夫人仙逝之讯”，“王先生欲于南菁书院添请院长一席，以兄当之，年脩千金，特此奉告。”^②王先谦幕友陶潜宣，则告诉缪万事俱全，只欠东风：“此间诸事妥帖，务祈大驾早来。七月即可开课，以慰故乡后进之心，祷切盼切。”^③

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当他回故乡主南菁讲席时，官翰林院编修。缪于光绪十四年九月七日到江阴。二十一日午刻，到南菁书院，学政王先谦、监院秦赞尧，以及院董亦是课生斋长的沙从心、冯箴率诸生入见，成礼。会晤经学掌教黄元同先生(以周)。当日，缪即出古学课题《吴越之间有具区》赋题(七言排律二十韵)。^④自此，缪荃孙在南菁书院开始了近两年的古学掌教生涯。

(二) 黄缪两院长“六世之好”

一个书院同时有两位院长，一主经学，一主古学，两位院长如何处理好关系，事先就有人担心过。^⑤但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缪荃孙于入主南菁后的次日，即赠送黄以周书两种《士礼居题跋》、《三续千字文》以及从京城带回的一些礼物。隔日，黄以周便回赠缪《傲居集》八册，是他父亲黄式三的著作。^⑥缪荃孙对黄以周很敬重，经常向他请教。十年后，黄以周去世，缪为他写墓志铭，深情地回忆起在南菁共事的情景：“荃孙戊子在南菁，与先生接席者两年，冲如昙如，粹然儒者，时时请益，反复详告，不惮烦也。”^⑦

黄以周也很尊重缪荃孙，与缪很投契。他与缪谈起了自己家乡浙江定海的事，说康熙年间定海县令缪燧有德政，去世后，定海百姓很怀念他，将他的事迹记录在册，称《遗爱录》。首倡其事者为黄灏，就是黄以周的高伯祖，而缪荃孙是缪燧舅孙，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九十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65页。

② 梁鼎芬致缪荃孙信，第四十一、四十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57页。

③ 陶潜宣致缪荃孙信，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74—675页。

④⑥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

⑤ 缪荃孙光绪戊子年(1888)六月廿三日日记：“(曹)塋永言南菁卷不甚多，人亦循矩，惟两掌院长同处，恐未必无闲话了。”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

⑦ 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因此，黄以周称两人有“六世之好”。而《遗爱录》存世仅寥寥数册，黄特送缪一钞本，还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表彰缪燧的“遗爱”：

其政绩尤赫著，越至于今二百年，士食其德，农服其畴，虽妇人小子，未能一一述公之政，而曰缪太爷，无不知为好官，公之遗爱可谓深且远矣。《遗爱》有录，创始于士民黄灏等。黄灏者，以周之高伯祖也。重厘其事者，有曰兴标，于以周为族祖；有讳曰梧，以周之先大夫也。缪公之舅孙小珊太史，以周耳其名甚久，初不相识。戊子秋，丁忧在籍，与以周同主南菁讲席，心甚契，谓之曰：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不足为训，而公羊家犹大之。今我二人，上修六世之好，实为美谈，世有阳秋，当大书而特书之。太史未见《遗爱录》，不知所云，因缮是书以遗之，太史欣然付诸梓，又增辑诸事。今定海故家藏斯录者寥寥数册，有此重刻本，人人得而读之，可称快矣。^①

缪荃孙重刻《遗爱录》，是在光绪己亥年（1889），即两人在南菁共事的第二年。

南菁书院所聘两位院长亲密无间，肄业课生大受其益。吴县曹元忠自光绪十二年入南菁从黄以周习经学，深得老师三礼之学之精髓。缪主南菁古学讲席后，曹元忠又从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之学，使他学问大增。又如阳湖吴翊寅请屠寄介绍，拜于缪荃孙门下，^②入南菁后，又向黄以周学习《易》学，经史词章均受益匪浅。吴翊寅离开南菁后，还曾写信就《易》学的问题向黄以周请教，而黄以周随即复信，讨论商榷，不厌其烦。^③

第二节 王先谦设立南菁书局

一 开设书局

王先谦于光绪十一年十月底抵达江阴，在“发观风题附撰《劝学琐言》一册”的同时，又“开设南菁书局，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捐千金为倡，期以三年成之”。^④

① 黄以周：《傲季杂著·文钞》卷二《重刻缪公遗爱录》，光绪二十年刊本。

② 屠寄致缪荃孙信第六通：“再，友人吴孟棗翊寅，阳湖附生，诗文敏贍，涉猎金石训诂之学，并有端绪。留心世务，议论激扬。近来敛才就范，力求实学，窃慕高风，欲肄业南菁，藉亲教益。”《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75页。

③ 黄以周：《答吴孟飞书》，《傲季杂著·文钞》卷三，光绪二十一年南菁书院刊本。

④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早在六十年前，即道光五年（1825），著名学者仪征阮元在两广总督任内，就在广州学海堂内刊刻《皇清经解》，至道光九年刻成。该丛书共收七十三家，著作一百八十三种，共计一千四百卷，凡清初至嘉庆年间著名的经学著作，搜罗略备。但是，由于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局限，仍不免有遗珠之讥。嘉道以还，至同光年间，经师辈出，经学著作又成汗牛充栋之势。因此，早就有学者想仿阮元而续编《经解》，然终难如愿。如德清俞樾就这样说过：“江浙之开书局也，余曾有续刻《皇清经解》之议。因博访通人，搜罗众籍，戴子高望以书目一纸见示，采撷略备。乃当事诸君子，莫有从余意者。余穷老且病，此志终不果矣。”^①然而，此事王先谦做到了。

（一）访书

王先谦是位有心人，来督江苏学政前，早在京师就“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②到江阴上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其实，这搜访文献的工作，前任学政黄体芳早已做了不少，赵椿年回忆说：“癸未之秋，漱兰师以国史馆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采访各处遗书，曾刊有札苏、松、太、扬、镇各属求书文稿一本，所列书目，多得自搜访，不尽凭志乘，极为难得。其后各属如何呈复，不得而知，即使有目无书，亦可补四库之存目，故备录之。”^③还说：“札词皆渊雅，扬州一篇尤为完美。”前任黄体芳采访遗书，为王先谦刻书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外，江阴缪荃孙、桐城萧穆（字敬孚）也居功厥伟。“先生（案：缪荃孙）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所藏清代经说，王葵园先生续刻《经解》，多所取资。”^④“王益吾祭酒先谦刻《续皇清经解》、《续古文辞类纂》，多半取材于敬孚。”^⑤

王先谦认为他所搜采到的这些书“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所以应该将它们“网罗哀集，刊布流传”，所谓“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该巨帙如能如愿刻成，“似于表章经术，启迪学人，不无裨益”。

王先谦下决心要续刻经解，也与当时的风气有关。自乾嘉以还，“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雠校”，甚至连“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

① 俞樾：《春在堂随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② 王先谦：《南菁书院设局刻书奏折》，《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刻本，1888年。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赵所录黄体芳札文，此处省略不录。

④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八十八《南皮学案下·南皮弟子·缪先生荃孙》，中华书局2008年版。案：《清儒学案》此说，实采自江阴夏孙桐所撰《缪艺风先生行状》。夏本是《学案》撰写者之一。

⑤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目以精审闻，他可推矣”。^①

（二）实心做事

王先谦是传统文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他这次出任江苏学政，竟然破例，没有参与考差而被直接任命，他说：“光绪乙酉，奉命督学江南，以未与考得之。弩劣小臣，蒙被异数，忝窃甚矣。”^②内心之感激可见。而对当时官场的敷衍因循的作风，又深为不满，他说：“谓居官难乎？甲往而乙来，朝至而夕迁，怀印掬绶，意气赫然，纷纭盈乎天下。谓居官易乎？则名于其职者，十不一二也。”尤其是督学之官，最难考核他们的政绩，“是故居此官之为难与易，其间几于不可辨”。然而王先谦却不想在这“几于不可辨”之间滑过去，他要想为天下学子做点实事，而不想“苟以官为荣人之具而思所以实其名，则其荣也，只是以为辱耳”。他希望做个名副其实的督学之官，实心做事，“将以佐圣主兴行教化，董正学术”。^③而“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本就是 he 多年来的夙愿，这次督学江苏，终偿夙愿。

（三）学幕

王先谦学幕中，如同前任黄体芳一样，人才济济。慈溪林颐山、会稽陶濬宣当时就极负盛名。

王先谦很敬重林颐山的学问，写有“说礼何人似后苍”的诗句赞扬他，^④因林颐山师从黄以周，亦精通礼学。林颐山字晋霞，后来有《经述》三卷收入《续经解》中。当萧穆为《续经解》事到江阴访王先谦时，与林也畅谈甚欢，极为佩服林的学问。萧后来为刻《诗经广诂》事，致信王先谦，认为该书“体例本佳，江浙诸老皆称之”，并希望“宜托林晋霞兄一手校定写刊”。又担心王的健康，“知执事煞费苦心，深虑精神用过，大非养生之道”，希望“校书之事，一切付之晋霞、理安、慧英诸君可也”。^⑤林与南菁书院关系很大，下文再提。

陶濬宣，号心云，光绪二年（1876）举人，能诗善书，入王学幕时，已年近四十。当陶返乡时，王曾赠诗：“陶生不得意，四十从我游。惜哉丈尺水，置此万斛舟。”^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② 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六《葵园校士录存》序。

③ 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六《江阴学使院续刻题名记》。

④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三《通州试院集同人小饮，次前岁登狼山韵》。

⑤ 朱荣琴整理的萧穆《敬孚函稿·致王先谦》第七通，《复益吾》。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⑥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二《送心云归会稽》。

称陶如“万斛舟”，在如“丈尺水”的学幕中，实在是委屈了他。

孔广睿，字谔卿，山东曲阜人。王先谦称他“孔圣人裔，举人”。王于光绪十三年（1887）春按试徐州府，试事毕，孔告假归省父母，因徐州离曲阜不远。王赠诗：“君家虽隔乡，此去三百里。且为十日别，往博二老喜。兼旬困文字，失笑蝇钻纸。……”^①十年后，孔因即墨孔庙事件而名噪一时，此不赘。

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安徽桐城人，师从桐城派名家吴汝纶等，与伯姊夫马其昶、仲姊夫范当世、兄姚永朴等名士相砥砺，博采众长，学识精粹。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江南乡试第一名举人。姚未中举之前，因吴汝纶引荐，于光绪十三年（1887）曾入王先谦学幕。^②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安徽师范学堂监督，赴日本考察学制。入民国，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著有《慎宜轩诗集》、《文集》、《日记》、《笔记》等。

当然，学幕中还是以湘籍学人为主。

王先慎，号慧英，长沙人，王先谦从弟。生性淡泊，不慕富贵荣利，王先谦称“弟立志不应试，每曰：‘他日有以自见，称长沙布衣某，足矣。’”^③王先谦在外按试，还不忘赠诗其弟，赞扬他“富贵功名转眼非，何人似子识先几。生员不羨元和惠，子美诗中大布衣。”（《寄从弟（先慎）慧英江阴》三之二）光绪十四年（1888）秋，王先谦在江阴学署为先慎过生日，王先慎感慨地说：“余从学使兄来署，自修复寄园，常寓于此。春秋清佳，朝夕玩赏。花树生色，景物相亲。荏苒三年，行且别去。季秋念六，为余初度。学使兄设宴秋芳馆，邀集家人欢醉竟日，客中之乐，无异逾兹。读东坡寿子由诗‘但愿白发兄，年年作生日’之句，弥觉怦然有感。”在江阴作客三年，却忘却是在客中之身，差有乐不思蜀之感，于是“率成二绝，聊助一粲云尔”。录其第二首：“筑馆编篱事事新，三年忘却客中身。而今霜信催归思，输与黄花作主人。”^④诗中显见王先慎与江阴的因缘，情感至深。王先慎有《韩非子集解》行世。

吴光尧，字莫阶，湘阴人。“长于目录校讎之学”，“尤专许书”，“参互二徐本同异，著《说文校勘记》十四卷。”“时长沙王祭酒先谦被命视学江苏，君与祭酒总角交，

①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二《送孔广睿谔卿归曲阜省觐（孔圣人裔，举人）》。

② 吴汝纶与王益吾书：“往岁论荐姚君，猥蒙示谕收录门下。”《吴汝纶全集》第三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631页。案：此信写于丁亥七月十七日，信中称“往岁”，则吴引荐姚，似在丙戌（1886），然王聘姚入幕，可能在丁亥年也。

③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三《寄从弟（先慎）慧英江阴》三首之第二首之注语。

④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三《秋芳馆寿菊生次韵四首附元作》。

又为姻娅，祭酒见君狂喜曰：‘此天以冀阶助我也。’祭酒以儒学进，锐意撰述，有整齐百家之思。君则意度矜慎，单文孤谊，辗转终夜，与祭酒析疑问故，多所诤难，祭酒辄虚己听之。校试数月遭微疾，少间，睹二童古衣冠持丹匣玉玦拱立榻旁，俄而不见。君知不起，乃依枕草家书，勸诸男敦行励学为治生之本，勿忧贫也。享年四十有七，光绪十二年八月辛酉卒于江阴试院。祭酒哀感，为归其丧。”^①

王启原，字理庵，湘潭人。王先谦将他与王闳运相提并论，写诗称道：“湘潭蔚时彦，二王既龙蟠（君及壬秋）。”^②

刘钜，字笏云，善化人，王先谦故友刘冕之子。王先谦在江阴学署中，还曾为刘钜撰其父刘冕的墓表。^③

王先谦的幕友几乎都参与了《皇清经解续编》的编辑校对工作，其中王先慎、吴光尧、刘钜所校卷数最多。而吴光尧仅在学幕一年尚未满，病逝于江阴学署中，可谓鞠躬尽瘁，生死以之了。但具体事务做得最多的还是“长沙布衣”王先慎，他是总编，所校卷数也是幕友中最多的，王先谦也最信任他，毕竟是弟兄关系，总是胜过外人，王于此点，在《寄从弟（先慎）慧英江阴》一诗中说得最明白：“洒涕鸰原气不伸，相看时复减酸呻。怪他四海论兄弟，群从须知胜外人。”^④王先慎在学幕三年，大概出棚助兄阅卷的机会极少，几乎全部时间都待在江阴，全身心地投入到《续经解》的编校工作中了。

二 筹集经费

当时，江苏学人对王先谦编纂《续经解》此举深感鼓舞，常州费念慈致缪荃孙信中多次提到，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社日一信：“吴下事如旧。书局中有续刻《皇清经解》之议，此事若果，真盛举也，未识当事者之意何如耳。”^⑤但对刻书经费问题表示担心：“一梧师书局之设，劝捐各州县，颇不易，以无好督抚也。”^⑥深恐督抚不会支持。又称“长沙师回澄，弟为家务所累，未得往谒。书来，言刻资尚短万金，而志

① 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二《清故湘阴县廩贡生吴君行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页。

②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二《王启原理庵以诗见寄奉答（王，湘潭廩生，时在幕中）》。王闳运，亦湘潭人，字壬秋。

③ 《刘秉斋墓表》，载《虚受堂文集》卷十二。

④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三《寄从弟（先慎）慧英江阴》三首之第三首。

⑤ 《艺风堂友朋书札》，费致缪第四通信中语，第311页。

⑥ 《艺风堂友朋书札》，费致缪第四通信中语，第335页。

在必成，殆须竭数年廉俸以济之矣。”^①可见当时王先谦甚至打算自己捐出数年廉俸来完成此事。又称王先谦已上奏折朝廷：“长沙夫子现拟刊《经解续编》，设局于南菁，五月中附片一奏，因经费无出，奏准后拟合江宁、淮南、苏州，四局合刻，三年可成，然非两万金不办。”^②现录王先谦奏折全文如下：

国子监祭酒江苏学臣王先谦跪奏，为奏明设局刊刻《经解》事。

臣惟育才之道，劝学为先，为学之方，穷经为首。国朝经学昌明，鸿生钜儒，时时间作。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采辑诸家言，刊为《皇清经解》一书，深有俾于学者。迄今又数十年，海内经生纂述相仍，流风未沫。兵燹之后，遗文秘秩所在散见。及今网罗裒集，刊布流传，彰国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林之望，亦学臣职也。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蒐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

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惟此项刻贲为数较巨，容再函商督、抚臣转谕僚属量力捐助，本省绅士及他省官绅有好义乐输者，亦从其便。臣委派书院董事兼管收发银钱书籍事宜，并飭江阴县知县稽查董理，事事务从撙节，期于工归实济，费不虚糜。书成后，仿汉代碑阴之例，将捐助官绅衔名银数付刊一卷，俾垂久远。仍虑经费或有不敷，臣于考试苏州时，与抚臣面商，在苏局分刻数种，亦经抚臣允诺。

区区愚忱，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似于表章经术，启迪学人，不无裨益。谨具折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具奏。

七月二十六日递回原折，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③

王在此奏折中称：“臣于考试苏州时，与抚臣面商，在苏局分刻数种，亦经抚臣允诺。”则王先谦在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按临苏州府岁试时，^④就与刚上任的江苏巡抚崧骏当面商定，由苏州书局分刻《皇清经解续编》，这大大减轻了南菁书局的

① 《艺风堂友朋书札》，费致缪第六十四通信中语，第353—354页。

② 《艺风堂友朋书札》，费致缪第五十七通信中语，第348—350页。

③ 《皇清经解续编》卷首。

④ 见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光绪十二年丙戌，“二月，出棚，考试苏、松、镇、太四府州属”。按惯例，江苏学政在任内的首次出棚，总是苏州府。参见拙著《江阴明清学政》。

压力。崧骏是满人，“光绪十二年，授江苏巡抚，时曾忠襄公督两江，每事必商之于公”。^①即便是两江总督曾国荃，也不敢怠慢崧骏，事事要与之商量。不过，崧骏在江苏学人中口碑不错，“崧中丞镇青之抚吴也，喜亲风雅士，栽培寒畯，无微不至。中丞嗜学，而尤善作擘窠书，以缣素乞写者踵相接也”。^②崧骏数年后调任浙江，浙人称其“廉介自持，抚浙时，值六旬寿辰，不纳僚属一物，闭辕门不受贺。后卒于任，篋中仅余养廉银六百余”。^③崧骏清廉且“嗜学”，喜欢亲近风雅之士，又肯无微不至地栽培寒畯，所以对王先谦于苏局分刻《续经解》的请求，能爽快答允。^④

王先谦上奏南菁设局刻书获准，经费来源有了保证，所以费念慈会庆幸“得旨筹款，当较易矣”。^⑤另外私人亦有捐款，如安徽黟县李宗焜，字辉亭，用后补道在江苏需次，因萧穆介绍，得见王先谦，闻王刻《经解续编》，便慷慨解囊。王先谦很是感激。李死后，为撰墓表：

光绪间，山西大饥，捐巨金振济，议叙道员，分发江苏，赠三代二品封典，而君不乐仕宦，未尝一投手版谒大府。……余视学江苏，介萧君敬甫来见，语大欢，留十数日。见余刻皇清经解续编，曰吾幸遇此不朽盛事，立捐贖助焉，逮余假归，月通书问，必举所欲刊播之书相商榷，其用心深长，乐善不倦。^⑥

三 刊刻《皇清经解续编》

(一) 商榷书目

续刻经解，首先要选定书目，哪些该刻，哪些不必刻，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取决于编纂者的学术爱好及其水准。王先谦的治学倾向和刻书宗旨，事后也可从其为淮安顾震福书所作序中体现出来：

……治经者，不通小学，无以究其原；不明假借，无以尽其变；不厘然于今、古文之界域，无以析众说之是非而折其衷。典午大儒虽精博如郭景纯，尚不能通贯小学、假借之旨，故于说经不免违闕。至本朝而《说文》多专家之学，或更

① 俞樾：《崧镇青中丞六十寿序》，《春在堂杂文》五编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0—102页。

② 李伯元：《南亭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案：崧骏字镇青，原误作骏青，径改。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7册，“崧镇青宦囊六百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94页。

④ 据《葵园自定年谱》光绪十四年六月，“余奏刊《经解》后，到苏州晤崧镇青中丞骏，与商此事，慨然允苏局助刊四百卷”。则崧骏答允助刊事，似在王上奏之后，抑或王先谦于上奏前后曾两次面晤崧骏，第二次因已奏准才最终敲定？待考。

⑤ 《艺风堂友朋书札》，费致缪第四十七通信中语，第341页，该信写于八月五日。

⑥ 王先谦：《诰授通奉大夫江苏补用道李君墓表》，《虚受堂文集》卷十二。

上溯三代彝器，旁求汉魏字书，所以穷六书之渊微，启古训之秘奥，美矣盛矣。若今、古文之分，则段茂堂、孙渊如之治《尚书》，陈朴园之治三家诗，不能无颠倒迷误之病。盖自康成注经，杂糅今、古，后儒猝难辨识，强执郑说，仞为今文，此其蔽也。毛公为诗，本不在孔壁古文之数，自谓传自子夏，当时已不遵信，以献王所好，依附幸存。然汉人罕称道者。刘子骏欲牵引以张不传之学，颇议立之。而移太常博士书，不及一字，足以推见至隐。其析邶、鄘、卫为三卷，不以周南、召南为地名，而强释数语厕之卜氏大序，致上下文意不通，用心至为谬妄。《桑中》序误解《礼记》，《硕人》序误读《左传》，则影附古文而实不明古文。若斯之类，尚难悉数，徒以郑君鹜博，为之作笈，郑学盛而毛传行，三家遂陵夷渐灭，无复片简之存，惜哉惜哉。自今以往，谓无有志复古者起而正之，吾不信矣。……^①

该序虽然主要在论说《三家诗》，但也可见王先谦治学眼光宽广，不偏守一隅，尊古文，也不薄今文，与阮元编《经解》有很大不同。难怪后人要称王先谦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涂辙而一之”。^②

先前，德清戴望就拟有经解目录一纸，或亦可供王先谦作参考。因此，王于书目的选定早已成竹在胸。但王先谦在学术上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时时会开示书目，与其他学者友人讨论商榷，如缪荃孙，如萧穆，如李慈铭等。

萧穆，字敬孚，安徽桐城人。同治初年，“曾国藩总督两江，注意文事，延揽学人”。萧穆以一诸生，上书幕府，得到曾国藩的重视。“时上海方创立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欧美史学、舆地、天算、声光化电诸书，用文笔雅驯者谈论修饰。”于是，萧穆就被分发到上海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薪水至薄，穆饮食衣服至朴俭。饌之美者，惟豕肉蒸菽乳，月数尝耳”。萧穆性嗜积书。当时大乱初定，书价极低廉，书贾多集上海，萧穆“节省衣食之余，益以卖文所得，一用市书。日夜考求，遂熟于目录版本之学”。由于“士夫之说学而宦游东南者多从之求”，“则贩贵所赢益市书”，“故一寒士而积书至数万卷，间多善本”，以致“长沙王先谦任江苏学政，刊《皇清经解续编》，又续姚氏籍《古文辞类纂》，取材出自穆者十八九”。萧穆为文，“长于考证，序跋居多”，虽然“楷书粗拙”，“得秘本，校勘迺写，夜静目昏不少修”。萧穆友

^① 王先谦：《顾竹侯所著书序》，《虚受堂文集》卷六。

^② 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闽尔昌《碑传集补》卷七。

人陈衍称他“盖何焯、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之流亚也”。^①其乡后辈姚永朴也称“惟先生一意编摩古籍，与后生言于字句异同、刊本良否以及前闻轶事，历历然如数室中物，而无一语及世务”。^②

当王先谦将拟刻书目给萧穆过目后，萧即复书，认为应将所拟书目删去三分之一。萧曾与瑞安孙诒让书信往来讨论此事：“……弟拟开年到江阴与之面谈，缘弟前已作字，属其将所列经目删除三分之一，更博采人间精著稿本及刊板而难得者，为之开雕。彼尚然否不定。今忽得我兄之示，不禁狂喜，彼此意见大合，不得不援以为助。然王君（案：王先谦）就为近来虚心之士，必须往聚数日，乃能斟酌尽善也。……十一月廿九日。”^③萧穆向王先谦建议，删除王原先所拟书目的三分之一之后，再广泛采集虽经兵燹而尚存于民间的“精著稿本”，和那些虽曾刊刻而至今已很难觅的板本，然后付刊。但王先谦对于萧的建议，“然否不定”，尚在犹豫。所以萧穆打算过一两个月，即开年以后，乘王先谦在年初尚未出棚之机，亲赴江阴与王面商。现得到经学大师孙诒让来书，“彼此意见大合”，这使萧穆说动王先谦采纳己见的信心大增：我的意见你可以不听，孙的意见你总不会漠然置之吧。萧穆觉得王先谦是“近来虚心之士”，但书信往来，总觉言犹未尽，所以“必须往聚数日，乃能斟酌尽善也”。

萧穆还真的去了江阴，不过是在开年的夏季。他后来写给孙诒让的信中提到此事：“……弟夏间病后曾回里一行，道出江阴，访王益吾学使，留谈三日，其所刊各经已有大半，较前目颇有增减，于尊见及鄙意所欲增删者亦大半相从。……十五日。”^④那么，王先谦还是虚心采纳了萧、孙的意见，“所欲增删者亦大半相从”，只是增删著作的具体篇目，似不见记载。

李慈铭（1830—1894），字悉伯，号尊客，浙江会稽人。光绪庚辰进士，官户部郎中、山西道监察御史。李博览群书，经史有根底，工诗词骈文。王先谦与李慈铭的关系很好，有学术上的认同，也有科举场上的因缘。王归田后自称：“犹忆甲戌分校，缪筱珊编修、李莼客、朱蓉生两侍御、赵桐孙太守卷，并出余房，力荐未售。同人

① 陈衍：《萧穆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十二。

② 姚永朴：《萧敬孚先生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十二。

③ 朱荣琴整理的萧穆《敬孚函稿·致孙诒让》第一通，《复孙仲容》，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案：该信可能写于光绪十二年。

④ 朱荣琴整理的萧穆《敬孚函稿·致孙诒让》第二通，《寄孙仲容》，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案：该信可能写于光绪十三年秋冬间。

诧余，此四君获隗，足冠一榜，余时亦颇自负。”^①李慈铭于光绪八年为王先谦母写墓志铭时，对此事也心存感激：“慈铭自同治壬申与今国子监祭酒王君先谦相识，甚疏也。甲戌会试，卷在祭酒房，力荐之，俛得，而以文字违格，卒被摈。心感祭酒，然踪迹益以渺。庚辰成进士，祭酒为邻房同考官，揭榜时见慈铭名，感唏之甚。既慈铭呈牒翰林院，乞守故官，祭酒力沮不能得，叹息累日。慈铭始益感祭酒，交日密。”^②

当王先谦将刊刻书目寄与李慈铭时，李即于光绪十三年八月回信：“辱示《经解续编目录编》，凡二百一十六部，^③皆近代经学大师微言秘籍。”^④接着，对王开列的二百一十六部书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应删五部：“宋确山《周礼古书疏证》鲜所发明，见闻亦隘，较之金坛段氏《周礼汉读考》相去远甚，似可不刻。邵位西《礼经通论》持议不根，实汉学之大蠹；戴子高《论语注》怪诞谬悠，牵引《公羊》，拾刘申甫遗唾，^⑤支离益甚，且多掩旧注以为己说而没其名。此两种宜从删汰。桂氏《说文义证》书太繁重，又湖北已有刻本，其书亦无甚精义。洪北江《左传诂》仅存古注之略，无所证成，既刻李次白《贾服解辑述》，则洪书似可不刻。”

现查《皇清经解续编》，宋世莘、戴望、桂馥之书确已删去，但邵懿辰、洪亮吉之书仍被收入。而桂馥《说文义证》之被删，大概也不是如李所说“书太繁重”，“其书亦无甚精义”。因王先谦对《义证》很是推重，他在《劝学琐言》中向苏省学子郑重介绍：“桂氏《义证》或病其繁，不知博通字义乃能精究字原，此书甚要，不可忽视。”那么，也许是因“湖北已有刻书”，为节省资源而忍痛割爱了。

李慈铭在复信中，又认为“宜采补者”约有五六十种，并开示书目，著名者如“王实甫《大戴礼释诂》”（此书未见，然阮文达集中有序，似已刻。近人书中亦有推重之者）^⑥、“陈兰浦《东塾读书记》”。今查《续经解》，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仍未收，

① 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六（《葵园校士录存》序）。

②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卷九《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页。

③ 《续经解》刻成，实收二百九部。

④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文集》卷五《复王益吾祭酒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62—866页。以下引文同此。

⑤ 案：刘申甫，疑是刘叔俛之讹。刘叔俛，名恭冕，宝应刘宝楠之子，继父志，续撰成《论语正义》。刘恭冕又有《何休注训论语述》一卷，讲《公羊》大义，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卷1412）。而刘申甫，名寿曾，仪征人，其《婚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亦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卷1423—1424）。仪征刘氏，自刘文淇起，四世治《左传》，守古文家法，不专治《论语》，更不讲《公羊》今文大义。李慈铭这里将扬州二刘混淆，误。

⑥ 案：王聘珍，号实斋，李称实甫，疑误。又，所著书为《大戴礼记解诂》，非《释诂》。

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则被收入。

王先谦大概不止一次地向李慈铭征集李自己的经学著作，李都婉言谢绝。在光绪十二年的复信中说，王先谦“自昔岁九月旌节南发”，抵江阴后，“远发德音，征刻鄙集”，但自己“平生篇秩，删佚居多。酬应语言，绝无留稿。遽灾梨枣，益汗甲颜”。^①李于光绪十三年八月的复信中说：“蒙索拙著经说，本多口耳之学，无可采者，以散在日记及经籍眉端，一时辑录不易，又苦乏写官，拟俟病愈招邑子及门生一二人处之寓斋，写出数卷，名曰《越缙经说》，奉正台端，以待别裁。”^②《越缙经说》至今未见，所称“遽灾梨枣”云云，亦非自谦，李确实在经学上用力不多，成就远不如他的文学。^③

至于学幕中人，除编校外，自然也参与了对《续经解》书目的讨论。王先谦卸任后曾与缪荃孙通信，称：“王铭西《春秋》，在江阴为林晋霞、王理庵两君所尼。”^④对王铭西的《春秋》三种，因林、王的反对而未收入《续经解》，有点后悔。但也说明王先谦在选定编目时，很尊重幕友林颐山、王启原的意见。

王先谦还与桐城派名家吴汝纶通信讨论，并寄示经解义例。后吴在致王的一封信中说：“示及搜刻经解义例。窃愿惠寄书目，少广见闻。阮太傅原书，虽未尽当人意，要为宏博钜观，资益学林不少。独其门户之见，使后来变本加厉，海内学者专搜细碎，不复涵泳本经，究通文法，此其失也。执事文章宗匠，取舍精审，此编出，必当远过阮公。未识经费何如？分校之士有几？成书何日？刻手若何？远在下风，无任驰仰。”^⑤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大家，秉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理念，对阮元在编选《皇清经解》时所持的汉学立场，颇有微词。王先谦则与阮元有不同，对桐城派很推崇，故吴投桃报李，有“必当远过阮公”之语。

江苏学人如缪荃孙等，也是王先谦经常商讨的同道中人。王先谦通过缪祐孙

① 《越缙堂诗文集·骈体文》卷二《复王益吾祭酒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页。此信未署年份，而王先谦于光绪十一年秋赴江苏学政任，由此可推断此信应写于十二年。

② 李慈铭：《越缙堂诗文集·文集》卷五《复王益吾祭酒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66页。

③ 案：民初，清史馆总纂之一的吴士鉴致信缪荃孙，谈及李慈铭：“越缙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间，此老监试，任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此，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欲争人儒林，直是不知越缙也。若列入文苑，尚可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艺风堂友朋书札》，吴士鉴致缪荃孙书第十四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453页。

④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⑤ 吴汝纶与王益吾信，丁亥七月十七日，《吴汝纶全集》第三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631页。

寄书目给缪荃孙,要他提意见。^①费念慈也写信告诉缪荃孙:“姚惜抱《经说》已删,然似此者仍不少也。”^②估计王先谦拟刻姚鼐的《九经说》,后听从缪、费等人的意见,删去不录,这也说明王在汉、宋学之间的取舍,还是顺从学界主流。

王先谦用来刻书所用的本子,大都是用王先谦自己和缪荃孙诸友朋的藏书和各学学官从儒门旧族覃心搜采来的旧藏。

(二) 校讎刊刻

《续经解》的校讎刻印实分两个系统,一是江苏巡抚及其属下掌控的苏州官书局,刊书地点在苏州;一是王先谦奉旨筹款而临时自设的南菁书局,刊书地点在江阴、长沙、上海三地。^③

据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④光绪十四年戊子六月,“《皇清经解续编》刊成。余奏刊《经解》后,到苏州晤崧镇青中丞骏,与商此事,慨然允苏局助刊四百卷。仁和叶淮生主政维幹在上海主书院讲,亦愿在沪助刊。余复设局长沙、江阴两处,延亲友分董其事,成书一千四百三十卷。广丐同志鸠集五万余金,以二年余获成巨编,非友朋欣助之力,不克至此,诚厚幸也”。

那么,《续经解》的刊刻,除苏州书局(即江苏官书局)由江苏巡抚崧骏答允助刊四百卷,上海敬业书院主讲叶维幹亦愿意在上海帮助刊刻外,主要由江阴、长沙两地承担。

苏州书局原由巡抚崧骏答允助刊四百卷,实际上没有完成此数,据王先谦于全书刻成而上奏朝廷时称,“苏局助刻书二百四十三卷”。

江阴刻书,设局于南菁书院,《江阴县续志》有记载:“奏准在院中设局汇刊《皇清经解续编》。于院西长江水师协镇署故址,建屋两进,为刊书局。”^⑤南菁书院原本在“长江水师游击署”故址上建成,现又在南菁书院西邻的一所旧衙署“长江水师协镇署”故址上,建造两排房屋,作为刊书所在。两年多后,《续经解》刊成,南菁书局裁撤,这刊书的房屋经后任杨颐改建后,成了书院课生的斋舍,书院的建筑规模也扩大了。

① 缪祐孙致缪荃孙信,第六三通,有“益师属寄《经解》目,祈查入”语。《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96页。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4页。

③ 案:王先谦原拟合江宁、淮南、苏州三官书局,再加上南菁书院所设书局,共四处同刻。见费念慈致缪荃孙第五十七通信:“长沙夫子现拟刊《经解续编》,设局于南菁。五月中附片一奏,因经费无出,奏准后拟合江宁、淮南、苏州四局合刻,三年可成,然非两万金不办。”《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8—350页。后又改变初衷,不知是何原因,抑或两江总督未允江宁、淮南两书局同刻《续经解》耶?

④ 《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长沙的书局设在何处,待考。

叶维幹在上海刻书之地点不清楚,有可能在敬业书院,因叶曾主讲该书院。叶助校刊之书竟有数百卷之多。^①

叶维幹(?—1889),字槐生,浙江仁和人,是王先谦的门生,因叶中光绪庚辰科贡士,王是房师。两人师生关系十分融洽,王赠诗与叶,说道:“与君会面勤,临别恨时暂”,“刊经实助我,朱墨纷点刊。采访遍故家,经营少遗憾。邛笈有分架,吴饷致远担。所重匪多仪,肺肝如篆斲。兼旬不相见,使我心烦慵。”^②对于叶在刊刻《续经解》时的全力支持,充满了感激之情。从诗中还可以看出,叶维幹不但倾全力帮助校刊,还四处采访故家藏书,甚至亲自参与校勘,朱墨纷点,肝胆尽露。

可惜,丛书成后不久,叶即因病去世。王很痛心,与缪荃孙通信时说:“昨得柚岑(案:缪祐孙)书,始知槐生在杭病故。(此君实堪痛惜,如此好人,不能长命,为之挥泪不止。)”^③叶维幹的乡前辈谭献,为叶的英年早逝也深为惋惜:“叶槐生贡士绩学善病,著书未成。研精校勘,博综群书。主讲上海,相见甚欢。以为乡井耆旧凋零,朋辈亦且阒寂,槐生新交,足张吾军。今年悼亡归里,过从,神情萧索,遽捐馆舍,可谓有才无命矣。”^④谭称叶“贡士”,而不称“进士”,实因叶虽会试中式,而丁忧未与殿试也。叶逝世后,俞樾也痛心不已,为写挽联,前有一小序:“槐生以庚辰年会试中式贡士,遽以奉讳归,未及殿试,至今十年矣。今年,庚辰一科得试差者七人,而槐生犹未登甲第也。主讲沪上敬业书院,亦游余门下,曾为余注《宾萌外集》,未成。”^⑤叶维幹的庚辰同年,十年后己丑(1889)得试差(案:乡试主考)者有七人,而叶竟然还未登甲第(因未参与殿试,未成正式进士),真令人痛惜。

王先谦于丛书刊成后,上奏《续经解》刊刻告成折,后附有刊刻《续经解》的总辑、监刻、收掌的姓名。总辑是“长沙布衣”王先慎,监刻是仁和叶维幹、长沙王宾,收掌则为江阴南菁书院的沙从心、冯铭。

① 王先谦《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而槐生在沪助余校勘《续经解》至数百卷。”《虚受堂文集》卷十二。案:叶维幹与陈昌绅为中表兄弟,陈昌绅后在瞿鸿禨任江苏学政时,主讲过南菁书院,时间不长。

② 王先谦:《寄赠叶维幹槐生》,《虚受堂诗存》卷十三。

③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此信尾署十月廿八日,但未署年份。据信中内容,似写于光绪十五年,王先谦归田刚一年,缪荃孙主讲南菁书院亦一年。又据谭献所写挽联,注明己丑,更为确证,可推断叶逝于1889年。

④ 谭献《复堂日记》卷八,己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⑤ 俞樾:《叶槐生贡士挽联》,《春在堂楹联录存》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参与校讎者，在南菁书局主要是学署幕友和书院课生。

校讎非常严谨，翻开《续经解》，每一卷末都附录两名校对者的姓名，可能前一人初校，后一人复校。众多校勘者中，可确定是肄业南菁的课生有：陈庆年、陈汝恭、冯铭、沙从心、章际治、赵椿年、曹俨、唐文治、丁国钧、范本礼、邵元晋、孙同康等，林颐山则是书院的老师，后为院长。唐文治回忆此事：“王益吾先生刻《皇清经解续编》成，余曾任校书之役，交半价，得书全部。”^①唐文治只是校书一卷，而他的同学陈汝恭则“校字”（初校）其父陈立《公羊正义》七十六卷。复校《公羊正义》的也大都是南菁课生，分别是常熟丁国钧“参校”第一至二十二卷，丹徒陈庆年参校二十三至三十九卷，昭文孙同康参校四十至五十六卷，常熟邵元晋参校五十七至七十六卷。^②又据费念慈致缪荃孙书：“陈卓人《公羊正义》原稿及清本均存书院，弟昨在江阴时见之，中缺数条，师倩元同孝廉补撰。”^③连黄以周山长都参与其事，当然他不会去做校对的事，而是应王先谦的请求，将《公羊正义》原书所缺的内容补撰完整。又，柳兴恩《穀梁大义述》稿本“稿墨凌杂，丁亥年，属庆年校理并为之补苴，长沙师复为编定三十卷”。^④则陈庆年不但了校勘此书，还曾为之董理补苴。南菁诸生中，校勘卷数最多的是范本礼，有可能他此时亦延入王先谦学幕中。王先谦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大工程，南菁师生作出了贡献。

南菁课生孙同康（后改名孙雄）晚年曾写诗回忆当年南菁校经之事：“江左黄王抗阮徐，欲从图画补精庐。（黄漱兰师督学吴中，创建南菁书院，甄选高材生肄业其中。王益吾师继任，校刻续经解（千）四百余卷，诸生分任校讎之役，余尝乞画师作《南菁校经图》）。问奇屡载玄亭酒，虚受堂高叹起予。”^⑤不知这《南菁校经图》尚在人世否？

校讎卷数最多的当然还是一些学署幕友，如王先慎、王宾、刘铎、刘钜、姚永概等。

①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光绪十四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据费念慈致缪荃孙四十八通：“夔一为再韩从弟，申季门人，长沙师颇赏之，调入南菁肄业。现在彼校《公羊陈疏》，闻已刻四十余卷矣。”《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2页。案：夔一，曹元忠，然《续经解》之《公羊陈疏》校对者名单中，不见曹元忠。再韩，曹元弼之仲兄曹福元，光绪癸卯进士。申季，管礼耕。

③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8—350页。

④ 许进、徐苏编：《陈庆年文集·年谱》，光绪十三年丁亥年，柳兴恩校勘并补注：《穀梁传》，南海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孙雄：《旧京诗存》卷四《再题约园图七绝四首》之一。

《续经解》列名的校对者中,有一些是苏州书局的,如雷浚、汪之昌,后来都任过苏州学古堂的学长(学古堂不设院长,学长即相当于院长)。汪之昌与南菁还有渊源,他常应课南菁书院获取奖金,也算是南菁院外课生,^①而其子汪开祉、其甥陶承璐,则都是南菁书院的正式课生。^②

又如张祥龄、汪家鳌、毕长庆等,估计也是苏州书局的。张祥龄(1863—1903),清末著名词人,四川汉州人,光绪乙酉举人,壬辰进士,甲午庶吉士,乙未散馆,改授陕西怀远令。他在乙酉至乙未的十年中,一直侨寓苏州,与著名词家郑文焯等共结词社,互相唱酬,^③所以他会有可能被邀入书局校讎《续经解》。

监刻之一是长沙王宾,可能就是长沙刻书局主持其事的所谓“亲友”。与他共事的还有湖南的刘铎、刘竣等。

不管长沙、上海的书局是隐形还是实有,《续经解》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南菁书局刊刻完成的。“藏事后,板存书院。”所有木板都存放在南菁书院了,共有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二板。^④

王先谦为保证刻书的质量,曾在江苏各地物色雕版业中的精工良匠。^⑤但中国历来重道轻器,为《续经解》做出重大贡献的众多刻工,均姓名无考。倒是曾经组织工人们参与印刷《续经解》的江阴宝文堂书坊,其后裔王德育留下了一点回忆文字:

我曾祖原籍常州奔牛,于清咸丰年间,在当地开设手工作坊,从事木板印刷。……数年后,他了解到江阴虽是江苏学政衙署所在,但从事印书业者较少,遂于清同治年间,举家迁入江阴城内,在学政署东侧大街上(现为人民东路),开设宝文堂书坊。……

我祖父王利宾,……当他继承“宝文堂”全部家业后,……中医书籍销路极畅,我祖父为此奔波各地,广购中医书籍木板,及时印刷销售。……如《临诊指南》一书,曾远销日本东京等地,而且颇受好评。

光绪十一年(1885),(王先谦)向清廷奏准在南菁书院设立书局,刻板印

① 章钰:《新阳汪先生墓表》,汪之昌:《青学斋集》。

② 汪开祉、陶承璐,《南菁学友录》均有名。汪之昌撰有《吴县学廩膳生员陶子猷传略》,《青学斋集》卷三十一。

③ 廖平:《张君曾恭人墓志铭》,《四益馆文集》卷一,《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版。

④ 上海漱兰学校:《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1942年铅印本。

⑤ 缪祐孙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五通:“益吾师到任后,来信托觅刻树,已为荐去。”《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87—289页。

刷。宝文堂书坊曾于光绪十四年(1888)承接南菁书局印刷业务,其中《皇清经解续编》一书,一千四百三十卷,即曾雇工百余名,精心印刷出版,费时达半年之久。^①

江阴宝文堂书坊为印刷该部丛书,竟然雇用印刷工人一百多名,花了半年的时间,可以想见当时江阴南菁书局刊刻印刷书籍的盛况。

又据王伊复、王伊同对其父亲借款给宝文堂的回忆,也可印证宝文堂后裔的记述确是真实可靠:“又南菁书院刻板的《皇清经解续编》,为研究我国经学必备书籍,畅销国内外。民初,例由江阴宝文堂王利宾印售。每年春节后,来我家借五百元购买纸张油墨,俟《经解续编》印就脱手,分期归还。”^②

可见,直到民国初年,宝文堂书坊还在印刷该部丛书,从未间断过。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年还印刷约二十部左右,每部约售五十元,大都销往上海。^③

那么,一部《皇清经解续编》初付印时的价格是多少呢?据时任南菁书院院长缪荃孙的记载:“(十一月)二日,送一梧师行。……叶槐生来。晚约槐生、晓林、杞怀、唱初小酌高家亭子。代笮仙购《续经解》一部,交杞怀带苏(洋卅六元)。”^④卖给钱振常的是三十六元。而又据时在广州广雅书局的屠寄为购书事,给缪荃孙的信中称:“《续经解》十部,照每部廿七元之价。”^⑤不过,屠在另一信中说:“闻孟棗言,《续经解》每部有书箱两只,今请只用大板箱装来。(一箱可装两三部。)其原装之两箱,可略折损价钱否?诸人盼书甚切,祈着抱芳妥速寄来是幸。”^⑥那么,每部只需二十七元,可能是因为一是所购数量多,二是包装简单。照此推算,光绪十四年初付印时的价格,每部大约是大洋三四十元。

《续经解》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二板,一直保存在江阴南菁书院。清末,书院改高等学堂。民国年间,又改为中学。然木板仍大致保存完好。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所有《续经解》板本全部毁于战火。

① 王德育:《宝文堂书坊的木板印刷》,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文史资料》第九辑,1988年8月,第126—128页。

② 王伊复、王伊同:《怀念先父王希玉》,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文史资料》第九辑,1988年8月,第49—50页。案:王氏兄弟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均肄业南菁中学,其父王希玉,民初为南菁校董。

③ 上海漱兰学校《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1942年。

④ 《艺风老人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二日,送王先谦离江阴。案:叶槐生,叶维幹;杞怀,费念慈,两人均是《续经解》的校勘者,与南菁书院大有关系。购书者笮仙,即钱振常也。

⑤ 屠寄致缪荃孙信,第二十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89页。

⑥ 屠寄致缪荃孙信,第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83页。案:孟棗,即吴翊寅,南菁课生,屠寄同乡。

(三) 大功告成

《皇清经解续编》的刊刻，自光绪十一年(1885)冬王先谦上任伊始即有动议，明年(1886)开工，至十四年(1888)夏季完工，前后历时三年不到。因该部丛书大多是在南菁书院所设书局刻成，所以又称为《南菁经解》，与阮元在广州学海堂所刻的《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合称《正续皇清经解》。

王先谦于全书告成后，为之写了一篇序言。录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序》如下：

国家稽古同天，崇迈往牒，世祖临御之初，御注《孝经》，颁示海内，所以宏阐经术，纲维人极。复命廷臣撰《易经通注》、《折中》、《古训》，仰禀睿裁，圣学精深，开生民所未有。列圣继体，炳焉同风。圣祖、世宗、高宗三朝钦定御纂诸经，揭日月而章云汉。于是海寓承学之士，憬然于圣教所先，群以研经为首务。而又殿本库书，布在寰宇，凡优游盛世者，咸得悉其智能，窥仰美富，家缙户述，流风益昌。本朝经学之隆，跨唐躐汉，非夫大圣人培植深而嘉惠厚，其奚及此？《易》之《贲》，贞离而悔艮，其彖辞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离》之彖辞则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夫人文者，化成之象也，然非重明丽正，无以致之，惟我皇清当之矣。

道光间，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荟萃国朝学人撰著刊于粤东，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邕昭代之儒风，导后进以绳矩，优优棣棣，观者美焉。今距粤东刊经之日逾六十年，中间寇难迭兴，烽警相望，而率土人士，内函贞固之气，外炳文明之姿，枕席可安，弦诵不辍，纂述之盛，视承平时抑无多让。幸值神武者定，寰海镜清，不于斯时裒集遗编，赓续刊布，惧弥久散佚，曷以称圣天子勤学右文至意。光绪十一年，臣奉恩命视学江南，抵任后，檄学官覃心蒐采，合臣旧藏，掇其精要，得书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奏请设局刊刻，经营三载，工乃告成。臣自愧学术疏庸，观听未广，岂足以继先臣阮元之万一，惟是汇而存之，以待后善学者择焉，冀于圣朝文治少有裨助，竭微臣区区之诚云尔。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夏六月。

苏州书局的汪之昌也为王先谦代拟了一篇序，^①但王先谦没有用。仍录汪序如下：

经学之盛，莫盛于汉时，盖去古未远，说经尤重师法，平时讲习，无非圣经

^① 汪之昌：《代拟〈皇清经解续编〉序》，《青学斋集》卷十二。

贤传，外此，亦皆先秦古书，其说之精者，质诸微言大义而无违，极之一名一物，亦必考证确凿，故得附经传而存录。我朝经学昌明，一变宋以来空言释经之习。士大夫之著撰成书者，或专治一经，或兼治诸经，有阐发注疏所未及者，有纠正注疏之违失者，亦有与古今人各执一说以俟折衷于后来者，裒然灿然，汉经师实事求是之旨，遥遥若合符节。阮文达公尝取顾亭林氏以下诸家解经书，汇刻为《皇清经解》，都一千四百卷，编次条例略见夏宗恕、严杰两序中。文达此举，不独为后学树经说之准的，抑亦备我朝之一大著作矣。

某束发受经，粗识涂径，诸凡说经之作，尤所留心访缉，先后得若干种；为文达所未及刻者又若干种。考文达之刻《经解》，在道光初，当时容有书尚未成，或成而未出者，且有读文达之书而兴起著书以抒其心得者。惟自粤逆构祸半天下，储藏家之古籍，与夫经儒家之著作，散亡灭没于兵火中者，所在多有，益见文达之广搜罗而付剞劂者，其意识为深且远。

怀欲为之续者有年矣。适奉命督学江苏，驻节处为江阴县，前督学使者瑞安黄侍郎尝于其地创南菁书院，招高材生肄业其中。即以前所得说经诸书，令诸生校而刊焉。时江苏省设官书局，咨商主局事者分刻之，以速其成。是书体例一依阮书旧式，凡为阮书所已刻者，不复刻，以避重出之嫌。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以阮书删节过多，重刻之，俾读者见其全。《白虎通论》汉人所著，刻陈氏立《疏证》者，犹之阮刻之《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也。夫古今人何必不相及，此《续经解》各书立说，固与阮书不尽同，而其发挥经义，恪守汉儒之家法，则与阮书罔弗同，亦已续阮书者广经学而已。书既成，爰书此以明微尚云尔。

汪序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特别提到南菁书院诸生校勘《续经解》事：“前督学使者瑞安黄侍郎尝于其地创南菁书院，招高材生肄业其中。即以前所得说《经》诸书，令诸生校而刊焉。”既是高材生，则校勘水平不低。二是虽说《续刻》体例有“凡阮刻已收者，续刻不收”的规定，但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阮刻虽已收而不全，故续刻重收。三是因刻陈立《白虎通疏证》（由汪自校），说明《续经解》所收各书立说，确与阮刻不尽相同。

王先谦于光绪十四年七月上奏朝廷刊书告成：

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臣王先谦跪奏，为经解刊有成书，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奏明在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经解情形，七月二十六日递回原折，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臣以此次搜访经解，得书较多，刻费浩繁，非臣棉力所能独任，比即函知督臣曾国鉴、抚臣崧骏，商请转谕僚属，酌量捐措。赖督抚同力相助，饬属鸠资，源源而来，极形踊跃，即他省官绅亦以臣此举为表章经术起见，多有不待函商，径自措寄前来者。臣飭局撙节动用，严密趲催。抚臣亦饬苏州书局助刊多种，首尾三载，幸获有成，为书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体例一仿前大学士臣阮元所刊《皇清经解》，名曰《皇清经解续编》。藏事后，板存书院刷印流传，俾艺林承学之士，宏观览而备研磨，庶几文教日益振兴，上副圣代作人至意。

至此次捐贖合计漕平足银一万九千三百三两二钱二分五厘，除苏局助刊书二百四十三卷外，计臣局刊书一千一百八十七卷，实用银一万六千三百三两二钱二分五厘，余存银三千两整，饬交江阴县知县发商生息，以裕书院经费。书局即行裁撤。此项悉出官绅捐助，并未丝毫动用公款，仰恳天恩准免造册报销。除将印本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刊刻经解成书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具奏。

八月十三日递回原折，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奏折中称，捐资合计漕平足银一万九千三百三两二钱二分五厘，实用银一万六千三百三两二钱二分五厘，还存余银三千两正，就交给江阴县知县发商生息，用来充裕南菁书院经费。这与他在自定年谱中所说的捐款数目相差太大，《葵园自定年谱》中说：“广丐同志，鸠集五万馀金，以二年馀获成巨编，非友朋协助之力，不克至此，诚厚幸也。”功成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五万馀金”与“漕平足银一万九千三百三两二钱二分五厘”，哪个更接近刊刻《续经解》的真实费用呢？估计是前者，后者是说给朝廷听的，表明自己对所集经费“撙节动用”，决无浪费伤廉之嫌。

据说，王先谦当初雄心勃勃，双管齐下，除刻《续经解》外，还有过刻印《史学汇函》的想法。^①然终未能付诸实行，恐怕是力不从心了。

四 刊刻《南菁书院丛书》和其他书籍

(一)《南菁书院丛书》

王先谦在上《〈续经解〉告成》奏折中说，《续经解》刊成，“书局即行裁撤”，恐怕

^① 缪祐孙致缪荃孙书，第五十五通，“益师将刻《续皇清经解》、《史学汇函》，此举甚善”。《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87—289页。

也未成事实。因为在王先谦离任前，“又刊《南菁书院丛书》成”。^①并为该丛书写序：

光绪戊子秋，予刊《皇清经解续编》成，时试事既毕，还暨阳候代，检旧藏及近得之书，裨益艺文者尚数十种，遂以余力促召梓人刊为丛书。国朝儒硕朋兴，纂著之盛，实能洞达闾奥，修起废坠，大之经笺史注，旷隆往代，即旁逮诸子杂家，靡不疏通证明，底于精善，虽其间学人所得大小醇驳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浅陋之风，庶乎涤荡尽矣。中兴而后，斯道益彰，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视乾嘉之际，执汉、宋学断断相辩论者固不侔矣。闻道而大笑，积久而后信，亦必然之理也。当此之时，苟有资于问学之书，亟取而公诸天下，传之久远，宏益儒者之见闻，仰赞圣朝之文治，岂非士大夫维持世教者之责与？

自来丛书之刻，多杂厕前代，或汎及词章。兹编专录国朝，非有俾考订者不入，书分八集，皆可喜可观。予未及搜采者，又属吾友院长缪筱珊编修赅续成之，板存南菁书院，因以名其书。四、五集则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观览兴起，尚益覃精术业，偕登于作者之林，是所深望也。

当时，《续经解》已刊成，但“检旧藏及近得之书，裨益艺文者尚数十种”。而此时尚有“余力”，刻资尚有多余，于是，就在他即将离任的短短时间内，继《南菁经解》后，又刻成另一部丛书，因为如同《续经解》一样，刻板都存放在南菁书院，所以取名为《南菁书院丛书》。丛书的取录标准是“专录国朝，非有俾考订者不入”，只收录清人的经史著作，而不收文学著作。

丛书分八集，共四十一种，一百四十四卷。其中四、五两集，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所撰述。第四集有于鬯《说文职墨》三卷，胡玉缙《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补遗》一卷、《续》一卷、《改错》一卷，徐孚吉《尔雅诂》二卷，范本礼《吴疆域图说》三卷，谢钟英《水经注洛涇二水补附武陵五溪考》一卷，程之骥《开方用表简术》一卷。第五集有陈玉树《毛诗异文笺》十卷，江衡《句股演代》二卷。

王先谦在刊刻这部很有学术分量的丛书时，竟然还把书院高材生的专著也收录其中，固然是由于南菁书院高材生的学术专著含金量不低，但编撰者也别有一番深意在：“多士观览兴起，尚益覃精术业，偕登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②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李慈铭认为《续经解》应删之书如戴望的《论语注》，刻成的

①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丛书·序文》亦收于《虚受堂文集》卷五。

② 王先谦：《南菁书院丛书·序》，以下引文出处同。

《续经解》确未收，但《南菁书院丛书》却收了，这是因为“中兴以后”，“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视乾嘉之际，执汉、宋学断断相辩论者固不侔矣”。于此可见，王先谦的学术观点，已与乾嘉汉学正统稍有不同。

当编刻《南菁书院丛书》时，因王先谦卸任在即，所以，实际上此事是由时任南菁书院院长的缪荃孙来完成的。《丛书》的第一集所收徐松《登科记考》，就是用缪荃孙所藏的稿本刻印的。缪所著《徐星伯先生事辑》，后附徐松著作目录，缪说：“《唐登科记考》三十卷，此书稿本，为荃孙所得。王一梧师刻入《南菁丛书》。《通志·列传》云一卷，误。”^①《登科记考》不是经学著作，却是研究唐、五代史学、文学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是所谓“有裨益艺文者”，虽碍于体例，无法收入《续经解》，但被王、缪收入《南菁书院丛书》，实在有功于学术界。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的《登科记考》点校本，应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就是以《南菁书院丛书》木刻本为底本的，因为它是清代唯一的刻本。于此可见该部《丛书》的价值。

王离任前后，屡屡与缪商谈《南菁书院丛书》事。有时面谈，还无法说清楚刻书琐事，就开列清单，书信往来。王致缪信：“顷诣谭为快。送上《丛书》底稿本廿三册。（中惟《蔡氏月令》刻成后，祈将元稿本并《茗柯集》赐还为荷。）惟《毛诗异文笺》卷三有刻样，余皆写校发刻未齐，其未经写齐之书，另单呈核。（此单均与刻匠对过不误。《毛诗异文笺》十卷全发刻。）四集以上写刻价，均已给清。五集以下，惟《春秋世族谱拾遗》付过刻价，余俱未付刻价。其付过写价者，（并钱店折一件。）另单交院董矣。”^②这是写于离任前。又有一信：“《丛书》总目呈上，七集以前俱发写刻。（每册注明其应存校勘之各书，底本容续奉上。）八集惟《二间记》发写二卷，余六册及《安甫遗书》附呈。统乞费心，感幸之至。（存银结账后交院董。）”^③这是写于离任后不久，此时王已在长沙寓所。

《丛书》第二集收了管礼畊《操敦斋遗书》四卷。而据管之执友费念慈致缪荃孙信，此《遗书》全由费一手编成。费念慈说：“申季遗文已录竟，平时所欲为者皆未就，仅存此院课，除经文外，约得五百三十余篇，弟拟从严特择，十存其二三，庶成一家之言，以对亡友。……同辈中与弟最契者不过数人，而此君最可痛，既厄其遇，复

①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一《徐星伯先生事辑》。

②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三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4页。

③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三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4页。

促其年，穷经一生，而遗稿丛残，仅留此应试之作，可云酷矣。”^①在另一信中则明确提出遗文可编四卷：“其遗著仅钞得院课，却有五百余篇，约可十存其二。其余碎金，摘为条记，或可共得四卷也。”还说：“郑堪有书与鞠常，欲梓以行，甚可感。”^②虽然管礼耕治学严谨，不肯草率从事，生前未曾编成专著，以致遗稿散失，但就这些仅存院课，学术水平也不低，否则，潘祖荫也不会“欲梓以行”。后来，费又致信缪：“申季遗文，长沙师允收入《经解附传》一节，果否能行？”^③那么，王先谦原先给《南菁书院丛书》起的名字是《经解附传》，本来就是对《续经解》的拾遗补阙，大概后来因所补收的并非全是经籍或经注，故改今名。

王先谦可能觉得心愿未了，还有很多种书已来不及刊刻，就与后任学政杨颐和书院院长缪荃孙商定，王离任后，仍进行《南菁书院丛书》的续刻，所以，返乡后不久，还写信向缪询问：“澄江握别，倏忽六阅月矣。……《南菁丛书》已否续刊？”^④但估计杨颐无意续刻，而未能如愿。

（二）其他书籍

王先谦在南菁书局还刻有《清嘉集》初、二、三编，是王先谦在学政任上岁、科两试中将考生优秀作品编纂而成的集子。赵椿年晚年回忆：“黄、王两师，皆有试牍之刻，黄名《江左校士录》；王名《清嘉集》，取陆士衡《吴趋行》‘土风清嘉’之旨也，共三编。余有‘子曰诵诗三百一章’制艺一首，‘汉伏日诏赐从官肉’、‘袖中吴郡新诗本’律诗二首，刻于集中，皆丙戌、丁亥岁科试之作。”^⑤

王先谦又刊《江左制艺辑存》，收录嘉庆以来江苏士人的制艺名作。先由常熟张瑛编选，最终由王先谦辑定。王为作序，称：“既有《清嘉》三编之选矣，思稍进之，复辑是编。常熟张君瑛邃于文，因委重焉，余复加增损，自嘉庆以来迄于今，都若干人，弗及知者阙焉；文若干首，皆醇雅有根柢可观览。”^⑥

王还刊刻周寿昌《思益堂集》。周寿昌是王先谦的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据王称，是与瞿鸿禨共同捐资刻成的。^⑦是年瞿正在浙江学政任上。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5页。案：申季，管礼耕。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六十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54页。案：郑堪，潘祖荫；鞠常，叶昌炽。

③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五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7页。

④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三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5页。

⑤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⑥ 王先谦：《江左制艺辑存·序》，《虚受堂文集》卷五。

⑦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光绪十四年，“是岁，刻周自菴先生诗论文词日札共十九卷，总为《思益堂集》成”。“亟与瞿子玖学士谋共捐资刻之。”

第三节 关于《皇清经解续编》

一 《续经解》概况

王先谦称，他刻《续经解》，“体例一仿前大学士臣阮元所刊《皇清经解》”，就是说，《续经解》也只收清人的经学著作，刊刻次序亦以著作者的年代先后而不以著作内容为准，如整部《续经解》，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九经误字》开始，至清末的林颐山《经述》为止。（《续经解》在南菁书院刊刻之时，林颐山正在王先谦学幕中，并助其师黄以周在南菁教习古学。）又如，《续经解》收录惠栋的著作有四种：《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左传补注》、《九经古义》，全归录于惠氏名下，而不以《易》、《书》、《春秋》等经书的内容分散归类。

《续经解》所收的二百零九种、一千四百三十卷的清人经学著作，与《学海堂经解》一样，如按著作的性质内容来分，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①

（一）经义著作

这是该丛书的主题部分。

《周易》类收二十余种，多数是当时阮元未见而失收，或因学术见解上的原因而摒弃不取的著作，如王夫之《周易稗疏》、胡渭《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张惠言《易图条辨》、宋翔凤《周易考异》等。还有很多是嘉道以还的著作，如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刘毓崧《周易旧疏考正》、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俞樾《周易互体征》、成蓉镜《周易释爻例》等。

《诗经》类也收二十余种。直至今日仍以《南菁经解》为底本而不断再版排印的，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诗传疏》等。还有陈寿祺、乔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这样有今文学观点的传世之作，而胡承珙的《毛诗后笺》也一直为学术界所称道。

《三礼》类收三十余种，胡培翬《仪礼正义》、张惠言《仪礼图》等均是传世之作，而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等、庄存与《周官记》等、褚寅亮《仪礼管见》等也都是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① 这里参考沿用了虞万里先生《正续清经解编纂考》的分类。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10页。

《春秋》及《三传》类收有三十余种。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陈立《公羊义疏》、柳兴恩《穀梁大义述》、钟文烝《穀梁补注》等在学术界极负盛名。还有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等也早已声名卓著。

《尚书》类收十余种,有开清代疑古风气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还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枬《今文尚书经说考》等今文学派名作。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亦是不刊之作。

《论语》、《孟子》、《孝经》以及四书总义类著作十多种。刘宝楠、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最为名著。

(二) 语言学著作

这类著作,以前的学者称之为“小学”,如《尔雅》、《说文解字》等。这类著作研究的内容,实质包括了今天所说的训诂、音韵、校勘等学。清儒认为,声韵明而后训诂明,训诂明而后经义明,所以,“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①

《续经解》收有十数种小学著作。孔广森《诗声类》、钱坫《尔雅古义》、严可均《说文声类》、江沅《说文解字音韵表》、宋翔凤《小尔雅训纂》等都负有盛名。

清代学者还专门研究经传异文(文:文字)。由于古代经师,家学承受,口耳相传,记录经文时,有篆隶等字体的变化,以后,抄本、刻本又各自相异,再加上方言的不同,所以,同一经传,出现异文之处比比皆是。清人为之疏通证明,进行系统研究。《续经解》收有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徐养原《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李富孙《易经》、《诗经》、《春秋三传》异文释五种,陈乔枬《诗经四家异文考》等,这些都可视为语言学著作。

(三) 有关典章制度、名物考释方面的著作

梁启超说:“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明堂大道录》阮刻未收,《续经解》则收有此书。《续经解》还收有江永《仪礼释宫增注》、任大椿《深衣释例》、钱坫《车制考》、王宗谏《考工记考辨》、焦循《群经宫室图》等十余种。黄以周的《礼说略》也属于此类著作。这些都是清代学者对某一方面作“窄而深”的研究,题目虽小,但成绩却很大。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既然研究《三礼》就可以接触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那么,攻读《诗经》,也可多识草木虫鱼,避免“腾口虚说,而实不识一物”之弊。《续经解》收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毛奇龄《续诗传鸟名》、俞樾《诗名物证古》等数种。

(四) 天文历法及地理著作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必须要有准确的农事季节的概念,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观察天象、制定历法,所积累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梁启超说:“我国(古代)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学,至清而尤盛。”清代学者用较前人更为科学的方法,并吸取了西方的先进成果,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这也反映在《续经解》所收集的这方面的专著中,其中有陈厚耀《春秋长历》、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包慎言《春秋公羊传历谱》等数种。

清代的地理学研究也十分兴盛,《续经解》收有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钱坫《尔雅释地四篇注》、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朱右曾《诗地理正》、成蓉镜《禹贡班义述》等多种著作。

(五) 文集笔记

《续经解》收有文集多种,实际上都是学术笔记。清代学者做学问时,喜欢准备一个笔记本,“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最为学者所称道,就因为它虽是笔记,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缘故。《续经解》收有宋翔凤《过庭录》,徐养原《顽石庐经说》,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陈澧《东塾读书记》,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多种学术著作,要想知道清代学人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可从这些文集、笔记中窥知一二。

二 《续经解》与前《经解》比较

前面所述,是《续经解》所收清人经学著作的概况,与阮元所刻体例大致相同。但是《续经解》毕竟在某些方面与《经解》有不同。

(一) 编纂体例

尽管王先谦一再声称《续经解》“体例一仿《皇清经解》”,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清代不少著名学者的文集中,只有与经学有关的,才会被阮元收入《学海堂经解》。譬如,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五十卷,《经解》只收了其中的六卷,约三十篇,部分篇

章还略有删节。这固然受《经解》体例的限制所致，无可非议，但总不免给人以割裂散漫的感觉。而《续经解》所收大都全是专著，很少有收单篇残章的现象，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七卷，《续经解》一卷不漏，全收，尽管该书所举疑例，不全从经书中来，很多摘自史书和子书。也正因为如此，《续经解》不可避免地遭来某些学人所称“体例不纯”的讥讽，甚至有人批评王先谦“经解滥收”。^①

又如，阎若璩、胡渭在清代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而“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②但是阮刻《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据说阮元认为两书虽极出色，但体例不纯，“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如《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中，就掺杂了日记、信札之类。但从学术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考虑，阮元将它们摒弃于《经解》之外，确实有些可惜。《续经解》则收录两书，但随之而来诸如“不纯”、“滥收”的批评，也不可避免。

阮元被称为汉学护法，所以在编纂《经解》时，严守汉宋壁垒。王先谦是通人，编《续经解》时，虽仍持汉学正统，但凡汉宋兼采而卓成一家者，也予收入，如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如陈立《公羊正义》。与南菁书院关系非同寻常的费念慈，虽是常州人，但一直随父寓居苏州，受吴学影响很深，笃守汉学家法，他与缪荃孙信中说：“陈卓人《公羊正义》原稿及清本均存书院，弟昨在江阴时见之，中缺数条，师倩元同孝廉补撰。此书实是长编，多采宋说。弟意欲将宋人说尽删，以守何氏家法，然元同孝廉必不谓然也。”^③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固然“必不谓然也”，而王先谦也并没有采纳费的意见。

王先谦在今古文的取舍上，也毫不偏执。《续经解》与阮刻不同，收有不少今文学家名作，如陈乔枏《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陈立《白虎通疏证》，邵懿辰《礼经通论》（李慈铭斥之为“实汉学之大蠹”），魏源《书古微》、《诗古微》等。这些今文著作，成书于嘉道年间，但即便出于乾嘉年间，也不见得就一定会被阮元收入《经解》。

然而正由于阮《经解》不收今文著作，所以，晚清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说“嘉道以后，治今文说者，《（国朝汉学）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俱见于

①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图书馆 2003 年影印版，第 178 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费念慈与缪荃孙书，第五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 348—360 页。案：沃丘仲子在《近现代名人小传》中称费乃吴籍，微误。

《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①

（二）编纂过程

《续经解》的编纂过程也大有异于前《经解》。《学海堂经解》由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八月在广州两广总督任上，发凡起例，编纂刊刻。但一年不到，阮就于六年六月奉调云贵总督，刊刻之事只能委托他人继续完成。虽说能于千里之外遥控督促，终不及亲历其事而可靠无误。所以，《经解》刊成后，讹误脱略，在所难免，后来学者也指出不少这方面的问题。

而《续经解》的刊刻，则始终由王先谦一手经营，避免了政出多门，前后矛盾的毛病。另外，江南不比广东，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藏书之富，赏鉴之精，甲于天下，王先谦搜访所刊经籍于世家故族，如鱼得水。这一点，阮元学问再广博，也无法望其项背。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王先谦有一个学术水平相当高的校勘班底，那就是肄业于南菁书院的课生。这些当时仅在《续经解》每卷末附上一个校勘者姓名的年轻学子，日后大都成为学术界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如唐文治，陈庆年、丁国钧、范本礼等。

三 版本价值与留下的遗憾

（一）底本不凡

《南菁经解》所刻的底本，有不少珍贵的稿本、抄本。陈立的《公羊正义》，卷帙浩繁，共七十六卷，是《续经解》所收著作中卷数最多的。此稿本一直由其子陈汝恭收藏，当陈汝恭肄业南菁书院时，就带至书院，且由黄体芳经手，后经黄以周补遗，南菁众弟子校勘，由王先谦将它刻入《续经解》。又如柳兴恩《穀梁大义述》也是未经整理的稿本，经南菁书院弟子陈庆年校理补直，王先谦最终编定，刊入《续经解》。黄以周的《礼说略》、《经说略》和林颐山《经述》也都是稿本，当时他们都在南菁书院授讲。还有宝应成蓉镜的一些著作也都是未曾刊行的稿本。由于《续经解》不单是汇刊众刻本，还搜访了不少的稿本、抄本甚至秘藏本刊行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稿本、抄本获存于世的愈见寥寥，弥足珍贵，则《续经解》本身的版本价值也愈见增高。《续经解》在保存古文献方面对学术界做出了贡献。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2页。

《续经解》于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刊成后,次年便出现了上海蜚印馆石印本。石印本字小,但较刻本轻便价廉,也很受欢迎。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为研究用,曾致信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国会图书馆若有石印本的《皇清经解》,如能借一部供随时翻检,那就是最感激的了。(《续经解》似无石印本?)”^①胡适要石印本,因为它比木刻本便宜很多,可“供随时翻检”之用,且间有校正南菁刻本讹误之处。不过,胡适当时“《续经解》似无石印本”的怀疑,似乎不确。

(二) 少许遗憾

《续经解》基本上将阮刻以后的经解名作搜罗殆尽,但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一些遗憾。目录学家杨家骆说:“至两《经解》未收诸注无虑十余家,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义精语洁,最为善本。不惟恪守汉法……,独怪阮元与聘珍并世相知,又尝撰序推许备至,而《经解》竟未录其书,盖以严杰辈草率将事,未能一较其得失也。”^②阮元对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当时就“推许备至”,但刻《经解》竟未收,可能是其弟子严杰等人识见不高,草率从事。但不知王先谦为何也没有将之收入《续经解》,况且李慈铭还向他推荐过此书。^③也许,是该书在王之前已有单行本问世的缘故。

王先谦刊刻《续经解》时间稍有仓促,应收而未收的情况在所难免。他对未收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很感懊悔,他说:“余督学江苏,续刊《皇清经解》,左君绍佐邮寄是书,以未遑考订置之。而其时王编修懿荣疏请以国朝人所著诸经义疏颁行学官,李君袞然居首,天下咸知有《纂疏》一书。逮余携以南归,思贤书局取而重刊之。”“后之究心汉《易》者,吾知其必以是编为先路之导,则有功经学非小小矣。”^④所谓思贤书局,他在长沙曾与缪荃孙书中提及:“昨与郭筠仙前辈创议开一小书局,每岁可刻千金书籍。”^⑤又说:“兄竭力张罗,已得四五千金。现即用李道平《周易纂疏》开手。”^⑥

王先谦在长沙思贤书局还想刻朱右曾《左传服贾注疏》及松江府学廩生张声驰家所藏某君所著《古微书疏证》,并恳请现任江苏学政杨颐帮忙,他写信给当时正主

① 《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7页。

② 阮廷卓:《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杨家骆序,台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版。

③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文集》卷五《复王益吾祭酒书》,第862—866页。

④ 王先谦:《周易集解纂疏·序》,《虚受堂文集》卷五。

⑤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1页。

⑥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0页。案:李道平,误作李道王,径改。李道平,字遵王。

讲南菁书院的缪荃孙：“兄已致函蓉浦同年，恳为行文嘉定、松江两处，务得稿本赐寄，兄为筹资付刊，乞弟代恳蓉翁，从速办理，至为感荷。（朱先生书尤要，兄已见首本，时书局已竣，实为可惜。其后人闻在四川，系官、幕之间，如不放心，专人至湖南，兄给川资。）”^①当王见到朱右曾该书的第一册稿本时，南菁书局刚裁撤，不及刻入《续经解》，“实为可惜”，时时系念。一年后，王已退休在家，仍念念不忘此书，恳请现任江苏学政杨颐“行文嘉定、松江两处，务得稿本赐寄”。并请缪荃孙在旁催促。王甚至打听到朱的后人可能在四川，为打消藏书者顾虑，王愿意自出路费让朱的后人专程来湖南一行。

王先谦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还求借刘文淇、雷氏、承培元等人的著作，以备刊刻。王在信中说：“因忆弟有《刘孟瞻集》，刘家既不发售，外间罕见，其中必有经说，倘可提出另刻，乞弟赐借。又通州雷洪，记莼客说好，不审可觅借否。”^②王又在另一信中说：“鄙意先得承氏《说文》尤要，此书引经证例，不审何以至廿四卷之多，便中敬祈赐寄，急欲一观。”^③王先谦研究学术、传播文化的执着精神令人钦佩万分。

王先谦的乡土情谊深重。湘人李肖聃称赞王：“先生念经术之不明，望乡人之奋厉”，“故于续刊经解之时，留意表章湖湘之学，于魏、邹数公而外，兼录湘潭二胡之书。人竟及于生存，例不拘于故事。特相诱掖，深具孤怀。”^④湘潭二胡之书，指胡元仪辑《毛诗谱》和胡元玉《驳春秋名字解诂》各一卷。《续经解》收其书时，二人俱生存。李之“特相诱掖，深具孤怀”的赞语，似对二胡的学术水准不甚肯定。叶德辉则说得直截了当：“湘中人儒林、文苑者，先辈本无多人。（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非夸诞也。）当时葵园老人刻《皇清经解续编》，采王船山、曾文正之书，辉即以为不可。乡党之见不化，不足以示大公。”^⑤不过，收录当时尚生存之人的著作，并非只有二胡，黄以周、林颐山不也是吗？关键还在于学术成就与声望，湘潭二胡实难与黄、林抗肩并论。

①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案：朱右曾是江苏嘉定人。此信落款“十月廿八日”，未署年份。据函内容，应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

②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三通。案：雷洪，疑是雷鏞之误。据李慈铭于光绪十三年《复王益吾祭酒书》中说：“雷（鏞）《古经服纬》。（顺天通州人，乾隆中举人，官教谕。慈有其书，颇谨严有条理。）”抑或王先谦本是指的雷学淇而漏写“学”字？

③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四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1页。案：承氏指江阴承培元，李兆洛暨阳书院及门弟子，著有《说文引经证例》。

④ 李肖聃：《湘学略 葵园学略》，岳麓书社1885年版。

⑤ 叶德辉致缪荃孙书，第三十八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558页。

另外,尽管校对者学养都不浅,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可能是因时间紧迫而导致校对者不能从容从事所致。张锡恭某次致信曹元弼,抱怨道:“郑子尹《礼经私笺》,南菁书院刻本甚不佳,如‘从母昆弟’条脱去下半,‘夫之姑姊妹之长殇’条脱去上半,承接处文谊不通亦不顾,不识兄处有此书原刻本否?”^①

(三) 黄以周的弦外之音

时任南菁书院经学讲席的黄以周,《续经解》收其《礼说略》三卷和《经说略》二卷,还收其父黄式三《春秋释》一卷。作为浙东经学大师的黄氏父子,尤其是已故的黄式三,居然仅收其《春秋释》一卷,也许还是看在黄以周的面子上。黄以周很为其父抱不平,他后来在答其南菁弟子阳湖吴翊寅的信中说:“先君子作《易释》四卷,由博返约,力削百家之野语,而执圣之权。然非生平深研周、孔之义蕴,参考诸家之是非,不能知《易释》之精密。譬如浑金璞玉,能知而宝之者,鲜矣。《经解续编》不收是书,何足怪哉!承询《易》义,敢私布之。”^②愤慨之情,显而易见。

其实,前任学政黄体芳奉饬采访《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资料,曾数次汇送书册给国史馆,光绪十五年(1885)十月,即在江阴学署的最后一个月,第三次汇送书册清单中,就开列黄式三经史著作五种:“《易释》四卷,《春秋释》四卷,《论语后案》二十卷,《周季编略》九卷,《傲居集内编》十四卷,共二十一本。”^③然而,一年后,王先谦刻《续经解》,竟只收了黄式三《春秋释》一种,且还没有收全,《春秋释》本有四卷,仅收一卷。至于被黄以周认为是“浑金璞玉”的“精密”之作《易释》,王先谦丝毫未加考虑,竟然弃之如敝屣,那么,到底是王先谦大意失收,还是传统汉学之“家法”与浙东学术有异而有以致之?

第四节 王先谦与南菁沙田

一 王先谦《南菁沙田记》

南菁书院的常经费,建院开始,就以两江总督左宗棠捐拨公款两万两发商生

① 此由北大吴飞先生告知,特志感谢。

② 黄以周:《答吴孟飞书》,《傲季杂著·文钞》卷三,光绪二十一年南菁书院刊本。案:吴翊寅,字孟槩,阳湖人,曾肄业南菁书院,著有《易汉学考》。

③ 俞天舒编:《黄体芳集》卷三《简牍》,“咨国史馆(第三次汇送书册)”,第132页。

息为主要来源。

王先谦接任江苏学政后，为南菁书院的学术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已见上述。谁也没有想到，醉心于学术的他，竟还为南菁书院置办了一份产业，那就是南菁沙田。王先谦将此事的前因后果都写在了《南菁沙田记》中：

南菁沙田者，松江川沙厅境，东海中横沙也。道光间始见，可万亩。厥土斥鹵，草芦生之，可伐为薪，渔于海者私焉，而纳贖厅之官吏，所谓草息者也。同治间，征息入江苏布政使库，岁八百千。光绪七年，江南大吏有清丈新涨沙滩招佃报买之奏，于是，候选道姚君文楠、清河道费君学曾等，仞佃横沙四万余亩，贾银至万二千，岁征息至二千千。众竞于利，争讼积年，奸蠹丛生。姚君、费君愿入公为书院膏火费，余又偿他姓佃贾银六千两有奇，沙遂为书院有。最难以芦草泥计者共五万亩，盖已视昔加赢，此南菁书院有沙地之始。草芦得咸潮益茂，故高阜转稀，择地辟之，可得二万亩。薪樵无损，而菽麦加丰。以属姚君等董其事，经始光绪丁亥，亩四之一，堤防沟洫，聿有成绩，徐次第尽垦之，此沙地有田之始。今岁入告部议升科，嗣是沙田为书院恒产，利赖及久远矣。

记曰：天不爱道，地不爱宝，造物之资于人者，日取焉而不穷，在善理之而已。吴地襟带江海，弥望衍沃，得涨沙，则土人拥圩而耕，久之，户口滋多，小为乡聚，大则都邑，今靖江、崇明是已。兹沙也辟，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苟主之者尽招徕区划之方，绝龙断苛扰之弊，数十百年后，宜或有建官分治事。而其地直吴淞口外百里所，为海上天然屏蔽，异日筑城郭，设汛防，言形势者将有取焉，又不独书院区区之利也已。沙无名，名以南菁，自余始。

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提督江苏全省学政王先谦撰

就职直隶州州判拔贡生沙从心书丹并篆额

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夏六月^①

原来，在长江入东海处，有一个横在江中的小岛，当时属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管辖，原是由长江中的泥沙淤积而成，故称为“横沙岛”。道光年间，这岛才露出江面，大小约有万亩左右，以后又逐年增大。然而，都是一片盐碱地，长满了荒草芦苇。由于岛上的芦苇砍伐后可作柴薪，于是那些在海上打鱼的人，私自上岛伐薪，

^① 《南菁沙田碑》今存南菁中学内。

甚至围垦造田,但要稍微纳点税(“草息”)给川沙厅的官吏。同治年间,正式征息入江苏布政使库,每年可得八百千文。光绪七年,江南大吏上奏朝廷,要求清算丈量新涨的沙田,招佃报买。但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在光绪八年(1882)十月上奏朝廷有关“江苏淤生沙洲”的奏折中,提到“横沙岛”:

……川沙厅横沙地,方孤悬海外,前经议定该处为商船避风守潮之区,亦为师船焯洗放哨之地,永远不准承买,即由渔户佃种,现在仍归招佃,以符原案。惟令每亩上缴佃价,并按年完纳草息,俾免覬覦而绝争端。……^①

由于横沙岛在左宗棠的眼中还有其军事上的意义,且“前经议定”,所以“永远不准承买”,只能“招佃”。^②而在有此“议定”之前一年(同治十一年),富绅姚文枬、费学曾及郁姓等多人已化银一万两千两,承佃报买横沙岛田四万余亩,每年上缴草息二千千文。由于承佃者将沙田分散转租给佃农,收取的地租应远超过此数,所以“众竞于利,争讼积年,奸蠹丛生”。而承佃的沙田现又明文重申规定“永远不准承买”,为避免积年不决而又无谓的争讼,于是,姚文枬、费学曾两人毅然将承佃的芦草滩地二万零二十五亩,悉数捐给了南菁书院。然后王先谦又筹措了六千八十八两银子,购入了郁姓承佃的二万零二十五亩,连同接涨的白涂水滩九千四百四亩九分,总共滩地为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亩五分五厘。^③此为南菁书院有沙地之始。

横沙岛五万亩沙地归属南菁书院后,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低处的茂草芦苇,得江海之咸潮的滋养,更加茂盛。而地势稍高的沙地上的草芦逐渐稀少,选择适宜的沙地进行开辟,得到的可耕田约有两万亩,可用来种麦种豆。这样一来,低处草芦薪樵无损,高处沙田菽麦加丰,由地变田,“此沙地有田之始”。

后来,又“入告部(按:户部)议升科”,经朝廷记录在案。^④自此,横沙岛沙田就成了书院永恒的产业。因为沙田还没有名字,王先谦就给它取名“南菁沙田”。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29页。

② 案:所谓“前经议定”,是指同治十二年(1873)两江总督李宗羲议定之事。“咸丰八年(1855)方出露水面。随后不同单位和阶层的人都覬覦之,先后引起川沙厅和营汛间、不同报领人间的各种矛盾。同治十二年(1873),江南总督李宗羲批准‘横沙永远作为公产,不准军民人等承买’。”转引自王大学:《清末民初江南地方慈善组织的经营实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1895—1927)》,《近代史学刊》2005年第2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③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续志》所述与王《记》吻合,且数目更详细。

④ 王先谦在《南菁沙田记》中称“今岁入告部议升科”,时在光绪十四年(1888)。实际上当年虽经“议定”,而“部议未准”,后在杨颐任上,南菁沙田升科事似才完满解决。详见后章。

二 费姚捐田

(一) 捐田过程

关于费学曾和姚文枬捐田善举，费学曾之子费念慈早于光绪十三年(1887)就告诉了缪荃孙：“……长沙师八月初出棚，考镇江，重九后可来吴下。弟处上海沙田八千余亩，家严已约姚访梅(姚有万余亩)，悉数均捐入南菁书院，以充经费。郑澧筠、陈荫南在沪开办，书院中事则心云主之也。……六月廿九日。……”^①

一年后，因此事与缪荃孙能否来南菁主持古学讲席有关，所以王先谦曾写信向缪详细说明捐田过程。王在光绪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致信缪：“……昨费幼亭观察来澄，并与熟商之。观察前与姚访梅及陈、郑二君，包办沙田地，公立合同，每年交书院余利三千串，去岁办理伊始，只得二千串有奇。元拟将观察代借缴价之三千金，暂扣不还，每年初息。即以去岁所得之二千串，划存千二百串，为下半年延师加课之用，余以划付息金。今年所得之三千串，以二千四百串为明年正用，六百串为息金，尚有敷余，每年如此办理。俟沙田开垦，书版行销，得有利银，陆续归本。惟须观察诸君公禀中，注明自戊子年为始，每年交足三千串。兄亦应允将今年亏项，归入报销，三千金借款妥为立案。观察谓今年必可包三千串，惟公禀中注明一节，尚迟回未定，将赴浙与姚君妥商，约以四五月之交，再来办理。兄但得其一禀，即可定局，彼时再有函奉达也。(观察谓兄不妨先将延师增课事定局，兄以交卸在即，必须妥办，庶后任不至以竭蹶改章，兄亦不至以冒昧貽笑。)……三月廿二日。”^②

两个月后，时在王先谦幕中的陶潜宣写信告诉缪：“……益师相须甚殷，月初后来澄江，始惊悉年伯母大人仙逝之耗，……南菁书院近因添置沙田，拟添请院长。益师前已泐函奉告，唯因员绅办理伊始，岁入章程尚未定案，故尚未敢遽以劝驾。现费幼翁与姚访翁于月之十八日来澄，一切课息应缴之款，均已上禀批定，立案事皆妥当。前读致益师手书，知吾兄拟六月图南，闻之喜抃无量，用特专函奉告。此间诸事妥帖，务祈大驾早来。七月即可开课，以慰故乡后进之心，祷切盼切。回忆川沙沙田一事，去岁姚、费二君再三来说，益师以事多窒碍，且亦离奇，决口复之。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五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4—346页。案：原文标点为“郑澧筠、陈荫南在沪开办书院，中事则心云主之也”。大谬。郑、陈在沪未曾开办书院，只是为经营沙田之事，而在沪开办南菁书院沙田之局；而陶潜宣(心云)则在江阴南菁书院主沙田诸事也，见下陶与缪第五通书信。又，据信中所述王先谦按试行踪，此信当写于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②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6—27页。案：此信落款未有年份，据信所述内容，当写于光绪戊子年(1888)。

经弟竭力苦口，再三赞成，且一切公牍文字，皆自任归弟承办，始于去年五月定义开办。尔时弟即与益师商计，此举如成，异时必可添请院长一席，不谓期年有成，而适吾兄来主此席，此中欣慰如何可言。专肃奉布，不罄千一。……年小弟陶濬宣顿首。五月廿四日。”^①

据上面三信所述可知，费学曾、姚文枬动议捐沙田给南菁书院，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就已向王先谦提起此事。开始，王先谦觉得“事多窒碍，且亦离奇”，一口回绝。况且，此时王刻《续经解》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不想再多惹事。费、姚两人再三到江阴与王先谦商量，陶濬宣在旁“竭力苦口，再三赞成”，并答允有关沙田的“一切公牍文字皆自任”，不劳他人，王先谦才点头同意，于该年五月定义开办。由费学曾、姚文枬和陈美棠(荫南)、郑惇五(澧筠)“包办沙田地。公立合同，每年交书院余利三千串。”费学曾前已缴所谓的“草息”三千串入江苏布政使库，现在沙田地既已捐给了南菁书院，理应转由南菁来缴，则费已缴的应退还给他。但王先谦在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给缪的信中说，打算“暂扣不还”，而将合同中每年所交书院余利三千串的大部分作为“延师加课”的正用，余下的则为付给费学曾的利息。等将来“沙田开垦，书版行销”，再陆续归还本金。不过，费姚等人必须在公禀中注明“自戊子年为始，每年交足三千串”，因在去年丁亥(1887)沙田开办的第一年，只交了两千串多一点。费即赴浙江与姚文枬商量。后两人于五月十八日到江阴，“一切课息应缴之款，均已上禀批定，立案事皆妥当”。然而，“入告部议升科”，也很费一番周折，经过尚在京师的缪荃孙等人与户部的疏通，大约在七月份终于议定，费念慈七月廿五日致缪荃孙信：“顷来白下，谒长沙师，出示尊函，知升课事已议定。……顺德典试，江南之福……廿五日。”^②王先谦在离任前终于大致办妥了南菁沙田事。

(二) 费学曾和姚文枬

费学曾(1829—1898)，字绳盒，别字幼亭，武进人。曾官直隶怀来、宛平知县，擢天津府知府，调保定府，晋清河道。后辞官，居苏州，养亲课子三十年，终不出。“其啧啧人口者，尤以通州议和为最著。而公所最自愉快，则以横沙田八千顷举以畀之南菁精舍，为生平第一乐事。”^③“通州议和”事，详见俞樾《费幼亭观

^① 陶濬宣致缪荃孙书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74—675页。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五十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47页。案：因信中有云“顺德典试，江南之福”云云，而王先谦时在江宁，则正是科考江宁府和全省录遗之时也。故费写此信，可断为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③ 缪荃孙：《二品顶戴直隶清河道费公墓志铭》，《艺风堂文集》卷一。

察七十寿序》，此不赘。而赠沙田于南菁事，俞樾亦于《寿序》中郑重提出：“滨江之地，沙涨成田，积数万顷，皆君产也。其时，王益吾祭酒视学江苏，于江阴建设南菁书院，以经史实学劝课多士。君曰：此诚国家乐育人材之一助也。尽以沙田助之。”^①费学曾是盛隆的女婿，与盛康是郎舅，是盛宣怀的姑父。其子费念慈与盛宣怀是表兄弟。因费念慈常到南菁书院访学，与王先谦和南菁不少学人关系密切，王先谦刻《续经解》，费念慈曾参与校勘。其父捐出沙田，费念慈应是此善举的竭力促成者。

姚文枬(1826—?)，字访梅，浙江嘉兴人。姚家世代巨富，但乐善好施。其父姚丙僖，道光己酉举人，曾散巨资赈灾乡里，姚文枬回忆往事：“道光己酉，岁大祲，吾父散万金乡里。”^②后姚文枬以候选道官长芦盐运分司，常驻天津。盐运差事令人艳羨，所积资财自然宏贍。姚与费因盛宣怀的关系，亦是姻亲，^③姚之捐万余亩沙地于南菁书院，可能也是因费学曾父子的关系。

(三) 其他捐助沙田者

当初商定的包办沙田的是四人：费学曾、姚文枬、陈美棠、郑惇五，但一开始具体管理沙田事务的，是靖江陈美棠和江阴郑惇五，他们是当地士绅，都曾捐田给南菁书院。^④

陈美棠字荫南，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拔贡，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⑤

郑惇五字澧筠，《江阴县续志》有传，称他仅是“附贡生，候选通判”，但“为人通敏有干略”，“更事多，经验富。邑中事无大小，惇五无不与。有不与者，亦必咨之。”“光绪七、八年间，沿江各沙大水。惇五议筑长堤捍之，募款于沪浙富商。堤长百余里，工竣患绝。大府奖以额，并下其事沿江诸县以为式”。^⑥也许郑惇五有治水经验，所以由他与同府的靖江陈美棠一起赶赴上海设立沙田办事机构，实地考察，筑圩排水，将沙地改造成沙田。

盛康(1814—1902)，字勖存，号旭人，武进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

① 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十《费幼亭观察七十寿序》。

② 王先谦：《姚访梅妻张夫人墓志铭》，《虚受堂文集》卷十一。

③ 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姚颂虞》：“工部同僚姚颂虞，世浙江盐业，家富钜万。年少翩翩，捐贖入部，为候补郎中。其妻为盛尚书之女，悍甚，时往来京津间。”民国六年铅印本，第11页。案：姚颂虞为姚文枬之孙，盛尚书指盛宣怀。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横沙于光绪十四年开始围筑，陈美棠、郑惇五董其事。”

⑤ 光绪《靖江县志》卷十一《选举》。

⑥ 《江阴县续志》卷十六《人物·耆旧》。

署理湖北按察使。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盛康捐田给南菁的时间稍晚一点,是在光绪十五、十六年间杨颐任上了。

南菁沙田以后出产颇丰,为南菁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但南菁沙田的管理较为繁杂,事见下章。

第三章 南菁书院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杨颐扩充书院规模

一 王先谦离开江阴

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上，对南菁书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曾被王先谦和杨颐聘主南菁书院古学讲席的缪荃孙，二十多年后，在为王先谦所作的《七十寿序》中，对此说得最为简明扼要：“江苏三岁，使车再周，文学之士，选拔殆尽。南菁书院初创，先生为集巨款，增学额，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礼学馆所共推，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皆南菁之门人。”^①

这里的“集巨款”，是指王先谦刊刻《续经解》和购入郁姓横沙岛沙地而募集大量资金。“增学额”云云，是指王先谦在他任上，努力增加入院课生名额，而使书院呈现出一片学术繁荣的景象。缪写王之寿序时，已是宣统年间，这时，被学界所推举的礼学馆中的编纂如曹元忠、张锡恭、胡玉缙、钱同寿、曹元弼（顾问）、丁传靖等，都是早年肄业于南菁书院的课生；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如陈庆年、丁国钧等也都是南菁门人。因缪曾是南菁掌院，二十年后，缪被聘为礼学馆顾问和江苏通志局总纂，在这两个学者云集的学术机构，看到昔日的南菁门人都挑起了大梁，饮水思源，这不得不使缪想起了王先谦对南菁书院学术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

王先谦离任前，写诗一首《题南菁书院讲堂》，^②与南菁书院依依惜别：

才峰到处皆堪赏，艺海从来岂有涯。

共向西京讨师法，故应南学得菁华。

^① 《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宣统三年辛亥，七十岁。七月，余七十生辰，坚辞馈遗，而以文诗为寿者，义不可辞。谨备录之，用志友朋厚谊。”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83—486页。

^② 《虚受堂诗存》卷十三。

聚星知有英贤在，追日宁论道路赊。

要识使君无尽意，东溟重见马头沙。

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底，后任学政杨颐抵达江阴。王先谦与杨颐办好交接手续，于十一月初二日，由江阴启程，回长沙老家“修墓”。^①途中，王吟诗二首《舟发江阴，寄交代杨颐蓉浦同年(杨，茂名人，大理寺少卿)》^②：

江南欢语得公迟，我与君山亦展眉。

紫陌同年非隔面，青山交代合留诗。

经纶听报三年最，梁栋从储百岁资。

更有莺花相付与，寄园春已到南枝。

诗中，君山是江阴的名山，历任学使咏君山诗甚多；寄园是江阴名园，在学使署中。

王先谦走了，也带走了南菁书院对清代经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不过，在以后的—段时期内，南菁书院无论在办学规模上，或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上，还是在不断地发展。

二 杨颐上任伊始仍循双院长新章

杨颐(1824—1899)，字子异，号蓉浦，广东茂名人。同治乙丑(1865)进士，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1888)，以大理寺少卿督学江苏。

这时，南菁书院仍遵前任学政王先谦所定的新章程，即聘两位院长，黄以周主讲经学，缪荃孙主讲古学。

杨颐与王先谦是同年，在京师同朝为官，关系一直不错。当王在长沙二个月假满而向朝廷申请因病开缺时，杨很为王惋惜，还连忙在江苏学署写信劝阻。^③缪荃孙是由王先谦所聘，然仅一月有余，王即离任。但后任杨颐和缪荃孙的关系也很不错，两人还有师生之谊，因杨是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会试缪荃孙的房师，惜力荐未售。^④

① 《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光绪十四年，第213页。早在该年八月，王先谦上奏“交卸后，请假两月，回籍修墓。”“奉旨赏假两个月，钦此。”

② 《虚受堂诗存》卷十三。诗本两首，今录第一首。

③ 王先谦：《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中说：“在都，与济宁孙文恪公毓汶、吴县洪侍郎钧……及余为文酒会，酣嬉淋漓，极一时友朋之乐。……而公督学江苏，与先后任，知余将病免，贻书劝沮。”《虚受堂文集》卷九。

④ 《艺风老人年谱》：十年辛未，年廿八岁，“卷出茂名杨蓉浦师颐房，力荐，以微疵斥，杨师极惋惜，手抄二、三场文”。

所以,缪的古学讲席不会因学政的交替而有所动摇。缪于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因守制期满,离开南菁,北上复职。缪在南菁执教约一年有半。

杨颐的学术声望似不及前任黄体芳、王先谦。^①与王先谦关系很好的李慈铭,对杨颐出任江苏学政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八月初一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是日,简放各省学政,外论纷然,无不为余不平。”对自己没得学差,牢骚满腹。接着又说:“大理寺少卿杨颐,去秋,乞假归,迁延不至,今年春末始入都补行京察,旋试考差,竟得江苏。”最后愤慨地说:“此辈一时竞出,真文运之厄也。”^②正因为学界不太认可杨颐,所以,有人预料杨颐不会像前任那样善待黄以周,甚至怀疑经学大师黄以周是否因此有可能辞去教席,以致远在京师的黄体芳也过问此事。杨颐连忙向友人缪荃孙诉苦:“黄元同先生今年在院日多,今年住院生徒亦众,并未闻有辞馆之说,而漱兰前辈竟自都中致书挽留,不知此语从何得来,殊深惶惑耳。”^③

三 继续处理南菁沙田事

南菁沙田“升科”事,其实在王先谦手里并未彻底办妥。虽说南菁书院已经派有专人经营沙田,但户部一直未有正式沙田升科的公文下达到地方,所以江苏藩司一直在催促南菁书院上缴草息。杨颐写信给缪:“南菁书院尚欠应解藩司草息四千串,今年三月又奉严札催解,并有飭令绅董将收支数列册送核,以免任意侵蚀之语。”^④四万余亩沙地每年上缴江苏布政使库草息两千千(见王先谦《南菁沙田记》),两年便是四千千(串),杨颐说得不错。因缪荃孙一直参与沙田事,所以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南菁沙田升科事,因部议未准,近时藩署文催两年草息甚急,现拟先筹解一年,暂时塞责。此事既经台从,现与部友议明,自有把握。但应如何咨复,始能核准,务祈致函董事处拟稿稟复,方能据情咨请中丞转咨户部。鄙人于此事原

① 丹徒柳诒徵回忆考秀才之难的同时,曾月旦几位江苏学政:“光绪中江苏学政,以黄体芳、王先谦为称首,所甄拔多知名士。继之者杨颐、溥良,去黄、王远矣。”柳曾符编:《勉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6册(《荀学斋日记·癸集上》),广陵书社影印本2004年版,第11833页。

③ 杨颐致缪荃孙书第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0—11页。案:此信末所署月日为八月十八日,但未署年份,据信内容,当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

④ 杨颐致缪荃孙书第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1—12页。案:此信未署月日为五月十六日,未署年份,据杨自叙按临行程次序,应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以下引文出处同。

委茫然，无从凭空结撰也。盼甚，念甚。”^①杨颐说的也都是实情。杨颐还说：“近来书院经费支绌异常，而去年余利仍有一千五百串未清，郑澧筠托词以升科部费甚巨……”^②管理沙田的绅董，老是托词拖欠不缴沙田收益，让杨颐叫苦不迭。大概后来缪荃孙想请杨颐写封信给户部尚书翁同龢，疏通南菁沙田事。杨婉言谢绝：“至翁大司农处，向无书信往来，兼此事实未了了，若欲作函，正如一部廿一史从何说起，是以难于握笔，尚祈原谅为幸。”^③

缪荃孙确实也在为南菁沙田事奔走说项，甚至在光绪十七年主讲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时，还与时在京师的从弟缪祐孙屡屡通信商量沙田事，缪祐孙也屡屡与其兄通报其事的疏通情况和进展。^④缪因杨颐不肯作函与翁同龢，只得自己写一启与翁同龢，而户部上下打点，也花费不少，虽说可由沙务局报销，但消耗精力不少。缪荃孙之所以会如此出力，可能不少人（如陶澐宣、缪祐孙等）也包括自己以及捐田之人，在南菁书院的名下租佃下了一定数量的沙田（即所谓围户田，见下文）。^⑤陶澐宣离开王先谦学幕后，即去广东参张之洞幕，他在广州致信缪荃孙，十分焦急地问及沙田事，还说：“弟与吾兄分田受禄，无所参差。”^⑥怪不得当初陶澐宣要极力劝说王先谦接受南菁沙田事。

如前所述，王先谦任内，光绪十三年（1887）姚文枏、费学曾捐入横沙承佃之芦草滩地二万二十五亩给南菁书院，王先谦又筹银六千八十八两，购入郁姓承佃之二万二十五亩，连同接涨之白塗水滩九千四百四亩九分，共有滩地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亩五分五厘。后杨颐在光绪十七年（1891）补缴滩价银一千八百八十两九钱八分

①③ 杨颐致缪荃孙书第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0—11页。

② 杨颐致缪荃孙书第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1—12页。

④ 缪祐孙致缪荃孙书，第十四通：“南菁横沙一案，弟即托次亮向如君一言，此外尚有可托之人，弟必竭力图之。”第十五通：“沙田之事，据冯润田云，不必托江南印稿，自有办法也，请放心。”第十六通：“田事当作一启（即代）致虞山，（子梁写好，对过始送去。）稿底由子梁任寄上。陈次亮谒而未晤，容再诣。据润田说，可不托印稿，恐其生疑，反不好办。（咨稿送与润田矣。）”第十七通：“沙田事实由堂定，（大约已画齐稿矣。）吏缘索费，（行出甚快），自应如数酬之。”《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49—250、250—252页。

⑤ 缪祐孙致缪荃孙书第二通：“川沙田，兄允与弟合办，但不知每股出钱若干？至东沙滩三元一亩，亦不甚贵。”第七通：“兄能为弟谋沙数十亩，感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38—240、242—244页。

⑥ 陶澐宣致缪荃孙书第七通：“沙田事，现已收租息否？年岁何如？（每亩可得若干？）吾兄就近必闻其详，即乞告我。（费幼翁回南否？访翁在沪否？）弟与吾兄分田受禄，无所参差，一切统求照拂，拜赐多矣。目下情形，并祈详示，叩祷叩祷。”第八通：“承示南菁沙田，必须自行派人经理，足征高识。见在尊处有无派人？弟处拟请徐舍亲梅仙兄前往经理，并可随同办公。唯人地生疏，诸多未谙，奉恳转托郑醴翁照拂指教，并转请于公所内酌给脩脯，不胜叩祷。尊处如派人经理，事同一例，并可彼此招呼。所有派人赴沙，一切情形，祈详细指示，盼切祷切。”《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75—677页。

一厘给江苏布政使库。

至光绪十五、十六两年，即在杨颐任内，复由费学曾、盛康、陈美棠、郑惇五等先后捐本邑小阴沙新滩九千六百十七亩二分二厘七毫，^①为课生宾兴之费。则南菁沙田有近六万亩之多。

横沙岛沙田分自管田、围户田两种。自管田，系书院自行围筑滩地成田，散给各户承种，每年缴纳全租，每亩先收钱八百文，后加至一千三百六十文。围户田，由围户向书院缴价领田承围，每亩年纳板租钱三百六十文。南菁书院设沙务局于横沙岛，最早主沙务局事的是郑惇五等人。^②

四 杨颐扩充南菁书院规模和增加课生膏火

杨颐在任内加意扩充书院规模，《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记载：“十四年，杨颐继任，加意扩充，增广住院额。改刊书局旧屋，添建斋舍十四楹，编列‘礼、乐、诗、书’四字，合前共八斋。”书院前有“训、诂、词、章”四斋，现改为“德、行、道、艺”。

改旧屋，建新斋，动议应在光绪十五年。杨颐在该年除夕复信给缪荃孙：“……书院盖屋两层，阁下前信云千余串可得，（昨沙、冯两董来言，外间估工二千四百串。）大是快事，开正当邀各董事到书院面酌可也。缘簿已酌捐廿员，惟簿内捐项寥寥，想未即兴工。鄙人尚有两年在此，俟将兴工时，凭簿来取未迟耳。（年事忙迫，未暇照付。）手此奉复，顺颂岁螯，不备。愚兄杨颐顿启。除夕。缘簿并题目册并缴，又及。”^③整个建造费用估计“二千四百串”，大概除动用书院正常开销外，还向士绅发动了捐款，“千余串可得”。那么，书院扩建为“德行道艺、礼乐诗书”八斋，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吴稚晖于十五年（1889）春入学，住的是诂字斋，那时还未改斋名。^④

① 此为《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所载。又据1935年南菁中学所编之《南菁略史》，“（光绪）十五年，苏绅费学曾、盛康、陈美棠、郑惇五捐南通十圩港小阴沙新滩六千四百十余亩，为书院之产。十六年，苏绅费学曾等续购小阴沙接涨新滩三千二百余亩，捐入院中。”与《续志》所载吻合，且较详细。费学曾籍贯武进，称其苏绅，因其寓居苏州，晚年亦间住常熟。捐田之人中的盛康，即盛宣怀之父。

②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③ 杨颐致缪荃孙书，第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3页。该信未署年份，据信中“鄙人尚有两年在此”云云，应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除夕，时缪荃孙正在南菁书院度岁。

④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我等所居为诂字舍，各自以为许、郑、迁、固，聚此八舍也。”案：吴肄业南菁四年，入院后住诂字斋。明年，即扩建为八舍，但吴三十年后记住的还是诂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1969年，第277—280页。

由于斋舍扩大,自然有条件增加住院生的名额。缪荃孙自称,戊子年九月,“杨蓉浦师督学江苏,招至邑城,命主讲南菁书院。书院延两院长,黄元同以周先生专课经学,荃孙分课词章。诸生正额八十人,附额不记数。”^①而南菁课生殷葆诚则回忆:“庚寅,廿九岁。新正二十,赴城投考南菁。案出,余在住院之列。(超、特等均可住院,月支膏火七千。一等为在院,只能应课。)心无他念,束装入城,与阳湖谢莼赋君为邻。外县之人纷纷到院。(此届两门所取住院共六十二人,百余名在院。)”^②则住院生名额虽为八十名,但往往宁缺毋滥,如殷葆诚那一届,经、古两门共取六十二人。

课生的膏火也大幅度增加,每月增加二千文,即由原先的五千文增加到七千文。斋长则是十千文,比一般课生多三千文,与前没有变化。月课奖金仍旧,第一名还是奖八千文,余依次减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待遇:如遇上乡试之年(一般三年一次),不管是内课生,还是外课生,只要是赴江宁赶考的,每人发给旅费补贴,即所谓“宾兴”费银元三枚,不过,“本年月课不满十次者,不给”。^③这是鼓励课生积极应试院课。宾兴费的来源,就是前面所说的“费学曾、盛康、陈美棠、郑惇五等先后捐本邑小阴沙新滩九千六百十七亩二分二厘七毫,为课生宾兴之费。”

五 又恢复聘请一位院长之旧章

缪荃孙将于光绪十六年离院,南菁书院古学教习由谁替代,议论纷纷。缪荃孙向王先谦征求意见,王迅即复信:“得五月十九复书……南菁一席,弟冬间必须辞馆。承以替人见询,适得叶槐生手札,云蓉生思归甚切,属为推荐。兄思若得蓉生接替,实为得人。吾弟亦与深交,如以为然,可否函询蓉生,得实即向蓉浦先生极力言之,裁酌为幸。……骈文及《思益堂集》随寄不误。(正在刷印,因蓉生事,特先驰复。)……六月初七日。”^④王极力推荐朱一新,然而,费念慈和屠寄都认为朱未必肯来,倒不是朱的声望不够,而是朱在广东已有馆席。^⑤之前,费念慈已告诉缪荃孙,汪鸣銮、许庚

① 缪荃孙:《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0册,1999年。

② 殷葆诚:《追忆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1999年。

③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④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8页。此信应写于光绪十五年。

⑤ 费致缪信第一百十四通:“蓉生前辈未必果能到馆,在都时苗生同年言,端溪一席仍可蝉联也。南菁绅董如肯俯就,甚善。家严日内有函致澧筠,即当商及。”屠致缪信第十一通:“蓉生已就广雅一席,必不能来。”《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6、479—480页。

身同时写信给杨颐，推荐元和袁渭渔。^①屠寄则向缪荃孙推荐梁鼎芬或者屠仁守，甚至希望缪荃孙能发电报请托翁同龢、潘祖荫向杨颐疏通。^②屠寄还很恳切地对缪荃孙说：“南菁乃吾乡育才之本，必不可听其糟，阁下总须妥为交代。”^③缪荃孙心中还有一人，那就是从弟缪祐孙，如不成，则仍由兄遥领，实由弟襄校。^④

然而，出人意料，杨颐竟一个也不聘，倒不是他看不上这些学者，而是自己另有打算。他致信缪：

昨奉手示，南菁书院事宜，极承拳注。此次鄙意欲暂复旧章者，不过见书院现请院长两位，而肄业者仍复寥寥，总由每月膏火太少。意欲酌增膏火，而经费又恐不足，且膏火既增，则肄业必多于往岁，不得不添盖斋房。故明年暂照旧章，只请院长一位，俟沙田成熟，经费充裕，然后循照益吾祭酒所改新章办理。揆诸事理，似无窒碍。且黄山长虽词学未深，然初建书院，本有古学定额，此事并未偏废，尽可另行设法，以辅所不足，鄙意亦早筹及。至于遥领院长一层，贵省书院虽多如此，然南菁并未开此例。倘院长可不住院，且恐肄业者无所请益问难，愈裹足不前，讲舍鞠为茂草，殊足寒心。此则鄙意所未安者，尚祈熟思之。大约添盖房屋，必虽今年定局，其余开年议之未迟耳。手泐，复颂著祺，不备。愚兄杨颐顿首。廿六辰刻。^⑤

杨颐给缪荃孙的信中，开首就明确提出，准备暂时恢复黄体芳所定旧章，即只聘请一位院长。因为现在虽请两位院长，但来书院肄业者并不见多，总是由于每月膏火太少。如增加膏火，又恐经费不足。况且增加膏火，来院肄业者增多，就不得不增建斋舍。如只请一位院长，省下的薪金就可弥补增添膏火和增建斋舍的费用。

① 费致缪书第一百零七通：“南菁一席，明春所荐何人，在都时，汪郎亭师有函与茂名前辈，为袁渭渔孝廉推毂，许泉唐师亦有函与茂名也。渭渔经学辞章，皆有根柢，惟体弱耳。未知尊意何如也？”《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3页。

② 屠致缪信第十一通：“南菁一席，阁下荐星海何如？（好在杨老同乡。）或较胜口天辈也。（或由翁、潘荐屠梅君，须阁下电托翁、潘，刻知梅君已就‘经心’，梅君不肯求人也。然函丈亦欲请梅君掌‘江汉’教。）……初九日。”案：“口天”辈，疑指江阴吴鸿甲等。《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79—480页。

③ 屠致缪信第十一通。案：该信中屠又推荐以下数人：“若陈伯严（分吏部，告假不干。）刘慈民（现在版浦掌教。）并品学兼优，足以启迪吾乡土者。谭仲修（钱篋仙、洪右丞、左笏卿、蔡松夫。）何如？”《艺风堂友朋书札》。

④ 缪祐孙致缪荃孙书第二通：“书院一席，弟岂敢接手代兄阅卷，（即与杨师言，亦须着活笔，不必说代之何时，或云三月，或云半年，以后拖延至一二年亦无碍也。）最妥明冬如果能换聘固佳，否则仍由兄遥领，弟权作襄校。”第七十二通：“弟明年出京之计，在海外即已决计，今吾兄又许暂权讲席，何幸如之。”《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38—240、305—306页。

⑤ 杨颐致缪荃孙信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2页。案：此信应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

不过，杨颐也没把话说绝，“俟沙田成熟，经费充裕”后，再恢复王先谦当时所定的聘请两院长主讲南菁的新章。

至于“黄山长词学未深”的问题，杨颐说“尽可另行设法，以辅所不足”，并称早就考虑到此事了。杨颐的“另行设法”，虽在信中未向缪明说，据日后课生的记载，原来是杨颐自己代行了古学教席的职责，殷葆诚说：“（庚寅）二月朔，山长黄元同先生到，开课。（上年，黄山长主经学，缪小珊先生主词章。今岁词章无山长，由杨宗师自兼，课卷皆送署批阅发案。）”^①然而，杨颐四出按试，忙碌异常，哪有功夫来批阅课卷，自然只能请他人代劳。但拖延误时，势所难免。他曾请已离院的缪荃孙阅卷，然南菁监院仍将课卷寄到杨颐按临所至的考棚，使杨颐疑惑不解，致信与缪询问究竟：“又日前托沙孝廉致函，欲请台从本年每月评阅官课试卷，闻已承金诺。而兄三、四月按试通、泰两棚，该监院连月将课卷寄来，不知何故，殊使揣测不明耳。”^②

既然杨颐“只请院长一位”的态度很坚决，缪荃孙便向他建议，主讲词章的院长不必亲自到院，而在异地“遥领”。杨颐断然拒绝：“贵省书院虽多如此，然南菁未开此例。”书院院长异地遥领，在江苏是司空见惯，如瑞安孙锵鸣掌教上海求志书院十余年，自甲午后居然五年足迹不及上海，“领题、寄卷等务均由监院办理”。^③又如缪荃孙，多年后主江宁钟山书院教席，长住江宁，但又兼任常州龙城书院院长，一人如何分身，就只能“遥领”龙城书院了。在缪本人固然是顾念乡情，但能拿双份束脩，又何乐而不为？吃亏的是龙城书院的课生，院长遥领，课生就无法耳提面命，亲领教诲。再如黄以周，常住江阴掌南菁经学讲席，同时遥领宁波辨志精舍经学讲席，宁波是黄以周的故乡。也许，杨颐曾因为请他人异地帮忙阅卷，效果不佳，^④所以，

① 殷葆诚：《追忆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1999年。

② 杨颐致缪荃孙信第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1页。案：沙孝廉，沙从心也，南菁书院课生、斋长，又是书院钟董。通、泰两棚，指通州和扬州府两处考棚，扬州府考棚设在泰州。据杨颐按试行踪，该信似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

③ 宋恕《代孙锵鸣致邱赞恩》（一八九九年七月上半月）：“弟承乏上海求志书院史、掌两斋阅卷之任已十余年。向例，斋长皆不到院，领题、寄卷等务均由监院办理。甲午以后久未至沪，有小甥宋生礼在沪游学，一切收转事宜，历年命其就近与监院交涉。今闻执事兼任监院，敢以奉闻。”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1页。案：宋礼，即宋恕，孙锵鸣的女婿。邱赞恩，大概是上海县学教官。

④ 其实，缪荃孙代杨颐阅南菁官卷或家乡的书院课卷，有时亦假手他人，转请堂弟缪祐孙代阅。缪祐孙致缪荃孙书第十五通：“西郊课卷，二、三两月都到，弟连日披阅，以后两月之题，先为拟去。”信中的西郊，是在江西西乡的一个书院，由缪荃孙遥领院长。第十六通：“承以阅课闻属，又欲分润，闻之感愧。南菁如寄卷来，弟自当尽心代评，但虑薄陋不足副此托，至百金之惠，千万不必。……西郊四月课题遵出，由子梁侄寄去矣。”《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50—251页。

由此及彼，杨颐深悉“遥领”之弊，于是他在信中预料“遥领”的后果一定会很严重：“倘院长可不住院，且恐肄业者无所请益问难，愈裹足不前，讲舍鞠为茂草，殊足寒心。”这无疑是对南菁书院课生很负责任的态度。

杨颐也知道靠少请一位院长来节省经费，只能解燃眉之急，根本的解决，还是要靠南菁沙田的收入。所以，杨颐在任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过问沙田的事。^①前文已述，不赘。

六 加试时艺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时，就明确规定了该书院的性质，即是一所全省优秀人才研究经学、古学的书院，“专课通省经古”。^②书院聘请的老师也都是“训诂词章兼通之儒”^③。平时对课生所出试题亦不出经学、古学范围。然而，杨颐主政后，却规定南菁课生在经古试外必须加试时艺，这与黄体芳当初“捐廉议创是院，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④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这一举措立即招来饱学之士的讥笑。费念慈给缪荃孙的信中说：“弟谓南菁，是瑞安师奏定通省经古书院。添课时文，与奏案不符。且调各属高材生而课以制义，亦从来未闻。不独貽笑通人，亦恐见讥士子。”^⑤

其实，南菁书院虽说“专课经古”，但大多数课生将来的出路，仍得要以八股文这块敲门砖，去打开各级考试的关口，才能畅通无阻进入仕途。所以，南菁书院的绝大部分课生，在肄习经史词章的同时，也绝不可能全然抛却制艺时文而不顾，南菁书院出身的课生，日后的科举功名迥出时流，便是一个明证。杨颐只不过是將诸生业余或私下的肄习，纳入了公开的由学政主持的考试，因而貽笑大方。大概杨颐忘记了这些全省的高材生要么已是举人、贡生，要么都是各府州岁、科试均考一等前几名的秀才，对于写八股文或五言八韵诗的技巧早已纯熟无比，而现再在书院中对他们加试制艺，确是重床叠屋，多此一举。

杨颐任内，因课生增多，难免不引起一些“风波”，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心，屠

① 案：《艺风堂友朋书札》共收杨颐给缪荃孙的七封信，倒有六封是在江苏学政任上所写，而其中屡屡提及南菁沙田事。

② 左宗棠：《南菁讲堂跋尾》。

③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④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⑤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一百零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1—372页。

寄致信缪荃孙：“黄元老离院，诸生如此放荡，吾乡士习何以挽回？”“茂名曾不能以耳为目，何能整顿？”^①院长黄以周偶一离院，便出现“诸生放荡”的情况，所以同属常州府的屠寄要向前辈学人缪荃孙发出“吾乡士习何以挽回”的感慨，对杨颐的书院管理表示忧虑。

不过，杨颐除官课加试制艺外，均遵黄体芳所制定的经古书院的规章，且认真管理南菁沙田，增建南菁斋舍，扩充课生名额，提高课生待遇，这是大可值得肯定的。

七 黄以周刊刻《南菁讲舍文集》

光绪己丑(1889)冬，杨颐已上任一年，南菁书院的两位院长黄以周和缪荃孙共同编纂刊刻了《南菁讲舍文集》，它是南菁书院诸生的部分优秀课卷的第一次汇编，黄以周为作《序言》：

古者，王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中俊秀之士，无不受教于学。学校一正，士习自端，而风会藉以主持。自唐代崇尚诗赋，学校失教，华士日兴，朴学日替。南宋诸大儒思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著籍多至千百人，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主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

江苏之书院甲天下，若“钟山”，若“尊经”，若“紫阳”，其课士悉以诗文。“正谊”近改经古，“惜阴”又附于“钟山”、“尊经”，以经古为小课，非所重也。瑞安黄漱兰侍郎督学苏省，仿“诂经精舍”之课程，创建“南菁”，力扶实学，一如阮文达之造吾浙士。嗣是任者，长沙王益吾祭酒，续编《学海堂经解》，侵版废阁。茂名杨蓉圃太常，又复增广学舍，一时好学之士济济前来。以周主讲此席，于今六年。前我主讲者，有张广文歙山，已作古人。同我主讲者，有缪太史小山，相约选刻文集。因眷辑课作，简其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得若干篇。诗赋杂作，缪太史鉴定之。凡文之不关经传子史者，黜不庸；论之不关世道人心者，黜不庸；好以新奇之说、苛刻之见自炫，而有乖经史本文事实者，黜不庸。

^① 屠寄致缪荃孙信第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

在昔宋儒创书院，以挽学校之衰，暨今钜公又建讲舍以补书院之阙，其所以扶朴学而抑华士者，意深且厚。今选刻是编，约之又约，不敢滥取。蕲与《诂经》、《学海》诸文集并传于世，且望后之学者无爽创建之深意云尔。光绪十五年冬至，定海黄以周。

文集共六卷。卷一至卷三为经学课卷，卷四至卷五为史论课卷，卷六收诗赋、数学课卷。作者有光绪九年(1883)最早入院的张锡恭、华世芳、章际治、冯诚中、雷补同等，也有刻此文集的当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刚入院的吴眺(吴稚晖)等。

八 奏请书院院长常川住院

前文已述，杨颐拒绝南菁书院出现院长遥领的情况，并且为保证自己卸任后，也能使院长常川住院不被改变，所以他曾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由他出面上奏朝廷，成就此事。刘坤一很赞同，但又觉得“殊有窒碍”，于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二十一日回信称：

再，台指以南菁书院院长常川住院，与生徒朝夕讲贯，获益良多，深恐日久忘其本意，囑为入告，期垂久远。具征培植士林，无微不至，仰佩莫名。惟有敝处具奏一折，殊有窒碍。此间钟山院长孙渠田先生(案：孙锵鸣号渠田)，即如来函所谓“隔省遥领，数年不一至院”者。若由敝署出奏，不免有顾彼失此之虞。查南菁书院设立之初，聘订院长均由尊处主持，似不若由阁下于将来交替时，奏请飭下新任遵行，较为得体。^①

刘坤一对杨颐“培植士林，无微不至”是“仰佩莫名”，信中对孙锵鸣长期遥领江宁钟山书院之事也语含讥讽，但投鼠忌器，认为还是由杨本人上奏较为得体。于是，杨颐于其离任前，为南菁书院院长常川住院事，上奏朝廷。

杨颐奏，各省书院之设，与府州县学相维，其造就至广。然必院长常川住院，朝夕与生徒相见，乃能施诱掖而励观摩。查苏省兵燹之后，书院斋舍多未修复，生徒弦诵无所，院长亦少住院，甚至以隔省隔府曾任显秩者遥领而兼摄之。或一年至院数次，或数年并不至院，名为主讲而家巷安居，书院遂成虚设，甚非朝廷培养人材之本意也。

臣驻署江阴县，有南菁书院，创设于前学臣黄体芳，递年延请院长，专课通

① 刘坤一：《复杨蓉甫》，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3—1984页。

省士子经古，以讲求实学。其建造斋舍经费，由各官捐集而成。其院长修膳，生徒膏火，则系咨商前督臣左宗棠借拨淮北盐票项下银二万两发典生息备支，奏明在案。创设之初，经费仅足敷衍。迨前学臣王先谦任内，复有前清河道费学曾等捐拨地亩一项，而经费稍裕。臣莅任后，又添盖斋舍数十间，规模益拓。院长浙江举人黄以周，品端学邃，主讲八年，常川在院，功课既密，学风蒸蒸日上。就目今苏省书院而论，生徒朝夕讲习，常获禀承师训者，南菁一席实为硕果仅存。深恐日久懈生，所延院长或随俗波靡，不时在院，则生徒聚散无常，难期造就。且恐群居终日，无人提撕，业荒志荡，流为放僻，势所必至。合无仰恳天恩，飭下江苏学政衙门，著为定章：嗣后延请山长，必订明常川住院，然后关聘。庶学臣循名责实，拥皋比者知以素餐为耻，则诱掖必专，似于培材之道不无裨益。缘此，书院修膳膏火，明系借拨盐票银两生息备支，与给发官帑无异，理宜慎重将事。且院长向由学政衙门延请，臣职有专司，今当报满，不敢不就管窥所及据实上陈。

得旨，如所请行。^①

杨颐此奏获准后，南菁书院院长常川住院，与课生朝夕讲贯的情况，在杨颐卸任以后也就沿袭下来。杨颐此举，有利于南菁书院的继续发展，值得赞赏。

第二节 溥良遵循书院旧章

杨颐离任后，溥良接任。

溥良，字玉岑，清宗室，和亲王后裔。^②光绪六年（1880）进士，于光绪十七年（1891）赴江苏学政任。溥良主政南菁初期，遵循杨颐旧章，^③仍请一位院长黄以周常川住院，院长束脩与课生膏火及奖金均不变。但于官课时文，决计废除，而重新恢复黄体芳定下的考试经古的旧章。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009 页。

② 案：和亲王，这里指雍正帝第五子弘昼，乾隆帝之弟。董玉书《先师傅良记》说“和亲王有吴泰伯高风，世称让德”云云，则误认溥良先祖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了，代善亦封和亲王。董《记》见卞孝萱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团结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溥循杨旧章。”

一 费念慈与溥良谈南菁事

关于溥良上任之初管理南菁事，费念慈与缪荃孙的一封信中有谈及：

……玉岑前辈已晤谈，详告以沙洲始末，虽未能尽了，然当不致视捐户如佃户矣。玉岑言，本延吾哥阅官课卷，嗣因茂名临行有封奏，言书院事，云院长当终年住院，阅文课卷不得寄出。拜折后始以稿示玉岑，玉岑以此未便奉约，属道歉忱。

玉岑欲去时文，官课仍出诗古题，又以初到任，遽改茂名旧章为嫌。弟谓南菁是瑞安师奏定通省经古书院，添课时文，与奏案不符。且调各属高材生而课以制艺，亦从来未闻，不独貽笑通人，亦恐见讥士子，渠颇以为然，已决计复旧矣。

弟又言沙洲学息余利三千串，每岁解为常额，既不刻书，又不添造学舍，不如仍延山长。此项与存款不同，岁岁完缴，断无短絀不敷之事，以充束脩加奖之费，绰乎有余，既可培植士林，又免从中蠹蚀。渠亦以为然，言现方有控绅董一案，须查明后再议。如请院长，仍欲延吾哥，属先道意。

至翔翰已掌“礼延”，玉岑言在都时，郎亭、蘧庵交荐之，以主“南菁”。然元同经学大师，断无辞退之理，而翔翰时文世家，不知古学如何，正在踌躇，适闻绅士以延主“礼延”，甚妥，遂更赞成之，已定局矣。

玉岑之意，一切皆遵瑞安旧章，人亦和平，似胜茂名之坚执己见也。所延幕友未谈及，不知何如，闻仍延晋霞阅经解，想瑞安所荐也。……^①

细析此信，共分六层意思。第一，费念慈向溥良详细说明南菁沙田之来龙去脉，强调自己是捐田之户，而不是普通的承佃之户。第二，溥良表示本约定仍延缪荃孙批阅南菁书院之官课卷，但因前有杨颐之奏，所以无法践约，表示歉意。第三，溥良决计复旧，不考时文，官课仍出诗古题。第四，费认为，南菁沙田出产，用来作为山长束脩和课生加奖的费用，绰绰有余，所以不如仍延两位山长，溥良也同意。第五，溥良说在京师时，已有汪鸣銮等人向他推荐时文世家的江阴陈熙治主南菁书院词章讲席，正在踌躇，现陈已被江阴绅董延定主讲江阴礼延书院，事情完满解决。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零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1—372页。案：据信中溥良“初到任”云云，此信应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此时费念慈刚结束主考浙江乡试之差不久，故返乡赴江阴学署拜谒溥良。

第六,溥良表示一切皆遵书院开创人黄体芳所订旧章,学幕则仍延请林颐山阅经解卷。

溥良打算官课不再考制艺;并恢复双院长制,但两院长均须住院,不准异地遥领,大概以后都付之实行了。课生吴增元八十回忆:“光绪十八年壬辰,余年二十三岁。江苏学政溥良,满人,宗室。……二月初,开课,须领膏火住院。每月两课,一经史,一词章。”^①没有制艺。院长黄以周继续主讲经学,而古学讲席则由他的弟子林颐山担任了。林跟随其师于光绪十年(1884)来江阴,一直在江苏学幕中阅经学、古学卷,也时常协助老师阅南菁课卷,但好像一直没给他院长的名分。林颐山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十八年(1892)连捷成进士,估计就在这两年中,林才有了名分,开始与其师共掌南菁书院。

溥良如同他的三位前任,对南菁书院视如己出。他自称:“辛卯秋,忝膺简命,视学江苏。每遇按试余暇,亦尝亲临讲舍,接见诸生,相与讲学。”^②估计他与南菁诸生“相与讲学”中会谈到“性”与“习”的关系,所谓“向之视其性近者,学之始基也。继又因习而变者,学之进境也。”他之所以要与诸生“推原性习”,乃“意在劝学”也。

兴化李详曾于此时来游南菁书院,不禁思念起书院的开创人黄体芳:

海内树风节,莫如瑞安黄。松筠莅驿旆,慷慨陈封章。校士来吴趋,疾恶怀刚肠。讲学慕东林,横舍开澄江。悠然慕古人,冀觐顾与杨。阅世逾十年,高材纷揆张。破字师康成,崇纬尊公羊。谈笑互创痛,容止争丰昌。此中有佳处,过者为旁皇。缅昔育才华,岂仅论文章。大贤恋桑梓(先生以久病,告在籍),奚不兹游翔。颓息付后生,调臂讥伧荒。敬勸同舍流,勿秽黄氏庄。^③

李详在诗中也流露出对当时书院内出现的某些情形的担忧:如院内出现“破字师康成,崇纬尊公羊”的治学倾向;院生的治学态度亦大不如前,“高材纷揆张”,甚至“谈笑互创痛,容止争丰昌”。这与黄体芳当初着眼于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建院宗旨大相径庭,因此,李详寄语院中莘莘学子:“勿秽黄氏庄。”

① 吴增元:《八十回忆录》,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93年10月。

② 溥良:《南菁札记·序》,光绪二十年江苏学署刻本。以下引文同。

③ 李详:《游南菁书院敬怀黄漱兰先生》,《学制斋诗钞》卷一,《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2页。

二 溥良刻《南菁札记》

光绪二十年(1894),溥良离任前,将南菁学子所撰或所辑的十四种著作,于江苏学署内开雕汇刊成一部丛书,取名《南菁札记》,溥良为作序:

三等奉国将军理藩院左侍郎提督江苏学政宗室溥良撰

大凡学必视其性所近,而事半功倍;不率性以为学,实者滞于虚,华者漓于朴,势必至倍其事、半其功不止。善为学者,先试其学之所好,然后知其性之所近。性近则喜悦,反是则厌倦。遇有厌倦,则虽善不信。勿与之相强,而别易一术以试之,屡易数术以递试之。试之而果有所好,好之而确有所信,则厌倦之念日益祛,喜悦之趣日益深,而为学之事功日益懋。于是朴者致力于实,华者游神于虚。或以故训胜,或以词章显。向之视其性近者,学之始基也。继又因习而变者,学之进境也。

今夫学问之道,不可以一蹴几。始焉竭一人之心思智力,其立志也坚而忍,其修业也专而精。继焉合众人之心思智力,而相观,而善善,与人同取其专以求其兼,励其精以会其通,因其坚忍以驯至于持久。故自古儒学之盛,惟汉称最,其所以致此者,建太学,造横舍,广设弟子员,各守家法,互相切磋。诗赋家既旁通经故,而传经者又皆雅善文辞。即在畴人子弟,翫其议论丰采,亦莫不雍容尔雅,粹然儒者之言。此岂出自性成哉?盖运实于虚,黜华返朴,良由其习使然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于以知习与性相成,匪伊朝夕之故,其殖学也固深且久矣。

自黄瑞安设立南菁讲舍,提倡宗风,士之负笈来学者,业已砥砺观摩,久历年所,恢恢乎有宏我汉京气象。辛卯秋,忝膺简命,视学江苏。每遇按试余暇,亦尝亲临讲舍,接见诸生,相与讲学。偶及贾子引孔子佚语,而有触于中,窃不自揆,推原性习,意在劝学。爰仿南学札记,月课一册,比及三年,积帙滋繁。今者试读甫竣,复辑札记,得十四种,次第付梓,并述曩时讲学所及,弁诸卷首,以叙崖略。于时岁次甲午,大清光绪二十年也。

《南菁札记》收有江阴缪楷的《尔雅稗疏》四卷,上海钮永建的《前后汉记校释》各三卷,以及通州崔朝庆等人的数学著作和曹元忠等所辑《仓颉篇补本续》诸书,共十四种,二十二卷。

《南菁札记》是继《南菁书院丛书》后的又一部将南菁学子的专著编辑而成的丛

书。虽也有讥之为“浅陋”、“粗浮”的，^①但溥良终究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实事，在众多的南菁学人“镌刻”的南菁书院史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虽不算耀眼却是永恒的痕迹。

三 黄以周刊刻《南菁文钞二集》

溥良于光绪二十年(1894)冬离任，离任前，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又一次选编肄业诸生的优秀作品，在该年(1894)冬，汇刊成《南菁文钞二集》，距前刻《南菁讲舍文集》(初集)已有五年时间了。黄以周又一次为写《序言》：

夫西都后进，皆欲从之平原；北海通方，咸仰流于高密。志向所在，心期斯同。是以太学横经，古训是式。精庐程艺，美才为多。淬砺精而用宏，真积久而业茂。岂况大江南北，灵淑所钟；诸老先生，风流未沫；如林子侄，尽读藏书；成市生徒，实繁作者。

以周主讲此席，十二年矣。少承家学，述有著言。抗礼滋惭，拥经负疚。曩者己丑之岁，辑及门诸子之作，凡若干篇，汇为一集，并美备众制，妙绝时人，可喜可观，无遗无假。今距前刻又五载矣，寒暑屡更，著录积富。铿铿说理，颀家间增，飘飘凌云，后生可畏。非惟扶风弟子，乃有高业；蜀郡成都，实生词人。洵慕学之孔殷，自文明之蔚盛也。爰踪前志，为定新编，又得若干，续之《初集》，文辞并美，诚复如班固所称“老眼犹明，吾已从君鱼受道矣”。^②若夫幽兰方馨，春草已宿。简文痛心于撰集，子桓伤逝于曩游。美志不遂，遗书待收。是又览此子之文，对之拭泪，念少壮之岁，真当努力者也。勛哉多士，幸广鸿篇。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至日，定海黄以周。

《二集》与《初集》一样，共六卷。卷一至卷四收经学课卷，卷五收史学课卷，卷六收赋(铭、赞)。《二集》目录的开头，还列出校勘者的名单：“院长黄先生鉴定。斋长林之祺、孙倣、顾鸿闾、崔朝庆、王家枚、孙揆均同校刊。”

① 王伯恭：《螭庐随笔》之《江苏学政刻试牍》条：“后余房师傅玉岑先生良，官侍郎时，放江苏学政，……已而师受代去，竟刻成试牍四巨册。余取阅之，皆浅陋之算学及粗浮之经解。此直高阁中物，何苦灾梨祸枣，不如其公子毓少岑为吾皖学政，不刻一字，为善藏拙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案：王氏称《南菁文钞》为试牍，实误解也。

② 案：“吾已从君鱼受道矣”，似出《后汉书·孔奋传》，而非《汉书》。

第三节 龙湛霖对书院的“西化”改革

光绪二十年(1894)初冬,龙湛霖抵达江阴,继溥良出任江苏学政。

龙湛霖(1837—1905),字芝生,湖南攸县人,^①同治壬戌(1862)进士,督江苏学政时,官刑部右侍郎。不过,当时学界似对龙湛霖的学养不甚认同。^②

一 添课西学

该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士大夫受到强烈的刺激,要求变法的呼声高涨,南菁书院的士子自不能置身事外,而学风也为之大变,由传统的经史研究逐渐趋向于对时务的关注。

龙湛霖在江苏学政任上,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上奏折《为请旨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以期速开风气而广育人材恭折仰祈圣鉴事》,由其幕友谭嗣同代写。奏折中说:“窃见倭人就款之后,中外臣工乃始徐徐筹及补救之策,于是变法之章奏杂然而并陈。”而“变法之本”是“广育人材”,要“广育人材”,就“不能不变通科举”。所以,“此后科举,即仍考制艺,宜令各兼习西学一门,以裨实用。”“必须果真精通一门,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还请求朝廷“一面飭令各直省督抚臣会同学臣,于各直省书院添课西学,随时加意培植,礼罗四布,谁不思奋。庶几奇材异能之士,不至湮没废弃,而向之徒以制艺见长者,亦必惭愤而自励于实学。”^③

龙湛霖身体力行,先在南菁书院推行“添课西学”。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奏保书院肄业生员一折中称:

江阴旧有南菁书院,归学政臣主政,为通省举贡生监肄业之所,其课程尚

① 案:《江阴县续志》卷三《建置·官署》附《学使题名》,称龙湛霖籍贯“长沙”,实误。陈三立《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称龙湛霖籍攸县而居长沙。

② 李慈铭于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初一日记:“……翰林侍讲学士龙湛霖得江西,此辈一时竞出,真文运之厄也。”见《越缦堂日记》第16册(《荀学斋日记·癸集上》),第11833页。又,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甲午八月七日,“得龙芝生督学江南信,江南文事可知矣。”可见当时的学人对龙湛霖的学术修养的不认可。

③ 谭嗣同:《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分经义、词章、算学三门。方今时事艰难，算学尤为急务。臣到任后，于算学之中，分别电、化、光、重、汽机等门，飭在院诸生，即向以经义词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艺。惟近来中国所译西书，多出自文人润色之笔，论藻绩则有余，考实济或不足。且以一人兼举各学，既非专门名家，其余要眇精微之处，究不免貌合而神离。臣深知其弊，特筹款购办制造机器一具，并测量图绘诸器置诸院中，俾诸生目睹其物，因而推求其理，庶收居肆成事之效。

诸生目击时艰，亦颇知加意讲求，以备国家异日之选。惟创设未久，成效尚迟，核其所长，究以经术为最。查同治二年（1863），前河南学臣景其濬保准副贡生苏源生等五名以教职选用，并钦承谕旨：“嗣后学政准予通省生员中综合名实，认真考核，酌保数人，以为乡里矜式等因，钦此。”此诚国家励贤崇化之隆规也。兹查有举人元和胡玉缙、新阳汪开祉、通州顾鸿闾，优贡丹徒陈庆年，廪生通州孙傲、常熟丁国钧，先后在院肄业多年，均经术精通，学有家法。又徐州府铜山廪生徐重礼，立品端方，讲求时务，于算学亦有门径。该府僻处在远，风气未开，该生独为于人所不为之时，其志趣不无可取。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援照成案，将该举人胡玉缙、汪开祉、顾鸿闾，优贡陈庆年等四名，以教谕选用；廪生孙傲、丁国钧、徐重礼等三名，以训导选用。并飭部注册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奉旨硃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①

龙湛霖称：“飭在院诸生，即向以经义词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艺。”还“特筹款购办制造机器一具，并测量图绘诸器置诸院中，俾诸生目睹其物，因而推求其理，庶收居肆成事之效。”估计都是表面文章，很难推行，^②毕竟南菁诸生“核其所长，究以经术为最”，所以他保举的南菁肄业诸生胡玉缙、汪开祉、顾鸿闾、陈庆年、孙傲、丁国钧等人“均经术精通，学有家法”，并不是“各兼一艺者”。

陈三立所写《神道碑》中说他“及为江苏学政，世变益急，为输格致新法，购置译籍表器，分科立章程，首推行号称最得才士曰南菁书院。日有效，声绩闻朝廷”。^③龙湛霖并不满足于“居肆成事”，甚至还派出课生去上海机器制造局学习“制器尚象”。如金匱华彦钰和无锡孙毓修都曾在上海学习过，不过时间很短。南菁同学王

①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十一《学校四·书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8—3310页。

② 案：当时的南菁课生如丁福保、蒋维乔等自订年谱中，均未提及“必兼一艺”事。

③ 陈三立：《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

家枚称华彦钰“先是，君肄业南菁讲舍，学使龙公湛霖知君具倣傥之才，通中西之法，咨送沪上机器制造局，研究新机，讲求实事，制器尚象，思补司空于六官，穷源溯流，推本畴人之八线。君尤究心于声光热电诸理，而于化学尤专尚焉。及归自京师，权轻淡之气，炼铍（案：早先“钾”之译名）磺之精，将以设庠授徒，致知格物。”^①孙毓修致汪康年信中说“去冬，奉龙侍郎师资遣至沪，迫于人事，未克叩谒”，^②大概就是指赴上海制造局学习格致新法之事。

龙湛霖学幕有谭嗣同这样的激进维新人士充居其中，要说不受维新变革思潮的影响，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能在日讲训诂词章的书院内，输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即所谓的“格致新法”，并还购入介绍西方科学的翻译著作，添置西方的科学实验器材，甚至派出课生去上海机器制造局学习，这些举措即便有装点门面之嫌，但这位龙学政也不全然如晚清官僚徐桐、刚毅那样顽固不化，是大可值得肯定的。然而，华彦钰英年早逝，其“设庠授徒，致知格物”的设想付之东流，而孙毓修以后也并未投入致知格物的研究，却又恢复文史研究的旧业，由此推及，所谓在书院输入格致新法云云，并未产生什么效果。

二 整顿沙田经济与提高课生待遇

龙湛霖主政南菁时期，书院的经济收入逐年有所增加，这是与龙湛霖承袭前任余荫，刻意经营南菁沙田的努力分不开的。

费念慈曾写信告诉缪荃孙：“龙子琛前辈到苏，与严亲谈，极契合。有意扩充南菁规模，整顿沙洲出息。坚约家君主持沙务，坚辞，不获。现已统归家君经理，招垦、招佃，每亩加四百文。一改澧筠积弊。”^③龙学使到苏州，与费学曾谈得很投机，于是，龙请费再次出山，主持南菁沙田事务。费学曾和郑惇五都是捐赠沙田给南菁书院的原经手人，并包办沙田的开发，可能两人在经营沙田的具体策略上意见相左。这次费出主事，不管是招垦围筑，还是招佃耕种，每亩都加租四百文。费念慈认为，其父这次一扫郑惇五主持沙田时的种种积弊，“此后当有起色，于书院亦多裨益也”。倒也给费念慈说准了，书院“产息日赢，历次加膏火，增斋舍，广住额，出入

① 王家枚：《华相卿别驾谏并序》，《重思斋遗著》卷下。

②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9页。案：该信署名为孙学修，即孙毓修也。落款日期为三月一日，未署年份，据后“今兹承乏中西讲舍余景”云云，该信当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则龙湛霖遣南菁课生孙学修等赴上海，在二十二年。

③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三十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89页。以下引文同。

相抵，尚复有余。至二十四年，续存各典之款，几达二万千文”。^①

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龙湛霖对书院内部做了一些改革，每斋原本设一位斋长，现改为设置正、副两位斋长，“于课生中择最优者为正斋长，次为副斋长”。斋长待遇又一次得到了提高，“每月膏火，正长二十四千文，副长十六千文”。原先，斋长是十千文。“诸生亦增加三千文，为十千文。”而原先诸生的膏火是七千文。斋长膏火增加的幅度远高于课生，这拉开待遇档次，厚待优秀课生的措施，对提高课生研习的积极性，是大有激励作用的。

^①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以下引文出处同。

第四章 书院改办高等学堂

第一节 瞿鸿禨遵旨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

一 瞿鸿禨主政南菁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冬,瞿鸿禨继龙湛霖督学江苏。

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号止龢,湖南善化人。瞿鸿禨十七岁入学,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二岁连捷进士,入翰林院。以后,一直外放试差或学差,当王先谦于光绪十一年(1885)任江苏学政时,瞿鸿禨也正督学浙江,苏浙仅一湖之隔,两人同乡同窗,志趣投合,时有诗书往来。瞿写诗赠王:“吴越封疆界五湖,轩车相望口碑殊。爬梳众说经郭廓,阮傅风流并世无。”^①将王先谦比作阮元,并自谦口碑不能与王相比。想不到十年后,自己也步王后尘,督学江苏、主政南菁了。

(一) 院长更迭

当时,朝廷推行改革,瞿鸿禨在南菁书院自然有所响应,在聘请院长的问题上费了一番周折。此时,南菁书院之古学(算学、词章)教席乏人,林颐山已去苏州学古堂。黄以周德高望重,诸生爱戴,经学讲席非他莫属。但黄以周此时早已萌生退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仲夏,离开他主讲十五年的南菁书院,归隐于杭州。临别时,作《示诸生书》,告诫诸生谨守六经之教,不应以西学为指归:

《大学》之道,《礼记·大学篇》言之至矣备矣。《大学》之法与《大学》之教,《学记篇》论之亦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至九年知类通达,是能通达于政事矣。强立而不反,所谓果敢强有力,无事用之于礼义而顺治,有事用之于战胜而无敌,学至是而大成。故依

^① 瞿鸿禨:《答益吾见赠次韵》三首之第一首,《超览楼诗稿》卷一。案:诗中“五湖”,太湖。

《大学》之法，自有豫、时、孙、摩之美而教以兴。废其法而不用，以齿有过时、不及时之失，以学有杂乱、孤陋之弊，始以扞格勤苦，卒以逆师法，废实学，无他，学士朋辟之习深也。

燕朋者，朋匹相乐，所谓“乐燕乐”是也。燕辟者，隐僻自好，所谓“索隐行怪”是也。二者皆欲废《大学》之法者也。君子知教之兴有四，废有六，而能修明其所由兴，补救其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师也者，守先圣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不惑于异端，不挠于时论。敦德礼于春秋，谈仁义于战国，当时君若臣鲜不以为迂阔而不通时务，而孔子言之，孟子言之，其道卒明于天下而昭于后世，亦以圣人之徒传而述之者广也。

三代以上，崇儒而尚农，农亦知道，得与士合矣。后世归利权于商，于是士而商者亦有矣。近乃立西学之名以与中学敌，且欲驱学校之人尽攻夫西学，又合士、工为一途，以为此西人所专长，非吾中华所有，不学此，无以自强，蔑能济世。夫独不闻输攻墨守，迭尝其巧；弩发櫜动，各用其机，而士大夫终鄙其术，不相传习，其法寢湮。今乃拾前人之所鄙弃，而以为美谈，又且自小其说，以张彼教，是何见哉？

夫中土士人文弱，必不能手执艺事如西人之不惮烦，即有知其法，亦能说不能行，曷若《大学》之教“三达德”、“五达道”，率我性分所固有，事事可见诸实践，无烦援其所不及，强其所不知，如西学凿智斫性之为哉。《大学》之法，具在六经，能谨守其教而审行之，人才自出，国家可兴，如谓非西法不能靖世，岂中国数千年之天下皆泯莽之世邪？如谓时势有不同，岂知与时变迁者，其术也，而道亘天地而不变。

孟子闲先圣之道，拒彼行，放淫辞，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信道如此之笃也。又虑学校失其教，选举失其法，良臣民贼失其衡，曰：有善战者杀，任土地者刑。卫道又如此其严也。学者读圣贤书，当务期大者远者，以经传植其基，以子史充其识。读汉儒书，事事求合于典籍而约之于礼，勿逐乎文字训诂之末，破碎大道；读宋儒书，事事体諝乎身心而返之于己，勿袭其空寂幽眇之说，辜负实学。

测量为古六艺之一法，我尚有之；兵矿为今军国之大计，我尚游之。农桑则农家习之，营造则工家习之，颀门名家，别有其人，我尚不欲。光热化电，多能鄙事，我皇多有之？一生之精神有限，百岁之年华易逝，孳孳从事于《大学》，

尚恐力有不逮，何皇分其志于小道哉？曲艺之士出乡入学，并不与士齿，今以利禄所在，靡然宗之，不羞与之伍，且有求焉如不得，士习之卑鄙可耻，于今极矣。诸生幸一洗之。余主讲南菁十有五年，今老矣，将归明农。爰书此，与诸生别。时在戊戌夏日，年七十有一。^①

黄以周走了，南菁书院辉煌的经学时代也随之而去。

大师难继，时在南京主讲钟山书院的缪荃孙，建议瞿鸿禨不妨将“院长分而三”，瞿回信道：

……院长分而三固当，惟一时经费无出，尚有难行。拟且就一院长修数，改聘两贤，欲以算学延华若溪先生主之。（分三百金为算学修，以四百金为词章修。）闻公明岁，舍钟山而近就龙城，未知有是说乎？果尔，则郡城密迩，往来甚便，敢求台驾来领词章一席，不胜大愿。惟修羊损薄，有辱高贤，倘蒙不择细流，裁成乡党，功德岂复有涯，而不才得时亲教论，其私幸更何如也。……^②

瞿的意思是，如聘三个院长，其中词章、算学两教席，只能付给一院长的薪水。词章拟请缪荃孙，四百金；算学拟请华世芳，三百金。当时缪正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而华世芳主讲常州龙城书院。

时隔不久，瞿得知缪仍主讲钟山，并遥领龙城，即复信与缪：

……若溪先生算学之聘，幸邀许诺。琴从方赴芎帅之招，恐两湖分席，必且借重，合之龙城寄卷，已不胜烦，若再以累公批阅，未免劳矣。区区之诚，俟诸异日。岁内已无多日，礼聘未可过迟，鄙意拟即招鹤琴学博，且主词章。唱初兄则荐杭州陈杏生太史，^③早晚当即定局。相去不远，尚望随时开益。……^④

瞿鸿禨告诉缪荃孙，华世芳已答应主讲南菁算学，而闻听缪则仍受钟山、龙城两书院之聘，已不胜烦，拟不再劳神。瞿鸿禨准备聘请王亦曾任院长，并主词章讲席。王亦曾，字鹤琴，江苏吴县人，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外放广西知县，后返乡，改就教职，官徐州府教授。王亦曾在龙湛霖任内可能已接替

① 黄以周：《示诸生书》，《傲季杂说》，詹亚园、韩伟表主编：《黄以周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1—523页。

② 瞿鸿禨致缪荃孙书第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5—66页。又据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所记，丁酉年（1897）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均与瞿鸿禨有信往来。

③ 案：唱初，吴鸿甲字。吴鸿甲，江苏江阴人，与陈昌坤是同年，丙戌进士，翰林院编修，官御史。

④ 瞿鸿禨致缪荃孙书第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6页。案：此信似当写于光绪丁酉年底。

林颐山掌南菁古学教席，现拟连任。但也有人向瞿推荐陈昌绅。陈昌绅，字穉亭，号杏生，浙江钱塘人，光绪丙戌(188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瞿鸿禨觉得时间紧迫，“早晚当即定局”。

在龙、瞿任内，王亦曾、陈昌绅先后被聘南菁书院词章教习，不过，在南菁的时间都不会长。陈昌绅于“己亥冬，入都”，^①最多掌教南菁一年左右。又因黄以周衰老请辞，瞿鸿禨不得不又要重新考虑院长人选。最终，选定了丁立钧。瞿曾写信给缪：“南菁讲席，已聘叔衡太守，前在扬州相见，虽有末疾，作字须使左手，而神采奕奕，不减当年，必能乐育后进也。”^②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衡斋，江苏丹徒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翰林院编修，山东沂州府知府，因患中风，在任一年多，便辞官寄寓扬州养病。病后留下“半边风”残疾，右手已不能举，写字作画须用左手。不过，瞿鸿禨在扬州见过丁立钧后，觉得他“神采奕奕，不减当年”，相信他一定能胜任南菁讲席。

(二) 瞿鸿禨的维新倾向

在清末大僚中，瞿鸿禨以“慎密勤敏”、“处事持重不急切”著称，^③但他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当他连丁父母忧，在家守制时，“嵩焘自海外归，倡西学，鸿禨大好之”。^④郭嵩焘是瞿鸿禨未中举前在长沙城南书院求学时的老师，瞿不可能不受到他老师的影响，所以瞿鸿禨后来同情康梁变法图强的运动，这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及居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方倡变法，鸿禨则为延誉。”“俄政变，几被株连，以章疏中未显言保新党，得不问。”同情康梁，却未被株连，确也说明了瞿的“慎密勤敏”。

瞿鸿禨曾邀请康有为弟子唐才常入江苏学幕，未成。^⑤又，瞿鸿禨在江苏学政任内，当光绪帝以康有为《兴农殖民，以富国本折》上奏后，即于当日(七月初五日)

① 王先谦：《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虚受堂文集》卷十二。

② 瞿鸿禨致缪荃孙书第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65页。按：“前在扬州相见”云云，则此信当写于戊戌年下半年，因按惯例，江苏学政在江阴过夏天后，始出棚岁考江宁、淮安、扬州、通州等地。

③ 刘宗向：《瞿鸿禨传》，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十六，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6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④ 郭嵩焘曾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思想敏锐，不肯随俗浮沉，竭力想把中国引向世界，但最终还是屡遭挫折，不能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流，生前死后还落了个“汉奸”骂名。史学家汪荣祖曾说郭嵩焘“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见汪荣祖著：《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弁言，岳麓书社2000年版。）

⑤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引唐才常于戊戌五月初六日致欧阳中鹄信中语，“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入幕，并非无啖饭所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发出上谕，而瞿鸿禨乃于七月十一日即上奏响应，亦可谓之迅矣决矣。^①（瞿之奏折见下。）由于瞿有“新派”倾向，他来江苏督学，必然也会给小县城里的南菁书院，多少带来一点维新的气息。

蒋维乔在《竹翁自订年谱》中记载：“公元一八九八，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十六岁。……六月间，瞿子玖学政颁行经济特科题数道至各县，其中有《沿海舆地形势考》，余选作此题，竭一月之力，草成十万余言，向王君瀚卿处，借得收小放大绘图器，用西法摹绘附图三十余幅。案发，取列第三名，批语中有云：‘西法绘图，出于士林之手，乃海内所罕觐也。’”^②

批语有味，对中国士子重道轻器的传统提出了异议。

瞿鸿禨还对书院课生的考课内容做了一些变动，由辞章改为时务。正在南菁肄业的王观，金坛县人，与时主《时务报》之汪康年有姻亲关系，就曾为南菁书院应时务课事，写信给汪：“敝省南菁讲舍，文宗于六月特课，依经济六门命题，内有理财一题云：‘山西铁路矿物定借洋款，归义、俄两国商人兴办，与中国利源损益若何？’按此，想近今之事，见闻所囿，茫乎未知。因想贵馆《时务报》必早著有论说，用寄一洋，乞择论及此事者代购数册，付局寄下，并祈惠赐谕言，将中国利源损益所在，指示一二门径，俾知趋向。”并请汪将《时务报》直接寄至“江阴南菁讲舍内印书局”。^③

瞿鸿禨识拔金松岑，也说明南菁书院传统的经学研究的逐渐衰落，而趋重于变法图强的时务讨论。“善化瞿侍郎鸿禨按试江南，得先生所为《长江赋》及《西北舆地图表》，遽大称赏，檄调南菁书院肄业，选充学长。”这时，南菁士子治学，仍如前一样的严谨而活泼，“当是时，大江南北材贤知名士，皆集南菁，相与谈析道艺，高会文酒，疑义竞起，互矜人艰僻以取胜所不知”。^④

然而，在费念慈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写信给缪荃孙：“叔衡主南菁讲席，兼经、史、算三门，将辞赋改为时务，诸生皆调取，无甄别投考，然高材甚少，以赵君闾为冠。^⑤弟到暨阳，在院中谈数日，见开课卷，略翻阅而知之。西学误人，勦说雷同，满纸皆是。中学遂日荒废，邪说之为害如此其烈，以视公主讲时，相去远矣。”^⑥

①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339页。

② 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

③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页。

④ 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第699页。

⑤ 案：赵宽，字君闾，赵烈文之次子，阳湖人，寓常熟。

⑥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4—375页。

费认为,距黄以周、缪荃孙合作主讲南菁不过十年的时间,竟然邪说为害如此之烈。西学误人,中学荒废,书院前景堪忧。

二 瞿鸿禨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自上而下厉行新法。五月甲子(1898年7月10日)上谕:“即将各省、府、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①

这时,瞿鸿禨在江阴仅上任半年多,立即响应变法。他于七月十一日(1898年8月27日)上奏:

江苏学政瞿鸿禨跪奏,为江阴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富强之道,以人才为致用之资,以地利为厚生之本。兴学兴利,莫急于今。伏读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此而升。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开办,着即将各省之大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等因,钦此。”又恭读六月十一日上谕:“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兹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等因,钦此。”仰见皇上广学育才,锐意指导,凡有血气,莫不感激奋兴,力求通变。

臣查江苏书院在江宁、苏州两省城者,均由督抚臣经理,惟江阴南菁书院系由前学臣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院中事宜专为学政主政。今既奉旨一律改为学堂,臣当恪遵办理。但书院虽在江阴县治,入院肄业者乃全省人才所萃,自应照省会书院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以符新章而资鼓舞。并于在籍绅士中择其学通中西、士林翕服者,管理一切,即兼总教习之任,俾得恢张新学,以专责成,实力奉行,宜有明效。

查书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项,在松江府属之川沙厅境内,名曰横沙,系光绪十四年前学臣王先谦任内,据绅士前直隶(请)[清]河道费学曾、候选道姚文枬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26页。

等呈请,将该绅等认佃前项横沙芦草滩地二万二十五亩零,捐入南菁书院,以充经费。又劝令郁姓承佃之五分沙地二万二十五亩零,一并归入书院,其原缴沙价库平银六千八十八两零,亦经臣王先谦筹款如数缴还,即各将佃单全数呈缴,永归书院管业。委员逐一丈量,实计芦草泥滩共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并续涨沙地九千余亩,当经前抚臣崧骏据情具奏,并将亩分图形咨送户部,旋经部咨核准开课,历年遵行在案。

臣查此项沙田,均系招人承佃,租息微薄,未扩利源。若求《周礼》“物土之宜”,参以泰西化学之用,必能树艺五谷,遍植果蔬,即棉麻等项亦可试种。现当屡奉谕旨振兴农务,臣将未经围佃之地先行试办,如有实效,再行推广。农学之事董之学堂,学堂之费资于农利,二者相辅,即无另外筹款之难,复有相助为理之益。但中国之农学,不及西国之精深,习故蹈常,地多遗利。且沙田质性,较异常田,转瘠为肥,实资新法。查欧西比利时国佛兰德斯及甘滨地方,皆系沙田,设法垦治,遂成腴壤。欲兴种植,自应讲求。察土性,辨物质,慎培壅,非西人之教不精;垦荒土,屏积水,利耕获,非机器之力不逮。臣因访有美国农师本托士,拟即延订覆勘,随当择购机器,宽备工料,次第筹办。昌绝学以开民智,增地产以裕财源,冀能裨益国家,非仅规一隅之利也。

所有微臣改设学堂、试办农学缘由,谨缮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①

光绪帝对该奏折很重视,不是单批“知道了”三字就发下,而是硃批:“另有旨。”现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98年9月12日)谕旨如下:

(七月戊寅)谕:瞿鸿禨奏江阴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一折。江阴南菁书院,经前学政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现既改为学堂,着准其照省会学堂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以资鼓舞。该书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项,据称拟参用西法,树艺五谷、果蔬、棉麻等项,将未经垦熟之地先行试办,如有实效,再行推广等语。学堂、农会相辅而行,洵为一举两得之道。该学政此奏,具见筹画精详,留心时务。即着照所议认真办理,务收实效,毋托空言。^②

光绪帝赞扬瞿鸿禨此奏“筹画精详,留心时务”,并命瞿“认真办理,务收实效”。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4—275页。

^② 朱寿朋纂:《光绪朝东华录》,第4188—4189页。

于是，瞿鸿禨“认真办理”自己提出而由皇帝恩准的两件事：一是将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一个设在县城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恐怕在当时绝无仅有；二是将南菁沙田参用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方法进行改造。

但此时南菁沙田的管理也存在隐患。开始由郑惇五、陈美棠董理沙田事，后辞职，“由学使委员管理，后归川沙厅以专责成”。^①其中费学曾也主持过一段时间，戊戌年正月间，费念慈还陪侍其父到江阴来会晤瞿鸿禨，谈沙田事。^②费后来又写信告知缪荃孙：“院中沙田，为委员串同围田之人舞弊，（郭委员尤劣。）鱼肉沙民，至聚众滋闹，竟为所持，遂败坏至不可收拾。子久亦以为忧，而多疑偏听，虽殷殷见访，弟实不便过问，所恐日久整顿愈难，未免可惜耳。”^③估计正是因为学使委员与围田之人内外勾结，共同舞弊，所以后来才会将管理沙田之事委托给川沙官府，以专责成。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动摇瞿改造沙田的决心。

然而，瞿鸿禨对此两事虽确实“认真办理”，却无一点“实效”，因光绪帝关于南菁谕旨下达不过十日，慈禧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寿终正寝。南菁高等学堂徒存学堂其名，而无学堂之实，一切都恢复书院之旧。瞿鸿禨对南菁的改革也就此结束。其实，严格地讲，也谈不上什么恢复旧制，因为瞿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对书院的旧制进行过改革，至于要办什么农学的宏谋远图，此时更是烟消云散。

南菁课生吴增元在其《八十回忆录中》中指出：“瞿奏请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校，并无改定计划，投机取巧，而校中亦徒有其名，毫无实益，使人心浮动而已。”^④“投机取巧”如指瞿讨好朝廷，容或有之。因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臣子本分。但说他“并无改定计划”，恐怕不是事实。

另一名南菁课生殷葆诚则追忆当年事：“戊戌，三十七岁，……吾苏学政瞿鸿禨乘时而起，得风气之先，仿经济特科分类命题，集卷甄别。余亦投卷应课，取列全案十一名。南菁书院复有改为学堂之议，购机器，聘教师，如火如荼，兴高采烈。……腊月中，得府门斗信，知明年由瞿学政调入南菁。”^⑤殷于次年（1899）来南菁，不禁

① 《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书院》。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三十二通，“顷晤子久前辈”，“侍随侍家严来此谈沙田事，月底方回。”末署“正月廿四日，江阴舟中。”《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85页。案：此信当写于戊戌年（1898），两个多月后，费学曾即去世，见缪荃孙：《直隶清河道费公墓志铭》：“光绪廿四年四月十三日卒。”《艺风堂文集》卷一。

③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一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4—375页。

④ 吴增元：《八十回忆录》，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93年10月。

⑤ 殷葆诚：《追忆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1999年。以下引文出处同。

感慨道：“自去秋八月以后，变法之说大为政府所厌闻，瞿宗师尤工于揣摩者也。书院不改，而机件则弃置闲房；八股复兴，而康梁则斥为邪说。”可见，瞿当初是“购机器，聘教师”，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至于隔年后，殷所见到的“机件弃置闲屋，八股复兴”等景象，是瞿也未曾预料到的。^①

就这样，瞿鸿禛在戊戌年将书院改为学堂的最终结果，也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虽有学堂之名，仍留书院之实。

第二节 南菁书院再次奏改高等学堂

一 李殿林奏改“南菁书院”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

瞿鸿禛以詹事府詹事督江苏学政，任内升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第三年即庚子年(1900)，瞿鸿禛自述：“庚子九月初一日，以礼部右侍郎在江苏学政任内被命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甫十日，擢工部尚书，召赴行在。”^②瞿鸿禛离任，接替他的是李殿林。

李殿林(1843—1917)，字荫墀，号竹斋，山西大同人。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历经升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以吏部左侍郎出任江苏学政。

经庚子国变，清政府与入侵的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皇朝，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推行所谓的“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诏，又一次命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等“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再发上谕开设各级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④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901年12月5日)，又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各级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各等资格。^⑤礼部在一次奏折中，还表示了对各省大僚执行谕旨不力的担忧：“迄今

① 案：殷因被瞿怀疑岁试有枪替之嫌，而被逐出南菁，故对瞿有怨言。事见《追忆录》己亥年(1899)。

② 瞿鸿禛：《恩遇记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697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己卯上谕。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719—4720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乙未上谕。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787—4788页，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丁巳上谕。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数月，除升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开办山东学堂章程奏到外，其余各省均尚未奏复。”

李殿林为表示紧跟朝廷的改革步伐，急忙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902年1月17日）上奏《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拟章程》：

臣查江苏书院在江宁、苏州两省城者，已有督、抚臣分别改办。惟江阴南菁书院，自前学臣黄体芳创设后，以经古专课通省士子，通才硕学多出其中。院中事宜归学臣管理。光绪二十四年诏改书院为学堂，经前学臣瞿鸿禨奏，以南菁虽隶县治，而入院肄业者为通省人才所萃，请照省会书院之例作为高等学堂，当邀恩准。今又迭承明训，改定教规，自应照省设大学堂章程办理。臣惟山东章程，学生分斋督课，其次第则先办备斋、正斋，后办专斋，此自为风气未开，宜循序渐进起见。江苏为人文渊藪，年来讲求中西实学颇不乏人。即南菁诸生平日所肄习者，如经史、政治、舆地、天算、格致各学，皆门径已通，可期深造。若非径立专斋，俾资精进，恐无以鼓舞高材及时奋勉之心。臣谨拟专斋、正斋、备斋同时并立章程，于明年正月先行试办，由臣延请在籍绅士之学通中西、士林翕服者为总教习，又分延天算、格致、测算、东文、西文各艺学教习，俾得陶成多士，启迪新机，以仰副皇上求治作人之至意。至办事支销，系就书院原有经费酌为区画，未能添筹。计开办事宜如改造学堂、加建号舍、添置图书仪器等项，费用已属不支，故额设学生止限百人之数，只可将来再议扩充，合并声明。所有江苏南菁书院遵改学堂谨拟试办章程开具清单恭呈御览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着照所请办理，务期认真考核，期收实效。单并发。欽此。

谨拟江苏南菁书院遵改学堂试办章程十条恭呈御览：

一、恭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旨：“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等因，欽此。”查南菁为江苏全省经古书院，建设以来，各府举贡生监皆入肄业。特因事归学政管理，是以黉舍建于江阴，原为通省士子肄业之地。院生执业素尊，英才斯萃，每届优拔之科率取诸此。光绪二十四年诏行新政，经前学臣瞿鸿禨奏准改为高等学堂。今更钦奉明谕改定章程，请得比照省设学堂，定名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以崇规划。

一、查政务处颁定各省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内开大学堂课程，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项。今按备斋者，即各州县小学堂应办之初级浅近学；正斋者，即各

府直隶州中学堂应办之普通学；惟专斋肄习专门之学，参酌中外学制，分为十门，实为大学堂应办之主义。又章程第一章内开“现中小学堂未设，大学堂无所取材，当先立备斋，次立正斋，俟各府州县学堂有成，再立专斋”等语，专斋之设，须俟正斋学生毕业之年，现时未能即办。窃惟苏省风气早开，南菁尤为通省人才所聚，年来讲求有用之学，如专斋所隶之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测绘以及农工商矿之类，诸生平日本事考求，允宜即立专斋，俾资精进。至诸生普通艺学各门，多有未备，今拟变通补习，并日程功，期以四年，普通、专门同时毕业，以速成就而备任使。专斋课程列后。

一、省学堂募考学生，本属权宜办理，今南菁为改设事归学政管理，应由学政调取原在院之肄业生及各学之高等学生百人充各斋学生。嗣后学生缺额，仍由学政于各学调取。其举人贡监愿入肄业者，由各该县具文申送，准其附课，俟及三月，由总教习核定去留。如其文学较优者，遇有额出，即补入班次。

一、正、备斋学目悉照颁定章程，其专斋学目原定十科，今开伊始，先立经、史、政治、测绘四科，余分年次第兴办。

一、聘请总教习一人，艺学分教习天算学、图绘、格致学、东文、西学各一人，将来农、工、商、矿各学添立专科，随时添请各学教习。

一、调取学生百人到堂，由总教习先课三月，再由学政亲加考验，明定班次，以经史、政治、艺学有门径者为专斋学生，其次者为正斋学生，余皆为备斋学生，各给膏火有差。

一、诸生课程曰日记，曰月记，曰勤业，总教习与艺学各教习司之。及半年，总教习察诸生之勤惰及科第之高下，用积分升舍法，各班递升，以资诱掖。其有学业不进者，核分数以退其班次，有不率教者斥去之。凡升、退、斥、去者，由总教习书其状以闻于学政，岁终仍总记诸生班次、进退之数，簿而呈之学政，以备考核。

一、学堂旧有藏书楼一所，兹将旧度新购各图籍编刻书目，俾诸生检用，仪器并附。

一、届专斋、正斋四年毕业之期，由总教习考察诸生学业，遵取合格者，以专门学已深而普通学兼备者为专斋毕业生，以普通学完全而勤习专门者为正斋毕业生，出具切实考语以达于学政，学政亲考验之，各发给毕业学生凭照，余

仍肄业。至备斋学生毕业，升入正斋，即照颁定章程办理。

一、学堂经始责掌之事，权限宜明。学政有管理学堂之责，凡延请总教习，选派提调、经理各职事，调取学生及学生毕业亲加考验之事，皆学政主之。总教习有管理学务之责，凡定立课程、添置图书仪器、延请分教习、稽考学生德业、分别班次、出具学生毕业考语，总教习主之。学堂经费收支归董事经理。至于稽查银钱出入、管理一切堂务、督率司事及执役人等，皆提调主之。

附课程：

经学：小学、理学附。《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右十三经分七类，诸生各就夙究心者择一类精研之，日有所心得记于册，月终考之，必期年而后可更其所治之类。愿温故仍习旧类者听之。月课一艺，以验其益否。小学为治经必由之径，理学则士人检身不可须臾离者，诸生研经之暇，随时讨论，有心得并记于册。

史学：舆地学附。史之类三：曰历代史鉴，曰国朝掌故，曰各国史志。舆地类二：曰中朝舆地，曰五洲形势。以上两门学均繁重，通贯为难，诸生先各即一类精治之，一类竟，再治一类，必半年而后可更其所治之类。日记、月课如治经。

政学：农学、商学、工学、矿业附。政之类七：曰吏政，国家官制及各国官制之属；曰户政，国家岁用出入、丁赋漕粮、监课商税、圉法邮政、俸饷仓储、蠲贷荒政及各国财政之属，农事如种植、垦荒、渔牧、蚕桑及各国商政之属；曰礼政，国家典礼、贡举、学校及各国选举教育之法；曰兵政，国家海防边防、水陆兵制、餉需军械、营规操演、炮台城守、保甲民团及各国兵政之属；曰刑政，国家律例及各国刑律之属；曰工政，国家河防海塘、直省水利、船政铁路、机器制造及各国工政之属，工学、艺学附此门；曰外交政，国家与各国交涉，如互市分界、传教、通使、游历，一切国际公法私法及各国交涉之属。右中外政治七类，诸生先即一类精治之，各类繁简不同，不定期限，然必一类竟，再治一类，始免浅尝躁率之讥。日记、月课如治经。农工商矿本列专门，第须考验实事方臻精诣，诸生有志各学者，故就前贤论及肄之，为将来专门之学预备。

艺学：体操附。艺之类五：曰算学，天文学附；曰测绘学；曰格致学，凡重学、化学、磁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水学、地质学、生物学全体之属皆是；曰译学，外国语言文字；曰体操学。右天算门在各国学校为普通学，诸生素通习

者益精治之，亦日课礼记，月课一艺，以时考验，其不能者补习之。测绘门在各国学校亦普通学，于兵学、舆地学尤关切要，须补习，诸生算术素精者尤宜勤肄，以成专门之用。格致学在各国学校亦普通学，精治之，日记、月课如天算，不能者补习之。任习外国一国语言文字，在各国学校亦普通学，今立东文、西文二科，随诸生择便补习。柔软体操在各国学校亦普通学，为人卫生要义，须补习。以上补习详细课程，由总教习会同艺学教习随时商定。

奉硃批：览。钦此。^①

李殿林的奏折称三年前即光绪二十四年，南菁书院已由前学臣瞿鸿禨奏改高等学堂，现参考山东大学堂章程，是先办备斋、正斋，后办专斋。然而对于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江苏来说，南菁高等学堂完全可以直接办专斋，李提出“专斋、正斋、备斋同时并立章程”。

李殿林拟定学堂十条章程，第一条就定南菁学堂名称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

第二条规定，南菁应以专斋（肄习专门之学）“为大学堂应办之主义”，四年毕业。这与书院不限定课生在院肄业（学术研究）时间，完全不同。

第三条规定，“应由学政调取原在院之肄业生及各学之高等学生百人充各斋学生，嗣后，学生缺额，仍由学政于各学调取。”又第六条也说“调取学生百人到堂”，则学生进学堂，是由学政“调取”，而不是书院时期主要是靠学政在每年正月通过“甄别”考试，这不由不令人怀疑学堂选择学生的公正公平。

第五条规定，学堂设总教习一人，相当于原先主持院务的书院院长，但下面分设各学科，均聘请专任分教习，而第十条又规定，由总教习延请分教习，似扩大了书院时期院长的职权。但又规定“学政有管理学堂之责，凡延请总教习，选派提调、经理各职事，调取学生及学生毕业亲加考验之事，皆学政主之”，与学政主政书院并无两样。学堂之提调，大概相当于书院之监院；而学堂之经理，也大概相当于书院之经董。

十条章程后，还附有学堂所设课程，有四大类：经学、史学、政学、艺学。与书院时代相比，史学类正式增加了各国史志与五洲形势等课程；政学类则有“外交政”课程出现，值得注意；艺学类最令人注目的是西方的测绘学、格致学（物理学、地质学、

^① 《御折汇存》光绪壬寅，卷二十二，第41—43页。

生物学)正式引入了学堂课程。

从李殿林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值得令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开设的课程虽然看上去五花八门,但经学总是首列。经学的研究,晚清已呈衰落之势,但在学堂中仍居所有课程中的老大。而西方科学技术类的课程,通通谓之艺学,叨陪末座。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反映。传统意义上的书院真要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学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中国学堂的课程中,出现了“邮政”、“各国刑律”、“国家与各国交涉”、“船政铁路、机器制造”、“一切国际公法私法”、“重学、化学、磁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水学”、“地质学、生物学”、“外国语言文学”等闻所未闻的新课程,南菁高等学堂将它们其中的一些科目列入课程表中,尽管是否真能付诸实施,也许连李殿林也从未去认真思考过,但叶落知秋,从南菁的转型,可以感觉到中国的教育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殿林上奏此折四个月后,因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李又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902年6月5日)上奏《开办学堂分类考课片》:

再,江阴旧有南菁书院,归学臣主政,为通省举贡生监肄业之所。上年遵奉谕旨,改为南菁高等学堂,谨拟试办章程十条,于十二月初八日恭折具奏。二十七日奉硃批:“着照所请办理,务须认真考核,期收实效。单并发。钦此。”臣即聘请在籍绅士之学通中西者为总教习,又分延天算、格致、测绘、东文、西文各艺学教习,于今年二月遵照章程开办学堂,分类考课。现在调取诸生来堂肄习及三月,臣复亲加考验,明定班次,额设课生一百名留堂肄业。臣仍责成各该教习切实督课,无令始勤终怠,庶得于诸生毕业之年,冀收实效,以副国家兴学育才之至意。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①

该壬寅奏片中提到:“聘请在籍绅士之学通中西者为总教习,又分延天算、格致、测绘、东文、西文各艺学教习。”但没有奏明所聘何人,实际上开始所聘总教习还是原来的南菁书院院长丁立钧。由于丁立钧的辛勤操劳,使南菁书院顺利渡过了它的转型时期。

此奏片没有提到南菁学堂所设课程,实际上,前一年(辛丑)十二月所奏的经学、史学、政学、艺学四类课程,当学堂开课时,经学、史学统归之于政学,仅存政学和艺学两类,且政学不局限于中学范围内,也涉及西方的政治、历史,这不能不说是

^① 《渝折汇存》,光绪壬寅四月,第五页。

一个进步。但学堂各方面大致上仍沿书院之旧,据有关校史资料记载:

当时学堂,设政科、艺科两种:政科分经学、掌故等门,为必修科,专记日记而无讲义;艺科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四门,为随意科,习否听便。又设英文、法文两门,亦许学生自行选择,既无一定教授时间,亦无一定教授范围。每月开课两次,优者给予奖金,大抵仍承书院之旧,但无外课生而已。

二十八年,始设体操科,习者甚少。又规定休沐日,除节日、大典日外每月逢十各停课一天。是年,因钦定学堂章程公布,李殿林乃将本学堂课程重行核定,分别补习中学堂应有之普通学科,规定上课时间:上午授东、西文,下午授算学、测绘;至于政科中之经、史、政学,但期温习而止。政、艺两科均列目有八,以伦理、经、史、诸子、词章、西文、算学七者为普通学,余为专门学。专斋三年毕业,正斋、备斋四年毕业,是为“高等学堂预科”。^①

对由书院课生转变为学堂学生来说,普通学中,除西文、算学,尤其是西文,恐怕要恶补一番之外,其余的均娴熟于心,不必花多少功夫。倒是那专门学科,要搞得学生焦头烂额了。

二 丁立钧由南菁书院院长改为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

(一) 丁立钧主讲南菁书院和刊刻《南菁文钞三集》

丁立钧于光绪二十四年被瞿鸿禨聘主南菁讲席。瞿之聘丁,固然由于丁之品声望足以膺南菁山长之选,但恐怕两人同属意维新,意气相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惺惺相惜也。丁就任南菁书院院长之职后,瞿对丁十分信任,丁立钧的堂侄丁传靖回忆南菁往事:“时瞿止龢尚书任江苏学政,院中事一惟公言是从”。^②而丁立钧也不负学使重托,以病残之躯,继黄以周后主讲南菁三年多,为院中事务呕心沥血,创获良多。其堂弟丁立棠说起兄长的这段经历,是动了真情的:“澄江书院多东南俊髦,君诱掖奖励,语以通变有用之学,每论及中外近十年大事,泪辄涔涔下,多士感奋。”^③丁传靖也说其叔父“主南菁讲席,多士望若山斗。提奖所及,士为起舞”。^④南

① 1935年,孙揆均长南菁中学时所编《南菁略史(自清光绪八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之(二)“学校过渡时代”。案:学堂规定每月有休沐日,似刘奉璋总教习于光绪二十九年才实行,见下节程宏远日记所载。

② 丁传靖:《补记衡斋公轶事》,载《丁氏族谱》,镇江绍宗楼藏。由柳书斌先生提供。

③ 丁立棠:《第二十七世叔衡公事略》,载《丁氏族谱》。

④ 丁传靖:《补记衡斋公轶事》,载《丁氏族谱》。丁传靖时随其叔父肄业南菁书院,时间虽不长,但因是亲见亲闻,故真实可信。

菁课生仰若泰山北斗，足见丁在院中威望之高。

戊戌政变时，波及南菁，官府欲捕南菁课生，被瞿鸿禨拒绝。^①丁立钧应该在其中也起了作用，因为院中之事，瞿鸿禨“一惟公言是从”。

丁立钧继承了南菁书院刻书的优良传统，于辛丑年（1901）十月，收集遴选了书院这一时期课生的优秀课作，刊刻成《南菁文钞三集》。这距黄以周于甲午年（1894）主持刊刻《南菁文钞二集》，已有七年的时间了。丁立钧为《三集》写《序言》：

光绪辛丑十月，选刻南菁课文，此三刻矣。自乙未至戊戌四年，课作散失无存者。乃遵取己亥迄今，得文共百六十首，立钧为之编次，一循前刻义例，而篇数倍之。又所为文多指陈世务，辞气激宕，视前刻稍不侔。意言者，心声，文章之事关世变之迁流欤？虽然，何其速也。世运之隆也，其文多高简，又音节和雅可诵；及既衰，每辞繁数而意危苦，有历历不爽者。然南菁文之初刻也，岁己丑，距今十二年。再刻，岁甲午，距今七年。不应先后歧异若此。噫！此不能无怵于世变之既亟矣。

大凡运回既至，捷如风雨，盛夏之时，郁蒸兼旬不可耐，忽一夕风雨大至，走雷电，飞沙石，震荡万物，动心怵目，瞬息之顷，而气候顿异。夫戊戌以前，盛夏之郁蒸也，虽有忧时之士，不得不息机观变，自率其悠游泮涣之素。及是大风雨作矣，人世动心怵目之事日相逼而至，虽忘情者不能屏闻见以逍遥事物之外，又何疑夫兹文之异昔乎？

庚子教哄，仓卒变生，朝野震荡，不遑宁处。独簧序之子弦歌如故，漠然是非，理乱之无与焉，此亦事之至不顺者也。抑又论之，人世是非理乱之故，本至难言。草野之夫抒所闻见，冀一效其款款之愚者，大都意有所激，未必尽中事理。然蒙以为削之不若存之，何也？人子于父母之疾，无不愿得良药以疗之，然三世之医不可得，则虽告有良药，终亦迟回疑虑，而莫敢以轻试，及疾之既亟，则不暇顾矣，故慎药，孝也。然疾既亟，则皇皇焉博求方药，以冀夫疗之或得一当，又人子之至情，不得苛其鹜乱者也，是在主方药者之善别择而已。且天下无不药即已之疾，而疾甚又无必效之药，故草野谈治之言，其繁数而危苦

① 《钱自俨忆南菁书院生活》，钱自俨口述，吴新萃整理，钱“又谈及瞿学台曾保护课生，批掉苏州府送来拟逮捕因为响应戊戌维新课生的案卷”。载《江苏省南菁中学百年校庆专刊》1982年。按：钱自俨误，应是钱自严，名崇威。

者，与过而削之，不若过而存之，亦曰庶几得一当耳。乡校之议，舆人之诵，或亦当世采风君子所勿罪欤？

斯役也，刻三月而毕工。任校勘者，阳湖陈佩实、太仓陆炳章、通州达李、无锡蔡文森、娄县张葆元、元和孙春雷、常熟蒋元庆、东台杨冰。其乙未迄戊戌散失之文，属江阴王家枚求之，俟补刊。丹徒丁立钧。

这部《南菁文钞三集》与前两集相比，最大的不同处，便是“所为文多指陈世务，辞气激宕”。除了书院式传统经史课作外，还出现了如《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东三省疆界变迁考》、《论普法之战》等所谓“指陈世务”的作品。

据丁立钧《序》中所说，乙未（1895年）至戊戌（1898年）的四年课卷已散失无存，不知是什么原因，是黄以周年老体衰，无暇顾及，还是因学政龙湛霖（甲午至丁酉在任）正有意引进西学，而忽略了经古课作的收集？不可考矣。丁立钧命书院高材生江阴王家枚搜求这四年的课卷，可谓是托付得人，然而终未有成，为南菁书院留下遗憾。

（二）丁立钧改任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

丁立钧刻竣《南菁文钞三集》两个月后，李殿林便奏准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丁立钧便由院长改称为总教习。李殿林奏折中所说的学堂章程，有些是表面文章，真的实行起来确实有困难。这学堂的实际情况，从《江阴县续志》所载，可以略窥一二：

（光绪）二十六年，李殿林继任，是时学堂风气大开，李乃奏请实行高等学堂章程。额设学生百名，即以课生充之。堂内设政、艺两科，以总教习主管教务，别延分教席数人。学生分专斋头班、二班，正斋头班、二班及备斋五班。用积分法升斋。及《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始将课程重行核定，分别补习中学堂应有之普通学。政、艺两科列目各八，以伦理、经、史、诸子、词章、西文、算学七者为普通学，余为专门学。专斋三年毕业，正斋、备斋四年毕业。^①

学堂中的学生大都就是原来的书院课生，共一百名。共分五个班：专斋有头班、二班两个班，正斋也有头班、二班两个班，还有备斋一个班。这五个班的所有教务有总教习丁立钧管理。共有十六个课程，其中“伦理、经、史、诸子、词章、西文、算学”七个课目为普通学（中学堂的基础课目），其余的九个课目作为大学堂的专门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城内学堂》。

课目。

由于学堂斋数和学生学习科目的增多,所延请的分教习必然也会增多,总教习的工作当然比以前书院时期的院长更为繁杂和沉重,丁立钧这位南菁学堂的第一位总教习也是南菁书院的最后一位院长,为南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辛丑,大同李公改办学堂,君办任其事,外而章程,内而学课,具不肯为苟同苟异。复博访当时通人硕儒,有一说善于己者,从之如流,故南菁学堂之规则经年而后定焉。”^①可见,这南菁学堂的规则,是由丁立钧采纳众议,亲手制定的。丁拖着病残之躯,殚心竭虑地操持着学堂内里外外的具体事务,最后“心力交瘁,病益剧”,终于支持不住,“于壬寅七月,卒于东台旅舍”。

(三) 沈曾植与丁立钧讨论南菁学堂事

如前所述,改办学堂时,丁立钧便“博访当时通人硕儒”,沈曾植就是很为丁立钧重视的一位通人硕儒。辛丑年(1901),丁与沈时有信函往来。沈给丁的一封复信中说道:“承询学堂意见云云,此事植在昔年为先觉,而在今日为背时。”所谓“背时”,是沈曾植一直认为“设学堂不必改书院,讲西学不必废时文,两利并存,和辑之术在调停”,而“此论在秣陵大为时流诟病”。^②

对南菁学堂所设普通学的学习,沈曾植在另一信中提出建议:“普通中文课文可用者尽多,如算学则《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测绘则《绘地法原》;化学则《鉴原三编》;格致则《格物入门》;天文则《天文揭要》;理财(东译称经济学)则《富国策》;诸形量法则《算式集要》;地理则《地理志略》。以东文译本校之,大致不殊。于其中择取数门,诸生各自认定,分年学习,而延一普通诸学指授之,(狄考文学生,多能教普通。)自习于私室,讲解于课堂。诸生皆逾弱冠,不可复以教小儿之法教之,不易课读为自习,终无见成效之日也。”沈还特别提醒:“南菁以经义自存,尤不可不遵明诏,置《三通》于不问,诸生或治学堂课,或治科举业可矣。若普通学,弃中文而任习东、西,异日纠葛必多,不可不熟思审计也。”^③沈认为,南菁之所以为南菁,就是它一直以“经义”相授受的经古书院,即便改为学堂,传统的学问也不能丢弃。至于普通学课本,现有的中文译本足够用了,不必要让学生直接学习西

① 丁立棠:《第二十七世叔衡公事略》,《丁氏族谱》,镇江绍宗楼藏。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第二十二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页。

③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第四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137页。案:此信写于辛丑年十一月初八日。

文、日文去读原本,否则以后会带来麻烦。^①

沈曾植本有机会,且也愿意来江阴接替丁立钧主讲南菁,可惜沈与南菁有缘无分。要是当时张謇辞退江宁之文正书院教席获准,丁立钧即赶赴南京接替张謇接任文正书院讲席,那么,沈曾植就会来江阴主讲南菁书院了。沈曾植于辛丑三月初七日在上海与丁立钧书:“今日即作信寄通,告以弟不复北行,决就澄江之说。第总须李公关聘来时,乃能料理吾二人交代之事。”又说“孝章招弟至此,闻将以梅生遗席相属,此非所能胜。若挂名一席,使弟可自澄遥领,则愚计最便者,第恐非彼所愿”。^②沈曾植告诉丁立钧,他已写信通知通州张謇,自己不准备北上京师,而愿就江阴南菁院长一职。但必须要等李殿林学政的聘书到来,才能与丁立钧履行交替手续。而这时盛宣怀招沈曾植至上海,可能要他接替刚去世的何嗣焜的南洋公学总理一职。沈曾植觉得自己最好能主讲江阴的南菁书院,如要挂名“南洋”,也可在江阴“遥领”,只是盛宣怀要不惬意了。沈曾植之所以称南洋“遗席”“非所能胜”,非不能也,实不愿也。

然而,天不作美,因张謇辞文正书院教席未成,丁立钧也就无法离开南菁,沈曾植无奈只能就上海南洋公学经理一职。但后来当他听到丁有辞南菁之意,即于四月十一日写信劝阻:“鄙于沪上勉借枝栖,请公于澄江亦勿遽去之脱屣,万一改学堂,犹望公为经学留一隅之地。总之,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算学、化学、理财学、兵学、教育学、政治学,译本精深,尽有过于学堂西文之本。由此成学者,于通译即为见短,于治榘实甚见优。将来学堂储备人才,期以任内政,非皆以任翻译也,何所为而废本国文字,强学他国文字乎?日本学堂专以译本为课程,西语西文别为专门之学;埃及则专以各国语言文字教,一兴一亡,断可识矣。千万留意,千万留意。”^③从日后书院改学堂时确无聘请西语洋教习来看,丁立钧基本上都采

① 案:沈曾植重视学生读中文译本,反对读西文、日文的原因,可见《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第二十二封,云:“凡国所已立于天地间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伦理三也。……必无偏仓、许之人,然轻译本而重欧文,则文字之根抵摇;……日本学堂以本国文字为课本,埃及学堂以欧洲文字为课本,日以学堂兴,埃以学堂亡。”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146—147页。又,信中之“偏”,疑是“偏”字之误。

②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第十一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140页。案:试对该信略作诠释:“寄通”,寄通州张謇。“澄江”,江阴之别称;“就澄江”,就江阴南菁书院院长一职。“李公”,江苏学政李殿林也。“孝章”,疑指创办上海南洋公学者之盛宣怀,东汉末年,孔融有《论盛孝章书》。“梅生”,何嗣焜,南洋公学首任总理(校长)。

③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第六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138页。

纳了沈曾植的意见。

(四) 蒋维乔回忆南菁学堂

关于南菁学堂,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学生回忆录中,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蒋维乔自订《年谱》中说:

公元一九〇二,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三十岁。

去秋,本已接受陈氏之聘,今年仍馆徐墅。嗣闻南菁书院有改为江南全省高等学堂消息,盖八国联军之役^①以后,清廷亦知兴学之不容缓,明令各省设学。南菁书院丁山长叔衡(立钧)得风气之先,乃有改设学堂之计划。余积年有志研求科学,未得机会,今闻此事,以为断断勿可错过。但对于陈氏,十分抱歉,遂请人代馆,而于正月束装赴江阴。是时学堂正在筹备,教习亦未聘定。余在堂中,仍按照昔年方法,读《史记》、《方輿纪要》诸书。

.....

当时改书院为学堂,政府既无颁定之章程,各省办学皆以意为之。如南菁学堂所定之课程,极为幼稚。主事者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旧观念,以为经史、政治、掌故、輿地等专门学问,院中肄业生早已具备,只需补习西国之普通学耳。故所设科目为理化、测绘、东文、西文、体操五门,均须上堂听讲。此外旧有之经史、輿地、算学等,均自行研究,按日作札记。

堂中肄业诸生,皆是秀才或举人,年最少者,亦在二十以上,故多反对上堂听讲者。遂分新旧两派:新派以余及常熟丁芝荪(祖荫)、无锡顾述之(倬)、黄芝年(以仁)为首领;旧派以武进孟苑孙(森)、梅今裴(调鼎)为首领。新派主张上课,旧派主张不上课,丁总教习(旧称山长,现改今称)则左袒新派。卒至孟、梅二人无形中取消学籍,中途出堂。

学堂至二月内方筹备就绪,聘定理化、东文、西文教员各一人,测绘兼体操教员一人,其中惟理化教员钟宪鸞(观光)先生学行均优,最得学子信仰。

三月初开课,五门科目,由各生自行认定,有仅认一门者,有认二门、三门者,惟余最勇猛,五门科目悉认之,对于理化尤感兴趣。体操则系湖北武备学堂之兵式柔软操,有盘杠超跃诸技,余之技冠于同侪,惟东西文兼习,年龄已长,脑力不敷,顾此失彼,殊为非计。余之习西文,此为第二次。

^① 按:“八国联军之役”,原为“拳乱”,谱主手稿自改。

钟师于授课之暇，恒贯输国家思想，暗示革命意义。余之思想乃为之剧变，遂与黄芝年从事鼓吹革命，对于科举极端鄙视，即旧日研求之学问，亦根本动摇。（手批之《史记》、《方輿纪要》等书，亦因之中止。）有志赴日本留学，以经济所限，终不能如愿也。^①

书院时期，课生都是独自研究，请教山长。改成学堂，学生当然要进课堂听教习讲课，但当时“学生之笃旧者犹反对”。蒋维乔是属于“锐意革新，主张上堂听讲”的学生，^②而后来成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的孟森，就是当时竭力反对上堂听讲的一人。孟森“辛丑进南菁书院肄业，及壬寅，南菁改为高等学堂，森仍以顽固自负，阴结年长学生多人，反对上课。丁叔衡山长为之不悦，意欲去之。森闻之，先辞职而出”。^③

一九〇二年，孟森辞别南菁书院，也就意味着南菁从此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告别了书院时代，开始向学校时代过渡。

第三节 李殿林、唐景崇相继主政南菁高等学堂

一 丁立钧、丁立瀛、刘奉璋应李殿林之聘相继出任总教习

（一）丁氏兄弟讲学南菁

如前所述，丁立钧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瞿鸿禨聘请，出任南菁书院院长。两年后，李殿林将书院改学堂时，仍聘丁立钧任学堂总教习。一年后，丁立钧因病辞职，由其胞兄丁立瀛继任南菁总教习。而丁立钧终因病重不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卒于东台寓所。丁立钧生平事迹见下第八章第一节。

丁立瀛（1844—1907），“字丽生，绍周长子，同治辛未进士，授职编修，改官御史。遇事力持大体，不切切于讥弹，清操平易，刻苦自甘。与从兄立幹、季弟立钧同居清要，门望甲于一邑。寻转给事中，擢顺天府丞。光绪己亥春，以足疾请开缺回籍。庚子，两宫西狩，立瀛闻而痛哭，以足疾不克赴难，引为大戚。丁未夏，卒于家，

①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手稿，上海图书馆藏。

② 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卞孝萱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9页。

③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常州旅沪同乡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初版。

年六十有四。(节家传)”^①丁立瀛、立钧与其父丁绍周一律，均是翰林出身，故兄弟相替出任南菁学堂总教习，不会招来多少非议。

丁立钧的一位堂兄丁立中，也曾批阅过南菁诸生的算学试卷。丁立中(1837—1914)，“字礼民，镇江丹徒人，工诗善弈，尤精算学。……二十年擢江宁府教授，兼主南菁书院算学讲席。”^②所谓“兼主南菁书院算学讲席”云云，大概是指丁立中身在江宁，而“遥领”江阴的南菁。

(二) 刘奉璋继任南菁总教习

丁立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任南菁总教习，不会满一年。明年(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刘奉璋接任南菁总教习。刘奉璋，字志宜，号我山，宝应人，著名学者刘台拱之曾孙。刘奉璋十多年前曾肄业南菁书院(见学友名录光绪十一年)，现来就南菁学堂总教习，正所谓“前度刘郎今又来”，只是身份变了，由原来的书院课生成了如今的学堂总教习。

刘总教习对南菁还是很有感情的，上任仅两月，他就发帖称：

鄙人虽到堂以来为日未久，而中怀坦白，立志坚贞，亦以从前肄业，同是学生，曾受瑞安、定海两夫子培植。堂中济济多士，半多同砚之交。至于英俊少年，亦是我同乡中后来之秀，颇愿互相砥砺，文字订交。他年出为名臣，楹建大业，鄙人亦与有荣施焉。^③

对昔年黄体芳和黄以周两位夫子的栽培之情仍念念不忘。

刘奉璋确实也很关心南菁学生，来校仅半月，便发出字谕两张，一是劝诫学生注意摄身，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贪多务得；一是规定休沐日期。两谕全录如下：

其一曰：本堂译学，备东、西两文，听诸君自择。诚欲采异域之擅长，补中学所未备，有志之士，亦既欣然从事。抑鄙人犹有一言与诸君商者：则以深造必先自得，循序乃能升阶。葛、裘不同时而袭，甘、辛不并口而尝也。盖洋文最重音读，文隔东西，音读自尔迥异，若不专精一途，有类齐楚之傅。况学问无穷，精神有限，今诸君子于中学、算学既万不可缓，而又兼两国文字，篝灯破晓，大有妨于摄生。即如京师大学堂考选通才，收录之后，意在兼堂，然必须一国卒業之后，再及其他。且非独洋文然也，算术、测绘、理化三项亦然，算术有门径，

①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十二上《人物二》。

②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十九《名宦传》。

③ 程宏远：《宝视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1953年家印本。

而后可学测绘、理化。鄙人于诸君向学之殷，亦既无任欣佩，而其中层累，容或有未能晓然者，用特表而出之，尚希垂亮。

其二曰：古人为学，兼重息游。各处学堂，例准休沐。诸君勤奋可嘉，反休息无期，殊非爱育之道。今遵钦定章程，明示停课日期，俾习传循诵之余，收泮涣悠游之益。即自四月初十为始，以后一律照行，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二仲释菜日、端阳、中秋节，每月逢十，小建则二十九，各休息一日。届时或澄心默坐，静摄精神；或游目骋怀，就近闲步。慎毋宴乐迭游，群聚嬉谑，是为至要。^①

刘奉璋出身经学世家，学养深厚，主讲南菁经史，自然驾轻就熟。然而，学堂的管理比书院时期要复杂得多，学生时起风潮，使得刘奉璋疲于应付而萌生退意。刘在南菁恐怕也未满一年。时在校学习的程宏远，曾有关于刘总教习遭受学生言辞侮辱之事的记载：某次考课，“‘义夏里留’、‘意大利伽离’本是一人，译音稍异，某君误认为两人。总教未曾检点，信手加圈，列于超等。狂妄者益加抨击，将卷任意涂污，并贴匿名对于总教会客之处，文曰：‘人可化身，世无好眼。’跋尾语更不逊：‘韩文公有言，诸生业患不能精，毋患有司之不明。’”程宏远感叹道：“朋友之间，尚宜以仁恕相待，况同列于门墙，仰承乐育，竟藐视师长，为此无理无法之事，世风不古，士风亦复如是，可胜慨哉！”^②这种情况在书院时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

（三）程宏远癸卯日记中的南菁学堂

无锡程宏远于光绪二十八、九年在南菁学堂仅肄业一年，但程勤奋异常，逐日记下了癸卯年数月的学堂生活，现摘录几段：

光绪廿九年癸卯三月廿四日晨起，温西文，上堂授课，毕。刘总教自宝应来，乘桥入室，诸生依次进谒，用红禀帖，旁书“受业程宏远，字瑞生，年二十七岁，无锡县附生”十八字，一叩首，一揖。教习答叩首，答揖，以宾主礼命坐，问何日到此，现在何字号，平日尚用功，家居是否授徒教语，寒暄毕，辞出，已午饭矣。下午算学，上堂演习两点钟，并借阅《新世界学报》，藉增加知识。

廿五日，雨，晨起，食朝粥毕，带笔砚上堂，教习南面坐，将题纸发出，共六题。政学题二……，艺学题四……。照抄一纸，领卷毕，各归号构思，教习亦退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1953年家印本。

②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入内院。依学堂章程，宜在堂面试，因诸生共觉不便，此例遂不能行。

(四月)初四日，……堂中定例，凡诸生课卷经总教习评定之后，聚订数本，供人流览，以昭公允，俟下期课卷评定之后，再将前卷散给。……阅诸卷毕，又同湛如步观各号舍，回廊曲折，花木扶疏，颇饶胜致。到堂以来，日被功课迫促，刻无稍暇，今日始前后曲折，一一走到，可免升堂而不入室之讥。……

(四月)十五日，因钦定学堂章程有每月朔望教习率诸生上堂宣讲圣谕一条，今日始遵章举行。晨起后，设公案于讲堂，教习东乡立，诸生依次排立于下，讲者南向，据案宣讲，其人姓缪，名承金，字丽生，江宁府六合县人。^①

除了学生要上堂受课(上午英文，下午算学)外，大致情形似与书院无甚两样：学生初见总教习，仍行跪拜礼；学堂考试，依学堂章程，本应“在堂面试”，却“因诸生共觉不便，此例遂不能行”，诸生“领卷毕，各归号构思，教习亦退入内院”，这与书院时期课生在斋自习答卷的情形完全相同。可见，此时的南菁，还完全谈不上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李殿林主政期间，只是南菁由书院向学堂过渡的时期。

二 唐景崇主政南菁学堂

李殿林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离任，继李来督江苏学政者是唐景崇。唐的生平，参见第八章第二节。唐来江阴，南菁已由书院转型为学堂了，唐在任上，对学堂事宜不断加以完善。

(一) 端方的支持

时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端方，给予南菁高等学堂一定的支持。他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上奏朝廷《南菁书院改学堂片》：

再查江苏学政向驻江阴县治，前学臣黄体芳于县境创设南菁书院，实为通省士子讲肄经古之区，英才多萃其中。光绪二十四年，诏改书院为学堂，升任学臣瞿鸿禨奏将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嗣前学臣李殿林奏明拟章试办，兹经现任学臣唐景崇遵照上年奏定章程，详加筹划，认真厘订，除总教习外，增设监督，添请理化、舆地、英文、体操诸分教，于政科、艺科，或研求专门，或补习普通学。臣唐景崇于堂内学制课程务求完备，锐志图成。惟每年进款不满一万五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

千串，所短经费甚巨，而讲堂斋舍，原就书院改设，未尽合度，亦尚无力扩充修改，自应筹拨的款接济，俾学臣唐景崇得资展布，藉以宏造真材。臣等现飭于苏州鼓铸铜元盈余项下，自明年正月，每月拨银一千两，作为南菁高等学堂常经费，以资应用。除咨户部、学务大臣查照外，谨合词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①

按此奏片，可以看到，唐景崇遵照李殿林奏定章程，又“详加筹划，认真厘订”，增设“监督”一职，添请理化、舆地、英文、体操诸分教。更重要的是，端方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自三十一年（1905）正月，每月拨银一千两，作为南菁高等学堂常经费，以资应用，这对南菁无疑是雪中送炭。

（二）聘请宋育仁、金鉞任南菁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冬，唐景崇接替李殿林出任江苏学政。唐“按照通行章程，更定职名，始设监督、教务长、庶务长等职，学科未备者，添设教员。每月朔望，增设会讲，由总教习同监督、教员，集诸生于讲堂会讲”。^②至是，南菁算是正式进入学堂时代。

时刘奉璋亦已辞去南菁教席，宋育仁继任总教习，后又聘请金鉞出任监督。宋育仁后亦任监督一职。总教席一职后被撤销。^③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进士。十七年（1891）充广西乡试副考官。甲午（1894）以翰林院检讨出任使英、法、义、比参赞官，著有《采风记》。返国后，被荐举回四川兴办实业，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创办《蜀学报》。光绪三十年（1904），应江苏学政唐景崇之聘，任南菁总教习、监督。宣统年间，曾入直隶总督杨士骧幕，名重一时。又任礼学馆纂修。入民国，携家遁入茅山道观。民初，主张清室复辟。后应其师王闿运之邀，任国史馆纂修。不久，返乡主讲成都国学院。总纂《四川通志》。见者称其“身材短小，貌特清癯，高髻危髻，若有道者焉”。^④宋学问淹博，经术湛深，泛滥词林，著作宏富，有《闻琴阁丛书》等存世。

金鉞（1869—1950），字式金，号蘅意，泰兴人。在南菁书院肄业时，与吴稚晖等

① 《端忠敏公奏稿》卷四，第519—520页。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南菁高等文科第一类学校》。

③ 案：此据《江阴县续志》说。至于宋育仁何时担任南菁总教习，唐景崇设南菁学堂监督是在何时，宋亦曾任南菁监督，是在金鉞之前，还是之后，监督、总教习并存局面有多长时间，均尚有待考证。

④ 参见萧月高：《宋芸子先生传》，汪兆铭辑：《碑传集三编》卷三十五。

同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金任南菁学堂监督。生平简况,参见本书下编之《学友录》光绪十六年。

(三) 唐景崇主持第一次预科毕业考试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自改办学堂后”至此“已满四年”,唐景崇于该年四月亲临学堂,举行第一次预科毕业考试。考试结果,预科毕业生共四十九名,“最优等十三名,优等三十名,中等六名。毕业后留堂入本科者二十七名”。^①

据学堂高材生无锡陈作霖回忆:

壬寅(1902),余二十二岁,清帝诏废八股,以策论试士。余赴澄,应科试,列第一,遂食饩,并由李宗师殿林调入江阴南菁高等学校肄业。时清廷锐意革新,南菁故为书院,向有江苏督学使者兼管,所聘山长均系一时知名之士,以故大江南北文人学者均以得调入南菁肄业为求学之阶梯。在院诸生对于国学皆有根柢,吾邑如吴稚晖、孙寒厓、廉南湖、俞仲还诸先生均系南菁书院优秀分子。是年,该院奉令改为学校,扩充学额,添设英文、算术、格致等科。^②……

丙午(1906),二十六岁,唐宗师景崇到校举行毕业考试。试毕,取列最优等者共四名:第一为江都叶君惟善号貽谷,第二为丹徒叶君玉森号荭渔,之二人者,苏人士所称“南菁二叶”是也。第三为盐城李君稟良,号守彝。第四即余。二叶旋由清廷奖给拔贡,余与李君因学年不足,改奖优贡。

陈记“最优等”名额仅四名,与《江阴县续志》所载有十三名不同,大概得到清廷给予“贡生”奖励的只有四名,故陈认为最优等者也就只四名。

第四节 南菁改办高等文科学堂

一 学政裁撤与提学使司的设立

(一) 提学使司衙署迁往苏州

唐景崇主持南菁高等学堂第一次预科毕业考试时,清廷下旨裁撤各直省学政,代之以提学使。唐景崇回京销差。两者比较,提学使是一新设之官缺,为督、抚属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南菁高等文科第一类学校》。

^② 《陈作霖自述》,见《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无锡图书馆藏。

下,在布政使之下,按察使之上;而学政乃皇帝之钦差,是差而非缺,然与督、抚平起平坐。提学使的地位远不如学政。

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建立,以后一直由江苏学政主持大政;而在全省众多的书院中,江苏学政也只对南菁书院负责。所以南菁书院之所以能超越江苏其他书院而独占鳌头,在行政上全由于是江苏学政的关系。如今新设的江苏提学使,权势无法与学政比,而且提学使要管理全省的学堂,南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南菁的先天优势已荡然无存。如果江苏提学使司署再离开江阴的话,这对南菁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江阴士绅希望提学使司衙署仍留在江阴。

原南菁书院高材生江阴王家枚,草拟了一封写给京中江阴籍的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的信,希望他能与朝廷政要疏通,为江阴留住提学使司。信中所陈述的几点理由,第一便是要考虑南菁的前途:

今则江阴为长江门户,东南数省之屏障,尤宜设重臣以镇抚之。近者朝旨以兴学为务,改江苏学政为提学司,其驻节之所,或仍在江阴,或改驻省垣,皆不可知。窃为驻节江阴有数利焉,敢为阁下牘陈之。自瑞安黄侍郎创建南菁书院,长沙王祭酒、茂名杨侍郎继之,人文甲于他省。近改为高等学堂,英才辈出,群务为有用之学,其所以争自濯磨,蔚为高材者,以学使者就近提倡之也。今学政既裁,而提学司驻节他所,势必力难兼顾,昔所经营而培植之者,后将难乎为继。是驻提学司于江阴,则南菁人才必能日盛一日。^①

然而,落花流水春去也,江阴士绅的努力,终无法挽回提学使司迁往苏州的厄运,南菁的前途实在堪忧。

(二) 周树模主持第二次预科毕业考试

首任江苏提学使是周树模。周树模(1860—1925),字少朴,号沈观,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五年(1899)进士,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随五大臣出洋考察。三十二年(1906)授江苏提学使。三十三年调任奉天左参赞。宣统元年(1909)实授黑龙江巡抚。入民国,两次出任平政院院长。有《沈观斋诗》、《谏垣奏稿》、《抚江奏稿》存世。^②

周树模任江苏提学使仅半年。当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授江苏提学使时,正在京师参与修订官制事务,直至该年十月才赴江苏。次年(1907)四月便又调

^① 王家枚:《拟与陈梦陶副宪书》,《重思斋遗著》,宣统元年刻本。

^② 左绍佐:《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黑龙江巡抚周公墓志》,卞孝萱:《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八。

任奉天左参赞，周在江苏仅半年时间。^①周抵苏两个月后，即赴江阴主持南菁高等学堂第二次预科毕业考试。此时，南菁学堂监督是金鉞。

关于此次试事花絮，原书院课生殷葆诚有记载。殷当时曾应南菁学堂监督金鉞之请，由两江总督端方指派，以提调名义亲临南菁参与监试，故记叙详尽，而当时学堂尴尬情形亦纤微毕现。殷说：

冬月，江阴南菁高等学堂因卒業考试，新旧学生各有主张，监督金衡挹太守无法调停，函请江督端午桥制军指派余为监试，以提调名义代为办理该校毕业。余与金君同为十数年前之住院同门。

余抵澄后，询悉该堂各种情况，并知经费久领未发，账房无一钱之存，且欠千余庄款，至厨房则尤可怜，不仅未领工资，并代欠煤米等项三百余两。近日诸债丛逼，大有停炊之势。又闻此届之考，苏提学周树模学使不日亲临，堂中毫无预备。询之会计能否设法，据云罗掘已穷。余问金君，更无办法。

后来，殷出面向江阴知县成功挪借二千金到手后，

当即付厨役阿二三百元（阿二乃二十年前之旧人也），交单一纸，令其代办，并告以余既来此，所有欠账当然代为清理，惟目前先还若干，买物若干，留待学使到堂备用云云。（阿二当日几欲因债自寻短见，因渠家口既众，毫无积蓄也。经余告诫后，知前欠不致无着，其一种感激涕零之状态，匪言可宣矣。）

周少朴提学来，仅有随从三人。（一巡捕，二跟丁。）仪表极佳，语言亦妙。（余曾言其不日封疆。）余与金君进入客堂，茶后告知，带有二批经费六千余金在船。（学堂经费向由藩司发给，自周到任后，统拨给学使主管。本堂莫名其妙，仍向司库具领，以致期期脱空，办事人信息不灵一至如此。）着人往领云云。阖校闻之，眉飞色舞。

连日监同考试，场规甚肃，而特注重于枪替。竣事，已嘉平月望矣。^②

周树模于试事竣后，曾写《腊月十五日至江阴南菁学堂考验学生》一诗记叙此事：

① 周离开江苏时，巡抚陈夔龙赠诗送别，周作《丁未四月奉命摄奉天左参赞，中丞陈公枉诗赠行，次韵奉酬》：“棋局长安耳惯闻，难将遗策叩元君。琴弦敢道更张易，车辙今看径路分。私喜兰陵称祭酒，无端莲幕要参军。吴人攀手公投辖，所愧昌黎不武文。”诗后加注：“予提学江苏甫六月，苏人倦倦请留，中丞电商，枢部不允。”周树模：《沈观斋诗》，宣统二年石印本。案：周在江苏任职六月，于丁未四月离苏，故可推测来苏应是丙午十月。

② 殷葆诚：《追忆录》，记“丙午，四十六岁”事。

士多如鲫校如林，入冶谁为百炼金。定有光辉生凤羽，须将格磔化鴉音。
救时难托空文见，临老惟余劝学心。独上君山（在江阴城北）舒远眺，大江东去
日西沈。^①

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二次毕业，“计六十七名，最优等四名，优等十四名，中等二十四名，下等十五名，最下等十名”。^②

（三）毛庆蕃、樊恭煦相继任江苏提学使

毛庆蕃（1849—1927），字伯宣，一字德华，号实君，江西丰城县人，出生长成于四川。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官户部，迁道员，授湖北荆宜施道、永定河道、天津道，署直隶按察使。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江苏提学使，“乃严束诸生，有过失，坐堂皇戒斥之”。^③“与吴中柄学务者异趣，类訾其顽固。”^④毛任江苏提学使约一年有余。毛庆蕃信奉太谷学派，在苏州，折节师事黄葆年。宣统元年（1909），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后以“阻挠新政”落职，寄寓苏州，民国16年卒。著《江苏学务公牍》、《古文学馀》、《奏议》等。

樊恭煦（1843—？），字园孙，号介轩，浙江仁和县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⑤同治十年（1871）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光绪五年（1879）任陕西学政。十四年任广东学政。三十四年（1908）八月任江苏提学使，直至清亡，约三年。

在毛、樊任内，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改为南菁高等文科学堂。

二 南菁改办高等文科学堂

（一）南菁高等文科学堂

南菁高等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月分别由学政唐景崇、提学使周树模主持一、二两次预科毕业考试后，各界对南菁学堂的前途，议论纷纷，有说改为农校的，有说改为师范学堂的，还有说改为女子学堂的。

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听从江苏教育会（会长张謇）的提议，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将南菁改为高等文科学堂，然后停学两年，期间不再招生，可以节省开支，

① 周树模：《沈观斋诗》，宣统二年石印本。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

③ 叶玉麟：《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行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三，第659—660页。

④ 陈三立：《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散原精舍文集》卷十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4页。

⑤ 樊恭煦生年，据其同治壬戌（1862）恩科顺天乡试硃卷，然硃卷官年，不一定可信。

买地造屋，扩充规模，这恐怕也是前任周树模的意见。至宣统二年（1910）南菁高等文科学堂正式开办，却因各府中学堂毕业生太少，南菁只得先从文科中学办起，准备五年后再办高等。然而，一年后清皇朝灭亡，南菁文科高等学堂无形中也夭折了。

《江阴县续志》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提学使从江苏省教育会之议，停办原设之高等预科，节减岁出，拟办高等文科第一类之学堂。三十四年，拨到水师守备署一方，仓街一条。又购入校东民业基六亩二分八厘一毫七丝五忽九微，为建筑新校舍之用。又购陈姓旧屋七楹，度藏书板。宣统元年七月，新校舍落成，计新式楼房两进，共三十二楹；走廊五十六丈。改建厨房七楹，川堂十一楹，厕所十楹。

当时筹备宪政，督抚议省城高等学堂改办第二、第三类，其第一类专归南菁办理。庚戌，奏准开办。以中学堂毕业生无多，难合高等资格，议先从文科中学办起，年设一级，五年后，再办高等。

三年辛亥，武汉事起，江苏旋亦响应，地方多事，学堂停办。^①

又据1935年所编《南菁略史》称，南菁高等文科学堂时期，建筑新校舍，“支建筑费漕平银一万零一百五十二两有奇”。又称：“始终其事者，为庶务长章琴若先生；而包工建筑者，则为川沙杨先生斯盛（创办浦东中学者）。”

当光绪三十三年决定南菁改办高等文科时，江苏教育会还致信原书院时期高材生陈庆年，希望他出来主持南菁文科高等学校事：

敬启者：南菁校事腾口舌者屡矣。上年曾据情白督抚帅及两提学：琴瑟不调，改弦而更张之，宜也。南菁旧日学生，国文尚不失为优美。自滥竽者多，国文且不可恃，遑论其他？故欲保全南菁优美之性质，则莫如因势而利导之，改建文科高等之议，盖有所不得已也。少朴（案：周树模）学使去腊考验毕，周视学舍，拟量改其不中度者，并谋为完备之组织，暂停一学期，经之营之，用意良苦。文科高等大纲有二：曰修明中籍，以包国粹；曰贯通西文，以吸欧化。年长者，则收储译籍，以补智力之所不及。今之学者厌故而喜新，舍本而逐末。人亦有言，以语言文字灭人国者其法为最新，其祸亦最速。今外侮侵寻，若不以祖国之文字为主位，恐我所学者，浸成奴隶之质料，供彼族指使之用，而日虞不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

给，弊弊然不可言矣。惟南菁学校既经此次之更张，毖后惩前，待人而理。周询于众，金谓非公周克胜任。公槃才硕学，出所蕴蓄，固知别有发抒，或不肯屑屑以一校自局。然斯文有将坠之惧，载胥及溺，其何能淑？文科高等得公而振挈之，则所淑不已多耶？拳拳之意，盖非仅为南菁一校言。吾乡子弟方将恃此文科为鲁壁丝竹之遗，以留貽一线，是此邦之愿望于公者甚奢，公之责负亦无可委。先介一书，以为之赞，幸垂许焉。惟察不尽。^①

信中提到学者要以“祖国之文字为主位”，如果语言文字灭，国亦亡，所以，南菁改办高等文科，亦时势之必然，不得已也。又说明南菁文科大纲有二：“曰修明中籍，以包国粹；曰贯通西文，以吸欧化。”虽强调“国粹”，也重视“欧化”，说明江苏教育会的态度还是很开明的。

陈庆年未曾回母校主持南菁高等文科学堂事，实际主持南菁校务者为江阴章际治。章际治，字琴若，光绪八年举人，南菁书院最早入院的课生，二十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生平简介见本书下编第九章《学友录》光绪九年。

当宣统元年(1909)南菁高等文科学堂新校舍即将落成之际，两江总督端方于该年五月上奏《文科高等学堂立案折》：

奏为江阴南菁学堂改设文科高等学堂，谨将大概办法，恳恩敕部立案，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准学部咨开，据江苏教育总会函称，南菁高等学堂程度既不符合，改为优级师范，于苏省情形、经费、地势均不相宜，仍请改办文科高等，请飭司就近考查详细情形，酌拟办法等情，当经飭据前江苏提学司毛庆蕃详称遵往江阴详加履勘，并集深通中西教育员绅，一再筹议，金谓宁、苏省会早设师范，各府、直隶州亦多分设，目前办法，仍拟设文科高等，其学科遵照奏定章程，高等学堂第一类课程，法文、德文暂请缓设，军政学一门，则陆军已有专门学堂，毋庸兼设学科，既稍有减省，所习各科必可深造详请核办等情，具详前来。臣查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学部头等咨议官张謇等，原拟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改设文科高等学堂办法，系依据高等学校第一类并文科大学之主要科目参酌配置，以“保存国粹，并沟通中西文学途径，养成完全文学家，发挥各科学之蕴，俾国学日有进步”为宗旨，实能洞明学理，造就通才。据开科目名

① 陈登丰：《横山人年谱》。案：据信中“少朴学使去腊考验毕”云云，则该信应写于光绪三十三年。编者定为后一年1908年，似不妥。

额、班次，及招录生徒，添修校舍各事宜，亦均条理秩然，可资采用。现在京师开办分科大学，文科高等即为升入文科大学之预备，亟应厘定名目，次第图成，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江阴南菁学堂改设文科高等学堂，敕部立案，实于国学前途大有裨益。除将开办事宜及预算不敷经费飭司妥为筹办，及咨部查照外，谨会同江苏巡抚臣瑞澂，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①

关于筹备中的高等文科学堂的经费，《江阴县续志·学校》亦有记载：

学堂经费，就书院旧管款产支充，原有沙田租及存典生息钱二万千文，又停办高等预科二年，节减岁出，遂克供改办文科添筑校舍之用。（沙田围岸内外曰“挂脚田”，向不纳租。光绪三十一年，丈查清晰，一律缴租，其额照正田六折计算，计增出挂脚田五千余亩。又，接涨沙滩归本堂承报，唐学使分咨督、抚、藩立案，札飭川沙厅照办。宣统元年，有人占买老猪沙涨地，提学使樊恭煦力主注销，发还原价，苏抚程德全有“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之批。惟鼎丰沙被人占去，因其报买在唐学使示禁之前。）

官方似无拨款支助，经费全由南菁自筹。辛亥革命起，南菁高等文科学堂仅成雏形，就中途夭折了。

（二）改为存古学堂的设想

早在江苏学政唐景崇、提学使毛庆蕃任内，就已有江苏士绅倡议，为保存国粹，应如张之洞将湖北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那样，也将南菁书院改为存古学堂。江苏巡抚陈启泰于光宣之际复缪荃孙信：

南菁卓论亹亹，深切著明，实获我心。实君亦颇有此意，憎兹多口，未欲先发，得公一倡言之，足为吾道增剧援矣。介轩、竹石均有同心，示以尊缄，极为钦赞，并乞我公草创一大致章程见教，商定再告。甸帅当亦无不乐从，经费少绌亦不足虑，竹石可任之也。将来主席，计亦非我公莫属。宁苏兼顾，不妨斗南一人，自无多让，容再续商一切。^②

信中所谓“宁苏兼顾，不妨斗南一人”，是因缪当时正主江南高等学堂（原南京钟山书院）讲席，而陈启泰还想要缪兼主南菁。至于缪荃孙的设想到底是想把南菁改为高等文科，还是改为存古，此信看不出来，但从以下樊增祥与缪荃孙的信中，可

^① 《端忠敏公奏稿》卷15，第1839—1842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

^② 《艺风堂友朋书札》第54页。案：实君，毛庆蕃；介轩，樊恭煦，两人前后任江苏提学使。竹石，朱之榛，署江苏按察使、布政使。甸帅，端方，时任两江总督。

略知一二。

江宁布政使樊增祥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复缪荃孙一信中说：

……自学堂改章，科学既繁，又限于钟点，将来经学词章，恐无复专门名家者。惟公硕果不食，灵光岿然，中学一线之延，舍公奚属。来教以为于官于绅，议皆不合，然维新时代，正赖旧人维持其间，乃能融化党偏，保存国粹。……馆侍年愚弟增祥顿首。闰四月廿五。^①

可见，当年士绅大都以“旧人”自居，深忧“将来经学词章，恐无复专门名家者”。为“保存国粹”，舍“存古学堂”莫属。

樊在另一封信中则说：

昨书来，适赴咨议局，旋在节楼夜坐，致稽答复，歉歉。细读清折所开，拟改南菁为存古学堂，适与侍心相印。在都时早蓄此志，到宁未暇及此。一日午帅忽言，我决不效冰相开存古学堂，侍遂嘿然。此事稍缓，必力图之。此为中学专科，不当孱入西文、西语，既费重金以聘西师，又与本旨相戾，断不必也。……^②

据樊增祥信中说，端方不肯学张之洞那样办存古学堂，这说明端方与缪、樊诸人办学宗旨有异。缪、樊认为文科高等学堂“为中学专科，不当孱入西文、西语”，况且“既费重金以聘西师”，也与原来所定不聘洋人的宗旨相违。但端方则要求学堂既“保存国粹”，又“沟通中西”，这与江苏教育会提出“修明中籍，以包国粹；贯通西文，以吸欧化”说法相同，缪欲改南菁为存古学堂的设想自然也就没了下落。

第五节 南菁书院之流风余韵

一 京师大学堂与无锡国专

南菁书院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这些高材生日后都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尤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他们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很大。

（一）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

十九世纪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充任京师大学堂教

^① 樊致缪信第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10页。案：此信当写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该年闰四月。

^② 樊致缪信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11页。案：午帅，两江总督端方。冰相，张之洞。

习的,就有不少是从南菁书院走出去的。

章际治,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即充京师大学堂教习。

刘可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管学大臣孙家鼐推荐,任大学堂文科教习。一年后,义和团起,刘可毅称“吾目中不能容此等人也”,于五月十五在大学堂例行谒拜孔圣时,“大言之,面颊发赤,气益盛,语亦益急。”五日后遂遇害。^①刘任教京师大学堂较早,但时间也较短,仅一年便惨遭横祸。

杨模,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京师大学堂历史兼地理教习,时间不长,即返乡办学。

顾栋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国文教习。两年后,调学部,参与制定各级学堂章程。

丁福保,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李希圣的推荐,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丁福保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兼生理卫生学教习,三十一年(1905)离职,约两年多。

汪荣宝,光绪三十年(1904)起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史学讲习,为诸生讲授近现代历史,诸生皆服其淹博。汪讲课时自编讲义,后勒成《清史讲义》一书。

胡玉缙,光绪末年,以张之洞荐,任京师大学堂文科讲席,授周礼学。民国,仍任北京大学教员。

孙雄,光绪末年,张之洞管京师大学堂,奏派为文科大学监督。

白作霖,光绪末年,离开上海澄衷学堂,北上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

关于南菁书院高材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情况,胡玉缙写有《京师大学堂教事录》记录甚详,藏有胡氏手稿的王欣夫介绍该书内容,称:

(当时京师大学堂)于经科设《毛诗》、《周礼》、《左传》三门,绥之先生以南皮张之洞荐,任《周礼学》教员,此为其掌教时之纪录。《周礼》门学生共二十二人,皆举、贡出身。而最著名者,为浙江象山陈焯。焯原名汉章,字倬云,光绪丁未改名,字伯弢,时年四十七岁,盖弱于先生仅六岁,而膺戊子乡举,早于先生辛卯且三岁。师弟之不拘资格如此,惟道存则师存也耳。

其课业章程,分句读与礼记二门。句读之书,别具目录,每日以十叶为度。礼记则包括钞录、参考、著述三类。每学期由教师收阅两次,并评定分数,再递

^① 刘树屏:《伯兄葆真家传》,《刘葆真太史遗集》卷下。

呈提调、监督、总监督阅看。于基本功夫之训练，执行颇严。

其检查学业之评语，及指示治学之方法，则于黑板揭示，剖析分明。名言如云：“慨自乾嘉而后，经学亦稍稍衰矣。讲理学者鄙训诂，侈大义者薄考据，不知经学诚非训诂考据所能尽，然不从训诂考据入手，譬诸闻异言而翻译无人，适他国而东西莫辨，夫岂足恃？且他经故勿论，即如《周礼》故书，二郑、杜子春异读，后郑从而或申或驳，岂非训诂考据乎？故理学家之弊，未免心思怕用。大义派之弊，遂致界说不清。”盖以汉学为宗，故于宋明之理学，当时廖平、康有为之今文学，皆所不满也。

诸生又各自述其治学经过并心得，而先生加以详评。其评陈焯云：“为作者计，除研究《周礼》外，既成书若干种，他日翻阅各书，有涉及者，即录于上，或另纸录出，积之愈多，则任我去取，以便修改。务使一书还一书之本义，融洽而又分明，则但见其精而无疑于杂矣。涉猎所及，一时或无暇录出，当记出某事，注明书名及卷数、页数，俟暇再录；即不录，亦一检即得，则但觉其便而无伤于骤矣。”言治学之法，著书者当奉为绳墨。

评刘复礼云：“六艺皆先王政教，固欲垂之万世，然时移世易，先王亦无如何，况更秦之荡然泮灭乎？玉缙亦最喜留心时事，但经义自经义，时事自时事，分别为之，较为两得。”盖若不善于古为今用，切不可泥古不化，亦足为后学之戒。

惟其教法之精严，故能人才辈出。若陈焯之著作等身，蔚为通儒，可谓不负先生之谆谆矣。他如《左传》门知名者有山阳顾震福、武陵余嘉锡，亦皆富于著述行世云。^①

如同胡玉缙一样，南菁诸生在京师大学堂讲授经学时，繁征博引，凡引用老师黄以周的话，则不敢称名，而省称“师说”。陈汉章从胡玉缙读《礼书通故》时，曾说：“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讲经皆宗是书，称曰‘黄教谕说’而不名者也。”^②徽季学派至清末民初，竟在京师大学堂尚有一脉相承也。

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执掌教鞭的南菁学者也有不少，如田其田、孟森、夏仁虎等，在学术界都颇有声望，尤其是孟森的明清史研究，至今，也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那时，学术界的争论，已不纠缠于什么汉学、宋学，今文、古文，而主要是新学与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辛壬稿》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3—594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第1121—1122页。

旧学的相与争锋了。旧学出生的孟森能在新学占主流的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如胡适所认为的，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自有其内在的科学因素的原因，孟森年轻时在南菁接受的学术训练，使得他在日后的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除北京大学外，教育界、学术界另一重镇东南大学，也能感受到南菁书院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菁后期课生蒋维乔出任校长数年，自开数门课程。章太炎弟子黄侃，似与南菁素无因缘，却对日本访问学者称，自己所从之学乃黄以周之学。^①

（二）无锡国专

无锡国专乃唐文治所创，二十多年中培养国学人才无数。据钱仲联讲，唐先生办国专，主要是借鉴了他的母校南菁书院的方法。而其办学宗旨也与当初黄体芳创办南菁书院一样，希望能有曾文正、罗忠节等经世人才应时而出。（可参见下编第八章《唐文治传》。）唐文治开办国专之初，便请南菁挚友陈庆年主讲，陈复书：“吾病矣，不能行，我设传经堂，子辟国学馆，从此终隐可矣。”^②陈虽因病而终未能赴锡讲授“国学”，然南菁“传经”之初衷，丝毫未变，且至老弥笃。国专开办初期，教员仅寥寥数人，唐自己得亲自授课，校中事务大都由总干事陆曾业分担，“缔造艰辛，倚畀益重”，而陆曾业与唐既是同乡，又是南菁同学。后来担任教员的吴县单镇则既是昔日商部同僚，又是南菁校友。

无锡国专后期学生冯其庸回忆母校：“我上无锡国专第二年时，就在《大锡报上》发表习作《澄江八日记》，调查明末江阴抗清斗争的遗迹。”^③这与王绍曾先生的回忆可相应征：“吾师唐文治肄业于南菁书院，每于无锡国专讲授诸葛武侯《出师表》时，辄举阎典史三十字联，以勸勉诸生。时隔七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王与同乡薛仲良信中语。）阎典史，即领导江阴百姓抗清八十一天之阎应元，《江阴县志》有传，传中载有其就义时所书三十字联。在无锡国专，时可感受到江阴南菁书院的影响。

二 南菁书院同学聚会

民国后，南菁高等文科学堂已改为省立南菁学校。书院时代的老课生对母校

^①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95 页。

^② 唐文治：《陈君善馀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③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冯其庸《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 页。

仍充满深挚的感情,时有聚会,纪念母校。1935年,南菁中学校务主任孙振在编《历年学友录》时曾说:“南菁创立五十三年,学友达四千三百人,只因散处四方,鲜有联络,同学旧友,大半茫然。民国十年,唐蔚芝、章琴若、袁淑畬诸公倡议组织学友会,刊发缘起,分区调查,并借《南菁半月刊》以通声气,大为前辈诸公所赞许,先后来书,积之盈篋,惜因事阻,未获睹成。阅十年,张孝如、薛晓升诸先生继美前贤,续组南菁校友会,事前调查,既颇周详,届期亦已集会,不料又复因故中止,致五十年来,欲求一完备之学友录,竟不可得。”^①

民国十年(1921),唐文治就发起组织南菁学友会,时唐正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于无锡,江阴南菁与无锡国专,本一脉相承。然而,十多年过去,几经波折,学友会终未组成。但学校仍编印《南菁半月刊》,以通声气。学友之间亦时有小聚。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菁书院的老课生们曾在无锡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聚会。著名中医史专家陈邦彦回忆:“江苏南菁书院,设在江阴,前清的时候,曾一度改做南菁高等学堂。南菁书院产生的人才不少,很有许多革命的巨子,都产生在那书院里面的。民国十七年,有许多南菁书院的院友,假座江苏省立无锡中学开会,那出席的人都在六十岁以上,很少在六十岁以下的。据我所知道的,有吴稚晖、庄蕴宽、柳诒徵诸先生。他们开会谈到年老已经朽腐了,又谈到参加革命的往事,便拟出了四个字,叫做‘腐朽神奇’。那许多的老人,对于文化上贡献不少,所以南菁书院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也是值得人钦佩的。”^②陈邦彦与南菁素无渊源,他那时可能正执教于无锡中学,故十年以后,还能记得与会诸公。柳诒徵虽与南菁甚有渊源,却并非南菁出身,或许那时他是以南菁学校董事的身份,出席了聚会。

日据时期,一九四一年这一年内,南菁书院老校友在上海就聚会三次。吴县单镇在日记中记道:

民国三十年辛巳,六十六岁。一月一日,唐蔚芝、蒋竹庄、金松岑三君发起,召集旅沪南菁同学在绍耕庐聚餐,摄影。到者十一人,以齿为序:唐蔚芝七十六,朱香晚七十二,雷君曜七十一,吴汀鹭七十一,钱自严七十一,蔡松如六十九,金松岑六十八,蒋竹庄六十八,丁仲祐六十七,单束笙六十五,庄翔声六十二,合计七百六十岁(均按农历计算)。

① 孙振主编《南菁略史》所附《历年学友录》后的识语,南菁中学铅印本,1935年。

② 陈邦彦:《自勉斋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时隔半年，又相聚一次：

六月一日，南菁同学第二次在绍耕庐聚餐，旋赴福煦路周氏花园摄影，以农历计，唐蔚芝七十七，朱香晚七十三，吴汀鹭七十二，蔡松如七十，蒋竹庄六十九，季景范六十九，金松岑六十九，丁仲祐六十八，单束笙六十六，徐益修六十五，庄翔声六十三，仍十一人，合计七百六十一岁。每人叙述在院时事略一页，存查。

北平新出《中和杂志》第二卷第三期载赵剑秋先生所著《覃研斋师友小记》，叙述南菁源流颇详，余购存一册，以备浏览。

后相隔五月，又第三次聚会：

(十一月)十六日，南菁同学第三次在绍耕庐聚餐。朱香晚七十三(宜兴)，吴汀鹭七十二(江阴)，钱自严七十二(吴江)，蒋竹庄六十九(武进)，吴达成六十九(江阴)，金松岑六十九(吴江)，季景范六十九(盐城)，丁仲祐六十八(无锡)，单束笙六十六(吴县)，徐益修六十五(南通)，到者十人，合计六百九十二岁。蔚芝以感冒未到。^①



南菁书院旅沪同学第一次聚会

据单镇记载，首次在沪南菁同学聚餐，是由唐文治、蒋维乔、金松岑三人发起。

^①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三次聚餐均参与者有宜兴朱香晚、江阴吴增元、武进蒋维乔、吴江金松岑、无锡丁福保等。第一、二次聚餐后，还曾摄影留念。第二次还“每人叙述在院时《事略》一页，存查”。如今尚存第一次聚会时的照片，弥足珍贵。

在这帧南菁书院旅沪同学第一次聚会时所摄照片中，左下端有与会者题一识语：

此影摄于上海绍耕庐。

前行坐者：唐蔚芝，年七十六；左，雷君曜，年七十一。立者：右，朱香晚，七十二；左，丁仲祐，六十七。

后行自右而左：蔡松如，六十九；吴汀鹭，七十一；单束笙，六十五；金松岑，六十八；钱自严，七十一；蒋竹庄，六十八；庄翔声，六十二。

到会者本有十二人，惜吴达臣因事姗姗来迟，遍插茱萸，致少一人云。

唐文治与雷璠前排有座，大概是他们二人在聚会同学中肄业南菁最早的缘故，老学长了。年龄最长者为唐文治，最幼者为江阴庄庆祥（翔声），庄肄业南菁，已是学堂时期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吴稚晖与纽永建合影

三 校庆活动与老课生手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菁中学纪念校庆五十周年，盛况空前。五年后，抗战爆发，江阴沦陷，学校毁坏。二十八年（1939）一月，旅沪校友和教员，租赁上海跑马厅路绍耕里六号七层楼房一幢，成立南菁沪校。南菁校董会拨给开办费用近万元。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上海租界。为避日伪耳目，三十一年（1942）二

月七日，另觅静安寺路471号“怀久女中”原址，以“上海私立濑兰中学”名义，恢复上课。假名“濑兰”，乃纪念南菁创始人黄体芳也。该年十月二十七日，举行南菁六十周年校庆典礼。南菁书院在沪老校友纷纷题词祝贺，丁福保亲临讲演。学校后出《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唐文治亲题书名。

吴江金松岑有《濑兰中学六十周年》七古一首，追忆早年肄业南菁书院时情事，不胜留恋之慨，全录如下：

我初奉檄来南菁，执挺忝为门生长。诏书举行特科荐，论兵首蒙善化赏。追思瑞安开创日，三吴隽异多弘奖。我独耿介不迎时，心与古贤通肝鬲。人事低昂雅颂变，牛老垂胡驹骏奖。芭桑厄运岁周甲，数典还书瑞安榜。时危可仗须豪杰，梁栋材期百年养。几时重睹上庠开，坐待河清天地爽。

诗中，善化指瞿鸿禨，瑞安指黄体芳，“诏书举行特科荐，论兵首蒙善化赏”，均实录也。诗末“几时重睹上庠开，坐待河清天地爽”两句，亟盼抗战胜利的心情跃然纸上。



金松岑《濑兰中学六十周年》

江阴沙志衍亦作《南菁书院六十周年纪念感赋长句》一首，因沙氏父子兄弟三人均先后肄业南菁书院，故叙书院事更为详尽：

逊朝取士重八比，空疏贻诮文人耻。瑞安督学莅此郡，宏开讲舍崇经史。择地近临节署前，万千广厦连云起。规仿钟山与紫阳，董其事者峨嵋裔。堂斋四启各殊方，藏书楼峻中间峙。落成正当壬午年，宵雅肄三官其始。南方之学

得菁华，命名义取子言子。学兼汉宋溯渊源，郑朱并重双崇祀。掌教首推南江张，三礼精通定海黄。林缪陈丁先后聘，及门群彦尽汪洋。二十年称全盛，遗闻轶事熟能详。自从清季停科举，书院更新开学府。名称高等与专门，议置农科或存古。纷纭直至光宣交，始改中学规模具。继续光荣三十年，飘然作客来淞沪。厄运连遭变姓名，度词未免将人误。鹤筭于今六十春，折柬相招孰主宾？我欲陈辞申善颂，不禁回首感前尘。先君昔日黄门弟，兼知院事曹公继。酌剂盈虚莞度支，校刊经籍辨同异。旧业清厘积弊除，手书碑石沙田记。戊子登科始释肩，簿书一束犹藏度。我亦当年住院生，改制仍留学籍名。侍当瀛海归来日，忝拥皋比寻旧盟。后来子弟多从学，又是一重香火情。敢献新诗留后约，青春作伴启归程。^①

诗中提到“董其事者峨嵋裔”，是指曹佳，初建书院时，曹佳总董其事，其祖上曹禾，以馆选中博学鸿词科，为康熙朝著名诗人，著有《峨嵋集》。“先君昔日黄门弟，兼知院事曹公继”以下云云，乃指其父沙从心继曹佳为书院董事，为南菁经济、校勘经籍、书写碑记等尽心尽力。不过，诗中也流露出对变更校名，以致宾主换位的不满：“厄运连遭变姓名，度词未免将人误。鹤筭于今六十春，折柬相招孰主宾？”这也是江阴读书人对南菁书院特殊感情的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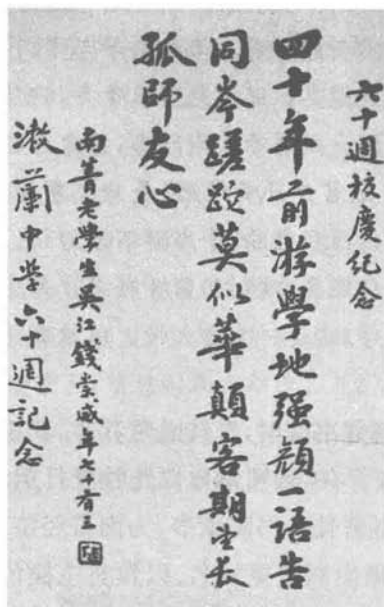
沙志衍《南菁书院六十周年纪念感赋长句》

吴江钱崇威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翰林，晚年寄寓海上，以卖字为生，因此墨迹流传，蜚声南北。郑逸梅称他“书法挺秀”，“却无馆阁气，于矩度中具有超逸神韵”。^②钱崇威亦有七绝一首，祝贺母校六十周年校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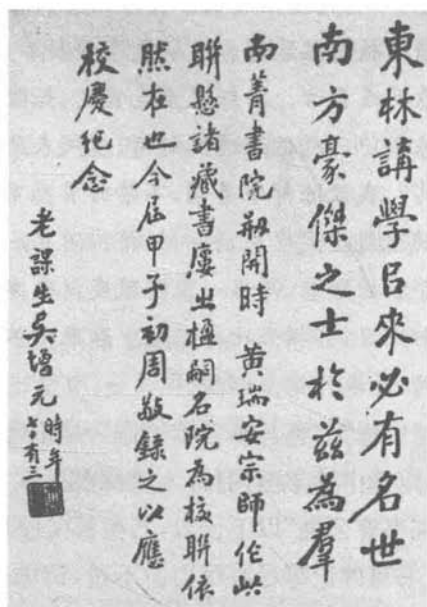
① 《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上海私立濂兰中小学印，1942年10月。

②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清代最后一个太史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780页。

四十年前游学地，强颜一语告同岑。蹉跎莫似华颠客，期望长孤师友心。



钱崇威校庆贺诗



吴增元题联

江阴吴增元则敬录昔日黄体芳创院时所题之联“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南方豪杰之士，于兹为群”，以应校庆纪念。他在联语后加一识语：“南菁书院创开时，黄瑞安宗师作此联悬诸藏书楼之榭。嗣名院为校，联依然在也。今届甲子初周，敬录之以应校庆纪念。”

吴增元于清末民初，弃儒从商，创办实业，名列江阴实业家之首，亦可算是“南方豪杰之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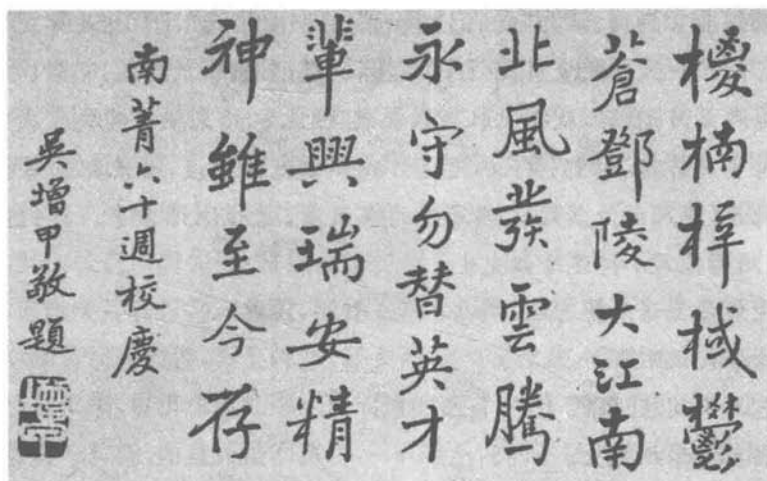
吴增元之弟吴增甲则题：“椶楠梓械，郁苍邓陵。大江南北，风发云腾。永守勿替，英才辈兴。瑞安精神，虽至今存。”

吴增甲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翰林，比钱崇威还早一科，自有资格称“椶楠梓械”，“英才辈兴”。

武进蒋维乔亦有题词：“化育菁莪。”

宜兴朱香晚则书“扶质立幹，垂条结繁”联语，自称：“漱兰中小学徵南菁六十年纪念辞，敬录当年精舍中署院之文，以颂教泽。”此联亦可补前述书院联语之遗。

蒋、朱两人在民国年间都曾执教高等学府，所题之词，确也贴切身份。



吴增甲题词



朱香晚书联



蒋维乔题词

四 胡适的最后一首旧体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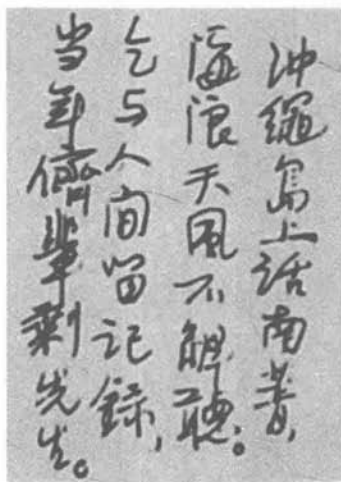
胡适年轻时与南菁书院很多老课生有过来往，对南菁书院很感兴趣，曾说：“南菁书院的历史，我屡次想搜辑，也时时向朋友说起。”后当他得到赵椿年的《覃研斋

师友小记》时，非常高兴，认为“此《记》中记南菁书院最详”，于1958年11月27日作了摘记。隔了一天，即11月29日的夜里，又补记道：

今年6月16日，我搭飞机从台北起飞，上机始见钮永建先生夫妇。在冲绳岛停半点钟，客人都得下机走走。我和钮先生闲谈，劝他把南菁生活记下来。他说，有人说他知道江苏革命的事最多，也劝他记出来。我们回到飞机上，我用铅笔写小诗递给钮先生：

冲绳岛上话南菁，
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
当年侪辈剩先生。

钮先生今年八十九岁了。他在海外看见我摘记的南菁史料，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①



胡适摘记

胡适要搜辑南菁书院的史料，最初的动机是跟研究《水经注》有关，因为众多的邨学专家中，慈溪林颐山曾在南菁讲过学。但胡适对书院的研究，则早就开始了。他于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一次“书院制史略”的演讲中，就这样说过：“一千多

^① 胡适：《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史料》，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十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277页。

年以来,书院实占教育上的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对书院制的完全废除,深感遗憾,因为“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接着,他举江阴的南菁书院为例:“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演讲将近结束时,又一次谈及南菁:“譬如南菁书院,其山长黄以周先生,常以八字告诫学生,即‘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因为研究学问,遇困难处若以调人自居,则必不肯虚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弃了。”^①

胡适对南菁情有独钟,直至晚年,还要赠诗与钮永建,希望他能将早年在南菁书院的生活写出来,可惜未能如愿。而胡适的这首诗,不想成了这位白话新诗开创者所写的最后一首诗,而且还是旧体诗,^②不能不说胡适还真与传承传统文化的南菁书院有缘。

① 胡适:《书院制史略》,《胡适文集》第十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3页。案:黄以周,原文作黄梨州,是当时的演讲记录者误记,径改。

②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中 编

南菁书院的治学

第五章 学使主政和院长主讲

第一节 学使主政

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八年(1882)创设,书院大政一直由历任学政牢牢控制在手。^①从黄体芳开始,至唐景崇为止,与书院有关的八位学政,依次为黄体芳、王先谦、杨颐、溥良、龙湛霖、瞿鸿禛、李殿林、唐景崇。他们大都是以侍郎衔提督江苏学政的,位高望重,所以,学政举手投足之间,直接影响着南菁书院和院中诸生的命运,所谓“东南行省,吴中最为大区;郡县诸生,督学乃其祭酒。”^②其中,黄体芳创建书院,王先谦倡导学术,与南菁关系最大。

南菁学人对晚清历任学政的评介,黄体芳、王先谦最高。陈玉树写给他学生的信中说:

……士子应试,多揣合考官之好尚;书贾鬻书,多揣合士人之好尚。市多经世之书,知考官必裕经济之学;市多训诂之书,知考官必长考据之学;市多制艺试帖,知考官必庸陋不学。值考试时,一入闱闈,观游闱闈,而考官之达与不达,可得十之七八,不待聆其言,观其所作也。

忆昔大江南北,城镇乡村之塾,案有《十三经注疏》,与马、班、范、陈之史,暨《东华录》、《经世文编》者,百无一二,书贾之架亦不多觐焉。自瑞安黄漱兰先生暨长沙王祭酒师,先后督学江苏,以经史掌故提倡多士,向之百无一二者,至是乃十有二三。阅者众,售者众,印者亦众,风气为之一变。

① 如前所引瞿鸿禛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奏折:“臣查江苏书院在江宁、苏州两省城者,均由督抚臣经理,惟江阴南菁书院系由前学臣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院中事宜专为学政主政。”

② 案:见朱铭盘代黄体芳所作《南菁书院记》(《桂之华轩文集》卷三),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全文有录。此处“祭酒”乃虚喻,不料下任学政真的是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真所谓一语成谶。

后之来者，学术不逮，风尚亦殊。书贾之舂载而舟运者，则高头讲章《味根录》、《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也。……^①

柳诒徵更说得直截了当：

光绪中江苏学政，以黄体芳、王先谦为称首，所甄拔多知名士。继之者杨颐、溥良，去黄、王远矣。^②

柳诒徵虽未曾肄业南菁，但其师长缪荃孙、陈庆年、茅谦均是南菁师生，且柳在民国年间又是南菁学校校董，与南菁甚有渊源，故柳的看法应有代表性。

但同为江苏学人称道的两位学政，黄体芳与王先谦的人才观似有不同。“以经史掌故提倡多士”，两人看法相同，然而，黄体芳建院初衷，是想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而王先谦则走上了纯学术研究的道路，关于此点，前已有事实罗列，不赘述。

江苏最末一位学政为唐景崇，唐在任时，南菁早已在前任学政李殿林手中完成了从书院转为高等学堂的过程，似唐与南菁书院无关。但此时在学堂中肄业的学生，有不少原就是书院的课生，故唐亦可说与书院有缘。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政裁撤，代之以提学使，地位降低，在布政使、按察使之间，均归督抚节制。至清亡，三任江苏提学使分别为周树模、毛庆蕃、樊恭煦。江苏提学使仅管理苏南学务，驻节苏州。^③诸位学政之生平概略及其在江苏任内行踪，简介如下。^④至于江苏提学使，督管苏南各地所有学堂，而不像前之江苏学政专管南菁书院，且其生平，前章已略有介绍，故此处不再涉及。

一 历任学使

黄体芳 光绪六年(1880)至十一年(1885)在任，创建南菁书院。

王先谦 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在任，开创南菁书院学术辉煌时期。刊刻《皇清经解续编》和《南菁书院丛书》。

杨颐 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七年(1891)在任，扩充南菁书院规模。

溥良 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十年(1894)在任，刊刻《南菁札记》。

龙湛霖 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三年(1897)在任，增加课生膏火，并提倡

① 陈玉树：《与张生延寿郁生馨山吴生绍祐书》，《后乐堂文钞续编》卷九。

② 柳诒徵：《记早年事·考秀才之难》，柳曾符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③ 案：苏北(还包括江宁)则由另设之江宁提学使管辖。

④ 亦可参见拙著《江阴明清学政》下编《江苏学政小传》。

新学。

瞿鸿禛 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二十六年(1900)在任,曾改书院为高等学堂。

李殿林 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在任,正式改办南菁高等学堂。

唐景崇 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在任,主持南菁高等学堂第一届预科毕业考试。

以上与南菁有关的历任学政之生平简介,见下编第八章《南菁书院名人传》。

二 聘请院长

清廷曾于光绪九年四月下旨：“嗣后书院院长，均着由地方官绅自行延访品学兼优之人，各该上司不准徇情压荐，以杜弊端。”^①南菁书院的延聘院长，始终由江苏学政一手揽办。因为当初黄体芳创设书院时的经费，全由江苏及外省各级官吏捐款所得，黄体芳说：“查此次起造书院及束脩膏火各项公费，系由本部院倡捐廉俸，并函请本省外省督抚提镇监司州县诸公捐廉所集。寸丝粒粟，未尝取之于民。盖恐此议一开，则士颂民诅，厥弊甚大，不得不豫为防范，以期久远遵行。”^②既然“寸丝粒粟，未尝取之于民”，那么地方士绅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涉南菁事务，包括聘请院长之事。

由于江苏学政几乎都是翰林出身，自身的学术修养一般都很高，因此，在延聘书院院长时，也都有较高的学术标准，大体都很谨慎从事，从而保证了能让一流的学者入院执掌教鞭。

当时著名的书院院长束脩丰厚，所以愿受聘或欲求此教职的，大有人在，甚至厚颜钻营也不乏其人，而主政者也有将此职位当作人情送与求托者的，正如叶德辉所讥讽的那样，“学堂讲席本极尊严，谋者乃以州县缺相当，与者亦以为人情物，大是可笑”。^③叶虽说的学堂，书院何尝不是如此。但南菁讲席的来路却甚正，江苏学政也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们可从当时不少学人给缪荃孙的书信中，约略窥见这一情况。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1523 页。

② 黄体芳《南菁书院头门勒石》，碑存。

③ 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第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 535 页。

王先谦函称：“决计于南菁增设一席，请弟主讲。”^①弟，指缪荃孙，王与缪有师弟之谊。时王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王离任后，仍关心南菁事，“又闻袖岑言，来岁讲席，已延定蓉生”，^②蓉生，朱一新。又说，南菁“若得蓉生接替，实为得人”。^③费念慈函称：“闻长沙师已拟延莼客。”^④莼客，李慈铭号。屠寄函称：“蓉生已就广雅一席，必不能来，阁下荐星海何如？”星海，梁鼎芬。^⑤张謇函称：“子培不可无馆，南菁尤为相宜。”^⑥子培，沈曾植。以上王先谦等人所推荐的缪荃孙、朱一新、李慈铭、沈曾植等人，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一流学者，除缪氏外，因种种原因均未能就南菁教习。但也于此可见，南菁书院在当时学人心目中的分量，山长一席，决非泛泛之辈就可以滥厕其间的。当时，沈曾植正面临着盛宣怀请他去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经理和张謇、丁立钧推荐他来江阴主持南菁书院讲席的两难局面，沈还是选择了南菁书院。虽然沈最终还是去了上海，但非其本愿，实是无奈之举。^⑦也许，在沈曾植的心中，有着研习经学传统的南菁书院，才是他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地方。

三 选拔课生

聘请院长固然是学政之事，选拔课生的权力也为学政所拥有。选拔的形式两种：一是甄别，二是调取。

（一）甄别

选拔在每年正月过了十五（元宵节），具体日期由学政决定，大约正月二十日前后。^⑧这时，大江南北人才汇集于江阴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亲自进行“甄别”，所谓“甄别”，就是入院考试。因南菁是一所“考课通省举贡生监”的书院，参加考试的，必须是已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如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如还没有考上生员（秀才），或不是江苏籍的，是没有资格进南菁书院住院肄业的。考试时间为两天，一天

①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6页。

②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四十四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0—31页。

③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四十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8页。

④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七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59页。

⑤ 屠寄致缪荃孙信，第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79页。

⑥ 张謇致缪荃孙信，第八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568页。

⑦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⑧ 黄体芳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与儿绍箕书》：“我二十五日出署。十八日南菁课经，二十日课古。”见俞天舒编：《黄体芳集》卷三《简牍》，第140页。又据殷葆诚《追忆录》：“庚寅，二十九岁。新正二十，赴城投考南菁。”

考经学，一天考古学。

太仓唐文治是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他于十一年(1885)应南菁书院甄别，中举已三年了，他回忆道：

甲申，二十岁。学政浙江瑞安黄漱兰师在江阴设立南菁书院，以朴学提倡多士。毕君枕梅(名光祖)为余报名，寄卷应试。

乙酉，二十一岁。春，偕毕君枕梅、张君拙嘉(名树葵)诸友同赴江阴南菁书院应试，取超等，住院肄业。谒见黄漱兰师，淳淳然训以有用之学，遂受业于院长黄元同先生之门。先生名以周，浙江定海人，为薇香太夫子之季子，东南经学大师也。……^①

毕枕梅可能是光绪十年甲申(1884)即已入院肄业，比唐早一年。唐文治对此有记载：

甲申，督学瑞安黄漱兰师创设南菁书院于江阴，君往试经学、古学，皆第一，瑞安师喜甚，曰：“大江南北，涉猎之学，当以此生为最，太仓毕氏有传人矣。”

逾年，余与君偕赴南菁试，余方潜研性理，君务博习多闻，人或相嘲以汉宋门户，不知余固祧许郑，君亦服程朱，相师而不相非也。^②

阳湖赵椿年亦于乙酉年甄别入院，他追忆往事：

书院首次甄别，以《南菁书院崇祀高密郑君、紫阳朱子栗主议》命题，因郑君、朱子抬头，写作两行，有误作两题者，传以为笑，惜未见其文，不知“南菁书院崇祀”一题，如何措词也。甄别经学首选，忘其为何人，古学题为《七洲洋赋》，刘葆真首列，其时尚名毓麟，后改可毅。^③

赵还称，他至晚年，“益吾师手评三次甄别卷亦尚存”。可见，甄别的试卷由学政亲自出题，且由学政亲自评阅。赵椿年在南菁肄业四年，晚年尚存王先谦手评三次甄别卷，因王在任三年(丙戌、丁亥、戊子)，每年一次甄别，共三次。而乙酉甄别，则还在黄体芳任内也。

江阴课生殷葆诚回忆庚寅年(1890)杨颐主持南菁甄别、开课时：

庚寅，廿九岁。新正二十，赴城投考南菁。案出，余在住院之列。(超、特

①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

② 唐文治：《毕君枕梅传》，《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七。所谓“太仓毕氏有传人矣”，因毕光祖乃毕沅之后。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刘葆真，武进人，赵之同乡。以下引文同。

等均可住院，月支膏火七千。一等为在院，只能应课。)心无他念，束装入城，与阳湖谢苑赋君为邻。外县之人纷纷到院。(此届两门所取住院共六十二人，百余名在院。)

那么，甄别试考生的成绩可分三等：超等、特等、一等。凡考超等、特等的可以住院，称住院生或内课生，每月领取膏火七千文。(之前，即黄体芳、王先谦主政时，课生膏火是五千文。四五年后，龙湛霖主政南菁时，增至十千文。)凡考一等的，为在院生，或称外课生，领不到膏火，但能应试月课，成绩优秀，与内课生一样，照例得奖金。庚寅年(1890)，南菁书院共取住院生六十二人，而在院生约是住院生的两倍。^①时学政为杨颐。

(二) 调取

江苏学政在按临各府州的岁、科试中，常常会将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者，即连续数次一等的前几名，选拔至南菁书院肄业，称之为“调”。如赵椿年记甲申(1884年)科试事：

甲申科试，正场首列，复试第二。张小圃鹤龄，正场第二，复试第一。发落之日，(宗师于试竣之日集诸生训勉，谓之发落。)漱师召小圃及余二人至案前，勸勉有加。是年食廩饩，调南菁书院肄业。

常州府科试，按江苏学政按临各府州次序，赵所说的这次应在甲申年五月左右，那么，只要自己愿意，赵椿年应在那年下半年即可入院肄业，比唐文治还早了半年。

又如上海钮永建，其《年谱》记载：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二十岁，再应院试，以第一名入泮，由提学使特调至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与业师秦赞尧、李景韩两先生偕行。^②

再如武进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中记载：

公元一八九五，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二十二岁。……五月，赴岁试，先进古学场，所试皆经史诗赋，生员素有研究者可报名应考，否则听。余考列第三名，题为“裴子野借官地起茅屋赋”。岁试正场亦列前十名。

向例，岁、科两考列前茅者，由学政调入南菁书院肄业，书院设在江阴，前

① 殷葆诚：《追忆录》。

② 杨凯龄：《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十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学政黄漱兰(体芳)所创办。院中藏书十余万卷,全省人才荟萃于此,平时研究者为经史词章、舆地算学,有山长(历代大儒多在名山讲学,故书院掌教称山长)以督率之,每月出题考试二次,前列者有奖金,住院者有膏火。是时山长为黄元同(以周),以三《礼》著名,维乔进院谒师,师年已六十余,道貌岸然,望之敬畏。凡入院肄业者,皆学有专长,余自愧浅陋,不敢不用功。但院中重自由研究,规则极宽,亦由在外处馆,并不住院,但按月应考领膏火者,山长不过问也。

进院时间比蒋维乔还晚的吴江金懋基,也因学政瞿鸿禨的赏识而调入南菁肄业:

善化瞿侍郎鸿禨按试江南,得先生《长江赋》及《西北舆地图表》,遽大称赏,檄调南菁书院肄业,选充学长。^①

如果说赵椿年、钮永建、蒋维乔调入南菁书院肄业,是因为他们的岁、科试(或再加上经古试,如蒋维乔)名列前茅,那么金懋基就完全是因经古试得到学政的赏识而调入南菁。

当然,调取名额也不是毫无节制,要看书院住院生是否有缺额可补。不过,一般总有缺额空出,因年初书院甄别时“经、古并取者止作一名”^②,而不作二名计算,那么,“经、古并取者”越多,留下的空额当然也就越多。

不过,即便已“调”入南菁,如果在次年正月的“甄别”通不过,那还得走人。有课生回忆:“南菁岁岁甄别,继续住院者大都止十余人。”^③住院时间超过三四年,长达七八年甚至十多年的,都是那些心无旁骛,孜孜不倦追求学问的人,如张锡恭、曹元忠、唐文治、陈庆年、赵圣传、缪楷等,当然,书院较为丰厚的膏火亦是留住他们长期住院的重要因素。

其实,著名大书院如江宁的钟山、惜阴,苏州的紫阳、正谊,选拔课生入院肄业,与南菁一样,都要在正月进行甄别考试。惟独“调取”,则是学政的“专利”。学政利用按试全省岁、科试的机会,把名列前茅的生员“调”入南菁,这样就保证了进入南菁的都是全省最优秀的人才,真如吴江金天翻所说的“瑞安黄漱兰学使创南菁书院于江阴,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隽之士,多出其中”。^④

① 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卞孝萱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

③ 殷葆诚:《追忆录》,庚寅年(1890)。

④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607页。

(三) 优、拔之选均出自南菁

自南菁书院创设后,全省人才荟萃于此,他们之所以会自愿“入吾彀中”,原因既简单又很现实:南菁书院除了为课生提供了一个高水准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可靠的经济保障外,课生日后的仕途前景也十分诱人。

李殿林在《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拟章程奏折》中说:“院生执业素尊,英才斯萃,每届优、拔之科率取诸此。”^①某些地方志中,也有这样相同的记载:“南菁为江苏著名之书院,直隶于学使者,优、拔之选,多出其中。”^②而这是江苏的其他书院望尘莫及的。所谓“优、拔之科”就是指选拔优贡、拔贡。^③

所谓拔贡,学政在三年任期中,若逢酉年,那么这位学政在按试各府州学时,必定会在科考结束后,再举行一次拔贡考试,参加者都是在历次岁、科试或经古考试中名列一等最多的生员。每县选拔一人,府学选两名,江苏全省不过数十人。自乾隆七年(1742)起规定,每十二年举行一次拔贡考试。所以能得拔贡者,决非泛泛之辈。每逢酉年的八月乡试前(酉年也是乡试之年),全省经过初选的拔贡生齐集江宁府试院,由总督、巡抚、学政合试,所谓“三院会考”,十分郑重。取中者于明年入京,再经朝中大臣考试两场。(复试时考题由皇帝钦命。)取中者分等录用:或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或以知县分发各省试用,或以教服用。

所谓优贡,是指学政在三年任满前,将各府州县学官提供的优秀生员名单,严加甄别考核,选出品学兼优者。优贡考试亦在省城,先由学政取录,再与总督、巡抚会考覆试,由三院联署发榜。明年再赴京师朝考,一如拔贡。优贡是三年一次,似比拔贡容易,因拔贡要十二年才拔一次。实则并非如此,因优贡全省仅取数名,江苏是科举大省,每三年仅取六名而已,“择之精,故得之尤难”。^④

南菁书院是全省人才聚集之所,由学政主政,而优贡、拔贡的录取与否,也取

① 前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② 《(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七《卢求古传》。

③ 案:明、清两代对学校生员控制很严,众多生员中,将来能考上举人、进士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那些奋斗终生而始终未能如愿的落第秀才,这在统治者眼中,就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朝廷为对这个庞大的生员群体进行疏导,便推行了一个荐拔举贡的制度,即生员即使考不上举人,也可通过选拔成为贡生而直接进入仕途。而前途最为看好且与学政的考核最有关系的便是优贡和拔贡。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六《优贡生候选训导杨君墓志铭》,《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3页。又,晚清安徽盱眙人王伯恭也说:“国朝定制,取士之法,乡会试外,优行、选拔两途为贵。优行三年一次,选拔十二年一次。优行则各省人数不同,吾皖每次六人。选拔则各省每学一人,似难实易,而优行则似易实难。”见王伯恭《螭庐随笔》六“科举丛话”,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案:盱眙现属江苏。

决于学政。所以，确如李殿林《书院改学堂奏折》中所说，江苏全省各府州每届的优贡、拔贡几乎全出自南菁书院。这也可从南菁课生吴县单镇的回忆录中得到证明：

提学使者大同李荫墀夫子殿林，会同两江总督新宁刘砚庄夫子坤一、江苏巡抚长白艺棠夫子思寿，会考江苏全省优行生，拔取第二名优贡。

江苏优贡六名：韩兆鸿（江宁府属）、单镇（苏州府属）、徐彭龄（松江府属）、陆炳章（太仓州属）、陈延昌（扬州府属）、丁锡福（海州属）。旋单镇、徐彭龄均于本科乡试中式举人，以备取之冯善徵（通州属）、赵维城（苏州府属）递补焉。^①

单镇在这里讲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参加优贡考试的事。本来优贡三年一次，早就应在庚子年（1900）举行，因八国联军侵入京师而停止，直至壬寅（1902）补行。这次江苏全省按例仍中六名优贡，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学政李殿林在江宁进行三院会考，韩兆鸿、单镇、徐彭龄、陆炳章、陈延昌、丁锡福等六人取中，这六人全部是南菁课生。又因为单镇、徐彭龄两人优贡会考分别得中第二名、第三名后，参加江南乡试又中举人，于是由候补的第一、二名冯善徵、赵维城两人依次递补而成为优贡，而冯、赵两人也都曾肄业于南菁书院。

南菁书院时期诸生于光绪年间应经历过两次拔贡考试，即乙酉（1885年）和丁酉（1897年），时学政分别为黄体芳和龙湛霖。优贡则三年一次，即每任学政三年报满，离任的那一年会举行优贡考试，则南菁书院时期应经历六次优贡考试。1905年科举废除后，举贡制度仍沿袭不改，所以南菁改为学堂后，原书院或学堂课生仍可应举贡考试，如己酉（1909）仍举行拔贡试，直至清亡。

据《南菁学友录》（1935年编），并参考江苏各府、州、县志之《选举志》和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等有关资料，略举肄业于南菁书院之拔贡和优贡的知见名录如下：

乙酉拔贡：

盐城金谷元，金匱华世芳，江阴沙从心，泰州戚金奎，松江府学雷补同（华亭），宝应刘奉璋，常州府学刘毓麟（武进），通州李安，太仓张树莹，高邮王虎卿，吴县曹元弼，江浦陈浏，华亭耿葆清，荆溪万康，无锡杨模，如皋顾锡祥，丹

①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徒姚锡光，娄县张锡恭，镇江府学周召齐（丹徒），金坛曹辅臣，上海汪锡增，太仓州学徐乃枏（太仓），句容杨世沅，元和汪凤瀛，江宁府学孙启泰（上元）。扬州府学顾锡中（泰州）。

丁酉拔贡：

新阳陈定祥，元和汪荣宝，通州范铠，苏州府学高人俊（吴县），常熟蒋元庆，仪征刘师苍，吴江金祖泽，江阴缪楷，吴县钱人龙，江宁府学夏仁虎（上元），上海于鬯，如皋张藩，青浦蒋寿祺，上海王宗毅，长洲韩云骏，金匱华彦钰，六合田其田，盐城吴会云，阜宁赵培庠。铜山王聿修，宜兴宋树槐，无锡秦树鎧，常州府学顾沐润（无锡），海门袁煦，丹阳林亮功，太仓州学冯缙勳（太仓），镇洋汪曾保，崇明王树声，娄县倪宇梁。

乙酉优贡：

丹阳李兆庆，太仓毕光祖，上海李平书，吴县戴姜福，仪征刘富曾、通州袁绍昂。

戊子优贡：

丹徒陈庆年，盐城陈玉树，上海范本礼，武进谢钟英，上元周钺，通州姚熙。

辛卯优贡：

元和胡玉缙，泰州卢求古，阳湖方怡，青浦陈承澍，铜山王学渊、泰兴金斌。

甲午优贡：

吴县曹元忠，吴县周德馨，金匱孙揆均，丹徒殷松年。

丁酉优贡：

宜兴朱楚善，无锡秦瑞玠，吴江张慰祖。

壬寅补行庚子优贡：

江宁韩兆鸿，吴县单镇，海州丁锡福，太仓州学陆炳章（太仓），仪征陈廷昌，松江府学徐彭龄（青浦）。候补第一、二名：通州冯善徵，吴县赵维城。

癸卯优贡（时书院已改学堂）：

元和陆蕖，江阴章钟祚，常州府学沙煦（江阴）。

（四）荐举

当江苏学政向朝廷荐举人才时，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南菁书院。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朝廷拟开经济特科。江苏学政瞿鸿禨上《保举经济特科片》，推举“素所深知”者陈三立、丁立钧、孙诒让等进士、举人十五人，“又于江苏士子中择

优附送六人”，并一一加以考语。这“附送”的六人全是南菁院生：

附生阳湖赵宽，深明治体，通达时务；附生通州冯微，算学功深，兼明西艺；附生泰兴张东烈，专司格致，力求新理；廩生吴江金懋基，舆地兵学，皆能讲求；廩生吴县潘敦先，留心时事，亦知西文；廩生长洲裴熙琳，资质英敏，究心外交。^①

四 掌管书院经济

江苏学政除了操持延聘院长、甄别院生等主要院务外，还掌管整个书院的经济。维持书院正常运转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书院创办时，由左宗棠拨银二万两，发商生息，即存入常州府属各县的典当，按时取出利息；二是南菁沙田的出息。前几章均有叙及，不赘。

第二节 院长主讲

一 院长题名

张文虎，是南菁书院的首任院长。在院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七月至十一月。

黄以周，主讲南菁，历时最久，自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四年(1898)，整整十五年，与南菁书院相始终。

缪荃孙，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至十六年(1890)二月在院。时南菁书院实行双院长制，黄以周仍主讲经学，缪荃孙主讲古学。

林颐山，是黄以周的学生，随老师黄以周至江阴，入江苏学政幕，同时又一直助老师批阅南菁书院课卷。辛卯科(1891年)中举，壬辰科(1892年)连捷进士。林正式有南菁书院院长的名分，估计是得甲科功名后，约在光绪十八年(1892)至二十二年(1896)间，与其师黄以周一起主持南菁讲席，林颐山主讲古学。大约在光绪二十二年，林颐山离开江阴南菁书院，去苏州主持学古堂。

王亦曾，继林颐山后，与黄以周一起掌教南菁书院，主讲词章。在院时间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

^① 《瞿鸿禨奏稿选录》，《近代史资料》总83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

陈昌绅,继王亦曾后,主讲南菁书院词章。在院时间约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

华世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兼任南菁书院院长,主讲算学。时黄以周主经学(黄于二十四年仲夏离院),陈昌绅主讲词章。华于二十九年(1903)离开南菁。

丁立钧,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二十七年(1901)任南菁书院院长。二十八年(1892)书院改学堂,又任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约半年时间。

以上历任书院院长之生平简介,见下编第八章《南菁书院名人传》。

还有一人须提及,那就是丹徒丁立中(丁立钧的堂兄),在江宁府学教授任上,曾主南菁算学讲席(确切在院年份待考),然鲜有人提及,可能是兼职的缘故。录其小传如下:

丁立中,字礼民,镇江丹徒人,工诗善弈,尤精算学。同治甲子举人。初官靖江县教谕,以忧去。光绪十三年选江都县教谕。时安定、梅花两书院由学官分监院事,每给诸生膏火,立中必手自料检,铢黍无或爽。二十年擢江宁府教授,兼主南菁书院算学讲席。樊布政增祥重其学行,恒与唱酬。在江宁任十八年,辛亥后归丹徒,卒,年七十有八。著有《怡云轩诗文稿》、《算稿》藏于家。(家传)^①

在历任院长中,丁立钧是南菁书院最末的一位院长,又是书院改学堂后的第一位总教习,可称得上是位继往开来的南菁人。但对南菁书院影响最大的则是浙东大儒黄以周,黄以周把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南菁书院,书院课生亲炙其教诲的也最多,受其影响也最深,他是南菁书院的灵魂。要讨论南菁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就不得不从黄以周说起。

二 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

(一) 粹然儒者

黄以周粹然儒者,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全院诸生,也赢得了历任学政和共事的其他学者的尊重。

王先谦致信缪荃孙,提起黄以周,称“元同品学实好”,“诸生尚佩服,兄亦敬之”。^②王先谦学问渊博,又阅人无数,自视甚高,私下与友人称自己敬重某人的情

^① 赵叶裳修,钱祥保纂:《江都县续志》卷十九《名宦传》。

^②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七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6—27页。

况还真不多见。而缪荃孙与黄以周在南菁有两年的共事经历,对黄以周极为尊敬,他回忆这段共事经历:“荃孙戊子在南菁,与先生接席者两年,冲如县如,粹然儒者。时时请益,反复详告,不惮烦也。”^①缪在当年已是名满天下,而能放下身段,向黄以周“时时请益”,正是因为不但黄以周的经学迥出时辈,其人品也实在令人心折。黄以周为缪荃孙答疑解惑,循循善诱,从不厌烦,总是原原本本、剖切鲜明地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却又虚怀若谷,所以缪要由衷地赞扬黄“冲如县如,粹然儒者”。

黄以周的学生唐文治是这样称道老师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端恣而精详。其教人务以敦品励学、躬行实践为旨。”^②这是唐文治的切身体会,平时看见老师很是严肃,然而向他请教问题时,刚一接触便觉得融融暖意,如坐春风。听老师讲解,率直诚恳,毫无虚言,娓娓道来,精确详明。但黄院长除了传授学术,更看重的是教诲学生如何做人,他要学生从自己做起,培养纯真美好的品德,不断追求学问,努力实践,逐步完善自己。

比唐文治晚进南菁书院整整十年的蒋维乔回忆:“公元一八九五,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是时山长为黄元同(以周),以三《礼》著名,维乔进院谒师,师年已六十余,道貌岸然,望之敬畏。”^③蒋维乔所好不在经学,估计不会像唐文治那样经常去向黄以周问学,然对这位“道貌岸然”以三《礼》著名的经学大师,还是又敬又畏。

(二)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座右铭对南菁诸生的影响

黄以周身体力行,对南菁诸生的影响,不是一时一地,而往往使人终生难忘。

唐文治于辛酉年(1921)为其师所写《黄元同先生学案》时说:“文治自光绪乙酉岁受业先生门下,忽忽已三十余年矣。追惟先生之训,恒自警惕。”此时,唐文治正在无锡创办国专学校,向诸生传道授业,自然要追念老师遗训,以此时策勉自己。

赵椿年晚年检点南菁课卷,称:“元同师手评经古两课卷具存,今日观之,誉过其实,后逊于前,真气日醺,浮光日甚,所以至老无成,负师门矣。”^④七十老门生,回首书院往事,还在连连感叹:“至老无成,负师门矣。”对黄以周可谓一往情深。

比唐文治、赵椿年晚进南菁书院四五年,且与这两位学长失之交臂的吴稚晖,对于黄以周的教诲更是刻骨铭心。吴回忆己丑年(1889)经“甄别”入南菁书院见山

① 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

②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

③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长黄以周的情景：“余应选入南菁治学，第一日谒定海先生，先生铭其座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心窃好之，与无锡范蠡、许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纪礼诂，不暇为词人。”^①

这“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对吴稚晖的影响甚大，从此吴便下决心不做文人，而专门从事于经史训诂之实学。上述吴的这段回忆，是为其同窗好友孙揆均的诗集写序而顺便带出，所以于此谒见黄以周的情景写得简短而平淡，而老师的这八字座右铭对他内心产生的巨大震撼，数十年后即吴稚晖逝世的当年，由胡适在纽约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为其倾情表达出来。胡适说：

我同吴先生见面时很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书，邀我去讲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员宿舍里，同他联床，谈了好几个钟头。那是我同吴先生单独谈话最久的一次。后来在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后期（民国十二年，西历一九二三），我有一次到上海，吴先生到我旅馆里来看我，我们谈到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忽然发了一点“自叙”的兴趣，谈起他少年时，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拜见书院山长定海黄以周先生（一八二八—一八九九），看见黄先生的墙壁上有他自己写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吴先生说，他初次看见这八个字，使他吃一惊。因为“实事求是”四个字是《汉书·河间献王传》里的话，读书的人都知道，都记得，但“实事求是”底下加上“莫作调人”四个字，这是黄以周先生最精警的话，古人从没有这样说过，所以使吴先生吃了一惊。吴先生说，他一生忘不了这八个字。

吴先生那一天对我讲这个故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他写那篇七万字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把“人生”看作“那两手两脚戴着大脑的动物在宇宙里的舞台上演他的戏”，——千言万语，还只是他第一天进南菁书院看见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的精神。

他老人家是南菁书院（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府）的高材生，是黄以周、林颐山诸先生的学生。他后来很沉痛的同他的朋友陈颂平先生“私把线装书投入毛厕里去”，又很沉痛的公开警告我们：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不可。现在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

^①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写于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第277—280页。

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他苦口婆心的说这番话,也只是那“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的精神。

在那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他很大胆的指出中国民族旧文化的缺点,很大胆的说:“虽局董也有什么洒扫应对,礼乐射御,许多空章程贴着,他们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内泥污积叠,——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同时又很大胆的说,那个“算账”的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即闪弥与罕弥两族、印度民族、与中国民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这种很大胆的东西文化比较的论断,也正是吴老先生一生不敢忘记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的精神。^①

黄以周的座右铭,几十年后竟然通过吴稚晖也影响到了后辈学者胡适,使我们对和胡适同时代的鲁迅所说的“有时我常常想:他(案:鲁迅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有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②的这段话,原本存在的一点疑问,即为什么要说“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难道“学术”比“中国”更为重要?也就恍然大悟了。

黄以周在书院与诸生讲学论道的情况,在下面两章会详细叙及,兹不赘述。顺便说一下,黄以周在南菁书院的座右铭,实际上应有十六字:“多闻阙疑,不敢强解;实事求是、莫作调人。”^③只是当时让吴稚晖受到震撼而终身不忘的是后面八个字。

三 学政与院长在院务中的交合

学政与院长的责权有时也不是决然分得清清楚楚的。

黄以周在光绪丙戌(1886年)得知唐文治考进士不第后,立即写信招他再来南菁书院研习。^④缪荃孙主南菁古学讲席时,屠寄向他推荐吴翊寅入南菁书院肄业:“再,友人吴孟斐翊寅,阳湖附生,诗文敏赡,涉猎金石训诂之学,并有端绪。留心世务,议论激扬。近来敛才就范,力求实学,窃慕高风,欲肄业南菁,藉亲教益。虽无

①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杨恺龄主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③ 王兆芳:《徵季子粹语》卷一,《黄以周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02页。

④ 《茹经年谱》,光绪十二年丙戌,“春,赴礼部试,下第归。黄师函招,仍赴南菁书院。”

孤子之言，何、刘、沈、谢，谅可暗中摸索也。”^①而这本应是学政的职权。吴翊寅《易》学精深，诗文敏赡，入院肄业，也在情理之中。而费念慈向缪荃孙介绍包祖同，恐怕纯属是请托了。费致缪信：“弟有友，名包祖同，（子丹先生之子，境况极累，年过四十，极肯用功，而苦于衣食之累，如得住院，便可专心矣。）肄业南菁，未得住院，如开课名次稍前，能为补入否？凭文试士，不敢妄置一辞也。”^②缪后来在南菁开第一次古学课，《吴越之间有巨区赋》题，取包祖同卷第一，非但“名次稍前”而已。^③至于包后来是否得以住院，不可考，但一年后由黄、缪亲自编选的《南菁讲舍文集》，所收《吴越之间有巨区赋》，是六合唐志益所作，而不是当初缪评定的第一名包祖同的课卷。

学政也常对南菁诸生给以学术上的指导，尤其在王先谦主政时期。盐城陈玉树撰成《毛诗异文笺》，请前辈学人斧正时，除院长黄元同外，首先想到的是王先谦，陈自称：“丙戌冬，丁亥夏，两次录稿，呈学政王益吾师。”王先谦称赞该书“引证该洽，唯以体裁杂糅为嫌”，于是陈玉树“遵守箴覆，更定条例，芟剔繁芜，仅存十卷。易稿数四，书乃告成”。^④武进谢钟英撰《〈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时，同样也得到了王先谦在学术上的指导，谢在该书凡例中说：“长沙祭酒王先生曰：‘洪《志》缺误，病在无图，若取两《汉书》为根，绘图稽合，以北江为前导，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钟英秉承师训，从事此书，时历三期，成《补注》十五卷。”^⑤

南菁书院课生的月课试卷，学政有时也会亲自评定。而每年正月的甄别，学政阅卷，更是天经地义，职责所在。赵椿年晚年还保存着王先谦批阅的三份甄别试卷。

院长虽不管书院经济，只管教学，但有时也会涉及经济上的麻烦，那就是课生所得的奖金问题。江阴殷葆诚回忆于庚寅年（1890）初进书院第一次应月课的情况：

余第一次词章课取超等第十，经学取特等廿一（古学三十名有奖，经学二十名有奖。每课总百四五十卷。住院生经古兼课；在院者取经课经，取古课

① 屠寄致缪荃孙书第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案：屠寄时正守制，故自称“孤子”。屠所称“何刘沈谢”，乃指南朝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九十一通，《缪荃孙友朋书札》，第366页。

③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光绪戊子十月九日。

④ 陈玉树：《毛诗异文笺·自叙》，《南菁书院丛书》第五集。

⑤ 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岳麓书社1994年版。

古,余此次经学课适为无奖者第一人)。奖章侧重前三名,偏枯太甚。其实兄弟之作颇多,聚全省之人才,而得奖者仅有此数,于是资格之说,喧于人口,怨声繁兴,而山长为众矢之的矣。^①

这实在是元同先生所不愿看到的,猜想他给学生课卷打等第时,一定会慎之又慎。

^① 殷葆诚:《追忆录》。案:殷氏于经学,实素无研究,他自己也说:“余初意极欲专心学问,从事卷轴,乃典籍浩繁,无从措手。经义为性所不近,且屡次应课,屡取廿一,兴味索然,然亦‘人惟求旧’之敝也。(初入院者,山长必不肯骤置之前列,防其文非己出。)此种似敝非敝之习,不独经古书院为然,即八股书院亦何曾不然,所谓老名字也,特经学尤为显明昭著。”殷氏经学课卷得不到奖金,实与“人惟求旧”无关,怪不得黄山长。

第六章 书院自由的治学风气

第一节 课生自由研习

胡适曾对中国的书院有过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他曾屡次提到过江阴南菁书院，他于1923年12月10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时说：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时自修的程度如何，……在清朝的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之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①

在这里，南菁书院被终身服膺自由主义思想理念的胡适置为清朝四书院之首，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 吴稚晖《讲舍杂录》之入院回忆

吴稚晖(1865—1953)于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赴江阴参加南菁书院甄别，以古学第一名录取，二月入院肄业。是年，吴稚晖二十五岁。吴稚晖将入院当日所遇之事和所见之人都详细记录下来：

进院时，先诣司帐处报名。司帐彼此呼先生。司帐启口，必先诘贵府尊姓，某甫某大名，一一回讫，余则寒暄而已。于是听差进曰：“先生其便于某斋乎？抑习于某所乎？”乃遍引而观之。

司帐两人：鬓有二毛、年六十许者，姓章；羸瘦而短、年三十余者姓梅。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听差两人：鸩^①其舌，年五十余者，曰次三；作江阴乡谈，年亦五十余者，许昌也。

院中凡四斋：

曰训字号，入院第二进之东廊，共六号。曰诂字号，第二进之西廊，共六号。此二处舍宇宽敞，前轩后窗，地亦幽僻。所居者皆历有年所，新至者不可得。

曰词字号，此处最冲繁，日夜人声不绝，其第三、四号密迹厨房，更觉喧闹。以一间六架分作两舍，仅仅和合窗两扇。循廊数号，下午昏黑不见。当院中第三进，共八号。

曰章字号，此处亦甚好，其制与词字号不殊，而清闲幽雅则远过之。就后院有石台，登睡甚便，尤据一院之胜，当院中第六进，院长住院之后，郑、朱二先生飧堂之前，共八号。

择定住所，即将行李书册移入，出入锁钥惟谨，跬步不可忽也。斋中所备诸物：梯架一副，铺板两方，书架一座，书台一张，面架一个，面盆一只，板椅两三张。（书架桌椅，问听差，公所有余，尽可溢分取用。其余均须自置，并帐竹、便壶零星物件，亦要一一带去。）

陈设已毕，具柬谒院长。听差送柬上房，谒生屏立堂上（即藏书楼下）。院长出见，西面东上。谒生北面南上，行再拜礼，院长答拜。起，院长命坐，谒生就下位，命以宫礼，再辞，而后即上位。有问，则起而对。久不言，乃请退，起，至中阶，院长止。谒生欠身，乃出。

出则遍拜同院生，一揖，退。诂姓字者，谨对之。回斋。同院以次答拜。以后，凡有后来者，吾亦答拜之。

拜司帐亦如同院生。

谒院长，冠衣冠，服礼服，莫敢不备。其柬用全柬者，端书受业门人某某。（黄院长命于柬^②之下端，各注小楷四：曰某县，如无锡，则径书无锡；曰某甫，如伯甫，径书伯甫。）谒同院生，用名纸。均以听差为导。

谒监院，亦于至之日躬诣学署，并嘱听差导引。其进见礼数，以余往谒时，学师公出，不敢悬拟，俟问明续述。监院者，以江阴两学师每年轮为之，掌院中

① 案：“鸩”，疑是“鸩”之误。

② “柬”，原误作“东”，径改。

课卷收放,及发案给奖等事。住院课卷,可从本生径交院长,不必送监院处。外来者,则或交监院,或嘱住院生面交山长亦可。监院用红票,书南菁书院肄业生某某。

其供给,以至之日,厨房请书名于簿,而后厨中为具膳。日食三次,一粥两饭。自居于斋中,或偕数人合馔,均听其便。惟人数多,则馔饮愈丰耳。面水、泡茶,均由厨房送至。终朝不断煤火,但呼应则不甚灵动。此项茶水,亦须开销节费。用俟续述。^①

黄以周是礼学大师,于弟子见师之礼尤为看重,决不肯敷衍苟且。王兆芳记道:“或有就南菁讲舍肄业者,初见子,曲一膝而不拜。子粲然不悦,曰:‘此何礼也?’答曰:‘官场行此礼。’子曰:‘弟子见师有此礼乎?’”^②吴稚晖在这里记他初次谒见黄山长的礼节甚详,师弟之名分至此才定。自此,吴稚晖开始了他四年的南菁攻读经史的生活。^③吴稚晖所记南菁书院建筑,与《江阴县续志》所载完全吻合,且更为详细。但没明说藏书楼的位置,《续志》称藏书楼在第四进,楼上藏书,楼下便是吴稚晖当年谒见黄山长的地方。

二 唐文治《南菁日记》中初入书院的记载

南菁书院如同其他著名书院一样,都规定课生必须写日记,记札记,并须按时交院长检查。(即便书院以后改为学堂,仍循此规定。)吴稚晖曾因事漏写数日,当黄以周向课生征收日记时,吴稚晖不得不补写完整后才上缴。^④比吴稚晖早入南菁书院四年的唐文治,也有当年求学南菁的日记存世,与吴相比,唐的日记似专重应课及学术研究。先录三则如下:

南菁书院日记卷首题辞:

先儒谓学问之道,当以己心为严师,故昼之所为,夜必书之。陶庵先生作《吾师录》、《自监录》,^⑤凡一言一动,莫不备载。又自誓神前,不妄取,不谈人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五《山川人物》之《讲舍杂录》,第2604—2606页。吴未记是日为何日。

② 王兆芳:《敬季子粹语》,《黄以周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页。

③ 吴称:“二十三岁入学。入学前,十九岁七月、二十岁五月、二十二岁五月、二十三岁五月,共四次赴江阴院试。二十五岁正月,以甄别南菁赴江阴,二月住南菁。二十八岁十一月,离南菁。肄业南菁整四年。”《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癸巳日记》,四月十四日,记游迹,第164页。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黄院长亲征日记,补书五月日记讫。”

⑤ 陶庵先生,明黄淳耀,嘉定县人。清代雍正以后,嘉定属太仓州,故陶庵先生是唐文治的乡先贤。

过。文治窃有志于圣贤之学，谨仿陶庵先生之意，凡日用言动，略载是编。虽然，自欺欺人，尤为学者之大患，苟掩不善而著其善，终身安有成就之日哉。

乙酉正月晦日谨书。^①

二月初一日

晨起，临《九成宫》五十字。恭诣藏书楼行礼于高密郑君、紫阳朱子前，遂观祭。又恭诣讲堂行礼，礼毕，略候，听点接卷，题即出：“拔茅茹以其汇解”、“干禄说”、“礼以节性说”、“孟子游齐梁先后考”。即抄题封信，一寄毕枕梅，一寄徐少瑜，^②附家信一封，交听差送至信局。

午膳后，检《虞氏消息》注曰：“否泰反其类，否巽为茅。”张皋文释之曰：“否，四也。”窃谓泰初应四，或可取象于巽。否初应四，则拔茅之象，应在四爻，而不应在初爻矣。于此知其不可从。又阅《易通释》以为否泰牵引为一类，更属纰缪，全失圣经之意。遂至藏书楼检《周易集解》抄得王弼、荀爽之说，然于否泰初爻所以并言拔茅之义，终无的解，中心不能释然。至若溪兄处散步。嗣晤陈雨人兄，^③谈及干禄之说，因得读做居太夫子《论语后案》，其说干禄，精当不磨，因亟录出。灯下取《学海堂经解》细检，竟无成说。即睡，夜梦尚清。

初二日

晨起，检《说文》汇字，本训为虫，俗作蝟，作猥，即此字。又至藏书楼检《释文》，至循矩^④兄处阅《仲氏易》，即作首解。

午后作首解，驳去虞氏诸家说，自立一见，仍空演无实义。《易通释》支离，并不待辟。得家书第一封，悉均安。又悉辨志案均发，^⑤七月汉学列超等六名，宋学列超等一名。八月汉学列超等三名。灯下《易解》成。检《毛诗稽古编》、《毛诗细义》，于干禄并无训。《说文》干字训犯。又检《尔雅·释言》曰：“干，流求也。”知干字无别训，即睡。

初三日

晨起，至循矩兄处，阅《诗经》注疏，又至藏书楼阅《古微堂集》，以孟子为先

① 王桐荪等编：《唐文治文选》，内选收《南菁书院日记十六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毕枕梅，即毕光祖；徐少瑜，即徐乃桢，均是唐的太仓同乡，南菁同学。

③ 若溪，即华世芳，金匱人；陈雨人，即陈国霖，泰兴人。

④ 循矩，即沙从心，江阴人。

⑤ 案：时江苏学子亦常应浙江宁波辨志精舍课，因南菁院长黄以周兼主家乡辨志精舍经学讲席也。

游梁，后游齐；阅《蛾术篇》，以孟子为先游齐，后游梁。抄得后，即作《干禄说》一篇。

午后，作《礼节性说》，以为性本乎五行，出入乎五藏，故不能无嗜欲之动乎内，又思性偏于仁则为兼爱，性偏于义则为为我，异学亦由无礼以节之，故至于倒行逆施也。说礼字，就五伦及冠、昏、丧、祭、乡、相见说，此皆人性所固有，庶见先王制礼之精。送孙伯龙^①诸兄动身。

灯下检《养新录》、《群经识小》、《龙城札记》，作《孟子考》。因赵邠卿注有“孟子去齐，老而之魏，故惠王尊之曰‘叟’”之说，想及孟子晓景丑“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之说，是孟子游齐之年不过五十，恐不得如此夸张也。此说，先儒未之及。考成，即睡，夜大雷电风雨，未起。

乙酉(1885年)二月初一，是该年南菁书院开课的第一天，自此，唐文治开始了他在南菁四年的读书生涯。这天，唐文治去藏书楼向南菁祭主郑玄、朱熹行礼。接着，去讲堂向院长黄以周行礼，并领取月课经古题四道。初一、二、三日，唐文治都沉浸在解答课题的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中。

再录三则日记如下：

十四日

晨起，临《九成宫》六十字，抄《字义》一页，说立志曰：“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便做成甚人？”因思吾辈尤易失足，谨之，谨之，毋为小人之归。

午膳后，取所抄《字义》点校。适夫子传见，教以须学字母，并喉音、唇音、牙音、齿音、舌腹音、舌头音之分。又谕：“嗟也可去，谢也可食，并无可疑。凡事须容人悔过，若矫情不食，即非中庸之道。”退出默思，觉权衡至当，敬谨录出。后取段氏《音韵表》阅之，茫然不得其纲领，竟昏昏欲睡，即圈《说文》数篆。

灯下，刘淮生^②兄借《李氏音鉴》阅之，见其分“春满尧天溪水清涟”诸字母，而于舌音、齿音等皆不言，仍不得其要领，闷极，姑置之。随取《春秋大事表》，读《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论》、《郑庄公三论》、《卫石碻论》、《郑烛之武论》，均极有见识，论烛之武以为启秦晋之隙与楚国之患，尤为确当。即睡。

① 案：孙伯龙，即孙锦标，通州人。

② 案：刘淮生，即刘翰，武进人。

十五日

晨起，随斋长恭诣藏书楼行礼毕，进见夫子。退出，临《九成宫》六十字。至书楼领取《字典》并《音韵阐微》二本，归斋，取字母读之，音仍不能分得明，而牙音与齿头、正齿更觉分不出。

午膳后，欲出院，取膏火钱。进禀夫子，未见。取钱后归斋。杨芷^①兄又惠借刘融斋先生《说文双声叠韵》，又有开口正音、开口副音、合口正音、合口副音、齐齿、撮口之目，又有字母清浊图。孙季兄又惠借《切音便览》，头绪愈纷，心思愈杂。专攻《字典》字母，而于十二摄韵首法及切字样法，广门狭门诸目，翻阅竟日，懵然不得一义，奈何奈何。拟明日执卷进质夫子。

灯下阅《音韵阐微·凡例》。

十六日

晨起，临《九成宫》六十字，阅《说文》双声。

午膳后，阅《李氏音鉴启蒙》乙卷，系取人物花鸟颠倒相切，说虽明了，然仍无提纲挈领处。因进质夫子，命录《音韵阐微》，并写示样式。退出，私心窃喜，晤得诸韵录出，则随一字皆有四字随口而出，因之可以究其音也。因取韵部及大音式样录出。

灯下，录牙音十八韵，共三十余音。作与毕枕梅信。刘淮生兄来，见示文字一篇，系礼延书院作，题为“居处恭三句”。蒙见其文老干无枝，绝无时下涂抹习气，因与之纵论时文，于明则独推归、唐，于国初则独推熊钟陵先生云。即睡。

唐文治在这三天中，为不解音韵学而苦恼不已，最后得到老师的指点，心中所存疑惑迎刃而解。可以说，出生于理学之乡太仓的唐文治的经学，尤其是训诂之学，完全是在南菁书院打下的基础。

最后，录三月的两则日记，以见师生情谊和弟子对老师的敬仰心情：

初三日

晨起，至讲堂听点，接卷，题即出：“颠也解”、“食哉解”、“其诸解”、“郑人来渝平说”，即抄题封信交听差寄去。

午膳后，检《周易集解》。

^① 案：杨芷，应是杨芷湘，即杨世沅，句容人。

灯下检《困学纪闻》、《易》书二本，于“颠也”、“食哉”俱无训。得家信第八号封。

初六日

晨起，作“其诸解”稿就，检《春秋正辞》、《春秋异文笺》、《九经古义》，作“郑人未渝乎说”。

午膳后，说成。从服虔注，辟去《公》、《谷》“堕成不果成”，及惠氏“逾盟”之说。还循矩兄书。（中略）夫子谕：“尔等有志为学，须求在我者，凡毁誉诸事皆不必管，即如考书院课期，但尽我所长耳，不必计其或前或后也。”又谕：“近日讲学极难，有避道学之名者，则讳而不讲，即有讲者，先入主出奴之见存于胸中。夫既存一入主出奴之见，原可不讲学了。故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证》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至焦理堂作《孟子正义》更失东原先生之旧。（中略）”

文治案：近日讲学，诚难言矣。有避道学之名者，则绝口而不谈，然亦非专避道学之名也。有谓学问须躬行不必出诸者，有谓翹然以道义自命，则迹涉标榜，来人訾议者。治谓此二者诚合乎暗然自修之真，足矫当世之为人徇外者。然所见犹未尽也。夫子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失人、不失言固难，然儒者顾问其心之何如耳。苟勇于以道自任，遑问其迹之涉标榜与否哉。学问原在躬行，然绝口不道，则理何自明？此二者不足避也。所患者，言学之分别门户耳。近世有训诂之学，有义理之学，其外又有顿悟之学。言训诂者，病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病训诂为泛鹜；而言顿悟者，更病义理为支离。甚有主训诂之学，目未见程朱之书，而亦痛斥宋儒者；主义理之学，目未见许郑之书，而亦痛斥汉儒者。痛斥宋儒而躬行视为迂腐，痛斥汉儒而经书束之高阁，至言顿悟者，并且绝圣弃智，专认本来面目矣，此岂复成儒者气象哉。

夫学术不明，吾党之责也。文治天资既钝之极，于经学尤生望洋之叹，然窃愿于训诂义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训诂者不至斥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不至斥训诂为泛鹜，而顿悟之学，尤思辨其似是之非，至于其他，非所敢志。今幸值夫子之有道，而终身得所依归，故敢布其私愿，谅有志竟成，不以为大言不惭也。

三 入院肄业平等自由

正式入南菁书院的肄业课生，不是经过每年正月的“甄别”，就是由学政按临各

府州岁、科考时“调取”的那些在考试中总得一等的生员，他们都是大江南北的杰出人才。他们入院肄业，不受功名、年龄、贫富、在院肄业时间等的限制。

(一) 功名

入南菁书院肄业者，均为举、贡、生、监。江阴章际治、太仓唐文治入院时，都已是举人身份，两人是光绪八年壬午(1882)科同年。娄县张锡恭光绪九年(1883)秋即入院，十一年充拔贡，十四年中举人，功名虽有变化，人却一直在南菁肄业。有的是贡生，如兴化赵圣传是廩贡生。有的是监生，如阳湖庄蕴宽。当然，大多数还是生员。如还未入学考中秀才的，那是没有资格入南菁书院肄业的，但可以在外附名应课，如无锡廉泉。

廉建中编《南湖居士年谱》时，询问钱基厚(钱基博之孪生兄弟，钱锺书之叔父)：廉南湖有否入南菁书院肄业？钱基厚复信称：“南湖未入南菁，盖南湖进学较迟，南菁必生员乃可肄业，且须岁、科案考列一等。非生员只可在院外附名应课。”^①钱称廉泉“未入南菁”，又对又不对。诚如钱所说，廉泉入学较晚，无资格参加南菁的甄别，不能成为南菁的正式住院生，这是对的。但又如钱所说“非生员只可在院外附名应课”，廉泉应曾附名应课，也算是肄业南菁书院，所以钱说廉“未入南菁”，并不确切。廉泉与吴稚晖、孙揆均等南菁诸生关系密切，固然有“常在春源楼茶话，高谈阔论，皆一时名流，故当时有春源党之目”的因素，但廉与吴、孙之间更有南菁同学的情谊。

廉泉甲午科中举，吴稚晖说：“惠卿首艺钞迈卿一股半，二篇钞迈卿易义，竟得法，可见秘本之有用。”^②惠卿，廉泉之字。迈卿，丹阳王英冕，与吴稚晖、孙揆均等都为南菁高材生。当王英冕英年早逝，“叔方曾存慰曼卿家，惠卿赠百洋”，吴稚晖感慨道：“古谊皆可感。”^③由上举二事，可见廉泉与王英冕的关系之亲密如同吴、孙，则更可证廉泉应曾肄业于南菁书院，只是未曾取得住院生资格，得不到书院膏火而已。

如廉泉那样“非生员只可在院外附名应课”，丁福保、孙毓修也是如此。丁、孙都曾二进南菁，但第一次都还未入无锡县学，无秀才身份，故只能是在院外附名应课。数年后，考中秀才后，再经书院甄别，才正式成为南菁住院生。

① 《南湖居士年谱》后附钱基厚函，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历史文献》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案：此段引语，原标点大谬，径改。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之《锡报》，第150页。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乙未日记》，第425页。

(二) 年龄

院生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最小的甚至只有十一二岁,被称为神童的。书院时期留下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少,但给人的印象却很深。赵椿年回忆:

句容陈子寿汝恭,名父(卓人先生著《公羊义疏》)之子,亦治朴学。携其弟子田自耘其田来,甫过十岁,见余等皆谦称先生,而目光炯炯,若俯视一切者。后与刘申叔师培同治汉学,文亦法汉魏,惜不永年也。^①

田其田是跟随他的老师陈汝恭来南菁书院的,人虽小,骨子里却傲气十足,这一点,在吴稚晖的有关南菁书院的回忆文字中也可见到:

其时,院中彬彬文学之上选,产江南者,则有阳湖吴翊寅,金匱孙揆均,丹阳王英冕,无锡高翔,元和汪荣宝。其尚在童龄者,有无锡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宁之田其田。其田才笔肆茂,年十三以神童为王先谦拔食廩饩,意气甚盛,颇蹠弛,院之成年长德,皆为诟侮。嗣程则修拔俊整,不好弄也。

产江北者,则有籍上海而家泰兴之赵世修,泰兴又有姚鹏年,童子金弑,世修弟子,宽弱受侮其田,然弑工李商隐偶体文,其田虽上规骚选,卓而成家,勿若也。^②

田其田十三岁就被王先谦拔取入学,并食廩饩。刚入院时,见到赵椿年等人时,还很谦恭地称他们先生。但四五年过后,田仍在南菁肄业且与吴稚晖等同学时,似已不如前那样循规蹈矩,而是“意气甚盛”,蹠弛张扬,连院中成年长者,也都被他恶语相加。倒是那位同是童子的无锡杜嗣程,则“秀拔挺整”,不喜玩乐。还有一位泰兴童子金弑,宽厚老实,经常被田其田欺侮。田、金两人所学,各有千秋。金弑学习词章,专攻晚唐李商隐骈文,已有相当造诣。田其田虽上取法于楚辞汉赋,立意古幽,但在“卓然成家”这一点上,却还是比不上金弑。

在南菁求学的,既有上述稚气未脱的神童,也有白发苍苍的宿儒。兴化廩贡生赵圣传,自入学后,便无意于功名,而是潜心治学,对《左传》尤为用力,精熟异常。然而,当地百姓认为他是“杂学”,没有哪家肯聘他做私塾老师,赵陷入贫困境地。甲申年(1884),当他听到黄体芳在江阴已建南菁书院,专课经史古文词,“乃橐笔渡江,身外无长物,年已六十余矣”。^③虽然在甄别时,赵圣传“书卷字出格外,而又据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②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载孙道毅:《寒厓集》,中华书局1924年版。

③ 陈庆年:《赵圣传传》,《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以下引文出处同。

特确”，黄体芳十分欣赏，又怜悯他穷困潦倒，身无长物，特别为他备制了被子，送入院中。院长黄以周也称赞赵圣传“该洽群籍，为诸生冠”，命他做了斋长，于是“南方学者始少少知其名”。赵圣传在江阴作客八年，年年都是正月出门，年末回家，往往“经年不得家书”。那时，他已“目眇齿衰”，而又“贫乏不能自存”，只能完全依靠书院发给的膏火和月课奖金来度其余生。然而，赵在“月试之暇，繙阅诸儒经说，犹必尽其首尾”，真是视学术为生命了。

当然，如上所说的“神童”、“宿儒”，在院中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课生正是风华正茂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入院时，赵椿年、汪荣宝、曹元弼、钮永建等都二十岁不到，唐文治、庄蕴宽、曹元忠、丁福保、陈庆年、蒋维乔等则二十岁刚出头，张锡恭、吴稚晖二十五岁，胡玉缙、金天翻等不到三十岁，华世芳、谢钟英、孟森、陈玉树等则三十岁刚出头。

由于南菁书院对课生入院肄业的年龄不加限制，所以兄弟联袂入院肄业是常有的事，如无锡的丁宝书、丁福保，武进的蒋维钟、蒋维乔，元和的张一麐、张一鹏，江阴的吴增元、吴增甲等。

也有父子先后入院的，如元和的汪凤瀛、汪荣宝父子，丹徒的陈懋恒、陈庆年父子。江阴的沙从心是最早入院的课生，数年后，其子沙亮功、沙志衍兄弟二人亦联袂而来。

还有师弟同时入院的，如江阴的章际治、顾书城和阳湖的赵椿年，顾、章两人曾先后在常熟做过赵的塾师。^①又如前述的句容陈汝恭和籍贯六合而家住江宁的田其田，也是师弟携手入院。

也有入院后，同学之间因仰慕对方的学行而拜其为师的，如泰兴的于璠、松江的雷璠就执弟子礼，问学于太仓的唐文治。^②唐文治说：“光绪戊子之春，余与玉峰始相见于江阴南菁讲舍，时玉峰年十七，亭亭玉立，心已器之。既玉峰过余，谈经学大旨，心折余言，遂执弟子礼。”^③

(三) 贫富

南菁课生大都出生于所谓的“书香门第”，但穷书生居多。前述兴化赵圣传，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因杨思赞姑丈同福之招，令余与辛孟表弟同学，延江阴经师顾先生书城（忘其字，讲李申耆先生学派者）授辛孟读，而余另从江阴章琴若师际治改文字。”

②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戊子（1888），二十四岁，春，仍赴南菁书院肄业。同学泰兴于君玉峰（名璠）、华亭雷君曜（名璠）来问业。”

③ 唐文治：《于玉峰遗稿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

“贫乏不能自存”，在书院想做学问，却要“仰课卷以求活，不能专心撰述”。而比他小三十岁的丹徒陈庆年，也出身贫寒，肄业南菁，固然是为求学，但背井离乡，也是为讨生活。“赴江阴时，乃考子贞先生送至江干，君于岸上灯光中见先生须发苍然，不觉泪盈于睫，过焦山，凄然西望，犹感泣。”^①陈庆年在南菁时与赵圣传相处融洽，赵死后为其作传，其中亦有同病相怜的因素。又如武进谢钟英，少时即遭难，苦不堪言，“君少丁洪杨兵燹，避居泰兴，随母言太宜人拾菜根为食。后归于乡，故庐仅存，风雨不蔽。年十岁，尝为小贩以依家。逾年母氏卒，兼助父葆初公执炊爨。隆冬犹御夹衣，年二十始制一袍、衣覆一衾，阅十七年未更易”。^②然而，人穷志不穷，他们在院中以言贫为耻，自强不息，专心治学，终成知名学者。

也有出身官宦家庭或家境富裕的课生，如汪荣宝，如曹元弼，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柢十分扎实，在南菁书院又得名师指点、同学切磋，所以，年龄尚轻，却已学富五车，成名极早。

(四) 肄业时间

书院课生在院肄业时间也是不受限制的，只要通过每年正月学政主持的“甄别”考试。前述赵圣传异乡客地，在江阴八年，固然“盖好学其天性也”，但也是出于无奈，他是以书院为栖身求生之地了，倘不是因贫病歿于家，恐怕还是未能忘情于他的学术研究而重返南菁书院的。^③

与赵圣传先后同时住院的太仓唐文治、阳湖赵椿年、丹徒陈庆年、阳湖吴稚晖等，则都在书院肄业四年或四年以上。

江阴吴增元晚年回忆书院事，称自己先后住院十年：

光绪十八年壬辰，予年二十三岁。江苏学政溥良，满人宗室，正月，例行南菁书院甄别，本“逢考必到”之义，往观光焉。乃侥幸取列特等。二月初开课，须领膏火住院。每月两课，一经史、一词章。课卷选刻，给奖颇优。全省高才荟集于是，江苏之最高学府也。予以后进资格，追随其间，自信获益匪浅。尤幸每届甄别，未遭淘汰。三五年后，更以日记成绩，见许于山长黄元同师，列于多年之老课生地位。迨至奏改学堂，依然充数。二十七年，李学政实行学堂新制，仍以斋长视我，我则视为滥竽，愧悔生而退志萌。古云：“读书不成，去而学

① 唐文治：《陈君善馀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② 张元济：《谢钟英先生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陈庆年：《赵圣传传》。

贡”，窃从事于斯矣。先后住院十年，难免恋栈之讥，殊抱憾也。

但也有不少课生虽名列住院生，却不常住院。如娄县张锡恭自光绪九年（1883）至二十二年（1896），一直应课南菁，在南菁肄业有十四年之久，然而真正住院的时间不会很多，往往于每年正月二十前后，赶赴江阴应南菁甄别，取得住院资格后，便返回家乡松江。武进蒋维乔也称：“盖余本住院生，在外就馆，每隔一、二月，必到院住数日也。”^①住院生而不常住院的恐怕很多，他们只要每月按时上缴两次月课答卷，便可安心在家乡，或专心读书，或设馆授徒，每月都能向南菁书院领取膏火。而书院的月课题，可由住院的同窗按时寄达。据唐文治乙酉年二月初一日的日记：

又贡诣讲堂行礼，礼毕，略候，听点接卷，题即出：“拔茅茹以其汇解”、“干禄说”、“礼以节性说”、“孟子游齐梁先后考”。即抄题封信，一寄毕枕梅，一寄徐少瑜，^②附家信一封，交听差送至信局。

也有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即没有住院资格，当然也拿不到膏火，却纯粹为求学问，而安心在院肄业，如丁福保，如孙毓修。他们两人第一次入院时，还不是生员，当然无住院资格，但南菁住宿方便，无锡距江阴又近，所以他们非常乐意借住南菁，而徜徉于书海之中。而书院也从没限制，可见南菁书院对课生管理的宽松。

又据在南菁肄业四年的赵椿年回忆，此四年中，不常住院及相识者有耿葆清、毕光祖、徐乃栢、曹元弼、雷补同、陈国霖、李平书、孙泰圻、钱荣国、汪开祉、顾书城、汪凤瀛等。其实，这些住院生中的大多数都因乙酉拔贡而踏入仕途，在南菁肄业时间最多不过两年而已。

（五）地域

课生入院也完全不受本省地域的限制，最远的可达徐州、海州（今连云港）。如铜山（今徐州）人杨允升（后中癸卯科进士）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千里迢迢南下赴南菁书院就学，直至晚年还保存着他在书院时的诗作《骑鹤客诗存》一卷。又如海州的丁锡福，在书院肄业多年，庚子（1900）优贡。某次在归途中遇到大风，船只覆没，所幸人未遭殃。

毋庸讳言，因南菁书院建在江阴，故常州府尤其是江阴的读书人沾了光，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是生员，或已是生员却没有通过甄别，以致不能住院肄业，而

①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

② 案：毕枕梅，即毕光祖；徐少瑜，即徐乃栢，均是唐的太仓同乡，南菁同学。

只能附课应试者，江阴、武进、无锡、靖江人最多。通州尤其是通属泰兴人也很多，因为通州本地没有著名书院。相比较而言，同样距江阴也很近的南京、扬州和上海（上海虽属松江，自开埠后，涌现的新、旧书院不少），因本地有不少有名书院，到南菁附课应试者就相应较少。

（六）其他

在南菁书院肄业的课生中，还有其他民族出身的：恩华，镶红旗蒙古人；云书，正白旗蒙古人。都属京口（镇江）驻防。这两人后来还分别是光绪癸卯（1903）、甲辰（1904）科进士。宜兴的沙彦楷则是回族人。

四 自由研习经史词章

（一）分斋研习

南菁书院每年正月下旬由学政举行“甄别”试，二月初开课。江阴课生殷葆诚回忆庚寅年（1890）南菁甄别、开课事：

庚寅，廿九岁。新正二十，赴城投考南菁。案出，余在住院之列。……二月朔，山长黄元同先生到，开课。……^①

课生以其性之所近而分斋研习，这里的“斋”，大概在学术研究上相当于现在大学或研究院里的系科，但在教学组织上却又类似于现在的班级，而在生活上又像是学生的一个宿舍区。

书院初始，分“训、诂、词、章”四斋，数年后杨颐主政时，又扩充“礼、乐、诗、书”四斋，而将前四斋名称改为“德、行、道、艺”，共八斋。每斋各设斋长一名，选择年富力强、资历又深的优秀课生担任斋长。龙湛霖主政时，各斋又增设副斋长一名，正斋长每月膏火二十四千文，副斋长亦有十六千文，比起一般院生的十千文，斋长的待遇明显优厚。这也引起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无锡程宏远就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日记中有过这方面的记载：

（四月）初九日，照常上课。经董张来谒总教，因堂中添建号舍，购办书籍，经费支绌，议欲减少膏火，并严定课程，整顿一切云云。后闻同人窃议，以为膏火一项较从前创始之时，已形俭啬，而花红每次尤不及从前十分之二。从前课列超等，有钱二十千，或十余千不等，近来，则一二千而已。试思此中诸生，若

^① 殷葆诚：《回忆录》。

在家教读，谁非可自谋温饱者，而必欲从数百里外奔走来此，吃三餐淡饭，以仰人鼻息乎？且诸教习及学长，各有身家，故束修当从丰致送，而吾辈岂无父母妻子待养者。若谓学业过人，则恐较短量长，正不知鹿死谁手也。出此言者，常州、江阴人居多，盖南菁向设学长八人，择肄业年久资望甚深充之，每月每人膏火二十千，安坐而食，无所事事。若遇课期，乘兴撰成一篇，无论优劣，另卷呈阅，当拟作看待，给润笔二千。其中歉以自牧者固不乏人，而目无余子、妄自尊大者亦常有之。

去年，改设学堂，定例，凡诸生课卷，必先呈学长阅过，拟定甲乙，然后呈诸总教。众人心不能平，群起攻之。此例虽废，今日所言，仍是余怒未息也。^①

书院时期，院生对斋长的待遇丰厚就很不服气，“若谓学业过人，则恐较短量长，正不知鹿死谁手也”。改学堂后，又增加一新规定，即斋长有批阅其他同学课卷并为拟定等第的权力，这就激起公愤，“群起攻之”，最后不得不废除此项新规定。

曾担任过斋长的，沙从心、赵圣传、陈庆年、章际治、范蠡、赵宽、金松岑等都有案可稽。

江阴沙从心，曾任“训字斋”斋长，唐文治回忆：

院中设“训、诂、词、章”四斋舍，余于乙酉岁住院时，江阴沙君从心字循矩，为训字斋斋长。余初之院，见君如旧相识。君方致力于小学、经学，余与讲贯，均无间然。君具刚练才，凡诸同学寄卷寄题，悉一身任之。^②

兴化赵圣传，似任过“诂字斋”斋长。陈庆年回忆：

院长黄先生，浙东经学大师也，谓君（案：赵圣传）该洽群籍，为诸生冠，署为斋长，南方学者始稍稍知其名。^③

丹徒陈庆年也任过“诂字斋”斋长。吴稚晖回忆：

时长吾曹舍者，为丹徒陈庆年。庆年为经师柳兴恩姊子，能传外氏学。庆年好谈，常侧其头，唇翕张，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为诂字舍，各自以为许、郑、迁、固，聚此八舍也。^④

江阴章际治亦任过斋长，可能是章字斋，因唐文治那时住章字斋，唐曾回忆曹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

② 唐文治：《江阴沙君循矩墓志铭》，《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

③ 陈庆年：《赵圣传传》，《续碑传集》卷七十五。案：陈庆年未说赵圣传任何斋斋长，而赵是光绪十年入院，沙从心九年入院，沙既已任训字斋斋长，则可推测同治经学的赵，似应任诂字斋斋长。

④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

元弼拜访他时的情景：

初，乙酉岁，余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君访余于章字斋中，君年十九，治《诗》、《礼》。余年二十一，研性理，一见如旧相识，诃合无间。^①

唐文治后来为昔年的南菁同窗章际治写《墓志铭》，其中说道：

当是时，督学使者瑞安黄先生漱兰病士子专事帖括，爰于江阴创建南菁书院，提倡经学，大江南北好古之徒云集辐辏，院长南汇张啸山先生主讲于前，定海黄元同先生、江阴缪艺风先生继讲于后。君闻风兴起，往肄业焉。元同先生素好朴学，尤器重君，延为斋长。^②

在南菁书院肄业多年的上海赵世修也是多年的老斋长了。^③

范蠡当斋长时还很年轻，且在院时间不算长，资格不算老，老院生就不太服气，使得范很苦闷，不得不“稍通方”。吴稚晖记道：

前年在南菁书院举斋长，旧人皆易其年少，请让之，以故稍通方。^④

吴江金松岑是南菁书院后期课生，也做过斋长，时已改称学长。金后来为南菁同学曹家达的诗集作序时说：

瑞安黄漱兰学使创南菁书院于江阴，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隽之士，多出其中。光绪戊戌，朝廷始议变法，书院亦改科目以应功令，余奉学使者瞿文慎师檄，调充学长。^⑤

与金松岑同时肄业书院的阳湖赵宽，也做过学长。^⑥

又如通州顾鸿闾、孙倣、崔朝庆，金坛林之祺、金匱孙揆均、江阴王家枚也都做过斋长。黄以周于甲午年（1894）刻《南菁文钞二集》时，在文集开首便有这样的说明：“院长黄先生鉴定，斋长林之祺、孙倣、顾鸿闾、崔朝庆、王家枚、孙揆均同校勘。”

① 唐文治：《谱弟曹君叔彦七秩双寿序》，《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

② 唐文治：《章君琴若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案：唐住章字斋，且两人都致力于理学，且治词章，两人入院时都已中举，章于光绪九年（1883）秋即入院，唐则十一年春始入院，故推测章际治似是章字斋斋长。

③ 张家镇在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殊卷的问业师栏中写道：“同门赵韵臣夫子名世修，前南菁书院斋长；同门赵君闾名宽，前南菁书院学长。”《清代殊卷集成》。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乙未日记》，第450页。案：范蠡当斋长在甲午年（1894）。

⑤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天放楼诗文集》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页。又见张家镇壬寅乡试殊卷。

⑥ 见钱自俨口述、吴新萃整理：《钱自俨忆南菁书院生活》，又见蔡文森《自述》。

斋长除膏火从丰外,当院长选刻南菁课作时,也比其他同学享有一定的优势。《南菁文钞》共三集,凡集中选入较多者,大都是斋长,如《三集》中,斋长(或副斋长)达李、金懋基、赵宽、张葆元、陆炳章等都被选入五篇课作以上。

(二) 钱崇威回忆宽松自由的书院生活

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入南菁肄业的蒋维乔,晚年回忆:“凡入院肄业者,皆学有专长,余自愧浅陋,不敢不用功。但院中重自由研究,规则极宽。亦有在外处馆,并不住院,但按月应考领膏火者,山长不过问也。”蒋维乔这也是夫子自道,他就是一个“并不住院,但按月应考领膏火者”。但他又说:“余本住院生,在外就馆,每隔一二月,必到院住数日也。”这是因为他正在读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凡祖禹所引证者,一一检查原书,为之校补”,而“家中书不敷用,则标志于书眉,赴南菁书院藏书楼校阅”。^①

如上所述,住院生有的并不住院,却在书院之外设塾处馆,获取束修,而书院膏火仍照领不误,院长也从不过问。然更有奇者,有住院生竟然还将自己所教的私塾学生带进书院,继续施教。早期的如陈汝恭携带田其田入院肄业事,前已述,此不赘;晚期的如吴江的钱崇威亦是如此,且所携蒙童尚不止一人。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调入南菁肄业,与金松岑同时,比蒋维乔晚三年入院。

钱崇威晚年九十多岁时,曾把自己在南菁的亲身经历,向南菁中学的来访者作了一点回忆。这位当时硕果仅存的清代最后一位翰林的口述,便由访问者整理成文字如下:

钱老回忆当年,在中乡榜之前,任塾师,由于入学案首,经江苏学政瞿鸿禨保送到南菁书院做课生。当时蒙馆聘约未到期,乃带了蒙馆学生一同到江阴就学。书院内有课生约50人,内课生居住院内,外课生不住院,住房较宽敞,每人至少可居一整间书斋,自己由于带蒙徒就居三间。在学时历黄以周、丁立钧两位山长,丁立钧和学政瞿鸿禨同年^②,是最后一个书院山长(后改名总教习)。书院内经学、小学、古学三门。在书院课生,平时博览群书,勤于自学。自学时做笔记写心得。课卷(即作文)每月一次,^③由山长命题,三天内完卷,

①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案:瞿鸿禨是同治九年庚午科举人,十年辛未科进士。丁立钧亦是同治九年庚午科举人,但光绪六年庚辰才中进士,倒是丁立钧之兄丁立瀛是同治辛未科进士。则丁氏兄弟与瞿鸿禨都是同年。

③ 南菁每月应是两次月课,是钱晚年记忆有误,还是书院改学堂,黄以周离院后,课生只须应一次月课,待考。

每个作文题都有指导,促使课生到藏书楼(即图书馆)钻研参考书籍,畅思路,助写作。课卷经讲席批,山长定名出榜,优秀者有奖金,并有酒吃,当时以喝到优秀酒为荣,喝不到优秀酒为耻。当时有一个陆萼系陆凤石之侄,^①文章写得快,常常名列前茅。阅读群书中遇有困难,得请山长或讲席解惑。黄以周山长是经学专家,诸生钦佩。也有个别讲席出古怪题、偏题,企困难课生,绝大多数课生确难于下笔,乃推代表去问讲习,请求指示,代表未回,就有课生把题目来龙去脉、自己心得体会向大家发表。待代表回来传达讲席教材与该课生无异,有时还不及该课生材料丰富。钱老就说,当时师生之间差距并不大,书院时代,确是教学相长。但是,当时也有善于引经据典死记硬背而不善于写文章的人。

钱说,与他同时的课生有赵世修(出过诗集)、丁响卿(海州人)、裴雨舫(吴县人)等。关于山长、讲席讲不讲课的问题,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课生有疑难问题到山长讲席处请教。他又说,当时课生钻研经书后,学台要来检查,检查的方式是抽签讲书(复述、还讲),即在课堂上课生面北而讲,学台坐讲堂西北角,洗耳恭听。他又谈到学台可以保举课生任圣庙里的老师(训导和教谕),他也曾被瞿学台保举为训导(由于康梁事变未成)。光绪二十六年,经学、小学、古学(诗赋)每课生专攻一门。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之间废经学攻策论。

钱老回忆,课生生活由书院按月发膏火费。(查案每月五千文^②)课卷优秀时有奖金,其中有班长能代讲习讲学每月四十元津贴,像赵宽(阳湖人)、金天翮(吴江人)都做过班长。山长、讲席对课生不谈纪律。记得有一次某课生做纸头人讽刺讲席,书院当局亦不过问。

又谈及瞿学台曾保护课生批掉苏州府送来拟逮捕因为响应戊戌维新课生的案卷。

最后钱老谈到,他在南菁书院学习颇有所得,就其所谈内容归纳如下:

1. 南菁书院时期的讲学方法以课生自学为主,山长讲习指导和解惑为辅。
2. 南菁书院是江苏全省最高学府,设在学台所在地,学台亲自抓,抓得紧,讲席都是当时全国所谓知名人士,从课卷命题中根据自己自学的经验指导课

① 陆萼似是陆凤石(陆润庠)之堂弟。

② 案:膏火每月五千文,是书院开创时黄体芳、王先谦任内的数目,至杨颐已增至七千文,龙湛霖时为十千文。钱荣威在书院时,正瞿鸿禨、李殿林先后主政,是否膏火减少,待考。

生钻研经古史籍。

3. 南菁书院藏书楼上储藏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并汇刻《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丛书》^①和《南菁札记》。藏书丰富，能满足自学的要求。

4. 书院课生都来自各县案首，济济一堂，真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有利于互相切磋，互相促进，读书风气浓。

5. 书院斋舍整洁，环境优美安静，适宜自学。^②

钱崇威在南菁数年，正是由书院改学堂的过渡时期，所以他会提到学堂时期的讲席。钱谈到书院“不讲纪律”，课生做纸人讽刺讲席，书院“亦不过问”，这说明南菁书院的治学环境确实自由宽松。

（三）书院藏书丰富

钱崇威说南菁藏书楼“藏书丰富，能满足自学的要求”。

比他早进南菁书院的蒋维乔也回忆：

……《通鉴》毕业后，继续圈点顾祖禹之《方輿纪要》，……凡祖禹所引证者，一一检点原书，为之校补。家中书不敷用，则标识于书眉，赴南菁书院藏书楼校阅。盖余本住院生，在外就馆，每隔一、二月，必到院住数日也。

蒋维乔还说：“院中有十万卷藏书。”^③

与蒋维乔同进南菁书院的无锡丁福保，在其自订《年谱》中叙述他初见南菁藏书楼“藏书甚富”的情景：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二十二岁。余肄业江阴南菁书院，见院中藏书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适五都之市，可以荡目邀魂，批发吾十年葺誓，狂喜无已，乃手抄院中藏书目一册，而私自祝曰：他日果能处境稍裕，必照此书目尽购之，豫算拟买各书约千元。

丁福保后来终于成为著名藏书家，实现了他在南菁书院发下的宏愿。

有十万卷藏书的南菁藏书楼，是南菁课生治学的必要保证，他们日后的学术成就莫不奠基于此。柳诒徵称其同乡学人陈庆年入南菁书院后，“南菁蓄书故富，府君横经其中，陈书发篋，遍观其所藏，又得交四方知名之士，晦明风雨，雅有攻错，其

① 指王先谦、缪荃孙主编的《南菁书院丛书》。

② 钱自俨口述、吴新萃整理：《钱自俨忆南菁书院生活》，载《江苏省南菁中学百年校庆专刊》1982年，第87—89页。案：钱自俨当作钱自严。

③ 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卞孝萱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

进诣遂无有限量”。^①

(四) 刻苦自习

书院给课生创造了十分宽松自由的环境,但课生想求得真学问,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南菁课生在书院中的研究学问刻苦异常,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陈庆年在书院读书劳累过度,曾得喉疾,无法开口说话,同学赶快请医生来,所幸无事。母亲闻知此事,迅即将陈庆年招回家,哭着对儿子说:“汝喜深夜读书,谓万籁俱寂,自谓神志可以湛然,而不知阳气不潜,阴气被灼,岁月浸深,患胡可测?”^②陈的同窗好友赵椿年也说他“在院至日晡始起,以读书终夜不寝也。”

陈庆年不但最喜欢深夜读书,还喜欢深夜写作,因为他依靠书院膏火奖金养家糊口,所以常常代他人作。“常同一题做十余篇,只一篇署己名,余皆为他人作。煤油灯下,彻夜不眠,一气成十余篇,往往署己名者得一等,余或二、三等,所得则与他人分之。后经常深夜写作,以零食充饥。常执笔久,困不支,鼾声如雷,而犹握管不放,不自觉纸上已墨团无数。俄而醒,则神志大清,下笔如有神矣。”

十多年后,他写信给“憔悴海外”读书艰辛的学生曹亚伯说:“仆往年读书南菁,此等苦剧亲演之矣。”^③不禁感慨系之。

课生读书到深夜,书院从不过问。什么时候该熄灯就寝,什么时候该起床读书,是课生自己的事,书院无权干涉。然而,荧荧豆灯之下,终夜专注于经史子集的研究,不少课生的目力因此而大受损伤。唐文治至中年双目已近失明,固然与他早年在家读书用功过度有关,但在南菁读书太过投入,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曹元弼也是如此,“吴县曹叔彦检讨元弼,盛岁成名,著述满家,然双目短视,咫尺不辨”。^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锡国专学生王邃常等人受老师唐文治之命,常去苏州从曹元弼受《仪礼》,王回忆曹先生“目短视,不能寸,又不御镜,阅书多,鼻常黑”。^⑤双目近视到看书非得将鼻子凑到书纸上,以致鼻尖常黑。

吴稚晖在南菁时,也在日记中写道:“拼命读书,不免伤身。”^⑥伤身之后,又不

① 柳诒徵:《陈横山先生行述》,《江苏书院志初稿》。

② 陈登丰:《横山乡人年谱》,己丑(1889)。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陈庆年:《复曹生亚伯书》,此信写于乙巳(1905)九月十日。许进、徐苏编:《陈庆年文集》,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④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740页。

⑤ 王邃常:《自述》,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⑥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第94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免后悔，他决心要戒去爱说闲话、爱好闲游、爱管闲事的毛病，这样就可省出用来读书的时间，不必“颠倒晨昏，劳劳故纸”，他说：

然则既节去“闲话”、“闲游”、“多事”三者矣，工夫已多出几倍，尽够读书，何必颠倒晨昏，劳劳故纸。夫学问之道，藏修游息，只需行之有恒，不贵进锐之功。每日眠起有常度，一也。今约：晨以钟八下即起，夜以钟十下即息。倘有未了之功课，可俟明日，则明日补之；遇有万不可俟者，稍迟眠以了之，明日略晏起，以养息之。否则眠起无度，精神昏怠，读书不精，一敝也；血气既伤，神形萧索，殊非养生之道，又一弊。

稍后入院的蒋维乔也称：“凡入院肄业者，皆学有专长，余自愧浅陋，不敢不用功。”

（五）友朋讨论之乐

课生在院中的研习主要靠自修，不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好在南菁书院人才济济，学子们尽可终日相聚一起，潜心探讨，互质疑义，增进学问。课生们论学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在讲堂，一在斋舍。唐文治于1929年为南菁同窗丹徒陈庆年写墓志铭时回忆：

余于丙戌岁，与君同学于南菁时，则又有江阴章君琴若、常州庄君思緘、赵君剑秋、常熟孙君师郑数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谭经，或讲堂角艺，争相先后，以为笑乐。^①

这“宿舍谭经，讲堂角艺”的情景，三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1923年唐文治为另一位南菁同学江阴章际治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光绪壬午捷于乡，与余同出长乐林先生调阳门下。当是时，督学使者瑞安黄先生漱兰病士子专事帖括，爰于江阴创建南菁书院，提倡经学，大江南北好古之徒云集辐辏，院长南汇张啸山先生主讲于前，定海黄元同先生、江阴缪艺风先生继讲于后。君闻风兴起，往肄业焉。元同先生素好朴学，尤器重君，延为斋长，时余亦滥竽其间，每当春诵夏弦，读书露坐，讨论经史疑义，滔滔辩论，得一新知，相与欢笑以为乐，不炫异而矜奇，惟实事以求是。汉经师家法，君能心得之矣。^②

这“春诵夏弦，读书露坐，讨论经史疑义，滔滔辩论，得一新知，相与欢笑以为

① 唐文治：《陈君善馀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② 唐文治：《章君琴若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

乐,不炫异而矜奇,惟实事以求是”的感人场景,在同是南菁学友的昭文孙雄于1924年所写的章际治《墓表》中再次得到印证:

瑞安黄漱兰侍郎,时方督学三吴,创设南菁书院,延聘当代硕儒主持讲席,君入院肄业,发愤治经史考据之学,以实事求是为宗,而于宋儒性理诸书,亦复潜心探讨。蔚芝与君为壬午同年,所志所学,若合符节。每当夏弦春诵,摊书围坐,讨论疑义,澜翻不穷。复以余暇,兼治词章,时或痛饮读骚,互相背诵班、马、韩、杜诸集,视其误否,以角胜负。余亦隅坐从游,极少年豪放之乐。蔚芝尝校刊陆桴亭、陈确庵两先生遗书,君助之讎勘,因深有得于桴亭之学,益信惟学足以愈愚,而非礼不足以持己。^①

唐文治于1941年(辛巳)为又一位南菁同学谢钟英作《家传》,回忆五十多年前与南菁同学“相与考古证今,上下其议论”的情景:

当光绪癸未、甲申之交,吾省学政瑞安黄漱兰先生于江阴设立南菁书院,长沙王益吾先生继之,招罗俊彦,宏奖风流。于是,大江南北,人才鳞萃,时则有若吴县曹君元忠、江阴章君际治、淮安陈君玉树、丹徒陈君庆年,皆一时名俊。余于乙酉岁滥竽其间,君后余一年而至,相与考古证今,上下其议论,君尤慷慨自负,出语惊座人,有时彼此纵饮,放论高歌,旁若无人者。^②

唐文治在南菁求学时同住一斋舍的太仓同乡有毕光祖、张树蓂,唐于1926年为亡友张树蓂作传,称:

拙嘉盖英奇磊落人也。方黄漱兰先生初建南菁书院,君及毕君与余肄业其中,常共宿舍。君年较长,余最少,相与上下议论,不可一世,盖君之抱负非庸人所能知。^③

盐城陈玉树与武进谢钟英分别多年后,写信给谢,直诉当年谅直论学而不知珍惜,如今欲求此乐而不可得的茫然若失的心情:

回忆暨阳共研,江路同舫,雪泥尘踪,散如烟雨。昔途谅直,不知悻悻。今索居愆滋,望益无径,求如前此之乐,胡可洵也。^④

书院早期课生在院中“相与上下议论”,深得友朋切磋之乐。中后期课生同样

① 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

② 唐文治:《谢君钟英家传》,《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

③ 唐文治:《张君拙嘉传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④ 陈玉树:《与武进谢钟英书》,《后乐堂文钞》卷六。

如此。孙毓修曾在南菁前后两次肄业多年，首次进院时，还未曾入学，仅是个童生。多年后他用骈文写了《南菁旧感》一文，记下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余年十七，始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一时同学，如朱曼君之骈体，接武齐梁；范素行之经学，折衷郑许。乐旨潘笔，并资宏导；季缙侨纒，深相结爱。坐绳床而参秘议，食麟馐以求咫闻。杨雄腾笑于藻悦，非所敢闻；子安销恨于清文，窃可同喻。江城清晏，坛坫胥欢。忽忽三年，不知岁月之速也。^①

吴江金松岑被江苏督学瞿鸿禨檄调南菁书院肄业：

当是时，大江南北材贤知名士，皆集南菁，相与谈析道艺，高会文酒，疑义竞起，互矜人艰僻，以取胜所不知。^②

江阴祝廷华回忆与同乡缪炳组课艺谈文情景，已是书院、学堂交替之时了：

维时君方肄业南菁，与余斋舍相邻，课艺谈文，备形浹洽；评今论古，各出心裁。击钵推诗，拈毫作赋。上下议论，略同庚蟋之互鸣；鞭弭周旋，有似云龙之相逐。而君复虚怀若谷，勤学惜阴，每就鄙人，时殷下问。叔牙知己，敢辄贡夫狂言；祖逖先鞭，几难测其进步。畴人之学，喜窥其藩；哲学之书，亦研其旨。思欲综贯经史，会通中西，不憚钻求，务穷精力，此更余所亲见而叹为畏友者也。^③

晚期书院课生无锡蔡文森自述：

戊戌，肄业南菁书院，山长丹徒丁叔衡先生立钩，深契之，拔武进赵君闾及文森为正、副学长，奖掖倍至。是时同学多发奋自好之士，予与君闾及青浦张雄伯、徐启商、金剑花、李梦华、娄县张蕴和、武进蒋竹庄、同邑秦于卿、平甫尤交稔，切劘之益，友朋之乐，以此时为最，虽历数十年之久，寤寐不能忘也。^④

蔡文森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家乡办教育，又进商务印书馆编了几部有名的辞典，最后助家人办实业，一生经历丰富多彩，然而晚年犹称“切劘之益，友朋之乐，以此时为最，虽历数十年之久，寤寐不能忘也。”始终未能忘情南菁。

五 勤作日记和札记

南菁诸生读书时都有记日记和札记的习惯。日记与札记有不同。吴稚晖在某

① 孙毓修：《绿天清话·南菁旧感》，《小说月报》第三年第七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② 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卞孝萱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

③ 祝廷华：《缪炳组传》，缪幸龙：《江阴东兴缪氏家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3页。

④ 蔡文森：《自述》，《锡金游岸自述汇刊》，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天读《礼记》，记下自己的心得：

莅官行法。孔云：“莅，临也。官，为卿大夫、士，各有执掌。行法，谓司寇、士师明刑法也。”其义甚安。吴氏辄以行法谓“班朝治军，莅官之法”，其改释之谬，不待深究。江氏永既知吴氏为非，犹必自为之说曰：“莅官行法，言当莅官而行法令也。”说固可通，不至似吴氏之显属强词。然既不能起古人而问，殊嫌多事。夫古义谬于是非，已说合于是非，改之可也。若古义既甚安，已说虽备一义，徒启学者于不必措意之处，皆有心攻驳，则不如独存古义可也。

吴稚晖认为江永之说虽亦可通，但孔疏本来就不错，江氏此举，岂不是多事？还是独存古义为好。不过，吴的这种看法，却不敢公开，在此心得下还加了一句：

此段入日记中，万不可誊之札记以取祸。^①

可见，札记是要给院长或其他人看的，而日记则是给自己一个人看的。

南菁课生做读书笔记各有不同的方法。每人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笔记。吴稚晖称自己的笔记为《识馀》，壬辰年（1892）后又别做另一种内容的笔记，称《实事求是》。他在日记中写道：

既有《识馀》矣，曷为又作此册？曰：《识馀》记言记事之书；此读书之录，考核勤惰之记也。为例如左：

凡读书，谨记其页数。

读书时，随手摘录，所要摘录者，低一格书之。

凡有当摘录者，宜乎归类。总录，别纸书之，不入此册。

凡看书，首尾读讫曰看，复读曰读。一书随手揭看，不能详举其目，曰杂看某书。并未用心看者，曰杂检某书。看一二篇者，曰略看某书。^②

《识馀》是记言纪事之书。《实事求是》是读书时的随手摘录，可能还不算是札记。要整理后，所得心得，再另写入他册，以供老师查阅。不过，两种都是读书笔记。

吴稚晖还将读书的方法加以总结，分为“看”、“读”，“杂看”、“杂检”、“略看”数种。全书从头到尾看完才能称为“看”。在“看”的基础上，加以复读，才能称为“读”。“读”大概是最认真的一种阅读。这算是吴氏阅读法，其他的同学一定会有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之《戊甲叢鈔》，第68—69页。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之《壬辰丛鈔》，第89—90页。

其他不同的读法。

第二节 治学之余

一 登临君山

南菁书院课生在专心治学之余,有时也会放松一下。他们最爱去游玩的地方,便是江阴的君山。君山在江阴城北外里许,山虽不高,却历来被称为江阴主山。书院时期,君山遍山青松,是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的前任夏同善所载,“至今幽郁青葱、蔚然深秀者,皆其遗荫也”。^①南菁诸生登临君山,恐怕多少也有一点纪念前贤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想凭高眺远,一吐胸中郁勃之气。

唐文治回忆他在南菁时与诸同学相处的情景:

或宿舍谭经,或讲堂角艺,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暇则登君山,览长江,天风朗朗,遥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为狂,而吾辈不顾也。^②

真是书生意气,狂态毕露,一洗平日在书院师长前拘谨慎微的习气。

然而,南菁诸生登临君山,也不全是为“一吐胸中之奇”,有时,文人特有的悲切缠绵之情,也会从胸中自然流露,倾泻无余。宝山邵曾鉴,“为文师韩柳,上追马班,尤工词赋,超然万物之表,风发泉注,清莹高朗,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概”。前辈学人都很器重他,说“此君天才,亦国士也”。但邵曾鉴身在南菁,却心在故乡,因故乡有他情深恩笃的妻子独守空房:

故每当登君山,瞰大江,砉然长啸,浩然孤吟,诵苏子瞻“千里共婵娟”之句,不胜黯然销魂,时时有离别之感。

又复自顾身世,侘傺郁伊,乃更落拓自放于酒,醉后歌呼呜呜,或竟露宿达旦,不自顾惜。……岁科试屡居第一,有时文太奇,有司故斥之,君亦不以为意。尝作《今月曾经照古人赋》,有句云:“半霎红尘,一抔黄土,蟾何为而光新,鹄何为而啼苦?”又云:“此时痛饮歌呼,笑明月依然明月;他日乘风归去,任后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夏同善传》:夏“先是奉廷寄巡阅黄山炮台。经君山,至梅花书院故址,慨然曰:‘君山乃江阴之主,不宜荆莽荒凉。’出廉俸,往苏浙采备松秧三万余株,满山栽种,商请淮军总统唐定魁派兵巡驻。至今幽郁青葱、蔚然深秀者,皆其遗荫也”。

② 唐文治:《陈君善馀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人复哀后人。”

邵是性情中人，虽有“天才”、“国士”之时誉，终因不容于世，“得呕血病卒”。^①邵曾鉴的不幸人生，也让我们看到了南菁课生刻苦攻读经学、古学现象的另一面，而这或许更能真实反映这些学子的内心世界。

比邵曾鉴略晚入南菁肄业的太仓姚鹏图，离开南菁十年，后东游日本时还念念不忘南菁，不忘君山，他在《丙午八月日本修文馆讲席赠南菁同学》诗中说道：

南菁文藻久荒芜，尚有君山一卷图。但使遗珠返沧海，未妨吾道在江湖。^②

又如地处江苏最北端的徐州府铜山县的杨允升，千里迢迢南渡淮河、长江，来到江阴南菁书院。在攻读经古之余，其乡愁较其他同窗更为浓郁。他在和青浦张家镇《端午感怀原韵》诗中写道，平时登临君山，是为北望故乡，如今端阳佳节，却“千里关河”，游客滞归，思亲依依，不禁畏上君山，空劳望眼：

一春花事如烟去，千里关河滞客归。正是浴兰好天气，那堪尘曲扑征衣。旧游钟阜巢都换，此乐南皮(?)人已非。莫上君山劳望眼，白云亲舍思依依。^③

书院晚期课生吴县单镇，光绪二十八年进士，成名后仍不忘书院生活，于光绪三十四年，在京师请友人将自己生活经历按时间次序绘图二十幅，其中第二幅便是“君山访碑”，自称：

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每登君山眺望，摩挲石碣，颇寄幽情。

他晚年自订年谱，忆及庚子国变，“联军入京，两宫西狩”，然“江左宴然，幸未波及，士子弦诵如常”。

余仍往来江阴，肄业南菁，登君山北望，愀然有“瞻乌爰止”之感。^④

二 瞻仰三公祠和睢阳庙

(一) 三公祠

江阴号称忠义之邦，明末乙酉(1645)，江阴百姓抗清八十一天，城陷，无一人投降。后建三公祠纪念阎应元等抗清领袖。南菁诸生暇时也常去瞻仰。江阴王绍曾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晚年回忆：

① 唐文治：《邵君心炯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② 姚鹏图：《扶桑百八吟》，杨寿枏：《云在山房丛书》十四种，1928年铅印本。

③ 百度百科，杨允升条。http://baike.baidu.com/view/4830464.htm?fr=aladdin。

④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三公祠内原悬有阎应元就义时在壁上的题联：“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众同心取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三公祠系由栖霞禅院改建，民国间创办辅廷小学，三公祠尚保留原貌。）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吾师唐文治先生在南菁书院肄业时，常在三公祠徘徊瞻仰不忍去。我在无锡国专肄业，唐师于讲课时，对阎典史就义题联背诵如流，勉励学生立身处世，必须以阎应元为榜样。六十余年以来，未敢或忘。

王绍曾先生不止一次的提到其师唐文治赞扬阎应元的抗清气节，他说：唐先生“每于无锡国专讲授诸葛武侯《出师表》时，辄举阎典史‘三十字联’以劝勉诸生”。^①

金松岑比唐文治晚进南菁十余年，三公祠也是徘徊瞻仰不忍离去的地方。他写有《江阴寻阎典史祠》一诗，录如下：

爵秩劝忠孝，降臣多大官。山河壮天险，雄兵挫弹丸。典史守暨阳，不戴兴朝冠。弯弓死名王，叱咤老据鞍。苦斗八旬余，力尽大节完。闵忠爱其死，庙食留江干。江流逝不息，客愁来无端。丰草锁林扉，神鸦诏晚寒。灵爽不可即，惻惻凄我肝。会当濡大笔，丰碑建桓桓。^②

（二）睢阳庙

睢阳庙也是南菁诸生徘徊瞻仰之处。睢阳庙在大街虹桥西，为明弘治九年（1496）知县黄傅所建，祭祀唐张巡。清乾隆十二年（1747）改建，在张巡旁又列南霁云、雷万春两人配祀，并铁铸贺兰进明跪阶下，观者必箠击之，到后来只存下半个铁像。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后又次第重建。至黄体芳督学江苏，于光绪十年（1884）又加重修，并亲撰联二副，勉励南菁诸生重气节，讲事功，倘时局有变，希望能出曾文正、左文襄其人。其一云：

男儿死尔复奚言，若论唐室功臣，四百战勋劳岂输郭李；
父老谈之犹动色，敢吁扬州都督，亿万年魂魄永镇江淮。^③

孙雄晚年回忆三十多年前于南菁求学情景：“吴季子之墓碑，张睢阳之庙貌，往时鼓歌讽诵之余，所徘徊而瞻眺者，犹萦绕于梦寐之间。”^④从不曾忘记张睢阳之庙貌。至于吴季札之墓在城西二十余里之申港镇（缪荃孙故居所在），估计南菁院生

① 王绍曾致薛仲良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99年10月12日，2000年元月28日。

② 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③ 光绪《江阴县志》卷九《秩祀·庙祠》，民国《江阴县志》卷八《秩祀·庙》。案：另一联则见于第七章第四节之一。

④ 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

因途远而瞻仰不会频繁。

三 多才多艺

南菁课生研习经史词章之余，也常抒发传统文人的雅兴，喜欢以琴棋书画作为消遣，略举数例：

武进蒋维乔为其四十年前的南菁同学江阴曹家达(字颖甫)作《传》：

江阴昔有南菁讲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业于此。或深通经术，或擅长词章。其为人，或笃厚淳谨，或风流放诞。乙未年，余与颖甫先后入南菁，而余以“狂”名，颖甫以“憨”名，人皆呼为“曹憨”，颖甫曰“善”，亦辄自称“曹憨”焉。余之初遇颖甫也，彼此眼高于顶，覩面不语。既而在宜兴储南强斋舍中不期而遇，南强温文倜傥，同学中皆乐就之，与余尤称莫逆。南强指之曰：“此曹颖甫，诗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憨耶？”颖甫辄应曰：“是也。”

余斯时因养病，习七弦琴，略知数引，颖甫闻琴，大喜。每日至余处静听之。尝云：“曹憨向不肯下人，今于君乃心折矣。”^①

看来，蒋维乔七弦琴的弹奏技巧还真不错，否则也不会使“眼高于顶”的曹颖甫“心折”。

不过日后在音乐上真有所成就者还推童斐，童斐学行见光绪十九年《学友录》。

蒋维乔在《曹颖甫先生传》中又说：

颖甫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壬寅登贤书，科举废，即绝意进取，征选知县不应。常藉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画拟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洒落，含道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焉。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

那么，曹颖甫的梅花画得如何呢？当曹颖甫请同是南菁同学的金松岑为其诗集作序时，金松岑便要曹颖甫投桃报李，先给自己画一幅梅花：

颖甫老不得志，而隐于岐黄，时时画梅以自遣，余既诺为序，又必先索其梅以为报，颖甫不余靳也。^②

能被金松岑看得上眼，曹颖甫的梅花一定画得不会差。

① 蒋维乔：《曹颖甫先生传》，《江阴文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10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页。

又如南汇于鬯，“著书有暇，则习为绘事，所写墨菊，尤高澹绝尘”。^①

关于南菁课生闲暇下棋的事，唐文治有这样的记载：

戊子，二十四岁。夏日，王益吾先生招余入署弈围棋，见国手周小松先生，受九子，余获胜。^②

唐文治在被周让了九子的情况下取胜，与国手差距甚大，唐文治道德文章为世人所仰慕，但棋艺毕竟被看作是“小道”，唐当然不会在这上面多下功夫。但好歹胜了国手，所以唐自订年谱时还不忘提上一笔，因为其他同学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光绪朝，王益吾祭酒先谦督学江苏，曾邀围棋国手周小松至江阴学署，令与南菁书院诸生之善弈者弈，诸生震周君，逡巡不敢往。苏人某，性卑鄙，棋甚劣，好自负，以得入学署对弈为荣，遂欣然而往。比对局，某无子得活，乃抱头鼠窜矣。^③

田其田也喜欢弈棋，有追忆吴稚晖的文章说：

吴先生最投契的同学，是南京田北湖先生其田，据当时同院诸公说，院中最聪明的是他两位，最活跃的也是他两位。田先生后来很喜欢手谈，而吴先生则否。^④

至于书法，那可算是书院课生与生俱来的功夫，有意无意，天天在练。唐文治在乙酉日记中就记载，他在该年二月，每天晨起，大都会临“九成宫”五十至一百字。三月，则临“玄秘塔”。吴稚晖亦在日记中记他每日勤练书法的事。

日后，书院课生中以书法著名于世的不乏其人。吴稚晖以其篆书被称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又如松江耿葆清晚年在家乡结“松风诗社”，可是诗社中人却评其诗名在书名后：“平生尤耽书，晚年双目失明，犹能臆光弄笔。索书者多，亦不自矜重也。先生为人，不立崖岸。论者谓其人品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云。”^⑤

四 文人相轻

然而，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南菁书院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后期。前期课生讲修身，行事较为含蓄。金松岑回忆：

①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十八《游寓传》。

②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

③ 《清稗类钞·艺术类》第九册，“某生以对弈为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186页。

④ 杨定襄：《追念稚老小记》，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⑤ 沈其光：《餠粟斋诗话初编》卷四，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瑞安黄漱兰学使创南菁书院于江阴，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俊之士，多出其中。光绪戊戌，朝廷始议变法，书院亦改科目以应功令，余奉学使者瞿文慎师檄，调充学长。同时受檄者，吴县潘叔重敦先、阳湖赵君闾宽、长洲裴萸芳熙琳。君闾年事最富，气傲兀睥睨侪辈；而萸芳广交际，玩世不恭，时饮酣使酒骂坐；叔重恂恂有贵公子态。余以年少，阶资浅，日闭户诵习，示不敢与同舍颀颀，同舍颇传余立崖岸。顾习知余者，谓余平易无矫饰。余卒以是被狂名二十年。^①

金与同里钱崇威似亦不甚融洽：“钱崇威为末代翰林，与鹤老有隙末之嫌。两贤相厄，人比之李越缦与赵撝叔，高邕之与李梅庵。”^②

又如前所述，有些院生对斋长的待遇丰厚也很不服气，凭什么斋长要多拿膏火，“若谓学业过人，则恐较短量长，正不知鹿死谁手也”。其实，能当斋长的，一般都是院中公认的高材生，“较短量长”云云，乃文人相轻，意气用事之言。

院生遇到不愉快事，所发牢骚之语匪夷所思。吴稚晖离开南菁，应课苏州紫阳书院时，诸事不顺，想起了南菁好友钮永建所发的牢骚之语：

记友人上海钮君曰：士人作书院课生，有同娼妓，揣声摹色，冀得大老欢。得则倾其同侪，不得辄菲薄人，自以为负屈久之，遂毁妆。本无绝丽之质，潦倒既久，亦自觉其可憎。嗟嗟，悔恨无及矣。^③

五 遗闻轶事

(一) 吴稚晖在其残存的南菁札记中记有一些他在书院求学生活的片段，这所见所闻，既真实，又有趣，录几则如下。

书斋失窃

(光绪十八年壬辰)八月初一，昨晚，溧阳石君，为偷儿窃去衣物，据云值七八十万钱。

日晡，江令刘某与典史某，履勘贼踪，居然升讲堂，笞责更夫地甲及捕役。主讲黄公梦梦，不知喝止，其他院之经董，更属贖贖，可歎也夫。^④

①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页。

② 《郑逸梅选集》第六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癸巳日记》，“吴市余生”，第154页。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第94页。案：此事发生的月份疑误，前记已是八月，此处似是九月才对。该年闰六月。

石君，即同学石铭，字怀瑾，溧阳人。某夕被偷价值七八十万钱的衣物，这当然不是件小事。明日中午，江阴知县亲自带了典史到南菁查案，竟将书院讲堂当作县衙公堂，小偷还没抓到，更夫、地甲及捕役等相关人员却先受到了笞责。知县在传道授业之地审讯案子，大动干戈，吴稚晖认为有辱斯文，而院长黄以周和书院经董均未加阻止，故吴在日记中直斥院长“梦梦”，经董“聩聩”。

讲堂刑人

八月(案：似是九月)初九日，某公不悦于发匠，某仆招之来，滋其怒，扑某仆二十，方寝其事。此偏任意气，故有是失。儒者，顾可不以持敬为先事耶？于是讲堂刑人之机兆。^①

因为仆人招来了主人某公不喜欢的理发匠，引起主人大怒，责打仆人二十下，方息怒火。吴稚晖认为儒者应以持敬为先，不可偏任意气。否则，如此发展下去，这书院讲堂不就成了刑责课生之处了吗？不知此处“某公”所指为谁，黄以周，林颐山，还是某经董，某课生？不可考矣。

掷砖瓦于江阴知县之轿舆

吴稚晖《壬辰日记》记载：

十一月十八日补书：十月二十七午，江阴令乘舆过文庙，余掷砖瓦警之，被拘。同院大愤，请责奴隶，不许。二十八，噪于院。二十九日，余与香如、铁臣、迈卿、黼臣、石怀瑾东归。十月(案：应是十一月)二十一，院长白其事于学使者，乃假两人枷示院门论事。^②

陈洪、陈凌海编《吴稚晖年谱简编》叙述此事，则云：

十八年壬辰(1892)，二十八岁，十月，以江阴知县乘舆过孔庙未下轿，同学田自芸(其田)、(康)[唐]浩镇、王英冕认为“非圣无法”，拦舆质询，以石投之，先生暨钮永建和之。知县怒，拘田自芸入县署，先生率同学拥往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子为非法，乃以轿送先生回南菁书院。但山长黄以周(玄同)不满先生之所为，旋回无锡。

据此《年谱》所说，好像开始闹事者为田其田、唐浩镇、王英冕，吴与钮永建只是应和。后田被拘，吴率同学去县署交涉。则似吴虽自承被拘，估计随即放归，并未被拘入县衙，因吴当时已有举人身份。此事发生在十月二十七日，过了近一月的时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第88页。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第112—113页。

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处理,大概江苏学政溥良正按试在外,不在江阴,而事涉知县,院长黄以周也无法应对。待溥良回澄,作出处理,结果是“假两人枷示院门”,苦了两位当初狐假虎威的差役。然而吴亦因此事离开了南菁书院。

南菁书院院生对过孔庙而不下轿之江阴知县掷以砖瓦之事,当时传遍江阴城内,以致三十年后,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

吴稚晖等在课余之暇,夕阳衔山时节,往往至龙头桥旷阔之处散步,或在中街会征坊桥闲话,换吸新鲜空气。某日,吴等四五人,又在会征坊桥上闲眺,或并坐石栏,或箕踞桥级,状颇闲逸。适知县刘有光开道吆喝而来,过桥入礼延书院有事。舆前衙役,即厉色斥吴等,命之起立,前清父母官来,固应尔也。

吴、纽诸人,见而恶之,待刘过去后,即密约同侪,各执砖石,至文庙前龙眼中埋伏,倘刘有光回衙经过此间,不避道,由龙眼中绕越,直接当门而过者,彼蒙违例不敬之罪,吾侪即伏兵攻之,敬以砖石,以泄此时之忿。计议既定,如法往候。

未几,刘有光事毕回衙,果不绕龙眼而直接冲过,轿至照壁中间,吴等突从龙眼圈门中跃出,砖石雨下,轿旁玻璃尽毁。刘有光陡吃一惊,停轿呼撻。吴等昂然而至,谓刘曰:“公祖知孔子为何如人,文武至此,例应出轿下马,刊有碑文,而公祖独欲乘舆而过,是何道理。”刘有光情知不妙,询知南菁诸生,即拱手任过,纵之回宿舍,并丐山长为之调停,其事始寢云。^①

此处记叙,较吴本人所记及《年谱》所载均为详细,但最后知县“并丐山长”云云,恐怕夹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渲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实,吴对此事还是追悔莫及的,他为此停写了一个月的日记,后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月不书,何也?不安本分,忽有十月二十七之事,几于倾危不治。幸而无事,已声名败裂,取笑交游,传闻道路,取讥老成。然痛定思痛,伤哉!皆入世之心太热也。此后当践宿言,绝交游,恶浮名,以自全其天年(二十七之事,俟事有究竟,别书之)。^②

山长纳宠

昨叔方在南京拜老师回,渡江见江四,着天青呢马褂,蓝呢袍子,红帽子。急问何事,江四摇手曰:“山长纳宠。”问人在何处,云在洋蓬子里。伯安先去

① 徐再思,《澄江旧话》,《吴稚晖纽惕生孙揆均在南菁轶事》,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第112—113页。

看，一看，云“不好。”叔方诸人同去一看，见满面大麻子。叔方对江四曰：“如今你饭碗不成了。”江四大怒曰：“七八十老人做得来如此一个少艾，好极了，尚要嫌坏。”及回，黄山长版领方头（案：吴在下还画一形状图），天青宁绸马褂，日在藏书楼下走了三四天了。及见了大面麻子，不觉大喜。秦毓麒来道喜，山长不敢当。因他今年儿子也中了一个举人，遂即过去还道喜。此叔方为余亲言之，价二百四十洋，极昂，有潘姓做媒人，此女听说是总督寄女。^①

吴稚晖记此事在民元前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时孙揆均中举，故在南京拜谢老师（主考和房师），回来时碰见黄以周“纳宠”。黄以周此时已六十多岁，“纳宠”估计也是为了照顾老年生活，所以“见了大面麻子”，竟会“不觉大喜”。南菁监院、江阴教谕秦毓麒来向黄以周道喜，黄赶紧也过去还道喜，因为其子秦曾源也中了此科举人，而秦曾源也是黄以周的南菁弟子。此时吴稚晖已离开南菁两年，山长纳宠之事是由孙揆均告诉他的。

（二）程宏远在日记中记学政衙吏敲竹杠一事，也可算是一则活生生的科举史料：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四月）廿五日，照常上课。海州人丁锡福字响卿，庚子优贡，向在南菁。定例，考取优贡之后，须向学院领取贡单，方可进京朝考。去年丁远道来此，学房科索费过巨，未曾领归。在途遇风，船被覆没，人几溺死，故恨入骨髓。现朝考期近，房科知不可缓，即将贡单费送来堂，丁见之大怒，旁人亦代抱不平，该房科无可奈何，狼狈而去，挽同堂课生江阴人谢某为之说项，丁竭力艰拒，不鸣一钱，纷纷扰扰，尚未了结。^②

丁锡福是海州（今连云港）人，千里迢迢南下江阴，肄业南菁书院多年，好不容易得庚子优贡，却被衙吏大敲竹杠，自己在返乡途中险被葬身水中。衙吏上下其手之可恶，院生受辱无告之可怜，跃然纸上。

第三节 师生之谊

书院师生关系融洽，即便学生离院后，仍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略举数例，以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二）》，《锡报》（民元前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十月初三止），第152页。

②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案：江阴人谢某，疑为谢鼎镛。

见师生情谊之深。

一 南菁诸生对张文虎的怀念

张文虎在南菁讲学仅四月(癸未秋七月赴江阴,冬十一月旋里),然而亲炙门下之南菁弟子,对他感情很深。张于光绪十一年春逝世于松江,噩耗传来,南菁弟子武进刘毓麟作祭文。刘回忆,夫子离开江阴时,雨雪纷飞,南菁诸生送至城南:“回飏劲榷,雨雪濡轨。夫子曰归,徂两戒矣。载治任从,于城之南。”从此,“瞻望弗及,吴云阻深”。一年后,“流润三泖,峰颓五茸”,夫子逝世。遥想当年,“养一之歿,暨阳中微”,而夫子来主南菁,犹如“屯我时雨,犁我春风。”如今,“矧逝夫子,蒙将安归?”南菁诸生纷纷“低徊登堂,云何弗思?”^①

南汇于鬯挽联云:“从早岁东西奔走,垂老归来,却又撇故乡子弟;合大江南北菁英,一齐俯首,也算得满眼儿孙。”^②上联说先生垂老归来,却离开故乡,赴江阴主讲南菁,如今是真的撇下故乡子弟,撒手西去了。下联是说,尽管先生晚年无子,然而眼看南菁众多弟子群从受业,恰如儿孙满堂,此生亦不必遗憾。

二 黄以周与南菁诸生之情谊

黄以周主讲南菁十五年,与诸生终日讲学论道,师生情谊久长,尤其是书院前期、中期研读经学的院生,如唐文治、陈庆年、曹元忠、顾鸿闾、王兆芳等,住院日长,朝夕相处,感情尤为深厚。如以地域论,好像黄以周与通州学生的交谊更为密切。王兆芳在老师生前,如同孔门弟子为孔子编定《论语》那样,便辑录其师徽言绪论,成《傲季子粹言》二卷,七个门类;老师死后,又为其撰写《行状》。而上奏朝廷,请国史馆为其师立传的,则是通州的崔朝庆和顾鸿闾。醴金为老师刊刻《经训比义》者,也是通州学生居多。

(一) 南菁诸生醴资为老师刻书

《经训比义》为黄以周早年受阮元《性命古训》影响而所成的书稿,“秘藏家塾垂四十年”,一直不肯刊印问世。黄说:

南菁讲舍诸生闻有是书,屡进索观,不与,遂以我为隐。乃出而示之曰:

① 刘可毅:《祭张啸山夫子文》,《刘葆真太史遗稿》卷下,清宣统二年刻本。案:三泖,五茸,指松江。养一,李兆洛,暨阳,江阴之暨阳书院。李兆洛在道光年间主讲暨阳几近二十年。

② 吴恭亨:《对联话》,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5页。

“是书之作，条析字义，而读陈北溪书者，将谓我违异师说；读东原《疏证》者，将谓我调停宋儒。大道多歧，孰能是正？编辑旧闻，自求印证而已。”诸生有进而言曰：“仲尼殁，微言将绝。读是书，炳如日星矣，可以发陈氏之墨守，可以砭戴氏之狂器，诚有功于先圣，大有益于后学。请早付梓，以供同好。”恧再四，予频却之。

然而，南菁诸生乘老师赴分水县训导任数月之际，竟自筹资金，为老师刊成此书，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黄以周回院后，为作弁言，称：

比抵分水任，通州顾泽轩鸿闾、孙敬臣傲、静海崔聘臣朝庆、金坛林晋安之祺、江阴王吉臣家枚暨定海王雅三亨彦等，遂自集贲校勘是书。余回讲舍，闻而瞿然，曰：噫！滋予媿矣。诸生家各寒素，为好乐是书，自任刊贲，予心既有所不安。而以周踵顶皆过，自攻治且不遑，亦何可以此衒世？然予之所述者，经传也；所辑者，故训也。间附私说，自明去取之意，“非曰能之，愿学焉。”诸同志谋刊是书，勿滕口说，务求躬行，其与我共勉旃。^①

（二）黄以周请学生陈庆年写家传

陈庆年离院后，师弟间仍通信频繁。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四日，收到黄以周信，由于黄连日患病发热，衰惫之极，故此信还是由杭生执笔代书的。黄以周在信中请陈庆年为他家人写两篇家传：

善徐仁弟大人经席：迭接来书，屡不作答，一则年老，懒于笔墨；二则自去冬以来，日发寒热一潮，肌肤消尽，精神惫极，执笔未及一刻，手臂酸麻，一切友朋之信，概置不答。有关切要事，口授数语，令杭生代书之。愚之衰惫一至于此。《傲季杂著》早可刷印，亦为病故，拖延至今。装成一部，奉送执事，且请为我作家传两篇：一陈孺人家传，别有事实附后；一亡儿镇青，事迹略具。望早赐传，可补刻入题词后，且愚病如此，不久将就木，时以一见为幸。^②

陈庆年很快完成老师的嘱托，为黄以周侧室陈氏和子家岱立传，成《黄氏庶母陈孺人传》、《黄家岱传》。陈于九月二十五日收到黄以周的感谢信：

善徐仁弟大人经席：昨二十四日接到尊翰，并读鸿文两篇，俾我亡室亡儿遂得传于后世，不朽于泉壤，感戴无既。迩时朋侪能细读我书者，曾无几人，又于几人中，求其文章尔雅者，更难其选。我之日后志传，非藉大笔，恐

① 黄以周：《经训比义·弁言》。

② 陈登丰：《陈庆年年谱》。以下引文出处同此。案：杭生，不知何人，待考。

亦黯然无光也。

时主政南菁书院者为龙湛霖，正在书院中“输格致新法，购置译籍表器”，^①书院诸生亦多关心时务，涉猎西学，经学愈不受重视。黄以周很是无奈，故在信中感慨道：“迩时朋侪能细读我书者，曾无几人。”至于信中流露出百年后自己的《墓志》、《传》亦想请陈执笔的意愿，则日后分别由缪荃孙、章炳麟完成。

（三）王兆芳作《傲季子粹语》

章太炎称“通州王兆芳尤亲”，黄以周歿后，王兆芳为作《行状》，然此《行状》至今未见载于何书。王兆芳所作《傲季子粹语》则存。王兆芳为学，一本师说，还将老师平时的教诲，按七类编纂成《粹语》二卷，分别是《士职》、《师教》、《读书》、《古术》、《道德》上下篇、《伦教》、《丧记》八篇，黄以周治学理念大略可见。不过，黄以周在为王兆芳的《才兹集》所作的序言中，很谦虚地说“王生漱六从予学有年，自订其文若干篇示予读之，知多本予之绪论。予方自媿鄙陋，不足以发明经史”云云，还说：“一师之说未可偏守也。”^②显示出黄以周宽博的治学胸怀。

（四）白作霖请老师黄以周写序

南菁诸生撰书，大都请老师赐一序言，如曹元忠、陈玉树、陈庆年、王兆芳等。前有提及，不赘。而通州白作霖在诸弟子中显得有些特别。白在南菁书院肄业四、五年，治经甚力，自称：“忆自辛卯春肄业南菁，明岁住院，始从黄先生受经学。先生教以治经从《毛诗》入，于是日为割记若干条，积三年得十数巨册，今犹皮藏讲舍中。”^③“嗣是更为《三礼郑注释例》，经始于乙未二月，讫丙申冬，仅成两卷。”“丁酉春仲，乃更入上海南洋公学，校课尠暇，势不能复理旧业。……爰将已成初稿并前此在讲舍时所作文百有余首，写寄澄江，求师一言，以为评定。”

白作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7)入南洋公学，已致力于新学，却仍不忘黄先生和他传授的旧学，还要将自己在南菁书院所作的《三礼郑注释例》未成稿二卷，以及光绪十八年(1892)至二十二年(1896)四年间的书院课作，包括经说、杂文及辞赋共百余篇，汇成《质庵集》，由上海寄呈尚在江阴南菁书院讲学的黄先生，请先生赐一序言。

① 陈三立：《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

② 《才兹集叙》，《黄以周全集》第十册，《傲季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3—524页。

③ 王逸明：《定海黄以周先生年谱稿》，《黄以周全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34—735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三 其他师生情谊之点滴

(一) 孙毓修追忆王亦曾

王亦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接替林颐山,主讲南菁书院词章,孙毓修亲承警歆。后孙寓苏州,与老师过从甚密,并做过其子王彊之的塾师,两人愈见亲近。十多年后,孙毓修整理旧帙,发现一份自己的壬寅乡试草稿,回忆往事,师恩难忘,便在稿上题一跋语:

此光绪壬寅秋试场中草稿,是科始废时文,改策论。余寓吴门,治英国文字,无意秋试。王鹤琴师督之,谓必去。因赴京口,与吕君明叔同行。及还吴,鹤师索观场艺,虽蒙激赏,然竟未中,命也。丁巳春间得此于字麓中,为题数字。鹤师之墓早有宿草矣。追怀知己,掷笔怆然。留翁。明叔即于是冬化于厦门,距今题此时不及一岁也。^①

一年后,孙毓修重睹王彊之手札,爱屋及乌,悲从中来,在书札后写下一段文字:

右及门王彊之手札五通,彊之,鹤师仲子,英年好学,绰有家风。精畴人家言,就北京大学之聘,声华藉甚,方期远到。宣统初,遽以瘵疾卒于西湖。斯人不禄,无可言者,检点遗墨,书此志痛。戊午九月,留菴书于沪寓。^②

(二) 徐点撰赠书不忘师恩

华世芳是南菁早期课生,戊戌年(1898)后又重返南菁主讲算学。武进徐点撰是其及门弟子,对老师教诲之恩终身不忘。华世芳之同乡后辈钱穆,清末就学于常州府中学堂,恰遇徐点撰临时代课,钱穆记其最后一课:

先生最后一堂课,手持书八本,乃先生自著书,告诸生:“我尝从学于无锡荡口镇之华蘅芳、华世芳两先生,今班上有荡口镇同学八人,当各赠我所著书一部以为纪念。”先生即下讲台,首以一本给余,余坐讲堂之第一位,其余皆在后座。先生一一走就其座授之。先生平时似乎高瞻远瞩,双目在云汉间,俗情世事,全不在眼,乃不意其知班上有从荡口镇来者八人。徐七人皆姓华,独余不姓华,亦从荡口镇来。^③

① 孙毓修:《壬寅秋试稿》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②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书前图版“孙毓修手迹”。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5页。案:徐自称从学于华蘅芳、华世芳,是统而言之。南菁诸生不可能亲炙于华蘅芳,然因世芳而阅读其兄蘅芳之著作,而私淑蘅芳,亦在情理之中。

徐点撰回报师恩，竟泽及乡梓，钱穆叨华姓之厚遇，也得赠书一本，使他也终生难忘。

第四节 南菁同窗友谊的回忆

一 唐文治悼念同窗亡友之至情至性

南菁课生在院时切磋学问、谈道论艺，相互间结下了深厚友谊。早期课生唐文治住院肄业四年，交游很广。我们可从唐文治悼念同窗亡友的许多至情至性的文章中，感受到南菁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

唐文治为宝山邵曾鉴写《传》，对邵的文学天才赞不绝口，又对他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

……丁亥春，始遇君于江阴之南菁书院，一见，乃大欢洽。君为文师韩柳，上追马班，尤工词赋，超然万物之表，风发泉流，清莹高朗，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概。后过太仓，先君及先师王文贞公皆大器之，曰：“此君天才，亦国士也。”当是时，余谬负文名，同社之士，或敛手称服，尝于尊道书院中，会文秉烛，酣嬉淋漓，然从不敢与君角文艺。盖文之至者，曰雄曰奇，曰清曰劲，此在审于法度，明于阴阳刚柔之义者，尚能为之。若夫皎洁无尘，旷绝千古，则天也，非人也，君独专而有之矣。君为人清皎出俗，俯视一世，天性尤纯粹。……尝作《今月曾经照古人赋》，有句云：“半霎红尘，一抔黄土，蟾何为而光新，鹃何为而啼苦？”又云：“此时痛饮歌呼，笑明月依然明月；他日乘风归去，任后人复哀后人。”予读之，愀然以为不祥，亦莫能止也。……论曰：余昔年挚友不为不多，然性情意气文章相契合者，惟君一二人而已。此时风雨之夕，知交满座，把酒问天，拔剑斫地，余谓吾辈自有千秋矣。而君于酒后，每为余言其尊人病歿舟次事，未尝不垂涕，偶值其弟心湛在座，常淳淳训诲，并属予勸勉之，盖孝悌之忱，发露于不自觉，其至情至性，岂寻常人所能及哉。先君就养京师时，屡询君状况，迨其卒也，咨嗟太息者数日。呜呼！今先君已弃养矣，余为君传，所以往复低徊，不禁泣数行下也。^①

^① 唐文治：《邵君心炯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当年，邵曾鉴死后，在京师的南菁同窗曾为其募集助丧经费，由曹元忠执笔写《启》，附录如下：

助邵心炯丧启

岁乙未，某等客京师，闻宝山邵君之赴。悲夫，煎膏戕翠，竟凋龚生之年；伐性驱龄，悽讽彦和之语。好学短命，良用叹息。意夫弥留之夕，宛转寝床，当有视高堂而不瞑，对房帟而欲绝者。诚知於陵之母，更无敬养之时；黔娄之妻，非复食贫之况。必至望炊寂寂，灶冷三隅；恤纬茕茕，灯寒次室。此则九渊之下，隐泣何穷；永诀之时，欲言不得者也。於戏，故人往矣，岂忘家累于平时；生者嗷然，慙使相从于地下。伏希在位君子，久要良朋，存任恤之深心，援相赙之大义。庶几北江故友，街风谊于弁山；东园无人，佩高情于曲阜。谨启。^①

唐文治为丹徒陈庆年写《墓志铭》时，怀念亡友，几乎泣不成声：

……余挥涕不能铭，然不能不铭也。……犹忆丙午岁，余亦丁先妣忧，君贻书慰藉，并述柳太夫人遗言，谓“他人母皆死，汝独求母长生，无是理也，毋为愚孝灭性毁身”。读之不禁泪血交迸。……辛酉岁，余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延君主讲，君复书谢曰：“吾病矣，不能行，我设传经堂，子辟国学馆，从此终隐可矣。”呜呼！曾几何时，章君逝世，余既为文哭之，今又哭君而为铭，俯仰身世，沧桑之变易，朋旧之凋零，益复累叹唏嘘而不能已已也。^②

唐为太仓同乡毕光祖写《传》时说道：

……余与君偕赴南菁试，余方潜研性理，君务博习多闻，人或相嘲以汉宋门户，不知余固祧许郑，君亦服程朱，相师而不相非也。当是时，友人张君拙嘉以词章负人望。乙酉，君举优贡，拙嘉得拔萃，三人实相往来，饮酒论世，上下古今，旁若无人者。逾年，拙嘉歿于京师，余与君哭诸寝门外，君泣^③然曰：“拙嘉家贫，巨卿之责，非吾两人其谁？”则与余稍稍饮助其丧。……辛未春，诸乡人会饮，与君谈少年事，余笑谓君曰：“逾数年，君重游泮水矣。”君默不语。是年冬，凶问卒至，回忆五十年交情，不觉泪之盈睫也。……^④

唐在毕传中提到的“友人张君拙嘉以词章负人望”，唐、毕、张均是太仓同乡、南

① 曹元忠：《笈经室遗集》卷十五。

② 唐文治：《陈君善馀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③ 案：泣，疑是泫之讹。

④ 唐文治：《毕君枕梅传》，《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七。

菁同学。三人中，张树莫去世最早。四十年后，唐为之作《传略》：

……顾天不永其年，未四十而死。其尊人雨甘先生哭之极恸曰：“吾此后无余望矣。”余与挚友毕君枕梅闻之咸流涕焉。君好谐谑，见余著述，笑曰：“如子所作，正覆觚耳。”其死也，余作挽联云：“野鸟至，主人去，太傅何心，竟忍一朝委躯命；解嘲难，覆觚易，子云复作，再成数卷畔牢愁。”盖伤之至也。今距君之卒已四十年矣，思君不能置，故为之传，盖其言笑丰采宛然心目间也。^①
唐又为武进刘可毅作《传》：

……余与君同学于江阴之南菁书院，又同举于礼部，知君较稔。君既歿之八年，葆良以状来乞传，爰撮君之生平，以备后之史家采择焉。论曰：余与君初相识于书院时，谈经论史，商论古今，旁若无人者如昨日事耳。拳祸作，余时避地京师北山之阳，鹤唳风声，几不能免。及出，闻君死，则大戚，泣下不能已。……^②

唐在南菁书院的同学，后又执贄称弟子者于玉峰早逝，唐不胜伤感，后为其遗稿作《序》，内称：

光绪戊子之春，余与玉峰始相见于江阴南菁讲舍，时玉峰年十七，……岁杪，余乞假归省，将赴礼部试，玉峰叩别，依依若不胜悲者，且谓：“先生归，吾焉所请益？”余亦不自觉其怅然，亟告以相别无几时耳。余己丑下第，暂馆津沽。冬间得同年章君琴若书，谓玉峰以病歿矣。余大惊悼，为出涕者数日。……悲夫，玉峰之死，岂特于氏之不幸，固吾党之不幸也。……^③

唐文治晚年见到南菁同学陈浏之外甥女出示其舅的墨迹，不禁感慨系之，“翻阅数四，曷禁恍然”。并为之题词：

陈亮伯兄讳浏，与余少年时同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中年时同服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今改称外交部）。当同学时，有若江阴章琴若太史际治、沙循矩内翰从心、吴县曹夔一内翰元忠、曹叔彥太史元弼、丹徒陈善余明经庆年，一时人才，彬彬极盛，而余与亮兄参与其列，有时春秋假日，饮酒论文，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昔人诗云：“昔年朋旧半凋零”，回忆从前友朋盍簪

① 唐文治：《张君拙嘉传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② 唐文治：《刘君葆真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③ 唐文治：《于玉峰遗稿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

之乐，昕夕切劘，何其盛也。洎乎彼此分袂，天各一方，追溯旧游，邈不可再。……^①

二 吴稚晖笔下的南菁同窗

同样在南菁肄业四年的吴稚晖，为其南菁好友孙揆均的《寒厓诗集》写序言时，记录了不少南菁师友的情况：

余不能诗，亦不好为诗，故年二十有三，著学籍。适其时瑞安黄体芳，长沙王先谦，茂名杨颐，长白溥良，先后督吴学，建南菁书院，刻《续皇清经解》，振朴学于东南。讲学南菁者，有南汇张文虎，定海黄以周，江阴缪荃孙，慈溪林颐山。余应选入南菁治学，第一日谒定海先生，先生铭其座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心窃好之。与无锡范彝、许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纪礼诂，不暇为词人。

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钮永建。永建来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龄天才，为杨颐所拔。颐取永建所为古文词，邀番禺梁鼎芬评定，鼎芬尤礼重焉。厥后，永建弃书肄剑，入湖北军校，鼎芬为监督，左右之甚至。

时长吾曹舍者，为丹徒陈庆年。庆年为经师柳兴恩弟子^②，能传外氏学。庆年好谈，常侧其头，唇翕张，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为诂字舍，各自以为许、郑、迁、固，聚此八舍也。

其时，院中彬彬文学之上选，产江南者，则有阳湖吴翊寅，金匱孙揆均，丹阳王英冕，无锡高翔，元和汪荣宝。其尚在童龄者，有无锡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宁之田其田。其田才笔肆茂，年十三以神童为王先谦拔食廩饩，意气甚盛，颇趺弛，院之成年长德，皆为诂侮。嗣程则修拔俊整，不好弄也。

产江北者，则有籍上海而家泰兴之赵世修，泰兴又有姚鹏年，童子金鉞，世修弟子，宽弱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隐偶体文，其田虽上规骚选，卓而成家，勿若也。……^③

吴稚晖在此特别提到了上海钮永建和丹徒陈庆年。吴稚晖与钮永建的友谊至

① 唐文治：《江宁陈亮伯先生墨迹题词》，《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一。

② 柳诒徵说：“按：此语微误。”见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柳兴恩，丹徒人，著有《穀梁大义述》，陈庆年为之整理校订，刊入《皇清经解续编》。

③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

老弥笃，年轻时在南菁求学则同住一个斋舍，而陈庆年是他们那一斋舍的斋长，非但没有一点年长者的架子，还往往被年少同学寻开心，但陈庆年一点也不觉得是冒犯了他。吴还提到了其他同学，个个都是“院中彬彬之上选”。

但吴稚晖也没有忘记当年默默无闻而日后也很少有人记忆的同学，如江阴的钱筮离：

余不喜九流杂说，此命书两张，余与内人之命书也。胡以存之？因推此者为光绪己丑同住南菁书院之钱公仲常手迹难得，故存之也。

钱名筮离，江阴人，长余二十余岁，庚寅春物故。丁酉四月重检。

此两纸系己丑年所写（其时笑尚未生），去今五十九年^①。存此，时在丁酉四月，亦已五十一年。今黏出，则为丁亥四月五日清明。钱先生庚寅以肺病物故，不及见余辛卯乡举。^②

吴稚晖一生鼓吹科学，当然不会相信也不会喜欢“命书”之类的“九流杂说”，但他竟然保存了南菁书院同学钱筮离为他夫妻两人所写的一纸“命书”，且四、五十年后也不肯扔掉，是因为他看重的“为光绪己丑同住南菁书院之钱公仲常手迹难得”，同窗友谊难忘也。

吴稚晖的南菁好友丹阳王英冕在家乡逝世，闻讯后，吴稚晖痛不欲生。由京南返，夜宿靛庄，正是去年北上时投宿之地，吴稚晖夜题靛庄壁七绝一首：

往岁曾经初病齿，王郎惊起慰中宵。入门风景足於邑，惨说残魂今夜招。

吴很感伤地说：“去年二月公车赴都，与曼卿、集安、孟兼宿此，今日重来，风景宛如畴曩，念曼卿之物故，不觉与孟兼同致哀叹。”^③回想去年自己牙痛，王英冕半夜起床嘘寒问暖，如今却是人天永隔，只能是“惨说残魂今夜招”了。

因王英冕的英年早逝，又想起了其他早卒的南菁学友，不禁发下了一个宏愿：

哀其著作，与近时江南诸名士之早丧者，若吴肇嘉、朱铭盘、姚鹏年、范本礼之属，同付刊刻，集为丛书，并遍搜中兴以后魁儒，贫不能传其遗著若赵圣传者编入焉。^④

① 案：五十九年，疑误，应是四十九年。己丑（1899）钱筮离所写，吴稚晖丁亥（1947）黏出，连写的那年算起，刚好是四十九年。吴稚晖逝于1953年，若五十九年，吴已不及见矣。

② 吴稚晖：《命书批注》，《吴稚晖全集》卷十六《杂著》，第303页。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乙未日记》，正月十七日事。曼卿，丹阳王英冕；集安，无锡高翔；孟兼，无锡杜嗣程，与吴均为南菁同学。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甲午日记》，第377—378页。

然而，此愿终难以偿。

三 其他南菁学人的回忆

华亭耿葆清晚年有诗与南菁同窗江浦陈浏唱和：

元龙豪气尚如前，远寄新诗话旧缘。郎署趋公畅游目，师门侍坐乐随肩。
八人落落存三士，一别匆匆逾十年。君复策勋山海上，我从雷焕住江边。^①

耿、陈二人同为乙酉年拔贡，而明年朝考得授七品小京官者，南菁同门竟有八人。如今三人硕果仅存，然已十年不见。回想当年在京师之日，郎署趋公，师门侍坐的情景，不胜感慨。师，指黄体芳也。

陈浏有和耿葆清诗四首，中有句云：“澄江风日院门前，（始识君于江阴南菁书院。）半世追随结生缘。”澄江，江阴别称。又有句云：“当时角艺殿廷前，老去偏慳一面缘。”^②角艺殿廷，当指拔贡殿试也。陈浏在南菁仅一年，耿葆清也只两年有余，然晚年仍不能忘情书院同学友谊。再录一首陈浏贺耿葆清七十寿辰诗：

与子同年四十年，难从远道话缠绵。酣歌拓戟怜工部，舐笔和铅愧马迁。
自昔仙班联玉笋，只今幕府艳红莲。澄江横舍仍无恙，白袷风流在眼前。（君为乙酉萃榜同年生。廷试，用京秩者八人。今独我与君及雷同年在耳，皆江阴南菁书院中惨绿少年也。余与修国史有年，以家弟飞青瀚、曲江浦同在关外，辄应朱庆澜、张焕相两将军之聘，来游松花江上，自刻小印曰“携家出塞，史局随身”，盖纪实也。）^③

“江阴南菁书院中惨绿少年”，如今均垂垂老矣，所幸“澄江横舍仍无恙”也。

昭文孙雄于甲子（1924）在为已故南菁同学章际治写的《墓表》中说：

自定海黄元同先生主讲南菁书院，江左俊彦，亲炙门墙，达材成德，不乏其人，而以娄县张闻远孝廉锡恭、丹徒陈善馥明经庆年、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江阴章琴若太史际治四君，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元同先生之学，覃精三礼，兼苞汉宋，门弟子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闻远、善馥于汉学致力至深，蔚芝、琴若初亦治汉学，而践履笃实、希圣希贤，尤与宋五子为近。四

① 《陈浏集》，耿道冲：《寄陈亮伯同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案：诗中“元龙”，指陈浏；“存三士”，陈、耿外，另一位是华亭雷补同。

② 陈浏：《和华亭耿伯齐户部同年》，《陈浏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③ 陈浏：《寿华亭耿伯齐户部同年道冲七十，和雷同年补同，兼呈黄稼溪太守、马适斋大令》四首，取第一首，《陈浏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人者，皆余四十年前旧同学也，张、陈、唐三君，齿皆与余相若，章君则十年以长，当时同学诸子悉以兄事之。

……惟思余自光绪壬辰春间，应翁文恭公之召，入都襄理笔札，今已三十有三年未至澄江矣，犹忆上巳之辰，辞别元同先生及南菁诸同学，情话依依，尚如昨日，此三十余年中，高陵深谷，华屋山丘，家国沧桑之感，如何可言。吴季子之墓碑，张睢阳之庙貌，往时鼓歌讽诵之余，所徘徊而瞻眺者，犹萦绕于梦寐之间，今乃执笔为故人表墓，其能无感慨于心乎？^①

孙雄三十三年后，南菁求学的生活“犹萦绕于梦寐之间”，始终不能忘情。友朋读书之乐，君子淡水之交，我们在数十百年后诵读这些至情至性的文字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丹徒陈庆年于1929年在家乡丹徒（今镇江）逝世后，远在北京寓居的孙雄赋七律四首悼念，今录一、四两首：

四十年前同负笈，三千里外赋招魂。校经曾侍长沙席（王葵园师刊《续经解》，同任编订校勘之役），请业偕登定海门。《论语》知新稽《后案》，《礼书通故》悟微言。（《论语后案》为定海黄薇香先生所撰，《礼书通故》一书为元同师一生精力所萃，付刊时，余与善馥及唐君蔚芝、章君琴若均任参订之事。）做居学派今消歇，落落晨星仅有存。（薇香先生有《做居集》，元同师自称做居子。）

章（际治，江阴）、赵（圣传，兴化；世修，上海）、张（锡恭，娄县）、曹（元忠，吴县）俱宿草，横山耆献亦凋零。艺文考证通班志，祀典参稽陟孔庭。万卷琳琅储福地（君储藏旧籍极富），诸郎弓冶守遗经。平生兄事兼师事，太息乡邦陨典型。^②

江阴王家枚为南菁七年同窗金匱华彦钰的早逝，哀痛不已：

予与君廿载论交，七年并坐，每当曙霞敛红，宵缸荡碧，苦诘甘对，口吟舌言，析一义则骋辞飞辩，得半解则鼓掌伸眉。坐常连茵，行亦并辔。比虽尘事牵迫，杂忧纷扰。而怀袖之书，经旬弗旷；云树之望，积月遂偿。詎料执手一别，瞥眼三生。座席犹温，榭尘隔世。^③

① 孙雄：《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

② 孙雄：《丹徒陈善馥徵君庆年逝世赋七律四首哭之》，《旧京诗存》卷一。

③ 王家枚：《华相卿别驾谪并序》，《重思斋遗著》。

江阴祝廷华为亡友缪炳组作传，两人既是同乡，又是斋舍相邻的南菁同窗，痛失知己，情难自己：

维时君方肄业南菁，与余斋舍相邻，课艺谈文，备形浃洽；评今论古，各出心裁。击钵摧诗，拈毫作赋。上下议论，略同庚蟋之互鸣；鞭弭周旋，有似云龙之相逐。而君复虚怀若谷，勤学惜阴，每就鄙人，时殷下问。叔牙知己，敢辄贡夫狂言；祖逊先鞭，几难测其进步。畴人之学，喜窥其藩；哲学之书，亦研其旨。思欲综贯经史，会通中西，不惮钻求，务穷精力，此更余所亲见而叹为畏友者也。^①

金鉞在南菁书院的学长庄蕴宽，于民国十七年任江苏省通志总纂时，金鉞任常务编纂，三年后分手时，庄手书一联赠金：“少日才华冠流辈，暮年诗赋动江关。”金珍惜异常，一直挂在厅堂，时时怀念南菁同窗友谊。

甚至因先后入院而始终不曾亲窥一面，互相之间也均心仪钦慕而倍感亲切。最早随侍张文虎入院肄业的松江闵萃祥，虽然在南菁书院时间不长，但同窗友谊仍无时或忘。十多年后，乡后辈张蕴和肄业南菁，请闵萃祥为其无锡同学蔡文森之祖母作八十寿序时，使闵不禁又回忆南菁往事：

南菁书院为东南人材渊藪，萃祥昔侍吾师复园先生讲席，于今盖十有七年。当时同学诸君或仕或隐，云飞而星散。后此诸贤，则道远末由承颜接辞。今年春，同郡张子蕴和肄业于院，比以书来，则盛称无锡蔡君松如之贤，且言松如之学与行，大抵秉之于祖母丁太恭人之教。……^②

而闵去世后，吴县曹元忠读其遗著，恨生前不见一面：

二十年前，读书暨阳南菁书院，闻春秋秩祀郑君、朱子祝文，为闵君颀生之词，恨不一见其人。今从同学闻远张君得其遗著，世教沦夷，才士凋谢，抚此陈编，能无太息。^③

南菁书院诸生在民国年间仍时有聚会，畅叙友情，上编第四章第五节已略记数事，不再赘述。

① 祝廷华：《缪炳组传》，《（光绪）东兴缪氏宗谱》。

② 闵萃祥：《蔡节母丁太恭人八十寿诗序》，《式古训斋文集·外集》，光绪戊申刊本。

③ 《式古训斋外集》卷前曹元忠题词，末署：“宣统二年仲春月五日元忠记。”

第七章 南菁书院的治学理念、方法和成果

第一节 汉宋兼采

一 “汉宋兼采”的学术背景

有清一代学术,考证学最盛(所谓“汉学”)。乾嘉时期,取得的成就最大。其原因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是清廷的高压政策,迫使清代学者不敢议论政事、国事,不敢触及思想问题,只能遁入对“经典”考证的狭小的学术天地。梁启超说:

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为,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诂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仅是一个“外缘”的因素,清代考证学的发达,还应要从清学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因为思想史本身是有生命,有传统的。^②

嘉道以还,清皇朝已开始走下坡路,清廷的专制权威已有所松弛,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不少学者不满于“汉学”的支离破碎,于是又开始讲求“经世致用”,经今文学派转而大盛。咸同间,曾国藩、罗泽南等砥砺“宋学”,文学上又极为尊重桐城派,将所谓的义理、考据、词章、经世等各种主张糅合在一起,使得“汉宋兼采”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陈澧。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他的学术著作《东塾读书记》共十五卷,最为人称道。该书《郑学》和《朱子书》这两卷,专写郑玄和朱熹。郑玄,字康成,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为清代汉学家终身服膺。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一言一行被明清理学家奉为主臬。在乾嘉时代的学者眼中,汉学与宋学本不相同,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论戴震与章学诚》外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一讲考证，一讲义理。但至光绪年间，陈澧却认为郑玄、朱熹两人的学说在本质上原是一家，否认他们有根本的差异。这招来了后来学者章太炎的讥讽：“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翦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刊色理同者。”^①章太炎曾问学于黄以周，可见黄以周虽汉宋兼采，却不肯做汉宋调人。

陈澧于光绪八年(1882)在家乡广东番禺逝世，而江苏学政黄体芳就在这一年年于江阴创建南菁书院，不知是历史上的一次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偶然？

二 书院尊祀郑玄和朱熹

南菁书院当然不能摆脱汉宋兼采的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在书院中祭祀的是郑玄和朱熹。黄体芳在《南菁书院记》中说：“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禘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

这使我们联想到阮元在杭州创建的诂经精舍，供奉的栗主是郑玄和许慎这两位汉学大师，尊崇的是汉学，宋学则被排斥于外。阮元虽说也并不菲薄宋学，且有兼采汉宋的倾向，并曾著《性命古训》略作阐明。但他毕竟被称为“汉学护法”，还不曾在研求汉学的书院中将朱熹抬至与郑玄并祀的地步。

八十年后的南菁书院就不同了，祭主将许慎换了朱熹。黄体芳说“使来学者不忘其初”，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爱好来选择研究汉学还是宋学，“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实际上，南菁诸生都是汉宋兼习。黄体芳为藏书楼(建楼初始，郑玄和朱熹的栗主即安放在楼上)写的一副对联，其上联“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也很明显地表达了汉宋兼采的观点。唐文治晚年回忆其同窗好友毕光祖时说：

余与君偕赴南菁试，余方潜研性理，君务博习多闻，人或相嘲以汉宋门户，不知余固祧许郑，君亦服程朱，相师而不相非也。^②

孙雄也说：

元同先生之学，覃精三礼，兼苞汉宋，门弟子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闻远、善余于汉学致力至深，蔚芝、琴若初亦治汉学，而践履笃实、希圣希贤，尤与

① 章太炎：《清儒》，《检论》卷四，《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唐文治：《毕君枕梅传》，《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七。

宋五子为近。^①

比唐、孙略晚进院的吴稚晖也说：

昨与迈卿论文曰：为文章者，古今得四人，曰屈平，曰司马子长，曰司马长卿，曰韩退之。读书者三人：曰许叔重，曰郑康成，曰朱晦庵。^②

吴稚晖在南菁攻读古学，故叙次先文学而后训诂、义理。许慎、郑玄和朱熹在吴稚晖眼中都是善读书者，不分彼此。

三 尤重郑学

南菁书院经学研究尤重郑学，这固然受到当时学术界佞郑风气的影响，^③但也与在南菁提倡宗风的院长有关。首任院长张文虎说：

贤者著书，启迪后人，各从其诣力所至，不能以己徇人，亦不能强人从己。且汉宋两朝著述之多，孰有如两贤者？今各路所调书咸备于是，有出于训诂名物、性命义理者乎？夫高密博极群书无论矣，新安于百家杂说，无不究其指归，晚年定《仪礼经传通解》，一以高密为主，然则其学已汇于同，而訛訛者犹强辨之，多见其不自量矣。^④

张文虎认为朱子晚年的学说，已汇同于郑玄，“一以高密为主”，则汉宋兼采，仍以汉学为重。

南菁诸生尤其是吴中学子，承惠氏红豆山房一脉，对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尊崇无比，连自己的名字也要与郑玄扯上些关系。如吴县曹元弼，字师郑，意即终身服膺郑学。吴县王仁俊，字捍郑，即捍护郑玄之意。昭文孙雄，在书院时的名字叫孙同康，字师郑，同康，即仰同康成，师郑，即师法郑玄。

① 孙雄：《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癸巳日记》（附癸巳读书记），记五月十四日事，第288页。案：该年吴已离开南菁，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迈卿，王英冕也，吴稚晖之南菁好友。

③ 清乾嘉以后学术界之佞郑风气，既深且广，甚至影响到民间曲艺界。笔者曾听苏州评弹名家弹唱《珍珠塔》（据说，有数百年历史的《珍珠塔》弹词，清末还曾由苏州两位状元洪钧、陆润庠润色过），陈御史于九松亭以九棵松树为媒，将女儿陈翠蛾许配方卿，而这九棵松树，在弹词名家口中，竟然是一千多年前东汉郑玄所植。又据顾颉刚回忆，“十七岁时，江苏存古学堂招生，我知道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也报名应考。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发榜，不取，领落卷出来，签条上面批着‘斥郑说，谬’四个大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④ 张文虎：《南菁书院崇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记》，《鼠壤余蔬》，《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章钰称新阳汪之昌“每岁七月初五日，汉高密郑公诞辰，必瓣香行礼，记以诗文，则先生私淑之微旨也”。^①曹元弼甚至对《后汉书》上记载的郑玄曾为马融弟子这件事，一直心存疑虑并耿耿于怀：“皆言先师子郑子为马融弟子，心窃疑之。”^②马融怎配做郑玄的老师呢？不过，怀疑归怀疑，《后汉书》却明明这样说：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只是“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后来，因为听说郑玄通晓“算术”，“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③郑玄学问虽然迥出时辈，但曾为马融弟子，似无疑问。可是，曹元弼对此史实，感情上实不能接受。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一条证据，那就是《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郑玄别传》中这样说道：“季长临别，执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于是，曹元弼大加发挥：“‘大道东矣’，盖谓郑学为大道，深推服之也。”是马融十分钦佩郑玄的“大道”，而不是《后汉书》上所说的“郑生”学到“吾道”而带回东方。于是，曹元弼推断：郑玄“从融受学之事，可决其必无也”。曹元弼南菁挚友张锡恭也很赞同曹的看法。

不少南菁院生撰写了有关郑注研究的书，如研究丧礼的张锡恭，有名著《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存世。比张晚进南菁近十年的通州白作霖，经学功力自不能与张、曹相比，但也写了《三礼郑注释例》两卷，可见南菁书院师生研究经学，尤其是三礼之学，十分看重郑注。

四 不薄宋学

南菁书院经学研究重视汉学，但也不非薄宋学。早在书院开创之初，左宗棠在《南菁书院讲堂跋尾》中说：

……惟自顷士习凌夷，徇于科第利禄之说，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其有志于学者，又兢于声音训诂校讎之习，以搏击儒先为能。或借经世为名，谰闻动众，取给口舌，博声誉为名高，而学术益裂，求如李申耆先生暨阳讲席，训诲后进，恪以程朱为宗者，百不一二也。……

今督两江，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涂辙而日

① 章钰：《新阳汪先生墓表》，汪之昌：《青学斋集》。案：《墓表》称：“当道闻先生好博览，延入书局校理，又分应正谊书院经古月课，并上海求志、宁波辨志、江阴南菁诸文课，膏奖所获，悉以购书。”汪之昌虽《南菁学友录》无名，然其常应南菁课卷，则也算是南菁院外课生。

② 曹元弼：《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复礼堂集》卷七。

③ 范曄：《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

跻焉，升堂入室，庶不迷于所向矣夫。

左宗棠反复强调书院课生应“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的”，而反对“务为词章取悦庸耳目”或“兢于声音训诂校讎之习，以搏击儒先为能”的汉学流弊，左宗棠尊崇理学，显而易见。

院长黄以周精三礼，通训诂，但其理学造诣亦很深湛。唐文治回忆他初进书院肄业时黄以周对他的教诲：

谒见黄漱兰师，谆谆然训以有用之学。遂受业于院长黄元同先生之门。先生名以周，浙江定海人，为薇香太夫子之季子，东南经学大师也。闻余讲宋儒之学，甚喜。语余曰：“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之教，先博后约，子其勉之。”复教余训诂义理合一之旨。^①

可见，黄以周与张文虎相比，好像不那么严守汉宋壁垒。正因为如此，总体上江苏学人发自内心的敬佩黄以周的三礼之学，但也有颇不以为然的。费念慈曾致信缪荃孙，提起黄以周，“闻其所撰《三礼通诂》，多采宋人说，鄙意总不甚谓然也”。^②

毋庸讳言，南菁书院习词章者比习经学者多，习经学者中，汉学比宋学多。唐文治来自素有理学传统的太仓，入院前从王祖畚（字紫翔）习性理之学，入院后，仍爱好理学的研习。虽大多数同学专研训诂词章，甚至菲薄宋儒，但毕竟也有同学如江阴章际治等与他谈经论道的，“践履笃实，希圣希贤，尤与宋五子为近”。^③还有拜他为师向他问学的，如松江雷璠、泰兴于玉峰。唐回忆于玉峰在南菁时：

既玉峰过余，谈理学大旨，心折余言，遂执弟子礼。……爰进以周程张朱诸先儒性理之书，并告以忠孝礼仪、躬行实践之旨，玉峰喜甚，拳拳服膺，益自砥砺，以为天下之道在是矣。时讲舍诸同人方爬罗笺疏，菲薄宋儒，相与讪笑玉峰，玉峰弗顾也。……当戊子、己丑之时，士大夫咸摭拾琐言，张皇碎义，以期揣摩当道者之耳目。^④而玉峰独能深信余，毅然不顾世俗人之好尚，相与从事

①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清光绪十一年乙酉，二十一岁。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四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36页。案：费所说的《三礼通诂》，即《礼书通故》。

③ 孙雄：《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

④ 案：唐文治这里是有指着的，据《清稗类钞》第二册，第633页，“乡会试卷重公羊”：“制艺中之讲公羊者，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始。主考为李芍农侍郎文田、王可庄太守仁堪，皆崇尚经学者，故所取士如费念慈、李传元、江标，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会试，总裁为潘文勤公祖荫，正场首艺，凡发挥公羊‘王鲁’之义者，无不获售，江南连捷者至十余人。”则此乡、会试所取者，有被唐讥为“摭拾琐言，张皇碎义，以期揣摩当道者之耳目”者，可见唐在学术上的理学倾向。中华书局1996年版。

于声希味淡之中，以潜研夫身心性命之学，是真能不为风气所转移者。……^①

唐文治在南菁四年，跟随其师黄元同先生，研习经学、小学，然始终未能忘情于理学之躬行实践。

张锡恭是所谓治汉学者，成绩卓越。然而又终身服膺朱子之学，以为“宋代理学宗派不同，而莫正于新安朱子”。曹元弼回忆与张在南菁同学时的情景：“时先师瑞安黄公漱兰先生督学江苏，以经史实学、经济气节教士，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瞻闻之士，鸿笔丽藻之客，蔚然并臻。君与余均在调取中，邂逅相遇，色温神定，貌恭言从，肃然心敬，以为儒者气象。论学甚相得，以圣贤志行、忠孝事业相勉。一日言及《诗·国风》郑、卫诸篇，《集传》用郑樵说，由与吕伯恭先生论不合而然。君曰：‘以朱子不遵《诗·序》为千虑一失可也，以为有意见存乎其间，则以常人之心诬大贤矣。’余爽然自失。”^②

又如华亭钱同寿，在南菁书院时，与张锡恭亦师亦友，晚年“追忆壮岁从闻远问学，蒙其指示，遂粗涉贾、孔诸儒之学”，则所问之学，仍是汉学。然而钱为曹元忠《笺经室遗集》作序时，又称：“余平日治经，本分半及洛闽，又好南阁祭酒文字之书，侍读与闻远深知余中学不专心之病，终究未能自克。”^③则钱治经学，对汉学并未全力以赴，而是分半及宋，这在南菁恐也不是个例。

再如吴稚晖，被胡适称为反理学的思想家。却没有想到，早年的吴在南菁求学时，也曾于理学下过一番功夫。录一段他论“主敬”的南菁札记：

（闰五月）二十日，清晨，仍至江阴。

主敬须格物，格物者，非有元理高论，使人不可持循也，不过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已，此外更无所谓格物之方也。学、问、思、辨，不过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已。笃行即是主敬，信者笃行也，二而一也。（笃行即是主敬，不达其意者，玩之似有语病，而吾意盖曰：欲主敬，非学、问、思、辨不可，欲不失为主敬，非笃行不可。）（又恻隐四者，亦非以分配学、问、思、辨也，所语似亦未分明。今申之曰：意云所学，学是四者；所问，问是四者；思、辨，亦各如是而已。）^④

① 唐文治：《于玉峰遗稿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

② 曹元弼：《纯儒张闻远徵君传》，张锡恭：《茹茶轩续集》，《云间两徵君集》铅印本，民国三十八年。

③ 钱同寿：《笺经室遗集·叙》。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第78页。案：此时吴稚晖正钞读邱潜之《朱子学的》，故写下此读书心得。

然时过五天，竟为细微小事与同窗好友钮永建争吵起来，事后反省，深责自己：“说敬方聒，忽大不敬至此”，“可耻孰甚焉”。吴将此事记在札记中：

二十五日，晚餐，因食品与铁臣互嘲，至毁器，虽各自引咎，曾无几微嫌隙，然说敬方聒，忽大不敬至此，气质之庸劣，自问之心，不觉鄙夷。铁臣识见姿稟，超轶流辈，不虚心事之，而以恶态溷之耶？可耻孰甚焉。^①

尤令后人惊讶的是，吴稚晖那时仍信奉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

八月初六日，今日为无锡释菜之期，雨甚。得颂书，悉祝君雪初于上月十一因病卒于沪上，其妻子翼日仰药以殉，深可嘉。……^②

妻以身殉夫，竟然“深可嘉”，这理学杀人，实在冷酷之至。

甚至吴稚晖离院后，还时时执着宋儒的反省功夫，他在丙申（1896）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

早起，陈公起、汪公起，皆谨立相招呼，此宾主常礼，无足怪也。及幼安起，余乃领之。比觉，再起，已内愧无已。托熟自肆，显生分辨。赵次疑在旁见之，必已觉着。此与往年一事甚相类，彼事犹可愧：癸巳，余追击江令之舆，责其经文庙不降舆，大兴讼事。及次年与小翰舟往水居，过文庙，小翰起立，余坚坐，故不起。既过，余又戏小翰恭敬，小翰略哂，答云：“吾家每年上坟，道此必如此。”余忽然顿觉愧怍无地。可见万事伪为，不觉久而遗忘，本相全露。^③

时吴正在苏州陈家做塾师，仍然执守儒家信念。谁也不会想到，仅仅数年之后，吴竟成了反理学的先锋，真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第二节 黄以周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主讲南菁书院十五年的黄以周，应是对课生影响最大的学术导师，其学生赵椿年说“元同师之为教，经学则汉、宋不分，理学则朱、陆不分，惟求其是而已”。^④可说是对黄以周的治学最准确的概括。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第79页。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第86页。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山川人物》之《南菁以后日记》。案：日记中“癸巳”疑吴稚晖误记，追击江阴县令之轿舆事，在壬辰（1892），不在癸巳。癸巳，吴已离开南菁，流寓苏州。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一 郑注“义理之精”“引而不发”

黄以周治经，宗郑注。但同是宗郑却与当时吴下汉学家有不同。吴派尊郑，是认为郑玄集汉学之大成；黄以周尊郑，除文字训诂的因素外，主要还因郑注隐含义理。他说：

学者喜朱子注之详明，转嫌郑注简奥而以为陋且晦焉，此岂有合尚论之道。且学博说约谓之简，简非陋；极深研几谓之奥，奥非晦。郑注中阐发义理之言，有如布帛菽粟，服之而无斲，咀之而有味，读郑君粹言，自知之。经以载道，经学即是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读《日知录》可会之。考据间有未明，义理因之而晦，不读郑注，为害不细。朱子于宁宗持重服事，亦自言之，则学朱子之学者，舍郑注其可乎哉？^①

很明显，即便是喜好宋学者，亦不能不读郑注。因为郑注“释训诂，尚考据”，舍郑注而无法读通古经。但黄以周认为这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郑注中阐发义理之言，有如布帛菽粟，服之而无斲，咀之而有味，读郑君粹言，自知之”。他接着又解释如何才能发现“郑注中阐发义理之言”：

郑君康成所注书多散逸，其诗笺、礼注之存者，只释训诂，尚考据。而义理之精，引而不发，望学者寻绎而自得之，此汉师注例然也。

原来，郑注中蕴含着“义理”，而且这义理还十分精当，只是需要读者细心寻绎才能得到，所谓郑注“义理之精，引而不发”。

汉儒注书往往蕴含义理而“引而不发”，需要学者细细寻绎才能体味，这是黄以周研究三礼之学而得出的独特见解之一。他告诫书院诸生：

汉儒注书，循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异同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此引而不发之道也。^②

然而此语不能与俗人言，只能与好学深思之士讲：

而好学深思之士，阅宋后书而惟恐卧，日夜读汉注而不知倦者，何也？譬如花盛放而姿色竭，一览无余。萼半菑而生气饶，耐人静玩而有味也。

黄以周在《礼说》卷五《先生夫子》一篇中，尽情发挥他的这种独特见解：

……《记》：曾元称其父为“夫子”，有为言之，故郑特为之注曰：“言夫子者，曾子亲没之后，齐尝聘以为卿而不为也。”曾子此事见《韩诗外传》，郑引此以证

① 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义》，《傲季杂著》之《傲季文钞》卷六，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刊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黄以周：《示诸生书》，《傲季杂著》之《傲季文钞》卷四，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刊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夫子之稱，其義取諸卿，不取師，所以明曾元之意，蓋曰：以夫子寢卿簣，本不違禮。病革而變，易之不可。而曾子終不為卿，故以易簣為得正。

“夫子”之義明，而通節脈絡自貫，即弟子之稱其師為“夫子”之義亦見。鄭注甚精密，讀者習聞“師稱夫子”之說而不加察，反議鄭注之迂曲，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韓詩外傳》曰：“曾子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孔疏引此申之曰：“言‘輕其祿’，是未為大夫，故他人名己，得呼為‘大夫’而言‘夫子’。若已須依禮，不寢大夫之簣。”說甚明了。朱子乃謂“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但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如朱子語，設时无童子言而曾子將終斃于不義乎？是不若鄭注之允當矣。

前人咸謂鄭注經，詳訓詁，略理義。予謂鄭之理義多函于訓詁中，“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其鄭注之謂乎？^①

黃以周認為，前人總是說鄭玄注經，訓詁詳盡而忽略義理，實際上是他們沒有讀懂鄭注。如曾子臨終易簣，其子曾元稱其父為“夫子”，鄭注“夫子”：“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讀者都習慣了對教書的老師才稱夫子，所以認為鄭玄此注很是迂曲。實際上，古代“夫子”亦相沿以為卿、大夫之稱，所以鄭注引《韓詩外傳》來證明曾元稱其父“夫子”，“其義取諸卿，不取師”。黃以周不禁感嘆道“予謂鄭之理義多函于訓詁中”，而孟子所說的“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就像是在說鄭注之義理之精。可惜，鄭注中蘊含的義理都被讀者忽略了。

二 經學即理學

黃以周治經學，不分漢宋。其南菁弟子唐文治曾以理學家的眼光作以下的描述：

自乾嘉以來，士大夫鈎稽訓詁，標宗樹幟，名曰漢學，其末流之失，不免破碎支離，甚且分別門戶，掎擊宋儒義理之學，以為空疏，意氣囂然，漸至暴慢。

先生獨謂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為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均多乖離聖經，尚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

^① 黃以周：《禮說》卷五《先生夫子》，南菁書院《徵季雜著》本，光緒甲午年刊。

国朝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黄梨洲诸先生。亭林先生尝谓经学即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故经学、理学宜合于一，不宜歧之为二。乃体郑君、朱子之训，上追孔门之经学，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其所得于心而诏后学者，务在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盖江慎修、王白田先生以后一人而已矣。^①

唐文治实际上是在复述老师的话，黄以周就这样说过：读其书，论其世，“仲尼歿而微言绝，能绍厥传者，北宋诸子能集大成者，新安一人”。又说：“经以载道，经学即是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读《日知录》可会之。”^②黄以周拳拳服膺程朱理学的治学理念，可以“经以载道，经学即是理学”来概括。

黄以周治理学，不分朱陆。同是理学，朱熹强调“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提倡“尊德性”，两派学术本是水火不相容，但在黄以周那里，言理言性，已通融为一体。他说：

仁义礼智信曰五德，亦曰五性，合而言之，曰德性。此天之所与我者，故尊之。问也者，问此者也；学也者，学此者也。问之，学之，而德性愈明。故道之德，性之诚，必以问学而大。问学之明，实有德性而融。尊德性，道问学，非截然两事也。^③

他给南菁课生出的古学题《读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说》，对大部分课生鄙薄陆九渊而很不以为然。赵椿年晚年翻开乙酉（1885）日记，当年他在南菁书院向元同先生问学时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

是日见师言，前日古学题《读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说》，都将象山一概抹到，不知象山之学，亦有是处，如“决去世俗之见”一语极是，今人惟不能决去世俗之见，是以为学不能静专。^④

黄以周在肯定了“象山之学亦有是处”后，指出了朱陆思想的不同之处：“象山之立乎其大，则不务集义而专从事于养气，故有积累与顿悟之异耳。”即朱熹是讲“集义”，讲“积累”；而陆九渊则讲“养气”，讲“顿悟”。但是两人亦有相同之处，虽然陆九渊讲“顿悟”，“尊德性”，不重视“道问学”，“然象山前段亦有读书功夫，故能屏

①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

② 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义》，《傲季文钞》卷六，南菁书院《傲季杂著》本，光绪甲午年刊。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黄以周：《德性问学说》，《傲季文钞》卷一，南菁书院《傲季杂著》本，光绪甲午年刊。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以下引文出处同。

去私欲，而立得大者”。至于后来陆王之学之所以流于空疏，是因为“后人天资既不如象山，而又以不读书学象山，则终不如象山”，这是怪不得陆九渊的。

不过，黄以周出此古学题，本希望学生能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他才会称赞“象山之学亦有是处，如‘决去世俗之见’一语极是”。实际上，黄以周看重的还是“然象山前段亦有读书功夫”。总之，“尊德性，道问学，非截然两事也”。

由此可见，黄以周治学，确是“汉宋不分，朱陆不分”，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三 治经当以经为主

针对当时汉学、宋学孰是孰非的问题，黄以周认为，今日想要“调停汉、宋”的人不外有两个方法，一是“两通”，一是“两分”，其实这两个方法都行不通。因为郑、朱两家学说，自有大相径庭者，如何两通？而郑注中所含“义理”有时比朱子还充分，朱子的训诂也有比郑注更为精确之处，一定要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实是偏见，因为两者在继承圣经原典上本有相通处，如何两分？

黄以周认为，南菁书院崇奉郑玄、朱子，“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以求合于圣经贤传”，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汉宋”之说完全相反。^①

黄以周还认为，不管是郑玄还是朱熹，他们都上承圣经贤传，汉学、宋学都是孔圣一脉。所以黄以周很赞同南菁书院立郑玄、朱熹两祭主。但又提出如下建议：

南方之学，自吴季札、言子游二人而开。江阴旧有书院曰礼延，奉吴季子主。今欲持汉宋之平，似宜中奉言子主，而以郑君、朱子配享，则南菁与礼延两书院遥相峙，于命名之义亦更有合焉，未知瑞安黄公之意以为何如？谨议。

结合江阴已有“奉吴季子主”的礼延书院的实际情况，黄以周认为南菁书院“似宜中奉言子主，而以郑君、朱子配享”。因为“南方之学，自吴季札、言子游二人而开”，子游是孔子嫡传，郑君、朱熹虽都是汉、宋学集大成者，毕竟与孔圣相隔一层。黄氏此说虽未被黄体芳所接受，但从中亦看出黄以周治学，意在实事求是，不为汉、宋学“家法”所囿，直接圣经原典的宗旨。

黄以周治经“不重家法”，“惟求是而已”。其弟子吴县曹元弼研习礼学，日后能

^① 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义》，《傲季文钞》卷六，南菁书院《傲季杂著》本，光绪甲午年刊。以下引文出处同。

卓然成家，与他早年在南菁书院亲炙黄以周的教诲也有很大的关系，曹元弼弟子王欣夫称其师：

年十九，问学于定海黄元同先生，言治学当以家法为主，先生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师由是不敢以株受旧说为遵家法。务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深推诸家离合异同之故，归于案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郑义之不可轻议。^①

黄以周说“治经，当以经为主”，不当以家法为主，不啻予曹元弼当头一棒喝。苏州学人治经，很多以株守旧说为遵家法。新阳汪之昌读《春秋》，于“齐侯来献戎捷”经文之注有异议，他说：“《春秋》为圣人手定之经，事事征实，解《经》者不明句读，本两事而误合为一，说不可通，穿凿附会，以掩其陋。”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于该句中间均未句读，“一若齐侯亲至鲁国，而行献捷之礼者”。汪之昌认为该句应“齐侯来，句绝，献戎捷，自为一句”。汪指出传注之误，并下结论：“解经当先分句读。”然而汪又在此条读书笔记后又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识语：“前夜梦说读经书，援引精博，甚慰夙心。醒后，仅记‘齐侯来献戎捷’一条，宜作两句读，力指三《传》之诬。晴窗昼长，梦痕回忆，衍成此篇，见者得毋哂其呓语耶？己卯闰月十日日记。”幸亏编辑汪之文集的胡玉缙，又在后面加了一条按语，否则，读者还以为汪真有夜梦读经之事。胡说：“玉缙谨案：先生说经，实事求是，具有家法，亦有不袭旧训者。如《鬼方考》、《达巷考》，先生既自明之矣。此篇以‘齐侯来’为一事，‘献戎捷’为一事，创解，亦确解。而舍三《传》以言《春秋》，汉学家所不许，遂托之梦耳。”^②可见，汪之昌实际上也是“治经，当以经为主”，只是为吴下汉学氛围所囿，不敢直白而只能托之于梦了。

四 为学贵在静专

黄以周常教导学生，为学之法，贵在“静”、“专”两字。通州顾鸿闾曾向老师问起大学者俞樾的治学之道，黄以周答道：“荫甫先生可谓浩博矣，与我之家学有异。”^③俞樾为学，可以“浩博”两字概括，而黄式三、以周父子治学则可以“精专”两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二，《礼经大义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9页。

② 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九，民国二十年新阳汪氏刻本。

③ 王兆芳：《傲季子粹语》卷一，《黄以周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7页。

字概括。治学要臻于精专，就必须静心而无旁骛。

唐文治对老师的教导，终身不忘：

先生一本孔孟之教以为教，尝取《易》“静”、“专”二字以训南菁诸生，曰：“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人有终日读书而掩卷辄忘者，病在不静；有终身读书而白首不名一艺者，病在不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又曰：“昔之儒者尚专经，故能由一经以尽通诸经；今之学者欲无经不通，乃至一经不通。”其笃实如此。

文治自光绪乙酉岁受业先生门下，忽忽已三十余年矣，追惟先生之训，恒自警惕。^①

与唐文治同年入院的赵椿年在日记中也说老师对他说过“静”、“专”两字：

今人惟不能决去世俗之见，是以为学不能“静”、“专”。^②

七年后，唐文治、赵椿年的南菁学弟吴稚晖也在其《壬辰日记》中记载“静”、“专”，还多出一个“精”字：

（八月）初六日，……拼命读书，不免伤身。意不“静”、“专”，不能省记。然则既节去闲话、闲游、多事三者矣。工夫已多出几倍，尽够读书，何必颠倒晨昏，劳劳故纸。夫学问之道，藏修游息，只需行之有恒，不贵进锐之功。每日眠起有常度，一也。今约：晨以钟八下即起，夜以钟十下即息，倘有未了之功课，可俟明日，则明日补之，遇有万不可俟者，稍迟眠以了之，明日略晏起，以养息之。否则眠起无度，精神昏怠，读书不精，一敝也。血气既伤，神形萧索，殊非养生之道，又一弊。

每日功课亦当一定，二也。为学而无“专”、“精”之意，虽白首不名一技。然一技之中，书籍门类亦繁多，不能循序渐进，必且顾此失彼。当立志坚定，攻一门如无别径，读一书如无别书，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用功在己，成功在天。……我读我书，立定课程，期以终身。日日怡然自足，乐布疏，陶性情，不亦快哉。^③

说明黄以周教导学生读书要“静”、“专”的方法，在书院是一以贯之，而学生也都奉为治学圭臬，时时省记。

①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

胡玉缙被称为清末民初年间的“通儒”，著作等身，皆由“静”中得来。他晚年在一封致王欣夫的复信中说：

近来学术，除疑古派不足论外，率皆惮治经而喜治史，心之静、躁，所由判也。^①

从胡玉缙对“近来学术”的不满，反观胡自己，虽已近黄昏之年，却仍一秉元同先生教诲，静心治学。不过，他对当时学者怕治经而喜治史，完全归结到心之不能“静”，似有失公允，经学至民国，似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第三节 黄以周与南菁诸生讲学论道

一 老师“讲贯”与学生“进讲”

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事，曾翻开当年所写的日记，称：“师在校讲贯之语甚多，不能悉记，仅就乙酉日记中，讲‘先立乎其大’一事，录之于左，以见一斑。”

是日见师言，前日古学题《读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说》，都将象山一概抹到，不知象山之学，亦有是处，如“决去世俗之见”一语极是，今人惟不能决去世俗之见，是以为学不能静专。

晚间命蔚芝与椿进讲，师言先立乎其大。孟子曰“思则得之”，正当体验一“思”字。如今庸夫俗子，终日营营，未尝不思，然尽是游思妄念，何尝能立，可见象山“决去世俗之见”之是。孟子之思，是先于静时体认得四端真切，动时能见仁谓仁，见智谓智，自然能立。此大学所谓知止之学也。故初学做功夫，先当自己体认，即如我方才在前面，尔等见我，自然立定，一心专注在我，听我说话。后仁卿、绍穆^②进来，亦皆立定在此，自己亦说不出所以然，不过认得我耳。设有院外人来，便未必立定，即立定，亦必要悬揣为某人某人，总由不认得，不能知止耳。然如我进来之后，尔等心总散，未必如向之专一。是以学问之道，在时时提醒此心，提醒者，即孟子“必有事”数语之理也。故孟子“先立其大”，只要做功夫，原是人人能立。以集义养气言之，义集得几分，即立得几分；气养得几分，即立得几分。

因谕蔚芝，前课卷中，言须“尽心知性”乃能立，非是。如谓孟子“四十不动

① 胡玉缙：《覆王欣夫大隆书》（丁丑），《许夙学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4—485页。

② 仁卿，顾锡祥，如皋人；绍穆，王虎卿，高邮人；蔚芝，唐文治，太仓人，均是赵椿年的南菁同学。

心”为立乎，是孟子四十以前，常有游思妄念而不能立矣。惟孟子之立乎其大，则于集义养气，并下功夫；象山之立乎其大，则不务集义而专从事于养气，故有积累与顿悟之异耳。然象山前段亦有读书功夫，故能屏去私欲，而立得大者。后人天资既不如象山，而又以不读书学象山，则终不如象山。故教学者不得不从平实。程朱学问，原不专是求其外而遗其内，如朱子“中和说”四篇俱好，但后二篇更较前二篇着实耳。

蔚芝因问：“言敬者极多，究以何说为下手之要。”师言：“涵养最难。程朱有程朱之涵养，陆王有陆王之涵养，总以孟子‘必有事’数语为最切。尔等平日读书时，心固在书上，及做事时，心便散，所谓‘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此由无养故也。能养，然后能静。能静，然后能读书。”

蔚芝又问：“禅学体系认其昭昭灵灵者，故常有一恍惚景象，然如孔子所谓立则见其参其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颜子所谓卓尔，孟子所谓跃如，却易为禅宗所假借。”师谓此皆“必有事”之谓也。又谓禅、释亦自不同，一则屏绝事物，一则亦须应事接物也。又谓近日讲学极难，有避道学之名者，则讳而不讲，即有讲者，先以入主出奴之见存于胸中，夫既存一入主出奴之见，原可不讲学了。故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至焦理堂作《孟子正义》，更失东原先生之旧。近日有新刻理学书，分传道、明道诸目，传道系陆稼书、陆桴亭、张杨园、张孝先四先生，至汤文正诸先生在明道之列，此书见识亦未必精。

椿以庄方耕先生遗书问，师谓方耕先生识解自高，所以不行者，议论每有过当处，由天资高、学力浅之故。又训椿云：“汝年最少，学问都可做得，但十年、廿年一瞬即过，须深自刻励。”又训：“汝日记中谓周初未有九庙，此说非是。周公立庙时，文武固在四亲庙中，文武以前之栗主，不能不立，又不尽在七庙中，不得不置之世室，可见当时实有九庙，早已为文、武世室地步。”又训以舌音与半舌音难辨者，由音有清浊，及土音不同之故，为学当务其大者、远者，此等得大意已可。^①

据此赵椿年乙酉日记所载，黄以周曾出一道月课古学题《读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说》，学生按时交卷并经黄以周批阅后，就在某天白昼对学生作“讲贯”，晚上还命学生“进讲”。黄以周对南菁诸生谆谆教诲，且时时耳提面命，使他们终身受益。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这在其他书院是不多见的，尤其是那些院长遥领的书院。

对中国的书院制度素有研究而且不乏真知灼见的胡适，在致友人信中说：“你说起书院时代的山长的责任，这更是误会。书院的山长，院中人每月只公见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过是看看书院课艺而已。有时候山长完全可以不到书院，只看看课艺。”^①于此可见，南菁书院院长的学识、书院教学的认真和师生关系的融洽，在当时江苏各大书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二 师生合作进行学术研究

除了上面所说的院长主动给书院课生讲学，或等待课生遇有困难来请教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外，院长指导课生学术研究的方式还有很多。

黄以周会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交给学生，让他们分头去搜集资料，然后师生共同合作，在老师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产生一个新的学术成果，如黄以周的《子思子辑解》就是这样成书的。黄认为“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学，必以子思为枢纽”。^②一直想辑子思一书，虽已动手，却终未成书。晚年时，体弱多病，感叹道：“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遗憾。”南菁诸生终于帮助老师完成了心愿，后黄以周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近染寒疾已逾一载，时思旧辑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讲舍诸生广为搜罗，复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热时发，功有作辍，凡四阅月而后藏事。”黄以周还特为在序中提到参与其役的南菁诸生之功：“襄辑逸文者，顾鸿闾、曹元忠、胡玉缙、蒋元庆、达李、林之祺之功为多云。”

如果说，《子思子辑解》该书，黄以周已为它倾注了不少心血而早具雏形，只是“旧辑疏漏”，而自己又已觉精力不支，才命诸生助辑，成书之功还是黄以周居多，那么，黄以周所著《军礼司马法考证》这部书，则是课生陈庆年先在黄以周的指导下，“根据姚（鼐）、丁（晏）两家所辑，复搜群书，更加缀补。”材料搜集得差不多了，黄以周“乃为之董正其次，推明古制，折衷经教，为《考证》二卷”。^③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高总结的工作，当然还是要由老师来做的。但陈庆年也在这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学术上的锻炼，可惜其已成的《司马法校注》三卷，《司马法逸文》一卷，未曾刊刻印行。

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致叶英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页。

②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黄以周：《军礼司马法考证叙》，《傲季杂著》之五《傲季文钞》卷二。

黄以周很重视《司马兵法》这部讲军礼的书，认为“儒家不谈古兵法则已，欲谈古兵法，舍此何所从事”。然而，“孙伯渊刻本未尽善也”，故黄门弟子从事该书研究的不乏其人，“近时校辑《司马兵法》，有丹徒陈明经庆年，昭文孙吉士同康、暨吴县曹孝廉元忠”。曹元忠《司马兵法校本》书先成，黄以周为作序，称曹元忠“孝廉喜校勘古逸书，志甚锐，力甚果，其书先出，用孙刻本，附校异文于节下，并录旧注，复舛逸文，别附卷后”。黄以周考证该书源流，“古《司马法》至隋已亡，《经籍志·兵家》列《司马兵法》三卷，即今五篇本。顾今五篇复有剥落删削耳”。“予前作《军礼司马法考征》，凡逸文有见于唐以前书者，尽采辑之，以归军礼。唐以后书，别有引见，悉属兵法逸文。”自己虽已有成书在前，而“今读孝廉校本，乐其与予书可并行不悖也，爰为之序”。^①奖掖后进之意可感。

又如黄以周校《晏子春秋》，最早是在浙江书局，然而“时在书局校勘是书，限以时月，匆匆付梓，疏陋之讥，自知不免”，“嗣后主讲南菁，钮惕生永昭更为详校，今采其说之精核者，以补前校之未备”。^②那么，这次重校，是老师采用了学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只是体例上有些不同：“他书所引文义有短于本书者，不复著录，此与钮校体例有异也。”此真所谓教学相长也。

三 弟子校勘老师著作

黄以周的不少重要学术著作，如《礼书通故》、《傲季杂著》、《经训比义》等在南菁书院刊印时，南菁诸生积极参与参订、校讎。赵椿年晚年回忆：“刻《礼书通故》时，列分校诸生之名，令蔚芝校第一卷，余校第二卷，所以勉之也。”^③孙雄晚年也提起此事：“《礼书通故》一书，为元同师一生精力所萃，付刊时，余与善馥及唐君蔚芝、章君琴若均任参订之事。”^④南菁诸生在帮助校勘老师的学术著作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经验，所谓学有师承也。

南菁弟子校《礼书通故》者，初校有：太仓唐文治，阳湖赵椿年，江阴冯铭、章际治、沙从心，娄县张锡恭，金坛林之祺，江阴章元治，泰州卢求古，丹徒陈庆年，丹阳王英冕，慈溪林颐山，静海李安，昭文孙同康，吴县曹元忠，江阴张之纯、吴聘珍，阳

① 黄以周：《司马兵法校本叙》，《傲季杂著》之五《傲季文钞》卷二。

② 黄以周：《晏子春秋重校本叙》，《傲季杂著》之五《傲季文钞》卷二。以下引文出处同。案：南菁院生详校《晏子春秋》者，是钮永昭，而非钮永建，黄以周误记。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案：赵误记，校第一卷者为慈溪冯一梅，唐、赵分别校卷二之一、二。

④ 孙雄：《丹徒陈善馥征君庆年逝世，赋七律四首哭之》第一首诗中的自注，孙雄《旧京诗存》卷一。

湖谢恩灏，通州孙徽、顾鸿闾，上海钮永建，阳湖吴眺，元和胡玉缙，吴县王仁俊，无锡范蠡，铜山王聿修，通州白作霖、清河严通，江阴高宗岱，新阳汪开祉，无锡唐浩镇，通州王兆芳等。复校有泰兴何允彝，静海崔朝庆，江阴钱荣国等，余则大都为黄以周子侄辈也。

校《傲季杂著》之经学专著者，《礼说》有海宁许克勤，泰兴丁蓬山，吴县曹元忠，江阴缪楷等。《群经说》有泰兴何允彝，通州邢启云，海宁许克勤，无锡范蠡等。

校《经训比义》者，有通州顾鸿闾、孙徽、王兆芳、达李、达孚、白作霖、徐安仁、邢启云、徐洪度，泰兴丁蓬山、张之彦、于文华，静海崔聘臣，金坛林之祺，丹徒陈庆年、张济川，丹阳林亮功，溧阳陈公溥，江阴王家枚、吴聘珍、缪楷、杨世芬，金匱华彦钰、上海赵世修，江都王汝诚。

以上所列校勘老师著作的南菁诸生名录，许克勤是一个例外，他籍浙江海宁，而自祖上便寄寓苏州，是学古堂的学生，不知是否算是南菁的正式住院生，因南菁一般不收外省籍人士。

四 指导诸生“徐不敢尽”的治学方法

南菁书院诸生，每月要应院长出题的两次考试，每次都要考经学（也包括性理）、古学（史学、诸子、词章等），称为师卷。学政除每年正月举行甄别试外，其他月份有时也亲自出卷考核在院诸生，称为官卷。统称为月课。

黄以周教学很认真，批阅课生试卷时，极为注重课生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囿于前人成说，但更不能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而随便“破”前人之“注”。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著作如《礼书通故》也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所谓“有疑共商，彼此多益”，教学相长也。

他在一次月课中，出的两道经学题都是关于礼学方面的，一是《礼记·文王世子》，一是《礼记·郊特牲》。大概他觉得学生对此两题的发挥不尽如人意，做不到撇开枝节而专“志在发明《经》意”，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关于如何研究此两题的指导性意见，公示诸生，现全录如下：

汉儒注书，循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异同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此引而不发之道也。至宋儒，反复推究，语不嫌详，已有异于汉注。今人著书，必胪列旧说，力为驳难，心中所有之意尽写纸上，并有异于宋人。而好学深思之士，阅宋后书而惟恐卧，日夜读汉注而不知倦者，何也？譬如花盛放而姿

色竭，一览无余。萼半菡而生气饶，耐人静玩而有味也。

夙著《礼书通故》，志在发明经意，而旧说之得失不加详辨，时存有“馀不敢尽”之意。

如近课《文王世子》及《郊特牲》两题，“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终言“又语”之事，尚属以待之年，故下继之曰“谓之郊人”云云。此本文甚明，旧解亦未讹者也。如以“进等”为已然之事，破“远之”于成均为“达之”之讹，则“谓之郊人”四字，与上下文均不贯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以上文“用牷贵诚”、下文“卜郊”“尊亲”数句参之，则始郊以至，正申明用辛之义。此本文甚明，旧解亦未讹者也。如拘守董、刘、王肃之说，以用辛为启蛰郊始，郊为冬至之始，于启蛰分作两项，于上句语气不了，于下句义类不可通。如曰以日至证用辛之故，而冬至不常辛日，何用以证？

《礼故》循经立义，于此俗解概置不辨，正待善读者潜玩而得之。如有不合经义之处，明以告我，有疑共商，彼此多益。^①

这篇《示诸生文》虽简短，却清楚表达了黄以周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黄以周在该文中，称自己所著《礼书通故》，“志在发明经意，而旧说之得失不加详辨，时存有‘馀不敢尽’之意”。弟子胡玉缙是老师所说的所谓“善读者”，对老师此语深有会意，能“潜玩而得之”者。胡晚年复王欣夫书：

黄书仿闻人通例，引书往往颠倒改易，又或取一人他处所说，引在一处，猝不易读。而其间剖析精细，绝不牵合，各还其意，实为可法。卷帙既繁，间或自相违异，然亦无多。倘有好事者一一将其原文注出，如翁注《困学纪闻》例；又一一将其根据注出，亦不朽盛业。

先生尝与弟曰：“心得谈何容易，但使明于取舍，已难能可贵。余研经数十年，心得不过数条。”^②

《礼书通故》作者不易，读者亦不易，因黄以周于旧说不加详辨，只是发明经义，给读者留下独立思考研究的余地，所谓“馀不敢尽”。所以，胡玉缙认为，如果有学者能将先生原文和根据一一注出，使得读者容易读懂该书，且体会作者的治学方法，“亦不朽盛业”也。然而至今尚未见有学者为《礼书通故》作注，恐不朽盛业终难

① 黄以周：《示诸生书》，《黻季杂著》之五《黻季文钞》卷四。

② 胡玉缙：《复王欣夫大隆书（丁丑）》，《许廪学林》，中华书局1961年版。

见世也。

五 与诸生讲学论道

从以下所举黄以周与其南菁弟子讲学论道的例子，可见黄以周孜孜不倦教诲学生的感人场景，而黄以周不分汉宋、惟求其是的治学观点亦可略窥一二。

黄以周与学生金谷元书：

读书由得间而入，立义至无间而成。得间难，无间尤不易。《庄子》述解牛之法曰：无厚入有间。《考工记》察车之道曰：朴属而微至。微至自无厚，朴属又何间，与其以无厚入有间，何若朴属而微至，并无间之可乘。学者读古人书，析疑之明，能如庖丁之解牛；树义之坚，能如车人之察车。斯道也，而进于技矣。

金生莲溪，读经善求间，遇疑义，辄搜前人之说以相参，露钞雪纂，稿积数尺许，自补博士弟子员，应经古十一试，皆冠其曹。去年，瑞安黄公督学至淮安，每经一题，以试多士。莲溪作十三解而出。余在南菁讲舍闻之，叹为奇才。

比陈生镜蓉来告余曰：莲溪近刻历科所取经解，得三十余篇。余曰：是何足多也？传世之作，与应试异。应试之文博足矣，传世之作，不惟其博，惟其精。精斯无间，无间，天下莫能破。充金生之学力，当必有进于是，而不能以得间终，此殆其嚆矢乎哉？爰以斯语贻莲溪，莲溪亦当以余言为然。^①

黄以周认为，读书能“得间”，发现问题，很难；但经过学习研究而取得一个学术成果，就必须做到“无间”，而“无间”更难。黄以周引用《庄子》之“庖丁解牛”和《考工记》之“察车之道”打比喻，认为“察车”如“无间”，乃是道（哲理）；“解牛”如“得间”，仅是一种技能，而“道”当然超过“技”。

盐城金谷元读经，善求间，所以，“应经古十一试，皆冠其曹”，黄以周很赞赏，叹为奇才。后听到金生将“历科所取经解”共三十余篇刊刻成书，不禁感慨道：“这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因为金谷元所刻，乃应试之作，非传世之作。传世之作，不求博，只求精。只有精，才能“无间”。“无间”，则“天下莫能破”，自己的学术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黄以周这种富有哲理性的教诲，南菁诸生当受益匪浅，不过，从“得间”到“无

^① 黄以周：《与金莲溪书》，《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三。

间”，不但与学术素养的深浅有关，往往还涉及学术境界高低的问题。

张锡恭乃黄以周三礼之学的嫡传弟子。黄以周阅张锡恭所著《读士冠礼日记》后，回信给张，称张著“申郑辟贾，说皆精案”，“与余所著《通故》之义亦暗合”。但也指出张的错误：“元端有元裳、黄裳、杂裳，本不必分上、中、下士，而兄弟毕袵元，经文不言端，则非元端也。《士昏礼》：主人从者毕元端，女从者毕袵元，分别言之，明是二服。自敖君善辈以袵元即元端，今并疑其兄弟皆上士，似失之矣。”不过，对学生还是应以鼓励为主：“礼经之难读，韩退之犹苦之，贤弟覃思不辍，所造莫量。”最后，黄希望张“后别有见，幸再告我共赏之”。^①

陈玉树撰《毛诗异文笺》，稿呈老师黄以周指正。黄以周阅后，将稿退还时，复书称赞：“顷读《毛诗异文笺》邶、鄘风数卷，钩稽遗文，独探精深，洵不朽之作。”接着，黄以周强调小学之重要：“夫读书必先识字，字有本义，有假义。自假义通行，而读者往往昧其本义之所在。其本义之可知者，又往往循文立训，而不识古书之有通假。此小学所以不可不讲也。”然后指出其不足或错误之处：

毛公所传诗为古文，古文多假借，故异字错出于其间，例不能一。今笺其异文，亦惟检其用假义者，举正字以笺之。其本用正字者，可从略。如《邶风》“迨冰未泮”，举《周颂》之“判涣”通之，“忧心殷殷”，举《正月》之“慇慇”通之，是也。“宴尔新婚”之“宴”，“不我能慇”之“慇”，为本义，今乃以“新台”之“燕婉”，“蓼莪”之“拊畜”通之，反用假字笺正字，似非小学之法矣。夫小学家之讲通假，所以明本义也。经文本用正字，而转欲以假字通之，庸非反增荆棘乎？且毛诗虽有用假字，而其用正字者自多，今乃以假字为古文，正字为后人所改（据“忧心”、“慇慇”诸条为言），充其义类，将毛诗尽用假字乎？好言某与某通，而不著明其字之本义，则字之孰借孰正，读者终莫能知，未免少别白矣。

最后，黄以周提出解决办法：

“赫如渥赭”条可删，当移案语于“沤麻”。“彤管有炜”条可删，当移案语于“鄂不辍辍”。“御”、“禦”之通，“它”、“他”之异，人尽知之，亦无须详述。^②

现翻开该书的南菁书院刻本，可以发现，陈玉树大都接受了老师的改正意见，如以“不我能慇”之“慇”为本义。但也有所保留，如老师认为“御”、“禦”之通，无须详述，而陈仍未能忍痛割爱也。

① 黄以周：《答张闻远书》，《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三。

② 黄以周：《与陈颂芬书》，《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三。

陈玉树《毛诗异文笺》撰成后，听从老师建议，又撰成《尔雅释例》，请黄以周为作序。黄在序中，先赞扬陈之前作《毛诗异文笺》：“陈生惕庵潜研经术，尤精小学，所著《毛诗异文笺》，业与李芑沚书分道扬镳。”后归到本题，称“(陈玉树)近治《尔雅》，作《释例》五卷，邮寄示予，读之忻然”，“虽以《尔雅》非权舆于周公，首三篇始、终、该生死，与愚见相左”，“而释诂诸篇立有假借、无假借，文同训异，文异训同，训同义异，训异义同，同字为训，同声为训，相反为训，辗转为训诸例”以及“释地诸篇”，均能“标明纲格，同樞大归”。黄以周为陈生撰成此书很感高兴：“畴昔《尔雅》有例之言，得此大畅。”^①

黄以周曾与南菁弟子昭文孙同康商讨《论语》郑注的问题。黄说：“读古经难，读古注亦不易。《论语》郑注久佚，近人之所编辑，大半断圭残璧，非深知其意不能通，尤难乎其难者。”提到刘宝楠的名作《论语正义》，却颇有微词：“刘楚楨作《论语正义》，采辑古说，不拾唐以后之人言，此自命为汉学者也。”然而，刘“于义理之精微，罕有所得，即训诂考据亦多疏失”。所以，黄以周对孙同康奉刘宝楠之说为圭臬大为不满：“今贤弟作《论语郑注集释》，已成十五，书中一一引用刘氏说，奉以为圭臬，甚至刘氏谬驳郑注，亦以为其语详尽，而不敢发一言以剖郑注，是何好之深也。”接着，就《八佾》一篇中“禘自既灌”章、“与其媚于奥”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子语鲁太史乐”章，举出不少刘说之谬误处，姑节录一段文字如下，余从略：

“与其媚于奥”章，郑注云：宗庙及五祀之神，皆祭于奥，室西南隅谓之奥。明当媚其尊者。夫灶，老妇之祭。郑意，奥、灶分作尊卑二神，与俗解异。俗解以奥灶为一神，何复作两人之喻？此说之不可通者也。郑注以奥祭宗庙五祀之神，是神之尊者也。又曰：夫灶者，老妇之祭，明其神卑不足媚也。则此灶，明非夏时所祭五祀之灶神矣。“何谓也”是反诘之辞，明无是理也。其意欲媚其尊者，是以奥自比。奥，近内之尊者也。刘氏申郑，乃谓祭奥祭灶连文，指夏祭，言奥灶本一神，是以俗解申之，而实与郑义相左。既左其义，则其语不可通，乃谓郑注不全，其下必有辨矣。

最后，黄以周告诫学生不要为刘注所误，并指示其治学方法：

今作《郑注集释》，幸慎择之，不为刘氏书所汨也。郑注之训，义多有所本。

^① 黄以周：《尔雅释例叙》，《徵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二。案：李芑沚，李富孙。

后人之诠释郑义者，今录之详矣。其先乎郑注之说，而为郑注所本者，宜疏明之，如“樊迟御”节之注，从王充《论衡》所录旧说而略变之是也。郑注之佚文，近人一再辑之，今又搜罗古书而补之亦详矣，其郑义之见《诗》《礼》注者，或泛说，或有关于本经，宜采入之，如《诗》笺引“无为而治”章，而申之曰“任贤”，故亦甚有理致是也（详见《后案》）。展读数卷，佳处甚多，间有与鄙见不合者，因略陈之。^①

从以上所引，可见黄以周治学，源承家学，确不为汉、宋所囿，而惟以实事求是为鹄的。

黄以周与南菁弟子阳湖吴翊寅讨论《易》学，称：“经学之盛，推乾嘉时，而说《易》之坏，亦于斯为烈。”接着解释说：“前之说《易》也，宗虞氏；今之说《易》也，思驾而上之，则曰孟氏。夫孟氏之说，留遗于今者，寥寥数言。荀及马、郑皆习费《易》，无与于孟。虞氏自谓宗孟，而说解中是孟非孟，今亦莫得而辨之。‘消息’为《易》中之一道，孟氏卦气，无论其不当于《易》，就孟而论，法有难通，朱子曾详言之。”不过，“而消息自卦气而出，去其非而存其是，此虞氏之善学孟氏也”。“然而虞氏之祸《易》甚矣。王弼一去汉魏师说，文以晋人元学，其祸尤甚。”黄以周认为：“《易》有君子之道四，曰辞、象、变、占。辞主义理，义理与象数不可偏主，说义理不参象数，则屯爻可迺于蒙，师爻可迺于比，其失在隳侗而不知轨涂。说象数不参义理，则刚爻而解以柔，消卦而解以息，其失在离畔而不守绳墨。”而近世讲学之通病，“只求解于一章一句，未常融会全经，说《易》更甚”。^②强调治经必须融会贯通。

吴翊寅撰有《易》学著作多种，成一家之言。其与师往来论学，受老师影响不小，如其《周易消息升降爻例》有云“虞君五世传孟氏《易》，消息升降之说本孟氏家法，而有合有不合者，则皆取象太密，以词害意”，似沿其师说。

黄以周史学功底也很深。他认为治史者“欲著书，莫如先校书”，因为“史文之疏舛，更甚于经”。又认为“顾读史之法，与读经异，经为贤圣所作，又经孔子删订大义，炳如日星，校者按文正字可矣。史事繁赜，编纂多疏，虽以子长、孟坚，未见尽得无失，读者不能不别白于其间”。“先君倣居子曾校《史记》，于传写之异同，既旁注于行间；记载有离合，亦揭槩于简端。”“愚尝思校《两汉书》，以续先志，而终莫能逮”，所以，“有好学者，辄劝为之”，然“亦未有成书”。可喜的是，有南菁诸生钮永建

^① 黄以周：《与孙君培书》，《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三。案：《后案》，黄式三之《论语后案》也。

^② 黄以周：《答吴孟飞书》，《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三。

和丁国钧在作此事了：“《两汉记》钮孝廉永建有校本，颇为详核。近又寻见丁明经秉衡《晋书校文》。秉衡初欲注《晋书》，乃先参校各本，是正其文，补脱删衍，悉有依据。而事迹有违齮，见闻有踏驳，搜求今古书之存佚者，以备扬推，其书体例与吾家《史记》校本相若。”黄以周希望“能多得丁、钮数辈，各取一史治之，十七史校勘记庶或及身见之。同学诸子勉旃。”^①

黄以周最终没能及身见到十七史校勘记，数十年后，才由张元济完成了他的宏愿。

第四节 浙东学术的影响

南菁书院的创设者黄体芳和主讲书院十五年的黄以周，均是浙东人士，自然多少会受到讲经世致用，重事功气节的浙东学术的影响。

一 黄体芳创设南菁本意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当黄体芳于光绪八年留任江苏学政，议创南菁书院时，其老师孙衣言（孙诒让之父）复信黄体芳于江阴：

……暨阳创立经学书院，具见盛意，惟时文不可轻，宋时大儒，往往以时文引人于道，今日风气，若如龙门书院之专门讲学，恐后生望而生畏，不如用吕成公法，不废时文，渐渐引之于古。近来言经学者，专于文字训诂用心，恐非经之本意，且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异同攻击，徒长轻薄，百年以来功名气节不及前代，未必不由于此。大贤有志当世，似当观风气所趋，挽其既敝，不可更扬其波。鄙意以谓仍当以胡安定经义、治事为两大端，而兼治史学、时务，使学者通今知古，了然于得失成败、邪正贤奸之辨，则人才必当稍异于前矣。太史公以泰伯冠列国世家，即孟子不言利之意，虽为汉武帝、平津侯辈对症发药，实千古见道人也。书院似可即以“崇让”命之，使儒者皆有太伯、季子之心，则岂复有欺君卖国者哉，尊意以为何如？^②

孙衣言告诫黄体芳不可轻视八股文，因为八股文能“引人于道”，与左宗棠《南

① 黄以周：《晋书校文叙》，《傲季杂著》之五《文钞》卷二。

②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0—201 页。

菁书院讲堂跋尾》用意相同。^①孙衣言希望书院能培养功名气节之士、经世致用之才，明显带有浙东学派的功利色彩。黄体芳后来在《南菁书院记》说“然使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与孙衣言对江阴新建书院的希望相吻合。不过，孙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废时文”，如给书院起名“崇让”等，黄体芳并没有采纳。

黄体芳于光绪九年(1883)六月南菁书院落成后，随即出人意料地命学署书吏去做了一件似与学政责职关系不大的事，那就是在光绪十年重建江阴城内的睢阳庙大殿。大殿落成后，黄体芳特为撰联：

无饷又无援，临淮张乐，彭城拥兵，叹偏隅坐困将材，自古英雄千众忌；
能文始能武，操笔成章，诵书应口，幸试院近依公庙，至今灵爽膺诸生。^②

对联赞颂了张巡能文能武的儒将气概，抨击了贺兰进明妒贤忌能、见死不救的卑劣行径。虽说的是唐代的事，却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对南菁诸生的期待。

因睢阳庙坐落在东邻常州府试院的学政衙署与南菁书院的中间，所以黄体芳会说：“幸试院近依公庙，至今灵爽膺诸生。”而南菁书院诸生确也常去那儿，“鼓歌讽诵之余，所徘徊而瞻眺者”，^③而这也是黄体芳所希望看到的——“然使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

二 黄以周与浙东学术

黄体芳受浙东学术影响，主要是指浙东讲气节事功的永嘉学派，重在经世致用。而黄以周是纯儒，似与事功了不相涉，一生钟情于学术研究。黄以周于宋学、汉学并无门户之见，经学之今古、宋学之朱陆，黄都不排斥，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终身以之。黄治礼学，素重郑注。黄一直认为，郑注之精要，不尽在训诂，即在义理亦有胜过朱熹之处。但黄亦绝不迷信郑注，在其著作中驳郑注处亦甚多（见本书下编第八章《黄以周传》）。然而某些学人却无法接受，如费念慈到江阴南菁书院拜访黄以周，并阅读了数卷《礼书通诂》后，就写信缪荃孙，称黄以周讲经，虽“有极精到处”，却无“家法”，属浙东学派中人：

① 《跋尾》开头便说：“制艺代圣贤立言，于文体为最尊。自明至今，以此名其家者不少伟人，大抵依传注以释经旨，宗程朱以探原孔孟，阶级可寻，涂辙自合。”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八《秩祀庙》。黄体芳撰联两副，今录其一。

③ 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吴季子之墓碑，张睢阳之庙貌，往时鼓歌讽诵之余，所徘徊而瞻眺者，犹萦绕于梦寐之间。”孙雄《旧京文存》卷八。

元同谈半日，三礼之学，卓然名家。索得已刻《通诂》数卷，顷于舟中读之，有极精到处，惜无家法，浙东学派皆如此也。^①

今日看来，费之讥讽，实为赞誉。黄以周不立门户，兼采汉宋，实事求是，不做调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使其在其弟子章太炎所构建的近代学术谱系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三 南菁诸生受浙东学术影响

南菁诸生潜心研究经史词章，其中深受浙东学术影响，而讲究经世致用，重气节事功的，也不乏其人，如谢钟英，如陈玉树。

谢钟英，以名为字，武进人，所著《补〈三国疆域志〉补注》等必传于后。谢逝世四十年后，应其子之请，唐文治为这位南菁旧友作《家传》：

当光绪癸未、甲申之交，吾省学政瑞安黄漱兰先生于江阴设立南菁书院，长沙王益吾先生继之，招罗俊彦，宏奖风流。于是，大江南北，人才鳞萃，时则有若吴县曹君元忠、江阴章君际治、淮安陈君玉树、丹徒陈君庆年，皆一时名俊。余于乙酉岁滥竽其间，君后余一年而至，相与考古证今，上下其议论，君尤慷慨自负，出语惊座人，有时彼此纵饮，放论高歌，旁若无人者。江阴古称“芙蓉城”，君尝大言“吾为石曼卿芙蓉城主”，余笑语之曰：“与其为曼卿，曷若为六一居士？”君瞠目曰：“吾文学老泉；子于庐陵，其庶几乎？”太仓朱君映奎谓之曰：“君以名为字，后代子孙宜如何讳？”君曰：“何害？他日当称‘谢文襄公’可矣。”其自命若此。……前雷琼道杨彝卿观察寓苏垣，延君课其子侄，与诸生讲学，以义理、文理、事理为三大纲领，于性理诸书及古文、《资治通鉴》外，深有会于王阳明先生“致良知”之学，以为精深宏大，无为而无不为，圣道端在是矣。^②

谢钟英的南菁同学开玩笑地问他：“君以名为字，后代子孙宜如何讳？”中国传统，子孙后辈称呼长者前辈时，不可直呼其名，只能称字或号，但谢钟英的名也就是他的字，那么，他的后代如何避讳呢？谢钟英语出惊人：“何害？他日当称谢文襄公可矣。”须知，南菁书院的奠基人左宗棠去世后，清廷给他的谥号便是“文襄”，谢钟英确是“慷慨自负”，欲以事功名世，可惜天不遂人愿，去世时尚未满五十岁。

①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〇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2页。

② 唐文治：《谢君钟英家传》，《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

谢钟英致仕后，去苏州给人做塾师，与诸生讲学时，对王阳明“致良知”体验极深，以为王学“精神宏大，无为而无不为”，孔孟之道全在里面了。谢钟英在南菁求学时，每月朔望，祭拜的是郑玄、朱熹。程朱理学在明清两代地位崇高，士子要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就必须要将《四书》及朱注背得滚瓜烂熟。而谢钟英此时竟然认为王学“圣道端在是矣”，置程朱于何地？亦可见谢钟英受浙东学术影响之深。

陈玉树曾写信给雷璠，回忆自己与南菁同窗好友谢钟英和雷璠的道义之交：

昔岁在疆圉大渊献，余应长沙王祭酒师之召，负笈于暨阳之南菁精舍。同学者数十人，率多沉溺于词章训诂琐屑无用之学，罕究心于经济气节两途，即伦理亦未之及焉。唯武进谢君钟英负豪气，纵谭海内形势险要及国家利病、四夷情伪，历历如指掌。华亭雷君璠喜谭昔贤忠孝大节，每与余言其乡先生陈忠裕、张忠穆、沈忠烈诸公事，娓娓不倦，深慨夫明季节义之盛，迥非今日所逮。谓在上者非广言路以作士气，在下者非笃伦理以维持薄俗，世变之日甚将有不可知者，与予平日持论略同，与订忘年交。

迨余以养亲归里，君作诗饯行，送至江浒，自是与君不相见者十有五年，虽同举戊子乡试，从未于京师一邂逅也。戊戌春三月，予与谢君同登宣宁酒楼，痛饮大嚼，谭甲午、乙未往事，为之泣数行下。余讯君踪迹，谢君言君执笔于沪上之申报馆，其立论以扶植纲常、讲求经济、排击邪说为宗旨，其学识较之十载以前益大进矣。……^①

南菁书院本就是研习训诂词章的所谓“经古书院”，陈玉树却将这训诂词章之学斥之为“琐屑无用之学”，并对全院数十位同学“罕究心于经济气节”的现象深为不满，认为只有武进谢钟英和华亭雷璠等人，才可引为他的同志，因为谢钟英能以国家前途为念，雷璠则“喜谭昔贤忠孝大节”，都是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重气节事功的豪杰之士。

然而要知道，陈玉树在南菁书院得到王先谦、黄以周在学术上的指导，曾先后写成《毛诗异文笺》、《尔雅释例》、《卜子年谱》等多部学术著作。从陈玉树、谢钟英等南菁学人自甲午（1894年）以后在学术价值上的这种重新取向，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经学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① 陈玉树：《赠华亭雷君曜同年序》，《后乐堂文钞续编》卷九附录。

挑战。

至于陈玉树之深受浙东学术影响，其侄陈钟凡说得更为明切：“而其躬行辨志、砥砺廉隅，则黄梨洲、全谢山后，鲜等伦也。”^①

又如张树蕙，字拙嘉，镇洋人，与唐文治既是太仓同乡，又是南菁同学。张逝世后，唐文治为他所作《小传》称：

……少聪敏，善词赋，踔厉风发，试辄冠其曹，吾师瑞安黄漱兰先生尤器重之。……当光绪中叶，士务帖括，君虽喜文学，顾不屑谐于此，居恒研究时务，尝慨然大言：“捐纳行而天下无人才，掣签行而天下无吏治，此世之所以浑浊也。”余深韪其言。^②

像张树蕙这样感怀时事，极想经世致用、直道而行的人，在专制皇权社会中，也必定是命运偃蹇乖舛的人。张后来一入仕途，便索居寡欢，“遂纵酒以殒其天年”。正直的读书人美好的理想总是与龌龊的现实世界相冲突的，对百无一用的书生来说，既无“世”可“经”，也学无“致用”，其内心的痛苦，只能以酒来浇释了。

南菁书院前期课生是如此，而晚期课生则因受甲午战败、戊戌流血的刺激，经世致用思潮的涌动，愈现激烈。日后赴欧美日本留学，倾心革命者，这里姑且不论。即使那些终日埋首于经古研究的温和雍容的学子，也逐渐在起变化。如江阴的缪炳组：

君既以文学驰名，而干济之才，亦为素具。姚崇世务，以小试而见奇；陈平擘画，以分肉而称善。明以烛理，公以存心。断事深鉴莠丝，振裘务当挈领。一言徐出，众论翕然。充是才也，可以任繁剧、奏循良，参军国之谋，膺交涉之务。

祝廷华在为他的这位同乡又是南菁同窗所写的《传》末，不无惋惜地说道：

君以弱冠之年蜚英声，腾茂实，设充以学力，陈同甫、叶水心一流人不是过也。^③

祝廷华认为缪炳组如不是英年早逝，肯定也是浙东永嘉陈亮、叶适一类人物。而就是祝本人，在清末民初，以两榜进士而投身于工商实业，固是时势因缘，但书院中浙东学术的影响似亦不可忽视。

① 陈钟凡：《惕庵府君行述》，汪兆铭：《碑传集三编》卷三十五。

② 唐文治：《张君拙嘉传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③ 祝廷华：《缪炳组传》，缪幸龙编：《（光绪）东兴缪氏宗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第五节 南菁讲舍文钞

南菁课生尤其是高材生,大都有将自己的课卷装订成册的习惯,如张锡恭,如陈庆年,如吴稚晖。吴在壬辰(1892)札记中记道:

(七月)二十四日,检历年课卷合订,计数如左:

己丑,甲:超等经学卷一册计八本(仲培)。乙:超等古学卷一册计七本(衡之)。丙:特等、壹等经学卷一册计九本(仲培)。丁:特等、壹等古学卷一册计九本(另一本在林静安处)(衡之)。

庚寅,戊:超等经学卷一册计十五本(仞千)。己:合订古学卷一册计七本(衡之)。庚:特等、壹等经学卷一册计九本(仲培)。

辛卯,辛:合订经学卷一册九本(仲培)。壬:合订古学卷、官课卷一册计九本(衡之)。癸:全岁经古学卷一册计十二本(仲培)。^①

吴稚晖将他前三年的课卷装订成十二本,都被他的同窗友好借去了,借者的名字还记在括号中,如衡之,即无锡曹铨。吴稚晖的成绩不错,如己丑年(1899),即他入学的第一年,经学超等得八次,古学超等得七次。下一年的成绩更好,经学超等得十五次。大概超等中的前几名的试卷,才有可能被山长刻入优秀作品的选编中。特等无望入选,但名列前茅的还能得到奖金,只是没有超等得的多。一等以下的,恐怕连奖金也无望了。

南菁讲舍文钞是南菁高材生的优秀课作的汇编,共有三集。编纂过程在前面上编第三、四两章中已有述及。现再将文集的主要内容简单介绍如下,藉此窥见当时南菁课生的卓越才华。

一 南菁讲舍文集

光绪十五年(1889),由院长黄以周、缪荃孙编定。黄以周为作序(见第三章第一节),称:“查辑课作,简其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得若干篇。诗赋杂作,缪太史鉴定之。”黄以周选编经学,缪荃孙选编诗赋,分工合作,可谓珠联璧合。选录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

标准如黄所说“凡文之不关经传子史者，黜不庸；论之不关世道人心者，黜不庸；好以新奇之说、苛刻之见自炫，而有乖经史本文事实者，黜不庸”，很明显地表现出黄以周“重道轻艺”的教育思想。标准很严格，“今选刻是编，约之又约，不敢滥取”。在五年不知凡几的课作中，仅选取了一百一十二篇。分为六卷：一、二、三卷为经学，共五十一篇；四、五为史学、子学，共三十七篇，此五卷均是考据文章；六为诗赋，二十一篇，另有三篇算学。这些课艺，也体现出当时南菁书院课生的学术水准，现录三篇，以窥其余。

张锡恭《读胡氏仪礼正义一》

绩溪胡竹邨先生，承其祖朴斋先生学，^①又师凌次仲先生。朴斋精研《仪礼》，著有《释官》，而凌氏《释例》一书尤称礼经中杰构，故其于礼经之学，自少专精。而其所交，若胡墨庄、洪筠轩先生亦皆习于礼经。（洪氏著有《礼经宫室问答》，胡氏著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主吾郡云间讲院，时与朱虞钦学博往复论难，学博亦究心礼经者也。故其著此书，学之博而辨之明。称其所长，约有四端。

一曰搜罗富。贾氏作疏，丧服经传而外，所据者仅黄、李二家。国朝盛庸三氏撰《集编》，裒合古今说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胡氏自朴斋、纯轩（先生从叔祖，名匡宪。）而后，积书既多，先生生礼学昌明之时，交游广而借钞易，今核其书，增多盛氏《集编》者，又几及二百家。采择既多，折衷斯当，此搜罗为不可及也。

一曰校订精。近儒校勘礼经者，如卢抱经之详校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正字》，而阮文达《校勘记》尤详，此书既备录之。而阮氏作《校勘记》，未见严本（宋严州单注本）原书，仅据顾千里校录于钟本（明钟人杰单注本）简端者采入。此书则以黄荊圃重刊严本，一一核之。而阮氏所未见者，若汪容甫之经注校本、黄荊圃之校议，亦皆采录，此校订为不可及也。

一曰存秘逸。吴东壁《仪礼疑义》，据《爱日精庐藏书志》仅有钞本；江震苍《读仪礼私记》，据先生《研六室文钞》亦仅有稿本，此书录其说甚详。朱虞钦《乡大夫辨》，见所著经义中，近岁张孟彪师始为梓行之，先生时犹未梓也。朱氏所著经说，今犹未梓，时时见于此书。其他所采录，多有书目不甚显者，并有

^① “学”，课艺原稿和《茹荼轩文集》均作“礼学”。

姓字不甚彰者，则遗说之藉以流传，不少矣。

一曰除门户。汉学家诋宋学，叫嚣殊甚。教君善之《集说》，斥为“似是而非”；郝仲舆之《节解》，诋为“邪说”；而凌次仲于方氏《析疑》，至讪为“丧心病狂”，皆门户之习也。先生学汉学者，而此书平心持择，未尝党同伐异，则门户之见泯矣。

惟其订注义诸条，时或义短于郑，欲为高密诤友，而不免“蠹生于木，还食其木”之讥。此固其一短，要不能尽掩其长也。惜书未成而卒，其门人杨君大埭所补者，率以《集编》为蓝本，而稍增益之。昔张孟彪师病杨君为续貂，而深望后人之更作，其有以也夫。

《读胡氏仪礼正义》课艺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共三篇，《南菁讲舍文集》收一、二两篇。后张锡恭自编《茹荼轩文集》则三篇全收。今课艺原稿尚存，从其封面可知，该课艺获超等第一名，得奖洋十二元。阅卷者疑为王先谦，批语为：“《读胡氏正义》，详述渊源，穷搜根柢，菁华毕露，毫发灿呈。求之于古，则晁公武、陈直斋诸人未能如此精审；拟之于今，则顾千里、严铁桥、钱警石诸先生可与伯仲颉颃。阅卷至斯，喜甚佩甚。订正‘为人后者为本宗降服’一条，是有关实用之学。杨氏补成其书，而士昏礼觐礼记中，未能述燕寝、正寝殊制之说，得此表微，胡氏亦含笑于九泉矣。”^①今录其第一篇，亦可见当时阅者之“喜甚佩甚”之所出有自。

毕光祖《迂书传儒林不传文苑说》

史家体例，代有损益。龙门传目，但著儒林，范书而下，始传文苑。自论者谓后人之详，足以补前人之略，而史公之微意，久没而不彰矣。

古者游、夏之徒，列于文学，而其实皆穷经明理以传夫子之道，与后世所谓文学之士撷取浮藻，流宕忘归者，不可同日而语。盖三代而上，以道兼艺，儒与文合。三代而下，艺不由道，儒与文分。史公之意，以为当世之士，苟若游、夏，则入之儒林，何尝没其文学，不必有文苑也。若其言语侍从之臣，雍容揄扬之辈，靡丽于藻饰，淫泆于词说，于经为芜，于儒为靡，何必别派分流，高其位置。是以于司马相如，则编之列传，于东方朔，则列之滑稽。不使儒林之外，别有文学。正恐文艺之末，忝负虚声也。观其儒林诸人，自申公以至胡毋生，皆抱残

^① 此课艺影印件由吴飞先生惠赠，特此志谢。

守缺、敦学励行之士，去取之际，良有以耳。

后之作者，不明史公之旨，妄以儒林、文苑分传。至宋史，又分儒林、道学为二，通人达士，自昔嗤之。於庠！龙门而下，詎复有史才哉。

毕氏这篇短短的史论中，明显带有其师黄元同对“文学”界说的影响。

姚彭年《拟唐王子安慈竹赋（有序）》

案：《新唐书·王勃传》：勃既废，客剑南。此赋盖是时所作也。序云：“广汉山谷有竹，名慈。”广汉本剑南道。赋云“蓬转岷徼，萍流江汜”，与《入蜀纪行诗·自序》云“抵岷峨之绝径”，本集杨炯《序》云“远游江汉，登临岷峨”所言悉合，其为客剑南时所作无疑。子安自长安入剑南，在总章二年五月癸卯（《入蜀纪行诗序》自言之），此赋当作于是年冬。《文苑英华》次《涧底寒松赋》一百四十三，《慈竹赋》一百四十六，《青苔赋》一百四十七。《寒松赋》序云：“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依唐历推之，总章二年八月，正有壬子，则《寒松赋》十年秋所作也。《青苔赋》序云“吾之旅游数月矣”，承八月旅游言之，则数月定为冬也。《慈竹赋》云：“白藏载谢，元英肇切。”又云：“河坚地裂。”是秋冬冬至时，故次在《寒松赋》后，《青苔赋》前，信乎，为总章二年冬所作也。子身远游，骨肉间阻，借物自况，兼伤文字之厄，赋序所纪，篇末所言，胥如见也。

余以总章二年，旅游蜀中，朔阴肇临，忽忽数月。远阻定省，违念昆季。顾瞻阶庭，慈竹丛抵。生必向内，不忘本初。固广汉山谷之种，孰为徙于此也？感兴归思，百喟并陈。乃为赋曰：

繁梓南之殊质，挺修茎于岭岬。张翠葆以风翕，镂青琼而露腴。攢根咫尺，萦苞千株。繁叶初俛，崇柯交扶。茂同体之高节，临严冬而未渝。乃延赏于流俗，遂播阴于下都。观其绮云朝衔，赭曦夕翳。茂族幽阜，骈林凉砌。屈楚笈于十霜，迈文篠于千岁。凤翎疏竿，龙髓杳抵。抱远霭而知寒，爰燠阳以自卫。惧孤秀于庭表，衍丛阴于晨霁。尔乃子母惓惓，孝义秩秩。耿纯青于寸心，郁贞景于爱日。祥龟在庭，慈乌绕室。粉箨戴珥，苍珂修櫛。下有忘忧之草，上有抱蒂之实。至若孤客方矚，幽岩已迁。夏冰战冬，负雪娱年。邛山之修杖不复，南海之残根独全。文藻布濩，心情邈繇。岂易土以预乐，銜美名而非贤。故夫荣枯贞命，爱憎委心。惟劲节之自守，任殊方之景临。眷微物其骈

抗，美嘉德于杳深。幸藏节以韬晦，犹茂文而振阴。嗟旅軀于岷江，望骨肉于南岭。渺中庭之猗猗，愧遐慕之耿耿。于是青琴横怨，碧琬弄影。驰旨万里，如挹慈景。

南菁同学吴稚晖曾发愿要为姚彭年等“江南诸名士之早丧者”“哀其著作”，其愿终未成。赵椿年称姚彭年“诗文极艳丽”，但于此文也可看出，姚之考证功夫也不浅。

二 南菁文钞二集

光绪二十年(1894)冬，黄以周又一次选编诸生课卷，汇刊成《南菁文钞二集》，距前刻《南菁讲舍文集》(初集)已有五年时间了。黄以周仍为写《序言》(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只不过这次是用骈文写的。也许这位经学大师是为了回应有人讥其“特不解词章”，而一反常态，将序文写得文采斐然。

《二集》与《初集》一样，共六卷。卷一至卷四收经学课卷九十三篇，卷五收史学课卷十七篇，卷六收赋(铭、赞)二十八篇，共一百三十八篇。值得注意的是，《二集》所收经学课作的比例，比前集增大了。现录吴稚晖课作一篇。

吴朏《倭駟解》

《诗·倭駟》，毛、韩异谊。蒙案：毛传是而韩说非也。

传曰：倭駟，四介马也。戎马著甲，可历引《清人篇》“駟介旁旁”，《左僖二十八年》“駟介百乘”及韩氏《六月篇》“车纆轮，马被甲”为证。韩于此独谓駟马不著甲曰“倭駟”，谊不可通。序曰：“《小戎》美襄公备甲兵。”又曰：“国人则矜其车甲。”曰备曰矜，盛为夸耀，必非不介而驰，若将徒人，如今治韩学者之说矣。(近儒马氏瑞辰引《管子》、《左氏传》申《韩诗》之说，甚不可据。)毛曰“四介马”，方与秦当时情事为合，故是毛而讥韩也。

肤申毛说者，其说亦有二。郑笺云：“倭，浅也，谓以薄金为介之札；介，甲也。”其说似疏，其谊自密。毛传言介，释倭文也。倭，谓之浅，见上章。按之毛传自合。

近儒说：“倭，浅也。韩奕诗传：浅，虎皮浅毛也。既夕注：鹿浅，鹿夏毛也。凡毛之浅者，皆谓之浅。古者，战马之甲，以他兽之皮毛浅者为之。”其说甚新，而又不可通者。一篇之内：“倭收”浅也，以为浅短；“倭駟”浅也，谓之浅毛。谊兼虚实，恐非诗谊。况甲外有礼，无取有毛之皮以为之里。《左氏传》：蒙皋比，

蒙虎皮。蒙者，蒙于甲之上，取虎皮有文采，足以耀武慑敌人也。此临敌应变之智，非可为“甲用浅毛”之证。故传谓之虎皮，不谓之虎毛之甲。然则浅毛之解，已属牵合，而谓甲用有毛之皮，尤为未当矣。

如郑氏言，先后两“倭”，不致互异，恪守旧传，不失师法。此其善者一。贾氏《周礼》“司甲”疏，“甲用皮，铠用金”分疏，以严其别也。《说文》：“铠，甲也。”《广雅》：“函甲，介铠也。”散文，于义可通也。郑笺：“介，甲也。”据散文例，其实当训铠，薄金之札。铠之制也，凡皮取坚，而柔薄非所宜，观《周礼·函人》，为甲取犀取兕，贵其坚也。金之质重，而利于薄，《晋书》马隆讨凉州贼，负铁铠，行不得前，是铠不利过重之证。肤则浅薄之义，于金可通，于皮不可通。专取铠制谊，极周匝。此其善者又一。不肤，申毛而不能合，与宗韩氏说者之不合于毛，亦何以异？

吴稚晖在院肄业，攻古学，不专治经学。然而，因住院生月课，经、古都须与考，所以，吴稚晖于经学极用功，也很有根柢。如在这篇课作中，吴氏释“倭駟”甚确，即便今日学者亦无以易也。文中时用古字，如“然”作“朕”等，当亦受其师影响，亦步亦趋也。

三 南菁文钞三集

《二集》编后七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丁立钧主编了《三集》，选录了己亥(1899)至辛丑(1901)这三年间的课作，丁为作序(见第四章第二节)。在此之前，“自乙未(1895)至戊戌(1898)四年，课作散失无存者”，这是很可惜的。

《三集》与前两集在内容上有较大的不同。

一是“篇数倍之”。《三集》“得文共百六十首”，而它们都是三年时间内的课作，前两集却都各自收了五六年，篇数还没这么多。那么，能否像先前黄以周那样“约之又约，不敢滥取”，也成了疑问。

二是经学作品所占比例大大减少。全集的十六卷中，只有前四卷是经学课作，仅占四分之一。而经学课作中，有关礼学的仅有三篇。这恐怕与黄以周的离院有关，但也是清未经学日趋衰落的反映。

三是史论增多。《三集》共收八卷(自卷五至卷十二)，约是经学课作的两倍，这是科举时代风气的转变所致。刊行《三集》的这年七月，清廷下令，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除八股文程式。考试内容虽说还有四书五经，但已由原先的第一场置后于

第三场考。而当时朝廷最看重的是第一、二场的考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那么，书院相应地加强对史论的训练，当然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四是史论讨论的时间范围扩大，尤其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南菁文钞前两集的史论课艺，只到宋代，宋以后的历史绝不论及，这大概与清儒看不起明人治学空疏浮浅有关，但满清皇朝对读书人一贯进行严酷的思想钳制，恐怕更是主要因素。然而晚清政局大变，控制放松，读书人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常撰文评论时局，甚至借古讽今，抨击时弊，这在《三集》中能清楚地反映出来，如许朝贵《论明代官制得失》、金懋基《书王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后》、朱锦绶《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张葆元《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吴增甲《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等，这些有关近现代史的论著，在前两集中是绝然看不到的。

五是算学题大增。《三集》的最后四卷（卷十三至卷十六）全为数学课作，如杨冰《微积术补代数未尽说》、《读海宁李氏对数探源书后》等，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初集》仅选三种算学题，《二集》全缺。当然，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其中有些数学题不能算是高深，如代数题《有大、中、小三数，并中、小两数，与大数等。中、小两数和乘大数以中、小两数相乘减之，得三千一百三十六。其三数连乘，得六万一千四百四十。问三数各几何》，如几何题《三角形有积，有大小两腰，求底边及中垂线，当用何术》，但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六是未收文学作品。也许当时书院已不试“词章”，也可能与丁立钧的学术主张有关，在他看来，“世变之既亟矣”，救国图强才是第一要紧事，而吟诗作赋，于时事无补。丁立钧之所以选编《南菁文钞三集》，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南菁的学风能由“训诂词章”向“经世致用”转变。诸生课作虽非篇篇于世有补，但“天下无不药即已之疾，而疾甚又无必效之药。故草野谈治之言，其繁数而危苦者，与过而削之，不如过而存之，亦曰庶几得一当耳。乡校之议，舆人之诵，或亦当世采风君子所勿罪欤？”肯定了南菁诸生忧国忧民的情操。

毋庸讳言，《三集》所收，在所谓训诂词章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自不能与前两集相较高下，丁自己也承认，三集是“与过而削之，不如过而存之”的结果。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书院课生平时研究学习的内容和书院的学术取向的变化，从而看出剧烈的“世变”给书院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也就是《三集》之价值所在。选录一篇。

朱锦绶《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

呜呼！今天下通商之局，殆亘古以来所未有之变局乎？通商之利彼得之，通商之害吾受之，甚且通商其名，割地其实，致吾之民日以穷，吾之财日以尽，吾之国势日以蹙。闲尝读《易》至“履霜，坚冰至”，读《诗》至“如彼雨雪，先集维霰”，不禁于道光壬寅耆英、伊里布、牛鉴“五口通商”之约，太息之，痛恨之，涕泣而道之不置也。夫时势所趋，必无不变，闭关自守，今无此局。吾初不怪五口之通商也，吾独怪乎耆英诸臣，事事为彼计，绝无一为我计；事事为彼通商于我计，绝不一为我与彼通商计。此约成，流布彼中，动辄援例，变本加厉，今日之局，无非此一约为之阶也。如此大错，穷六洲之铁不能铸；如此作俑，极“无后”之说不足报。

大抵通商之局，道光之前亦有几变，而我之势恒处于盛。道光以后凡三大变，而我之势日见其衰。盖兵事变而商局随之变者也。方今大势，有约之国凡十数，而其足以操我、纵我、搯我、吭拊我、背制我死命者，莫如俄。其次莫如英、如法、如日。五口通商，英人之力，他国皆不与焉，故通商之势独盛。一变而英法联盟，称兵津沽，俄趁其时蚕食黑龙江，鲸吞新疆。英法立约，俄亦与焉，而俄人通商之势于是盛，此变之在咸丰庚申者也。再变而法攘安南，寇我马江，肆扰各口，举国惶骇。谅山之捷才闻，天津之议已定，撤南藩，隳军实，而法人通商之势于是盛，此变也在光绪乙酉者也。三变而日图朝鲜，败我平壤，海军糜烂，辽东失半。马关一约，割台湾一行省，赔款二万万，通商内地，日人主之，而日人通商之势于是盛，此变在光绪乙未者也。投肉与狼，始不过一狼也，群狼涎肉，不呼自至，于是沿海各口大半他属，自此以后，其变将不可究极。

西人之取人国也，大率先之以商，继之以兵。故始得其利权者，必终得其政权。其于吾中国也，则又先之以兵，继之以商。吾始失其政权者，乃复失其利权。中外通商之局，殆与兵事相始终者也。日邻东，俄邻北，英法属地邻西南，非越国以鄙远也。故此四国之势盛，则通商之大局大变。虽然，夺人之肉，肉尽则人，虎狼之习也；见弱则侮，见强则止，犬羊之性也。

同治中兴，削平粤逆，诸名将相分镇各省。光绪初年以前，俄则还伊犁矣；天津教案，杀其领事，仅戍一府县官而法无言矣；生番之役，日人旋遵约撤兵矣；英于其时且允加征洋药矣，此可乘之会也。再加数年，岂难举五口通商以来各国之约一变之，去其害，存其利，如日人之于各国重修条约，得以自强如今

哉。然则国势之盛衰，系乎商务之利害，商务之利害视乎兵力之强弱，未有兵事变而商局不随之变者也。不此之思，而总总于各国之添订和约，口岸增开之数，洋关收税之赢绌，丝茶鸦片之能抵不能抵，商轮各局之收回利权，谓通商之局之变大略在是，则岂识通商之大局哉？

当时一般喜谭时务的读书人之识见，如尽如此，岂不哀哉！

下 编

南菁书院的人物

南菁书院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学术机构，正如柳诒徵所说的
那样：

原书院之性质，其卑者类义塾，其高者乃视后之所谓文
科大学或文学研究院，不可概目为腐朽也。^①

南菁书院当然属于柳所说的书院之“高者”，所以取得的学
术成果也就很大，主要表现在：一是镌刻了许多对学术界有深远
影响的学术著作，二是涌现出各学术领域内众多著名的学者。
关于南菁的刻书，前面几章已略有阐述，这里从略。本编专讲人
物，第八章传各界名人，侧重于其在南菁书院或江苏的行事叙
述。第九章录历届学友。两者互为一体。然而，所谓名人，未必
就一定比隐没在《学友录》中的无传者有名；而历届《学友录》中
也不乏有真正的名人存在，只是笔者学浅识陋，不及发现，或因
资料难觅等其他种种原因而未为之作传而已。

①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

第八章 南菁书院名人传

第一节 师 长

南菁书院为江苏学政主政，故为历主南菁的学政作小传，黄体芳、王先谦与书院关系最大，影响最深。书院院长则以经学大师黄以周最为著名，张文虎、缪荃孙亦颇有声望。

黄体芳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1863)会试第一名，经殿试、朝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渐升至詹事府左庶子，侍读学士。在京师，黄体芳“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频上书言时政得失”。^①亲睹过黄体芳风采的吴县张一麇，曾追忆道：“先生任京职时，弹章不绝，台阁生风。”^②

“光绪初年，都中风气，以喜言国事、弹劾大僚为贵，谓之清流。”清流中以黄体芳、张佩纶、陈宝琛、宝廷最为出名，时人称为“四大金刚”。^③又有“五虎”之说，“光绪初，京朝官中有‘五虎’之名，其最著称者，则以何金寿、黄体芳为尤善。”^④

黄体芳于光绪六年(1880)秋以詹事府少詹事出任江苏学政。七年，在学政任上升内阁学士，八年，授兵部左侍郎，留任江苏学政。^⑤黄体芳办事认真，恪尽职守。

①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列传二百三十一，册四十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449页。

② 张一麇：《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 刘声木：《菴楚斋三笔》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3页。

④ 徐珂编：《清稗类钞·师友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21页。

⑤ 《清史稿》之《黄体芳传》称：“光绪七年，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案：黄督江苏学政在六年，见《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黄体芳传》。黄体芳在《南菁书院记》也自称：“体芳于光绪六年继仁和夏公督学于江苏”。《清史稿》于此叙述含混。

《江阴县续志》称赞黄在任“试童生，奏请‘提复’，以取真才。当堂面试自此始”。^①童生考生员的院试，正场结束后，还得进行一场复试，不过所谓复试，实为虚设，只要正场取定，复试一般无不取中。黄体芳奏请“提复”，“提”者，提堂面试也，这就给考生平添了一道关隘，因此也有人称为“酷例”，还将此事捅到了上海的《申报》上。黄体芳不为所动，发出告示，一一辩称：

照得《学政全书》所载，童试发案日，再行复试，笔迹虽同而文理不通者不准入学。本院再四思维，与其榜下除名，彰彰耳目，不如先行提复以定去取，然后遵例堂复，较为近情。江苏素称文薮，兵燹以后良楛不齐，果系真才，将为百炼钢，将为万选钱，其次焉者，亦自具规模，何忧面试？本院（立）法之始，诚恐美数太少，复卷或不敷剔去，且辍落者未免向隅，于是溢取十人或二十人有零，使额中之卷尚可充数，而额外之人亦可以自遣。又恐稽延时日，考费既倍，诸弊丛生，于是定为“当夜子正，起阅幕宾所取卷，卯正悬牌，午后出图”之法。又恐校阅太促，佳卷见遗，于是多延幕友并子侄辈共十人，当日未、申之交，阅至子刻，前后陆续分荐，以便本院总阅。又恐该童等多受辛苦，特不课以全篇。原报中所云“止作小讲”，乃是初试江、镇时，间或有之，而诸卷之中，多有开口便错者，谓一讲未足见真才，而真不才者固可立见也。以后均以两长比为率，至少一百六十余字，多者二三百字。至命题则择其略有点染者，以窥见其人胸中之书卷，笔下之性灵。夫以两长比之文，而题目又不深不浅，尚不足以鉴别真贋乎？此盲人语耳。

……

据称“百余年来联科直上者，及勋高望重、德名并永者，并不从提复来”云云，无论乾嘉以来名士名臣，断非今日恶劣者无从侥幸耳，谁谓勋望德名必从此出哉？若以勋望得^②名论，则国初诸名公有不从科第来者矣，有不从时文来者矣，更何论乎提复不提复哉。执此以辨，何见之陋也。

据又称“认真则正场便可截弊，否则十复亦无益”云云，其说似也。试思不认真，固多试多弊；果其认真，独不愈试愈真乎？校士者孰不自谓认真，其真能认真者，正复不少。必如所云，则县、府试可不烦初复、二复、末复矣，乡、会试复试之例更可以废矣。……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黄体芳传》。

② 案：得，似是德之讹。

总之，此事已经奏闻，非奉旨停止，断不为蜚语所握。

不管这“提复”是否真能杜绝试场诸弊，黄体芳想要以此拔取真才的热诚心肠袒露无遗，否则，他何必要为自己增添那么多麻烦。况且，他也并不固执己见：

惟素性酷爱人才，乐闻已过，该馆既明目张胆，何避隐姓埋名？如另有别伪求真之良法，实在有利无弊，至公无私，自应降心采择。^①

黄奏请“提复”，当在光绪七年（1881），时上任伊始。江阴殷葆诚晚年回忆往事，提起辛巳（1881）年院考：“是岁，始行‘提复’制。先时，正场案发，即为取定。至是，乃先行提若干人，或倍其额数，或多一二十，面试，一前八行与两后比，与正场无大出入者，始能入选。”^②黄体芳创始的童生院试“提复”的制度，后任江苏学政也就沿用下来。

其实，黄体芳对江苏士子还是很爱护宽容的。当时的读书人，即便取中生员，也不是一劳永逸，还须应付学政的岁试，才能保住这微薄的功名。《清稗类钞》记载：

黄漱兰通政体芳督学江苏时，有桃源诸生欠岁考者，欠至三次，教官已投例申请斥革矣。乃递禀，历叙其出省游幕，实非有意规避等情，乞准补考，从宽免其斥革。黄允之。补考时，乃以“吾以汝为死矣”命题。^③

这位桃源（今泗阳）秀才因欠考三次岁考，本应斥革，黄体房心存侧隐，答允该生补考的请求，不过，临考时也没忘记开他一个玩笑，考题竟是“吾以汝为死矣”。当然，这句话出于《论语·颜渊问仁》，并未逸出《四书》范围。

黄体芳在江苏学政任内，于光绪八年（1882）创建了近代最有名的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江苏各界的风云人物，大都与南菁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黄体芳创办书院始末，具见上编第一章，兹不赘。

光绪十一年（1885），黄体芳学政任满，于十月回京供职。他在江苏足足待了五年，对江苏士子已有深厚感情。离任那年，按试淮安府，科试之复试题为“杨柳依依解送行”，该年（乙酉）又是拔贡年，拔贡试题为“他时倘忆种花人”，皆有留连

① 黄体芳：《割切晓谕院试提复并答（申报）》，俞天舒编：《黄体芳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6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殷葆诚：《追忆录》，徐华根编：《江阴名人年谱》中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05页。

③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黄漱兰考欠考岁生”，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19页。

惜别之意。^①

黄体芳回京才两月，就遭到降职处分。南菁书院课生赵椿年在他晚年所写对南菁师友的回忆录中，关于此事是这样说的：

漱兰师学政任满，于乙酉十月回京供职。先是九月，已有懿旨创办海军，派醇亲王奕僊总理海军事务，并派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师以十二月上“大臣（原注：谓李鸿章）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原注：谓曾纪泽）遄归练师”一折。交部议处，降二级调用。^②

黄体芳降职，看来就是这封称李鸿章“会办海军，恐多贻误”的奏折惹的祸。那么，黄之与李，难道早就有过什么过节，而非得要乘机发泄一下私愤吗？绝对不是。还在光绪四年（1878），北方闹灾荒，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饬禁烧锅，以裕民食”，结果，户部议驳。黄体芳在翰林院上疏支持李鸿章，认为户部议驳，是因为自身得了好处，“而现在近畿各省粮米缺乏，民生困苦，烧锅耗谷最甚，应即严行禁止”。^③与李不谋而合。可见，黄与李私人间并无积怨。那么，缘由何在呢？《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黄体芳传》称：

体芳刚正廉明，不避劝要。中法构兵，凉山战捷，遽议和。彭刚直巡阅江阴，相见对哭。任满，未及覆命，具疏劾李鸿章，降通政使。

原来，黄体芳一直不满李鸿章在中外交涉中的软弱退让的态度，尤其中法战争，凉山大捷，李仍与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黄体芳目睹时艰，却只能徒唤奈何，难怪要与彭玉麟在江阴“相见对哭”了。于是愤而“具疏劾李鸿章”，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结果，“交部议处，降二级调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半年后，丙戌（1886）六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黄体芳的此次宦海受挫，似亦与朝廷中枢的政治斗争有关。

黄体芳左迁后不久，于光绪十七年（1891）便告病辞官了。他在京城闲住了几年，“犹领袖后进，坐客恒满”。^④甲午（1894）以后，被邀往外地，主讲过几个有名的书院，但时间都不长。

黄体芳对李鸿章始终耿耿于怀，有时遇见安徽人氏，就要将李冷嘲热讽一番。

① 李详：《药裹慵谈》卷六，“黄漱兰先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补》。

③ 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4页。案：烧锅，制作烧酒的作坊。

④ 李详：《药裹慵谈》卷六，“黄漱兰先生”，第110—111页。

丁酉(1897),黄体芳主讲安庆敬敷书院,道经芜湖,徽宁池太广道袁昶迎其入署。江阴殷葆诚时在袁昶幕中,遵袁嘱咐,陪侍黄体芳,因殷葆诚亦是南菁书院出身:

一日,袁师柬约汪仲伊山长、吕筱苏编修(两人皆仲稻学士庚辰同年)陪洗尘之宴。吕先期赴宁国,所至惟汪一人,谈笑甚欢,侍郎之酒逾量矣。嗣道及李合肥,侍郎忽变色,大声询汪曰:“汝为安徽人,试公言此人之善否?”汪窘甚,支吾其辞。侍郎顾余而问何案游庠,何年补廪,住南菁若干时,并及江阴琐瑛,若甚不愿听汪言也者。爽师遂借此呼饭,以间其辞。^①

据殷所记,黄体芳在宴席中对江阴、对南菁,殷殷垂询,无时或忘。殷接着又说:“近阅某种小说,亦载此事,完全失实。余与林、袁两君为当日陪席之人,耳闻目睹,知之最确,何尝有筱苏在座种种答语乎?”^②对小说家言很觉好笑。

然而,兴化李详所记此事也很真实,估计是汪宗沂亲口告诉他的,因汪与李在江宁、扬州时相过从。李记:

(黄体芳)甲午出为信陵书院山长,复主江宁、安庆书院,皆未久辞去。^③当先生过芜湖时,袁爽秋官此,迎先生入署,欢宴竟日。请吕君佩芬、汪君宗沂作陪,皆先生年侄。先生每遇皖人,必极诋李文忠。吕托病不赴,汪为中江书院山长,谊无可辞。先生举酒属汪曰:“仲伊先生,请进一杯。”汪作色曰:“年伯如此称呼,不敢当,将年谊不认乎?”先生曰:“因君学问好,故尊之。”又问曰:“仲伊贵同乡李合肥为何如人?闻君客其幕府数年,必深悉其人。”袁恐先生辞厉,乱以他语,辄命进饭。先生大呼:“爽秋!君乃不许我吃酒邪?”袁窘甚。汪进言曰:“年伯校士各省,闻出试题甚佳。”先生曰:“唯,唯。”汪曰:“年侄客李时,亦有一好题请教,为‘知虞公之不可谏,年已七十矣’。”先生抚掌曰:“妙,妙。”因尽欢而散。后袁谢汪曰:“非君不能解此围。”^④

殷葆诚、李详两人所记虽略有不同,但记黄体芳之不满李鸿章,似同出一口。黄体芳清流本色,至老未改。

黄体芳文名卓著,诗作不少,但随吟随散,“无可蒐搜,先生不以诗名,而敦崇气

① 殷葆诚:《追忆录》,徐华根编:《江阴名人年谱》中册,安徽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40页。

② 案:据殷回忆,陪黄体芳同行者有“令坦林若川君、西席袁观澜君”。

③ 案: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黄体芳应河道总督许振祿之聘,主讲河南开封之信陵书院数月。该年初冬,又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邀,掌江宁之文正书院,时间更短,因张又调回湖北。二十三年,主安徽安庆之敬敷书院讲席,时间也不会长。

④ 李详:《药裹慵谈》卷六,“黄漱兰先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1页。

节,时流露篇什间”,^①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但黄体芳考诸生所出试题,却大大出了名。他往往题中寓意,构思巧妙,极有幽默感,被士人称道不置:“命题之巧,为自来衡文者所莫及”,“命题匪夷所思。”^②《清稗类钞·考试类》称:

黄漱兰为江苏学政时,命题之巧,往往出人意表。光绪乙酉科贡监录科,新优拔贡与监生同场。贡题为“完廩”,监题为“捐堦”,皆出《孟子·万章上》。绎其命题之意,盖一则贴切新得优拔贡者,已出廩生之缺;一则贴切监生,以一百零八两库平银捐一监照也。^③

这是考优贡、拔贡和监生。又称:

黄漱兰督学江苏,试某郡,例考教官,以定黜陟。其题为:“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④

这是考教官。前句表示对教官的同情,后句则申明此为公事,不得有所假借。武进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作者)称赞黄出题:“其真婉而多风,谑不伤虐者也。”^⑤李又举例:

后试松郡,尚有金山县学某附生投来请补欠考三届,题为“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士何事,如彼其久也”。

这是补考生员,意思是前次我很愿意见到你来应考,而竟未来,所为何事,非得要拖至今日才来补考。两题确是婉约有旨,多所风劝,虽然迹近玩笑,但也不算过分。李不禁感叹道:

此等题若不经意者,然神情跃跃纸上,非老师宿儒而能若是乎?于此见《四子书》虽极熟腐,一经慧心人变化运用,无不可簇簇生新也。

这些题目中的句子均来自也只能来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读书人天天诵读得极熟且又极腐的《四书》,问题是一经黄体芳这“慧心人”“若不经意”地一加组织而“变化运用”,就“神情跃跃纸上”而“簇簇生新”,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了。

① 吴庆坻:《焦廊腔录》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6页。

②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③ 《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黄漱兰命优拔监题”,第622页。案:某郡,李伯元称太仓州,见《南亭笔记》卷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④ 《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黄漱兰出考教题”,第720页。

⑤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黄体芳有时也会借出题而表明自己的爱憎，所谓“托讽于微”：

尝有三县童生合考，黄命题曰：“有李，国人皆曰可杀”，指某相也。曰：“以左是社稷之臣也”，指左文襄也。曰：“老彭，吾无间然矣”，指彭刚直也。^①

这里的某相，当然就是指李鸿章了。

黄体芳不但命题很巧，批阅试卷所下的评语也极高明。“彼时阅文负盛名之师，首推黄漱兰先生体芳。”^②不过，妙归妙，有时也难免流于刻薄，所谓谑而伤虐了：

某生欲得寿榜，多填年岁，例须入学。则批云：“文在题外，字在格外，年在□十外，本学院不忍置之度外。”^③

黄体芳“性好饮，其公事图章为‘醉仙过目’四字”，自称醉仙。他阅卷后，在试卷上所盖图章的“醉仙过目”中的“过目”两字，倒有点像现在的某些官员在公文上所批的“已阅”两字。《江阴县续志》也说他“性喜饮，点名时，恒以酒代茶。然取舍公明，鲜有败事。”^④张一麀回忆少年时中光绪壬午科乡试副榜后，赴江阴晋谒黄体芳的情景：

余入厅事候未久，见一红顶花翎、身不满四尺而须眉甚伟者出见客，酒气熏人，即阅卷小印“醉仙过目”四字之漱兰先生也。先生任京职时弹章不绝，台阁生风，当时有四矮子齐名，比诸翰林四谏，先生与张文襄公之洞皆其一也。^⑤

黄体芳居官清廉，“其以正詹升兵部左侍郎也，淮军、湘军统领某，各以条金二百为寿，体芳力拒之。固请，乃为捐助山西荒赈。”^⑥回京降职任通政使时，也无分毫自润，自称：“通政司饭银之局，创于前通政使周少堂。余与同事奏明，依议相约，无以自润，现存约七千余金。”^⑦

黄体芳操守清厉，风节卓著。但对世界大势了解太少，如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始终信奉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严夷夏之防。《清稗类钞》记有这么一件事：

黄漱兰督学江苏时，有某生者，廩生也。试算学，用数目处，以亚拉伯字书之。黄阅之大怒，即悬牌曰：“某生以外国字入试卷，用夷变夏，心术恕不可闻。

①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第182页。

②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③ 刘声木：《莅楚斋五笔》卷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2页。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④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黄体芳传》。

⑥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⑦ 俞天舒编：《黄体芳集》卷六《诗》，《六十述怀》第六首自注，第292页。

着即停止其廩饩。”某遂以发狂死。^①

这位廩生在考试算学时用上了阿拉伯数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都说明该生能接受西方文明,是一种进步。但在学政大人眼中,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用夷变夏”吗?一怒之下,立即公布了对该生的处罚“停止其廩饩”,断了他的生活来源。这位可怜的书生因此发疯死去。谁叫你不用“一、二、三、四”的国粹,偏要用夷人的“1、2、3、4”,这些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数字与方方正正的汉字放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协调。

黄体芳对当时的所谓“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也始终抱着抵制的态度,对洋务派人物也从来没什么好感,他与李鸿章交恶,这也未尝不是原因之一。现代学者朱维铮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一文中说:

……1884年9月有道上谕,说是“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需人”,要求李鸿章立即密令“熟悉洋务”的马建忠(《马氏文通》的作者)赴京引见。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这时清流派主要人物黄体芳多次上疏,控告马建忠是“洋务奸细”,非处死不可,而当时北京刑场菜市口的摊贩们,甚至纷纷收摊,等待观看刽子手杀马建忠的头。^②

李越缦身在京师,记载此事,想必有据。黄体芳视精通洋务的马建忠为“洋务奸细”,是他一贯的“严夷夏之防”思想的流露,今日看来,殊不足取,但在当时却深孚众望,这可从摊贩们都想去观看马建忠被砍头的事得到证明。不过,也不能深责于他,这是时代使然,毕竟“放眼世界”的先知先觉能有几人?

甲午以后,世变益烈,黄体芳似亦同情维新,当光绪二十一年冬上海强学会成立时,黄体芳与其子绍箕、侄绍第三人均以发起人列名会籍,这主要是张之洞的关系,与康有为办会宗旨有异。^③

黄体芳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逝世于故乡,噩耗传来,江苏“士民痛悼”。“南菁书院为龛于藏书楼,设木主以祀。”^④黄体芳生前谦辞生祀,死后得以专享。喝水不忘掘井人,南菁书院没有忘记这位创始人。此时,院长是丁立钧,为这位声气相通的前辈作一挽联:

① 《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以外国字入经古试卷”,第619页。

② 朱维铮为马相伯《一日一谈》所作的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强学会人物”,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四《官师·黄体芳传》。

老成典型，当为中朝言事之臣独标劲节；
 残生涕泪，敢帅南菁从学诸子一哭斯文。^①

南菁书院早期课生吴县曹元弼，为黄体芳于光绪乙酉所拔优贡，知遇之恩终身不忘，所作挽联尤为沉痛：

为天下纪纲人才教化国运力挽狂澜，身在社稷，功在斯民，江汉秋阳，明德必祀百世；

与海内忠臣孝子义士仁人同声痛哭，生我父母，成我夫子，天高地厚，心丧岂独三年。

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因他卸官后隐居长沙乡间时，给建在城东北隅的住宅取名为“葵园”，所以后来学者都称他为“葵园先生”。

王先谦出身贫寒，兄弟四人，他是老三。生有异秉，从小读书，就喜欢问问题，有强烈的求知欲望。^②无奈家贫，读书不易，他后来为老友刘冕写墓表时说：“(刘冕)喜聚书，家无余货，则典衣以购，每得善本，以夸示余辈。”“而君颇怪余不蓄书，余笑曰：‘俟真能读书时，迺求之耳。’实则余贫困尤甚，欲如君典衣购书亦不能也。”^③二十岁那年(咸丰十一年)，父亲病亡，时家徒壁立，糊口无资，不得已，由父执荐入长江水师向导营，聘司书记，驻军安庆。后又入提督梁洪胜军幕，驻军湖北。同治三年(1864)，官军败绩，王先谦随梁洪胜率领败卒突围出，移营蕲水。七月归里，九月乡试中式。明年会试中式，经复试、殿试、朝考，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四岁。七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大考二等第五名，擢补右中允。二年，补国史馆总纂。五年，升补翰林院侍讲、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六年，升补国子监祭酒。^④

在十多年的清闲京官生涯中，他始终在追求学问，专研学术，“在史馆成《东华录》二百卷，《东华续录》四百十九卷，十朝谟烈，灿然大备”。^⑤还常参与抡才大典，

① 俞天舒编：《黄体芳集》附录《挽联》，第373—380页。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② 陈毅：《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卞孝萱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六，第403—409页。

③ 王先谦：《刘秉斋墓表》，《虚受堂文集》卷十二。

④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

⑤ 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七。案：光绪十年在湖南守制时刻成。又据陈毅所撰《墓表》称：“应得五百一十卷，此误计耳。并乾隆百二十卷，为六百三十卷。”

自称：“溯余通籍以来，凡五与试差之考，而三主省试，再校礼闱。”^①三主省试，指主持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再校礼闱，指两充会试同考官。搜罗人才，不遗余力。王先谦也十分关心朝政，屡次上疏议论国事，弹劾大臣。

光绪八年(1882)，因母亲去世，扶灵柩由海道南归。该年，撰集《续古文辞类纂》成，刊之湘中。

十一年(1885)服丧期满，进京就补旧职。就在这一年，受命出督江苏学政。王先谦上任伊始，就立即给江苏各学分配了学术研究任务。南菁书院早期课生赵椿年回忆：

下车观风之始，发《劝学琐言》一本，以《尔雅》、《说文》、《文选》、《水经注》四种，分配各属为集注，如《尔雅》，则“释诂”、“释训”，江宁；“释言”，则太仓；……各县皆照此分配，未能有成。^②

其实，只是当时未能有成，日后，王先谦还是充分利用了江苏学者的众多治学成果，完成了他的数部皇皇大著。王在三年学政任内，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南菁书院的建设上，为南菁添置了一份产业，即南菁沙田。特别应该提起的，是他在书院设局刊成《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后又刻《南菁书院丛书》一百四十四卷。沙田与《续经解》事，上编第二章已有详述，此不赘。

王先谦在江苏选拔人才，口碑甚好。叶昌炽在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王益吾学使岁考，建霞得首列，可谓破格拔人，吾乡后起庶几向学乎？”^③王先谦赴任后，在江苏的第一次岁试，就慧眼独具，识拔元和江标，使向学之士欢欣鼓舞。

王先谦是有心人，江苏各学人才，平时按试所至，随手记录。他后将此名录钞送给时主南菁书院古学讲席的缪荃孙一份，以供书院选拔人才做参考，他写信给缪：“学校人才，略区门类，平时随手记录，不免挂漏，贡监亦不与。吾弟留意人才，录赠一分，不必令外人见也。”^④甚至王离开江苏后，仍念念不忘江苏士子的状况，还自责当年选拔人才时的疏漏，他在写给缪的另一封信中说道：“于生可怜之至。金君不记何时入学？从前兄未物色及之，可知疏漏。江都有王景沂，已补廪，年少

① 王先谦：《葵园校士录存·序》，《虚受堂文集》卷六。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③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王先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④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三十通，《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4页。

能文，然亦瘦弱可虑。人才辈出，惟秀实乃惬意耳。”^①于生，指于玉峰，逝世时年仅十八岁，故王说：“于生可怜之至。”金君，泰兴金弑也。同是“神童”，王识拔六合田其田，而于金弑则“未物色及之”，故王自责“疏漏”。于、金、田都是南菁书院课生。

不过，王先谦表面文章做得不尽如人意，当入学诸生发落时，王先谦竟然连一句勉励的话都不说，萧穆就写信提醒他此点：

……计回辕甄南菁书院经古诸生又当在三月初矣。往者执事初莅江苏，各属士子皆有喜色，莫不欲出大君子之门。今二三年来，科岁两试皆将就竣，外间虽颂衡文之公，尚少爱戴之意。昔阮文达之按试山左及两浙，汪文端之按试安徽、江右及两浙，遗爱至今在人耳目，所以至此，二公所至，接见士子，论文讲学，如家人父子，士子习其教育，多所成就，流风余韵，沾溉后人亦复不少。今闻执事所至，入学诸生发放之日，默无一言，此岂足以为训。惟望此番甄别南菁书院，各属诸生毕至，不惜竭十数日之功，约诸生毕集，为茶果之会，仿阮、汪二公故事，论文讲学。……戊子正月廿八日大通发。^②

估计此时正临刻书告竣之时，获取虚誉之繁文缛节是无闲去做的了。

光绪戊子(1888)三月，王先谦离学政期满还差半年，在江阴学署上一奏折，请求惩戒为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李莲英：

为太监招摇请旨惩戒事。

臣维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滥权害政之事。皇太后帘听以来，办理一禀前谏，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为太监者，宜如何小心谨慎，痛戒非为。乃由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臣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官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皮硝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

①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四十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9—30页。案：据信中所说“院事交袖岑极好，弟幸与茂名师商之”云云，则该信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因缪荃孙正准备于次年(1890)春服丧期满、进京复职前，将南菁古学讲席交于缪祐孙也。

② 萧穆：《敬孚函稿·致王先谦》第八通，《与逸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臣虽职守攸羈，何敢稍存瞻顾之私，缄默姑待，以负圣朝？谨专折纠参，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①

奏上不报，于是王先谦于十月甫卸任，即请假回乡修墓。明年己丑（1899）二月假期已满，便呈请湖南巡抚代奏开缺，三月二十日奉朱批：“王先谦着准其开缺，欽此。”王先谦从此脱离官场，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学术研究和刊印书籍上。

关于王先谦弹劾李莲英的动机，有种种猜测。有人说，王能督学江苏，外间传闻他实际上是向李莲英行贿而得此美差的，卸任之前，担心自己的名誉被李给玷污，所以才上疏弹劾而显示自己的清白。^②文廷式就说：“或云王先谦得李太监之益，未知果信然否？亦足见人贵立身于早也。”^③不过，联系王之生平行事，此说有诬陷之嫌，实不可信。^④王先谦或与文廷式本有过节，王曾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给缪荃孙的信中大骂：“文廷式狗彘，亦得内阁中书乎！”^⑤

王既劾李，不报，遂萌发退隐之意。文廷式说：“王先谦以劾李莲英去，其折则淡淡二百字耳，盖欲俟明白回奏时，列款继上也。”不想，“及折入，则留中不发”。所以文廷式猜测：“闻归政之意，盖决于此，未知实乎？”而王先谦稍早修葺江阴学政衙署的后花园时，发现了一块明代学使毛一鹭所写的学政题名碑刻，而毛一鹭是阉党，王先谦触景生情，感叹国事不可为，至此，益坚其归隐之意。王先谦年未五十，便下决心脱离官场，与家事的不如意亦有关系，他写信给毕永年：“仆在苏学任内，以遭家多难，儿女夭折，万念灰绝，决计归田。”^⑥王在江阴日，上无父母，下无子息，旁无兄弟，“万念灰绝”恐亦不是虚言。不过，王先谦及早归田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自认“立功”无望，然桑榆未晚，“立德”、“立言”尚可有成也。王先谦于光绪十五年（1889）写信与缪荃孙，也透露了这一点：

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疾病缠绵，春深始渐向愈。公私百未料理，宦游本非素愿，重以嗣续尚虚，心境恶劣，出既无补于时，不如屏迹读书，稍有自得之

① 此折录于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四十七岁。

②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四册《谏诤类》，“王先谦劾李莲英”，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21页。

③ 文廷式：《知过轩随笔》，《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页。

④ 案：《清稗类钞》编者亦不信此事，在引李莲英污王之词后，便下结论：“知之者则曰，李既衔王，故以是损其誉也。”见《清稗类钞》第四册《谏诤类》，“王先谦劾李莲英”，第1521页。

⑤ 王先谦致缪荃孙信第四十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9—30页。

⑥ “王益吾祭酒复毕永年书”，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57页。该信亦收于《虚受堂书札》卷一，光绪丁巳（三十三年）秋刊本。

乐，此所以长往而不顾也。^①

后来，缪荃孙对王先谦自解褐至督学江苏任满后即归隐的这一段经历，有一总结：

江苏学政，年末五十，乞身还。为翰林，有直言敢谏之风，有特立独行之概；为讲官，不附时流；为学政，不阿总督。严劾内侍，择言雅训，固吾党所乐诵者。其阅文也，澄心渺虑，能烛其人根柢之厚薄、学术之邪正，而拔其尤，故所取皆知名士。江苏三岁，使车再周，文学之士，选拔殆尽。南菁书院初创，先生为集巨款，增学额，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礼学馆所共推、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皆南菁之门人。^②

王、缪两人交好几十年，缪为王所作《七十寿言》的这段话，绝非虚美之词，尤其是王先谦对南菁书院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至为深远。

王先谦回长沙后，主讲思贤讲舍的郭嵩焘，推席相让。王与郭经常在一起讲道论学，切磋学术。由于郭曾出使过英国，便与王纵论世界大势，也许是受郭的影响，所以王后来会有外国史地之作。王先谦后又主讲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一意撰述，日著书不辍。光绪三十三年，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进王著四种《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清廷赏内阁学士衔。

王先谦恪守儒家理念，思想正统，被维新人士视为顽固：“湘绅中以王益吾祭酒、叶德辉为最顽固”，“故二人交甚笃，凡有所为，王出其力，叶出其财，由是湘人并畏其人。”^③王、叶二人交谊甚笃不假，但论学则常相左，叶曾自称：“葵园主持湖南书局十余年，与辉持论相左。其所刻书必加以自注，又杂以本家及门人之注。注者往往不知门径，以意为之。且又不据古本，但据时本。校所不当校，注所不必注，灾梨祸枣，而天下人人恭维，可见世界只有读类书之人，无读注书之人也。”^④另外，要说守旧顽固，在湖南士绅中，王先谦根本算不上什么，更别说“最”。王在湖南曾兴办实业，创设公司，说起来还很新潮。王甚至还讥笑过湖南士绅之无识：“湖南僻

① 王致缪信第三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5页。据信中“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语，可知此信写于光绪十五年二月自请开缺得准后，约在四月间。

② 缪荃孙：《葵园七十寿序》。附《葵园自订年谱》“宣统三年辛亥，七十岁”，王自称：“七月，余七十生辰，坚辞馈遗，而以文诗为寿者，义不可辞，谨备录之，用志友朋厚谊。”案：“为学政，不阿总督”，不知何事，待考。

③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④ 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第四十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564页。

陋，风气不开，当事议行轮船，无识绅士尚复从中把持，真堪喷饭。关系省运，实非浅鲜，想大吏有风力者，必不至听其阻挠也。”^①他对西学也不一味排斥，认为西学相较中学，尤为繁重：“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②

然而，王先谦与张之洞一样，始终以“中学”为本位，而“西学”虽实用，终究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所以王对康、梁动摇国本的维新变法很是抵触。陈宝箴抚湘时，推行新政，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梁与谭嗣同、唐才常等竭力鼓吹变法，王喟然曰：“此洪水猛兽也。”^③

宣统二年(1910)春，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酿成惨案。梁启超对此发表评论：“三月初五长沙之变，举国震动，环球侧目，其祸盖未知所届也。”^④可见情况的严重。王先谦也被卷入了此事。

当时湖南士绅对巡抚处事不力而不满，便联名上电湖广总督瑞澂，要求撤换巡抚。结果，因“王祭酒以电文中首列名，遂遭严遣，奉旨降五级调用”。^⑤有学者认为，王先谦对于电文首列名，毫不知情。朝廷加罪于他，是由于瑞澂的诬陷。^⑥后人也有不少为他鸣冤叫屈的，如罗继祖根据王先谦与缪荃孙的书信，便为王先谦雪诬：“然葵园儒者，立身自有本末，‘包揽词讼’实瑞澂所妄加。”^⑦罗继祖所引王致缪的信是这样说的：“湘中三月初五之变，先谦杜门未出，众绅电鄂、电京，皆以贱名首列，又不审量轻重，直云请旨易人。”又说：“归里二十余年，未尝一与讼事。近数年谢绝酬应，地方州县官不通拜谒，而得‘包揽词讼’题品，此皆命官磨蝎所致，何敢尤人。”^⑧此信并未明说自己对首列名并不知情，而在另一信中，则明白无误地指出此点：“回念庚戌谪官，以常相见之黄董腴一忌生心，窃名而可以首列，在家而不来告知，遯问其何以电督，曰为大局起见。遯曰，奸民焚署，巡抚本站不住，君以我首列，

① 王致缪信第四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0页。

② “王益吾祭酒复毕永年书”，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57页。

③ 陈毅：《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卞孝萱编：《民国人物碑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湘乱感言》，《饮冰室合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页。

⑤ 吴庆坻：《焦廊陞录》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页。

⑥ 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冈尔昌编：《碑文集补》卷七。

⑦ 罗继祖：《两启轩笔尘》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⑧ 王致缪信第六十一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0—41页。

惟送我而已，安所谓大局乎？黄惟俯首无词而已，至今思之犹有余恨。”^①

尽管王先谦受此不白委曲，遭此飞来横祸，但对清廷仍忠心耿耿。辛亥革命后，他对时局完全失望，便改名“遯”，迁居乡间，日以著述为事。民国六年（1917），“闻复辟不成，愤而致疾，十一月乙卯（二十六日）卒，年七十六”。^②

叶德辉于十二月初九日闻听噩耗，立即写信与缪荃孙，不无伤感地说：“昨上一书，计已达钧座矣。今日接儿子家书，云葵园于十一月廿六日巳时作古。阅书后不觉泫然。田居廿余年，与此公共事，讲学时复参差，然矜而不争，和而不同，实无愧故君子之谊。老人凋谢，知己何人，不仅衡麓、洞庭山水无色也。”^③

王先谦为人治学，不走极端。为人不愿做真名士，亦鄙视假道学；为学则有调和汉宋的倾向。吴庆坻说：“长沙师王葵园师，尝与人书云：‘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欲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欲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欲貌袭直谏。’先生立身本末，为学大指，数语尽之矣。”^④又在《墓志铭》中称道“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涂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

吴称老师治学“合汉宋涂辙而一之”，不偏不倚，不纠缠于枝节问题。现代学者也有相同的看法，陈桥驿说：“在鄙学史上，赵、戴《水经注》案中”，“第一个充当和事老角色的是光绪年间的王先谦”，“王先谦当和事老的态度是公正的，方法也是可取的。而和事的原则简明，不偏不倚。”“王先谦本人是一位鄙学家，深知赵、戴之间存在的问题，实难解决，因而提出‘存而不论’的和解原则，其用心可谓至深。”^⑤认为王先谦在这段公案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先谦一生勤于著述，硕果累累。其友萧穆与吴庆坻的信中说：“王益吾先生书室，尝大书‘需者，事之贼’五字以自警，故其平生著书甚勤，刻书愈勇，每年必有成书一二部。”^⑥其弟子陈毅在《墓表》中亦说：“先生著书之富，世率震惊，以为一代冠。”吴庆坻为其师所撰的《墓志铭》中，历数其著作之富：

在史馆成《东华录》二百卷，《东华续录》四百十九卷，十朝谏烈，灿然大备。

① 王致缪信第七十二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48页。

② 陈毅：《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案：民国六年，陈毅称九年（宣统九年），遗老口吻也。按照公历，王先谦卒于1918年1月8日。

③ 叶德辉致缪荃孙书第四十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564页。

④ 吴庆坻：《焦廊陞录》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页。

⑤ 陈桥驿：《鄙学札记》，《掌故·和事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48页。

⑥ 萧穆：《敬孚类稿》补遗卷一，“谢吴纲斋学使”，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474页。

视学江苏，成《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绍阮文达盛轨，用嘉惠来学。复以余力辑《南菁书院丛书》一百四十四卷。

其著述则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三家诗义集疏》二十八卷，《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新旧唐书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补》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庄子集解》八卷，《五洲地理图志略》三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三十三卷。

其撰集之书，则有《合校水经注》、《续古文辞类纂》、《骈文类纂》、《律赋类纂》、《十家四六文钞》、《六家词钞》。

其校刊之书，则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盐铁论》、《世说新语》、《郡斋读书志》、《景教纪事碑文考》。

其阐扬先德，则有通奉公遗著《诗义标准》一百十四卷，《鲍太夫人年谱》一卷，季弟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谏续录》、《文贞故事拾遗》十一卷，重事考证，成弟未竟之志。

其表章乡邦耆硕，若周侍郎寿昌、郭侍郎嵩焘之集，毛茂才国翰、欧阳州判格、毛孝廉贵铭之诗，吴训导敏树之文，并辑眷刊布，用章遗献。

访获亡友李布衣谟、丁孝廉蓉绶、李明经楨诗文集，授之梓。苏郎中與著《春秋繁露义证》，书成而歿，为刊行之，其笃风义又如此。

自为诗文曰《虚受堂文集》十五卷、《诗集》十七卷，门弟子所编刻也。^①

其实王先谦还有不少著作，吴庆坻未曾列出，如《释名疏证补》等，而《虚受堂书札》则于光绪三十三年就已有刻本。

学界对王先谦纂著的评介，亦誉多毁少。坊间传说，王湘绮拜访王先谦，取《续经解》和《续古文辞类纂》读之，曰“《经解》虽不能抗行芸台，《类纂》或足以比肩《惜抱》”^②，对《续类纂》的编选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认为王选录诸家之文，比例失调，“虽罗列诸家，少者仅录文一二篇，似不足尽诸家之长。所录十家为最多，成为十家文钞，亦一病也”。^③竟讥之为《十家文钞》。

总的说来，后来学人对王先谦的学术成就都十分推崇。罗继祖说：“王葵园木

① 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七。

② 陈澧：《新语林》之《文学》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刘声木：《莠楚斋三笔》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83页。

天隽望，迭司文柄，寝馈撰著，几乎等身，求之清末儒林、文苑，几以一身兼之矣。”^①乡后辈李肖聃说：“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又说：“综兹四部，集诸一身，纂述鸿编，发扬巨业，其名驰誉域外，其书传于寰中，湘国灵光，韶年寡两。”赞誉之词，无以复加。湘人公祭王先谦时，李还撰文称：“四十余年，楚学生光。长沙大师，并称二王。湘绮通玄，形同庄、列。公则守常，克全晚节。”^②王闿运、王先谦并称湖南二王，但如单从衡量学术成就的角度看，湘绮如何能比得上葵园？

王先谦在清末，以一身兼儒林、文苑，但他并非无治事之才，翁同龢在光绪八年五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就称“王益吾长于经学，人开张，可用才也”。^③然而，王及早脱离官场，终身从事著述，亦未尝不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

王先谦给自己的诗文集取名《虚受堂》，其缘由盖出自江阴学署。王先谦在《重修寄园记》中自述：

先谦曩在京师，即闻座主今都御史祁公，述其少时侍父文端公于江阴学署，得常游所谓“寄园”者。既奉视学江苏之命，公出示所藏《寄园消夏图》，则文端尝以夏日与李申耆、苗先路、张石舟诸君子，宴集斯园。逮入参枢密，乃因而记之。复自书园居时所为诗数十篇于后，其于斯园，盖惓惓也。先谦于是得具知当日园中亭舍之美与风景之丽。祁公曰：“斯园吾不详其自始，以‘寄园’命名，则始于陈侍郎希曾。”

……

咸丰庚申，署毁于贼。乱定建署，而园不复。陈公视学之岁，距今且七十年。今《江阴县志》于寄园初未之及，吾虑斯园之终湮也。先谦既到官，暇日周览其地，则垣墉隳夷，芜秽盈溢，一池之外，悉无存者，愀然伤之。感祁公之言，亟谋修复。经始光绪乙酉仲冬，落成于丙戌季春。为庐曰“永慕”，以奉先谦父母遗像。堂曰“虚受”，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存雪”、“列岫”诸亭，并仍其旧，……^④

① 罗继祖：《两启轩笔尘》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② 李肖聃：《湘学略》之《葵园学略》第二十，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62页。

④ 王先谦：《重修寄园记》，《虚受堂文集》卷十三，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九月刊本。

文中的都御史祁公，指山西寿阳祁世长，是王先谦的乡试座师，少时随侍其父祁寓藻督学江苏时，在江阴学署生活两年多。寄园为学署之内花园，当时，祁寓藻常与江阴暨阳书院山长李兆洛和学署幕友苗夔、张穆诸人在此宴会。祁氏父子对江阴感情很深，祁寓藻回京任军机大臣后，还画了一张《寄园消夏图》以作纪念。王先谦因老师祁世长的关系，来江苏前，就耳闻寄园大名。所以上任伊始，便修复寄园，又增建“永慕庐”，放置父母遗像。另建“虚受堂”，作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军机大臣、工部侍郎孙毓汶为作榜名。修葺之雪浪湖亭，则请刑部尚书潘祖荫题额。

王先谦将“虚受堂”作为诗文集的名字，对江阴，对南菁书院，念兹在兹，一往情深。兹录王先谦《君山》七绝一首，以结束本文：

江天澄碧照人明，小立能令百虑清。不用梅花寻旧额（原注：山下有梅花书院废址），他年径与换南菁。^①

杨 颐 溥 良 龙 湛 霖 瞿 鸿 禛 李 殿 林 唐 景 崇

杨 颐

杨颐（1824—1899），字子异，号蓉浦，晚更号蔗农。广东茂名人。^②

杨颐从小聪颖异常，九岁就读完五经，十岁就能写出一篇很像样的文章。十六岁时，广东学政戴熙很欣赏他的才华，录取入学。数年后，后任学使李棠阶对他更是赏识有加，选为优贡。李棠阶在京师将他召至国子监，供给饮食，指导作文，教诲做人。杨颐没有辜负李的栽培，咸丰壬子（1852）中式顺天乡试，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杨在中进士前几年，正值战乱。杨颐在家乡与同郡绅士举办团练，守卫高州郡城，筹饷练兵，始末三年。杨颐天天在行伍中，“治军书，筹馈运”。当军饷不支时，便“质家产三千金济军”。事定后，杨才赴京参加会试。

杨颐进入仕途后，曾两充会试同考官。光绪八年充甘肃乡试正考官。因为参与纂修《穆宗实录》，以劳绩迁翰林院侍讲，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升顺天府丞，调奉天府丞兼学政。

光绪十四年（1888）以大理寺少卿督学江苏。杨于该年十月抵达江阴学署，与王先谦办好交接手续，正式上任。杨颐办事认真，恪守朝廷功令，但又处处照顾到

① 王先谦：《君山二绝》（丙戌年作），今录其一。《虚受堂诗存》卷十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刻本。

② 王先谦：《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十五。以下引文同。

士子的利益,这可以从他上奏朝廷折子里看出来。光绪十五年(1899),杨颐奏称:“州县学额,迭有增加。”但经庚申兵燹后,应试人数减少。如果不肯降低录取标准,势必会有学额空出,这虽也符合朝廷“宁缺毋滥”的要求,但杨颐为士子着想,“不特文字竟体完粹者,首加甄录。即瑕瑜互见,亦均节取其长,登进如额”。^①尽可能地为学校多收几个生员。

杨颐对南菁书院也一如前任那样关爱备至。他下令改造了王先谦建造的刻书局的旧屋,添建了十四间宿舍,由以前的“训诂词章”四斋,扩充成“德行道艺、礼乐诗书”八斋。内课生也增加很多名额。还增加课生的膏火费,由每人每月的五千文增至七千文。^②南菁书院在杨颐主政时期又有了不小的发展。

杨颐任内升太常寺卿。三年报满,于光绪十七年十月请假南归故乡探亲。明年,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年(1894)出任会试副总裁、顺天乡试副考官。该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杨颐向朝廷“屡陈事宜”,请求惩处那些“失律”的官员,“以肃军令”。^③杨颐对那些为国捐躯的官员则大加表彰,如左宝贵战死在平壤,尸骨无存,朝廷在其家乡建衣冠冢,冢前的华表上,刻有杨颐所写的一副挽联,留传至今。

光绪二十一年,充会试知贡举。二十二年,擢升兵部右侍郎,次年转左。二十四年(1898),康梁变法时,杨颐似持反对态度。据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申报》,《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中载:“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同乡许筠庵尚书应骥、杨蓉浦侍郎,以其惑众敛钱,行为不正,严加斥逐,不准再开。”^④不久,杨颐告假回乡修墓。光绪二十五年(1899)卒于家。

杨颐曾主纂过光绪《茂名县志》,时在光绪十四年,杨颐官大理寺少卿。杨颐对金石学颇有研究,除撰写过《茂名金石志》外,其《好太王碑考订》一文,据说是我国学者对高句骊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

溥 良

溥良(1854—1921),字玉岑,清宗室,和亲王(雍正第五子弘昼)后裔。然而到

①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百零四辑第六百三十六折,转引自张伟然、梁志平:《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六《书院》。

③ 王先谦:《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续碑传集》卷十五。

④ 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策略的转变并论转变以后至曾廉上书以前康的政治活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溥良这一辈，所谓“天潢贵胄”已徒有虚名，早已失去门荫的溥良，决心走科举进身这条路。溥良拜淮安人秦焕为师，刻苦攻读，终于在光绪元年中举，六年（1880）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由于溥良是皇室后裔，所以官场上升迁很快，不到十年，已官至内阁学士，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江苏学政。

江苏士人对溥良督学江苏的表现，有不同的评价。有赞不绝口的，如董玉书说：“训士以实学有用为宗旨，按部考试，场规肃然。”^①还说 he 按试时常随身带着一顶碧纱橱，端坐在大堂上，从来没露出过疲倦的神色。他还禁止吏役催迫考生完卷，使得诸生“在风檐中从容得尽其长，拔取多寒峻而学有根柢者”。董是江都人，以附生径得优贡，溥良对其有知遇之恩。按功令，“各省之优贡、拔贡，必须补廪生后，方准应考，附生无应考之例”。^②董记恩师，容或有溢美之辞，但出于他人之口的赞辞，则在在皆是。

“据江都徐蛰叟广文师言，粤捻匪平后，任江苏学政，真能弊绝风清者，只有宗室溥玉岑尚书良。尚书考试，论字不论文，然确无弊窦。士林亦悦服，无异言。银台（按：黄体芳因上疏李鸿章事，贬官通政司使）仅以风节著耳。”^③在这位徐先生的口中，溥良在杜绝考场弊端上，竟然比黄体芳做得更令士人悦服。

江阴士人也称溥学使监督考试确实很认真，对考生也很友善。“每至扃门试士时，溥辄至考棚周历巡视。或与考生谈话，其言直率可喜，无骄饰习气。”^④溥良很谦虚，对应考士子娓娓道来：“我虽任学使，文理其实不兴。但我之幕中人，皆出重金聘来，尽系饱学之士，且多翰林、进士。先生们（溥称考生，向无‘尔小生’、‘诸童子’等不入耳之言）务要用心作文。作得好文章，决不埋没英才”云云。进场与考者，无不悦服。

溥良很重儒家道德，按临淮安时，虽然他的老师秦焕早已去世，溥良还是亲自去秦府，拜谒秦夫人，“执弟子礼甚恭”。^⑤

不过，对溥良的非议也不少。溥良考试时，忌讳很多，南京士子夏仁虎回忆：“或传孝钦名‘翠’，昔溥玉岑尚书督学江苏时，讽学官、士子避‘翠’字。又记有同试某君，

① 董玉书：《先师溥良记》，卞孝萱：《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刘声木：《苕楚斋续笔》卷八，《优拔贡考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7页。

③ 刘声木：《苕楚斋五笔》卷八，《黄体芳出试题寓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3—1054页。

④ 徐再思：《澄江旧话》，《学使春秋》，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6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董玉书：《先师溥良记》，卞孝萱：《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

文极佳而被放，以文中用‘握瑾怀瑜’字也，‘瑾’、‘瑜’皆妃号。”^①不但慈禧太后的名讳要避，连同治帝妃嫔的名号也都要避，以致有人怀疑他别有隐情。不少考生吃了暗亏以后，才从他的仆人那儿了解到“翠珠乃溥爱妾之名”，然“蒙冤者已不少矣”。^②

还有人称“溥良坐堂阅卷，必先翻排律诗，颠头播脑，备诸丑态”。其实他腹中空空，什么也不懂。甚至说当时翰林院有“四大不通”，而溥良就是其中之一。前面提到徐先生赞扬溥良“考试，论字不论文”。也不知这是什么衡文标准，毕竟是考秀才，又不是考状元，要那么注重书法。

溥良在江苏三年，任满回京，历官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溥良如同其他大多数满洲贵族一样，极端排外。庚子年(1900)五月二十一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筹议和战，“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③据说，后来西方列强与清政府议和时，开出的一份惩处清廷官员的名单中，就有溥良，罪名是他提醒太后处死许景澄和袁昶。^④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灭。溥良痛心疾首，不愿再见故都“黍离麦秀”景象，就移居于河北易县。庚申除夕(1921年2月7日)，阖家聚宴，大醉。大年初一早晨，家人发现他卧床不起，竟饮毒(除夕夜所饮之酒)自尽了。^⑤也有传说，他是“卒赴皇陵痛哭，自缢而死”的。^⑥西陵就在易县，首葬西陵的就是雍正帝，即溥良的先祖。溥良有位曾孙，在现代的书法界享有盛名，那就是著名学者启功。

龙湛霖

龙湛霖(1837—1905)，字芝生，湖南攸县人。

龙湛霖弟兄三人。二位兄长都是举人，分别做过江西的知县和广西的知府。龙湛霖于同治元年(1862)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关于龙湛霖中进士事，翁同龢日记中有记载。当时翁是该科第十八房同考官。他说：“许星叔(庚身)、朱道然(九香先生少子)、龙湛霖，此拨来三人，皆珠玉矣。”许、朱、龙都是他房拨给翁

①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四，《宫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

②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以下引文同。案：李伯元此说，似小说家言，不如夏说有据。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63页。

④ 《德国档案中有关义和团的新鲜史料》，《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⑤ 董玉书：《先师溥良记》，下孝堂，《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团结出版社。

⑥ 杨寿枬：《云在山房丛书三种》之三《竹素园丛谈》，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辑。

的,所以称“拨来三人”。两日后,翁又记载他对龙的印象是“伟而厉”。^①

龙湛霖在光绪二年(1876)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九年,以詹事府左中允兼日讲起居注官。龙认为光绪帝很年轻,终日跟宦官打交道,不利于日后的君临天下,就上疏要求选择皇亲国戚中“绩学笃行、通雅有节概者,给事殿陛”,此疏得到不少人的赞许,认为说到了点子上,所谓“议者推为知本”。^②太后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很好笑,因“小臣未谙体制也”。^③

龙湛霖后来经过六次升迁,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光绪十四年(1888),出督江西学政,任内升詹事府少詹事、詹事。在江西,龙“用雅故群籍课士,风习为一变”。^④特别为人所称道的是,龙给经训书院聘请了通儒皮锡瑞任院长,皮后来为江西培养了很多人才,以致陈三立在三十多年后饮水思源,还说:“至今江西人士思皮先生,益推以思公。”龙任满返京后,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于光绪十九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光绪二十年(1894),龙湛霖以刑部右侍郎出督江苏学政。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结束,中国战败,“世变益急”。龙湛霖并不保守,为顺应潮流,他下令江苏各府州购买上海时务、商务各报,分给各书院的学子阅读。在日讲训诂词章的江阴南菁书院内,输入西方的科学知识,购入介绍西方科学的翻译著作,添置西方科学实验的仪器,很是难能可贵的了。在例行的岁、科试中,“其衡文也,以得经史之学、有用之才为亟。”^⑤龙湛霖对诸生说:“通人之作,一望而知。匪特村学究不可滥竽,即描画台阁文章亦无足取。”取士应以“通经致用”为标准。

龙湛霖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实由谭嗣同代写),请求“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试制艺(八股)外,均兼考西学一门,……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⑥这在当时可谓是极为大胆趋新的举措了。

陈三立称龙湛霖“气貌仁厚,粥粥若无能,而中饶知略,晓达治体,忠睿发摅,无所阿避。而为国家育贤才、端学术,愈引为己任”。^⑦

① 《翁和龢日记》册一,同治元年四月初八日、初十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201页。

②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③ 金梁:《近世人物志》,《龙湛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④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民国《江苏通志稿》之《人物志·名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⑥ 谭嗣同:《乙未代龙先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谭嗣同全集》,《秋雨年华之馆丛牍书》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 陈三立:《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龙公神道碑》。

江苏士人对龙湛霖的三年视学,印象深刻,如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是选拔之年,被龙学使录取的优贡、拔贡生,均为全省优秀人才,“舆论翕然”,认为龙很公正廉明。其中,南京的夏仁虎,三十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此事。^①

但对龙也有绝然不同的描述,当年南菁书院课生吴增元,在他的《八十回忆录》中,称“龙昏聩残年,须发皆白,沈于鸦片,凡事糊涂,阅卷悉委幕宾”。^②这里面可能挟有点私人恩怨,因吴拔贡未成,一直怀疑是龙在暗中捣鬼,且事后又似乎得到有力证据。但所谓“沈于鸦片”云云,都是吴增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所述当不致无中生有。又据近人费行简称,“龙任苏学时,皖抚沈秉成被弹,(朝廷)令(龙)覆按”,有人为沈说项,“湛霖信之,覆疏多宽假词。”结果,沈事后“用贪吏如故”。龙上了大当。^③如费说属实,则龙确实“糊涂”。

龙湛霖于江苏学政任报满后,即告病返居湖南省城长沙。一年后,便卧床不起,但仍很关心地方上的公益事业,如湖南教育界赫赫有名的长沙明德学堂,创建时,龙就捐资贰仟圆,并出任该学堂的总理。龙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享年六十九岁。

瞿鸿禛

瞿鸿禛(1850—1918),字子玖,号止龢,湖南善化人。

瞿出身于官宦家庭。十七岁入学。肄业于长沙著名的城南书院,先后受院长何绍基、郭嵩焘激赏。同治十年(1871)成进士,才二十岁刚出头。接着入翰林院,授编修,真是少年遂志,春风得意。朝中又得李鸿藻等大僚的器重,光绪元年(1875),便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传说,瞿被召见时,慈禧太后觉得瞿相貌有点像刚去世不久的同治帝,“语及穆宗,泫然泣下”。^④在以后的十多年中,瞿鸿禛常被外放考差或学差,先后出任河南乡试正考官、河南学政、浙江学政、福建乡试正考官、四川学政。光绪二十五年(1897)八月,瞿以詹事府詹事出督江苏学政。

瞿“校士严峻”,“律下尤严”,令人生畏。瞿在江苏督学三年,适逢戊戌变法,瞿对变法的态度如何呢?江阴士子吴增元在事过五十年后回忆道:“是年,江苏学政为瞿鸿禛,湖南善化人。初接任时,谒座,例召集廪生讲书,尚是注重八股试帖,痛

① 王景山:《夏仁虎的科举之路》,《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9日。

② 《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江阴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3年10月。

③ 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官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④ 刘宗向:《瞿鸿禛传》,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十六,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6—1107页。

斥时政，甚至指斥《申报》等为不可读之物。乃仅隔数月，岁试按临，口吻大变，对各县讲书之廪生，谓须多阅读报纸。善化人诚善化人。”^①善化，本是瞿的籍贯，即今长沙，这里却成了善于权变之谓也，可谓恶谑。

其实，瞿决非如吴所称的那样善变。戊戌政变前，他响应变法，将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又因南菁书院本有数万亩沙田的院产（今上海之横沙岛），特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农学。同时购买农业机械，聘请美国农艺师。后因慈禧发动政变而一切作罢。但他仍不避嫌疑，竭诚延聘维新派人士丁立钧出掌南菁书院山长。另外，又据南菁课生吴江的钱自严回忆，“瞿学台曾保护课生，批掉苏州府送来拟逮捕因为响应戊戌维新的课生的案卷。”^②

瞿鸿禨在江苏学政任内，升内阁学士，又升礼部右侍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任满，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后，补工部尚书。当时慈禧、光绪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已逃至西安，瞿此时由江阴转道家乡长沙，再赶赴西安。因荣禄、王文韶等大臣的荐举，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又命为政务处大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衙门改为外务部时，瞿即任命为外务部尚书。“时方与各国议和，鸿禨视事明敏，谙究外交，承指拟谕，语中窍要，颇当上意焉。”^③后又授协办大学士。

正岌岌向用之时，朝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突然降旨，命瞿鸿禨开缺回籍。其中缘由，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瞿密疏弹劾怙权贪黷的亲亲王奕劻，反被奕劻与袁世凯合谋，嗾使他人上疏弹劾瞿“揽权恣纵”，正中慈禧的心病。因瞿曾在太后面前“解譬戊戌时事，谓宜因庆典大赦党人，以收人心。”^④

瞿鸿禨在中枢六、七年，“尤矜清操，遵故事，不宴客，不投谒，严拒干请”。正是书生本色。辛亥革命起，瞿流寓上海。民国七年病逝，葬于杭州。

瞿的学问很好，所著《汉书笺释》一卷，多为王先谦纂《汉书补注》时所采用。另有诗文集等多种存世。

李殿林

李殿林（1843—1917），字荫墀，号竹斋，山西大同人。

① 吴汀鹭：《八十回忆录》，《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② 吴新萃：《访书院时期学员钱自严先生》，南菁中学《南菁百年校庆专刊》，1982年。

③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瞿鸿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 刘宗向：《瞿鸿禨传》。以下引文出处同。

传说,李的祖上是蒙古人,甚至有猜测是元代丞相脱脱后人的。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李殿林为文学侍从之臣四十年,历任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曾充广西学政、武会试主考官、广东乡试正考官。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李殿林以吏部左侍郎出督江苏学政。李为人“忠清醇朴,颇为时所称。”^①然而江苏本是人文荟萃之地,士子心高气傲,颇有点看不起这位山西翰林。常州士子李伯元说:“李殿林视学江苏也,除八股时文、五言试贴外,一切束诸高阁,甚至算学题目差至三万余,可谓谬之毫厘,失之千里。”^②还说:“按临江阴日,考童生场,一卷用‘元(玄,避康熙讳)德升闻’四字,幕友以其犯讳黜之,勒帛其旁。李闲步见之,贸然提笔代批道:‘元德是三国时刘备之名,不可用入文中’。李去,幕友传观,不禁忍俊。”

“元德升闻”,语出古文《尚书》中的《尧典》。孔传:“言谓幽潜,潜行道德,升闻天朝。”那么“玄德升闻”的意思,就是“(舜)潜心修行(自身的)道德,(好名声)上达到尧(天朝)那儿”。结果,熟读四书五经的李学使,竟将这里的“元德”说成是三国时候的刘备,因为刘皇叔字玄德。李还一本正经地提笔写了批语,谆谆告诫士子“不可用入文中”,真让人笑掉大牙。

李伯元又称,“某卷内用‘卢梭’二字,李瞠目不知所谓,其幕友有知卢梭出处者,具告之。李掀髯笑曰:何谓卢梭,此真是罗嗦。罗嗦,犹疙瘩也。”李学使倒也很风趣,还会跟属下开开玩笑。李看不懂考生有关“新学”的试卷也就罢了,毕竟要让中国的学政大人搞清楚法国的卢梭,实在是太难为他了。但要命的是他还要出错了考卷:“李按临苏属,一题为‘普王啡理特威廉第三恢复强理之由’。缴卷时,有请于李者曰:‘威廉第三,今德皇也,何以犹袭普王之旧号?’李大窘,不知所对。后检书,始知为威廉第一之讹。”

李伯元是小说家,以小说家的笔锋来记学政试事,不免过甚其辞。但李殿林不管旧学新学,与其前任相比,恐怕略低一筹。

李殿林在江苏三年,为紧跟朝廷“将书院改学堂”的改革步伐,曾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902年1月17日)上《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拟章程》奏折。在拟定的学堂课程中,出现了“邮政”、“各国刑律”、“国家与各国交涉”、“一切国际公法私法”、

① 民国《江苏省通志稿》之《人物志·名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船政铁路、机器制造”、“重学、化学、磁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水学”、“地质学、生物学”、“外国语言文学”等新课程。李殿林延请原南菁书院院长丁立钧留任，充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在李任内，南菁完成了由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转变过程。

李殿林任满回京后，曾充甲辰（1904）殿试读卷官。因李曾经做过醇亲王载沣的老师，当宣统三岁登基，载沣为摄政王时，李殿林也随之升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礼部撤销后，还任过典礼院掌院大学士。

当时，摄政王想除掉袁世凯，密拟上谕时，据说就是由他的师傅李殿林主稿。“上谕原为‘包藏祸心’云云，处分严厉可知也。”由于张之洞为袁缓颊，所以后来发出的上谕，将袁开缺回籍的理由改为“足疾加剧”。^①

宣统三年（1911）八月，举行举贡考职，李殿林出任首席阅卷大臣。正当李殿林凭借摄政王殷殷向用之时，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辛亥革命起，李殿林于明年（1912）致仕回籍，五年后去世。

唐景崇

唐景崇（？—1914），字希尧，号春卿，广西灌阳人。唐景崇兄弟三人，幼承庭训，均未出外就馆。唐景崇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擢侍读，再经四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派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明年，出任乙未科会试副总裁。阅卷时，曾鼎力相助另一位副总裁李文田，欲取中梁启超卷。终因总裁徐桐的反对而未成，使得李文田只能在梁启超的试卷末尾，批上两句唐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②

唐景崇历任兵部、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四年出任浙江学政，仅半年，便因母亲逝世而告归。二十九年（1903）以工部左侍郎派充浙江乡试正考官。试事结束，受命督学江苏。唐在江苏近三年，按试各郡，选拔人才。光绪三十年（1904）冬，考试淮安时，识拔山阳士子阮式，将其录取入学。阮时年十六。阮式是个才华横溢又富有思想的热血青年，他曾在《轩轾丛话》中提到康熙南巡苏杭之事：“（百姓）含辛茹苦，剥肤沥血，以媚兹一人，是因为奴隶者，牛马之天职也。”后来，阮式因响应辛亥革命而在家乡遭杀害，^③那么七年前唐学使能录取阮式入学，证明唐景崇绝非如徐

① 刘禹生：《世载堂杂记》，《袁世凯仓皇走天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8页。

②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页。

③ 白坚：《我爱清流阮嗣宗——阮式生平述略》，淮安市政协，《文史专辑》第十七辑。

桐之流那样的顽固不化者可比。所以当时人就称“唐春卿尚书景崇为卿贰多年，素负开通名”。^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停止科举考试，岁、科试自然也随之停止，学政的主要职责就只是对学堂事务的考核了。^②唐景崇顺应潮流，对废除科举制度后的学政事务，曾向朝廷提出十条积极的建议。^③

三十二年(1906)四月，清廷下旨，“所有各省学政，一律裁撤，均着回京供职。”而各省改设提学使一员，归督抚节制。^④唐景崇成了最后一任江苏学政。

唐回京后，调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由于唐“绩学端品”，科举废后，那些游学国外的毕业生，回国后授职时须经廷试，这主持校士阅卷的工作都常由唐景崇承担。^⑤

宣统二年(1910)春，升学部尚书。唐龟勉从事，每天早上七点至十一点，实地考察京师至少二个学堂。午饭后，十二点即赴部办事。辛劳如此，却无倦色。以致当时《大公报》都说“历观诸大老于职司之事实力整饬、不惮烦劳如唐尚书者，诚不数觐也”。^⑥

该年，清廷因筹备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各部大臣大多由满人担任，唐景崇仍任学部大臣。李殿林、于式枚向他祝贺，唐对政局有清醒的认识，回答道：“改君主专制为立宪，其效茫如捕景(影)，而贵族专制之祸已萌矣，两公尚致贺乎？”于式枚笑着说，你不也是贵族吗？还说这种话。李殿林也随声附和道，您不是台湾总统的胞弟吗？当然也是贵族了。^⑦原来，唐景崇的兄长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甲午战争后，唐景崧抗拒日军并吞台湾，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自任总统。所以，于、李二人会在此跟唐景崇大开玩笑。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出山，总理内阁，袁仍命唐景崇掌学部，唐称病告归。三年后，与世长辞。

唐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曾为《新唐书》作注，几乎花了他半

① 陈贻一：《睥向斋谈话》，《唐景崇对待门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三十一年八月甲辰、丙午上谕，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⑤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唐景崇传》。

④ 《光绪朝东华录》，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亥上谕，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⑥ 《唐尚书查视学堂》，《大公报》1910年4月28日。转引自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⑦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八，《于式枚》，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生的精力。^①罗振玉、江庸都提到此事。罗振玉称自己写成《新唐书世系表考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校议》一卷，未刊，宣统初，被唐借去，唐去世后，无人过问，以致书也没有归还罗。^②江庸则说：“唐春卿景崇师，费二十年精力，成《唐书注》若干卷，唯表尚缺，然已写有多条。春师歿后，其家人深藏稿本，又无力付刊，散失可虑。”^③不知该书稿尚存人世否？

张文虎

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又字啸山，江苏南汇县周浦人。“幼颖异，出就外傅，诵读倍常儿。见插架书，辄自翻阅，信笔评其是非，师禁止而心重焉。”^④年十七，为里中塾师。丙戌(1826)，补邑诸生。“既而读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阳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原本，驰骛枝叶无益也。则取九经汉唐宋人注疏若说经诸书，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语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所存，旁及诸子史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古今风会之变。”

张文虎不喜科举，仅在道光十二年(1832)，因“戚友强之行”，勉强参加了该年壬辰科乡试。试场中，不小心，浓浓的墨汁弄污了试卷，张文虎本无心应试，现在见墨污试卷，录取无望，便弃卷据案而起，提笔便在号舍墙壁上题诗一首，以明本志。不想，张文虎此时竟在他乡遇上了知音，一位名叫缪徵甲(字布庐)的江阴考生，恰与张同一号舍，对张文虎此举，先是惊诧不已，后又赞赏不置，也就走笔和诗一首。后来，这张、缪两首诗“为同舍生传钞殆遍”。^⑤张文虎晚年回忆缪与他交往的经过：

当壬辰秋，予应试金陵闱中，闻君与人谈诗，滔滔彻旦。俄予卷污，题诗号壁将出，君见而惊诧，走笔和之，为同号生传抄殆遍。八月望，君访予逆旅，步月淮青桥，议论风发泉涌。明日集秦淮水阁，诵近句，皆卓然有所见。^⑥

①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唐景崇传》。

② 罗振玉《雪堂类稿》附《永丰乡人行年录》，光绪十八年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③ 江庸：《趋庭随笔》，《未刊之唐书注》，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④ 闵萃祥：《州判銜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式古训斋文集(下)》，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海上刊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文苑传·缪徵甲》。

⑥ 张文虎：《存希阁诗序》，《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光绪五年己卯刻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两人一见如故，气味相投，结下了深厚友谊。十五年后，缪徵甲郁郁以终，其弟子搜辑缪诗集，寄给张文虎，请他作序。张满怀深情地写道：

呜呼！予与布庐以诗定交，十五年未尝再面也，然书辞通闻，岁率五六往复。每发函伸纸，如对一室，而今不可复得矣。……自十五年来，凡有书问，率以道谊学术相规勉，不暇言诗。

实际上，张、缪二人只是在南京结识几天，以后虽然每年有五六次的通信往来，而从未再见一面。然而二人心心相印，如同朝夕相处。张文虎在为缪之遗诗写好序后，就一直将缪之遗稿珍藏身边。三十多年后，张文虎被黄体芳邀来主讲南菁书院，虽然仅在江阴四月，却为其亡友奔走说项，终于将经自己删定之缪之遗诗一卷，刊印于世，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此时，已距与缪在白下订交长达五十多年，而缪长眠地下亦近四十年，张文虎也于一年多后逝世。张真可说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了。张、缪二人真是道义之交，学术之交，生死之交。古人之风，山高水长。

张文虎自道光十二年(1832)一应乡试未售后，即终生未入考场。因好友顾观光的推荐，为金山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先后馆钱氏三十年，校书数百种。张文虎路过扬州时，登门拜访阮元，阮对张为金山钱氏所辑之丛书赞赏有加，两人分别后“书函往复无间时”。张文虎“尝三诣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全书》，手自校录”，与同在文澜阁观书的绩溪胡培翠、元和陈奂“过从商榷甚欢”。其间，西游天目，南登会稽，尤爱天目之胜，因自号曰“天姥山樵”。张文虎不但精通校勘版本目录之学，天文历算的造诣也极精深，当时数学界仰之为泰山北斗的李善兰，将张文虎引为知己，两人纵谈算学，甚相契合。因李的介绍，“深明算理格致之学者”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伟烈亚力等，“闻先生名，数数造访，质疑问难，咸大折服，叹为彼国专家勿能及”。^①

咸丰三年(1853)起，东南大乱，张文虎辗转避难。同治癸亥(1863)，其独子病歿，抑郁不自聊，感伤至极，遂赴安庆湘军幕，曾国藩“属以内军械所事”。曾国荃在皖设书局，刊乡先辈王夫之《船山遗书》，张文虎与仪征刘毓崧受聘分任校讎。张后随书局迁江宁，手定书局章程，校刊经史各书。时与张文虎在书局者，有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等，谈文论艺，时相过从。戴望逝于

^① 闵萃祥：《州判銜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

金陵，张文虎等为之经理后事。事后，俞樾写信张文虎致谢：“仆与子高有中外之戚，又其学术素所倾倒，曾不能先为设法招归乡井，又不获执手一诀，凭棺一恸，九原有知，惭愧逝者。昨从苏寓又寄到惠书，知其身后诸事由公等料理妥协，笃于风义，今之古人，感作无已。”^①张在外十余年，自顾衰老，屡辞书局，而历任两江总督都很敬重他，屡次挽留，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始得回归故里。

张文虎在金陵书局时，与刘寿曾(字恭甫，刘毓崧之长子)亦是同事。朝夕往还，交谊极深。江都梅鹤孙的母亲刘师铄是刘寿曾的侄女，亲见张文虎作客刘家的情形，梅记母亲讲张的轶事：

他长身鹤立，红眼睛边，崖岸甚高，不轻许可。同时常在外家座上客，都有点怕他辞锋犀利，说他脾气大，称他为“张老虎”，有见他来即不敢多说话的。但他也极有风趣。他爱吃酒，量甚豪。有一次来与伯外祖饮酒，伯外祖母做的拆脍鲑头——此是一种扬镇风味，以极大鲑鱼头重数斤者，与茆葺之属同炖，火候到时，味极肥美——先生食而甘之，每次必问有此馐否，伯外祖亦常治而邀之，以为笑乐。

刘家座上客说张文虎脾气大，那是因为张的学问大，且又辞锋犀利。另外，张是主人刘寿曾的父执，比寿曾的父亲刘毓崧还大十岁，比寿曾则大三十岁，自有做“老虎”的资格。不过张文虎也有上当受骗、乞人相助的时候：

先生独居客馆，距刘氏朝天宫寓所不远。一日深夜，先生叩门，伯外祖询其何以仓卒如此。先生曰：“为人所给，求君相助。半月前曾托人买妾，已去看过，年貌尚可，当即立约付价。今夕送来，短身龇齿，竟另是一人。大为骇异，亟追媒氏，则已逃矣。此人在寓，如何处置？”伯外祖曰：“我与君皆非江宁人，自易受欺。君暂勿归。天明同访陈雨生(作霖)先生求策。”次日偕往，陈先生曰：“此极小事。其意不过求财耳。先生儒者，不宜与小人为缘，请少安。当遣一人为您解之。”先生感谢，卒如其言。回寓则其人已他去矣。越日，先生谓伯外祖曰：“微君之力不及此也。”相与大笑。^②

张文虎是儒者，受小人之骗，固是意料中事也。其弟子闵萃祥称其师：“先生体貌重厚，性端严，沉默寡言语，然接之极谦和。曾文正公谓为有儒者气象，尝诒以楹帖，有‘多闻寡欲’之语，实录也。”又说老师“于朋友倾城相款，有困乏者，倒囊周助

^① 俞樾：《与张啸山、唐端甫书》，《春在堂尺牍》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6册，第568—569页。

^② 梅鹤孙：《青谿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勿吝”，但友朋“苟有过，直言无隐，或疑其甚，则曰：‘此吾所以酬知己也。’”则“张老虎”之恶名亦从来有自矣。

张文虎归里后，正值苏州巡抚下檄各县续修方志，南汇县令“造门敦请”，张文虎“迫于桑梓之情，勉应之”。光绪初年，奉贤县令、华亭县令相继以修志事来聘，张自觉年老体衰，但又推辞不掉，只能勉力从事。张文虎修志，态度严肃，立场公正，针对当时参与修志的士绅，往往如嘉定钱大昕所讥讽的那样，徒借修志之名，“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的情况，提出了自己对有关史德问题的看法，这在他为重修的二十二卷的《南汇县志》所订的凡例中可以反映出来。其凡例中有一云：“凡载笔之事，必先不私于己，而后能不私于人。一有偏徇，反唇立至。”^①张文虎要求修志诸君子以此自律。

光绪九年(1883)七月，赴江阴就任南菁书院院长。弟子闵萃祥叙述此事：

癸未，今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夏四月，按临松江，躬延先生主讲席。时先生足痿，艰于行，再三辞，不获，秋七月赴江阴，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书请退，不复出。

张文虎在南菁讲学只有四个月。返里后一年有余，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逝世于松江城内钱氏复园。闵萃祥为其师撰写《行状》。数年后，由其另一弟子娄县张锡恭将《行状》携之南菁书院，请后任院长缪荃孙撰写《墓志铭》。缪荃孙在文末说：

……荃孙幼罹兵燹，避地楚蜀，未曾捧手受教。后先生四年，来主南菁讲席。华亭张锡恭出此状来求铭，爰作铭曰：

东南诸老，首推潜研。先生继之，名满垓埏。六书九数，如日中天。合朔周初，协律官县。徽言克绍，绝学能专。少绝仕进，青紫无缘。晚为宾客，愁直自全。校讎最工，几席丹铅。更生、子固，辉映后先。明湖之漭，冶城之巅。大名不灭，遗事独传。龙蛇岁厄，牛斗星悬。只鸡斗酒，谁过新阡。^②

哲人已逝，手泽犹存。据闵萃祥当时所列张文虎著作，有以下数种：

《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礼记》五卷，《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余笔》三卷，《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陞稿》一卷，《诗存》七卷，《索笑词》二卷。其未刊而藏稿于家者曰《鼠壤余蔬》一卷，《诗续存》一卷，《尺牘偶存》一

① 《南汇县志》，光绪五年刊本。

② 缪荃孙：《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卷,《湖楼校书记》、《杂记》、《续记》、《莲龕寻梦》、《记梦》、《因录》各一卷。其曰《怀旧杂录》者,具稿而未经编定者也。

张文虎最后撰写的著作是《怀旧杂记》,未成定稿。老师去世后,闵在《稿》后撰写一跋:

归自江阴之明年甲申,先生著《怀旧杂记》,未毕,痿臂日益甚。初冬骤寒,手握笔,顛不止,散稿满几案,不复检拾。萃祥每趋侍,为稍稍整齐之。一日,先生顾而叹曰:“是稿也,余未能竟,将就所有以付之。”萃祥谓天方寒沍,高年气血衰,手足不良,亦常耳,入春当渐舒展,无过虑。未几,先生病中愈。明年正月复作,遂不起。^①

缪荃孙在《墓志铭》中,总结张的一生:“先生丰于学而啬于境,少时迭遭大故,家屡空,殆人所难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归来,又恒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废学,手一卷外,无他嗜好,老而弥笃。”^②张文虎治学之勤,对照闵萃祥《怀旧杂记·跋》,无一字不可得到印证。

闵称其师还撰有《古今乐律考》、《周初岁朔考》二部有关音乐理论、天文历算方面的专门著作,只是“二书经寇乱散佚,未及整比”。“盖先生之学博大宏达,既以经学、小学、历算、乐律立其本,泛滥以及其他,莫不洞悉源流,烛见幽隐,实事求是,由博以返约,勿肯苟于著述,亦勿囿于门户,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

张文虎馆金山钱氏三十年,所辑校书《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艺海珠尘》、《壬癸集》、《小万卷楼丛书》,无虑数百种,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

张文虎承乾嘉余风流韵,重汉学而薄宋学。他在《南菁书院崇祀汉高密郑氏宋新安朱子栗主记》曾说:“夫高密博极群书无论矣,新安于百家杂说,无不究其指归,晚年定《仪礼经传通解》,一以高密为主,然则其学已汇于同,而訛訛者犹强辨之,多见其不自量矣。”认为朱熹晚年治学,已向郑玄靠拢,于此可见,张之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治学倾向,十分明显。

张文虎的文学成就也不可小觑。早在咸丰二年(壬子),即张入安庆曾幕之前一年,长洲江湜赠诗曰:“胸次九流苦太明,诗为学掩转无名。若言科目能收士,请

^① 闵萃祥:《怀旧杂记跋》,《式古训斋文集》上。

^② 案:此实是闵撰《行状》中文字,为缪撰《墓志》所采用。

看斯人作老生。”^①称他“诗为学掩”，末两句更是对张的学丰境啬而愤慨不平，同时也寄予了自己的一腔心酸。张文虎爱读《儒林外史》，并曾为之详加评点，也是藉此释胸中块垒而已。总的说来，张文虎是学者，看重的是经史本原之学，并不着意诗文创作。“时南汇丁时水工词章，颇负才名，先生斥为无本之学。”^②

张文虎曾有诗句：“功名莫恨儒冠误，只恐功名更误人。”然而真能像张文虎那样看透这“功名”二字者，世上能有几人？

附：闵萃祥《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

先生姓张氏，讳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南汇之周浦人。幼颖异，出就外傅，诵读倍常儿，见插架书，辄自翻阅，信笔评其是非，师禁止而心重焉，因以语先生父绍庭公。公家故贫，从先生所好，遂勉令读书。

道光癸未，年十六，丁祖母暨绍庭公忧，力营丧葬，皆如礼。然困甚，屡无以奉母。明年为里中王氏童子师，稍获脩脯以供甘旨。先生雅不喜帖括，颇肆力于诗古文辞。又以家业维艰，不欲应童子试，业师惺斋姚先生炜琥力持之。丙戌，补邑诸生。丁亥，丁母忧，力益窘，客授南唐张氏。

既而读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阳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原本，驰骛枝叶无益也。则取九经汉唐宋人注疏若说经诸书，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语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所存，旁及诸子史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古今风会之变，益无志于科举。壬辰，大比，戚友强之行。试卷墨污，题诗号舍而出，自是不复应试。

金山钱雪枝通守熙祚辑《守山阁丛书》，以属顾尚之先生观光。顾先生治医术，不能专力，举先生自代。先后馆钱氏三十年，所校书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及鼎卿学博熙辅续辑《艺海珠尘》、《壬癸集》，梦华少尹培名辑《小万卷楼丛书》，无虑数百种，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

尝三诣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全书》，手自校录。绩溪胡竹村培翬、元和陈硕甫奂两先生亦以窥中秘书同寓西湖。胡先生方为《仪礼正义》，陈先生纂《诗毛传疏》，过从商榷甚欢。中间西游天目，南登会稽，尤爱天目之胜，因自号曰天姥山樵。

先生客于外，有二弟，又皆就贾，子如也。乙未，年二十八，始就婚于金山姚氏。

① 江湜：《赠张啸山文虎》，《伏散堂诗录》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② 沈其光：《鲟粟斋诗话》四编上卷。以下引文出处同。

越四年，举一子，曰锡卣。姚孺人有贤能称，以是无内顾之忧。

癸卯，偕钱通守游京师，通守卒于邸，先生为经济其丧，载其柩南还。道过维扬，以通守所辑书质正于阮文达公，公由是深契，书函往复无间时。通守辑《指海》未竟，其嗣伟甫培杰、子馨培荪两司马请先生毕其事，先生力任不辞。

海宁李壬叔先生善兰与先生谈算契合。咸丰初，李先生从英吉利士人艾约瑟、伟烈亚力新译重学及几何原本后九卷，委韩绿卿中书应陞任刊几何，鼎卿学博刊重学，皆先生为之参订。而艾约瑟辈并深明算理格致之学者，闻先生名，数数造访，质疑问难，咸大折服，叹为彼国专家勿能及。

丙辰，移家张泾堰，盖赘于姚二十有二年，至是始有家也。粤匪之乱，避难回里，又转徙于奉贤、上海间。同治癸亥，锡卣病歿，抑郁不自聊，乃就曾文正公聘。

初郡守湘潭袁公芳瑛淹雅好古，折节交先生，屡欲延致之，而先生以钱氏丛书之役，不能应。后袁公数称先生于曾文正公，文正公心仪之。安庆克复，长江轮船通行，遂具书介李壬叔先生来招，属以内军械所事。而今制军威毅伯曾公方刊其乡先辈王船山先生书，庀局皖垣，即延先生及仪征刘伯山先生毓崧分任校雠。甲子，大军克江宁，文正公移节之任，先生与偕，以书局自随。乙丑，船山遗书刊竣，仍留幕府，喟然叹曩所校钱氏诸书俱毁于寇，而几何、重学二书尤切于当世之用，请于文正公，重钁以行。

是年秋，今傅相肃毅伯李公继督两江，议开书局刻经史各书，乌程周缙云侍御学濬总其事，仍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条例，以呈李公，公亟称善。所刻如《四书》、《十一经》、《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文选》、王氏《读书杂志》、渔洋山人《古诗选》，皆先生手校，而于《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一书考索尤深。

己巳，晋抚开县李公宗羲以书招先生，书达制军马端敏公，公欲留先生书局，径为书谢之，而后以告。庚午，文正公再回任。逾年公薨，先生感知己凋谢，自顾衰老，屡辞书局，而历任制军若香山何公璟、合肥张公及开县李公皆慰留甚坚。今傅相李公总督直隶，闻先生欲辞席，特寄言留行，而制军李公诒书言己学问固远不及旧李，而钦佩之心未敢稍异，如不以为不可共事，务请勉留。

癸酉冬，先生归志益切，以老固请，始得旋里。而川督盱眙吴公棠新建尊经书院及设书局于成都，以学使今粤督南皮张公之洞言介制军李公来聘，先生为书恳辞，方将谢绝一切，颐养精神。又值苏抚固始吴公元炳檄下各县修辑志乘，邑令秀水金公福曾造门敦请，迫于桑梓之谊，勉应之。光绪初奉贤令萧山韩公佩金、华亭

令襄阳杨公开弟亦相继以志事来聘，及门钱子馨司马议辑先世书目，留先生于郡城复园。丙子秋，子馨歿，遗孤尚幼，为处分其丧事，而适闻姚孺人之讣，悲伤不能已，自是神气稍衰矣。丁丑，子馨家属迁回金山，以复园邀先生居，遂迁家焉。

癸未，今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夏四月，按临松江，躬延先生主讲席。时先生足痿，艰于行，再三辞，不获。秋七月，赴江阴，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书请退，不复出。甲申长至，痰火骤作，类中风，医治少瘳。乙酉正月复作，卒于复园。

先生于书无所不览，过目辄记，尤长于比刊，遇疑义，必反复穷究，广征旁引，以汇于通，往往发前人所未发，都确不可易，具详所著各书。今其已刊者，曰《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馀笔》三卷，《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陞稿》一卷，《诗存》七卷，《索笑词》二卷。其未刊而藏稿于家者，曰《鼠壤馀蔬》一卷，《诗续存》一卷，《尺牍偶存》一卷，《湖楼校书记》、《杂记》、《续记》、《莲龕寻梦》、《记梦因录》各一卷。其曰《怀旧杂录》者，具稿而未经编定者也。

又尝以汉魏以来古乐失传而古书之存于今者，只滋后人聚讼。近世若王氏坦、凌氏廷堪、戴氏煦多所发明，然犹不能有所牵合。乃因端以考其器数，审其声气，以究古今之变异，作《古今乐律考》一书。顾尚之先生作《殷历考》，所以申郑氏一家之言，先生证之经传，谓郑氏误执纬书及大传之文，致召诂注破经从历，而刘歆又损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经文，为作《周初岁朔考》以疏通之。二书经寇乱散佚，未及整比。

复以世人论古文，辄曰唐宋八家，不知唐之与宋原委既殊，门户各别，岂可概论，乃选录元道州以下十八家之文，为唐十八家文录若干卷，以破唐宋八家之说之固陋。盖先生之学博大宏达，既以经学、小学、历算、乐律立其本，泛滥以及其他，莫不洞悉源流，烛见幽隐，实事求是，由博以返约，勿肯苟于著述，亦勿囿于门户。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

然先生丰于学而啬于境，少时迭遭大故，家屡空，殆人所难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归来，又恒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废学，盘根错节，厉志愈专，手一卷外，无他嗜好，老而弥笃。此虽先生天性好学，而百折不回，亦由养之者深也。先生体貌重厚，性端严，沉默寡言语，然接之极谦和。曾文正公谓为有儒者气象，尝诒以楹帖，有“多闻寡欲”之语，实录也。

江宁归后，痛季弟文龙先卒，乃招其仲弟同居，白头兄弟，一室怡然。于朋友倾城相款，有困乏者，倒囊周助勿吝，苟有过，直言无隐，或疑其甚，则曰“此吾所以酬知己也”。后进以文字质者，必指其途径，期之甚厚，其敦笃类如此。

尤喜阐扬潜隐，见有纂述可传，无论识与不识，必竭蹶以谋之。妇翁姚坚香先生前椽与其兄古然先生前枢，以诗词名；而江阴繆少薇先生征甲者，诗友也，没后，后人无力传其稿，先生并为刊之。顾尚之先生为先生石交，著作等身，莫能任剗，先生为谋于上海令独山莫公祥芝，俾为刊布。顾先生算学独绝今古，而名未及远，及书出，而顾先生之学遂大显于天下。娄朱虞卿先生大韶邃于经术，亦有遗书藏于家。会浏阳李勉林观察兴锐属先生刊有用书，先生选录其经义若干篇付梓人，于是承学之士乃知吾郡经师有朱先生者，今学使黄公且以二先生书上之史馆，将列传儒林，亦藉先生表彰之力也。又顾先生尝为钱氏校刊《素问》、《灵枢》，复为作校勘记二卷，板亦遭毁。是书自道藏本及明以来所刊，率替乱莫可究诘，顾先生覃精研思，续正其舛讹者数百条，先生叹为精善。归自江阴，取顾先生校本覆按之，又补正百余条，思为刊传，而卷帙繁重，未能举。当病作时，犹手是书不置，此则先生未竟之志也。

曩从文正公军营，于江宁克复，得保举以训导选用。光绪初，援例加州判衔。生于嘉庆戊辰五月二十九日，卒于光绪乙酉正月二十日，年七十有八。自姚孺人没，纳妾倪，无出，二弟皆不娶。锡卣遗腹有一女，赘同邑附贡生王保如，生外曾孙孝曾，归为先生后，孝曾前殤，于是保如承先生意，复以慰曾来归。二月二十七日，先生弟文豹扶先生柩归葬于南汇常人乡十七保二区十团天字圩甲山庚向先生自营之生圻。保如谓先生一生劬学，宜有碑表谏传垂信于后，以萃祥习知先生行迹，属为状，将以求作者。

萃祥自甲戌春拜见于复园客次，先生不以为不可教，时诱掖之，迨迁居复园，朝夕走谒奉教尤数，或旬日未至，辄手束来呼，故于迹为最亲。呜呼！先生已矣，萃祥质性驽下，于先生学行曾不能仰窥万一，乌足以发先生之蕴，仅就平日所熟闻于先生者，竭其芜浅，粗记梗概，冀备大人先生采择焉。门人闵萃祥谨状。

黄以周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傲季，浙江定海人，出生于经学世家。黄以周四岁时，其母即逝，晚年在南菁书院时，写信与友人，还痛悼不已：“以周四岁失持，

蠢愚无识，至今追念先容，无从髣髴。自望或见诸梦寐，而梦寐之来告时，见先君，不见先母。或幸而得一见，未承色笑，先加号咷，慟而觉，觉而音容警效仍惘然也。”^①

其父黄式三，人称傲居先生。黄以周为其第三子，故号傲季也。黄式三“于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又长《三礼》”，^②敦行力学，著作等身。他曾经在《求是室记》中说：“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以求其是。”^③黄以周侍奉其父三十年，从没有一刻离开过。黄式三晚年已成半身不遂之“偏枯疾”，写不成字。某日，想把“黄氏塾课”记下来，结果写出来的字“蜿蜒难读”，只能躺在病床上口授，由黄以周含泪记录。父亲死后，黄以周将“蜿蜒难读”的绝命一纸，永远珍藏，“示我子孙，知吾父拳拳是书，所以佑启后人者，深且远也。”^④

黄以周六岁入塾读书，先识《说文》，后读经书。他读经的次序，跟当时大多数经生先诵《诗》、《书》稍有不同，而是先《礼》、次《诗》、《书》，再《春秋》、《易》。他读书十分认真，又肯钻研，每读完一个课程，便“条分节目，疏通大义”，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九岁，补定海厅学诸生。但以后便久困场屋，屡应乡试不中，这也与他不好制艺有关。黄以周恪守父训，以传经明道为宗旨。“十数岁即锐意著述，露钞雪纂，手不释卷，年三十余，著书已哀然成巨帙。”^⑤黄以周读书，有时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居然以治经为解忧之良法。他居镇海时，与堂兄黄以恭通信，称：“方省城告急也，弟闭户不知措，闻惊报，心如结，自谓苦思经义中之疑难者，俾心专于是，或可以解忧。因考三代田亩步尺之异同，日夜研索，约十日，忽得一解，沟洫乃通，而省城亦于是时收复矣。此如鱼游釜中，然于忧苦中强作快活读书也。”^⑥

同治六年(1867)，四十岁，时浙江巡抚马新贻、学政吴存义奏开浙江书局于杭州，黄以周供职书局，参与校勘典籍。自此，在浙江书局校长长达十多年。

① 黄以周：《与罗仲宣书》，《傲季杂著》五，《文钞》三，《黄以周全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8—579页。

② 《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传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296页。

③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下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 缪荃孙：《中书街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

⑤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

⑥ 黄以周：《答七兄竹亭书》，《傲季杂著》五，《文钞》卷三，《黄以周全集》第十册，第561—562页。

同治九年(1870),举优贡,旋中本科乡试,时黄以周已四十三岁了,与他同中举人者有义乌朱一新、绍兴李慈铭、余姚黄炳垕等。明年会试,不售,选誊录,期满,当得知县,黄以周不就。

光绪五年(1879),知府宗源瀚建宁波辨志精舍,请黄以周为定规制,分六斋课士,黄自课汉学。黄以周精熟经书,于古代名物制度研究尤深,性解营造,他亲自画图设计,准备将宁波辨志精舍造成能“效邹鲁习礼”的样式。临动工时,知府宗源瀚前来行视,看了好久,也不出声,最后,指着自己身上的官服,对黄以周说道:“恐怕穿戴着本朝的衣冠,不能施行古代的周礼吧?”黄以周只得将此复古壮举作罢。^①

光绪六年(1880),又应会试,仍下第,至此,无复仕进意。大挑,以教职用,先后署遂昌、海盐、於潜训导,选补分水训导。

光绪十年(1884)春,应江苏学政黄体芳之邀,黄以周离开供职十多年的浙江书局,赴江阴就任南菁书院院长,时年五十七岁。自此,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度过了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十五年,主讲经学。治学讲求“实事求是”,遇有两难,绝不含糊调和。吴稚晖回忆他初进书院时的情景:

入学时,进谒山长黄以周,见其墙上有自书座右铭一纸,其辞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实事求是”为河间献王传中语,凡读书者,均能记忆。但“莫作调人”之句,为黄山长自创,最为精警之语,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说过。由是衷心感动,终身奉为主臬。^②

吴稚晖实际上只记了黄以周自书座右铭的一半,据另一弟子通州王兆芳所记:“子书于座右曰:‘多闻阙疑,不敢强解。实事求是,莫作调人。’”^③大概“莫作调人”四个字给吴稚晖的影响太深了,故前面八个字反而淡忘了。

黄以周在南菁讲学,推崇汉学,但也不菲薄宋学。赵椿年说:“元同师之为教,经学则汉宋不分,理学则朱陆不分,为求其是而已。”^④南菁书院尊祀郑玄、朱子,黄以周治理学当然亦以朱子为指归,但也并不一味排斥陆王心学。赵椿年回忆,其

① 章炳麟:《黄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影印《章氏丛书》本。

② 陈洪、陈凌海:《吴稚晖先生大传》。

③ 王兆芳:《徵季子粹语》卷一,《读书第三》,《黄以周全集》第九册,第602页。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师针对学生有“将象山一概推倒”的倾向，不以为然，教导学生说：“不知象山之学，亦有是处，如‘决去世俗之见’一语极是。”至于后来的陆王学者之所以不重读书而流于空疏，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象山前段亦有读书功夫”，“后人天资既不如象山，而又以不读书学象山，则终不如象山。”

唐文治回忆，初进书院时，黄以周听说唐文治治宋儒之学，很高兴，对唐说道：“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之教，先博后约，子其勉之。”唐文治还称黄以周“复教余训诂、义理合一之旨，先假余陈北溪先生《字义》”，“自是，于经学、小学亦粗得门径矣”。^①

黄以周还常教育学生，为学贵在“静”、“专”二字，唐文治说：

先生一本孔孟之教以为教，尝取《易》“静”、“专”二字以训南菁诸生，曰：“学问必有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人有终日读书而掩卷辄忘者，病在不静；有终身读书而白首不名一艺者，病在不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②

赵椿年回忆老师也这样对他说过：“今人惟不能决去世俗之见，是以为学不能静、专。”黄以周昔日教育学生要注重“静”、“专”的学习方法，对那些刻苦攻读而学无所成的人来说，确是一剂切中弊病的良方，且至今仍未失效。

黄以周辅导学生，既认真又严格，甚至晚上，有时也命学生向他汇报平时所学心得，自己再加指点，这叫“进讲”，赵椿年乙酉日记记之甚详（见《覃研斋师友小记》）。

平时，学生都必须记日记，定时上交老师批阅。吴稚晖在壬辰（1892）会试落榜后南返，五月初二日回南菁书院，即补书日记，至二十四日“下午，黄院长亲征日记，补书五月日记讫”。^③

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刻《礼书通故》、《傲季杂著》时，校对者几乎都是南菁书院的学生，如吴稚晖就在其日记中记道：“校黄先生《礼书通故·田赋》二十五页。”^④现翻看《礼书通故》刊本，卷三十六《田赋通故》的校勘者确是吴稚晖，吴另外还校了卷十九《改正颁朔礼通故》。该两卷末都署校者姓名“受业阳湖吴眺”。

①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光绪十一年。

②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壬辰日记》，第67页。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壬辰丛钞》，十月初三日，第93页。

黄以周这样做，一方面是培养学生各负其责的品格，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工作的鼓励。

光绪十四年(1888)，以浙江学政瞿鸿禨保荐，赐内阁中书衔。十七年(1891)，浙江学政潘衍桐奏教官学行卓著，请旨奖叙，黄以周在任以教授选用。后选用处州府教授，时黄以周已在南菁讲学多年，且年老多病，未赴任。

黄以周主讲南菁十五年(1884—1898)，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影响极为深远。期间，黄以周曾于光绪十二年秋，权浙江遂昌县训导，三月即归。黄以周夫人梅氏未曾到过江阴，一直由妾陈氏照料黄以周在南菁的起居。甲午(1894)六月，陈氏病故，黄以周请弟子陈庆年为作传。数月后，黄以周又娶一妾，为照顾其生活也，事见第六章第二节之“遗闻轶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仲夏，黄以周因年老，且不喜新学，便告别南菁，归隐于杭州半山之下。二十五年(1899)初冬告别人世。其好友谭献闻听噩耗，极为感伤地说：“酸心事相接而至，愿游九地，与老友同弃恶世，携手无何有之乡。”^①

黄以周歿后数年，其南菁弟子崔朝庆、顾鸿闾便呈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端方，请将黄以周编入《国史·儒林传》。端方即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上奏《学官宣付史馆立传折》：

奏为已故学官学行可风、恳恩编入国史儒林传、以励儒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江南高等学堂算学教习、国子监算学助教崔朝庆，句容县教谕顾鸿闾等呈称，故处州府教授、内阁中书衔黄以周，浙江定海厅人，同治庚午科举人，主讲南菁书院有年，产从百越，泽及三吴。孝悌根于性成，言行衷诸礼训。教人无倦，授学不限方隅；抱道自居，传经有功黉序。从游日众，向学弥坚。光绪十四年，浙江学臣瞿鸿禨，称其“素履诚朴，粹然儒者”，奏请奖励，蒙赏内阁中书衔。十六年，浙江学臣潘衍桐复称其“研精覃思，物疏道亲”，奏蒙特恩，升用教授。其所著《礼说略》、《经说略》二书，已经前江苏学臣王先谦刻入《经解续编》，此外尚著有《礼书通故》、《军礼司马法考证》、《经训比义》、《子思子辑解》等书，皆能提要钩元，津逮后学。

查该教授之父黄式三，已入国史儒林列传。今该教授学行久达宸聪，绍述

^①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克承家学。英才乐育，著作等身。念潜德之宜彰，惧遗书之就失，谨呈故教授所著《礼书通故》一百卷、《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经训比义》三卷、《子思子辑解》七卷、《傲季杂著》五种，并开具事实清册，恳请具奏前来。

臣查已故教授黄以周家承通德，学有本原。能读父书，补乾嘉诸儒所未逮；克称师表，育东南多士以成材。阅其遗书，有关正学；考其素履，无间群言。列之儒林，洵无愧色。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故教授黄以周编入国史儒林传，以存旧学，而励潜修，出自逾格鸿施，除将该教授遗书并事实清册咨送国史馆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①

现《清史稿》有黄式三、黄以周传。

黄以周治学，汉宋兼采，绝无门户之见。当其弟子吴县曹元弼说治学要以家法为主时，黄以周则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②这里，前一“经”字，指学者所治之经；而后一“经”字，则是指孔圣之经。不管汉学、宋学，其源头在孔圣之学。他说：

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瞽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兹奉郑君、朱子二主为主臬，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以求合于圣经贤传，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③

学者治学，当于汉学、宋学取长补短，以求合于孔圣之经、孔门贤弟子之传，这才是实事求是之学。

黄以周治三礼，最重郑注，但他之所以推崇郑注，除郑注深明训诂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郑注中蕴含义理，所谓“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这是他儒鲜有提及之处。他说：

前人咸谓郑注经，详训诂，略理义。予谓郑之理义多函于训诂中，“引而不发，跃如也，能者从之。”其郑注之谓乎？^④

他还将汉儒与宋儒的治学作一比较：

① 《端忠敏公奏稿》卷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84—486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礼经大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9页。

③ 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义》，《傲季杂著》五，《文钞》六。

④ 黄以周：《礼说》，卷五，《先生夫子》篇末之议论。

汉儒注书，循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异同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此“引而不发”之道也。至宋儒，反复推究，语不嫌详，已有异于汉注。今人著书，必胪列旧说，力为驳难，心中所有之意尽写纸上，并有异于宋人。而好学深思之士，阅宋后书而惟恐卧，日夜读汉注而不知倦者，何也？譬如花盛放而姿色竭，一览无余。萼半萼而生气饶，耐人静玩而有味也。^①

可见，黄以周虽汉、宋学兼采，但究竟尤重汉学，重郑注。黄以周称赞郑注精密，如《礼说·先生夫子》篇：

《礼经》之“先生”，郑注以为卿大夫致仕者，僭最尊。后又通为“长老”之僭。而《曲礼》一篇，“先生”与“长者”犹分别言之。郑注云：“先生，老人教学者。”明其与不教学之长者固有异也。……郑注甚精密，读者习闻“师称夫子”之说而不加察，反议郑注之迂曲，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②

但郑注如有错，则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仅在《礼说》（《傲季杂著》之一）一书，驳郑之处也屡见。在卷二《干祫及其高祖》篇中，驳郑注：

郑注以“大事，为寇戎事”固非经意，谓“干祫空庙”又似可通。然诸侯祫及毁主，詎非无庙之主？何独以干祫属诸大夫、士邪？且坛墠可禘不可祫，禘为有事求福之祭，其礼秩与祫迥别。或训干为“求”，而以《祭法》“禘坛墠”实之，詎有合于典制？

曩作《肆献裸馈食礼通故》，于此沿用郑注，书已槩，不及改，故作此以补之。在卷五《棺椁抗木重数》篇中，驳郑注：

郑君以《礼器》“诸侯三重”为抗数，若以天子四重差之，棺亦三重，合之为六重，与“诸侯五重”之文不合，故分公、侯二等，以圆其说，此则郑之疏也。……郑谓大夫一重，士不重，以一重为有两棺，则《檀弓》天子棺四重而有五棺，岂《礼器》天子五重亦可谓之有六抗乎？此尤郑之失也。（皇侃说布席三重，有四席，又沿此注而误。）《礼书通故》从郑注，重思之，有未安，故复作此以正之。

在卷五《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服》篇中，驳郑注，又驳程瑶田：

郑注误会《经》意，因而驳《传》，且谓《经》嫌妾服女君之党，不自服其父母，将何以解为子之义乎？如程说，妾子有体尊之事，岂妾亦有体君之事乎？妾子

① 黄以周：《示诸生书》，《傲季杂著》五，《文钞》四。

② 黄以周：《礼说》卷五《先生夫子》，《傲季杂著》之一。以下引文均出自《傲季杂著》一，《礼说》。

有体尊，不得遂其母及外祖父母之时，岂妾亦有体君，不得遂其父母及子之时乎？郑以女君为比例，于义窒。程以妾子为比例，于义亦违。

在卷六《丧大记》篇中，驳刘向，尤驳郑注：

《小戴礼》之第十五曰《丧服小记》，第二十二曰《丧大记》，皆为《礼经·丧服·记》而作。《丧大记》宜题曰《丧服大记》。其第十六曰《大传》，又与《丧服小记》相发明，故小戴列其后。《礼经·丧服》之《记》亦有《传》，此《传》之所以次《记》也，亦宜题曰《丧服大传》。自汉初题篇省“丧服”字，刘子政《别录》遂隶《大传》属《通论》，失小戴意。郑康成又以第十六之《大传》与第十七之《少仪》相比，破少为小，以与《大传》相对，更失戴意。……郑《礼记》注文多舛讹，而《丧大记》尤甚。

黄以周驳郑注，与当时汉学界治学风气形成极大的反差。苏州学古堂学长汪之昌对《春秋》“齐侯来献戎捷”句，认为应作“齐侯来，献戎捷”读，称：“前夜梦说读经书，援引精博，甚慰夙心。醒后，仅记‘齐侯来献戎捷’一条，宜作两句读，力指三传之诬。晴窗昼长，梦痕回忆，衍成此篇，见者得毋晒其呓语耶？”胡玉缙在后加一案语：“此篇以‘齐侯来’为一事，‘献戎捷’为一事，创解亦确解。而舍三《传》以言《春秋》，汉学家所不许，遂托之梦耳。”^①相比之下，黄以周之不受汉学所囿，只讲“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尤显可贵。

黄以周强调“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莫作调人”之“调人”，实际上是有所指的。黄以周认为，汉学自汉学，宋学自宋学，两者“自有大相径庭者”，非得要调和汉、宋，甚无谓也。问学于黄以周的章炳麟，曾讥讽陈澧“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盖，以为比类。此犹摘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刳色理同者”，^②这恐怕也有受其师影响的因素在内，黄以周本不以调和汉宋为然。

黄以周著作等身，其中，《礼书通故》最为著名。该书“草创于庚申（1860），告成于戊寅（1878）”，以后又时加修订，刻成于癸巳（1893），“毕生精力萃于是矣。”^③

该书未出之前，有乾隆年间学者金匱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行世，被称为“礼学中集诸家之大成者”。后来曾国藩对它揄扬备至，曾对俞樾说：“此书体大物博，历

① 汪之昌：《齐侯来献戎解》，《青学斋集》卷九。

② 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③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以下引文出处同。

代典章具在于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但俞樾不完全赞成老师的说法，在“诚然”客气一下之后，马上批评道：“惟秦氏之书，案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藪，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然而，俞樾对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却推崇备至，他为黄书作序，称“为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经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纵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在略举数事后，接着说：“虽小小者，然其精审可知矣。至其宏纲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

梁启超论及清代学术时，对《礼书通故》评介也很高：“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晚清则有黄以周《礼书通故》最博瞻精深，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①

《做季杂著》是《礼书通故》刻竣后，于甲午（1894）结集刊刻。该丛书共五种：一是《礼说》，二是《群经说》，三是《史说略》，四是《子叙》，五是《文钞》。其中《礼说》和《群经说》均为说经之作，尤其是《礼说》，是黄以周晚年有关礼学方面的精心结撰之作，几乎每篇都精义纷呈，为后来学者称道不置。如在《秬鬯郁鬯》篇中，黄以周力斥《诗经》毛传之非：毛传“鬯，香草”，以后，郑众、马融、许慎诸说“并沿毛传之误，不可信也”。其实，鬯是酒名，郁才是香草，所谓郁金香也。“天子享神用秬鬯，裸尸用郁鬯”，秬鬯、郁鬯是二物（两种不同的酒，后者有香气逸出）。黄以周此说发前人之覆，确凿不可移。又如《周礼仪礼非古名》一篇，黄以周认为《周礼》“古名《周官》，自西汉之末，《周官》列为经而属之于礼，于是有《周礼》之名。十七篇之礼，古只称《礼》：对记言，曰《礼经》；合记言，曰《礼记》。自西晋之初，《礼记》之名为小戴四十九篇所夺，于是有《仪礼》之名。”考定《周官》之名始于西汉之末，《仪礼》之名起于西晋，此说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和称赞。《礼说》专释名物制度，与《礼书通故》相发明，但《礼说》成书较《礼书通故》晚了约十五六年，见解也更为成熟，故对前书《礼书通故》常有所补充修正。后来学者如要了解黄以周的礼学研究，《礼书通故》固然必读，但《礼说》也必不可少。

黄以周治《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经学著作，功力也极深厚，只是大都“未有成书，而有读书小记”，《群经说》就是这些“读书小记”的结集。如同《礼说》，《群经说》中的每一篇也都精义纷呈。如《群经说·离经辨志说》一篇，对于《礼记·学记》中“一年视离经辨志”的“辨志”一词，郑玄以后的众家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2页。

注疏大都解释为“辨别学生的志向”(如唐孔颖达的疏,直至今天王文锦先生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礼记译解》)。黄以周则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志与识通,辨志者,辨其章旨而标识之也”,辨志,就是理解了经文内容后而对经文进行分章(分段落)。所谓“离经辨志”,就相当于今天我们阅读古文时,先要“点断文句,分清章节”而已。黄以周认为,郑玄对“辨志”一词注为“别其志意之趣乡”本不误,“其志意,为《经》之志意也”,而非学生的志意(志向),误在后来的注疏家曲解了郑意,黄以周驳斥道:“孔疏‘志’属学者,‘辨’属考校者,于上‘视’字既触,于下文法亦违。郑意当不尔也。”确实,离经既是学生在离,辨志亦应是学生在辨,哪有“志属学者,辨属考校者”的道理?

《子思子辑解》是黄以周晚年最后写定的一本书,刊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5),时黄以周已六十八岁了。儒学博大精深,黄以周认为,孟子虽是孔子传人,但两人相隔很多年,孟子并未亲炙孔子,孔、孟之间有曾子、子思。在儒学的传承关系上,曾子、子思两人尤其是子思,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子思流传下来的篇目很少,除了《中庸》等少数篇目可确认为子思之作外,其他片言只语散见于各种古籍中。于是黄以周发愿,要将所有已考定为子思所作的辑成一书,并加以注解。但黄晚年体弱多病,时发寒热,已觉时不我待,不禁感叹道:“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①有志者事竟成,在南菁诸生的协助下,《子思子辑解》七卷终于成书,黄以周心情大好,“而疾瘥”,于是,更号曰“哉生”。

黄以周还著有《军礼司马法考征》、《经训比义》、《十翼后录》、《周易古训订》、《尚书讲义》等经学著作。

黄以周是经学大师,而史学也很有功力。在浙江书局时,殚竭书局八九人之心力,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而黄以周出力最多。

历来学者对黄以周的经学成就评介甚高。早在同治七年(1868),黄以周还未中举,李慈铭就极为推崇黄以周,他历数“近日浙中学者”钟文烝、汪日楨、俞樾、黄以周、谭献,“皆综研经籍,多所论著。而黄君承其父薇香先生式三之学,潜心说经,实事求是,视俞、谭诸君为优”。^②因李慈铭与黄以周都曾在浙江书局校书,所以李对黄以周的经学功底了解甚深,认为俞樾、谭献都比不上他。

① 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李慈铭:《再答平景菽书》(戊辰十二月),《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8—1319页。

而谭献确也由衷的佩服黄以周，他曾在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的日记中说：“黄元同来谈六书转注假借，殊有真见。”又在光绪廿一年九月朔日的日记中说：“丁秉衡札至，送阅元同新刻文集，征实之篇为多。元同不负当代经师之目，予终愧泛滥无所成就，让老友于专门”。^①

同时问学于谭献和黄以周的章炳麟，则称黄先生“其说《经》，陈事象物，闳肃超出钱大昕、阮元诸儒上远甚”。又将其本师俞樾与黄先生做一比较：“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重经术，亦各从其性也。”^②

黄侃虽拜章炳麟为师，却不以其师经学为然，“一日，杯酒之后，论及太炎学术，乃曰：‘小学颇有所得，经学不过尔尔，吾师乃文豪也。’”张舜徽则认为黄侃所说不误，张说：“太炎自少服膺船山、梨州、亭林之学，宣扬民族大义，奔走革命，席不暇暖，何暇伏案穷经。故其经学功力远不逮并世之黄元同（以周）、孙仲容（诒让），此故不必为之讳也。”^③

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二郎访黄侃于南京，“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④则黄侃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所授经学、小学，竟是黄以周之学也。其实，早在此前多年，京师大学堂传授经学者，亦均为黄以周南菁弟子。胡玉缙时任《周礼》教习，自著《周礼学》讲义，王欣夫称此讲义：

全书发凡起例，宏纲毕举。大致繁征博引，而折衷于元同之《礼书通故》，援《说文》称贾侍中例，书中省称“师说”。时象山陈伯弼汉章在弟子之列，其《礼书通故》识语自序所谓“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讲经皆宗是书，称曰‘黄教谕说’而不名者也。”^⑤

胡玉缙晚年由北京返家乡后，在复王欣夫的信中，提起老师教导他的话：

先生尝语弟云：“心得谈何容易，但使明于取舍，已难能可贵。余研经数十年，心得不过数条。”^⑥

虽是谦辞，但这也是黄以周治学由博返约，终成大师的经验之谈。

①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80页。

② 章炳麟：《黄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影印《章氏丛书》本。

③ 张舜徽：《黄季刚之评断章太炎》，《爱晚庐随笔》之《学林杂录》卷一，华中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④ 《仓石武二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5页。

⑤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122页。

⑥ 胡玉缙：《覆王欣夫大隆书（丁丑）》，《许慎学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4—485页。

附：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

先生讳以周，字元同，号傲季，浙江定海厅人。曾祖必悌，祖兴梧，庠生。父式三，岁贡生，敦行力学，著作等身，入国史儒林传。先生本名元同，字经纂，后出试，同知某命改从今名。少承家学，与兄傲孟、傲仲相砥砺。六岁入塾，识说文部首字，遂读经。先《礼》，次《诗》、《书》，次《春秋》、《易》，每一业毕，辄条分节目，疏通大义。十九补诸生，同治庚午，优贡，旋举于乡。光绪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职用，补分水县学训导。辛卯，学政瞿学士鸿禧称其素履诚朴，粹然儒者，保中书衔。后学政潘学士衍桐又称其研精殆思，物疏道亲，保以教授升用，旋选处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礼宜致仕，遂不就。

先生恪守父训，以传经明道为宗旨。其事父三十余年，未尝去左右，父卒前数月，大厥而苏，成偏枯疾，手不能作书。一日，自叙黄氏塾课，字形蜿蜒难读，先生适自外返，见而大惊，请口授为书之。父卒，先生装绝笔一纸，不忍毁弃，且曰：“示我子孙，知吾父拳拳是书，所以佑启后人者，深且远也。”居丧尽礼，不徇时俗。刊遗书行世。

先生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国朝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乃体顾氏之训，上追孔门之遗言。其说《易》，则由孔圣之大象传，以寻画卦之旨，由孔圣之彖爻传以寻象爻之旨。《诗》必宗序，《书》必条贯大义，《春秋》用比事之法，三《传》校以经例，定其短长，而三《礼》尤为宗主，凡详考礼制，昼夜研索，多正旧说之误，释后人之疑，而意在覈明古礼，示后圣可行。所著《礼书通诂》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礼制备矣。其书足以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至其道德性命之学，则在辨虚无，辨绝欲，以执一端立宗旨为贼道，悉折衷经训，以烛叛慝疑枝、邪离遁穷之情形。所著《经训比义》三卷，列二十四目，举谓博文约礼，圣门正训，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瞭然于心目。不博文，能治经乎？既治经矣，当约之以礼。又谓礼者，理也，天理之秩然者也。考礼即穷理。后儒舍礼而言理，礼必实征往古，理可空谈任臆也。欲挽汉宋学之流弊，其惟礼学乎？或云“礼为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云“礼岂为我辈设”，是言一出而晋乱。学术不明而治术弊。是先生以经学为理学，即以礼学为理学，顾氏之训，至先生而始阐。先生以孟子学孔子，由博返约，而未尝亲炙孔圣，其间有子思子，综七十子之前闻，承孔圣以启孟子，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而举子

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旨，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既书成，而疾瘥，更号曰哉生，盖先生之学，由子思学孔孟，至是而其志章矣，其学亦大成矣。黄漱兰侍郎视学江苏，建南菁讲舍，延先生主讲。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弟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也。”宗湘文观察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先生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光绪戊戌，去江阴，归隐于仁和半山之下，卒于光绪己亥十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二，卜葬于海晏乡黄家桥之东。配梅孺人，妾陈氏，子六人：长家辰，附贡生；次家岱，优廪生，先歿；次家鸞，廪膳生，皆梅出；次家骥，先歿；次家谷；次家珩，皆陈出。

荃孙戊子在南菁，与先生接席者两年，冲如昙如，粹然儒者，时时请益，反复详告，不惮烦也。今家辰等来请铭，曷敢辞。铭曰：

国朝家学，绍汉迈唐。元和之惠，高邮之王。鼎足其间，先生觥觥。佩麟自警，炳烛未遑。礼堂写定，北熊南皇。居乡植品，天府圭璋。涤笔摛辞，炎汉班扬。著录弟子，群奉瓣香。岁星周天，久留吾乡。传灯负笈，弦诵铿锵。山颓木坏，万口悼伤。张、黄同祀，永荐蒸尝。^①

章炳麟《黄先生传》

黄先生名以周，字元同，浙江定海人也。父式三，号傲居先生，治经，为浙东通儒。先生少承父业，以传经明道自任，言著书当质鬼神、俟后圣。年十九，为《十翼后录》，非其至也。清同治九年，中式浙江乡试。明年会试，选誊录，期满，当得知县，不就。又十年，大挑，以教取用，先后署遂昌、海盐、於潜训导，选补分水训导。

先生性颀至，事亲至孝，非礼不动。为学不拘牵汉宋门户，《诗》、《书》、《春秋》皆条贯大义，说《易》综举辞变象占，不偏主郑、王，尤邃《三礼》。自孙炎《类礼》以来，学者区别科条旧矣，清世得大体者，有惠士奇《礼说》、金榜《礼笺》、金鹗《求古录》、陈立《白虎通义疏证》，弗能条件分别，礼说尤散杂无部曲。凌廷堪《礼经释例》，比考周密，又局于士礼一端。先生为《礼书通话》百卷，列五十目，囊括

^①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五。案：“张、黄同祀”，指张文虎、黄体芳。

大典，揉此众甫，本枝敕备，无龙不班。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覈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尝又辑《军礼司马法》二卷，而论田制，取北朝均田为准。校定周尺，谓当今八寸一分，不如是，车不足容三人。均田制盖先生所欲施行。要其根极，以治礼为主，尝曰：“挽汉宋之末流者，其惟礼学邪？文章非礼则淫哇，政事非礼则杂霸，义理非礼则虚无。礼学废，故国乱而民荡。”初，宋世四明之学，杂采朱、陆，及近世万斯同、全祖望学始端实。至先生益醇，躬法吕、朱，亦不委蛇也。尤不喜陆、王以执一端为贼道。平生不为流俗文辞，诸华士皆谓先生不文，先生亦自退然。其说《经》，陈事象物，闳肃超出钱大昕、阮元诸儒上远甚。时宁波知府宗源瀚有循吏声，独严事先生，就辨志精舍属主焉。尝欲效邹鲁习礼，性解营造，画古宫室为图，命匠将裁矣，源瀚行视，良久曰：“至矣，所谓发育万物，骏极于天者也。顾皇代衣冠，惧不可以行周礼。”先生乃罢。

久之，提督江苏学政黄体芳就南菁书院延先生讲，主书院十五年，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中间尝并建他师，熹发策干进者多归之，而事朴学者专宗先生，弟子慈溪冯一梅、林颐山，丹徒陈庆年，元和曹元弼，为得其传，通^①王兆芳尤亲，早死。

先生之作，莫大乎《礼书通故》，其余有《子思子辑解》、《经训比义》、《古文世本》、《黄帝内经集注》及《傲季杂著五种》，皆卓然可传世。^②

晚选处州教授，以特荐授内阁中书。年七十二，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卒。子家岱、家鹭世其学。

赞曰：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重经术，亦各从其性也。清世大人称程朱者，多曲学结主知。士民弗躅，则专重汉师，抑雒闽。其贤者诚弘毅，知质文之变，而末流依以游声技，愈小苛，违道益远，夷为食客而不知耻。先生博文约礼，躬行君子，独泊然如不与世俗成亏者。林颐山颂之曰：“履贤体圣，怀褻精纯。绍闻衣言，董振汉学，呜呼至矣。”^③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辛酉)

唐文治在南菁书院亲炙黄以周门下整整四年(1885—1888)，于老师“为学大

① 通，应是通州，今江苏南通。

② 《古文世本》，《黄帝内经集注》两种，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均未提及。

③ 《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影印《章氏丛书》本。

旨”和“著作源流”有深切了解，所述最为真实可靠，故全录唐于辛酉年（1921）所作《学案》：

先生讳以周，字元同，晚字傲季，定海经学大儒黄先生讳式三号傲居子之季子也。七岁读《礼记》，旋受《士礼》、《周官》诸经，依次终业。十数岁即锐意著述，露钞雪纂，手不释卷，年三十馀，著书已裒然成巨帙。德清俞荫甫先生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先生上书自言其志，颇献所著以就正。俞先生优礼答之，不敢以师自居也。同治庚午，以优行贡成均。是岁，举于乡。明年，应春官试，补国史馆誊录。历署遂昌、海盐、於潜训导，旋补分水训导。所至训迪士子，成人有德。光绪庚寅，特赐内阁中书。旋奉特旨升用教授，补处州府教授，以年老不就。

自乾嘉以来，士大夫钩稽训诂，标宗树帜，名曰汉学，其末流之失，不免破碎支离，甚且分别门户，拮据宋儒义理之学，以为空疏，意气嚣然，渐至暴慢。先生独谓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均多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国朝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黄梨州诸先生。亭林先生尝谓经学即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故经学、理学宜合于一，不宜歧之为二。乃体郑君、朱子之训，上追孔门之经学，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其所得于心而诏后学者，务在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盖江慎修、王白田先生以后一人而已。光绪中叶，新学勃兴，士或稍稍变其所守，先生独卓然不惑于流俗，素履而行，遁世无闷，束脩以上，以是咸归之。

先生秉性孝友，事傲居子，数十年未尝离左右，居恒动容周旋必中于礼。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端恂而精详。其教人务以敦品励学、躬行实践为旨。

瑞安黄漱兰先生督学江南，建南菁讲舍，延先生主讲。宁波太守宗湘文先生建辨志精舍，聘先生主经学科，南方弟子从之者千余人。先生一本孔孟之教以为教，尝取《易》“静”、“专”二字以训南菁诸生，曰：“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人有终日读书而掩卷辄忘者，病在不静；有终身读书而白首不名一艺者，病在不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又曰：“昔之儒者尚专经，故能由一经以尽通诸经。今之学者欲无经不通，乃至一经不通。”其笃实如此。

文治自光绪乙酉岁受业先生门下，忽忽已三十余年矣。追惟先生之训，恒自警惕。爰撮其为学大旨并著作源流列于篇，俾后之传儒林者有所採择焉。

至先生行谊，具详王君兆芳所为《行状》，而学侣门徒则又繁莫能详，故均不著。

著作概略：

先生上俞荫甫先生书云：周质钝学浅，一无所底，奉承庭训，麤知汉宋学门户。年二十余，好读《易》，病先儒注说于画象爻下自骋私说，揆诸圣传往往不合，于是有《十翼后录》之作。嗣后喜观宋儒书，又病其离经叛道，多无当于圣学，甚且自知己说之不合于经，遂敢隐陋孔圣，显斥孟子，心窃鄙之，于是有《经义通诂》之作（案：此书后改名《经训比义》）。三十岁以后，又好读《礼》，苦难记忆，乃分五礼类考之，会萃旧说，断以己意，撰《古礼说》，未竟，以兵燹辍业。旋以先人弃养，读礼苦次，于小祥后，撰《凶礼说》，合订之，名曰《经礼通诂》（案：此书后改名《礼书通诂》）。又编旧作杂著文，说之无裨经史者删之，非我心得者黜之，约存若干篇，名曰《傲季杂著》。周桄昧不才，妄自撰述，惧见怪于当世，辄藏弃之不示人。今年四十矣，恐以痼蔽终身，无发矇日，幸遇有道，敢不就正，所呈《经礼通诂》两册，覬求指示纰缪，俾得改正。果蒙惠教，周将执弟子礼，奉全书以拜门下。

谨案：此书载入俞荫甫先生所刊《袖中书》中，先生生平著作梗概，具于是矣。

《十翼后录》、《周易故训订》

傲居子最精《易》学，尝著《易说》一书，不拘旧说，独标心得。先生绍承家学，著《十翼后录》八十卷。尝谓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经》也，孔子之传《注》也，以三圣人之经，而孔圣为之注，后世之说《易》者，但守孔圣家法足矣，故所作《十翼后录》，不分汉宋门户，惟以发明孔圣之说与合于经例者为主。

晚年又辑成《周易故训订》一书，自序之曰：“昔者文王作《象》，周公演爻，其名小，其类大，其旨远，其辞文，意蕴而不尽，义深而难测。《左氏传》录术家言，或已漫衍而不得其宗，孔圣乃订之，作十传以翼经，谓之《十翼》。《象传》明六画之法象，《象传》举一卦之纲领，《爻传》析诸爻之义例，而《系辞》、《说卦》诸传，《易》之精蕴具于是。夫《经》之有《传》，犹射之有毂也，学者勿背毂而去，必志毂而发之。然一人发之，巧与力有不逮，不若与众人共发，至且中之多也。是以学者必广搜古注，互证得失，务求其是。若夫舍古求是，詎有独是，多见其不知量也。虽然，学必求古，而古亦未必其尽是矣。古人《易》注充栋，多至千百家，即周之所旁搜而得见者，亦不下四百余家，其中有不遵孔子之传而臆解

文王、周公之经，且有不遵文王、周公而好伏羲之言，是所谓变轂率者也，其力能至乎？其巧能中乎？其一至无不至、一中无不中乎？惟愿学者择是而从，勿矫异，勿阿同，斯为善求古、善求是也已。周幼承家君之训，口讲指画，略有会悟，作《十翼后录》若干卷，会萃先儒之说，条列之，融贯之，若是者有年。今约其说而成是书，择古注之是者从之，其背圣传以解经义有不妥者，则足之以邮意，颜其名曰《周易故训订》。订者，平议之也，不敢矫异于古人，亦何敢阿同于古人，务求实是，毋背圣传，致乖圣经也”云云。

先生尝病国初说《易》诸家不无支离穿凿之弊者，甚者不谙家法，驰说骋辞，深为可惜，故所择易理，务在以经正经，发微言而明大义，较诸惠定宇诸儒所述，精深盖远过之焉。

谨案：《十翼后录》未经刊刻，《周易故训订》文治仅钞得上经一卷，藏以待刊。近世学者但知先生《礼》学之精邃，未能知其《易》学之闳深也。^①

《礼书通诂》

先生笃守圣门约礼之训，其于礼斯须不去身，于礼学终身以之，著《礼书通诂》凡五十卷，刊行于世。自叙云：礼根诸心，发诸性，受诸命，秩诸天。体之者圣，履之者贤。博文约礼，圣门正训也。周六岁入塾识字，七岁读《小戴记》，谨承庭训，略识小节。三十而后，潜研诸礼，于《经》十七篇外，搜辑大小戴两《记》及《周官》、《春秋传》，分门编次，厘定先后疏注家言，有裨《经》、《传》亦附录之，平文大义具彼书矣。而儒说之异同，别汇一编，迟之数年，迺放戴君《石渠奏议》、许君《五经异义》，裒集是书，草创于庚申，告藏于戊寅，列目凡四十九，曰：

① 案：时隔一年，唐文治于壬戌年（1922）刻其师《周易古训订》，并为作跋，该跋收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录如下：呜呼！此我师定海黄先生所著《周易古训订》及《注疏》剩本，盖皆未成之书也。先生承家学，最精于《易》，口讲指画，孜孜不倦。尝著《十翼后录》八十卷，都数十册，裒然成大观。文治偶假读一二日，辄索去，以其为未定之论也。光绪戊子夏，文治与先生论《易》学，详晰汉宋义例，先生欣然出此二卷曰：“此余未成之书也，子宜阅之。惟读此，则于《易》例得过半矣。”文治读之，如获拱璧，亟钞成之。嗣后宦京师，值庚子之乱，辗转迁徙，常携以自随，弗敢失坠。辛酉，主讲无锡国学专修馆，并受施君省之之托，刻十三经读本。同学陈君善馥以书来曰：“子有志刻先生之书，《周易古训订》为学《易》津梁，盍附刻于《易经》后。”文治闻之憬然，爰属馆生嘉兴唐兰详加校正，授之梓人。嗟夫，囊之不以此书示人者，因先生有宜秘之言，弗敢忘师训也。兹者距先生之歿二十余年，此书既出，后有学者倘能踵而成之，固先生之志也。伏案：《古训订》仅成上经一卷，注疏仅成《乾》、《坤》、《屯》三卦，并附重卦卦变图，然《易》理备于《乾》、《坤》二卦，学者循是以求，自可悟读《易》之法矣。追惟先生毕生精力在《易》、《礼》二书，《礼书通诂》已风行海内，而《十翼后录》闻尚藏于家，倘得有力者汇而刊之，是盖吾党所祷祀以求者也。

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礼、郊礼、社礼、群祀礼、明堂礼、宗庙礼、馈食礼、时享礼、改正告朔礼、籍田躬桑礼、相见礼、食礼、饮礼、燕饗礼、射礼、投壶礼、朝礼、聘礼、覲礼、会盟礼、即位改元号谥礼、学校选举礼、职官、井田、田赋、职役、钱币、市糴、封国、军赋、田猎、御法、六书、乐律、刑法、车制、名物、仪节图、名物图，盖先生毕生精力萃于是矣。

俞荫甫先生为之叙曰：“礼学中集诸家之大成者，莫如秦味经氏之《五礼通考》，曾文正公尝与余言，此书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于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余读之，诚然。惟秦氏之书，案而不断，无所折衷，可为礼学之渊藪，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求其博学详说、去非求是、得以窥见先王制作之潭奥者，其在定海黄氏之书乎？定海黄君元同为薇香先生之哲嗣，往岁吴和甫同年视学吾浙，录先生明堂步筵说见示，谓与余说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见。未几，余来主讲诂经精舍，始得交于君。后又与同在书局，知君固好学深思之士也。曾以所撰《礼书通诂》数册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献替。至今岁，又以数巨编来，则哀然成书，又得见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颓，学问荒废，流览是书，有望洋向若而叹而已。承不鄙弃，问序于余，余何足序此书哉。惟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纵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故有驳正郑义者，如缕以属武，非饰纓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郑义者，如冠弁委貌为正义，或以为元冠者，别一说，非谓冠弁即元冠。妇馈舅姑，共席于奥，谓二席并设，非谓舅姑同席，是也。略举数事，虽小小者，然其精审可知矣。至其宏纲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向使文正得见此书，必大嗟叹，谓秦氏之后，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经义麤庸，无能为益，而所说冠义毋拜之、乡射礼乏参侯道，皆颇与鄙说合，亦未始不自幸也”云云，其推尊如此。

《经训比义》

自汉宋学分途，学者胶于成见，意气纷争，鲜有能实事求是以沟通之者。先生深究天人之奥、道德之归、性命之蕴，尝谓宋陈北溪先生《字义》精矣，而不免失之虚；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证》凿矣，而更失之于器；阮文达作《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本原经义，可谓精而实矣，而尚嫌其略。爰著《经义通诂》一

书，以破虚无寂灭之陋，而烛被淫邪遁之情，晚年改名之曰《经训比义》。先生自序之曰：“经者，圣贤所以传道也。经之有训诂，所以明经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无倦，孰不有志于闻道，顾或者辨声音、定章句，专求乎训诂之通，而性命之精，仁义之大，一若有所讳而不言；言之者或又离训诂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甚且隐陋乎孔圣而显斥乎曾孟诸子，此岂求道者之所宜为哉。夫圣贤之经，儒说之权衡也。儒说之是非，以经质之。经义难明，以经之训诂核之。经训不可偏据，以诸经之相类者融贯之。经以类纂，如丝之纶。同异既别，是非自明，所谓叛慚疑枝、邪离遁穷之情形毕著矣。不揆樛昧，采掇成书。道毕宗经，训亦式古。而区区之意，尤在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庶或心知古意，不惑歧途也。因取《国语》士亶之言，以命其书，分为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盖是书一出而经学、理学始会归于一，是《诗》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传》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者，皆确有其主宰而不堕于元虚。刘芷人先生见之曰：“以此说经，经由是明。以此应世，庶不执臆见为理义败坏天下事矣。”南菁同学顾君鸿闾等为刊行于世。

《子思子辑解》

孔子之学，传于曾子、子思，孟子得子思之传，不独《中庸》之费隐，性命之精微，即出处进退、辞受取与之大节，亦取法于子思，故子思有壁立万仞之气概，孟子有泰山岩岩之精神。先生以为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学，必以子思为枢纽，尝辑《意林逸子》四十四种，而尤注意于子思子。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遗憾。”其后卒辑成书七卷，盖至是而先生之志彰，先生之学亦愈精矣。其自序曰：

“《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故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毛诗谱》引《中庸》一事，《史》、《汉》注引《中庸》两事，《文选》注引《缙衣》两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余条，一见于《表记》，再见于《缙衣》，则梁沈约谓‘今小戴《中庸》、《表记》、《坊记》、《缙衣》四篇类别皆取诸《子思》书中。’斯言洵不诬矣。其书唐代犹盛行，文史家、类书家所引，或从旧名曰《子思》，或依新题曰《子思子》，此各家体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书犹存，《太平御览》采取颇

多，而倏称《子思》，倏称《子思子》，一部书中，称谓错杂，岂其所引子思语，别见于他书与？然检诸古籍，多目为《子思子》，则辑《御览》者，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意林》载《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后，七卷本已难获，而鼂公武犹及见之，其季遂亡，渊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见，所见者汪暉辑本。《艺文考证》云：‘今有一卷，皆取诸《孔丛子》，非本文。’即据汪辑而言也。汪辑凡九篇，内篇割裂中庸文，分《天命》、《鳶鱼》、《诚明》为三；外篇刺取《孔丛子》书，有《无忧》、《胡毋豹》、《丧服》、《鲁繆公》、《任贤》、《过齐》六篇。所辑踳驳，本不足传，今并此而亡之。近时辑子书者，以严铁桥、马竹吾书为巨观，而皆不及《子思子》，非六合内之大憾与？初，以周辑《意林逸子》四十四种，内有是书，所辑皆古人引子思子语，其单书子思者，别见于后，《孔丛子》所载，不滥及焉。近染寒疾，已逾一载，时思旧辑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讲舍诸生广为搜罗，复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热时发，功有作辍，凡四阅月而后蒞事，以《中庸》、《累德》、《表記》、《缁衣》、《坊记》之有篇名者为内篇，凡五卷；汉魏唐宋儒书有引述子思语，亦并叠辑，《檀弓》引见七事，《孟子》引见三事，虽或系后学之传闻，而语著经典，即非出诸本书，而辑逸文者，自宜据补，总曰外篇，一卷。《孔丛子》虽贗书，而售贗者，必参以真，其术方行，若概以贗，不能售也。魏晋时，《子思子》具存，而作伪者欲援以为重，录其真者必多，王肃《家语》其故智矣，若尽摈之，不已矫乎？凡引见五十二事，别之曰附录，又一篇，都为七卷。

时相辑逸文者，顾鸿闾、曹元忠、胡玉缙、蒋元庆、达李、林之祺之功为多云。”

《军礼司马法考征》

《汉书·艺文志》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已佚，今所传五篇，系兵法，非军礼旧文也。汉晋以来，经注疏义所引据《司马法》言，往往五篇所未有，当系军礼佚文。桐城姚姬传先生《惜抱轩笔记》、山阳丁俭卿先生《佚礼扶微》，先后皆有载，未臻完备。南菁同学陈君善馥，根据姚、丁两家所辑，复搜群书，更加缀补，先生乃为之董正其次，推明古制，折衷经教，为《考征》二卷，其题辞云：“古《司马法》百五十五篇，或叙军礼，或详兵法，祖述似同，裔流迥别。刘编《七略》，以其均出司马，并列兵家。班《志·艺文》，冠以军礼，移入经类。郑氏《通志》，力排班书。章氏《校讎》，又诋郑说。顾旧籍久逸，坠绪难寻，任意出入，迄无定论。今以所见言之，世行五篇，旧名《司马兵法》，宜依刘《略》为允，

此犹《周易·明堂》，未可混列六艺也。其论军乘诸篇，“昏鼓四通”，许慎引为礼文。“邱马一匹”，杜预直称周礼。通人雅记，悉从班志，此犹刘向《五行传》有别于所序六十七篇也。《史记·自叙》云：《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三子，能绍而明之，实为《兵法》诸篇而发。《博物志·文籍考》因《司马法》与《周礼》相表里，以为周公所作。又以《军礼》诸篇而定，言虽各有所指，其为西周古书灼然可见。刘氏父子校录秘书，扬推家法，允称密至。惜《司马法》百五十篇未以兵法、军礼分隶两家，致后人犹有遗议也。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虽不能备，吉、凶、宾、嘉尚有端绪，而军礼独阙，无由表见后世，鄙人何敢谈兵事，衰入佚文，微成其义，欲以备五礼之一”云云。先生是书，虽抱残守阙，存千百于十一，而隅反之士，藉以寻省，遂谓古军礼至今存可也。

《傲季杂著》

先生于文退然，自以为弗工。然渊懿朴实，古色苍然，实非近世经生所能及。盖先生之学，精于穷理，故其研求训故，辨析是非，细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而其从至性中流出者，尤足以感动人心焉。所撰《傲季杂著》五种，曰《礼说》，曰《群经说》，曰《史说略》，曰《子叙》，曰《文钞》。

《礼说》大都掇《通故》中之精华，融贯而出之。

* 《经说》以释《易》诸条为尤精，如《周季说易古义》，谓《周易》非卜筮之书；《释艮限列腋》，谓医术通儒道；《释〈坎〉九五爻辞》，谓祇当依郑读为坻，坎不盈者，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下坎亦不盈也，是即《象传》水流不盈之义，所谓吉凶与民同患者也；《释〈丰〉日中见斗日中见沫》，谓即《象辞》之宜日中斗与沫虽不明，而其不明者甚小，庶与“来章有庆誉”之义相合；《释〈升〉上爻消不息》，谓坤性柔暗，昧于升阳之义，非谓阴自升不已也，上苟昧于升阳，则下阳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于不息之贞”，此正深为君子谋，非为小人幸。此皆《易》学之精微，圣经之通例，为前儒所未发。

《史说略》则博采古籍，考核精详，而论秦汉唐宋田制异同，论限田等篇，自秦以来，利弊得失，瞭如指掌。其意盖在覈明古礼，以俟后圣可行，益见先生经济之学有本而有源矣。

《文钞》中如《颜子见大说》、《曾子论礼说》、《子思学诗说》、《管仲子路功烈说》等篇，皆论述圣门弟子学术。《子游子夏文学说》谓系南北学派之权舆，北

方多苦卓力行之士，学业亦尚专攻，是善用守者，而其失也拘墟而不达；南方之士好博大识见，议论时突过前人，是善于创者，而其失也，泛滥而无所归宿，岂游、夏之流风使然欤？上下千古，俾后世知学派之祖。《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辨无》等篇，推论道德性命之学，精义坚深，并为千古不磨之作。《南菁讲舍论学记》，本朱子《常熟吴公祠记》“子言子敏于闻道，不滞于形器”之说，详考子言子学问。并谓文学即乡三物之六艺，艺与德可分，艺与道不可分。艺无道，其艺疏；道无艺，其道虚，以补朱子碑记所未及。后贤有作，不易斯言矣。《明经公言行略》、《质庭志传》、《仲氏谱传》等篇，孝友至性溢于言表，足以惊衰世而风末俗。故读《礼经》等说，有以见先生学问之大。读《文钞》，尤可见先生学问之醇。

谨案：《礼说》、《经说》，长沙王益吾先生曾刊入《皇清经解续编》中，非完全本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宋李文简《续通鉴长编》久罕全本，康熙时，昆山徐懋园先生所呈进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残本而已。朱竹垞先生题杨仲良《长编记事本末》云：“《长编》所佚，具见杨书，以杨书补《长编》，而李书可全，杨书之所阙，又以《长编》补之而杨书亦可全”云云。及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乃从《永乐大典》中辑成五百二十卷，然徽钦两朝则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宁、元祐、绍圣间九年事，读者憾之。至光绪中，浏阳谭文卿先生刻《长编》于浙江书局，更本竹垞先生之意，属书局襄校诸君以杨书补《长编》，使数百年阙佚之书一旦完善。时先生在局襄校，首任其事，大要以杨书为主，并参考宋、辽、金三史、《东都事略》，以及《编年备要》、《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靖康要录》等书，殚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数十种之史书，阅两年而后成书。是书之成，先生之力居多，特系众人所共辑，非先生所独纂，故《行状》未列是书云。

缪荃孙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缪荃孙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生于江阴城西二十余里的申港镇。祖父槐庭，嘉庆乙丑进士，官至平庆泾兵备道；父焕章，贵州候补道。

缪荃孙从小就受到严格的科举教育,读书聪明,其外祖父对其父说:“是子口齿清,记性好,或能绍书香也。”^①八岁,读《四书》毕,十一岁,读《五经》毕,开始读《周礼》、《仪礼》。十二岁,母亲瞿氏病故。咸丰十年(1860),十七岁,曾应县试,拔之前列。试后仅一月,太平军已攻破江南大营,东下,缪荃孙侍奉继母薛氏渡长江,避难于淮安。同治元年(1862),淮安丽正书院甄别,得漕督吴棠的赏识,缪以第二名入院肄业,从著名学者丁晏学,“教以读经必先研究小学”。后应父召,赴长沙,再赴成都,从阳湖汤成彦读书,始为考订之学。同治六年(1867)八月,以寄籍华阳监生应乡试,中举。先后入成都将军崇实、川督吴棠、川东道姚觐元幕。光绪元年(1875),执贲四川学政张之洞门下受业,为撰《书目答问》四卷,始为目录之学。

光绪二年缪荃孙中进士,入翰林院。从中举到成进士的十年中,缪荃孙遍游川东北、陕南各地的名山大川,搜访碑刻,开始研究金石之学。光绪三年,散馆,授职编修。张之洞自四川回京师,总纂《顺天府志》,时缪荃孙为撰修。后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缪继张主持总纂,前后经历七年始告成书,共一百三十卷,时推巨制。光绪五年,缪荃孙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得士最盛。他慧眼识人,以经策补荐山东福山王懿荣,然主考徐桐多疑,欲置副榜,经缪之力争,王始得售。王懿荣日后于甲骨文研究有开创之功,缪荃孙亦与有荣焉。

缪在京师,以博学嗜古与常熟翁同龢、吴县潘祖荫、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吴县吴大澂、福山王懿荣诸师友游,是以考证、碑版、目录之学根柢甚深,而搜罗亦极富。^②历充本衙门撰文,教习庶吉士,国史馆纂修、总纂。吴县潘祖荫时为国史馆总裁,疏请缪荃孙、谭宗浚编辑《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赅续阮元所未竟。后潘祖荫丁忧去职,谭宗浚外放,缪独任其事。掌院徐桐继为总裁。开始,两人亦甚相推揖,后徐桐示以纪大奎《易说》,命编入《儒林传》,缪荃孙不以为然,对徐桐直言相告:“《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收入经部,以此为例,大奎似未便补入。”缪此举犯了官场大忌,又加上相忌者在旁参以谗言,说缪荃孙“持才独断,渺视前辈”。于是徐、缪两人遂相齟齬。^③缪荃孙事过多年,于甲午翰詹大考后,曾写信张之洞,述说当年此事原委:

受业之开罪徐掌院也,因《儒林》五传奏派受业与谭叔裕总办。徐太无学

①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道光三十年,七岁。

② 刘声木:《菴楚斋随笔》卷六,“缪荃孙撰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7—118页。

③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光绪十四年,四十五岁。

术,又坚愎自是,硬交纪大奎、方东树入《儒林》。受业等二人恐为清议所鄙,力持不肯。属有谗人交构其间,遂固结而不可解。^①

不过,当时缪荃孙尽管受此委屈,仍尽心完成《儒林》等五传共二百余篇,“分并去取,略具苦心”,然而,徐桐“不知是非,以先入之言为主,随加挑斥,埋没苦心”。^②

光绪十四年(1888),继母去世,缪荃孙于该年秋奉枢归里,被江苏学政王先谦、杨颐聘为南菁书院院长,主讲古学。黄以周则仍讲经学。光绪十六年二月,辞馆,到湖北拜谒张之洞,交《湖北通志》稿,五月进京复职。缪在南菁约一年有半,问业于他的书院高材生有曹元忠、王仁俊、吴稚晖、钮永建、金鉞等。

缪入都才数月,父亲亡故。缪为父守制期间,于十七年二月受山东巡抚张曜之邀,赴济南主讲泮源书院。缪在山东仅半年,后回乡葬亲。十八年,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十九年服闋,充国史馆提调。二十年,翰詹大考,缪荃孙遭到严重挫折,盖翰林院掌院徐桐有意求疵。前记缪致张之洞一书,详记此事:

此次入都,撰文旧缺不派,庆典不派;会典馆潘文勤索之于前,翁尚书索之于后,允而不派;京警不能不列一等,考语平常,以致不能记名。掌院例不阅大考卷,忽特旨命之覆阅,业已拆封,恩怨易辨,受业卷初列二等,因一讹字,改置三等之首,亦可以已矣。徐一见大喜,谓非置四等不可,翁尚书再四挽救,置三等倒第四名,夺俸两年。徐尚以为未快也。深仇宿怨,为之下者,不亦难乎?^③

此书信由曹经沅收藏,曹日后请柳诒徵于信后作跋,柳氏详加考证,中引叶昌炽的两条日记,录如下:

丙申(1896)八月廿八日 夏闰枝来述,筱珊因与掌院争纪慎斋入《儒林》,大考为所中伤,日前接见同署诸君,昌言不讳。

丁酉(1897)九月三十日 补撰《儒林·纪大奎传》一首,东海相国之意也。大奎从邵子先天入手,阐明良知,亦不攻朱学,又旁涉二氏术数、疑龙撼龙诸说,其学颇不纯。东海师初以属筱珊,不允,致齟齬。余不能却,即此愧吾友矣。

叶昌炽与缪荃孙都酷爱金石之学,可谓学术同道,然缪荃孙于此事拒不从命,叶虽也认为纪大奎“其学颇不纯”,然屈从徐桐淫威而“不能却”,所以叶在日记中自

① 黄潜:《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1页。

②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光绪十四年,四十五岁。

③ 黄潜:《花随人圣盦摭忆》,第78—81页。以下引文出处同此。案:黄潜录此一段公案,极详尽。黄亲见此信,他说:“缪艺风上南皮一书,纒衞沔以见示,措法端整,用粉红罗纹笺,恪守翰苑前辈规矩也。”

责“愧吾友矣”。不过，柳诒徵说，“叶虽勉撰《纪大奎传》，后仍附《循吏传》”，则纪大奎终究未能入《儒林》。

缪荃孙既在史馆与徐桐论事不合，凡事徐均有意求疵，于是缪荃孙浩然有归志矣。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乞家省墓。六月到武昌，张之洞留缪重修《湖北通志》，并囑阅两湖书院官课卷。九月，决计迎春属南归，从此脱离了官场。是年，盛宣怀委托缪荃孙编刻《常州先哲遗书》。二十二年，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次年，兼领常州龙城书院讲席。二十七年，领江楚编译局总纂。二十八年，书院改高等学堂，充监督，兼领中小学堂。十二月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次年正月成行，三月即回国。“乃酌定课程，编辑课本，一切草创，中西之学兼重。访聘教员，皆取淹通笃实之士，讲求教授管理之法。实事求是，力戒袭取皮毛陋习。”^①缪荃孙在江宁执教的十余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悠然自得的时光，他致信汪康年提及：“应酬之简，更甚于鄂，每月阅卷约五日，以五日应酬，走荒滩，游胜地，足可得廿日闲，亦中年不易得之境也。”^②

三十三年（1907）辞高等学堂教职，结束了在江宁十多年的教授生涯，被两江总督端方奏派创办江南图书馆。缪荃孙在创建该馆期间，以七万余元收购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二十万卷藏书，实为近代书林的一大盛举。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吴兴陆氏“皕宋楼”，名扬海内外。就在缪荃孙筹办江南图书馆时，日人以十万元将“皕宋楼”十万卷藏书买下，载舟东航，藏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而“八千卷楼”藏书，亦因丁氏后人经营亏损而岌岌可危，为阻止这批珍贵典籍遭到“皕宋楼”那样的命运流落海外，经端方首肯，缪荃孙和他在南菁书院的弟子陈庆年同赴杭州，同丁家商榷，为江南图书馆采购“八千卷楼”的全部二十万卷藏书。由于缪荃孙在学术界的声望，为人又儒雅谦和，因而交游广阔。柳诒徵称其师：“性直而和，好学如命”，“貌丰朴，能饮酒，善谈谑，豁如也”。正因为缪性格开朗豁如，待人真诚，重然诺，讲信用，又与丁家有数十年的学术交谊和嗜书如命的共同志趣，丁家才会放心将私人藏书变为天下公产，且又解决了自己的债务问题。江南图书馆有丁氏藏书的充实，使得它无论是藏书数量，还是质量，大江南北，无与匹敌。

宣统元年（1909）学部奏派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二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奏修江苏通志，延缪荃孙总纂。五月，缪荃孙有安徽之行，估计是安徽布政使

① 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同此。

② 缪荃孙致汪康年信第五通，《汪康年友朋书札》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2页。

沈曾植为安徽存古学堂事，请缪荃孙赴安庆商讨。沈曾植于四月十四日致信缪：

……又此间开办存古学堂，鄙人用意，微与部章略存通变，与鄂章亦不尽同，大旨谓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书院日程，源流有自。此意发表，将为时流大闢，公必助我张目。倘能纤驾陋邦，作十日谈，为鉴决此事耶？……^①

又有一信：

……存古事，中丞、学使均望公以名誉遥为领袖，有大事可以主持，意出至诚，谅先生必鉴而允可。其保存微意，必须婉致春卿尚书，弟有一书尚未写毕，迟日当录稿奉呈请教也。……^②

于此两信，可见缪荃孙主讲书院、学堂时的作为，得到当时学界的普遍认可。该年，《续碑传集》八十六卷刻成，缪自称：“本百卷，因书局裁撤，截取补遗十四卷。”^③

此时，南菁弟子曹元忠南下江宁见缪荃孙，称学部吩咐他来看望老师身体如何，并催促入都。时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写信与缪：“闻都下图书馆一席，远迓蒲轮，为之喜跃。中原文献系属老成，国之光也。”^④庆幸京师图书馆得人。九月缪荃孙入都，出掌京师图书馆。缪上任伊始，就立即分类清理书籍，从内阁大库检出元、明旧秩，其中尚有宋本，还是当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临安时掳掠到大都去的，那怕是一鳞半爪，也弥足珍贵。缪一边编制善本书目，一边集刻《宋元本留真谱》，使得京师图书馆粗具规模，并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馆。

缪荃孙一手创办了南北两大图书馆，即今南京、北京（国家）图书馆，当时张元济写信给缪，称“南北两馆先后建设，后生小子得闻先圣之遗绪，识固有之文明，不致徇外而忘己，皆老前辈之赐也”，^⑤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又据湖北刘禹生回忆，“（张之洞）其后创建两湖书院，设南北两书库，延缪小山主持购采编藏，故所编书目最精整，采书亦古今适宜。今日图书馆剩余之本，皆小山先生一手皮藏批纂者。鄂中学士，至今尚食其赐云”。^⑥这是讲缪经营湖北武昌地方图

① 沈曾植致缪荃孙书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74页。

② 沈曾植致缪荃孙书第十三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77页。案：该信写于十八日，无年月，估计亦应是宣统二年。

③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宣统二年，六十七岁。

④ 张树年、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元济致缪荃孙第一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0页。

⑤ 张树年、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致缪荃孙第3通，第1271页。

⑥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缪小山充书库主任”，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页。

书馆的情况。有学者说,缪荃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光宣之际,缪荃孙还被聘为礼学馆顾问,而任礼学馆纂修者大都为南菁弟子。

辛亥革命起,缪荃孙隐居上海。皇帝逊位于民国,缪哀叹:“国破家亡,生不如死。”缪在上海“杜门不出,惟以书籍遣,日整理旧著。四方知旧,大都避乱来沪,访书问字,踵接于门”。“寓沪遗老结诗社,先生年最高,称祭酒焉。”民国三年(1914),清史馆开,赵尔巽主其事,缪荃孙聘为总纂,赴北京一行。次年,缪曾写信给冒广生,中叙及修史事:

弟跼伏海上,穷困不堪。次珊同年以《清史》见招,去岁入都一行。为之定门类,分功课。担任“明遗臣”、“儒林”、“文苑”、“孝友”、“遗逸”、“土司”五传。乞回沪自办,次珊允之,即于十月出都。而“儒林”及“明遗臣”两传,业已交卷。次珊又以列传囑定,专传、附传,三品以上无事迹者删,三品以下有事迹者增,与晦若同定,前六朝已毕。人虽不在馆,无一日不办事也。^①

“明遗臣”、“土司”二传是缪首创,国史所未具者也。缪还自任康熙一朝列传,脱稿者十之六七,未克毕事。

除清史修撰外,缪还编纂了数部地方志,如《顺天府志》、《湖北通志》。江苏通志局设立,缪任总纂,因辛亥革命,事中辍。民国年间,重议开局,主事者冯煦认为“金石”一门,非专家莫办,缪荃孙命子僧保参预其事,自发家藏拓本,编录考订,一手成之。家乡江阴续修县志,缪荃孙为定大纲,延请里中耆旧通才任分纂,而自总其成。《续志》由前志续至宣统三年,即清皇朝的结束。全书最后,另附《江阴近事录》三卷,专载辛亥革命后之近事,为后人再修县志保存了宝贵史料。

《江阴县续志》于民国八年(1919)秋告成,冬,缪荃孙溘然长逝于沪上。弟子柳诒徵赴沪吊丧,作哀诗一首。两年后,辛酉(1921)十月二十三日,又作《梦艺风师》一首:“载酒呼车颜料坊,十年向往艺风堂。萧斋换主楹书尽,梦里谈诗一断肠。”^②

缪荃孙“恪守乾嘉诸老学派”,一生对史学“致力最深”,“拾遗订误,悉本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家法。于当代掌故,征求讨论,心得甚多”。当谈论咸丰科场案时,众人不直肃顺,而缪荃孙则曰:“柏葭不死,吾等穷峻,焉有登第之望?”^③缪荃孙“为文私淑《全氏鲇埼亭内外篇》,以翔实为主,不尚空言。”尊全祖望而不喜章学诚。

① 《冒广生友朋书札》,缪荃孙致冒广生第五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② 柳曾符:《幼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③ 徐凌霄、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一册,“咸丰帝斩柏葭”,陕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缪荃孙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史学外，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校勘之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喜搜访于畿辅、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搨几遍。所编收藏目录，共得一万有八百余种。”缪早年为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因指示入学门径简明扼要，学界几至人手一编。后又撰《艺风堂藏书记》、《续记》、《再续记》。校勘成绩独步学界，况周颐就说：“先生校勘专家，顾千里、黄尧圃后，一人而已。”^①还撰有《艺风堂文集》、《续集》、《外集》、《辛壬稿》、《乙丁稿》、《读书记》等，编《常州词录》，纂《辽文存》，代端方撰《壬寅消夏录》。缪有日记存世。

清末民初，刻书之风大盛，缪以其丰富精湛的版本目录校勘学识，刊刻了许多善本书籍。除以盛宣怀名义所辑之《常州先哲遗书》外，还刻有《云自在龕丛书》、《对雨楼丛书》、《藕香零拾》、《烟画东堂小品》等多种丛书。王国维收到《藕香零拾》后，即回信道谢：“见赐丛书，已略读一过，均系有用秘籍，实为近刻丛书之冠，感谢曷已。”^②当时众多学者遇到版本鉴别等难题时，总会向缪荃孙请教。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购书事，致信缪：“有《朱子大全》，疑非宋槧，培老亦疑之，究为何本，老前辈必能评决也。”^③当张元济借给缪荃孙陆刻《史通》时，又请缪在此善本书上加上题跋，称“一经法眼，必能审定。倘蒙赐题，垂示来学，尤为感荷”。^④可见缪在当时学界声誉之隆。

民国四、五年(1915、1916)，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缪荃孙受人利用挟迫，在江苏联名领衔上表劝进，遭受各界非议。张一麀记此事：“闻当时伪造国民公意者，以江苏文物之邦，须求一老儒为弁冕，乃由省当轴饵缪以白镪二万，先致五千为寿，俟登极后补赠如约。不料西南起义，代表取消。一万五千之契约遂成泡影。艺风不容于公论，抑郁以终。”张一麀还很惋惜地说：“夫以艺风之学虽不能比亭林、船山、梨洲之蒙难《明夷》，开有清一代风气，欲如近世王湘绮、樊云门之俳优嬉戏，身享大年，固自易易。乃名山坛坫尚不如投阁之大夫，吾悲艺风，吾思牧翁，后之君子当阳九、百六之交，其亦知所自择夫。”^⑤张一麀是反对帝制、拥护共和者，故对缪此举深为惋惜。而另有一些前清遗老则直斥为“真西江之水，不能洗此耻辱。”^⑥

① 况周颐：《眉庐丛话》，“戏咏与缪荃孙同名者”七律自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页。

③ 张树年、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致缪荃孙第8通，第1274页。

④ 张树年、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致缪荃孙第11通，第1275页。

⑤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缪荃孙劝进”，第4页。案：张一麀的姐夫是江阴夏孙桐，而夏孙桐又是缪荃孙的妻舅，张一麀述此事应不是揣测之词。

⑥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卷六，“缪荃孙撰述”，第117—118页。

夏孙桐总结缪荃孙一生：

先生三十通籍，早负时望。以性刚不能偕俗，弃官时甫逾五十，取竹垞语，以“七品官归田”刻小印，^①用识微尚。后勉应召，一出本拟，即赋遂初。寻遭世变，终隐海滨。溯二十年来，名山坛坫，著述自娱，自谓不以富贵易其乐也。

可惜，晚年一念之差，竟至抑郁以终。所幸名山大业，永存人间。流风余韵，泽被后世。

附：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②

先生，讳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阴缪氏先世，自宋南渡时，宏毅公官统制，驻兵毗陵，遂家焉。历十一世至讳仁者，于明中叶始居江阴申港镇。又九传讳燧，康熙中官浙江定海县知县，有惠政，歿祀名宦，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讳秉奎，邑庠生。祖讳庭槐，嘉庆乙丑进士，官至甘肃平凉府知府。考讳焕章，道光丁酉顺天举人，官贵州候补道。

先生生而颖异，十一岁毕五经。十二岁遭母瞿太恭人丧，哀毁如成人。事继母薛太恭人能尽孝。观察公连试礼闈，不得志，从张忠武公国梁军。既而入蜀省兄伯康公酉阳州任所，兵乱阻隔，久不相闻。咸丰庚申，粤寇陷江阴，先生奉母渡江，避居淮安，肄业丽正书院，为漕帅吴勤惠公所识拔，从院长丁俭卿受经学、小学。久之，观察公已得官，佐黔抚田公兴恕幕，遣人迎眷，中途闻田公去黔，观察公亦牵詿罢官，^③复游蜀，遂至成都。时先生年二十有一，从阳湖汤秋史先生研究文史，始为考订之学。会四川举行丁卯正科、并补壬戌恩科，寄籍华阳，应试获举，改归原籍。先后入将军崇文勤公，总督吴勤惠公，川东道姚彥士方伯幕。遍历川东北诸郡，搜掇石刻，始为金石之学。张文襄公视蜀，执贄门下，为撰《书目答问》，始为目录之学。盖先生未通籍之先，一时耆宿咸以著作之才相推重矣。

光绪丙子恩科成进士，庶吉士，开馆大课，以《重修庶常馆赋》命题，擢第一，^④

① 李详于缪自比于清初朱彝尊事，说得较详细：“朱竹垞先生斥出翰林，为学士牛钮所劾，后补原官，再罢。长洲韩文懿公葵谓人曰：‘吾虽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多读数万卷书。’此语人艳称之。江阴缪艺风先生，昔在史馆，与掌院徐东海不合，投劾自免，镌一小印曰‘以七品官归田’，钤于书籍之上。”李详《药裹慵谈》，“七品官归田故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② 案：缪逝世后，妹丈夏孙桐先代其甥缪禄保写《四品卿銜学部候补参议翰林院编修缪君行述》，后又删略成《缪艺风先生行状》，两文同出一手，但后篇重在介绍缪氏学行，故录《行状》。

③ 据缪禄保《行述》，缪焕章是“因贵州教案牵累，与田公同罢官”。

④ 据《行述》，“大课，股谱经侍郎以‘重修翰林院及庶常馆赋’命题，擢第一”。则赏识缪荃孙者是股兆镛。

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在馆职殚心著作，暇即日涉海王村书肆，採訪异本，典衣购取。知交通假，钞校考订，日益博通。^①张文襄总纂《顺天府志》，招之相助。明志简略，二百余年未有续修，乃与文襄发凡起例，以宋临安两志为法，加恢扩焉。既而文襄出任晋抚，遂继为总纂，历七年而告成，时推巨制。

己卯，分校顺天乡试，得士最盛。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以经策补荐获售，众尤称之。历充本衙门撰文，教习庶吉士，国史馆纂修、总纂。京察一等。吴县潘文勤公为国史总裁，疏请编辑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赓续阮文达公所未竟。先奉派为分纂，寻偕南海谭叔裕先生同为总纂。后谭公外任，遂独任其事。文勤以忧去，掌院徐荫轩相国继为总裁，初亦甚相推揖，既而相国示以纪大奎《易说》，命编入《儒林传》。先生谓：“《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入经部。大奎未可补入《儒林》。”相国亦首肯，后有相忌者，谮言先生恃才独断，遂相齟齬。^②

戊子丁继母忧，居庐数月。整理五传告成，缮稿呈馆，始奉枢归里。主讲南菁书院，分经学、词章，与定海黄元同先生分任之。服阙，起复，京察复带引见记名，以道府用。未几，复奉观察公讳，主讲山东泲源书院。张文襄招主湖北经心书院，未赴。归里营葬。服阙，充国史馆提调。甲午大考翰詹，原列三等一名，已拆卷露名，徐、张两相国、翁协揆奉命复阅，以题字笔误，改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先生以徐相国史馆宿嫌，有意求疵，遂浩然有归志矣。张文襄闻而招之，重修《湖北通志》。逾年，文襄移督两江，聘主江宁钟山书院，自丙申至辛丑，主讲凡六年。复遥领常州龙城书院。^③课士之余，一意刻书，日事校勘。丛书数集，陆续告成。

金陵为东南都会，故家藏度，时时散出，苏沪密迹，估客奔辏，所致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庚子之变，海内震扰，江南幸稍安。及和议成，朝廷锐意变法，张文襄集东南名流于武昌，以资讨论。先生应招，遂领江楚编译书局，在江宁举其事，改钟山书院为高等学堂，充监督，兼领中小学堂。亲赴日本考察学务，归，乃酌定课程，编辑课本，一切草创，中西之学兼重。访聘教员，皆取淹通笃实之士，讲求教授管理之法。实事求是，力戒袭取皮毛陋习。第一届毕业诸生，颇有明达通才，后膺政治教

① 《行述》叙缪氏此时境况较详细：“居京师，卜宅大川淀，为朱椒堂先生旧居，手题‘涵秋阁’楹联犹存，泉潭风景在目，馆职多暇，殚心著述，博搜经籍，每涉厂肆，见有佳本，典衣以购，友朋通假，钞辑考析，日不暇给。”

② 《行述》未提缪氏与徐桐齟齬事。

③ 《行述》称缪氏遥领常州龙城书院原因之一：“以两院皆卢抱经先生主讲旧地，平生瓣香所在。”

育之选者。置吏援故事，疏陈绩学硕儒、士林矜式，诏加四品卿衔。寻辞学堂监督，专办江南图书馆事。时江浙藏书家常熟瞿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号为鼎足。陆氏书为日本购去，而丁氏书亦中落，时论颇惧蹈陆氏覆辙，流落外邦。急赴浙与议，以七万金全购善本书室所藏，益之捐购之本，至今海内各省图书馆，美富以江南为冠。

戊申，张文襄管学部，疏荐特旨征召，以图书馆事未竟，请缓行。宣统纪元，学部奏充京师图书馆正监督。次年，至京，召对养心殿，诏以学部参议候补。时图书馆犹未建，暂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藏之所。既任事，先分类清理书籍，内阁大库检出元明旧秩，其中宋本犹为元师平宋时由临安秘阁所收，一鳞片甲，有自来藏书家所未睹者，集刻为《宋元本留真谱》，牒文碑学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又编本馆善本书目八卷，各省志书目四卷。

初，江苏议修通志，延为总纂。当事屡更，迄无端绪，至是始重定例分授协纂诸人，克期编辑，意俟京师图书馆规模略具，书目编成，即乞长假，专办志事。无何，湖北兵变，东南诸省应之，诏下逊位，海内云扰，先生亦辞职归矣。自是卜居沪上，慨叹沧桑，杜门不出，惟以书籍遣日，整理旧著。四方知旧，大都避乱来沪，访书问字，踵接于门。国变后文献凋零，咸惧国粹湮没，购书刻书之风转盛。吴兴刘翰怡、张石铭两君，并哀集丛书，咸向就正。武进盛氏，自建图书馆，虽无秘册，通行精本甚备，亦请编书目。寓沪遗老结诗社，先生年最高，称祭酒焉。

甲寅，清史馆开，赵次珊尚书聘为总纂，先生身为旧史，生平网罗文献，有遗山、石园之志，欣然应招。先为条举大纲，贻书商榷。及至馆，与同人集议，开馆之始，多所赞画。因不能久居京师，赵尚书许携书自随，以国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初稿原出手纂，后经他人增改，仍愿引为己任。阅两年，除《循吏》一传让归他手，余四传皆脱稿。又成《土司传》、《明遗臣传》，则国史所未具而创辑者也。又拟全书凡例一卷，又遍阅《明史列传》一过，发明其每卷编次义法，笔录寄馆，以备印证。甲辰、戊午，两次至京，商办史事，力主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久之乃定议。自任康熙一朝，而时局日纷，牵于生计，遂分日力于所任史传，仅脱稿十之六七，每自引以为憾。

江苏通志重议开局，冯梦华中丞主之，以金石一门，非专家莫办。先生命子僧保预其事，自发家藏搨本，编录考订，一手成之。江阴续修县志，先生为定大纲，延里中耆旧通才任分纂，而自总其成焉。

先生三十通籍，早负时望。以性刚不能偕俗，弃官时甫逾五十，取竹垞语，以

“七品官归田”刻小印，用识微尚。后勉应召，一出本拟，即赋遂初。寻遭世变，终隐海滨。溯二十年来，名山坛坫，著述自娱，自谓不以富贵易其乐也。己未春，感疾，寻愈，犹铅槧不辍，《江阴志》及《通志·金石》皆于是秋告成。十一月初一日，卒于上海寄庐。

先生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有清一代经说，搜罗甚勤，王葵园先生续刻《经解》，多所取资。早膺史职，乙部致力最深，拾遗订误，悉本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家法，于当代掌故，征求讨论，心得甚多。为文私淑《全氏鲒埼亭内外篇》，以翔实为主，不尚空言。凡考古、述今、论治、论学，生平蕴蓄，皆于文集中见焉。骈体少喜《小仓山房》，后乃取法北江，出入骈轩，亦归纪实，而戒浮靡。诗多指事类情，主雅贍，不矜格调。晚好辑词，而不多作。酷嗜金石，先后得刘燕庭、韩小亭、马砚、孙瑛、兰坡、崇雨舫、樊文卿、沈韵初诸家所藏搨本。宦游所至，又得打碑人李云从、聂明光等，并喜搜访于畿辅、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搨几遍。所编收藏目录，共得一万有八百余种。凡伪造摹刻、无地可靠者，皆不录。砖与瓦亦不预。复续得千余种，藏本之富，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又补正孙、赵两家《访碑录》，为《金石分地录》。初拟补续《金石萃编》，先就辽、金、元辑录，以非独力能成，辍而未作。考证未有专书，散见文集、笔记、及《顺天》、《江苏金石志》中。目录之学，贯串古今，尤慕士礼居黄氏，早年助潘文勤公搜辑黄氏题跋，编刻行世，续得者江建霞及邓秋湄分为刻印后，复有得经章式之、吴印丞两君荟萃诸本，各将所得增入，合为一编。晚乃索稿刊成，海内藏书瞿、杨、丁、陆诸家，皆至契，互通借阅，资以钞校。自编《藏书记》，欷然谓限于力，仅可与阳湖孙氏、王松园相颉颃，《续记》及《再续记》，较初稿数且过之。所校刻石书，详溯源委，剖析异同，具载于序跋。论者谓与尧圃书跋允称同调。秘词孤稿，以力薄不能多刊，每贻同志好事者，如张文襄、王葵园、刘聚卿、刘翰怡、张石铭诸人所刻丛编，每有赞助。盛愚斋刻《常州先哲遗书》，则全出先生藏本，编校亦一手所成。原拟分为三集，写定目录，因辛亥之变，就已刻者结束，尚余二十种，存俟同乡后来者赅续之。笔记积数十册，皆关掌故。晚年志在理董，略创类例，拟删去重复琐屑及习见者，未及编成，藏待来者。其著述已刻者，《艺风堂文集》八卷，《续集》八卷，《辛壬稿》三卷，《乙丁稿》五卷，《金石目》十八卷，《读书记》四卷，《藏书记》八卷，《续藏书记》八卷，《辽文存》六卷，《续国朝碑传集》八十六卷，《常州词录》三十一卷，孔北海、魏文靖、韩致尧、李忠毅年谱各一卷。未刻者《诗存》四卷，《词》一卷，《尺牍》二卷，《金石分地录》二十四卷，《再续藏

书记》不分卷,《碑传集补遗》十四卷,《秦淮广记》十二卷,代端陶斋撰《壬寅消夏录》若干卷。所刻丛书:《云自在龕丛书》五集,共十九种,《对雨楼丛书》五卷,《藕香零拾》三十八种,《烟画东堂小品》十二种,自辑古书及国朝人小集、家集,皆在其中,《对雨楼》刻成,赠友,余板并藏于家。孙桐同乡里,申之以婚姻,在词馆为后进,熟闻绪论,知先生有经世才,生平遇奇,仕宦不达,以著述终老,晚预修史,亦未能行其志,不得继美石园,世所同惜。身后未十年,藏书已散,则尤深慨叹者也。曩曾据自编年谱,兼证著述,代其家草《行述》^①,兹复为要删略,具学行梗概,俾后之传儒林、文苑者,有所採择焉。辛未季秋,夏孙桐谨状。

林颐山 王亦曾 陈昌绅 华世芳 丁立钧

林颐山

林颐山(1847—1907),字晋霞,号蒙溪,浙江慈溪人。宁波知府宗源瀚创设辨志文会,黄以周主汉学讲席,林颐山为院中高材生。黄以周于光绪甲申年(1884)主讲江阴南菁书院,一年后,林颐山也应江苏学政黄体芳之邀,于乙酉年(1885)入江苏学幕,阅算学卷。林颐山那时的科名还仅是个廩贡生,但学问很好,经学精湛,尤其对礼学的研究,造诣很深。

黄体芳去任后,又应王先谦、杨颐、溥良等历任江苏学政之聘,继续留在学幕中,深得王先谦等人的敬重,并助王辑《皇清经解续编》。当王先谦友人萧穆为《续经解》事,访王先谦于江阴学署,见到林颐山,对林的品学赞不绝口。萧写信给薛福成:“穆前在江阴,曾以此书(案:《水经注评注》)自携,王益老谔为奇物。……其幕友有慈溪林君颐山,笃学好古,粹然君子人也。”^②七八年中,林颐山一直没有离开过江阴。期间,林颐山还经常以学政幕友的身份,协助老师黄以周批阅南菁课卷。

光绪十七年,浙江学政潘衍桐上奏“教官学行卓著请旨奖叙”折,另附片奏:“慈溪县廩贡生林颐山,究心经术,怀清履洁,着以教职选用。”九月,上谕:“该部知道。”^③而林颐山就在该年中举。浙江乡试副主考费念慈,试事毕后,写信告诉缪荃孙:“弟浙闱所得士,以林颐山为最。(经义五道皆进御,得卷迟,故闱墨未刻

① 《行述》末有:“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初九日,卒于己未年十一月初一日,寿七十有六岁。”

② 萧穆复薛叔耘函,萧穆:《敬孚函稿》,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8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七年九月,第2981页。

人。)……而夫己氏^①专看头场,取墨卷,通经能文者皆为所摈。又坚不示人,如林颐山、杨积芬、姚陞闻卷皆在东堂,偶为弟所见,始得取中。林、杨两卷,又屡为弟言欲撤去,后因属弟定元魁,遂皆前列。”^②那么,如不是费念慈的坚持,林颐山此次乡举危矣。明年,林颐山连捷中壬辰科进士,分发江苏,以知县补用。

林颐山实际并未真正踏入官场,而是仍回到江阴,不过,这次不再专做江苏学政的幕友了,而是与他的老师黄以周分主南菁书院讲席,黄仍主讲经学,林则主讲古学,大概林至此才有了院长的名分。此时的江苏学政是溥良,溥良又恢复了王先谦时定下的南菁旧章,即一书院聘请两院长。关于林颐山主讲南菁事,《清儒学案》则称:“迨通籍后,服官江苏,淡于荣利,著述不辍。继黄徵季主讲南菁书院,教士一秉遗规,士林翕服。”^③此处“主讲南菁书院”不假,但“继黄徵季主讲”、“一秉遗规”云云,实误。林并非“继”黄,而是与黄分主讲席。

林颐山好像从未授过江苏知县的实缺,但有“服官江苏”的记录,那就是在甲午江南乡试中担任过房考官。据他的南菁学生吴稚晖记载,该科江南乡试榜发后,“素行、杨模皆出林颐山房里,人必有藉言了”。^④素行,即范蠡,范与杨模都是无锡人,且都是吴稚晖在南菁书院的后先同学,如今两人乡试得中,且都出于他们的老师南菁书院院长林颐山的房中,那么,人言藉藉,令人可畏,所以吴稚晖有此感叹。

林颐山大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离开南菁书院,赴苏州就任江苏书局提调官,又委充学古堂提调兼学长。林任南菁院长约有四、五年之久,实际上,他助老师黄以周批阅南菁课卷,早在黄体芳、王先谦学政任内就开始了,只是那时没有院长的名分。所以他与南菁的关系,几乎与黄以周跟南菁一样的亲密。

林颐山主讲苏州学古堂也有很多年,因学古堂的学生张煜在光绪癸卯(1903年)科江南乡试硃卷中,还提及老师林颐山。^⑤林颐山继其师黄以周,也曾主持宁波辨志精舍经学斋讲席。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成立礼学馆,礼部尚书溥良邀请林颐山和孙诒让担任总纂,遭林拒绝。于是,溥良亲自修书再次诚邀,由林颐山的南菁学生曹元忠代

① 该科浙江正主考为山东安邱李端遇,时官通政司副使。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书第一百〇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71—372页。

③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八十三《曲园学案》,第七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97页。案:黄徵季,点校本误作黄季徵,径改。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之《锡报》,第150页。

⑤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笔,此时,曹正任礼学馆纂修。书称:“徒以劳形案牍,未暇笔札,使儿子隆奉书左右,不能致敬尽礼,诚为愧心。”因前信由儿子毓隆所写,未能克尽礼节,心生惭愧。“顾与足下论交二十年矣”,“度在知我,必能相谅,而乃不屑教诲,坚辞至再。”很是失望。“每与曹生元忠言及元同先生,恨其不及身亲见,早就大暮。员石可立,伤心赵岐之言;封山不从,太息马谈之命。道长运短,为之於邑。”^①溥良以林、曹的老师黄以周当年不能及身亲见修礼盛举,引为恨事,但希望林颐山不要错失此次机会,能早日北上就职。信中提到“论交二十年”,是指溥良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任江苏学政时,林颐山正与其师黄元同分主南菁讲席,因此,溥良认为,无论公交还是私情,林都不该拒绝。

据曹元弼所作《君直从兄家传》说:“戊申,朝廷立礼学馆,修《大清通礼》,溥玉岑尚书奏派兄为纂修,规划条例,延聘师儒,悉咨访焉。兄由是荐林晋霞大令颐山,张闻远同年锡恭,钱复初孝廉同寿及余。余以苏、鄂存古学堂事,未能入京,林、张、钱三君并入馆为纂修。”^②曹此说略有误,因林与曹、张、钱诸人入礼学馆为纂修(分纂)不同,林颐山入馆乃为总纂。

林被邀为礼学馆总纂而事最终未成,是林已“长逝”。据溥良邀请缪荃孙出山而致缪书,称:“乃以顾问辱劳执事,总纂之役,奏请瑞安孙君仲颂、慈溪林君晋霞任之。属仲颂迟回,晋霞长逝,遂使永明职局,历年而未就;开皇学者,有事于奏徵。……开馆至今,曹生元忠等虽撰条例,尚待裁决。……”^③林颐山逝世于丁未年(1907)十一月,那么,林即便进礼学馆,为时也极短暂。^④

徐世昌《清儒学案》将林颐山列入《曲园学案》为俞樾弟子,亦互见《傲居学案》为黄以周弟子。王欣夫以为“盖其时俞主话经精舍,黄主南菁书院,一时高才往往兼应两处经古课,故俞、黄皆为其师。”^⑤不过,王欣夫也说:“综晋霞之学,坚确精密,尤与黄氏为近。”最重要的是,林颐山与黄以周在南菁朝夕相处十余年,潜移默化,影响至深,俞樾与林颐山师友之谊,如何能与黄以周相比,所以,林颐山应归入《傲居学案》最为确当。

① 曹元忠:《为宗室玉岑宗伯师与林晋霞大令师书》,《笈经室遗集》卷十四。

② 曹元弼:《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曹元忠《笈经室遗集》。

③ 曹元忠:《为宗室玉岑宗伯师与缪艺风京卿师书》,《笈经室遗集》卷十四。

④ 据《慈溪林氏宗谱》卷四《慈支礼行十四公后裔希周公世系表》,称林颐山“光绪丁未,礼部奏调礼学馆总纂,卒于官”,民国十三年铅印本。此由慈溪王孙荣先生提供资料,特为志谢。

⑤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经述四卷四册》,第1156页。

著作概略

《经述》三卷 刻入《皇清经解续编》，为第一千四百二十八卷至一千四百三十卷，真正算是该丛书压卷之作了。卷一有《释井田》三篇，《释赋税》二篇；卷二有《释禄》，《释皇后首服》七篇，《释皇后六服》三篇，《释衽》附《图说》上下；卷三有《释屨履》，《释筮豆》，《释师儒》，《释奄》，《释奴》，《释家》，《释笑》，《释醕醢》，《释福衡》，《释纆綯》，《五齐三酒考》，《土圭测土深考》二篇。

《经述》四卷 手稿本，四册，王欣夫所藏。据王说，“前三卷已刊入《经解续编》，末卷则别题《隶经贖义》，而以其父兆丰名刻入”。《经解续编》第一千四百二十五卷，即林兆丰的《隶经贖义》一卷，原来是其子林颐山所作。王欣夫不禁感叹道，如不是自己亲眼所见林颐山的手稿，还真无法证实《隶经贖义》乃子代父作。王又说：

兆丰笃厚嗜学，所著《周易辑注笺疏》，《毛郑诗考正续》均未完成，其稿亦为余得。晋霞恫其父之毕世辛勤，而姓氏不彰，乃假此一卷书得厕著作之林，固昔时孝子之用心也。^①

《经述续稿》 不分卷，九册，手稿本，王欣夫所藏。据王说，“此手稿九册，十九皆说经之文”。除部分已刻入《经述》、《隶经贖义》及《诂经精舍》、《南菁书院》两文集，“其余约四、五百篇，皆未刻稿也。凡一篇之成，有易稿至四五次者，紊如乱丝，细入豪芒，几非目力可及，用功之精勤，令人钦服。”^②

《群经传授源流考》 不分卷，二册，手稿本，王欣夫所藏。王说：

述群经传授源流者，始于《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详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至清毕沅又用旁行斜上之法，为《通经》、《传经》二表，洪亮吉亦为之。洪居毕幕，疑毕书即洪代作。陆书有亡友吴君检斋疏证，最称咳备。但陆所未及而旁见他书者，例不增附。毕书虽便检查，而不载各家事迹，皆著书之体宜然，读者犹有憾焉。此书依毕书著其一传至若干传，而改为直行。依吴疏陆书，详其传授源流，并据群书碑板增补之，合二书之长于一编。而每经分列家派，尤为精审。如于《易》分孔子《古文易》以下五十五家，分别今文、古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之《经述四卷四册》，第1156页。

② 王欣夫叙述收集林颐山手稿之经过：“三十年前，沪上来青阁从慈溪收得颐山父子丛稿盈尺，并有密校《十三经注疏》、《水经注》等，索值至千金，余见之徘徊展诵，不忍释手，而岁暮囊空，徒呼负负。未几，《注疏》、《水经》均售去，而此破烂丛残无问津者，书友奢望稍杀，又鉴余好之笃，乃贬价至三百金，不得已告贷于友人，抱书而归，旁人之窃笑不顾也。今编《书录》，窃喜颐山一生心血，不至散佚，不可谓非幸矣。”见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之《经述续稿不分卷九册》，第1157页。

文，各以所治之学类属，下逮南北朝，每经皆然。惜至《左氏春秋》止，然所阙不过三之一，而木石基础已具，后有好学者不难循其例而补成之也。案语题“授经”名者，意如石臞之作改题伯申之类欤？原无书名，今据内容补。^①

《三代宫室制度释》一卷，手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颐山尝谓宫室之制，莫重于明堂。其兼有世室重屋之名者，《周礼·考工记·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世室者，宗庙也。”“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宋书·礼志》：“《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然则郑义依《周书·作雒解》，止以宫庙、路寝与明堂同制，而灵台、辟雍不得与明堂混矣。乃《文选·东京赋》注引《三辅黄图》“大司徒马宫奏”，《隋书·牛宏传》引马宫、王肃说，合明堂、辟雍、太学为一处。《左文二年传》正义引左氏旧说，及贾逵、卢植、蔡邕、服虔等说，合祖庙、明堂为一处。《诗·大雅·灵台》正义引蔡邕《月令章句》、卢植《礼记》注、颖子容《春秋释例》，又贾逵、服虔注《左传》，皆合灵台、辟雍、祖庙、明堂为一处。皆非郑意。至《初学记》明堂引“《尸子》：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虞舜以前，书阙有间，阙所不知可耳。于是力持郑义，成《释夏世室》、《释殷重屋》、《释周明堂》上下、《释宗庙路寝明堂丈尺不同》、《释宗庙路寝同制》六篇，而扉页题“经传郑义通释”，题首标“宫室类”三字，意欲遍释周代礼制，若其师黄以周《礼书通诂》，而创始于宫室欤？兹为改题今名以符实。古称议礼如聚讼，又称礼是郑学，然则治礼者，舍郑君之说则徒滋其纷纷耳。颐山治礼确守郑氏，读其《经述》可见，此六篇者，尤陈义坚卓，引证浩博，可谓善于说礼，殆属草在后，故未编入《经述》也。^②

《三礼郑注引汉制度考证》不分卷，三册，手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汉叔孙通作礼器制度，犹在《周礼》未出以前，而身为秦博士，得见先秦旧籍，所采古礼，悉与《周礼》暗合。故《周礼》郑注引用独多。他若萧何《汉律》，扬子《方言》等书，足与礼器制度相发明者，亦无不备引以释《周礼》。盖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周世去今久远，不依据汉制度，乌足以知《周礼》制度所留遗。至宋王伯厚撰《汉制考》，附《玉海》之后，纂辑《周礼》、《仪礼》、《礼记》、《毛诗》、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群经传授源流考不分卷》，第1158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三代宫室制度释一卷》，第1137—1138页。

《尚书》、《论语》、《孟子》、《国语》、《公羊》、《说文》、赵、许、郑、韦、何、伪孔旧注引汉制度，而郑注居四分之三；郑注引汉制度，而《周礼》独居三分之二。其所以较群经尤详备者，郑君传经，以《周礼》为宗旨，故虽群经中类与《周礼》不合，乃是诸侯与天子制度不同，及夏、殷旧制，桎、文霸制。则凡以汉制况周制，为郑注考证缘由，宜先从事于《周礼》。唐贾公彦疏、清惠士奇《礼说》、孔广森《礼学卮言》，言之犹嫌不详，颐山更遍及三《礼》，为博采群书，疏通证明，于《周礼》草创粗具，密行细字，乙注涂改，备见简练揣摩之功。考之南菁书院《续经解》所刻《经述》，凡释《周礼》者全出于此，即以其父兆丰署名之《隶经臚义》中，《周公称王说》亦采自《天官序》，惟王建国注、周公居摄作《周礼》云云考证。盖其时未及成书，乃截取其篇幅较长者，别著题目，于篇首补列数行，改成单篇经解以付刻耳。然所截取者，仅十之一二而已。今遗稿零落，转赖此已刻之一二，可见其书之浩博无涯。章太炎先生称其得定海黄氏之传者，读此书也益信。^①

《水经注笺疏》存一卷，附初稿一卷，二册，手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此存第一卷为河水一，尚未毕，写清定本一册，又初稿一册。注“笺曰”者，采明朱谋玮《水经注笺》语。《疏》曰者，颐山自疏语，博采群书，及全、赵、戴诸家说，而校误订疑，折衷阐发，殊为精密。于戴校亦时贡其疑，如《注》引《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戴云：“此十六字当是注内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间。”颐山谓：“据《类聚》、《六帖》、《御览》引《物理论》，并有‘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十一字，乃《物理论》承用《尔雅》文，则知《注》节《尔雅》文以免重复，即赵校《刊误》所谓截取之妙也。戴校恐非。”又《注》引“《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戴云：“此十三字亦《注》内小注，故录在所引《山海经》间。”颐山谓：“《海内北经》本有冰夷人而乘两龙句，《注》因《括地图》叙冯夷事较详，因别引《括地图》十字，节《海内北经》七字，以免重复，即赵校所谓截取之妙也。若以《注》引《括地图》为《注》中注，其将以《海内北经》冰夷人而乘两龙句为《经》中注乎？且河水又出于阳纒陵门之山，《注》变《海内北经》文以叙河水所出，非引《海内北经》原文也，汉魏六朝所注书，从未闻有注中注者，全、戴、赵校并有此说，窃所未详。”

案：俞樾《九九消夏录》云：“全谢山称其先世所闻《水经》一书，《注》中之注，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之《三礼郑注引汉制度考证》，第1133—1134页。

本以双行夹写，今皆作大字，是以混淆莫辨。于是赵一清用其说，辨别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分写之，成《水经注释》。然此可为读《水经注》之善本，若竟以为古《水经注》之真本，恐亦未必然也。”是《注》中有注之说，创自谢山，曲园亦不信也。颐山于此书用力甚深，余别得其手稿数册，细字如蚁，均摘录有关资料，而十九皆用朱笔抹去，盖既经采用，作此标记。又见局刻本，亦眉头行间，朱墨皆遍，悉逐写群书，尚未整理者。观此清本，又考《丛稿》有《静斋诗稿序》云：“今年春见颐所著《水经注笺疏贻稿》一卷，乃遭癸未之变，灰烬所余者。爰作七古一首，以亟为续补相劝勉”云云，知确既成书，而惜为六丁所收，仅残存一卷耳。故徐世昌《清儒学案》于颐山系据家述所纂，亦云“有《水经注笺疏》稿，不传”也。全书若存，虽不知视杨氏守敬《疏证》何如，然必可并传无疑。……①

《战国职官考》 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线普 431115）。

《鸣阴楼文存》 不分卷，一册，木活字本。

又据民国十三年所修《慈溪林氏宗谱》，林颐山尚有《群经音疏补正》、《十三经校勘续记》、《医经通考》等稿待梓，则林之著作可能大都散佚。

王亦曾

王亦曾（1839—1913），原名桢，字少蘅，一字鹤琴，^②号遂圃，吴县人。同治六年（1867）丁卯并补行咸丰辛酉科举人，七年后，中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年（1877）散馆，以知县即用，选授广西阳朔县知县。

光绪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调署藤县知县，勤政爱民，士颂民戴。谁也没料想到王亦曾在任不久，便卸去职事，径自回到省城，向上司提出，自己实在不能胜任县令此职，情愿改就教职，回籍候选。当时的广西巡抚张树声竭力挽留，但王亦曾去意已决，张虽为之惋惜，也只得在王上呈的公牍上，写了两句颇有方面大员风度的批语，含蓄而又隽永。王亦曾的同乡后辈王同愈曾在其《树缘随笔》中记有此事：

吴县王鹤琴（亦曾）先生，甲戌庶常散馆，^③知阳朔县事。以文学侍从之臣，出为风尘俗吏，殊乖初愿，未几，改教官归。巡抚张振轩欲留之不得，批其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二之《水经注笺疏存一卷附初稿一卷》，第1213—1214页。
② 见王亦曾之同治丁卯并补行咸丰辛酉科乡试硃卷，王自称“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少填三岁。顾廷龙编《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案：此句应点断：“甲戌庶常，散馆”。王亦曾是甲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所以称甲戌庶常，三年后才散馆，时已丁丑。又，称庶常，而不称翰林，因王散馆考试不尽如人意，未能留馆授职编修故也（王是二甲进士）。

牍云：“千里萼羹，一盘苜蓿。虽从高志，各有愧颜”云云。颇似白敏中之于孔温业也。（唐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辈亦须自检点，孔吏部不肯居朝矣。”）^①

大概王亦曾还未离开广西，张树声就先调离广西了。后任广西巡抚庆裕继续处理此事，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说道：“臣查该员文理尚优，以之司铎，实堪称职。”^②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在以后的几年里，仍留在了广西，大概被邀入抚幕了。曾肄业于南菁书院多年的无锡孙毓修，于民国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中，以“绿天翁”的笔名，登载了他的老师王亦曾所写的一副挽广西巡抚徐延旭的对联，并简述当时的背景：

光绪甲申，法越之战，徐晓峰延旭抚桂，兵败获谴。后又起用，旬月卒于位。时王鹤琴师以知县需次，徐公相爱殊甚，留置幕中。及卒，师輓之云：“圣主惜奇才，待公以鲁曹沫、秦孟明，遽贲志以终，恨未睹犁庭扫穴；末僚承下问，爱我如夏侍郎、张阁部，竟知音尽逝，忍重弹流水高山。”^③

那么，光绪十年（1884）时，王亦曾还以“知县需次”的身份在广西巡抚徐延旭幕中，并未为“萼羹”而“千里”回籍，且还没有去当那个安于“一盘苜蓿”，过着清苦生活的教官。

但王亦曾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回籍候选。大概一时尚未有实缺可补，就于光绪十五年（1885）去湖北呆过一段时间。不多久，就职徐州府教授。^④虽同是官居七品，而作为一邑父母官的县令的岁入，府学教授是望尘莫及的。王亦曾舍县令而就教职，固然有“以文学侍从之臣，出为风尘俗吏，殊乖初愿”的因素，但此举不脱读书人本色，实是难能可贵。

王亦曾大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主讲江阴南菁书院，也许此时王亦曾正丁忧在籍。王在南菁讲学时间不长，后又赴徐州教授任，海诱诸生多年，至少在壬寅年（1902）还在徐州啃冷猪头，嚼苜蓿草。^⑤其间，王还执教于江宁之江南格致

①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之《树缘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② 《数位典藏》网，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明清内阁档案，广西巡抚庆裕奏折。

③ 绿天翁：《挽徐延旭》，载《小说月报》第三卷第十二号。案：徐延旭在广西巡抚任上，兵败获谴，后并未“起用”，孙毓修此说似有误。

④ 案：《清实录》光绪十七年辛卯，八月庚申，“以司铎称职，江苏徐州府教授王亦曾下部议叙”。则王亦曾就任徐州府学教授，应在十七年（1891）以前。至十七年，王已以“司铎称职”，教学有方，而“下部议叙”了。

⑤ 丹徒监生许济菜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他在乡试卷“受业师”栏中称：“王鹤琴夫子印亦曾，甲戌进士，现任徐州府学教授。”顾廷龙编《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

书院(江南高等学堂)。^①不久,王致仕返回故乡,曾被聘为苏州府中学堂总教习。王在中学堂还教授诸生国文,据学生郑逸梅回忆:

授国文者,为老太史王鹤琴,学识渊博,书作率更体,极停匀工整。对学生循循善诱,和蔼可亲,令人如在春风化雨之中。某次,学生文课,谬用“而”字,鹤琴加以眉批云:“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连用“而”字,点明虚词之慎用,可发一噱。^②

王亦曾虽是传统文人,但思想并不保守。湖北沔阳卢靖(号木斋,光绪末年曾任直隶提学使)著《释公债》,王手批此书钞本,凡觉得有疑义之处,加上签条,粘于页眉,书后写有总批:

荆棘中顿辟康庄,足令杞忧人喜而不寐,况此事在中国为特创,在环球则为善因,成效已见,所欲理财者急起直追耳。小有疑义,各签于眉,未知是否,然但能举债以专兴实业,已可略抒目前之患矣。王亦曾识。^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十二月,苏州雷允上药铺主人雷文衍(号滋蕃)编辑《富贵宝笈》一书,收有不少当时吴地名流的文章,时年七十的王亦曾,亦被邀写《座右铭》一篇,录入书末。该《铭》虽应雷之请而作,然亦是夫子自道,全录如下:

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矜,矜则不长。尤人不如尤己,好贤不如好方。用晦则莫与争智,撝谦则勿与争强。多言为老氏所戒,欲讷乃仲尼所臧。妄动招悔,何如静而勿动;太刚则折,曷若柔而无伤。吾见进而不已者败,未见退而自足者亡。为善斯游君子之域,作恶则入小人之乡。吾侪当书绅以自警,刻盘而若伤。惟常存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④

此铭实在看不出有何儒家风范,只见到道家柔而不刚的说教,也许是他二十年冷官生涯的阅历总结。

王亦曾在辛亥年(1911)二月曾刻过一本《卑论》,书名或是作者自认所作“卑之无甚高论”的自谦之词。作者自称所收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在当日自认为切中时弊,不想时至今日,“旧弊未去,新弊复生”,时势更是岌岌可危,恐已无可救药。

① 《故苏州府中学堂总教习王鹤琴先生纪念碑》,改碑现在苏州第一中学(原草桥中学)。

② 《郑逸梅选集》第四卷,“清末府中学堂之耆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473页。

③ 木斋提学著,鹤琴先生批:《卢氏公债说》,雅昌艺术网(www.arttron.net)雅昌论坛,旺旺古斋之帖,2010年9月28日。

④ 《浮生漫记翰墨缘》,《信札十五 同治进士王亦曾信札以及〈富贵宝笈〉》,http://blog.sina.com.cn/kingty2007 发表日期:2013年3月1日。

果不然,该书刊行后数月,清皇朝便终于寿终正寝了。该书末有作者自跋:

是卷强半为四旬后旅鄂时作,后数首则任徐州教授时所续成也。在当日俱自谓切中时弊,忽忽二十余年,事势大变,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卷中云云,遂多隔膜。屡欲改补,而吾衰已甚,竟不能从事矣。爰以旧稿梓而存之,亦无聊之极思已。宣统三年,岁在辛亥春二月,吴中王亦曾遂圃氏识于沧浪亭北,时年七十三岁。^①

陈昌绅

陈昌绅(1859—1900),字穉亭,号杏孙,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寅(1890)散馆,授编修。陈好像并未真正踏入官场,仅在辛卯(1891)做过一次顺天乡试的同考官。陈昌绅闲居京师的时间也不多,一直流寓上海。他在丙戌科会试硃卷中称:“旧居省城小夹道巷,现寓上海格致书院后。”^②陈一直寓居上海的原因,据其同乡好友吴庆坻说,是陈“既授职,将北上,而其母黄太宜人寓沪久,族戚咸在,不欲远离,故杏孙归侍,未尝终岁京居。”^③陈昌绅在上海曾主讲过敬业书院。

陈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北上京师,大概是应试使差,该年是乡试年份,如得售,便可钦派出使各省乡试主考,但似未取中。吴县王同愈日记中有过记载:“丁酉四月廿六,晴。晨,陈杏孙前辈昌绅(丙戌,杭州)来谈。偕缘督出城答拜杏生。……六月十四,晴。贺徐、吴得使差喜。访陈杏孙前辈谈。……”^④于翰林院同僚中贺徐、吴两位得使差之喜,而不及陈,说明陈于丁酉年进京谋一使差而未成。

陈昌绅南返上海,大概就在戊戌、己亥年间,陈应江苏学政瞿鸿禛之邀,主讲江阴南菁书院,但时间不长。己亥年冬天,又入都。明年庚子夏天,得病,请假将南归,而义和团起。于是,赤日炎炎,陈昌绅冒暑跋涉,死于山东沂水途中,年仅四十二岁。

陈昌绅是翰林出身,接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但他的思想却极为开通,这

① 薛冰:《大变局中的文人(单论)》,载中国论文网,http://www.xzbu.com/5/view-1370349.htm,2012年4月9日发布。据该文作者自云:“2004年尾,因事去苏州,在古旧书店见《单论》一册,宣统三年刊本,薄薄二十八页,收策论二十二篇,对于晚清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方面,多有建言。书名《单论》,当取‘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意。”

② 顾廷龙编:《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的省城是指杭州。

③ 王先谦:《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虚受堂文集》卷十二。

④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栩缘日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可能与他长期寓居上海而接触西方文化较多有关。当陈于丁酉年入都试使时，平阳宋恕(瑞安孙锵鸣之婿)赠诗一首：

海上闻声已十霜，频年憔悴使人伤。词臣非复兼清切，经义从来寄狷狂。
浊世难为随武子，(甲午之役，君上书执政，陈敌之强，不可与战，坐是得罪妄庸。昔随武子力谏仅与楚庄王争郑，言虽不用，名望益崇，国中尚有公是，宜晋之复兴也。)愚忠能识郭汾阳。(恕尝评李合肥为当世第一愚忠，君深以为然。) 辅轩乘否寻常事，珍重幽兰永吐芳。^①

这首诗尤其是诗中宋恕的自注，让我们对陈昌绅为人有较真切的认识。甲午中日之役，翰林院中衮衮诸公，无一不是慷慨激昂，力主开战，以为灭此朝日，正是时机。而陈昌绅却不识时务，竟然上书执政，认为日本日渐强盛，千万不可轻易与战。陈的这一举动，恐怕得罪的不单是“妄庸”的上司，连同僚们也都难以谅解。宋恕则一反当时的士大夫清议，高度评介李鸿章是“当世第一愚忠”，陈昌绅却亦“深以为然”。两人对时局和人事的认识，如出一辙，似为深交，其实“闻声”虽已十年，相识只不过一年有余而已。^②

陈昌绅编纂有《分类时务通纂》一书。这是他在戊戌年前后，为响应朝廷新政，编纂而成的。当时，光绪帝“欲以时务取士”，“废八股，开特科”。于是，他将十余年间所积累的“时务”资料，按照“谕旨”，分编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大类，各大类下面又细分纲目。这是一部应付科举考试十分有用的资料书，但客观上也成为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时务”书。

陈昌绅有为袁枚编《随园年谱》的计划，但生前未曾完成，至为可惜。缪荃孙大概就此事询问过吴昌绶，但结果令人失望。^③

附：王先谦《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

光绪辛丑秋，吴自修编修庆坻走书告余曰：“陈杏孙死矣，而其不忘亲之心未死也。自其通籍后，遭父丧，不及亲含敛，哀毁柴立。既授职，将北上，而其母黄太宜

① 宋恕：《赠别陈杏生太史入都试使》，时在丁酉正月廿四日。胡珠生：《宋恕集》，第808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乙未日记：“十一月廿四，始识陈杏孙、汤蛰仙于仲琦席上。”《宋恕集》，第935页。

③ 吴昌绶致缪荃孙书第一百通：“陈杏孙是绶亲戚，又是干兄弟，少小至好。庚子匆匆由京南还，殉于中道。有子，不甚得力。前曾索其《随园诗注》，此杏孙手粘十余大册，常携以就质友朋者，绶亦颇有附益。今竟寻不出。绶之继母寿将九旬。今故已数年，其家数徙，恐更难寻觅。《年谱》并未成编，不过因诗注随时条记。至可惜也。”《艺风堂友朋书札》，第900页。

人寓沪久，族戚咸在，不欲远离，故杏孙归侍，未尝终岁京居。每为庆抵言：“吾母子相依为命，不忍以人世浮荣易吾晨昏之乐。”其至性有过人者。己亥冬，入都。庚子夏，病，乞假将返，而寇乱作。犯暑跋涉，六月二十四日没于沂水县双堠镇，年甫四十二，母年八十一，其可哀如是。夫子素嘉与杏孙，其忍不章以文？”

杏孙名昌绅，字穉亭，钱塘人。祖春晓，岁贡生，以诗鸣。父翔鹗，县学增生，候选训导。杏孙七岁能作擘窠书，十六应县、府试，并魁其曹，补县学生。光绪二年丙子举于乡，丙戌成进士，改庶吉士。庚寅散馆，授编修。辛卯，为顺天乡试同考官。甲午大考，列二等，记名，遇缺题奏。妻某氏，子辅相，以某月日葬某原。

余主浙试，得杏孙，榜放，来谒，年未弱冠，风神出群，余心异之。及督学江苏，其中表兄仁和叶槐生维幹，为余称其诗文及其志学之美。嗣杏孙访余扬州，谈经校艺，半月别去。见其学且大成，以为当践历崇显，有所表见。不意不幸至斯极也。

余至交多浙人，两为会试同考官，所推荐尤多浙知名士：义乌朱蓉生一新、会稽李恂伯慈铭、秀水赵桐孙铭最著。居京师，往来尤亲者，钱塘诸幼隳可忻也。而槐生在沪，助余校刊《续经解》至数百卷，为人醇竺而勤敏，博学工诗，貌清癯甚，余窃忧其不寿，未几遂没。余或齿少于余远甚，而皆为古人矣。悲夫，悲夫！人生踪迹难合并，独文字之契，结于性情，弥久而不可磨灭。蓉生、恂伯、桐孙之文，余既刊而传之，幼隳有所造作，谦不肯出，故不能得其一字。昔索槐生遗稿于杏孙，卒不获，以为恨。闻杏孙遗著多散落，今自修经纪其后事甚至，其必使有闻于世矣。余故为文视自修，以贻其孤，使镌石墓上。系以诗曰：

嗟民之生，风飘雨暴。有性斯凝，有文斯曜。赋君以性，弗遂其天。博君以文，弗昌其传。海波翻飞，蹙驾于陆。云胡斯人，而丁斯酷。清庙之器，委于林垆。如日将中，还坠东溟。黄发倚门，迺为儿恸。老泪倾泉，沪涛愤涌。知子犹眠，茹哀九原。有慰其灵，揭此新阡。

华世芳

华世芳(1854—1905)，字若溪，金匱县人。其父华翼纶，道光甲辰举人，官江西永新县知县。其同胞兄华衡芳，著名数学家，“近百年来，海内以算数绝学专门名家者，海宁李善兰外，首推金匱华衡芳”。^①

^① 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1910年铅印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华世芳幼时即颖悟异常，深得父亲钟爱，亲自授读群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及诸子之书。“年甫弱冠，已上下古今，泛滥百氏矣。”年十八，入邑庠，不久，成廩膳生。华世芳从小就受其兄影响很大，喜欢上了数学，家里又藏有数学书数百卷之多。于是，华世芳平时除研习经史百家外，还潜心披阅算书，“不数年，尽窥其奥。”其兄华蘅芳则称：

余年二十二岁，余弟若溪始生。弟七八岁时，余即出门，迄今二十余年，未遑有数月家居也。余素喜习算，凡古今畴人之书，见辄购之，计家中所藏及行篋中时有携归者，不下数百卷。性之所好，不厌其多，以为有此亦足自娱耳。乃余弟于举业之暇，辄发余所藏之书而披览之，因得尽窥其奥，而余未之知也。余自外归，或十余日即出，或数十日始出，家庭晤对，未尝以算学一语于弟，而弟亦未尝以其中之委曲一询于余。迨余著《积较术》，弟始与余论算学，余自此始知弟之已精于算，每有算稿，必嘱弟校之，其谬误之处，弟为余改正者居多。^①

当时，大学者俞樾主讲上海求志书院，华世芳便投卷应课。“其算学题有艰深奥赜、猝不易解者”，但华世芳“悉能洞晓其理”。这样一来，“善算之名遍播士林”。

江苏学政黄体芳听说后，很是欣赏他，就特为调考算学，进入刚设立的江阴南菁书院，时在光绪九年(1883)秋。华世芳是肄业于南菁最早的一批课生之一，与其同学的有娄县张锡恭、江阴章际治等人。光绪十一年(1885)科试，选为拔贡，就职直隶州州判，加州同衔。

华世芳曾入广东、浙江学幕，助阅算学试卷，名声也越来越大。不久，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充任湖北自强学堂算学教员，并分编《洋务纂要》一书，“益研精教育新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主讲常州龙城书院。当时，诏旨振兴学校，华世芳单身一人，兼以经、史、舆地、算学四门功课教授诸生，课务繁重，身体孱弱，但他毫不畏难，对诸生“悉心指授”，赢得众多士子的赞誉。明年冬天，又应江苏学政瞿鸿禨之邀，分主江阴南菁书院算学讲席，这是他重进南菁，但是身份不同了，由十多年前的院生变成一院之长了。与江阴仅一江之隔的靖江(清代，靖江属常州府)，这时也请他去主讲该地的马州书院。“四方承学之士闻风造请”，而华世芳“诱掖奖劝，孜孜不倦”，来学者“各满其欲而去”。“于是成材者众，学界风气因之大开。”

^① 华蘅芳：《恒河沙馆算草·序》，《行素轩文存》，民国二十八年(1939)燕京大学抄本。

不久,龙城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华世芳为之制定章程,认真授课,“独任劳怨”。开学仅五个月,学生便达一百六十名。学堂分科讲授,学生进步捷速。学堂正当蒸蒸日上之时,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大家都感到十分惋惜。

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廷诏开经济特科,尚书瞿鸿禨、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保奏华世芳“算学专家,精通时务,文行兼修,远近奉为师范。”华应选入都,可惜再试被遗。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应聘就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四月,北上京师,充任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算学教员。华世芳一如既往,在高等实业学堂中“口讲指画,不辞劳瘁”。除了每日给学生上课外,还需自己编译讲义,力求“详明晓畅,启发后来”。可惜,所编讲义还未成书,便因患肺疾逝世于学堂,时在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七日。丁福保时亦在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及生理学教习,闻听噩耗,悲痛欲绝:

正月二十七日,天甫破晓,忽从电话中得最惊骇最伤心之一语,谓吾师华若溪先生已于四时病歿也。遂疾驰至实业学堂,入吾师卧室,见吾师慈爱之颜,已变为瘦削苍白惨淡之色,而长须髭尚垂胸际,哭之不闻,呼之不答。诘料余两日前之来此,为最后之永诀也。^①

两年后,无锡、金匱在京官员便联名具呈学部,请求将华蘅芳、华世芳事迹宣付史馆,呈文中称:

该故绅秉性狷介,智识超远,颖特绝伦。生平无疾言遽色,遇人接物,粹然一出于天和,力行四十余年,学无不通,至老益笃。尝于乙酉岁刻所著《恒河沙馆算草》数种行于世,学者谓能阐发中西之秘,发前人未有之奇。尚有《专术举隅》、《今有术》、《双套句股》、《三角新理》等稿存于家。其遗稿之未竟者尚多,惜天靳其材,贵志以歿。……

除上述列举的几种著作外,华世芳还著有《近代畴人著述记》,生前便已刊印,大概已包括在呈文中所说的“尝于乙酉岁刻所著《恒河沙馆算草》数种行于世”之中了。

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丹徒人。其父丁绍周,字濂甫,道光三

^①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9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太仆寺卿。同治九年(1870)，丁立钧十七岁，即中顺天乡试庚午科举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进士，翰林院编修，供馆职十多年。丁立钧严正敢言，在馆虽无言责，却对当时醇王参与大政不以为然，写《大礼议》，请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一说翁同龢)代呈，而麟书不敢上。同乡尹恭保曾写长诗详述此事，后辈学者柳诒徵读后，赞扬乡先贤丁立钧：

尹恭保《赠丁叔衡编修》七古。恒斋《大礼议》稿本不传，得尹诗记之，可以知其主张，盖不以其时醇王参与大政为然。朝士皆知而不敢言，恒斋详考经史立《议》，而翁常熟不敢代上。乡人欲知恒斋风义，读尹诗不啻读其《议》也。^①

甲午以前，丁立钧知东衅将开，撰《历代边事》一书，进呈光绪帝，天语褒嘉，谓有条理。后丁立钧又上书老师翁同和，陈述对边事的忧虑。丁是翰詹词臣，却频频上书建言，公忠体国，风义可敬。

二十三年(1897)外放山东沂州府知府，有人猜想是其岳父徐用仪从中斡旋的关系，缪荃孙致汪康年书：“丁三简沂州府，尚算下得去，想仍是泰山之力。”^②丁在沂州任上，政绩卓著，但因操劳过度，患中风。病愈后，仍留下“半边风”残疾，右足已稍跛，右手也无法握笔作书画画，便改用左手写字作画。二十四年，因病辞官，回到东台(丁氏寓居东台多年，丁立钧便出生于东台)，寄寓扬州。二十五年(1899)应江苏学政瞿鸿禨之邀，接替黄以周，任江阴南菁书院院长。明年，义和团起，丁立钧的岳父徐用仪，^③时任兵部尚书，因反对与列国开战，竟遭诛戮，这对丁立钧的病残之躯的打击不小。

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丁立钧转任总教习。明年七月廿七日(1902年8月30日)，病逝于东台，友朋得此噩耗，伤悼不已。《郑孝胥日记》于该年八月二十五日记道：“得怪弟书，丁叔衡卒于东台，实七月廿七日，伤哉。”《张謇日记》八月二十六日记道：“得丁氏讣，叔衡疾卒东台，忧患之交又弱一个，可胜痛悼。”^④

① 柳曾符辑其祖柳诒徵所撰《里乘》卷五，“十、丁沂州”，载《镇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案：柳诒徵称翁同龢不敢代上丁疏，此说不知何据。据丁传靖《补记恒斋公轶事》则称“满掌院麟芝盒相国见公疏，错愕不敢递”，或为翁同龢讳？未知孰是。

② 缪荃孙致汪康年书第七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3页。

③ 丁立钧同治庚午顺天乡试硃卷履历栏内填道：“续聘徐氏，道光乙未科举人、湖州府同知槐廷孙女，咸丰己未科举人、三品衔候补五品京堂、军机处行走用仪公次女。”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④ 均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第273页。

附：第二十七世叔衡公事略（弟立棠谨撰）

君讳立钧，字叔衡，号恒斋，濂甫公子，以咸丰四年生于京师，同怀三人，君其季也。少颖异，过目辄成诵。十岁能属文，见者许为大器。年十七，以国学生应庚午科顺天乡试，遂登贤书。嗣丁内外艰，服阙，应庚辰科礼部试，中式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己丑，充顺天乡试同考官。辛卯，奉命典试湖南，所得士皆一时俊彦。甲午，廷试一甲三人，君所取士居其二，同辈艳之。供馆职十余年，历充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大考二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越一年，以支病乞罢郡，适会典馆议叙，擢道员，遂以此去沂回籍。主江阴南菁书院讲席，逾二年，改办学堂，心力交瘁，病益剧，于壬寅七月卒于东台旅舍，春秋四十九。

君姿稟英毅，学术以忠孝为根本，髫髻事庭闱，有至性，父母兄弟无间言。官翰林，时值甲午中东之役，君忧懣不能平，邀同辈上公疏，举劾庸臣悍帅不遗余力。乙未，和议将成，君力争和款，疏凡三上，不报，此一年中，君忧劳几忘寝馈，人以越职讽君，君弗恤也。先是，著有《大礼议》一卷，以濮议为不及，兴献为太过，主纯庙濮议，辨大旨而阐引之，缮疏乞上，抑于长官，未果。然其后醇贤亲王薨逝，廷议大礼，卒采其言，同列始以君为知礼。甲午以前，君知东衅将开，撰《历代边事》一书，进呈乙览，天语褒嘉，谓有条理。君之竭忠尽诚，不限于厥职者，类如此。其守沂也，海城李公为抚帅，素知君能，拳拳以捕盗相属，君下车之始，即假行部为密侦，复捐廉伙办马队，期年之中，获剧盗十余人，所属积案为之一清，李公奏保君通省吏治第一。其他请修水利、缮城堡诸议，虽或行或不行，然君之心固无日不兢兢也。澄江书院多东南俊髦，君诱掖奖励，语以有用通变之学，每论及中外近十年大事，泪辄涔涔下，多士感奋。辛丑，大同李公改办学堂，君力任其事，外而章程，内而学课，具不肯为苟同苟异。复博访当时通人硕儒，有一说善于己者，从之如流，故南菁学堂之规则，经年而后定焉。此又君之退不遗世、病不怠学者也。

君生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即于是年十二月卜葬于邑西乡留山之东支。

补记恒斋公轶事（侄传靖谨述）

谨按：公生平事迹，其荦荦大者，具见七叔所撰《事略》，尚有为《事略》所未详者，谨缀拾如左，亦不贤识小之意耳。

公由庶常假归，道出津门，时曾威毅伯权直督，公以濂甫公与文正有旧，乃上书威毅，微规其措置之失，其后威毅语人曰：“某此次权北洋，无一善状，惟喜得丁太史一纸规过书耳。”其引重如此。

官编修时，醇贤亲王就养藩邸，邸中近侍倚王势，稍稍预政事，公具疏历陈前代亲藩预政之失，请旨申禁，以保贤王始终，词义切直，浼掌院代奏，满掌院麟芝鑫相国见公疏，错愕不敢递，然由是雅重公，其后屡派馆差，并开列京察皆以此。

到甲午大考二等，分班引见，今上垂询平日治何事，公以修边史对，上颌之。越日，命掌院翁协揆传谕，以所著书进，公恭缮进呈，天语褒许。会中东事棘，上亦不复措意。

明年秋，拜守沂州之命，时东抚为海城李公，夙耳公名，先寄书京师通殷勤。山东，相得甚欢，遽欲调首郡，公辞焉。沂故盗藪，历任守令多选懦，不敢名捕，公捐廉治马队，购线勇，获剧盗十余，飞禀大府，批回立处决，幕中司刑名者进曰：“今日星家所谓天赦刑人，不利本官，盍缓至明日？”公曰：“吾为民除害，刻不容缓，时日小数，何足避忌。”立命行刑，时漏下已三鼓矣。积年巨盗一时骈首，郡内大安。属邑有教案，公持平判结，教士服，百姓亦服。沂州无书院，公集资创设，并以自藏书籍捐置其中。胶州事起，沂之属县壤相错，时公已积劳成疾，属幕中具禀大府，请截留上忙钱粮，为城中缮备。幕宾骇然谢不敏，公乃扶病起坐，自缮文牒，请于中丞海城，遽允所请，并檄公曰：“卧治足矣，毋以疾辞。”其后疾日剧，适会典馆议叙，以道员分省补用，乃开缺归。出境之日，沿途父老额手以祝曰：“愿公病速愈，仍到山东做官。”其得民心如此。

庚子变起，海城奉命入援，过江阴，访公于讲院，公念旧日相知之雅，为之力言新招卒伍不足恃，洋兵不可轻敌。李公魁其言，然事已无及，其后卒致溃散。又上书南皮督部，请率劲旅入卫。盖公虽以病退，其心未尝一日忘国事也。

官京师时，声誉隆起，一时贤士皆愿纳交，尤与盛伯熙祭酒、黄仲弢学士、郑苏鑫京卿、王可庄太守、沈子培太守称莫逆，尝语传靖曰：“此数君子，皆人杰也，其余谬得时誉而中无所有。”如某某者，公常目笑存之。平生笃于师友，与陈弼丞编修友善，陈君卒，公哭之恸，存问其家，岁时不绝。庚子，至常熟省视翁协揆，协揆平日以公辅期公，见公病状，为之失声叹息，留公剧谈数日，语及国事，相对呜咽。继而评论书画，商榷文史，乃复破涕为笑。其后公卒，协揆寄联挽之，其词曰：“有大礼议，有朝鲜篇，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

过江一别太匆匆。”足以括公之生平矣。

主南菁书院讲席，多士望若山斗，提奖所及，士为起舞。时止龠尚书任江苏学政，院中事一惟公言是从。一日，尚书访公以江苏人才，公历举知名士，并齿及传靖，尚书不以为私也。寻调往澄江讲院，侍公起居者月余。时公右腕已废，以左腕作书，弥复苍劲。夙工六法，神味超隽，病后亦以左腕为之，语传靖曰：“吾病来，百事都废，惟画差胜。”以淡墨仿耕烟法，写便面以赐，曰：“见画如见余矣。”其后，南菁遵改学堂，又言于大同李荫墀侍郎，欲以传靖充校长，传靖自惟不中学堂程度，不欲滥竽，谢未往，负公厚培，至今憬憬。是年七月，公遽卒于东台寄寓，其后葬牛山之麓，至今尚未展谒云。^①

郑孝胥《清故沂州府知府丁公之碑》

光绪甲午以前，海内无事，上下嬉娱，朝野方依赖北洋，而丹徒丁公立钧独抱深忧，斥合肥李公鸿章甚力，撰《历代边事》一书，以进于朝，朝廷黜之，然不能用。未几而日本战事作，于时丁公言虽不行，实有重名于朝，其切直不阿，为众所惮久矣。南皮张公之洞素未识公，闻将乞外，致书止之，谓“正士去，则朝廷轻，公不可去。”湘乡曾公国荃权直督，公以书规其失，曾公语人曰：“某来北洋，惟喜得丁公一书耳。”久之，出知沂州府，沂故多盗，公捕斩其魁十余，郡内晏然。海城李公秉衡上公治状第一。逾年，以末疾去官，主讲江阴南菁书院。壬寅七月卒，年四十九。

公讳立钧，字叔衡，年十七，中式庚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庚辰科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己丑，充顺天乡试同考官。辛卯，奉命典试湖南。历充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以会典馆议叙，擢道员。皇考绍周，以编修历官至光禄寺卿。子三人，公其季也。夫人邵氏、徐氏、李氏。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葬公于本邑西乡留山之东。所善友人闽县郑孝胥既书其实，又系以铭。铭曰：

积骄且衰，居我要津。世推老成，公独不然。愤军辱国，得倭于天。方其未败，孰能昌言。以公之气，乃屈于官。既屈于官，复厄于年。吾谁与归，斯亦九原。

^① 两文均录自镇江绍宗楼藏《丁氏族谱》，由东台柳书诚先生提供。

第二节 院 生

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十五年(1884—1898),又遥领宁波辨志文会(精舍)汉学讲席,著籍弟子不下千余人,弟子中后来成名发家者指不胜数。然而,自改学堂后,经学地位一落千丈。进入民国,真正传承做季学术者,廖如晨星。做季弟子常熟孙雄四十年后回忆南菁同学,就曾感慨道:“做居学派今消歇,落落晨星仅有存。”^①作为晚清经学重镇的南菁书院,经学有专攻、著作有影响的所谓“仅有存”者中,以张锡恭、曹元忠、曹元弼,陈庆年、赵圣传,唐文治,胡玉缙、于鬯等最为著名,除赵圣传、唐文治、于鬯外,其他诸人的传记,略行谊而重著作。

庄蕴宽、吴稚晖、钮永建等,虽经学非专攻,经世业绩却可圈可点。谢钟英、孟森、丁国钧等,在史学上卓有建树。丁福保、蒋维乔、金松岑等,于经学亦不甚措意,但在其各自的学术领域内成绩卓著。汪荣宝活跃于外交界,本质上却是传统学人。江淮诗人朱铭盘、陈玉树,又分别以史学、经学名世。

张锡恭 曹元忠 曹元弼

张锡恭

张锡恭(1858—1924),字希伏,号闻远,又号殷南,松江娄县人。本生祖张允垂官杭州府知府,父张尔耆,庠生,闭户读书,修身立德,世称夬斋先生。张锡恭幼承庭训,深造自得。年二十,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九年(1883)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先后师从张文虎、黄以周和缪荃孙。黄以周是礼学大师,张锡恭问道请业十余年。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拔贡,十四年戊子(1888)中江南乡举。二十五年(1899)应张之洞之聘,任两湖书院经学分教。三十四年(1908)进京任礼学馆纂修,与南菁同学曹元忠、钱复初等纂修《大清通礼》。民国建立,张锡恭以清遗民避世遁隐松江小昆山,足不履城市。甲子(1924)战乱,避难于从外甥封文权家,九月病逝于封家。

著作概略:

张锡恭研究三礼,宗守郑注,是黄以周礼学之嫡传弟子。张于礼学中,以对丧

^① 孙雄:《丹徒陈善徐征君庆年逝世赋七律四首哭之》,《旧京诗存》卷一。

礼的专门研究最为精深,《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是其传世之作。

《丧服郑氏学》十六卷,民国戊午(1918年)刊入《求恕斋丛书》。刘承幹《序言》:

……本朝经学昌明,言礼学者,知宗郑注,然确守家法,无一语出入者,甚鲜。年丈张闻远先生潜心礼服,尝撰《释服》及《丧服异谊驳》各若干篇,皆笃守郑君家法,无一语出入。及朝廷开礼学馆,被征为纂修,承修丧服。馆课之余,成《丧服郑氏学》十六卷。其于注也,有申而无破;其于疏也,全录而不遗。于诸儒之言,发明注谊者,甄录之;与注立异者,明辨之。疏亦有误会注意者,虽录其说,而必辨其非。其择之也精,守之也约,可谓治经必守家法者。闻诸先生自言,曰:《经》有十三,吾所治者唯《礼经》,《礼经》十七篇,吾所解者唯《丧服》。注《丧服》者众矣,而吾所守者,惟郑君一家之言。吾于学可谓隘矣,虽然,由吾书而探郑君之谊,其于郑君礼注之意,庶几其不倍乎?由注谊以探《礼经》,其于周公制服之心,庶几其不倍乎?由制服以观亲亲尊尊之等杀,于圣人之尽伦,或可窥见万分之一乎?……

曹元弼在《纯儒张闻远徵君传》中,对《丧服郑氏学》推崇备至:

……君学无旁鹜,沈研钻极,专久而美。直至晚年避世,乃论次《丧服郑氏学》,自注、疏、胡氏《正义》以及古今说礼服之书,搜采无遗,校勘异文,剖别异义,至精至详,弗明弗措。依据郑注,整齐百家,述先圣之元意,得人心之所同,然以正人伦而维世教,旁通曲畅,自《周礼》、二《戴记》以及各经涉丧服者,囊括网罗,转相证明,细入毫芒,昭示日月。立言平心易气,实事求是,不苟异同。书中引余说甚多,时有辩证,确然有当,余昔为之序,已具论之。……^①

《丧礼郑氏学》全书三十六册,分《礼经郑氏学》、《礼记郑氏学》两部分。其《礼经郑氏学》包括:《士丧礼》五卷,《既夕礼》三卷,《士虞礼》二卷,《宫室图考》一卷;《礼记郑氏学》包括:《曲礼》二卷,《王制》一卷,《礼运》一卷,《明堂位》一卷,《少仪》一卷,《坊记》一卷,《中庸》一卷,《檀弓》五卷,《曾子问》二卷,《丧服小记》一卷,《大传》一卷,《杂记》四卷,《丧大记》二卷,《奔丧》一卷,《问丧》一卷,《服问》一卷,《间传》一卷,《三年问》一卷,《丧服四制》一卷,《月令》一卷,《礼器》一卷,《玉藻》一卷。此外又有二册,分别为引用书目及闻远所修《大清通礼·凶礼·丧礼》。封文

^① 张锡恭:《如茶轩续集》,《云间二徵君集》,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权抄本，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①王欣夫称：

《丧礼郑氏学》，取《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暨《礼记》中说丧服、丧礼等篇，条举众说而折衷之，立义精当，为例谨严，一如《丧服郑氏学》。至一九二二年秋而削稿始就，越二岁归道山。^②

《丧礼郑氏学》十卷(十册)，一九三六年中国国学会会刊，蓝印样本。王欣夫说：

……(中国国学会)会员有建议刊布前贤遗著以广流传者，余以闻远先生此书为礼学巨著，一代绝业，有功经术，而卷帙繁重，非众擎莫举。于是撰启募资，……詎知甫成《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三种，而日寇来犯，刊工星散。……当时仅印蓝样本三分，……^③

《茹荼轩文集》十一卷，民国十二年华亭封氏篋进斋刻本。陈宝琛作序：

《茹荼轩文集》都十一卷，诗及杂文十一二，余皆议礼之作也。……宣统初年，余总礼学馆。时曹君直阅读与君同任分纂，……方君议礼时，宪政议兴，亟待编核。君谓须礼洽于乡，俾尚德尚齿之俗成，迺可修大询之典。此又知和而和当节以礼之旨，百变而弗离其本者也。……君心貌俱古，望而信为守礼之士。回忆一堂讲论时，使人惘然不能自己也。^④

《茹荼轩续集》六卷，附《炳烛随笔》一卷(一册)，钞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封君衡甫既刻闻远先生说经之文，为《茹荼轩文集》十一卷，又续得诗、古文若干篇，辑《续集》六卷，附《炳烛随笔》，未及付梓。余从其嗣耐公假得录副。一九四九年，其乡人集资，与钱复初先生《待烹生文集》合刊为《云间两徵君遗集》，各有删汰。此集凡删去十三篇，其与王某、唐某二书，劝阻于松之细林、赤壁采石筑路以保坟墓事，有关筑路掌故。《丽泽会启》为征集书籍以供众览，为建立图书馆之张本。骈体亦甚雅洁，似均可存。《宋台州本荀子与熙宁本同异记》，本非文体，去之是也，但宜别附卷末，以资读《荀子》者参考。……^⑤

① 吴飞：《张闻远先生学述》，作者赠电子版。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一之《丧礼郑氏学四十四卷附通礼案语一卷(三十五册)》，第1433—1434页。(三十五册，未包括引用书目一册耶?)

③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一之《丧礼郑氏学十卷(十册)》，第1435—1436页。

④ 《茹荼轩续集》，《云间二徵君集》，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案：陈序不及刻入《茹荼轩文集》，后收入《续集》。

⑤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辛壬稿》卷四，第667—668页。

《茹茶轩续集》有民国三十八年铅印《云间两徵君集》本，据王说，相比原稿，此铅印本已删去十三篇。

《礼学大义》一卷，金山姚氏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庚辰（1940）刊行时，王欣夫作跋：

……此书于《三礼》大义，提要勾玄，可为先生著书之纲领。如谓郑义人君左右房，惟天子燕寝、诸侯宗庙路寝为然，诸侯燕寝亦东房西室，大夫士东房西室，惟正寝与燕寝为然，宗庙学宫亦左右房，以解朱子释宫人君左右房、大夫士东房西室之疑。谓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首云凡建邦国，建者，立也，谓周公摄政斥大九州，制礼成武王之意，其时所建立者也，若鲁若卫若齐若宋，其封域岂不足五百里哉？若夫所因殷之诸侯，则固无此廓大，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则所建与所因之异也，郑君注《王制》已明言之，以释陈氏澧《广周官徵文》之疑。咸确有依据，不徒纂辑旧闻，诚为后学治《礼》之津梁已。……

附：曹元弼《纯儒张闻远徵君传》^①

余生八十有三年，回溯幼壮至于耆耄，应试南北，官于朝，友教吴楚士大夫，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从捧手甚多。我生之初，四海承平，师友极盛。我生之后，邦国殄瘁，人之云亡。时雨停云之感，积月积年，萦结心曲，叹息弥襟。而故友中伸天下大义，耿耿孤忠，与国为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莫若番禺梁文忠公；执天下高节，肫肫恳诚，与道为体，好学崇礼，至死不变者，莫若娄县张闻远同年。

呜呼！闻远之没二十余年矣，忆往时余与君直从兄及君相约，孰为后死，则孰为校书立传。前年余既为君直兄传矣，而闻远之传尚未践也，非敢缓也，慎重之至，反致迟延。疾病忧患中，无日不往来于心，而未敢率尔操觚。今日薄西山，深恐有爽平生之言，无以彰故友学行，诏来者师法，于是定志凝神，追思数十年中切磋宏益，撰次其事，以传信于后之志德行者。

君讳锡恭，字闻远，一字殷南，姓张氏，松江娄县人。先世由浙江归安迁松，曾祖璿华，赠朝议大夫。祖允元，庠生，早世。本生祖允垂，拔贡生，杭州府知府。父

^① 张锡恭：《如茶轩续集》，《云间二徵君集》，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尔耆，庠生，闭户读书，修身立德，世称夬斋先生。曾祖母陈氏，祖母蔡氏，以节孝旌于朝。本生祖母吴氏、赵氏，母赵氏、席氏，儒门家范，乡里领式。君，席太孺人出也，性孝友诚笃，聪睿内含，趋庭受经，勉勉循循，深造自得。为文章善说义理，霭如穆如。年二十，补博士弟子员。夬斋先生承累徽，多蓄故书雅记，有惠先生定宇、沈先生沃田校各经注疏精过录本。君优游渐渍，朝夕请益，以明善诚身为悦亲之道，以读书稽古为养志之方，学大进。

光绪乙酉中拔萃，时先师瑞安黄公漱兰先生督学江苏，以经史实学、经济气节教士，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瞻闻之士，鸿笔丽藻之客，蔚然并臻。君与余均在调取中，邂逅相遇，色温神定，貌恭言从，肃然心敬，以为儒者气象。论学甚相得，以圣贤志行忠孝事业相勉。一日言及《诗·国风》郑、卫诸篇，《集传》用郑樵说，由与吕伯恭先生论不合而然，君曰：“以朱子不遵《诗·序》为千虑一失可也，以为有意见存乎其间，则以常人之心诬大贤矣。”余爽然自失。时先仲兄邃翰先生同往，亦深服其言。及归，以闻先君子，先君子嘉叹，以为益友。自是函书往来，商榷经义。君每至江阴，恒过余，纵论学术，别同异，明是非，必求愜心当理而止。时余草《丧服校释》，殚心探索，寝食几废。君谓如此虐用其心，非学养兼修、优柔自得之道，先君子及伯仲两兄皆深韪其言。

戊子举于乡。己丑，年丈夫斋先生没，君哀毁至极，凶庐中痛念早岁失恃，自少至壮，读书学问皆受之庭训，以生我而兼鞠我之劳，以父生而兼师教之恩，呼天罔极，惻怛思慕，久而不已。以所撰《行述》寄余，时余适先妣倪太夫人丧，心摧气绝中，感触增痛，肝肠寸裂。何天不吊，越数年，而先考荣禄公又弃养，同为蓼莪鲜民，以修身慎行毋忝所生交勉。又十余年，而沧海横流，乾纲绝纽，同为黍离孤臣，以守先待后矢死靡他交勉。悲夫！

初，余与君并治《礼经》，同受学于南菁书院院长定海黄元同先生，尊闻行知，触类变通，由后师之说以深探先师硕意，以为汉代经师家法不同，莫纯于高密郑君，宋代理学宗派不同，而莫正于新安朱子，说《礼》皆一以郑义为宗。余初撰《礼经校释》，继撰《礼经学》，又旁涉群经，笺释《易》、《书》、《孝经》及他论撰颇多，岁不我与，《礼经纂疏》老而未就。君学无旁鹜，沈研钻极，专久而美，直至晚年避世，乃论次《丧服郑氏学》，自注、疏、胡氏《正义》以及古今说礼服之书搜采无遗，校勘异文，剖别异义，至精至详，弗明弗措，依据郑注，整齐百家，述先圣之元意，得人心之所同，然以正人伦而维世教，旁通曲畅，自《周礼》、二《戴记》以及各经涉丧服者，囊括网

罗，转相证明，细入毫芒，昭示日月。立言平心易气，实事求是，不苟异同。书中引余说甚多，时有辨正，确然有当。余昔为之序，已具论之。书成，刘翰怡京卿刊而行之，以惠士林。君又为《丧礼郑氏学》，并《礼记》中说丧服丧礼等篇，条举众说而折衷之，精当一如《丧服郑氏学》。前年金松岑、王欣夫两弟与诸敦道崇礼君子集资付刊，成《士丧礼》、《既夕》、《士虞礼》三篇，欣夫弟为之精校，汪青在弟亦与有力。世乱未及印，《礼记》诸篇未及刊，欣夫为宝守之，以待时清。呜呼！自天地剖判以来，圣人所以别人类于禽兽，变草昧为文明，使直题横目之民相爱相敬，相生相养相保而不相杀，天下可长治而不乱，虽乱而可反诸治者，在人伦。而人伦之规矩准绳在礼，礼之本在丧服。丧服虽《礼经》中一篇，而实五经之纲领，群经之本源。五礼之有丧服，犹六经之有《孝经》，所谓天秩、天叙，至德要道，自伏羲作八卦，至于周公、孔子治教大本，一以贯之。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经解曰：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后世废丧服、丧礼不读，是以孝敬日衰，人心恶薄，而杀人如麻之祸、洪水烈火不可抑灭矣。君之书致广大而尽精微，详绎礼文，深得礼意，感发人之善心，以塞犯上作乱、积血暴骨之源，而谨守郑训，博学知服，息群言淆乱，又足以杜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渐。余前序已备论大义，兹复约言之。君哀集说经论礼之文，曰《茹茶轩文集》，封君衡甫为之校刊。又有《续集》，凡先世懿德、生平学行多具于是。今年同乡里好德诸贤为之刊印，与钱复初同年《待烹生集》成二玉一珏，以并垂千古。

君家贫，积修脯所入，刊《拥书堂诗集》及《夬斋杂著》，以彰先德。修葺家祠，以奉烝尝。有弟锡谨，笃友教诲，亲没后，推家产悉以与弟。安贫乐道，不求闻达，四方贤士大夫多倾慕而未得见。余夙与梁文忠公言，君行高学深，当时罕儔。文忠以语张文襄师，己亥，师及文忠属余转延君为两湖书院经学分教。君以隔岁已受濮梓泉太守聘，不可爽约，函辞，且谓：“去卑而就尊，是慕势也；去薄而就丰，是货取也。慕势货取之人，南皮公将焉用之？”余以原书寄复，师益重之，即属濮太守造门劝驾，不得已应命。教授三年，多士悦服。后师奉命入朝，君辞归。

丁未、戊申间，朝廷开礼学馆，征天下有道之人修《大清通礼》，溥玉岑尚书奏保君与复初、君直兄及余，余以方任湖北、江苏存古学堂事，未能应征。三君子并为纂修分编礼书，君任凶礼，深念乱之所生，惟礼可以已之。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百世不可得与民变革。高宗继世即位，慈良于丧，而殷道中兴。唐代伪周以迄于

明，服制屡有变乱，而大旨犹不离乎劝孝。近世小人道长，非孝废服之邪说猖狂无忌，将使人类尽为禽兽，杀机一触而不可遏，至为可忧。于是斟酌古今，悉心编纂，科别条议，务合于先王制礼明伦本意，率天常，正人心，以固邦本。内有请八旗官民一律服三年丧议，不为时俗所悦，而总裁陈文忠公深然之。于时国步艰难，败纲教伦，浮言胥动，虽稍知古学者，亦援儒入墨，枝辞琢正，红紫乱朱，旧坊之坏，岌岌可危。君与复初、君直兄力障狂澜，正言严辩，义形于色，每恨余未就征，不能奋笔相助。而余亦以保存古学、教忠教孝大触时忌，卒无所济。呜呼！《大过》栋桡，一木难支；《未济》月晦，何时复旦。

宣统三年，新修《通礼》奏上而大乱旋起，君自是避世隐小昆山庐墓而居，攀柏哀号，掩卷流涕，非节义之士不与往返。或以修《县志》相浼，君曰：“必尔，当以南、董书法，直笔无隐。”乃止。君注心君父，顷刻不忘今上御极，拟“郊天”文进。隐居后，崇陵种树大臣太子少保梁文忠公以祭太庙所得分胙筮实遗之，以慰其江湖魏阙之思。壬辰大婚，恩赉旧臣，君蒙赐福字。君每岁至苏，与余及智涵伯兄、邃翰仲兄、君直从兄作数日聚，纵言学术人心家国之故，至欢至悲。丁巳夏，君在苏，适日中见沫，城阙烟尘之变，相与流涕呜咽，心折骨惊累日。及甲子蒙尘，而君已先没。余上念所天，下念执友，悲能自胜耶？

君食贫耐苦，尝放昌黎《送穷文》而反之，为《天申子留穷文》，取《西铭》“乾我父，坤我母”，“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之义。呜呼！此其所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卓然履伯夷之清，为孔子之徒，与北海郑公同风与？君为文，纯乎经术气，使人读之，矜平躁释。余尝与君言，吾操笔每苦言有枝叶，以视君文，殆有闾然的然之分。君曰：各有所当。吾子之文，盖所谓贤者识其大者。或问“好仁，恶不仁”之分，君曰：“好仁者无以尚之，如曹叔彦。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如钱复初。”君论复初当矣，余则何敢？如君之约身归礼，终食无违，乃真其人耳。

甲子七月，君以积病后避难封八图，没于衡甫家，年六十七。配刘氏，继配马氏。君初以锡谨子作霖为嗣，早卒，遗令以弟主兄丧，弗立后。家本贫，不事生产，先世遗田，久推于弟，节约衣食，所余至微。马孺人与君同志，有陶翟风。君没后，惟以畚田若干亩度日，宗族乡党皆敬之。君遗令曰：“昆山东麓，仰蒙锡福。三饭脱粟，五日一肉。陈篋启匱，古书可读。无子无秃，无秃无辱。儻幽瞑目，私愿已足。毋立嗣续，毋广讣告。敛以法服，渴葬必速。停棺徇俗，适貽后毒。”呜呼！君之志亦即此可窥见矣。

论曰：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礼所以明人伦，理之不可易者也。汉师礼学，宋贤理学，皆所以修身立道，辅世长民。近世浮华之士，分文析字，炫奇矜博，而置身心伦物无何有之乡，其于经明行修、通经致用相去绝远，甚且奇邪不衷，谬托今文，实逞臆说，变本加厉，取为乱阶，君子夙重忧之。君由理学以深通礼学，躬行心得，实事求是。其所著书，语大则天秩民彝、先王经世之大经大法推阐无余蕴，语小则一名一物、一字一句考证无疑义。可以立百世学者之准绳，振儒风而厚民德，挽狂澜于既倒，保谷种于阻饥，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龙集己丑三月，年愚弟吴县曹元弼顿首拜撰。

曹元忠

曹元忠(1865—1923)^①，字夔一，号君直，晚号凌波居士，吴县人。光绪十年(1884)以第一名入学，督学黄体芳器异之，咨送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以周受《诗》、《礼》群经，在院十年，笃志深造，覃思研精，学业日隆，声望日隆。甲午优贡，旋中江南乡试举人。后报捐内阁中书，聘为学部图书馆纂修，又充国史馆校对官，奏保以内阁侍读遇缺即补。光绪三十四年(1908)，派礼学馆纂修，修《大清通礼》。钦选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后，以清遗民自居，逝于家。

著作概略：

《笈经室遗集》二十卷，民国三十年王氏学礼斋铅印本。关于成书原委，曹元弼说道：“又有《锡福堂诗词稿》、《笈经室文集》、《宋元本古本考证》、《学志》等书，未及写定，编简丛残，涂改或难识别，余以目疾不能自校，以属弟子王大隆欣夫精心详勘，拾遗订误，出入十年，网罗放失，总编为《笈经室遗集》二十卷。虽兄生平蕴蓄未尽发抒，而其博学深识，贞志纯行，亦于此可见矣。”编订者王大隆，在该集末所写《跋》中，推崇曹元忠学问渊博，可与乾嘉著名学者钱大昕、孙星衍相比，并将曹元忠的著作归为八类：

……大隆于先生之学研索既久，得窥大略，敢扬推陈之。一曰经术，恪守高密郑氏家法，不稍出入。于《书》之《泰誓》有《考释》，有述有辨，多发前人所未发。于《春秋》则辟“素王改制”之异说。于《礼》则依据古礼，裁定新制，于丧服尤精专，别刊《礼议》二卷外，存文又若干篇，皆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一曰考

^① 曹元忠甲午乡试硃卷，称同治丁卯年(1867)生，实少填两岁。据此《家传》，曹元忠应生于1865年。

订,于《邓析子》、《司马法》有《音义》,《蒙鞞备录》有《校注》,旁及金石目录,书画歌曲,莫不原原本本,殆见洽闻。一曰校勘,多见宋元旧槧,凡内阁大库之秘藏,海内收藏家之珍籍,咸得目睹而手校之。一书必穷其原委,究其异同,所作题跋,蔚为大观。一曰辑佚,自小学、地志、医方、诗词,皆博采群籍,绳贯丝联,千百年不传之秘,重复旧观,其精密详审,阳湖孙氏、兴化任氏之匹也。一曰历算,谓服虔注《左传》用三统历,亦以殷历参校,谓班固《汉书·律历志》有推日食法,而补《畴人传》,虽仅存残稿,尤见博通淹贯。一曰医方,潜心于张仲景、王叔和诸家外,能博参古书,通以今法,活人无算。于《素女经》、《治奇疾方》有《集本》,《刘涓子鬼遗方》有《校补》,而论病之书,医经之跋,识断明通,尤为独绝。一曰音律,于唐五代宋金元词之仅存者,一一考其宫调旁谱,而于叙《彊村丛书》、跋《舒艺室》、《白石词》校语二文,特发其凡。一曰词章,古文则尔雅淳厚,骈体则鬻皇典丽,而诗词皆自名家,上嗣谷音汐社之遗,不失温柔敦厚之旨。综此八者,其渊博无涯涘,当与潜研堂、问字堂其挈其短长,特钱氏、孙氏生乾嘉承平时,不若先生之际天骇地蹕之会也。故先生之书,于维持礼教独具苦心,而故国之思,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朱彊村尝谓先生具子政、稚圭之经术,叠山、所南之怀抱,可以概其生平矣。……

《礼议》二卷,收入《求恕斋丛书》,民国五年刻本。张锡恭作跋,叙述《礼议》成因:

光緒三十有三年,詔开礼学馆于礼部,时掌礼部者宗室玉岑先生溥良,其弟子曹君直侍读元忠实左右之。而锡恭以草莽微臣名列征召中,……时侍读先在馆,条例粗定,锡恭既至馆,与侍读同为分纂。……每遇大礼,与侍读上下其议论,时断断争,必涣然冰释而后已。锡恭成《修礼当议》十余篇,而侍读成《礼议》若干篇。……今年侍读馆郡郊韩氏,辑在礼馆时稿为一编,来山示余。……宣统癸丑。^①

从弟曹元弼称赞《礼议》:“依据祖制,上溯《礼经》,旁徵诸史,正言力辩,精确不磨。”^②当时,曹元弼主讲吴、楚两地存古学堂,还将《礼议》中某些篇目作为教材,授读存古学堂诸生。

《司马法古注音义》四卷,其中《古注》三卷,附《音义》一卷,光緒甲午曹氏笈

① 张锡恭:《如茶轩续集》卷三。

② 曹元弼:《复礼堂文集》卷五《书从兄君直阅读〈礼议〉后》。

经室刊本。王欣夫得曹元忠订补手稿并跋，王说：

……光绪间，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以辑校《司马法》命题，并撰《军礼司马法考证》，诸高才咸有纂述。君直先生此书，即作于是时。而黄氏序以刊行。其书用孙（星衍）刻本，附校异文于节下，而汇辑《御览》、《群书治要》引古注分属之。别为《音义》，以著各本异同。……此为戊戌、己亥递加订补，以备重刊者。朱墨灿然，益见精密。……^①

可惜曹元忠订补稿至今未曾付刊，不知手稿尚存于世否？

《三儒从祀录》 四卷（四册），王欣夫藏钞稿本。王说：

三儒者，昆山顾炎武、衡阳王夫之、余姚黄宗羲也。光绪三十四年从祀文庙。君直先生辑录有关文件，以成是书。首吾师复礼先生宣统三年《序》。卷一为谕旨，复奏。卷二为说帖上，卷三为说帖下，卷四为拟奏，及光绪二年以来前后条奏。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奏。篇末间有附识。……今读此书，于三儒之说，胪举而详释之，实可作学案读，不仅存晚清议礼一大掌故也。胡绶之先生时官学部，亦有说帖一通，存《许廌遗集》。胡思敬亦有议一篇，存《退庐文集》。此未收，疑稿未送部，或后作，当据补于末。^②

《荆州记》 盛宏之著，曹元忠据《隋志》辑为三卷，而以《宋志》及所引《永初郡国志》先后编排，所无则据《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补入，以复旧观，每条皆注明出处，凡引用书籍达四十余种。光绪癸巳曹氏笺经室刻本。

《蒙鞞备录校注》 《蒙鞞备录》，宋孟珙著，曹元忠校注，光绪辛丑笺经室刻本。曹元忠自《跋》：

丁酉十月，元和胡劭介同年祥鏊刊《渐学庐丛书》，以泉唐汪氏振绮堂钞藏本《蒙鞞备录》见商。元冬修夜，恒苦不寐，辄取《古今说海》及《宋人百家小说》本为之校注。间质当世，谬谓可存，遂付写官。……当时轻于成书，率未之及。刊成书此，有余悔焉。辛丑六月，东吴曹元忠。

《楚语集》 一卷，附《易林集联》（一册）。手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君直先生于光绪季年，旅寓都门，与徐兆玮、汪荣宝等各集义山诗以记事托兴，而先生诗最工。《秘殿篇·序》所谓“修门十载，更历万状。欲言不敢，为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癸卯稿》卷三，第979—980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二，第1225—1226页。

思公子。长歌当泣，取近妇人。託旨闺幃，从事义山”。盖可窥其意矣。余编《笺经室遗集》，先得别稿辑入，后获此册，虽阙《秘殿篇小序》，而每首都附注所出，集句体例固宜如此。惜已不及补入。^①

《治奇疾方》一卷（一册），宋□□夏子益撰，曹元忠辑校并跋，手稿本，王欣夫藏。

《云韵词》一卷，收入翁之润辑《题襟集》，清光绪二十四年季冬宣南刻本。

《乐府补亡》 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仓颉篇补本续》一卷、《纂要》一卷、《纂要解》一卷、《桂苑珠丛》及《补遗》各一卷、《括地记》一卷、《两京新记》二卷，均为曹元忠所辑，光绪二十年刻入溥良辑《南菁札记》丛书，江阴使署刊本。

附：曹元弼《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

嗚呼！曾子有言，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而《诗·小雅·頍弁》之篇称：“岂伊异人，兄弟匪他，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其言婉笃深至，读之绝痛。人生天地间，如六骥足之过一隙。人伦之中，惟兄弟相处最久，然出处离合，往往中年异辙，欢笑情话能几何时？况风云变幻，山渊反覆之秋，急难孔怀，相怜尤切。而岁寒松柏，交柯连枝，同甘风饕雪虐之困，百折而不回。其惓惓恻恻，相依若性命，痛痒一体，珍爱护惜为何如？一有徂谢，其悲积于中，永久而不忘，更何如耶？

余自宣统辛亥后，随伯仲两兄及吾从兄君直阁读学，矢志偕隐，闭门绝世，相与忍泪看天，蒿目忧世，极天下之至悲。而论学论治，陈古慨今，以维持万世名教纲常相勸，又极天下之至壮。抵掌扼腕，慷慨沈郁，当日情事，历历心目。如何不淑，仲兄最先弃吾，越两年，而兄即继之，又数年，而伯兄继之。天下滔滔，四顾茫茫，独行踽踽，吾其何以为心耶？兄之歿且二十年，当世博学敦道君子，始刊其遗文行于世。余于是掇举兄行事大略，以告天下后世读兄书者。

兄讳元忠，字夔一，号君直，晚号凌波居士。姓曹氏，系出宋武惠王，八世祖侍楼公以明诸生自安徽歙县来迁，始为江苏吴县人。弃青矜，隐于沽酒，累世不仕，读书积善。乾隆、嘉庆间，始有以科第文章政治显者，曾祖考敬堂公讳炯，医学至精，行为人师。祖考云洲公讳维坤，至仁人恻隐，以医活人无算。曾祖妣张太夫人、祖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庚辛稿》卷四，第311—312页。

妣陶太夫人仁孝徽音，婉愉内则，世济厥美。云州公四子，先君子居长，次叔父讳毓骏，年十一，即遍读十三经及医书，不幸殇。次叔父实甫公讳毓秀，号春洲，次叔父紫荃公讳毓英，后改钟英。兄，实甫公长子也。公初娶陶太夫人，生一女，殇。继娶马太夫人，兄及诸弟妹皆马太夫人出。

兄至性过人，六岁，在塾，闻云州公弃养，奔归，痛哭不止。事实甫公、马太夫人，先意承志，曲得欢心，数十年如一日。读书颖悟，年十三，从名儒管申季先生礼耕学，先生为南园陈先生再传弟子，兄依据师授，研核训诂，考详典章，诵读校勘，辄至深夜。光绪甲申，以第一人补博士弟子，督学瑞安黄漱兰师器异之，咨送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元同师以周受诗礼群经，笃志深造，覃思研精。每考一义，必博稽群书，通贯流源，沈潜反覆古经师训义，不以己意穿求崖穴，往往积古霾晦之义豁然复明，盖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

余少兄二岁，自少相与论文至欢。兄既为管先生入室弟子，余亦时时从先生问故。又同受知于瑞安，受经于定海。然余从定海师质正诸大义，不久即归。而兄止宿南菁有年，每假旋相就论学，各举心得相证，往往不谋而合。尔雅辨言，断断如也，相说以解，怡怡如也。盖自是终身以为常。于是兄学业日进，闻望日隆，历任江苏学政如长沙王益吾前辈，茂名杨蓉浦师、宗室溥玉岑年丈皆重兄学，以其文刊入江苏试牍、南菁书院课艺。元同先生为礼经大师，尝以所著《军礼司马法考证》与兄所辑《司马法古注合编》并行，各存一说，其重之如此。

甲午，以优行贡成均，遂举于乡，应礼部试，在位通人争相汲引，而数奇不偶，屡试，仅挑取誊录。吴桥刘博泉侍郎、南皮张文襄师先后保奏经济特科试，又不第。文襄深惜之。盖兄文章尔雅，多据古义，志乎古，必遗乎今。且得之不得，时数适然。如朱笥河索汪容甫卷不可得，孙伯渊以用古字散馆见绌，射策中否，何足为大雅毫末轻重耶？兄志在行道显亲，及时济国。由顺直赈捐案内报捐内阁中书，适毓绍岑同年督皖学，固请襄校试卷，得士称盛。乙巳，入京供职，充玉牒馆汉校对官，并派检阅大库书籍，考订宋元旧槧。寻大库书归学部，宝瑞臣侍郎聘为学部图书馆纂修，竟其事。其间，直隶总督某某礼聘掌教北洋师范学堂兼中州学堂，一日，见其出行，以黄土填道，知其有不臣之心，立去之。丙午，充国史馆校对官、本衙门撰文兼会议政务处行走。丁未，直省举贡考职，奉特旨充襄校同考官。是年，玉牒告成，奏保以内阁侍读遇缺即补。

戊申，朝廷立礼学馆，修《大清通礼》，溥玉岑尚书奏派兄为纂修，规划条例，延

聘师儒，悉咨访焉。兄由是荐林晋霞大令颐山、张闻远同年锡恭、钱复初孝廉同寿及余。余以苏、鄂存古学堂事，未能入京。林、张、钱三君并入馆为纂修，时礼教陵夷，邪说蜂起，裂冠毁冕，拔本塞源，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兄以乱之所生，惟礼可以已之。馆中诸友有持异议、欲乱旧章者，兄与张、钱两君正言力辩，援据古今，申明大义，以合乎天则民彝之正，著《礼议》数十篇。闻远亦著《刍议》若干篇。总理陈文忠公宝琛、于文和公式枚，皆深韪之。历三年，《通礼》成，未及奏上，而乱作，天下惜之。既而刘翰怡京卿以《礼议》付刊，行于世，余为跋文，发其大义。呜呼！光宣之间阴阳争死生分之秋也，举世竞言新法，而朝旨特命修礼，又得礼学名儒如数君子者，俾斟酌论定，勒成不刊之典，此《大过》栋桡之良木，《未既》月晦之庭燎也。时余蒙德宗景皇帝特旨，以所著《礼经校释》发交礼学馆，既留滞家巷，仍聘为顾问。兄与闻远，深以余索处，不能协力正言断辞，摧陷群邪为憾。然余知兄及张、钱两君，卓识毅力，足以称圣意，奠邦基宪章，稽古通变，宜民可措正而施行，为中兴茂矩。何意中原云扰，典册尘封，此岂惟我朝之不幸，乃天经地义、五帝三王以来礼教之大厄。然兄及闻远书已行，复初老健，著书甚多，修礼大略，文献犹足征，岂非他日三雍讲学，虎观通义之资乎？

宣统纪元，充实录馆详校官，委署侍读。庚戌，又奉命充举贡考取同考官。寻蒙钦选为资政院议员，会议时，凡三纲六记，大防所在，必力申正谊，拒遏谲邪，冀正人心，而固邦本。法部草刑律，草案成，摘其害于伦理者，作驳议数篇，关系世道尤重，今附刊《礼议》后。辛亥闻起用某大臣，大骇，谓独坐空山，引虎自卫，必非国家之福。及某大臣到院，请其将时局大势明白公布。迨变，急纠集同志草疏严劾其误国大罪，未及上，而俯允致政之诏已下，痛苦不已。寻京师兵变，朝官纷纷出走，兄誓效死，弗去。

壬子正月，惊闻实甫公弃养，痛几绝，冒险奔丧，抵家，号哭伏地，昏晕久乃苏。自是矢志侍母，朝夕不离。自离垆室后，不复入私室，宿太夫人室中十年，闻太夫人有声息，必急起视。饮食寒暖，体会入微，是用寿考康强，年至九旬，神明不衰。家贫，节衣缩食，以奉甘旨，支门户。独抱遗经，不接人事，惟与伯仲两兄及余，并朱古微侍郎，邹咏春、叶鞠裳两侍讲，张闻远孝廉诸执友，扬推古训，慨论时事，作为诗歌，以发无穷之悲。天风地皇之间，使歆、丰辈来说，欲以为内史，峻拒之，叹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梅村往事，岂不伤心，况今何时耶？”丙辰，马太夫人八十寿辰，蒙特恩赏福寿字，及“修龄锡福”匾额。后太傅世文端公以《礼议》进呈御览，特赏内閣

侍读学士，并赐联云：“读书众壑归沧海，下笔微云起泰山。”兄感激天恩，愧无仰报。自辛壬以来，无日不渴望中兴。丁丑五月之变，日夜焦急，忧心如焚，时闻远适至，余与同在，兄所闻孽火燎原，相对雨泣，归见两兄，并呜咽椎胸。幸上天眷佑，匕鬯无惊，心始稍安。

兄居恒悲愤，深以不获侍实甫公疾为生平大痛。而上瞻霄汉，下顾苍生，长夜漫漫，颠拂滋甚，积痍在心，肝脾交病，年甚一年。自知病根在心，非药可疗，以数十年治经心得，于世道人心实有裨益，未经写定；考论文史，辨证金石文字，多发前人所未发，恐年岁不与，力疾修补。一日，余闻兄病，往视，怆然谓余曰：“昨日困甚，欲将残稿送弟，为我善后。”余闻，心惕甚，强言劝慰，请其节劳。虽然，著作之勤，他人以为苦，而吾辈则乐在其中。以兄将父之痛，忧国之思，固结不忘，是用少壮精力强盛，而卒不能至伏生、申公之年，病之所由来，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庚申后，病益剧，然恐马太夫人忧，未尝一日不强起。非惨怛万无可忍，必强为欢笑以慰母心。壬戌腊且尽，疾革，得御赐福字寿字及九天垂露画轴，感激喜跃，病若霍然，盖忠爱之诚，始终如一，惟心药能治心病。然精华竭矣，越日又变，马太夫人视之，犹强言慰藉，顾视两妹，谆谆以身后曲慰老亲为属。癸亥元旦时加寅卒，年五十有九。遗令丧礼一遵皇朝制度。又以事马太夫人未及终养，命置斩衰服于棺中。时从弟昇轩在京，以兄忠藎志节上闻。仰荷恩纶，特加褒恤，荣哀盛典，名教增光矣。

兄幼而好学，至老不衰，自弱冠后，即草《六艺论疏证》，晚年又欲为论语旧疏考证，谓邢疏说礼，多同孔冲远《礼记正义》，而冲远又本之皇疏，皇氏疏礼，又疏论语，其说必同，今世所行论语，皇疏未可尽信，叔明书中说礼详备，与记疏相应者，盖真皇氏旧文，其论甚确。其余所欲论著者多，惜皆未成。又考论《书·泰誓》甚详，及论服注《左传》用三统历，以殷历参校，皆有特识，语在文集中。其治经家法，与余及闻远皆确宗先师高密郑君，精心探索，弗明弗措，旁推午贯，义据通深。识者以为钱竹汀、孙薇隐之嗣响。性好表章古书，前贤撰述，多为序论，闻远同年《丧服郑氏学》有功圣经至大，兄语翰怡京卿刊之，亲为校勘，实与《礼议》并为垂世立教不刊之书。

综其生平，经术笃守许郑，文章出入汉魏，制行一以东汉气节、宋贤理学为宗。遇有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败名失节、巧饰淫辞者，必力陈正义斥之。所著自《礼议》外，有《司马法古注音义》、盛弘之《荆州记辑本》、《乐府补亡》、《蒙鞞备忘录校注》诸书，皆已刊行。《顾黄王三儒从祀录》已定稿，未刊。又有《锡福堂诗词稿》、《笈经室文集》、《宋元本古书考证》、《学志》等书，未及写定编简，丛残涂改，或难识别。余以

目疾，不能自校，以属弟子王大隆欣夫精心详刊，拾遗订误，出入十年，网罗放失，总编为《笈经室遗集》二十卷，虽兄生平蕴蓄未尽发抒，而其博学深识，贞志纯行，亦于此可见矣。兄幼承实甫公指授，善为词，朱古微前辈已为刊行。我家世传医学，兄又多得古医书，深通其义，厉疾沉痾，治每立效，归隐后，同人为订医例，助菽水资，然贫者辄不受酬，仁心恺惻，往往忘己之疾，以治人疾。闻远尝疾笃，以俗医皆去发媚世之徒，不愿服其药，兄驰往松江治之，转危为安。多罗特文忠公升允，寓青岛，病甚，诸遗老函请兄往诊，兄以公孤忠体国，而岛鲜良药，因裹药往治，公疾瘳，赠以诗曰：“正色立朝日，庞言乱政时，希文不为相，徐技作良医。”盖约而当矣。

兄生时，雷雨交作，没前，亦如之。自知将逝，又尝梦游泰山，或指一庙神像，曰即君前身，以生有自来耶？昆弟五人，兄为长。次元达，字花农，吴庠生，有孝行，实甫公疾，刲臂和药得效；次元文，字叔明；次元琦，字仰韩，并聪颖早成，惜皆不永年。季元森，字翼轩，有干才事。兄笃友诸弟，勤勤教诲，荆枝屡枯，心恒形瘁，忍哀致欢，曲慰亲心，翼轩不得已为禄仕，然心实在皇室，兄深念之，时贻书慰勉。妹三：长殇；次元燕，字纫秋，适张喜，从兄论学，工诗词，善书；季元嫫，字曼红，适朱，亦善文翰。马太夫人年高，俱归侍养。兄疾连年，亦赖佐理饮食药饵。配徐淑人，柔顺俭约，相夫育子，黽勉望幼。长子岳艷，译学馆毕业，举人，七品小京官，外务部主事，乱后，亦迫于处境，不克家食。兄戒以“安分守己，多长阅历，勿事他求。每见新进纨绔，奔走豪门，求官谋差，不知自爱，身败名裂者比比。汝慎勿效”。兄没后，遂不复出，每与余言，明于君臣大义，非甘心失身者比。保守遗书，弗敢失坠。惜早卒。次岳瑞，为叔明后。女二：一适邹，一适杨。孙凤年。孙女二。比岁同人谋刊兄书，凤年遍搜劫余遗稿，致欣夫资补辑云。

系曰：余与兄幼俱及见祖考云洲公，嬉戏重亲前为欢。继以屋狭分处彼此，时时从尊长相就。十余岁时，论文论学，娓娓不倦，騷騷乎讲求经术。迨弱冠后，兄每自南菁归，与余及故执友王虞笙广文大纶考辩经史，纵论古今得失之林，天下治乱兴衰之故，其味醇醇，其芬郁郁，其声洋洋，古人所谓渐离击筑，旁若无人，高风读书，不知暴雨者，真未足喻其乐也。不幸世变日急，光绪庚子之祸，相约宁为猿鹤，毋为臣仆。恨礼学馆之征，余留滞盘桓，重负兄意。及大陆既沉，兄弟四人偕隐，闻远亦每岁自松江来，慷慨剧谈，思所以旋乾转坤，维三纲于不坠，拯四海之倒悬，其相契之深，相期之重，缠绵固结而不能相离者，又岂语言之所能罄哉。伯仲两兄年长矣，余与兄及闻远齿不相悬，每相谓孰为后死，搜辑遗书，叙述行事，当兼其任，而

孰意均集于余耶？兄之没也，闻远闻耗，即素车白马而来。伯兄与余朝夕往省叔母，幸高堂无恙，可慰兄心。迨明年甲子，闻远避乱，卒于旅所，然与兄皆未及见圣驾蒙尘，及东陵被盗之变。余抚膺怀旧，每叹生不如死。然逝者有灵，欲叩帝阍而诉真宰，其怨恫何以异于生耶？天道循环，否极则泰，守先王之道，待天下之清，幽明同此心而已矣。龙集辛巳五月，从弟元弼谨撰。^①

曹元弼

曹元弼(1867—1953)，字师郑，号复礼，吴县人。光绪辛巳(1881)，以幼童入庠。乙酉(1885)，学政黄体芳调取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学，但不常住院。该年，选充拔贡生第一名，旋中江南乡试举人。甲午(1894)会试中式，明年补行殿试，成进士。丁酉(1897)，张之洞电聘主讲两湖书院。后主讲湖北、江苏存古学堂，任经学总教。辛亥革命后，闭户绝世，殚心著述，负经师人师之望。

著作概略：

《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光绪十八年刊本。曹元弼在序中自称该书“始于光绪九年，成于十七年十有一月”。据《行状》说：

己丑，倪太夫人弃养，先生哀毁甚，撰《北堂侍立记》以志懿德。居丧，始以历年读礼条记整理编写，成《礼经校释》二十二卷。校者，校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释经、注、疏之隐义。自唐贾公彦《疏》，迨近胡培翬《正义》，咸顺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讹补脱，乙衍改错，其说之异于注者，推其致误之由以订正之，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越岁刊成，以质当世。会稽李慈铭、长洲王颂蔚咸推为高密功臣。

《周易郑氏注笺释》二十八卷，宣统三年刊本。《行状》称曹元弼：

以前儒之说犹有未尽，更定体制，以郑注为主，采荀、虞诸家及古易说为之笺，而以己意贯穿惠栋、张惠言、姚配中及各家说释之。由先儒之说以通经传，由经传以定先儒之异同得失，苟义有不嫌，十易其稿而犹未已，必心安理得而后写定，历十七年，成《周易郑氏注笺释》二十八卷。

《周易集解补释》十七卷，民国庚申(1920)刻本。《周易郑氏注笺释》刻成后，

^① 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首。

曹“又恐文句繁多，学者寻省不易了”，别为此编。取李鼎祚《周易集解》校各本异文，择善而从，定其句读。又据孙星衍《周易集解》所采众家遗说，其中尤以清儒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三家为主，进而博采《礼记》、《春秋传》、周秦诸子、《史记》、《汉书》等说《易》古义补之，而以己意申其疑滞、辨其得失。

《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叙录一卷，逸文一卷，共四十二卷，稿本，王欣夫藏。王称：

余年二十，从复礼师受经，为述群经传授源流。谓《尚书》自济南伏生后，两汉今古文大师蔚起，至郑康成而其义大备。郑君子各经皆先通今文，后注古文。……《书》主孔壁古文说，而别注《书·大传》，则欧阳、夏侯所受伏生大义皆包之。……《书》注于欧、夏，存其是而去其非。……皆依据《书序》、《大传》、《史记》，而别择史文之参差，确乎得事理之当。……^①

王欣夫在《行状》中称道老师著此书时的辛苦，说曹元弼：

念《尚书》为前圣施于政治、道济天下之实，乃于辛巳（1941年）四月创稿，据郑注为本，集合《大传》、《史记》、《说文》称《书》古文，马氏佚注及《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两《汉书》等所载《书》说为之笺，而博观约取，近师胡（胡培翬）、江（江声）、王（王鸣盛）、段（段玉裁）、孙（孙星衍）、陈（陈澧）、王（王先谦）、皮（皮锡瑞）诸家义，反覆深思，弥缝变易释之。义有丝毫未惬，辄数易其稿，必问心无憾而后已。耳校口授，諄复不厌，必一字无误而后已，盖以目瞑意倦，桑榆困病之余，著书之苦未有若是者也。历十年而成《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二卷，都五十余万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即据复旦图书馆藏稿本影印。

《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又据《行状》：“又别为《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太誓》以下未成，遗命以二书稿授弟子王大隆。昔济南伏生，髦年传书，卒开汉代经术之盛。先生之学，无愧于伏生，而无如大隆之非其任也。”则《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为未成书。

《复礼堂文集》十卷，民国六年刻本。曹元弼自序：“惟是治经三十馀年，粗识天经地义，至德要道，先圣元意所在，作十四经学以发明之。复第录平日说经大义之文，都为一编。其余杂著，义足相成，亦附存之。”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第1107—1108页。

《复礼堂文二集》八卷 《三集》六卷(七册) 钞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我师《复礼堂文集》十卷刻本,断自丁巳十月。其后于治经之暇,续有所作,随时付梓,分为八卷,仅有红样本,未及校印,而板旋散失。洎归道山,余为收拾遗稿,又得若干篇,依前例编录成《三集》六卷^①。我师一生专力于经,所为文亦以发明经义为多。卷中如《易正论》九篇、《礼大义》十二篇,盖于《周易郑氏义笺释》、《周易集解补正》^②、《周易学》、《礼经校释》、《礼经学》外,沈潜反覆,撷其精要,以示后学,亦为诸书之提纲。……^③

《复礼堂诗集》 八卷,钞稿本,王欣夫辑藏。王说:

我师壮岁专力治经,未遑作韵语。自辛亥后,稍稍为之,自谓少不能诗,际此世乱年衰,百事俱废,强复为之,自顾失笑,聊用破涕。……时相与唱和者,叶菊裳昌炽、邹芸巢福保、朱古微祖谋、秦佩鹤绶章、恽季文炳孙,及仲兄邃翰福元、从兄君直元忠。……惟遗稿零落,歿后余搜集所得,自庚戌至癸巳,录成八卷。其中以五七言律居多,大致运用经典而不腐,工于对仗而不纤。时作韩冬郎体,譬之老树著花,自然妩媚,求之经师,难得此境。……^④

《复礼堂书牍》 二卷,钞稿本,王欣夫辑藏。王说:

我师与人书牍不留稿,散在四方,不易搜集。生前执友娄县张闻远先生锡恭所藏数十通,展转归余。又向封君耐公借得致其尊公衡甫先生文权者,合钞为卷上,而以历年寄大隆者钞为卷下。虽仅六十餘通,于师之立身行己、道德文章,可窥一斑。……^⑤

《复礼堂朋旧书牍录存》 不分卷(四册),王欣夫辑藏,钞稿本。王说:

……先师夙敦夙谊,于朋好所投尺牍,必谨藏之。自归道山,家人视为废纸,颇有散失。及余收拾遗稿,得一束于墙角。沈君谨庐又于冷摊购得若干家,承其见惠,于是整理排比,自俞曲园以次,得六十五家。少或一简,多至数十,辜较不下五六百通。皆在位通人,处逸大儒。虽属残余,已为大观。其中如张闻远、叶菊裳、江建霞、梁节庵、马季立、唐蔚芝皆以经术道义相切磋,各存

① 王欣夫:《吴县曹先生行状》则称《二集》、《三集》各八卷。

② 案:应是《周易集解补释》。

③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第1397—1398页。

④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第1398—1399页。

⑤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第1399—1400页。

数十牒，余亦无一作酬应浮泛语。……^①

《北堂立言记》不分卷(一册)，手稿本，王欣夫藏。王说：

我师幼时体弱多病，倍得倪太夫人之爱怜，太夫人钟仪郝法，教子有方。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弃养，时我师二十三岁，追述嘉言懿行，为《北堂立言记》，以备付梓。故以两兄元恒、福元名并列。太夫人之教我师曰：“汝既治经学，不屑以流俗自居，当深自勗励，言行相顾。毋见节于昭昭，堕行于冥冥，经学其貌，而流俗其心也。”……当清末叶，我苏旧族门庭雍穆，家法谨严，首推谯国。与夫我师道德文章、蔚然儒宗者，盖有所自矣。中如言孤寡之情一则，……于旧社会妇女之受压迫束缚，穷苦无告，几于一字一泪，其志有哀焉，其言有文焉，为录于此，或可为治社会史者之参考欤？^②

《大学通义》一卷 《中庸通义》二卷 民国二十一年刻本。王大隆在《行状》中称其师：

以《大学》、《中庸》二篇乃孔门论礼至极精萃之言，郑注简而精，朱注详而明，乃隐括条理，由博返约，成《大学通义》一卷，《中庸通义》二卷。

《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论语学》据王欣夫《行状》称，前三种和最末一种已刻，余三种刻而未竟：

时南皮张文襄公方督两江，延为书局总校。是年冬，锦涛公卒，先生哀毁，一如居倪太夫人丧。丁酉，文襄移节两湖，电聘主讲两湖书院。……未几，文襄命编十四经学。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先生以兹事体大物博，任重道远，发愤覃思，闭户论撰，寝食俱忘，晷刻必争，冀速揆于成。已刻者《周易学》八卷、《礼经学》九卷、《孝经学》七卷，刻而未竟者《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各若干卷，其《论语学》则改题曰《圣学挽狂录》者也。

《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 《孝经校释》一卷 民国二十四年刻本。王大隆《行状》说其师：

谓孔子行在《孝经》，立人伦之极，致中和赞化育之仁，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其本尽在《孝经》。汉郑君笃信好学，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宗。而今所传郑注，后人疑难百端，雾围千载，直至陈氏澧据《郊特牲》正义引王肃《难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第1419页。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三，第1336—1337页。

郑孝经注》，定为礼堂写定之文，聚讼始息。因据臧庸、严可均辑本撰《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校《注》《疏》脱误为《孝经校释》一卷。

唐文治编《孝经救世编》（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尝云：“通经以躬行心得为主，然不能熟读本经，何有于心得，更何有于躬行。孝经学之最精者，以明代黄石斋先生《孝经集传》与吾友吴县曹君叔彦《（孝经）郑氏笺释》为最。是编采二家说为多。”

《孝经集注》二卷，王大隆《行状》称其师：

又以前所著《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可语成人通学，难以语教小子，乃取旧日论撰，删繁就简，仿朱子注《四书》之法，集汉郑君以下百家之注，并自著之书，融合为一辞，成《孝经集注》二卷。

《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民国二十五年刻本。《行状》叙曹元弼著作《述学诗》始末：

先是，于丁巳岁（1917）曾综括数十年治经心得，于每经各为诗若干首，提挈纲维，开示来学。先举大义，正宗旨也；次详源流，明传信也；共得诗六百数十首。然经义渊深，经师家法源远，未分百家，得失参错不齐，其势非注不明。丙子（1936年），始博引群书，稽撰其说，三年而注成，为《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述学诗》之成，先生年已七十五矣。^①

《礼经大义》二卷，王大隆《行状》称曹元弼：

己卯（1939年），为诸弟子讲说《礼经》，以为“威仪三千”，乃政教典则之详，人伦日用之实，上下通行，师儒讲习。《礼记》则其传《冠》、《昏》诸义，皆七十子会通经文，亲受圣旨，提纲挈领，为后学举隅。乃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为《礼经大义》二卷。

王又在其《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中称《礼经大义》钞稿本一卷，并述说成书原委：

吾师年十九，问学于定海黄元同先生，言治学当以家法为主，先生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师由是不敢以株守旧说为遵家法，务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深推诸家离合异同之故，归于案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郑义之不可轻议。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非徒沿袭旧说，必求实得于心。元同先生历挽时失，李越缦以高密干城许之。

^① 丙子年（1936）似已刻成，时先生七十二岁。

师夙治《礼经》，熟读其文，潜研其义。郑注贾疏，背诵如流。年二十一，《礼经校释》创稿，年二十七，剞劂告成，播在学林，遂负经师人师重望。后又综其心得，区类为《礼经学》。

岁庚申，余从受业。师病目甚剧，于仪文度数，千条万绪，犹能冥目指陈，不爽毫忽。癸亥、甲子间，唐蔚芝先生于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选高才生吴其昌、唐兰、王遽常等七人月至苏城受教。退则各就口授笔录，但多匆促未审。自《丧服》至《牺牲》五篇，始先自撰大义，以便讲诵。后乃续将《士冠》至《觐礼》十篇，《少牢》、《有司》二篇，重加论次，合成完书，而自序之。由博返约，言简旨远，诚礼学之钤键也。歿后，检点遗稿，阙《士昏》、《士相见》、《乡饮酒》、《少牢馈食》、《有司撤》五篇，惧再佚散，亟缮写清本，以资世之考封建制度者。^①

附：王欣夫《吴县曹先生行状》^②

先生姓曹氏，讳元弼；字穀孙，又字师郑，一字懿斋；号叔彦，晚号复礼老人，又号新罗仙吏。系出宋武惠王讳彬后，八世祖侍楼公，明诸生，清初自安徽歙县迁吴，遂占籍江苏吴县。曾祖敬堂公，讳炯，国学生；曾祖妣张氏。祖云洲公讳维坤，国学生；祖妣陶氏。父锦涛公讳毓俊，同治丁卯举人；妣倪氏。自曾祖以来，世以岐黄术济世，全活无算。先生生而奇慧，三岁（1869），云洲公教以八卦奇偶，颇能辨别。四岁（1870），锦涛公教以《易本义》前卦歌及四子书、群经，已能通晓大意。光绪辛巳（1881），以幼童科试第四名入庠。元和训导六合唐公毓和得先生卷，心器之，以女字之。

乙酉（1885），调取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故。时大江南北才俊士，咸集南菁，朝夕切磋，而尤与娄张锡恭、太仓唐文治交笃，质疑问难，无虚日。是年，选充拔贡生第一名。学政瑞安黄公体芳奇赏之，于卷后加批云：“他日当以经济气节名世！”旋中式本省乡试第二十七名举人。明年（1886），应礼部试赴京，于瑞安客座识孙先生诒让，论礼甚相得，并与公子绍箕订昆弟交。己丑（1889），倪太夫人弃养，先生哀毁甚，撰《北堂侍立记》以志懿德。居丧，始以历年读《礼》条记整理编写，成《礼经校释》二十二卷。校者，校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释经注疏之隐义。自唐贾公彦疏迄近胡培翬正义，咸顺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讹补脱，乙衍改错，其说之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二，第1499页。

②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页。

异于注者，推其致误之由以订正之，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越岁（1890），刊成，以质当世。会稽李慈铭、长洲王颂蔚咸推为高密功臣。

甲午（1894），会试中式，以目疾未与廷试。乙未（1895），补行殿试，时殿廷试竞尚书法，习以成风。先生自幼以用精太过，目疾甚，不能作楷。阅卷者既列二等矣，有御史熙麟参奏，奉旨提卷呈览。常熟翁文恭公（翁同龢）方入直，面奏：“曹元弼虽写不成字，实大江以南通经博览之士。”卒以字迹模糊，降列三等五十名，以中书用。文恭尝太息谓：“经生安能与时流争笔画之工哉！”时南皮张文襄公（张之洞）方督两江，延为书局总校。是年冬，锦涛公卒，先生哀毁，一如居倪太夫人丧。丁酉（1897），文襄移节两湖，电聘主讲两湖书院。先生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示诸生治学之方，亦先生所以自道也。在院与番禺梁文忠公（梁鼎芬）同辑《经学文钞》，而相与论学者，则番禺马贞榆、陈宗颖，长沙胡元仪，丹徒陈庆年，同县王仁俊，宜都杨守敬，宛平桑宣，合肥蒯光典，罗田姚晋圻也。未几，文襄命编十四经学，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先生以兹事体大物博，任重道远，发愤覃思，闭户论撰，寝食俱忘，晷刻必争，冀速揆于成。已刻者《周易学》八卷、《礼经学》九卷、《孝经学》七卷，刻而未竟者《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各若干卷，其《论语学》则改题曰《圣学挽狂录》者也。

庚子（1900），以捐资报效，与伯兄元恒均得奖郎中，分部行走。丁未（1907），文襄又电招为湖北存古学堂总教。时清廷设礼学馆，编纂《通礼》，先生故交张锡恭、钱同寿及从兄元忠，皆入馆，任分纂。礼部尚书溥良奏保先生来京，以方任存古事，未应征，仅列顾问。戊申（1908），江苏巡抚陈启泰荐举经明行修，并以所著《礼经校释》进呈御览，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原书发交礼学馆。是年，江苏亦奏设存古学堂，延为经学总教，仍兼鄂学。同时，长洲叶昌炽为史学总教，元和邹福保及王仁俊、唐文治先后为词章总教，同郡孙宗弼、沈修、孙德谦为协教，皆一时硕学通儒，师资称极盛焉。

宣统辛亥（1911），辞存古总教。旋即致政诏下，先生心摧气绝，饮恨吞声，唐恭人常密防先生，先生问何故，恭人曰：“主辱臣死，君素志也。但自裁无益，守死善道以存书种，效贞苦节如何如？”先生长太息，曰：“天乎！与子偕隐，矢死靡他。”自此闭户绝世，殫心著述。所往来者，叶昌炽、邹福保、张锡恭、朱祖谋、王季烈、刘锦藻、承干数君子而已。其后，袁世凯设礼制馆，以书币来聘，则峻拒之。孔林被兵燹，清东陵被盗发，则竭鬻文货助修之。暇则为诸弟子讲授经义，毅然以守先待后为

己任。

念洪荒初辟以来，中国圣教王道所自始，人类所以孳生不绝之由，反本复始，潜心学《易》。以前儒之说犹有未尽，更定体制，以郑注为主，采荀、虞诸家及古易说为之笺，而以己意贯穿惠栋、张惠言、姚配中及各家说释之。由先儒之说以通经传，由经传以定先儒之异同得失，苟义有不慊，十易其稿而犹未已，必心安理得而后写定。历十七年，成《周易郑氏注笺释》二十八卷。又恐文句繁多，学者寻省不易了，别为《周易集解补释》十七卷。自序累万言。尤惓惓于学《易》改过迁善，以消杀机而返元气。

以《大学》、《中庸》二篇乃孔门论《礼》至极精萃之言，郑注简而精，朱注详而明，乃隐括条理，由博返约，成《大学通义》一卷，《中庸通义》二卷。谓孔子行在《孝经》，立人伦之极，致中和赞化育之仁，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其本尽在《孝经》。汉郑君笃信好学，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宗。而今所传郑注，后人疑难百端，雾围千载，直至陈氏澧据《郊特牲》正义引王肃《难郑孝经注》，定为礼堂写定之文，聚讼始息。因据臧庸、严可均辑本撰《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校注疏脱误为《孝经校释》一卷。先是，于丁巳（1917）岁曾综括数十年治经心得，于每经各为诗若干首，提挈纲维，开示来学。先举大义，正宗旨也；次详源流，明传信也；共得诗六百数十首。然经义渊深，经师家法源远，未分百家，得失参错不齐，其势非注不明。丙子（1936），始博引群书，稽撰其说，三年而注成，为《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己卯（1939），为诸弟子讲说《礼记》，以为“威仪三千”，乃政教典则之详，人伦日用之实，上下通行，师儒讲习。《礼记》，则其传《冠》、《昏》诸义，皆七十子会通经文，亲受圣旨，提纲挈领，为后学举隅。乃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为《礼经大义》二卷。继又以前所著《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可语成人通学，难以诰教小子，乃取旧日论撰，删繁就简，仿朱子注《四书》之法，集汉郑君以下百家之注，并自著之书，融合为一辞，成《孝经集注》二卷。

《述学诗》之成，先生年已七十五矣。其间世祸之烈，门庭之痛，有不如无生之感，而一息尚存，仁为己任，此志不容稍懈。所欲著书甚多，念《尚书》为前圣施于政治道济天下之实，乃于辛巳（1941）四月创稿，据郑注为本，集合《大传》、《史记》、《说文》称《书》古文，马氏佚注及《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两《汉书》等所载《书》说为之笺，而博观约取，近师胡（胡培塿）、江（江声）、王（王鸣盛）、段（段玉裁）、孙（孙星衍）、陈（陈澧）、王（王先谦）、皮（皮锡瑞）诸家义，反覆深思，弥缝变

易释之。义有丝毫未愜，辄数易其稿，必问心无愧而后已。耳校口授，淳复不厌，必一字无误而后已，盖以目瞑意倦，桑榆困病之余，著书之苦未有若是者也。历十年而成《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二卷，都五十余万言。又别为《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太誓》以下未成，遗命以二书稿授弟子王大隆。昔济南伏生，髦年传书，卒开汉代经术之盛。先生之学，无愧于伏生，而无如大隆之非其任也。他所著《复礼堂文集》十卷，《二集》、《三集》各八卷，《诗存》若干卷。

先生说经，一以高密郑氏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直通达，与番禺陈氏为近，而著书二百余卷，总三百余万言，则又过之。同县吴文安公（吴郁生）尝谓：“吾苏二百六十年，前后两人焉。昆山则有亭林先生，吴县则为吾叔彦先生。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独行之真儒！”识者谓为千古之公论。先生内行纯笃，事亲孝，虽笃老，每述恩慈，辄呜咽不已。与兄元恒、福元痛痒相关，出入必偕，终身无间言，祥和之气，充溢门庭。吴中数孝弟家风者，必以曹氏为首。自辛亥以来，历世多变，忧伤憔悴，晚更穷乏，饔飧不继，而惟以著书立教，孜孜不倦。虽疾病呻吟，不废简毕，斯真所谓守死善道者非耶。卒于农历癸巳九月十五日（公元1953年10月22日）丑时，距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日（公元1867年2月12日）酉时，享年八十有七。即于是冬窆于穹窿山祖茔之次，元配六合唐氏，继配同县王氏、上虞柴氏。大隆侍先生讲席三十五年，训诲殷勤，亲同骨肉。去年夏自沪返里，晋谒礼堂，深谈缱绻，临别，以未能再见为忧，泛澜不已。不图别才数月，遽厄龙蛇，山颓木坏，悲痛曷极。谨詮次所闻知先生生平学行，质言不文，以俟后之传儒林者采择焉！谨状。

胡玉缙 于 鬯

胡玉缙

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元和人。早岁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后调入南菁书院，为院长黄以周所激赏。所著《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补遗》一卷、《续》一卷、《改错》一卷，被王先谦于光绪十四年（1888—1889）刻入《南菁书院丛书》第四集。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称胡“经学、古学，无所不通。今尚在光福。”^①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优贡，旋中该科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任兴化县教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然赵于1941年在北平写此文时，胡玉缙已于前一年逝世于苏州故乡，赵尚未闻南菁故友噩耗，故还以为胡“尚在光福”也。

谕，深孚众望。^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经济特科试，录取一等第六名，改官知县，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三十年(1904)派赴日本考察，著有《甲辰东游日记》。三十二年(1906)，调补学部主事，升员外郎。三十四年(1908)聘为礼学馆纂修，时礼学馆主要纂修人员均为南菁旧友。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讲授《周礼》，著《周礼学》，象山陈汉章为其弟子。辛亥革命后，曾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胡玉缙一生“奋力著书，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②日寇入犯，胡痛心国事，浩然而归。不数年，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逝世于吴县光福镇。

胡玉缙著作等身，尤以对经学、目录学的研究之精深而享誉学术界。曾问学于胡玉缙的王欣夫称胡为“通儒”，说他“早岁专力治经，卓然经师。继乃博览群书，不薄今人。两渡东瀛，所见益广。每发议论，洞澈古今，明通切实。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达于今者能不趋今，岂与夫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时代迁移，虽或于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间，实为通儒”。^③

胡玉缙是“经生”，但文章也写得很好，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叶景葵，曾将胡与其同乡又是同窗的章钰和曹元忠作了比较，谓“精于四当，鬯于笈经，博及群书，语有断制，非但以著作为长者。此老真不凡才也”。又谓“稿中卓卓可传者，如《德宗升祔大礼议》及《说贴》，《赵岐准从祀说贴》，《刘因准从祀说贴》，《魏源〈元史新编〉》识语，《三国志集解序》，均能读破万卷，择精语详，近代无此作手。《辨郑注明堂位天子谓周公之谬》一篇，作于礼学馆，计其时当为摄政王而发。丁未年所草苏、杭、甬铁路废约两折，不知为代何人作，其是非曲直当另议，而文笔雄健无伦，固是杰作。”王欣夫认为，叶景葵对胡玉缙文章的评论，称其“近代无此作手”，可谓独具深识。^④

著作概略：

《穀梁大义述补阙》 七卷

此为胡玉缙早年著作，假名弟子张慰祖。胡玉缙“尝慨丹徒柳兴恩据‘《穀梁》善于经’一语，创通大义，实发二千年不传之秘。所撰《大义述》阙略待补者，实居泰半。迺细绎原书体例，逐条补缀，成书七卷。”又“以为著述之事，贵有益于后，不必自居其名，遂以授弟子张慰祖。”^⑤存刻本。

① 南菁同学盐城陈玉树覆胡玉缙书：“今闻执事介其操，煦其貌，博其教，劬其教，乃知湖州教授之遗范，近在百里外。”《报胡缙之学博玉缙书》，《后乐堂文钞续编》卷九。

② 王欣夫：《吴县胡先生传略》，胡玉缙撰、王欣夫辑；《许颀学林》，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③④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许颀遗集》十六卷，第1393—1394页。

⑤ 王欣夫：《许颀学林·跋》。

《说文旧音补注》一卷 《补遗》一卷 《〈补遗〉续》一卷 附《〈说文旧音补注〉改错》一卷

胡玉缙《说文旧音补注·序》：“向读《说文》，见二徐俱用反切，以为许君既言从某声，读若某，不烦反切。后读隋、唐《经籍志》，知有《音隐》，惜其不传。迨睹镇洋毕秋帆先生辑本，宝玩莫已，穆然想见其抱残守缺之盛心，顾其书于所采之书，止载书名，未标篇第，因仍梁氏《仓颉篇补注》意，一一考其所出”，为之《补注》一卷。更据《玉篇》、《广韵》、《一切经音义》、《大藏音义》诸书，为之《补遗》、《补遗续》各一卷。后胡玉缙又对《补注》中发现的错误做了改正，他说：“学问无穷，惟求其是。近阅张行孚《说文发疑》，颇多启发。谨将《补注》之未是者订正于篇。”为《〈说文旧音补注〉改错》一卷。此四卷均被王先谦刻入《南菁书院丛书》第四集。

《甲辰东游日记》 六卷

光绪三十年(1904)，由两湖、两江会派胡玉缙东渡日本，考察政学，著此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

王欣夫辑。王说：“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仪征阮元更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均集并时俊彦，分任编纂，搜罗既博，解题亦详，实为后学津梁。然仍罅漏百出，舛误多有。”^①后来学者对于各种古籍，时有论述，但都散在诸家文集、笔记、日记、藏书志、读书记中。胡玉缙“博采群书，折衷己意，用力数十年，为之补正”。^②然一人之精力有限，王欣夫回忆：“曾见先生与曹根荪书，谓此事虽有五百年之寿命，亦不能尽。又尝诏余云：‘吾之为此，惟俛焉日有孳孳，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而已。’”中华书局于1964年1月据王欣夫整理的钞稿本出版该书。据王说，出版之钞稿本辑为二十册。而胡玉缙手稿不分卷，辑为三十一册，今存复旦图书馆。近世纠订《四库提要》阙失的著作，还有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一书，辨议精辟。但余书所辨不足五百种，胡玉缙此书则有二千三百多种。两书参照同读，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续四库提要三种》 九卷

吴格整理。吴在《前言》中说：“《续四库提要三种》，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四卷、《许颀经籍题跋》四卷，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一卷。近代学者胡玉缙先生撰，其书均为先生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作。三书著录范围，

① 王欣夫：《许颀学林·跋》。

② 王欣夫：《蛾术斋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二，第1228—1229页。以下引文同。

《续编》旨在补辑《提要》失收之清乾隆前古人著述；《题跋》则增辑《四库全书》编纂以后问世之清人著述；《续修》为前东方文化委员会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先生所撰经部礼类书籍之提要稿。三种合计，共著录古籍一千二百余种。先生所撰解题，提要勾玄，考订精核，为清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以后，续《提要》类个人著述中最重要学术成果。”^①

《许廌学林》 二十卷

王欣夫辑，王在书后《跋》云：“右《许廌学林》二十卷，吴县胡绥之先生论学之作，欣夫所辑录者也。先生早岁以经学蜚声于时，得吾吴顾、惠以来一脉之传，亲炙于定海黄氏，凡《十三经注疏》、《史》、《汉》、诸子、小学诸书，无不烂熟胸中。益习典章制度，明音韵训诂，故说一义，考一事，旁通博证，元元本本，确守汉儒实事求是之旨。每读一书，贯澈首尾，综核大义，辨析是非，条举件系，罗列灿然，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无根据，可谓极考据之能事者矣。”王又说：“他如王先谦之《释名疏证补》、汪荣宝之《法言义疏》、卢弼之《三国志集解》、丁福保之《说文诂林》，亦多采先生之说，其精义当各于原书求之，此编实为之纲领焉。”^②

《许廌遗集》 十六卷

王欣夫辑，手稿本。王叙说该书内容和成书原委：“初，余据先生手稿所存及他处所见者仿《鲇埼亭》、《潜研堂》例，编成《许廌遗集》三十二卷，清写待刊。选其专论学术为《许廌学林》二十卷，一九五七年交中华书局印行。他尚百五十余篇并诗，重编为十六卷。其卷一至七，以事分类。卷一冠以三赋者，仿《昭明文选》，而继以《崇祀诸儒议》，于赵岐、刘因、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则拟准，湛若水、达海则拟驳，所以标为学之宗尚焉。卷二论德宗升祔及摄政王监国诸礼节，其事皆古所罕有，能斟酌古今，以会其通。卷三论修《大清通礼》，时为礼学馆纂修。同馆有过于泥古者，先生谓当先认清题目，为修‘通礼’，而非修‘三礼’。议‘救护’应出军礼，入凶礼，尤为宏通。卷四则议立宪，论学务，时官学部员外郎，均提纲挈领，能见其大。卷五拟学制，考试留学生、设立存古学堂、荐举博学鸿词、经济特科、增修《四库全书》，其事或属学部，或与学部有联。卷六为任兴化教谕时文告，而附以苏、杭、甬铁路借款事折、呈各一。以上皆作于清代。卷七诸作，则已入民国。先生以宏儒硕学，久居京师，国家有大典礼，往往咨询，亦或时发说论，以备采择，因类

^① 胡玉缙撰，吴格整理：《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许廌学林》，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叙之。自此以下，以体分类。卷八分辨、考、说、书。卷九记。卷十送赠、寿会诸序。卷十一书序。卷十二题记。卷十三书后、书跋。卷十四传赞、墓表、墓志铭。卷十五、十六诗。”^①

《读说文段氏注记》三十卷 《补遗》一卷(十四册)

手稿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王欣夫说：“绥之先生读段氏注数十年，本之以读先秦诸古书，并博采诸家说，申其是而驳其误。大约申者七而驳者三，措辞温和，既无夺席之心，又释器矜之气，庶几实事求是者也。惟段注凡所引据，不注篇卷，读者病诸。先生为一一查明，则冯景亨《说文段注考证》已先为之。宝应朱诤甫《说文形声疏证》手稿未刊，先生全部采录，俾勿散失，而丁仲祐《说文诂林》已入《附录》。彼时两书均未印行，先生固无从知之也。余既案次编订，别写清本，分为三十卷，后又于易箒前丛稿内得若干条，别为《补遗》一卷，盖先生于是书毕生以之矣。”^②

《释名补疏》

《释名疏证》一书，清镇洋毕沅撰，但实出江声代作。光绪癸未抚松馆重刻经训堂本，胡玉缙手校，并录海宁许克勤、吴县王仁俊校，成《释名补疏》稿本雏形。曾收藏此胡玉缙手校本的王欣夫说：“绥之先生于此书用力最深，并录许勉夫、王捍郑校语，朱墨灿然，密如蚁聚，即为所著《释名补疏》之底稿。”^③王欣夫又提到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称“王氏《疏证补·序》云：‘元和祝秉纲垂示胡、许二君所校，为芟去重复，别卷附末。’核之此本，所取仅十一而已。又未采王校”。而“绥之先生与许、王二氏均为同里好友，故往往同校一书”。胡、许、王三人不但是“同里好友”，还都是江阴南菁书院、苏州学古堂的同窗。王欣夫“曾见孙得之先生传凤手临《白虎通疏证》，亦三人同校”。而孙传凤亦是南菁课生。该底稿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独断疏证》二卷

手稿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王欣夫引姚振宗在《补后汉艺文志》中对蔡邕《独断》的判断：“今所传者，似中郎修史时随笔割记之文，其原书恐不若是，颇似后人辑录者。”“但其书为考证家之渊藪，而转写多讹。自卢抱经校本出，始稍可读。绥之先生又仿陈氏立《白虎通》例，为之疏证。世皆知有是书，而未之见。此其稿

①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四，第1393—1394页。

②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一，第1445—1447页。

③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辛壬稿》卷一，《释名疏证》八卷，第429—431页。

本,用湖北书局刻本,朱墨笔徧于眉端行间。廿年前曾请传录,谋为付印。得先生覆书云:“弟之《独断疏证》,仿陈立《白虎通》,尚无清本。”“未几,先生归道山,遗命以稿本见属。余深媿舛陋,不能丝联绳贯,辑录成书”云云^①,则此书虽已成稿,似尚未经人最后整理。

《新序注》《说苑注》《论衡注》

手稿本。王欣夫说,他曾得胡先生覆书云:“《新序》等注,并无稿本。但将拟注者,引用之书,案其叶数、行数,(此谓本书。)另纸录记,载明某书、某卷、某叶。(此谓所引书。其法:记出书名,卷数用一、二等,叶数用|、||等。)但须翻出某书,指示钞胥照录便得。此数者字数不在少数,颇愿兄助我整理”云云。则此数书,尚未整理成稿。王最后说:“谨述先生所示编写之例,以俟后之贤者。”^②

《周礼学》 不分卷(六册)

手稿本。王欣夫说:“清光绪乙巳,学部建分科大学于德胜门。宣统庚戌二月,以工程未竣,先就马神庙大学预备科旧址开学。张之洞保荐先生任周礼学教员,此其所编讲义,故用大学堂讲义稿红格稿纸。”“先生经学邃深,尤熟精三礼,得定海黄元同之传,因仿陈澧《东塾读书记》体例,分类研究。先拟叙目,共分目三十有四,曰名义、源流、纲要、会通、《周易》证经、《尚书》证经、《逸周书》证经、《毛诗》证经、《仪礼》证经、《礼记》证经、《大戴礼》证经、《左传》证经、《国语》证经、《公羊传》证经、《穀梁传》证经、《孝经》证经、《论语》证经、《孟子》证经、《尔雅》证经、郑注之善、郑注之失、郑注与古周礼说平议、郑注与各家佚注平议、郑注与《仪礼注》平议、郑注与《礼记注》平议、郑注与《古文尚书注》平议、郑注与诗笺平议、郑注与《论语注》平议、郑注与《周易注》平议、《说文》引经平议、故书段徐诸家平议、贾疏之善、贾疏之失、叙目。全书发凡起例,宏纲毕举。大致繁征博引,而折衷于元同之《礼书通故》,援《说文》称‘贾侍中’例,书中省称‘师说’。”此书并未写完,“惜仅至《尚书》证经第六《司勋》而止”,“然三十四条目,每条本皆可独成一书,如纲要一目,即达二百叶。若别裁著录,初无害于书之未完。其《叙目》已印入《许廪学林》”。^③

《京师大学堂教事录》 不分卷(一册)

手稿本。此为胡氏任教京师大学堂时的记录。王欣夫有介绍,见本书上编第四章第五节,兹不赘。

^{①②}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辛壬稿》卷二,《独断疏证》二卷,第519—520页。

^③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甲辰稿》卷一,第1121—1122页。

《读〈墨子间诂〉小记》 一卷(一册)

手稿,存十六叶,至《节用》中戛然而止,盖残存只三之一,藏复旦大学。王欣夫录副,称:“清末汉学家以治经之方法治诸子者,瑞安孙氏《墨子间诂》、长沙王氏《荀子集解》并称,然以《墨子》为倍难。”“自其书出而治墨者辈出”,“均有足为补苴者”,“至专订其误,意在附净友之列者,则惟先生此书足以当之。”^①

《读书偶记》 一卷(一册)

手稿,王欣夫录副,称:“是稿绥之先生自署元和,盖犹未并入吴县时中年之作也。读书考证所得,随笔记之。余为按类论次,得《易》一条,《书》四条,《周礼》一条,《礼记》四条,《左传》二条,《论语》五条,《孟子》一条,《国语》一条,《贾子新书》一条,《风俗通》一条,《困学纪闻》一条,《文选》一条,共二十三条。诠释考订,均极精深,多正前儒之误说。然在遗著中,祇虬龙片甲耳。手稿藏复旦大学书库,余与《读〈墨子间诂〉小记》同借出录副。从知先生遗稿,零落人间者不鲜矣。”^②

《金石萃编补正》 《金石续编补正》

手写自订未刊稿本。前者藏复旦大学图书馆。^③

《群书问答》

手写自订未刊稿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附:王欣夫《吴县胡先生传略》

胡先生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人,清末元和并入吴县,遂隶籍吴县。年十九,补县学生员。肄业正谊书院,与潘锡爵、叶昌炽、许克勤、曹元忠、王仁俊等友善。同邑许玉琢重其才,以女妻之。嗣调江阴南菁书院,南菁为大江南北人才渊薮,均斐然有述作。先生治经义兼词章,为山长定海黄以周激赏。光绪戊子,江苏布政使贵筑黄彭年创办学古堂,聘雷浚为学长,先生与章钰为斋长,肄业者得其指授,多成才而去。辛卯,以优贡中式江南乡试举人。明年春闹报罢,入福建学幕。庚子,任兴化教谕。癸卯,应试经济特科,录取高等,改官湖北知县,入总督南皮张之洞幕府。明年,两湖、两江会派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政学,著有《甲辰东游日记》。丙午,学部以治经有法、深明教育,调补主事,升员外郎。戊申,礼学馆重修《通礼》,聘任

①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三,第1591—1594页。

②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之《未编年稿》卷三,第1613—1615页。

③ 吴格:《续四库提要三种·前言》,注释(3)。

纂修。宣统庚戌，京师大学堂初立，聘先生讲授周礼，著《周礼学》，发凡起例，宏纲毕举，受业者多一时俊彦，象山陈汉章传其学。辛亥革命后，一主历史博物馆事，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再度东游。余则奋力著书，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旅京师四十年，与胶县柯劭忞、新城王树枏、江阴夏孙桐、长汀江瀚、仁和邵章、常熟孙雄、沔阳卢弼诸先生称莫逆交。及日寇入犯，时先生年将八十，痛心国事，遂浩然而归。卜宅光福镇虎山桥，其地为高士徐枋所徘徊不去，距此五六里，即四世传经惠氏之东渚故居也。先生仰慕往哲，俯事著述，拥书万卷，闭门谢客，有终焉之志。所著书及身所刊者，有《穀梁大义述补阙》七卷，假名弟子张慰祖，《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补遗》一卷，《续》一卷，《改错》一卷，《甲辰东游日记》六卷。欣夫为整理编者，《许廌学林》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许廌经籍题跋》二十卷，合为《许廌遗书》五种。其《读说文段注记》、《释名疏证》、《独断疏证》、《新序注》、《说苑注》、《论衡注》、《金石萃编补正》、《金石续编补正》，稿逸待访。公元一九四零年七月十四日（庚辰六月初十日）以疾卒，距生于公元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清咸丰九年己未七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先后娶许氏、冯氏、范氏。子文森。

溯吾吴学术之盛，三百年来，经儒辈出，自顾炎武开之，至三惠而博大，继之以江声、顾千里、沈钦韩、宋翔凤、陈奂等，迄先生及吾师复礼曹先生而殿焉，咸著述美富，沾溉靡穷。欣夫少受经于曹先生，得略窥门径，暨先生晚归吴下，屡扞衣晋谒，盛德谦衷，言无不尽，获益良多，并许为畏友。又以草稿丛残，多未写定，约相助为理。曾几何时，忽示微疾，犹郑重致书，以身后编刊之役为托。欣夫抱负遗稿，历经艰险，十余年来，始克编定五种刊行。爰撰传略，俾读先生书者，有所考焉。后学王欣夫谨撰。^①

于 鬯

于鬯(1854—1910)，字香草。一名东厢，字醴尊，南汇人。“幼聪慧，读书多奇悟，成童入邑庠，即一意治经，不屑为举子业。”^②“王先谦丙戌岁试，莅松郡，奇其文，拔冠多士。”王先谦很欣赏于鬯，取为廪生，并拔取戊子副优（备取优贡生）。

于鬯后屡以经学受知于历任学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登丁酉科拔贡。

^① 《许廌学林》，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十三《人物志》一。以下引文出处同。

明年,进京师应廷试。由于于鬯是家中独子,按例,应在家侍奉高堂,不能踏入官场。但还是有人劝于鬯出仕,还特为他出了个主意,叫他随便杜撰一个名字,假装是同胞兄弟,不就可以出而筮仕了吗?这在当时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但于鬯听了很是生气,回答道:“我实无弟而饰为有弟,是欺君也,君可欺,人谁不可欺?有何面目出而临民上乎?”断然拒绝,“遂拂衣归”。光绪癸卯(1903),大僚荐举经济特科,亦不赴。

于鬯曾师事上海敬业书院山长钟文炅,著有《穀梁经传补注》而享誉学界,而俞樾(求志书院山长)、黄以周、林颐山也都是他的书院肄业师。^①俞樾曾为于鬯所校书作序,称:“香草于君,余畏友也,好学深思,读书每有心得。尤长于《礼》。”“乙未夏,寄我所校书四卷,皆说小戴《礼》者也,多剖析入微。”接着,又举于鬯书中校语数条,认为“皆可补拙著《古书疑义举例》所未备”,对于鬯所校之书深表认可。^②

于鬯“日致力郑、鄞之学,自段氏《说文》外,凡桂、严、朱、王各家言,莫不博览而精研之”。经学、小学功底都很深。“复以形声训诂展转通借之例,遍读周秦汉魏诸古书,刊正脱讹,稽核同异,成《香草校书》六十卷,手自刊行。”

于鬯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读书,校书,教书,在家乡“主芸香草堂讲席,提倡汉学,士习丕变”。

于鬯多才多艺,“著书有暇,则习为绘事,所写墨菊,尤高澹绝尘”。^③与南菁同学青浦蒋寿祺友善,时往来南汇、青浦间,寓珠里圆津禅院。

于鬯去世后,缪荃孙曾为写《墓志铭》,称其“卓然成大家”,“近时与俞氏《平议》、孙氏《礼笺》卓然为三大师,非他人小小补苴能共语矣。”竟与俞樾、孙诒让相提并论,评介不可谓不高矣。

于鬯著作繁富,在江阴南菁书院与苏州学古堂肄业时,“校《说文》三卷,刻入《南菁书院丛书》(即四集之《说文职墨》);周礼、仪礼、礼记各一卷,刻入《学古堂日记》”。^④后遍读周秦汉魏诸古书,以深厚的汉学功底,校勘古书,最著者有《香草校书》六十卷,《续校书》二十三卷,《战国策注》三十三卷。

《香草校书》主要校勘经书,除《十三经》外,还有《周书》、《大戴礼记》、《国语》、

①④ 于鬯:《丁酉拔贡硃卷》,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俞樾:《于香草所校书序》,《春在堂杂文》六编七,《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③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十八《游寓传》。

《说文》，也都属于经、小学的范畴，如《国语》则被称为《春秋外传》。于鬯在该书自序中说：“自高邮《述闻》后，有德清《平议》，德清《平议》后，有此书。《平议》视《述闻》，若有时过焉者，然力不逮矣；是书视《平议》，若有时过焉者，力更不逮矣。文章千古，寸心知之，何可饰哉，何可讳哉。景揖前辈，向往无极。”^①是自谦之词，亦是自高之词。

《香草续校书》是校勘子部的著作，有先秦诸子包括《老子》至《商君书》共十二家，还有《内经素问》、《水经注》二种。

《战国策注》似未有刻本，其手稿本听说藏上海图书馆，少有人提及。至今只有少数几位研究《战国策》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于鬯的学术成果。于鬯在光绪三十四年的自序中曾说“《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今学者固无人不读《战国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鲜。”

附：缪荃孙《于香草墓志铭》

自唐贞观尊崇南学，而两汉之家法以乖。国朝乾嘉名流始治专门，力追两汉，至咸同时少衰，迄今渐灭殆尽矣。南汇于君香草，犹能钩沉拾烬，而卓然成大家，真豪杰之士哉。

君名鬯，字醴尊，自号香草。祖祐吉，廩贡生，候选教谕。父尔昌，邑增生。母冯太孺人，以节孝著。本生父尔者。

君幼慧，专力治经，不屑屑为俗学。十六补诸生，登光绪丁酉拔贡，得直隶州州判，以本生母年高，绝仕进，黄菊屏先生为署书室曰“娱亲著书”，纪实也。举经济特科，亦不赴。冯太孺人苦节三十年，奉旨建坊，君节啬衣食，得金五百，建坊墓道，而心始大慰。本生母卒，哀毁致病，绵延数年，遂以不起，宣统庚戌七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七。元配张氏，续室黄，再续朱。子五，今存大同、昱、三孙。葬本邑天字圩。

君墨守汉学，以形声故训展转通假之例，遍读周秦汉魏古书，刊正夺误，稽合同异，成《校书》六十卷，《续校》二十三卷，《战国策注》三十三卷，近时与俞氏《平议》、孙氏《札迻》卓然为三大师，非他人小小补苴能共语矣。荃孙久仪其人，又读其书，因君友人之请，而愿为之铭。铭曰：

^① 于鬯：《香草校书》原序（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四日作），中华书局1984年版。

天下滔滔，群言废经。君从汉故，径入孔庭。醇醇朴学，卫郑伸许。四达八窗，通知今古。著书一尺，入木未半。世有通人，当无河汉。君友君子，能传君书。恒幹虽掩，遗憾庶无。^①

唐文治

唐文治(1885—1954)，字颖侯，号蔚芝，江苏太仓人。父唐受祺(原名锡鬯)，恩贡生，教读为生，尊奉理学。唐文治少时，母教甚严，唐回忆：

文治六岁，先妣即命入塾读书。入塾次日，文治即逃塾，先妣执大杖，当门痛责之，曰：“汝父就馆苏台，汝废学，何以对汝父？归当挞死。”文治惧，入塾。次日，复逃归，先妣复痛责之，文治遂不敢归。……文治课不熟，先妣复严责之，曰：“汝为先生挞，毋宁我挞汝。”^②

祖父则对唐文治十分宠爱，而督责又不失勤劬：

文治生六岁，即随府君卧，夜抵足，口授诸经，呬唔之声，或达丙夜。繇是文治入塾，日中恒嬉，夜则毕日间之课，以为常。塾师怪之，以为文治聪颖，无烦督责，而不知吾祖之勤劬自课也。^③

有清一代，太仓理学之风盛行不衰，唐文治自小即受熏陶。七岁时，读《论语》，“是时家贫约，吾母甚健，缝纫予衣，补缀破裂，或结数处，同学咸姗笑之，余语之曰：“君子固穷，若辈则小人，穷则思滥矣。”同学咸讶之。是二语盖习闻外大父以之训人者也。”^④但也就因家境贫约，晚上读书，无力举烛，只能借助月光，目力自此大受损伤，为他日后中年失明，种下了远因。

光绪六年(1880)春，院试，以第六名取入太仓州学，时年十六，学使为夏同善。次年，受业于同邑王祖畬(字紫翔)之门，每隔三四日，前往听讲。王先生教诲倍至，告诉唐：

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至尖新险巧，则人必刻薄；圆熟软美，则人必鄙陋。汝学作文，先从立品起，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

① 缪荃孙：《艺风堂文别存》卷二。

② 唐文治：《先妣胡太夫人事略》，《茹经堂文集》卷五。

③ 唐文治：《王考府君事略》，《茹经堂文集》卷五。

④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以下引文出处同。

于是，唐文治在老师的教导下，“日夜淬厉于性理文学，初知门径矣”。光绪八年（1882），唐文治中式壬午科江南乡试第二十名举人，年才十八岁。试卷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赏识，这是数年后（光绪十五年）赴京会试谒见其乡试座师许庚身时，许亲口告诉他的，唐不禁有知遇之感：

谒座师许公星叔，师语余曰：“汝壬午试卷，左文襄公季高大为叹赏（左公时任两江总督），揭晓后，将硃、墨卷一并索去细阅，并云：‘此人三场字迹，一笔不苟，必有后福。’”余闻之，知己之感萦绕于怀，惜前数年未经谒见耳。

九年春，随王紫翔师赴京会试，不售，归。光绪十年（1884），同乡毕光祖肄业南菁书院，为唐文治报名，寄卷应试。明年（1885）正月，和毕光祖、张树莫诸位太仓同学赴江阴南菁书院应甄别试，取超等，住院肄业。其师王紫翔听说唐文治将问学于黄以周，很高兴，对他说：

昔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明理必在于通经，彼强分门户者，皆鄙倍之徒也。吾闻南菁院长黄元同先生，经学大师，子守吾理学之教，而更采黄先生之所长，博闻强识，穷理尽性，他日自成一家，斯可矣。^①

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听说唐文治讲宋儒之学，也很高兴，对这位刚入院的弟子说道：

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之教，先博后约，子其勉之。^②

唐文治两位老师的教诲，似同出一辙，实际上却大有区别。理学家王紫翔希望弟子能采黄先生之长，但最终应“守吾理学之教”；经学家黄元同却希望弟子“先博后约”，虽说“经学即理学”，最终能得“圣门之教”，但这博习训诂，研习经学、小学的功夫是绝对少不了的。

唐文治称在南菁书院，黄先生“复教余‘训诂、义理合一’之旨，先假余陈北溪先生《字义》，余钞读之，逾月而毕。又示余所著《经义通故》（后改名《经训比义》），余亦摘其精要者钞录之。又于藏书楼纵览诸书，自是于经学、小学亦粗得门径矣”。

唐文治在南菁书院肄业四年，据其自定《年谱》称，先后结交好友吴县曹元弼、江阴章际治、阳湖赵椿年、武进刘翰（以上光绪十一年），丹徒陈庆年、昭文孙同康、常熟丁国钧、吴县曹元忠、泰州卢求古、如皋姚彭年（以上十二年）、宝山邵心炯、阳

① 唐文治：《王紫翔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

②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以下引文出处同。

湖庄蕴宽、上海赵世修、丹徒殷松年、海门刘宗向(以上十三年)。十四年,同学泰兴于璠、华亭雷璠问业于唐文治。

光绪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三赴会试,均不第,回里教读。十八年(1892)中壬辰科二甲进士,以主事用,签分户部江西司,时年二十八岁。翁同龢延之其家,课读其孙辈。该年,唐文治受业于沈曾植之门,称沈师“博雅闳通,当世殆无匹焉”。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唐文治悲愤难忍,不顾人微言轻,奋笔直书,草拟了洋洋万言的《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翁同龢“激赏之,手自钞出数条,然当事者不能行也”。沈曾植与京中诸友也交相传颂。唐后来编《茹经堂奏疏》时自称:“此稿翁叔平、沈子培两师深加叹赏,称为万言疏稿,惜两行痛泪,无补时艰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派户部云南司帮主稿,唐办事十分认真,“以吏为师,遇事咨询”,并“调取档案目录,手自钞存”。作《职思随笔》,办稿必摘要钞录。唐自二十二年起,便留心世界事务,阅读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和晚清外交家曾纪泽、黎庶昌的文集,后又阅《经世文正续编》和曾国藩、胡林翼文集,对“经世”、“外交”之学大感兴趣。七月,以第二名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后改称外务部)章京,在总署电报处译机要电文,在司务厅收发文牍。而仍兼户部之职,任新设之则例馆纂修官,辑成《漕运门》八卷,升云南司正主稿上行走。此时,唐每两日赴户部,两日赴总署,事务繁杂,总署更甚,值夜班恒至天明。唐值夜班,决非空坐待晓,而是在司务厅发柜取读各国条约。同时又自学俄文,常在荧荧油灯之下,将中俄条约原文一一仔细对校,本来就很弱的目力,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庚子国变,唐在京师,“义和团戕杀民教甚夥,闻之极为痛心”,后补作《纪庚子冤狱》一文。七月初三,杀总署大臣许景澄、袁昶,唐文治极为哀痛,感叹道:“此时许、袁两大臣被祸,盖国家元气因此大伤,而人心亦自此渐去矣。”事后,唐“夜间常梦许、袁两公被刑状,辄大哭而醒,泪渍枕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唐文治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约一月有余。归国后,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得帮掌印差。至是,不复赴户部。

二十八年(1902)二月,中葡界约议起,葡萄牙因庚子赔款未能分得一杯羹,而适值清廷整顿关税,“值百抽五”,于是向清廷提出修改旧约,将广东界内的大孤、小孤等岛划入葡属澳门界内,“词气强硬坚决”。外务部大员均感棘手,而身为小主事的唐文治因平时研究外务有素,这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应对方案。唐认为,“按中国舆图,并无此岛属于彼岛之例”,中葡商定前约时,葡方对此也从未有何争论,因

此，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前约。至于整顿关税，各国均一视同仁，而与划界之事毫不相干。最后由唐文治主稿，回复葡萄牙使臣，断然拒绝无理要求。事后，葡萄牙使馆露出风声，说：“近来外务部办事，何以竟能强硬如此，葡使接复照后，致气忿成疾矣。”

三月，载振动身出使英国，致贺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唐文治以三等参赞随同前往。抵达英国呈递国书后，唐文治便随载振考察各处学校及伦敦图书馆，唐文治对牛津大学印象很深，而对伦敦大藏书楼藏书之丰富、尤感惊讶。陪同参观之一法国翻译对唐发问：“中国素号文明，今先生来游是邦，见欧洲人识字多乎，抑中国识字人多乎？”面露骄色。唐文治答道：“欧洲人识字固多，然中国识字人贵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谓识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之人固少，谅欧洲亦不多耳。”

唐文治之回答似有偷换概念之嫌，答非所问。但在当时，大臣载振以为知言；时至今日，读者赞为爱国。唐自己也为答词得体而不无自豪之情，称那翻译听后“面有惭色”。不过，唐文治亦亲眼目睹民众关心英皇病情的情景，感叹“西国人心固结如此”。

英国访问事毕，又赴比利时、法国、美国、日本访问。在日本，不期而遇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桐城吴汝纶，至为欢洽，“屡次相约常谈，论古文源流”。“时值有查办学生事，吴先生力主和平。余因白载大臣办折覆奏，颇得体要。”这里，唐所提到的“查办学生”之事，应是吴稚晖等与驻日公使蔡钧冲突之事，唐文治与吴稚晖为南菁先后同学，不知唐为载振办折覆奏时，为他的这位南菁学弟如何说词。

归国后，代载振作《英轺日记》十二卷，对于欧美各国普遍重视教育，以教育为富民强国之本的情况，感触颇多。也许，这次时近半年，行程逾八万里的欧、美、日的出访，为他日后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访英归来，仍赴外务部供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接沈曾植任庶务司主稿。四月，补和会司员外郎。公余，辑录许景澄出使奏议函稿成，唐自称：

公被难后，义和团劫掠其家，书籍著作被毁一空。余自去年回国后，即出资属外部供事员检覓旧档，将许公奏疏函牍悉行钞出，详加选择，得奏疏二卷，函稿十二卷，付诸铅印以传。非特报知己之遇，亦以阐潜德之幽光也。

六月，升补庶务司郎中。应试经济特科，未录取。七月，富商张姓华侨报效巨

款，朝廷赏了个三品京堂候补，张于是条陈商务利弊，奉旨令载振议复。唐文治代载振上了一份两万字的疏稿，内称：“欲求商业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兴”，“农工商三者并重，而握其枢于商部”，“应请先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八月，清廷很快批准，成立商部，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唐文治被任命为商部右丞。亦曾肄业于南菁书院的夏仁虎，于此事亦有记载：“商部既立，振为尚书，两侍郎为伍廷芳、陈璧，而右丞唐文治实主部事。”^①因唐不尚空谈，办实事在，故商部事无大小，均由唐一肩承担。

唐文治拟定商部章程，下设四司：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外另设司务厅。又亲自拟定保护奖励民族实业的方法，奏请设立农工路矿公司，创设高等商业学堂，在北京、上海设立总商会，再于汉口等地依次推广，又编订《商律》，种种规划举措，无一不渗透了他的汗水和心血。当时中国一些实业的兴办，如广东修筑三水到佛山的铁路，山东开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及科学仪器馆等，都是经唐文治手，或具奏邀准，或即予批行。

三十一年(1905)，署理商部左侍郎。奏请立宪，留中。

三十二年，补授商部左侍郎。九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奉命赴东三省查办事件，唐文治署理尚书，时唐四十二岁，距释褐仅十四五年，升迁不可谓不迅速，主要是得到了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的赏识。史称奕劻贪渎，但唐文治极为清廉。当商部新设，唐文治就要求“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藉图私利。”^②但由于当时有人视商部为升迁捷径，^③“尚有苞苴求差者，有某藩司之子来馈二百金，并持某尚书函，求得帮主稿。”唐文治大怒，“立即掷还。遂宣言‘倘有纳贿求差者，当令严参。’其风始息。”^④商人铺铁路、开银行、设酒厂，均向唐文治行贿，动辄数千两，均为严词峻拒。所以时人对唐文治亦似有怨言：“唐非甘终附权门者，

①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三《朝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案：首提设立商部者，据夏仁虎称“殆庚子后，贝子载振出洋，过南洋，有侨商书记川人吴桐林者，条陈设商部，载振纳其说，携吴归”云云，是侨商书记四川人吴桐林，而唐文治自订《年谱》则称是华侨富商广东张振勋，抑或张仅是“条陈商务利弊”，而吴则明确提出设立商部者耶？

②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

③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北洋捷径”，称：“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第91页）又，卷二，“商部捷径”，称：“商部既设，小人皆由是取径而入，不独堕坏朝纲也。盖全国之权寄于奕劻，奕劻之权又寄于载振，载振又转寄权于商部二三宵小之手。京朝议论纷纷，皆称商部为小政府。”（第82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

故后之论者，指目庆党，罕及之。”^①

该年十二月，母亡，唐须守制三年，尚书载振来弔，执住唐文治手，一边哭一边说：“余不啻断一手臂矣。”^②三十三年正月，扶柩出京，返乡葬母。四月返京，在家读礼。五月，载振为人参劾，怏怏辞职，唐文治感叹道：“论者谓农工商部一蹶不振矣。”八月，邮传部尚书陈璧奏请派唐文治为上海实业学校（原名南洋公学）监督。九月初，唐文治携带全家南返，一去不复返，永远脱离了大清官场。

离开了官场，唐文治开始了他的辉煌的教育生涯。唐初掌校，便对校内系科进行改革，将原有的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工程科，后又改为土木工程科，设立电机科，请美国人谢而屯教授为电机科长，并定每年选派路、电两科毕业生赴美深造。校中并设有中、小学。唐很注意于中文，自小学、中学以至专科之初年级，均延国学名师任教国文，而自己则于星期日亲自上课教授。初苦于无国文教授善本，因随讲随编，分才性理气等，凡二十余门，成《国文大义》两卷。宣统二年（1910）夏，新设商船驾驶科，为国内学校有商船科之始。

由于唐文治在官场的声望和道德文章的修养，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苏教育总会选举唐文治为会长，隐执东南文化之牛耳。后又被江苏士绅推举为地方自治总理。

民国年间，唐文治继掌南洋大学。五年，添设铁路管理科，图书馆、各科之实验室亦相继建立。民国九年（1920），因学风丕变，而自己目疾日益加深，已濒于完全失明，向交通部函电辞职已十次，部方遂准唐文治病假，而以唐之高足凌鸿勋代理职务。是年年底，交通部将上海、唐山、北京三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始正式准唐辞职，时唐才五十六岁。唐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民国九年（1920），长校达十四年之久。凌鸿勋晚年回忆恩师在校教书育人的情景：

先生教学生以躬行实践，明义理之辨。常曰：出处进退，辞受取与，为人生大节，君子于此必三致意。先生在校躬行俭约，提倡穿校服，自己首先穿着。先生住在校中宿舍，每晚必使人以一灯前导，至各课室察看学生自修，亦偶为讲解。先生除自己于星期日上国文课外，并编著《人格》一书，示人以立身处世的标准。……

以其时学校功课已偏重于理工，深恐国学益不为士子所重，乃定每年举行

^①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二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②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以下引文出处同。

国会会试一次，自己出题阅卷，优列者给以金牌、银牌或其他书籍等奖品，此项会试每于孔子诞前十日左右举行，圣诞日放榜，并于祭圣毕即发给奖品。^①

对当年唐校长在理工科大学中特别注重国学教育的感受尤为深切。凌鸿勋还说：

唐监督把教务的事和聘请教授等事都交给教务长去办理，他自己除了注意学生的品德和国学以外，还注意于学生的课外活动，这是非常难得的，例如体育、拳术、演讲、辩论、音乐等，别的官立学堂都不注意，但他都竭力提倡，并且提倡军事教育。^②

凌回忆当时学生到苏州靶场实弹射击的情形：“记得在宣统三年去过两次，每次实弹三发。”而在民国二年与圣约翰大学比赛足球的事，印象尤深，因为“不但两校的同学几乎全体都去”球场观看，“南洋的唐校长和圣约翰的卜舛济校长都亲自到场给同学鼓励”。

唐文治离开南洋大学仅两月，却又在友人的劝说下，于无锡创办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学专修馆，出资者先为钱塘施肇曾（字省之，外交家施肇基之兄），后为无锡孙鸣圻（字鹤卿，与唐文治为南菁后先同学）等。开学之初，即有近千人报名，经考试，录取二十四名，备取六名，共三十名学生，其中有日后成为学术界名人的王遽常、唐兰、吴其昌等。唐文治于开学前便提出办学宗旨：

爰宣布办学宗旨，略谓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人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为圣贤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人才，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③

这与当初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时，谆谆教诲诸生“然使国家猝遇缓亟，则又有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哉”的话，^④如出一辙。据国专早期学生钱仲联回忆，唐师办国专，主要借鉴了他的母校南菁书院的方

① 凌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四期，1964年10月。案：凌鸿勋自称：“于宣统二年以广东官费生考入实业学堂的附中四年级，先生以负笈远来，特于延见，训勉有加。”凌氏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② 凌鸿勋：《交通大学十年忆旧（二）》，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四期，1962年9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唐文治：《茹经堂自订年谱》，民国九年事。

④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法，^①应非虚言。唐又为制定《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共十条：躬行，孝弟，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其中第一条学规《躬行》中就说：

诸生既有志来馆专修，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平日读书当体之于心，返之于身，倘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如陆清献所谓“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每逢讲说，仅作一席空谈，而于礼仪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②

“躬行”、“辨义”之余，才是经学、文学的讲求。唐文治亲自讲授，学生都须精熟原著，把握大义。先后延请来讲学者，如陈衍、钱基博、单镇等都是老师宿儒，名重一时。十余年间，“唐门弟子”，誉满东南，真有南菁再起之呼声。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日寇大举侵略，唐文治已七十四岁，以失明病弱之身，亲率部分学生南下，迁校广西桂林。虽然环境恶劣，依然正常开课，照常举行毕业考试。后因身体日益衰弱，无法支撑，只得重返沪上，但不忘使命，仍在租界内设立补习部（所谓国专沪校）。而在广西的国专桂校则由冯振教务长代理校长，与沪校一样，照常招生授课，梁漱溟、饶宗颐等都被邀请来校讲学，直至抗战结束，国专才又迁回无锡。

一九四九年后，无锡国专并入他校。唐文治亦日薄西山，垂垂老矣。

唐文治学养博大精深，终身服膺儒家经训，但又不拘守于涖涖小节。他喜饮酒，“一夕酣宴于友家，酩酊大醉，仰卧通衢，朗诵《春夜宴桃李园序》，群目为狂生”。^③

但在国家兴亡、民族存危的关头，唐文治却始终严守操守，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凌鸿勋回忆：

辛亥革命起，各省响应独立，上海不免动荡，我们学子方以为先生受清朝厚恩，位至卿贰，深怕先生忠于清室，于革命有所阻扰。岂知先生已和伍廷芳、张謇诸氏致电清廷，要求清摄政王让位，俾早建共和。翌日，报中将此新闻刊出，人心大为振奋。先生并宣布将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并着同学们一律剪去辫子，自己亦首先剪去以为倡。^④

① 《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庚申），《茹经堂文集》卷二。

③ 陈瀛一：《新语林》，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119页。

④ 凌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四期，1964年10月。

此举亦遭来很多前清遗老包括他的师友们的指责，唐事后为此叙述经过并自剖心迹：

庄君思缄来，出示伍廷芳等电稿，请求皇上逊位，邀余列名。余叹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随附名焉。后王师深咎余，以为不应列名；沈子封师亦深以为非，见于辞色。后数月，俄国革命，俄皇尼可来不从，为国人枪毙。故臣耿耿之心，当可大白于天下后世矣。^①

然而，唐在此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记错了俄国革命的年份。唐所说“后数月”，当是后数年。且俄皇灭门，也是在俄皇退位一年以后的事了。

国共内战期间，唐文治支持上海的学生运动，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逮捕学生，由唐文治领衔，包括张元济等知名人士在内，联名致吴国桢、宣铁吾公开信，指责当局“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是政府先已违法，何以临民？”呼吁“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②

又据国专沪校学生季卫东回忆：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大中学校学生为沈崇事件掀起反美浪潮。我与于廉承同学会推举往校长处请示。唐师云：“既然有邀请，应当去。这是法律问题，惟聚会要防迫害。”临别，喟然叹曰：“我国常受美苏两大国的牵制。”

1951年，值土改，因事访师于静安寺路唐师宅，谈及时局，云：“我辈当今受困苦是应该的。”并诏余“要学习新的学识，否则政府不会要你工作。”我未遵照师训，昧于大势，畏难苟安，后悔莫及。^③

1954年4月，唐文治长逝于上海，终年九十岁。张元济、冒广生等发起公祭。

唐文治是一位国学家，著作等身，其及门弟子冯振等编有《茹经先生著作年表》（附在《年谱》后）。唐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弟子不下万千，而受其恩惠者又不知其数，如泰兴的朱东润便是其中的一位。朱家境贫寒，1910年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无力升入中学，朱自叙：

秋天开学，我在家闲着。唐庆诒给我一信，要我去上海，他说，办法一定有的。庆诒比我小两岁，本不认识，这封信当然是老师示意的。……沈老师领我到专科部唐老师的办公室。那是在当时称为上院的那座建筑物的底层，靠门

① 唐文治：《茹经老人自订年谱》，清宣统三年。

②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7页。

③ 凌微年：《季位东谈其老师唐文治》，苏州政协网，2008年12月2日。<http://www.zx.suzhou.gov.cn>。

的一间办公室，设备很简单，一张大大的大餐台，上面蒙着一条白桌布，两旁一式的十张靠背椅子，唐老师经常是整天毕恭毕敬地挺直着身躯坐在那里。沈老师先行一步，打过招呼，这才把我引进，要我长长地作了一个揖。“唔”，唐老师用那特有的太仓口音说：“唔，你老弟就在中学好好读书吧，学费在我这里。”说完，他把学杂费交给沈老师。我开始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开始读书。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

在唐老师的手里，毕竟把这座中国人办的但是殖民地化的专门学校逐步转变过来。时间是漫长的，但是毕竟转变过来了。这件伟大的工作，不仅影响了这个学校，而且影响了其他不少学校。……

每星期上午，他在大礼堂召集部分学生讲授古代散文。听讲的学生是由老师自己挑选的，从专科部到中学部，每班两名。老师讲授的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欧阳修的《五代史职方考序》、《泷冈阡表》、《秋声赋》之类。老师的讲法很特别，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读。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听着我们朗诵。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你旁边，说道：“老弟，我们一道读啊。”虽然带着太仓腔，但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后来我在英国，看到他们十七世纪的黑字本，也和我国旧时出版的书籍一样，没有标点，而在善于朗诵的读者口中，同样听到这些符号。这才明白符号只是一种指示，指导我们怎样去诵读，倘使我们不能诵读，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会丧失的。^①

朱东润的叙述，文字朴素，却深涵感情，真切动人。唐文治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可说是鞠躬尽瘁，生死以之了。

陈庆年 赵圣传

陈庆年

陈庆年(1863—1929)，字善馀，丹徒(今镇江)人。家境贫寒。光绪八年(1882)入丹徒县学，十二年(1886)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在院六年。十四年(1888)优贡。十六年(1890)赴金陵助王定安编著《两淮盐法志》。二十三年(1897)应张之洞之

^① 《朱东润自传》，第二章，“上海六年”，《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45—46页。案：唐庆诒是唐文治之子。

邀,赴武昌任湖北译书局总纂,兼任两湖书院史学分教。三十一年(1905)湖南巡抚端方邀为省图书馆监督、省学务处提调,代理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后返江苏,三十三年(1907)于江宁出任江楚编译局提调、江南图书馆坐办。辛亥革命后,仍著书不辍。终其一生,著作等身。歿后,南菁同窗唐文治为作《墓志铭》。

陈庆年学问淹博,经史兼治,但中年以后,于史学用功最深,成就也最大。他与其肄业南菁书院时的老师缪荃孙通信时,曾说:“受业在南菁时专治经,以后功夫多耗于治史。”^①陈庆年著作繁富,不下数十百种,后唐文治为所作《墓志铭》,罗列陈著已达四十余种,然而唐说:“其平生著书校籍,都凡千余卷,至不可胜纪,今著录者,十之四五而已。”下所介绍者,又不过“十之四五”之十之四五而已。

著作概略:

《司马法校注》三卷 《司马法逸文》一卷

稿本,鹤庐主人鲍廷博私藏。绿格,每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单鱼尾。稿首有陈庆年自序,称:“因取平津馆本,依据诸书,正讹补脱。旧注可考,并显其所出,悉为载入,为《司马法校注》。”成稿于光绪十六年(1890)(案:时陈庆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分为上、下卷,上卷为仁本第一、天子之义第二、定爵第三,下卷为严位第四、用众第五。

后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初九,从同年魏梅村段得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灯下校一过,时在金陵善后局”。以朱笔第二次校对,增改所注内容,分出上卷之定爵第三另作一卷,为中卷,全稿定为三卷。

再于“光绪二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从合肥蒯礼卿太史段得茅元仪《武备志》中司马法,校至定爵篇止,自是篇尽五篇,文多古奥,茅所训释多简当无束,录存之。《武备志》三注颇有较旧辑之注为当者,故后三篇多录之,无甚删节,五月初六日记。”这是先生以墨笔第三次复校。

后附《司马法逸文》一卷及《辑司马法逸文序》一篇。

通稿朱、墨两色笔校注,修改校正之语累累。惜未得刊传,仅在其晚年所刻的《横山山人类稿》中收入《司马法校注序》及《辑司马法逸文序》。^②

陈庆年作此书,是因为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曾以辑校《司马法》命题,诸位高材

① 陈登丰:《横山先生年谱》,民国三年九月六日与艺风师书。

② 鹤庐主人鲍廷博:《陈庆年〈司马法校注〉》,引自新浪微博,2009年5月25日。据称,该文发表在《无锡文博》第74期。笔者引用时略有删减调整。

生后来以此题辑校成书者，有数人，除陈外，还有吴县曹元忠、昭文孙同康等同学。曹所作《司马法古注音义》，黄以周还为之作序。

《两淮盐法撰要》 二卷

清光绪十八年木活字印本，三十年扬州益智社铅印本。

全书十八章：场灶产盐第一，南北各场盐色第二，南北引界第三，南北科则第四，票引总数第五，场商运盐储栈第六，场盐递送挨售第七，四岸搭销盐色第八，运商请引开江第九，挨次过掣第十，淮北场盐运坝第十一，淮北栈盐出湖第十二，南北运本第十三，南北局店栈卡第十四，南北异同第十五，纲食异同第十六，运库支款第十七，课厘收解各款第十八。

《吴勤惠公年谱》 二卷

稿本，镇江图书馆藏。《自序》：

吴勤惠公年谱二卷，公子吉甫观察属庆年所述也。先是，公族孙可园偕其邑人李普卿稽合疏稿，录为长编，藏诸篋，衍殆数十稔。近汪少甫从事董理，甫经撰述，以疾中止。适余在金陵佐纂《盐志》，役既告终，举以相属。旧稿丛积至十余册，丹墨凌杂，猝难就理，屡写净本，刊去芜累，辟榛淪源，端绪乃出。商榷义例，定为斯编，文省事存，取则囊轨。日淹二时，稿经三易，杀青既就，记其缘起。至公靖恭自献，功力允塞，天子嘉劳，载在史氏，阅斯谱者，皆能述之云。光绪癸巳七月，陈庆年叙于金陵二道高井。

《卫经答问》 一册

稿本，内有大量朱墨校改，涂抹增删，并粘贴浮签几十条，兰格竹纸订一册。^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未见刊本。陈庆年时在湖北张之洞幕中，此文为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据陈庆年于二十三年六月致汪康年信：

朱义乌说，尚有授以口实者。弟分条详说，曰《卫经答问》，俟脱稿后，接作《卫教答问》，亦为彼书而发，但论是非，毫无恩怨。^②

陈庆年认为朱一新的反驳，尚有授人以柄之嫌，所以自作《卫经答问》。至于还想续作《卫教答问》，似未成事实。陈又于二十四年致缪荃孙书：

……复作《卫经答问》，纠正康学。学问之事，不敢苟同。论列是非，并无所谓毁誉也。

^① 雅昌拍卖网，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12月4日拍卖。

^② 陈登丰：《横山先生年谱》。以下引文同。

虽一再强调纠正康学乃是学问之事，并无个人恩怨夹杂在内，但受张之洞影响显而易见。

《京口兵事通纪》

此书“述自汉以来，迄我朝咸同间，京口用兵防守战诸大事，穷源竟委，刺缀正史、杂史及诸家著述凡三百数十种，成若干卷，洵为巨观”。^①

《道光英舰破镇江记》 不分卷

光绪二十三年辑成。于各种史料均有所考证甄别，取舍审慎。陈登丰《横山先生年谱》云：

是年，采集夏燮《中西纪事·海疆殉难记》、《京口僨城录》、《草间日记》、《金壶浪墨》、《出围城记》、汤睿译日本人著《鸦片战史》为《英人强卖鸦片记》、《圣武记》、《江上议款篇》、《京口八旗志·名宦海龄传》等文献，辨别真伪，辑成《道光英舰破镇江记》。其中包世臣献策未被采纳、青州兵奋勇格杀英兵几段，最为感人。独都统海龄之死，是遁逃或为乱兵所杀或自焚，传闻甚多，与今之史书所说者有异，未下定论。但海龄质性昏暗，不知兵，为民所怨恨，则多有记载。彼时也，英军入镇江城，“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大为淫杀，黑夷尤甚，妇女闻叩门，往往自戕身”云。

该《记》后收入作者自编《横山乡人类稿》卷五。

《兵法史略学》 九卷

两湖书院刻本(前两卷)、木活字本(后七卷)。时陈庆年在两湖书院任史学分教，授诸生兵学门之史略学。因属课程讲义，两湖书院为之随讲随刻，己丑(1899年)至癸卯(1903年)刊行。《年谱》称：

初写成《春秋时局》一卷，梁节庵监督为之排印，持示张，张读之竟夜，击节赞赏。遗书梁：“古来兵家尚未有此书，今日书院则必无此师。”认为切时势，有实用，命为雕播。因此，增改为二卷，先予付印，即两湖书院刻本《兵法史略学》二卷一册也。论者谓“此书有无穷血泪，为二十年中第一救世之作”。

此二卷本即《课程义例》和《春秋时局》各一卷，属总论部分。陈庆年《自序》说：

^① 姚锡光：《江鄂日记》，页33，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初八日，“旋往善后局，侯陈善馥，善馥经术湛深，史学、时事亦深得款要，且严气正性，乃余之畏友。现方著《京口兵事记》，述自汉以来，迄我朝咸同间，京口用兵防守战诸大事，穷源竟委，刺缀正史杂史及诸家著述凡三百数十种，成若干卷，洵为巨观。”中华书局2010年版。

广雅尚书师以庆年曾撰集乡邦古今兵事为《京口兵事通纪》，于兵史初有所涉，史略一学，遂令承乏。先授课程义例，次言春秋时局，次说列国盟战。以彼时立国有内政，有外交，其构兵也有因，其成盟也有辞。强弱之势，和战之理，计谋政略，多与今比。故必综论而切言之，以晓学者。惟每日讲授，皆有常程，晷刻所限，构缀难待。每发意义，不及详说，略具事证，颇未周瞻。要皆甄择机要，著明前验，参会时局，以资惩愆。区区之心，愿共商榷。往年粤寇乱时，胡文忠已言“书生不知兵，为天下之大患”矣，况在今日，敢自安乎？故乐为诸生拥彗清道，企望尘躅焉。

后陈庆年于民国十一年对该《序》作如下说明：

此己亥书于湖堂后斋者也。其时，论春秋时局者，仅得一卷。梁节庵监督为之排印，持示张文襄公。公以为切时事，有实用，命为雕播。爰增改为二卷，先铄于木。以后四年间，讲春秋诸大战役。至癸卯正月，共成《春秋兵史》九卷，又就活字本先后补苴，付诸刷氏。卷七《鄢陵之战》，卷八《柏举之战》，卷九《吴越之战》，并于甲辰年刻成。至卷六《鞞之战》，方在发刊，余已去鄂，遂不及终事云。

则《兵法史略学》共有《课程义例》、《春秋时局》、《召陵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鞞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吴越之战》九卷。

民国九年五月，吉林徐鼎霖重刊《兵法史略学》，其《序》云：

曩者于役江苏，汽车戒行，念无以破长途之岑寂，偶从坊肆购得陈子庆年所著《兵法史略学》一册，辄为浏览一过，凡分八卷：一卷与二卷曰课程义例，盖通论古今中外兵学；曰春秋时局，盖通论春秋列国兵事窳要。三卷至八卷曰列国盟战，始录召陵，次城濮，次鄢，次鞞，次柏举，而以定哀之世吴越之战终焉。玩其辞，凡类举外国，即所以鞭策中国；凡类举古事，即所以针砭今事。援据详实，条理昭晰，于春秋行事奥旨既多所发明，究其旨趣所归，则务在提撕国人，俾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宏毅致远，不致终受强者劫持，以至忽焉以亡，倘亦针膏肓、起废疾之意也欤？颇闻陈子当清季以其学驾说江湖南北，故于广历学校之图尤三致意，可谓发愤而有作矣。益阳胡文忠公林翼抚鄂时，曾有《读史兵略》之辑，始《左氏》，迨《明史》，军事成败得失之林，足资考镜。陈子是编简明扼要，较胡集尤为适时。所愿读者时懔“佳兵不祥”之戒，免蹈弗戢自焚之讐，以无悖陈子编纂是书之深意也可。

徐《序》漏提鄢陵之战，故误称全书为八卷。

《中国历史教科书》 六卷

光绪三十年(1904)成书，章节体。武昌刻本。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初印，由学部审定，作为中学堂和师范学堂教材。《横山先生年谱》：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先生就桑原鹭藏《东洋史》，匡其乖误，补其漏略，……成《中国历史教科书》，……

《列国政要》(代端方辑) 一百三十二卷(三十二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书馆出版。光绪三十一年(1905)，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奉命到日本、欧美考察宪政。归国后，端方便请陈庆年编纂《列国政要》。《年谱》载有此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端方出国考察，还于上海，先生往晤。

七月，为端方编《列国政要》于焦山松寥阁。

十二月，母柳氏病逝。作《先妣哀启》，略曰：……(1906年)五月二十九日，不孝率长男裕菁乘江新船抵里，先慈同家君已于是晨率不孝妇及孙男女候于招商栈船，出示浚阳尚书自印度来电，谓不孝曰：“尚书遇汝厚，今既约会于上海，汝其即往。”不孝见先慈至意，良不忍遽行，谓：“小悞一二日再行，尚书不至去沪。”遂侍先慈周历汽船乃返。先慈谓不孝曰：“自汝出门以来，吾出迎江上为有生第一次，亦为余心第一乐。”语时，凝视不孝，外愉而内凄，来日苦短之意，固已情见乎词。此不孝盖微窥得之，此不孝今年半载所以息影家居，决计不就他馆也。七月以来，不孝为浚阳编《列国政要》，设局焦山松寥阁，往来山城，以时定省。先慈顾而乐之，谓为得未曾有。复率家人一游焦岩。……

《列国政要》一书共有宪法十卷，官制十卷，地方制度五卷，教育十九卷，陆军二十三卷，海军十八卷，商政七卷，工艺二卷，财政二十九卷，法律八卷，教务一卷。可算是清末有关西方政情介绍的一部巨著。

《西石城乡土志》 一卷

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西石城风俗志》 一卷

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共五章。陈庆年《自序》：

《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而《周官·太宰》八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郑康成释之曰：“礼俗，婚姻、丧纪，旧所行也。”旧所行者，不第曰“俗”，兼以

“礼”名之，是圣人不为庶人制礼，而庶人所以乐生送死者，其同遵之矩范，久习之节文，圣人固视为纲纪人道之大端，踌躇屢眷于其心，而不必事事别为之制，则省方设教之常经即寓于是，然则观道于乡者，观其乡之俗可矣。

庆年，丹徒西石城乡人也。西北距郡城十五里，宅于横山之南，居民二百余家，人口至八百余众。自南宋以来，聚族于斯，为郡治东南之望族。庆年既尝条其事类为《乡土志》矣，《风俗》一章，第规要略，而非其所专详。深维圣王馭民之术，计于婚丧宾祭之事，必监观四方，博问其旧俗，裁之以义，集为专书，以为俟鬼神、顺人情之大寔，蕲有合于可述多学之旨，此固非简略言之所能尽其蕴也。

族人学庚自乡间来，爰疏其欲问者，令条答之。语不务雅，惟真是求。先用白话积成初稿，付门人长沙屈士超理董，为之属词。庆年复与讨论，比附义类，定为五章：曰婚姻、曰丧葬、曰祭祀、曰宾客、曰节令。指事类情，使区以别。斯民之生，殊涂而居，壤宇不同，率由斯异，日用安之，渐成俗尚，虽有深识，莫能遽易。

近礼学馆调查局颇专意此事，以为翼教行政之助，庶几识馭民之意矣。能得好问之君子，旁稽乡故，絜矩于此撰，使芻蕘之言、风化之迹，皆有可考，此则区区构缀之意尔。

两书均为乡土学之佳作。

《横山乡人类稿》 十三卷

民国年间横山草堂刻本。此为自编文集，共收文一百多篇。卷一所载大都为陈庆年在南菁书院所作课艺，经学内容居多。卷二为序，卷三为跋。卷四至卷八为记，卷九为传，均为史学著作。卷十所载与他人书，保存不少史料。卷十一所载作者为他人所作宗、族谱序。卷十二为考，如同卷一之经学课艺，同样显示了陈的考证学功底。末卷记陈氏家族、家人之事。

附：唐文治《陈君善馥墓志铭》^①

君姓陈氏，讳庆年，字善馥，江苏丹徒县人。曾祖讳景周，妣耿氏。祖讳英俊，妣江氏、宗氏、洪氏。考讳懋恒，字子贞，诰封奉政大夫，妣柳氏，诰封恭人。自君之

^①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卒也，士大夫僚友莫不惊相告曰：“江苏大师陈先生歿矣。”相与咨嗟，道其遗事。逾数月，其孤裕菁、裕业等以书来请曰：“先生与吾父交最深，夙以学问道义相切劘，知吾父尤谄，敬请铭。”余挥涕不能铭，然不能不铭也。

君为学大旨，不分汉宋门户，笃守孔门博文约礼家法。于诸经中，三《礼》、《春秋》尤精，兼复旁搜远绍，补漏匡幽，必实事求是、折衷至当而后已。其早岁所著，有《古香研经室笔记》、《尔雅汉注辑述》、《祀灶书述故》。中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著有《知亡录》、《司马法校注》、《辑司马法逸文》、《汉律逸文疏证》、《补三国志儒林传》。厥后淹贯史乘掌故，又著有《宗圣志》、《润古述》、《西石城风俗志》、《石城乡人丛记》、《横山乡人丛钞》、《京口掌故丛编》、《风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鉴纪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详节》、《辽史讲义》、《陶隐居》、《苏魏公》、《沈梦溪》、《杨文襄》诸年谱。澹蓄演迤，腾蹕百家，间作单词短简，亦符合于大义。江南北诸名宿敛手推服。长沙王益吾学使、定海黄元同先生皆惊赏曰：“吾门得一汪容甫矣，俞理初辈不免畏此后生。”然此未足以尽君也。

君之志，以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然非致用，亦不可谓通经。故于食货、财用、兵陈、策略，与夫山川阨塞诸要端，靡不殚精竭思，究其源流终始。尝主修《两淮盐法志》，别为《撰要》。其关于农事、商政者，有《丹徒农事述》、《物价研究史料》。关于地理者，有《法显行程图》、《玄奘旅行图》、《元代疆域图》、《舆地新资料》。关于兵事者，有《京口兵事通纪》、《并法史证》、《兵法史料口义》、《柏杲战史》、《吴越战史》、《万历蜀徼征播史》、《兵事丛钞》等。方张文襄勘查京山唐心口堤工，以君精地学，偕君行，他人方饮酒赋诗，而君独步荒郊，挈测器，实地勘验，并访野老，详询疾苦状，文襄尤器之。“夫人必具经天纬地之才，而后可以登山临水”，顾亭林先生之言，君盖心知其意矣。然此未足以尽君也。

君之才，将开物而成务，以为海禁大开后，载书纷纶，必熟知彼己，深维利害，始足裕因应之方。故今日儒者，决非画封故步，所能济世而安人。爰著《外交史料》、《列国政要》，与鄂省诸学子讲明中外形势，了如指掌。盖当是时，君方佐张文襄幕府，管摄两湖学务云。其创办江南图书馆也，江督端忠愍实委君主之，君高掌远蹕，先购杭州丁氏藏书数十万卷，又采取他省局书二十万卷，尝一拒日人岛田彦桢，再拒木村恒雄等购书之请，盖非此，则吾江南之书势将不胫而走，君之功于是为大。又佐忠愍与日商西泽争回东沙岛，盖援雍正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形势图》以为据，海内搢绅交口称颂。甚矣，通人之有益于邦交也。然此未足以尽君也。

天之生君子也，其智虑宜充周乎万汇，其行谊必矜式乎圣贤。三王祭川，先河后海，孔子言孝为德本，教所由生。君子所以不可及者，孝行纯笃而已。君之幼，历境弥艰，而其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者，靡不止。壮岁官学四方，眷念庭闱，梦越魂驰，辄于中宵流涕。赴江阴时，乃考子贞先生送至江干，君于岸上灯光中见先生须发苍然，不觉泪盈于睫，过焦山，凄然西望，犹感泣。庚子拳匪乱作，柳太夫人忧君甚，谎言病，电速君回。君惶骇，星夜驰归，见太夫人无恙，则先笑后咷曰：“吾母乃健存，吾岂在梦中耶？”及太夫人病，君侍奉数十昼夜，太夫人以珍重为嘱，君哽咽断续不能成语。及歿，号哭不绝声。子贞先生疾革时，君伏其侧，先生曰：“汝盖重呼我，我将载汝声以去。”君肝肠寸断，几不知有生。比送葬，乡之人聚观曰：“呜呼，白头孝子，乃哀痛如斯耶？”虽古之颜丁少连奚以加诸？犹忆丙午岁，余亦丁先妣忧，君贻书慰藉，并述柳太夫人遗言，谓：“他人母皆死，汝独求母长生，无是理也，毋为愚孝灭性毁身。”读之不禁泪血交迸。呜呼！方今世道日衰，良知泯昧，人伦之教，不綦重哉。然则君之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余于丙戌岁，与君同学于南菁时，则又有江阴章君琴若、常州庄君思缄、赵君剑秋、常熟孙君师郑数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谭经，或讲堂角艺，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暇则登君山，览长江，天风朗朗，遥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为狂，而吾辈不顾也。迨后离索，天各一方，而音问往往不绝。辛酉岁，余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延君主讲，君复书谢曰：“吾病矣，不能行，我设传经堂，子辟国学馆，从此终隐可矣。”呜呼！曾几何时，章君逝世，余既为文哭之，今又哭君而为铭。俯仰身世，沧桑之变易，朋旧之凋零，益复累叹唏嘘而不能已也。

君以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卒，享寿六十有八。光绪戊子科优贡生，尝选授江浦县教谕，征辟经济特科，皆辞不就。癸卯，鄂抚端忠愍奏保内阁中书銜。其平生著书校籍，都凡千余卷，至不可胜纪，今著录者，十之四五而已。夫人何氏，继配张氏，皆有贤行。子四人：裕菁、裕业、裕武、裕润，克绍孝德，世其家。女二人，孙男八人，孙女四人。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之原。铭曰：

皖有东原扬有汪，南皮长沙岩二张。君累著书百斯箱，学贯天人参翱翔。夙昔抗怀大道行，春风化雨三千英。胡期乾坤正气渺，沉沦龙蛇之蛰以存身，忧郁于中不得伸，矧复蓼莪衔恤鲜民生。暮年慨叹亡臣精，一病痿痹九载悲呻吟。宾朋来集涕纵横，际此生死安足论。呜呼！君兮君兮，穆愉以宁。奋乎子孙济美能传经，百世而下闻者莫不兴。

赵圣传

赵圣传(1827—1891),^①字蓉裳,兴化人。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十三之五《儒林》有其《传》,录如下:

赵圣传,字蓉裳,岁贡生。天资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家故贫,苦无遗籍,假亲故家藏书观之,必尽其首尾。试辄不利。豫章李文宗联琇按试,得圣传卷,谓有实学,首拔之,命肄业南菁书院,遂恣搜览,学益富。黄体芳、王先谦两学使重其渊博,例奖外,复贻助之,署为院长。客江阴八年,著有《穀梁古义》若干卷。

然而,在这仅百余字的简传中,出现的史实错误至少有两处:一、命赵圣传肄业南菁书院者,是黄体芳,而不是李联琇。李联琇(1821—1878)赴江苏学政任,为咸丰六年(1856),咸丰八年(1858)即离任。二十年后,于光绪四年(1878)逝世。^②而黄体芳在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在光绪八年(1882),此时,李联琇已去世四五年了。黄体芳调赵圣传肄业南菁书院,在光绪十年(1884)。二、称赵圣传“署为院长”,亦误。赵入院时,院长为礼学大师黄以周。当时,南菁诸生分住训、诂、词、章四斋,每斋均推一斋长,赵圣传则因年富学博,署为斋长(可能住诂字斋)。院、斋虽仅一字之差,意思却有天壤之别。^③另外,志传提到赵圣传“著有《穀梁古义》数卷”,陈庆年所作《赵圣传传》则作《穀梁诂义》,^④未知孰是。不过,《续志》所记李联琇按试扬郡,“得圣传卷,谓有实学,首拔之”,应当真实可靠,在赵圣传“试辄不利”时,是李联琇将赵圣传拨入兴化县学的。

赵圣传虽然学问渊博,但在家乡,“顾群目为杂学,无延之课徒者”,竟然“贫乏不能自存”。直至“光绪甲申(1884),闻江苏学政瑞安黄公已建南菁书院,专课经史古文辞,乃橐笔渡江,身外无长物,年已六十余矣。”^⑤甄别时,“书卷字出格外,而义

① 据《横山先生年谱》,光绪十二年中秋,陈庆年与赵圣传留住书院,风雨剧谈。年谱编者提及赵后于1891年秋卒于家。又据吴稚晖《壬辰札记》(《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称赵“年六十有五”,则可推定其生卒年为1827—1891。

② 参见拙著《江阴明清学政》下编《江苏学政小传·李联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349页。

③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主纂是清末民初兴化著名学者李详,而李详与南菁书院甚有渊源,与黄体芳、王先谦颇有交往,对南菁事应了如指掌,而竟会出现此误,估计赵传当出自他人之手,然亦可见修志之不易也。李详有《游南菁书院敬怀黄漱兰先生》一诗,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李作此诗,当在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前后,因黄体芳于十七年辛卯(1891)四月三十日上疏请准开缺。

④ 陈庆年:《赵圣传传》,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赵圣传入院时的年龄,据推算应是五十八岁。可能因生活艰难,求学应课又辛苦异常,所以显得特别苍老憔悴,故陈庆年会误认为入院时已有六十开外。不过,赵离院时确已六十五岁了,赵即于该年逝世。

据特确，黄公赏之，为制被送院”。总算有了一个虽很艰苦但能安顿下来专心做学问的地方。“院长黄先生，浙东经学大师也，谓君该洽群籍，为诸生冠，署为斋长，南方学者始稍稍知其名。”赵圣传入院时已五十八岁了，比他的老师黄以周还大一岁。“自是客江阴者八年。正月出门，岁暮乃归。经年不得家书。”赵圣传此时虽“目眇齿衰”，但因“仰课卷以求活，不能专心撰著”。因为要住院肄业，不得不应付每月至少两次的月课，“然月试之暇，翻阅诸儒经说，犹必尽其首尾，盖好学其天性也。”

“辛卯(1891)之春，犹成《穀梁诂义》一书。至秋季以病返，不再至。久之，始知其卒于家云。”那么，自甲申至辛卯，赵圣传足足在南菁住了八年。而且，每年佳节如中秋，别的同学都回家团聚，他仍留在院中。《横山先生年谱》中，记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陈庆年入院的第一年，“八月，院生以中秋节相率返里，独先生与兴化人赵圣传君留院中，共数晨夕。风雨剧谈，宵中忘寐，得尽叩其所学，以为至乐”。

赵圣传有《申说文雋周燕义》刻入《南菁讲舍文集》，《读凌氏公羊礼疏》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因赵著今已不传，故详录此两篇课作如下。

《申说文雋周燕义》

《说文》“雋”字解云：“雋周，燕也。”今本篆下脱雋字，雋周连读。《尔雅》云：“雋周，燕；燕，𪚩。”犍为舍人云：“雋周名燕，燕又名𪚩。”舍人姓郭，系汉武帝时待诏，则前汉时已如此读矣。孙炎云：“别三名与舍人说同。”孙叔然受学康成之门，则汉人应悉如此读矣。乃郭注分为二物，于“雋周”注云：“子雋鸟，出蜀中。”宋郑樵注《尔雅》，因云“俗呼子规”，则与汉读不同。考《说文》，于“燕也”下又云：“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雋鸟。”此怪诞之说，盖用扬雄《蜀本纪》之文。《说文》于字义亦采雄说，于此不著雄姓名，是姑存别一说耳。许固未尝以之释《尔雅》，奈何据郭注而废历来相承之训诂乎？王观察念孙以为犹言“茆苜，马𪚩；马𪚩，车前”之例，于“雋”字引《吕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雋周之翠”为证其说，当矣。

更考《诗》毛传云“燕燕，𪚩也”者，亦是顺《经》字而加诂训。其实《诗》言“燕燕”，非一燕也，细绎诗人之意，首章言“差池其羽”，二章言“颀之颀之”，三章言“下上其音”，皆兴起庄姜与戴妫有至睦之情，其嫡妾之礼次又秩然不紊，故睹燕之其飞有序，而痛心于瞻望弗及也。又偕来独往，正如燕之分飞，所以劳心而泣涕如雨也。如云一燕，大失诗之本旨矣。

至燕一名𪚩，一名雋周，本属方言之别，或据《曲礼》“立视五雋”注云“雋，

犹规也”，谓轮所过之度以为嵩周者，言如规之一周。夫燕之所以有此名，原不容附会其说而二文相连为义，固不得云“嵩，一名周”，更按其上下之文皆加别名以互相释，亦不得云“于此独空列其名也”。然则许氏之说，其信然矣。

赵圣传该文后段，称“《诗》言‘燕燕’，非一燕也”，是读书有间之言。所释“燕燕”之义，合情合理。

《读凌氏公羊礼疏》

公羊传《春秋》，间著礼文，如两君相遇之礼，及鲁祭群公之别，他传无文。又述鲁郊望之制，亦他传所未备。而汉人议礼，至以为惟有公羊一策可据，则已不得泥郑“左氏善礼”之语，遂于公羊略而不论矣。迨何氏注此传，称述礼文尤夥，为之疏者，今已断为北朝旧本，卓然名家。顾其书惟主解疑释滞，殊不究心典故，故于注所引礼不见礼经记者，但目为纬书之说，或云时王之制，其疏略实甚，必须后人补释。而二传之学已几绝于唐初，横遭宋人驳斥，致令补疏无人。

江都凌氏本拟章比句栉，成此传全疏，因晚年精力不逮，仅著《公羊礼疏》，于何注所引礼文，悉疏通而证明之。惟取疏证，不加辩论，固疏家之旧例，然此乃六朝义例为然，近时通儒撰著，如刘氏考证左传旧疏，李氏辑述贾服旧注，皆间加考论。今观凌氏此书，诚大有功于何注，然嫌疏中全不加考核。兹取丧祭为礼之大者，略举数条辨之。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传》云“常事不书，此何以书”，因广言祭不可黷，亦不可疏之义。下文，夏五月丁丑，烝，又云“讥亟也”。此《传》本意谓《经》先书“正月烝”者，为下文“五月又烝”张本，不然，则常事不书，《传》意甚明。更按十四年八月乙亥，尝，《传》亦云“常事不书”，盖已交秋节，合之此文，知公羊以四时之祭，皆以仲月为正，亦或孟、仲皆可祭，此《传》之本义也。何氏必谓祭必于夏之孟月，以从董仲舒今文家说，已为反《传》违戾，更误会《传》意，以为十二月已烝，今正月复烝，故《传》已讥其亟。下五月又烝，又书之，与上祀同为亟，是鲁六月三烝。核经、传之文，实无此事。何氏每于经、传外增事实，此乃悖经违传，不可不辨者。

又，哀五年冬，“叔还如齐”，继书“闰月，葬齐景公”，《传》曰：“闰不书，此何以书？丧以闰数也。”注云：“谓丧服大功以下诸丧，当以闰数。”《传》又曰：“丧曷为以闰数，丧数略也。”注云：“略犹杀也，以月数恩杀，故并闰数。”按：何氏于襄二十八年《经》“乙未，楚子昭卒”下注云：“乙未与甲寅相去四十二日，盖闰月

也。葬以闰数，卒不书闰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丧，始死得以闰数，非死月不得数闰。”其云“葬以闰数”，正合此年《传》文立说。又云“期三年始死得以闰数，非死月不得数闰”，则与此年葬书闰《传》文义相违。且《春秋》书此闰月，乃诸侯之丧。《郑志·答赵商问》所谓“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期”者，焉得据“大功以下当数闰”解此《传》文“丧以闰数”，且谓“以月数恩杀”乎？推此《传》义，直谓“葬月数闰”，其云丧，即谓葬也。稽《经》所书，如“公之丧至自乾侯”，又如“齐人归公孙敖之丧”，“杞伯来逆叔姬之丧”，皆既殓待葬而称丧。又证以《周礼》，称“大丧既有日”，于葬日，冠以丧，知葬亦得单称丧。然则此《传》固明谓诸侯五月而葬，得数闰月。略者，质而略，不若服以年计乃没闰，固因渐三年之气，且涉于文也。《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是也。此亦《传》义之为注所汨，必当辨别者。

又此传解礼，有长于二传，当表出者。鲁郊三望，二传不列三望之目，惟《公羊》谓为“泰山、河、海”，且明其当祭之原。而注左氏者，乃以为分野星及在其地之山川。以《尧典》“望于山川”及《左传》“祭不越望”证之，则望者第为祀山川之名，不及星辰。故郑驳《异义》，以为“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则六宗无望，即文自明，是左氏说，于义未安矣。《穀梁》亦无明文，范注用郑义，以为淮、海、岱。不知三望乃郊之属，郊望所祭山川，非必在境内也。望，或举，或不举，而封内山川之祭，岂亦可以已乎？其说固与经义违矣。而宋郊之祭三望，势必不及海、岱，且有望不及三而又有不止于三者。以六宗四望例之，所祭之神祇不易，而其数有一定，而此三望所祀之神，随地屡易，其数又非一定，则又于六宗四望之义不相比附矣。于以知《公羊》此义大有渊源，爰表白之。而《传》义有汨于何注者，亦纠正之，以补凌疏之未备云。

赵圣传精熟《左传》，然于此课作，可见其于《公羊》研究亦精博冠时。

陈庆年回忆这位年长他一倍的南菁同学时说：“其在南菁时，同学多好词章，以君朴学，且衰老，罕就君论学。”^①南菁肄业诸生与赵圣传交往者很少，陈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同学好词章，而喜好朴学、钻研经学者少；二是年龄差距较大，少年英俊不喜与寒酸老儒论学问道。其实至少还有一个赵圣传自己性格上的原因，那就是赵圣传生性狷介，遇见看不惯的人与事，往往会破口大骂，尽管他骂过后也

① 陈庆年：《赵圣传传》。

就不再记在心上,但难免会给人以难以相处的印象,这可从赵的另一位同窗吴稚晖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在赵圣传去世后不数月,南菁同窗吴稚晖就在壬辰(1892)五月二十四日这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怀念这位老同学的情深意切的一段文字,当时吴稚晖正从江阴南菁书院乘船夜归无锡:

舟中无事,因思兴化赵蓉裳先生之为人,孜孜好学,至老不倦,能耐寂寞,不美非份,虽积学数十年,胸罗数百卷,而外无彰彰之誉,依然无闷。其处世也,人之得失、荣辱、妍丑、是非,了不相涉。其怒也,作腐言狂骂,过即不记。其喜也,朗吟慢步,自为问答,真古之隐君子也。小子狂佻,黑白太明,其志之,敬学焉。先生名圣传,岁贡生,十三经注疏、四史能背诵,著书满筐。眺曾听其《穀梁》成有数卷,前岁戏诺之为谋代刊,诂秋间归扬州,卒,年六十有五。子年少,未知遗书能读乎?想清贫无以为敛,迄今未知其耗。眺代刊其书,虽属戏言,然倘有绵力,终当访求藏稿,设法表章,不使先生半世辛苦消湮而不闻也。^①

不久,在闰五月初十日,吴稚晖又记赵圣传:

方介耐穷不好名,吾学赵蓉裳先生。然其与世交接,惟彼年高德劭则可,少年人之行,则遭人唾骂,且易入矫枉过正之境。故接人,学裘君小韩之和平,范君素行之苦心,以赵先生之硃硃经济之,不辨别黑白,庶可免于罪乎?

从吴稚晖的回忆文字中,可以了解赵圣传的为人:“孜孜好学,至老不倦”,“十三经注疏、四史能背诵,著书满筐”,腹笥之富,难有其匹。然而最让吴稚晖佩服的是,赵“虽积学数十年,胸罗数百卷,”从不炫耀,以致“外无彰彰之誉”,却仍“依然无闷”,不慕虚名,只知率性而为。所谓“人之得失、荣辱、妍丑、是非,了不相涉。其怒也,作腐言狂骂,过即不记。其喜也,朗吟慢步,自为问答。”吴稚晖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真古之隐君子也!”不过,吴稚晖也承认,在不辨黑白的浊世中,少年人可以学赵圣传的“方介耐穷”,但不可学其处世接物的方式,否则,难免矫枉过正而遭人唾骂。

赵圣传一生具体行踪,至今未见有详细记载。南菁同学陈庆年于赵圣传逝世五年后为之作《传》,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作于南京。该《传》后收入缪荃孙所编《续碑传集》中。陈庆年时时怀念着这位“生不遇,学不传”的南菁老同窗,他在宣统三年七月十七日与樊增祥的书信中,很感伤地说: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以下引文同。

新印成《续碑传集》，谨以一部呈奉存览。其《儒林》中有庆年所作《传》一篇，专表章一老项黄馘终死牖下之同学，伤其生之不遇，哀其学之无传，遂不惜其辞之烦费，计惟公肯一垂鉴耳。^①

陈撰《赵传》，因亲见亲闻，十分真实可靠。该《传》虽仅记述赵之治学，少涉其他，但因赵的著作除前述两篇南菁课作外，今似无存，后人或可藉此《传》略窥赵圣传治学成绩之百一。

如今，即便是学术界，也已无人再提“老项黄馘，终死牖下”的学人赵圣传。倒是数十年前的民国著名学者柳诒徵在谈及南菁书院时，还在赞扬赵圣传的学问“精博冠时”：

张文虎以淹博之学开其端，黄以周、缪荃孙继之，分掌经古，霑溉愈宏。院生传其学者，赵圣传、陈庆年精博冠时，其他瑰异婣雅者尤夥云。^②

据陈庆年《赵圣传传》，赵曾作《左传服义述》一书。至“辛卯之春，犹成《穀梁诂义》一书”。吴稚晖也说：“著书满筐，眺曾听其《穀梁》成有数卷”。赵死后，家人因贫困无助，恐怕遗稿无力刊行。吴稚晖曾发愿：“日后倘有绵力，终当访求藏稿，设法表章，不使先生半世辛苦，消湮而不闻也。”然而，至今未见赵著行世，恐怕遗稿都已散失，先生半世辛苦，不幸终归“消湮而不闻也”，悲夫。

附：陈庆年《赵圣传传》

赵圣传，字蓉裳，江苏兴化人，廪贡生。少颖悟，异常儿，闻人读书，每能臆其下句。既冠，补县学生，即弃举子业，日夕穷经。精熟《左氏传》，先治世族学，于旧说之失，多所举证。

如襄九年，疏引服云，皇郛，皇父充石之后十世宗卿为人之子，大司马椒也。近李次白引卫定姜称孙林父为宗卿为证。正之云：《传》所列宋六卿皆公族，何独于皇郛，明其为宗卿。“宗卿”二字，实“东乡”形似之讹。《周礼·大司马》，乡以州名，注云：乡则南乡甄、东乡为人是也。郑注东乡为人，即服注之东乡为人。《传》言宋有四乡正，故以四方为名。惠天牧《礼说》，据《广韵》引《世本》，宋有大夫东乡为，疑多“人”字。段若膺《周礼汉读考》，知《广韵》引夺“人”字，谓此即《左传》宋之向为人，向、乡通。不知《檀弓》疏引《世本》，乐善之祖父曰东乡克，父曰西乡士曹。又，文七

① 陈登丰：《横山先生年谱》。

②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卷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年疏引《世本》，鳞矐，称东乡矐，岂能尽读乡为向。段又以东乡矐为例，谓矐与为人同为桓族，故得称东乡为人。不知《传》言宋有四乡正，故以四乡为号，岂得因为同族，遂可假称，其说愈失。又服注，椒字又邳字之讹，邳通郟，与椒形声绝远无缘。《左传》名郟，《世本》名椒也。

又成十年传，晋侯梦大厉曰：杀余孙不。义疏：《世本》云公明生赵夙，《晋语》云赵衰，赵夙之弟，则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为公明之鬼。正之云：此后人误改《世本》，服所据者乃原文，其文云：公明夙生共孟及季衰。《晋语》韦注，于赵衰云：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于赵穿云：赵夙之孙，赵盾从父昆武子穿也。韦自序，以《世本》考其流，则其所据《世本》原文也，与服注足互明。疏从杜注，以衰为夙弟，乃因杜注误会《国语》文义，此疏及宣二年疏，皆引《晋语》云：赵衰，赵夙之弟。闵元年疏，更因《晋语》云：赵衰，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考此为宋公孙固告襄公语，原文作赵氏，不作赵夙，宋明道本《国语》与今本并同云赵氏之弟，则不得径指为夙之弟矣。《晋语》盖谓衰为共孟之弟，公孙固告襄公时，夙已死，故举共孟言之。共孟者，衰之兄及穿之父也，故《世本》于赵氏谱，与衰并著之，穿后世为大夫，有世谱，故必著之。又必衰系夙適子，孟虽长，乃庶出，故士会谓为赵之侧室。合观内外传及《世本》，于此世次并合，以公明为夙字，亦相配云。其说足正杜氏之失。

左氏世族之学，近儒之书，颇未精博。君谓高诱注《吕览》，于春秋系谱尚有误说。毕弇山校本，至不能举正，盖于是学未精熟也，宜别作《春秋世族谱》，显其所出，以发疑隐。

继以服注于世族最精，遂总辑服氏传注，作《左传服义述》，于诸家搜获以外，更考得二端以明服书之体例：其一，本疏中所载郑众、马融二家之注，以及彭汪许淑等解传之义；又疏中有以贾、郑二家之说，及贾、马二家之说并列者，皆服注所引用而加以辩论；疏杜注者，弃其折中之语，惟取其所载诸家之解，漫加诋斥，然亦有录服语删之不尽者，如皇父之二子暨齐平琴张，服载旧说而断以己意者，仍存疏中。以三处推之，知所载前人之注，率多加以断语。此端一开，足以哀辑服注原文，又累数十条矣。且考服注所载，固必具诸家同异，亦有仅列前人之注，已不复增注者，如《御览》于梗阳人有狱节，引服注，先引贾逵云讼者之大宗，此解其大宗略以女乐句；又云二子晋大夫魏子之属，此解女宽之为晋人；又云召二大夫食，此解馈人召之句；又云小人二子自谓，此解或赐二小人酒句；然后载服注云，昨饮酒醉，故不夕食；又云属足也，又云小人二子自谓，此解以小人之腹句之小人，与贾解二小人酒句之小

人，不嫌重复。然后云腹饥云云，方解属厌之义。据此，知录此注者，系全钞服注中所引者，不然，岂钞注者前皆用贾注，后皆用服注乎？又岂服注前文无解说，钞者取之不得乎？必不然矣。据《御览》此条，足知服注体例，其前人已注者，惟引其注，已可无注，故疏中每云贾逵云。然故杜用之常不及服者，以服已用贾说，更无他说。准此以推，又知诸书引贾而不及服者，多可录存，又得若干条矣。此一端也。又有一端可考者，九经注疏，皆系六朝人旧本，其《周礼》、《仪礼》、《公羊》三疏，均系北朝所作，唐人用之，未知有所修改与否，如《公羊》疏多载贾、服左氏经本，昭然可见。二礼疏引《左传》注，多用服注，其引杜注甚少，又必明标杜氏。今考二疏所载，不特明标注字，悉为服注，即不称为注而疏自立说者，亦多本服义立言，如少牢，疏谓鲁公子展，以展为谥，与杜不同，系用服义自明。疏中如此者多有，又可录存者若干条矣。自惠定宇表章服注，治服学者相踵，皆未能发此义焉。

又夏商官制，经传未尝详列其名，先生为文考之云，《周语》祭公谋父言，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夏衰，弃稷弗务，先王不窟用失其官。据此，更未闻商兴复后稷之官，第祀用弃耳。然则虢文公谏宣王，所陈耕籍之典，官制甚具，先云稷为大官，下冠以古者太史云云，又称天子为王，知所陈者，必夏官制矣。宋用殷礼，则《左传》襄九年所记宋救灾事，叙官制粗具，亦殷制也。今依《周官》，分六典，而以此两处为大宗，以考二代之异同，一太宰之属，夏无太宰，伏生《尚书夏传》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马公，三司空公。据此，知夏以三公兼三卿之职，则司徒之官最贵，而无太宰。《周语》云，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夫作大事，以王命戒百官，乃太宰之职，因无太宰，故司徒戒百官。更按下文，先王巡行，有司空、司徒、太保、太师，而无太宰，益可证夏无此最贵之官。《周语》又云，宰夫陈飧以王歆太牢，故与周宰夫掌牢礼之具制同，则无太宰、小宰，而有宰夫也。商有太宰之官，《左传》云，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微官。杜注云，鉏吾，太宰也。杜固以宋有太宰，亦望文知之，然误以府守为六官之典。当从刘炫说，为府库守藏，与周制太府、王府等属隶太宰同。又按此《传》，云使某官令某官者，皆兼使转令其属官，杜注司官奄臣，巷伯寺人，则与周奄寺之等皆隶太宰同矣。惟六典周公始作，则商太宰亦非最尊之官，故宋率以大夫为之，亦可见其非如周太宰。孔子所云听于冢宰，谓古之人皆然者，乃元老执政之通称。故郑氏注《仪礼》，云诸侯以司徒为宰矣。二司徒之属，司徒、司马、司空三官，夏为实职，最贵之官，商亦当然，以宋固具此三官，皆卿一人。又凡周之侯国，皆有此三卿，盖承用殷制，以降于天子。而武王伐纣，所云著此三官，亦

系尚用殷官名。故郑注《曲礼》，于司徒等五官云：殷制矣，夏、商实职，皆以司徒为首，与周异也。其大异者，草人、稻人等农师，周之小官，夏则稷为大官，即名后稷，名又甚尊，实因唐、虞旧号，属官有农正、农师、农大夫，商、周无矣。乡遂之官，夏、商皆与周同知者。《甘誓》“乃召六卿”，郑注《周礼》，军将皆命卿，则三代同矣。六军出于六乡，则三代皆立六乡，而乡遂吏名与其制皆同矣。宋止四乡正者，盖因地无千里，当殷时必为六乡也。宋使司徒令隧正纳郊保之民，与周制遂人以下隶司徒同。

又云，二师令四乡正敬享，不属司徒，则与周制异，若师氏、保氏，皆大夫官，均隶司徒者，周制也。《书序》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康成谓即兼此职。《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师保，知四代皆有此官，必求圣贤为之，故常以三公兼，而本职则中下大夫。《周语》详徇农之典，既曰司空四之，司徒五之，二官，三公官也。又曰，太保六之，太师七之，明师保非三公官。更以伊尹亦曰保衡，微子所告之父师，即太师，知三代此官大略同制。周以其久为三公兼官，而二代三公所兼之重职，又首在司徒，故以师保隶之与？然则宋左师、右师之官，非旧制矣。三宗伯之属，《周语》“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韦注：“阳官，春官。”按：阳，日也，训见《毛诗传》。阳官犹《左传》云“日官”，四时，本日行之南北，故以阳官为名。此犹《周官》冯相保章之属太史也。又云：“瞽帅音官，以省风土。”音官即钟师等官，犹周之隶太师也，四司马之属司马异同，说已见上。宋使司马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工正于周属司空，考鲁叔孙为司马，亦与工正书服，知亦周之侯国用殷之官制，与三司用殷官名，制固同也。五司寇之属，郑注《月令》云：“夏曰大理。”又《曲礼》之五官，末曰司寇，郑云殷制。是刑官之长，殷、周同矣。六司空之属，说亦见上。《周语》单襄公引《夏令》曰：营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宋司城即司空，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云云，《论语》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对曰：先臣惠伯命于司里。知司里掌城内外官舍、民居、道途、里巷，三代皆当属司空。韦、杜皆云里宰，非是。又据《曲礼》注，则司士、司寇与司徒等，为五官之长，而司士不如周之隶司马，此皆三代异同可考者也。其文钩稽三代异同，精核极伦。

复精《仪礼》，常朗诵其经文，不复按本，谓其章句义例、脉络节次最整齐，便记诵，韩文公独以为难读，不可解。其言如此，亦可知其烂熟《礼经》矣。

顾群目为杂学，无延之课徒者，贫乏不能自存。光绪甲申，闻江苏学政瑞安黄公已建南菁书院，专课经史古文辞，乃囊笔渡江，身外无长物，年已六十余矣。书卷字出格外，而义据特确，黄公赏之，为制被送院。院长黄先生，浙东经学大师也，谓

君该洽群籍，为诸生冠，署为斋长，南方学者始稍稍知其名。自是客江阴者八年，正月出门，岁暮乃归，经年不得家书。目眇齿衰，仰课卷以求活，不能专心撰著，然月试之暇，翻阅诸儒经说，犹必尽其首尾，盖好学其天性也。

辛卯之春，犹成《穀梁诂义》一书，至秋季以病返，不再至。久之，始知其卒于家云。其在南菁时，同学多好词章，以君朴学，且衰老，罕就君论学。其既歿之五年，庆年乃取其说经之精者，而为之传，使他日有采焉。^①

朱铭盘 陈玉树

朱铭盘

朱铭盘(1852—1893)，字俶偶，号曼君，原字日新，泰兴县人。出生于贫寒之家，父、祖均为诸生。同治十二年(1873)朱铭盘入泰兴县学。次年冬，入扬州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幕，执弟子礼，聘为纪室。光绪二年(1876)食饩。朱读书极为优秀，体质却一直很虚弱，以致方濬颐入四川任按察使，还写信勉以养生之道：“子癯而善病，每饭不过一盂，荤羶满前，往往不敢下箸。”“不病寒，即病热，且年年病疡。”^②

光绪三年(1877)，至浦口，入吴长庆军幕，始于军中得识通州张謇、海门周家禄等，结为好友，时称通州三杰。六年，因范当世谒武昌张裕钊于金陵，问为古文法，执弟子礼。冬，随浙江提督吴长庆移居山东登州。七年，袁世凯来登州投吴长庆，张謇、朱铭盘、周家禄等为是正制艺，与袁有师弟之谊。八年(1882)壬午优贡，旋举本科乡试。试后，朱即驰往军中，从吴援护朝鲜。乱事既定，朱为吴作东援记功之碑。朱铭盘在汉城，与朝鲜士大夫时有唱酬。

十年(1885)吴长庆歿，袁世凯自结李鸿章，朱铭盘以张謇兄弟与己三人名义写信与袁，痛责其忘恩负义，并与之绝交。信中说道：“窃想司马(案：袁世凯)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案：吴长庆)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吴长庆“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袁世凯“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然而，“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想当初，“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抑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至如今日所闻见者也。”略举一小事，大节可知：“謇今日犹是一

^① 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② 郑肇经：《纪年录》，附朱铭盘：《桂之华轩遗集》。

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①时间不过三年，袁世凯对张謇的称呼竟由“老师”逐渐变为“某兄”，如此狂妄，实让人觉得可笑之至。

十一年(1885)，入江苏学政黄体芳幕，并在学署授黄体芳之侄黄绍第读。又助黄体芳编定《江左校士录》，还用骈文写了一篇《南菁书院记》，但黄体芳未用。后来镌石勒碑的一文，是范当世所写。十三年(1887)，丁继母蔡氏忧，家居。该年，入南菁书院肄业。时无锡孙毓修尚未入泮，亦得借读南菁书院而结识朱铭盘。孙后在商务印书馆，回忆南菁往事：“余年十七，始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一时同学，如朱曼君之骈体，接武齐梁；范素行之经学，折衷郑许。乐旨潘笔，并资宏导；季缙侨纆，深相结爱。”^②孙毓修后来能写一手漂亮的骈体文，恐怕多少也与受朱的影响有关，孙与朱在书院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朱铭盘屡应会试不中，自十四年起，客金州张光前军幕六年，以军功保举知州。军旅生活艰苦异常，朱写信给友人：“所居室屋，截板为盖。墙则土石相积，最畏滞雨。甚或倾坏，小亦中漏若矢，著人床几。或然烛数起，移床就燥。檐滴财止，中响仍奏。”又说“若仆屏迹穷裔之外，放意草木之域。驹卒对话，泥涂为侣。地无冠带，何有士夫？山无林木，何有禽鸟？井泥一斗，何有淪茗之欢？海鸟怖人，何有魴鲤之美？雾风腥鼻，高咏何区？朽石如泥，摩崖无所。以此自构，坐损而已。自夏以往，风力日甚。冬昼出门，更患肤裂，有何可喜而来此乎？”^③然而，办理公事之暇，朱铭盘在凄风苦雨中仍著述不辍。

朱铭盘弟兄三人，幼弟早卒，与二弟朱铭孟常分处两地，手足之情，无时或忘。朱铭盘初入军幕，便寄诗给铭孟：“汝幼不解事，汝兄行路难。先人馀涕泪，贫士古饥寒。对剑悲冯意，临歧眷墨叹。墓门有宿草，摇落梦中看。”^④贫士饥寒，读之鼻酸。有时在病中还要为其弟的婚姻、功名烦恼：“有弟岁已冠，规当今年婚。不能举秀才，念之心中烦。”当得知弟弟已中秀才时，又欣喜若狂：“老兄射策只空回，家弟欣闻举秀才。回首先人翻欲涕，得书笑口暂能开。三韩旅病逢秋色，十月新寒恋酒杯。珍重故园好花树，苦心曾是昔人载。”^⑤

① 朱铭盘：《与张季直昆季致袁慰亭函(甲申)》，《桂之华轩文集·补遗》，《桂之华轩遗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② 孙毓修：《绿天清话·南菁旧感》，《小说月报》第3年民国元年第7期。

③ 朱铭盘：《桂之华轩文集》卷四，《与顾舍人书》，《桂之华轩遗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文海出版社。

④ 朱铭盘：《桂之华轩诗集》卷一，《寄示弟孟》。

⑤ 分别见《旅病述怀》、《喜舍弟补学官弟子》，朱铭盘《桂之华轩诗集》卷三。

十九年(1893)十一月,以病瘵卒于旅顺军中。遗有一子,名骥之,朱死时,才出生一月。当时有传说,称朱铭盘在儿子出生后,大办汤饼会,席中遇鬼索命,父子同时身亡。^①然而,朱铭盘之外甥郑肇经于1933年所编《曼君先生纪年录》则称“公实以病瘵卒于军中,公子骥之,今已年逾不惑”^②云云,则朱铭盘生前不遇,死后尚遭诬言,可云惨矣。

朱铭盘身后凄凉,张謇写信给黄体芳:“曼君妻妾同护一孤,老屋五楹,门扉脱落。謇比为筹别买屋。而六口之家,月用四千,几于喂矣,亦方为之图,而来源益绌。叔颂前辈前许协助,倘有百金存以生息,更以百金益之,冀可敷衍,不审叔颂力能任之否耳?”^③叔颂,即黄绍第,与朱有师生之谊。

朱铭盘于史学甚用力,成《四裔朝献长编》五十六卷。该书“录自汉元年以来至于明季,凡二十五朝朝献故事,通为若干事”。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倾诉自己写作的艰辛:“稍营几案,便置书笔,日为程格,以令自督。所撰集西汉已来四裔朝献事,便已累帙,今须手写,更付庸史,日可十数纸,裁计文二千许耳。”^④

朱铭盘又赅续徐天龄《会要》之书,他与浙江学人谭献通信,说道:“铭盘近颇撰录二晋及南北八朝故事,规为会要,续徐博士之书,其体例乃一依博士之旧。边海左僻,士人又寡,据几抑首,得失自领而已。”^⑤感叹自己僻据辽东军幕,又无友朋讨论之乐,治学得失,只能自领而已。至朱逝世,已成者为《两晋会要》八十卷,《宋会要》五十卷,《齐会要》四十卷,《梁会要》四十卷,《陈会要》三十卷。其他四朝未竟厥功。

朱铭盘所作诗文,大都收在《桂之华轩遗集》中,诗四卷,文九卷。章太炎对朱的骈文评价颇高:“泰兴朱曼君先生少倜傥,善属文。既壮,事武昌张公。张公以古文辞著,而先生善为俚语,犹申耆出于姬传之门也。其文上规晋宋,下亦流入初唐。尝为《鲁仲连碑》,士庶传诵,有夏侯氏《东方像赞》风。他笔札亦称是,其初效初唐者,非其竭思之作也。亦喜赋诗,颇杂宋体,盖清代风习固然。”^⑥

章太炎还为朱铭盘作《像赞》:“海陵之彦,唯君阔步。训辞深厚,翰音飞翥。以彼

① 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下,“名士遇鬼”,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② 郑肇经:《曼君先生纪年录》注七十五,《桂之华轩遗集》。

③ 俞天舒编:《黄体芳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366页。

④ 朱铭盘:《与顾舍人书》,《桂之华轩文集》卷四。

⑤ 朱铭盘:《与谭仲修书》,《桂之华轩文集》卷四。

⑥ 章太炎:《桂之华轩诗序》,《桂之华轩遗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良材，屈身戎路。簪笔乐浪，治书玄菟。嘉之解嘲，宏之作赋。才固绝人，扈亦难度。君歿韩亡，金辽多故。今遂耗矣，君离其汗。”^①最后几句是章太炎有感时事而说的。

陈玉树

陈玉树(1853—1906)，字惕庵，盐城人，故里在今盐城市建湖县上冈镇郊。后更名玉澍，自认为人的一身，当如及时雨那样润泽万物，《说文》：澍，时雨。)有功于社会，于此可见陈的抱负。

陈家境贫寒，父陈蔚林，县学生员，治学勤奋，以善治《毛诗》出名，撰有《诗说》二卷。歿后，江苏学政王先谦曾应陈玉树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说他“能与高邮大师王氏父子相翕应者也”。^②

陈玉树家学渊源，自小受其父影响很大，读书十分刻苦，“弱年授章句，兀坐一室，举案凝思，日以为常。十年遂毕读五经、二十四史，通其大谊。”^③好友李详则称道陈玉树：“君自少时读书辨志，躬赖贫贱，虽遭困阨，浩然之气，不为之夺。”^④少年时的艰难困苦，反而养成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陈玉树大约三十岁时，即写成《毛氏异文笺》，王先谦说：“光绪十二年丙戌，余按试淮安，得盐城陈玉树献所为《毛氏异文笺》十五卷。”^⑤

《诗经》注家众多，其中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大都散佚，只有《毛诗》经东汉郑玄笺注后，影响极大而流传至今。如对辑佚的《三家诗》与《毛诗》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不但经文大意不同，语言文字也差异极大，后来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的成果不少。

陈玉树的《毛氏异文笺》并非研究《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而是专门研究《毛诗》本身众多的文同字异的现象。陈钟凡在《惕庵府君行述》中说：“叔父上承先业，潜心搜讨，知三家字与毛异，毛与毛亦有异也。”接着，扼要举例：

《关雎》曰“君子好逑”，《兔置》曰“公侯好仇”，“仇”即“逑”也，一卷之中，其字不同。

《君子偕老》曰“玼兮玼兮”，曰“嗟兮嗟兮”，“嗟”即“玼”也，一篇之中，其字

① 《桂之华轩遗集》卷首，篆文。释文见《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上。

②⑤ 王先谦：《盐城县学生陈君墓志铭》，《虚受堂文集》卷十，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③ 陈钟凡：《惕庵府君行述》，汪兆镛纂：《碑传集三编》卷三十五。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同此。

④ 李详：《大挑教谕拣选知县陈君墓志铭》，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不同。

《行苇》之三章曰“四糗既钧(按:应是均),舍矢既钧”,“钧”即“均”也,一章之中,其字不同。

《凯风》曰“睨睨黄鸟”,“睨睨”即“睨睨”也,一句之中,其字不同。

“况全诗三百篇,其训同文异者,何可胜数。其中有今、古之分,正、假之别,或杂以讹俗,亦所不免。乃区别异同,考订雅俗,成《毛诗异文笺》十卷。”

关于成书过程,陈玉树在《序言》中称:“会瑞安黄漱兰侍郎督学江南,以经术提倡多士,望风振讯,负笈暨阳,钻研诂训,粗窥门径,考证异同,区别雅俗,不敢望文虚造而戾古义,亦不敢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扃户二载,成书十有五卷。”“丙戌冬、丁亥夏,录稿两呈学政王益吾师,称其引证该洽,唯以体裁未善为嫌。遵守矩矱,更定条例,芟剔繁芜,仅存十卷,易稿数四,书乃告成。”^①

王先谦很看重这部学术著作,于光绪十四年(1888)将它收入《南菁书院丛书》。后来,陈玉树写信给王先谦,提及此事,说道:“玉树粗解章句,非能自力学也,实惟吾父早岁启其径途,以道以掖,俾勿瞽蒙,以有今日。”^②饮水思源,实是当年父亲提携所致。

在南菁书院,学政王先谦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且看重他的为人,王说:“余既嘉其能文、穷经,知古谊,又稔知性行孝友,志气激昂,自树立,意甚重之。”^③院长黄以周也很看重他,对他的学术研究悉心指导。陈玉树亲承警欵,聆听师训,将研究方向由《诗经》转到了《尔雅》。

陈玉树自称:“玉树受经于定海黄元同先生,窃闻其绪论,知释《尔雅》之不可无例,犹之释诸经之不可无例也。于《毛诗异文笺》既就之后,即从事斯经。”^④《尔雅》列于十三经,实际上是一部字书,但通经必先识字,治经则不可不先通《尔雅》,所以历来研究《尔雅》者大有人在。但释《尔雅》不可不先创通谊例,从中找出内在规律,犹如王筠研究《说文》时所作《说文释例》一样。“知不明经文在上之例,则不识萑菴、魮鱒、鷓鴣之为误倒也;不明经文在下之例,不识罇谓之帐、闕谓之门之为误倒也;不明文同训异之例,不识譚之训敬当作禋,琛之训宝当作深也;不明文异训同之

① 陈玉树:《毛诗异文笺·叙》,《后乐堂文钞》卷七。

② 陈玉树:《上祭酒王益吾师书》,《后乐堂文钞》卷五。

③ 王先谦:《盐城县学生陈君墓志铭》,《虚受堂文集》卷十,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④ 陈玉树:《尔雅释例·序》,《后乐堂文钞》卷七。

例，不识宜之训事当作官，禧之训告当作诰也。”

陈玉树研究《尔雅》二年，参考并吸收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儒邵晋涵的《正义》、郝懿行的《义疏》，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等，但也决不盲从，“各有所适遵，亦并有所匡正”，于光绪十六年（1890）写成《尔雅释例》五卷。

学术界对该书评价不低，如著名元史专家柯劭忞就“盛赞陈玉树的《尔雅释例》，教学生用《尔雅》证许为治小学入门之阶”。^①

陈玉树在南菁书院受其师黄以周的影响，对子夏发生了兴趣，认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就数子夏传经最多，没有子夏在学术上的承前启后，几乎也就没有汉儒的经学。然而，二千年来，竟然没有学者对子夏的生平作过详尽的考证，以致这位孔圣传人系年不详。

陈玉树说：“吾尝谓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宋儒之言道学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是孔子为宋学、汉学之始祖，而曾子、卜子为宋学、汉学之大宗也。”^②

陈觉得冷落子夏很不应该，于是博览群书，潜心搜讨，于光绪十七年（1891）撰成《卜子年谱》二卷，“爰起周敬王十三年，即鲁定公之三年，终周安王二年，即魏文侯二十五年”。

陈玉树在经学研究上成就卓著，所以，民国年间支伟成编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陈被收入其中。

陈玉树以经学蜚声江淮间，但他始终认为，通经不但止明训诂，还要求涉于世用。而要经世致用，就应明了历代治乱之理，所以，陈在治经的同时，“渐渍于史”，“于历史舆地、政治掌故与夫百家之说，纬以经谊”，受浙东史学尤其是黄宗羲、全祖望的影响很大，其好友李详称“律以国朝浙东之学，于谢山全氏为近，而原本忠孝，上承梨洲，君孤行海表，一与之合”。^③

陈玉树有积极用世之意，所以他对当时在南菁书院钻研训诂词章之学的众多同窗，时有不满之词。多年后，他在《赠华亭雷君曜同年序》中还这样说：“昔岁在疆圉大渊献，余应长沙王祭酒师之召，负笈于暨阳之南菁讲舍。同学者数十人，率多

① 牟润孙：《蓼园问学记》，《学林漫录》第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陈玉树：《卜子年谱·叙》，《后乐堂文钞》卷七。

③ 李详：《大挑教谕拣选知县陈君墓志铭》，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沉溺于词章训诂琐屑无用之学，罕究心于经济气节两途，即伦理亦未及焉。”^①当时，只有两位同学最与他谈得来，一是武进谢钟英，因为谢“负豪气，纵谭海内形势险要及国家利病、四夷情伪，历历如指掌”，是陈所谓“究心于经济”者；还有一位是华亭雷璠，因为雷是陈所谓讲究“气节”者，平时“喜谭昔贤忠孝大节，每与余言其乡先生陈忠裕、张忠穆、沈忠烈诸公事，娓娓不倦，深慨夫明季节义之盛，迥非今日所逮”。

光绪十四年(1888)，陈玉树以淮安府廪生举戊子科优贡，随即中本科举人。按惯例，陈以门生礼谒拜座师、房师，该科乡试主考是王仁堪，殿撰出身，当时声誉正隆，“文章经济，咸推为他日封疆之选，非风尘中吏也”。王对陈很赏识，临别时，陈请赐训言，王仁堪说：“吾愿汝为古之志士，不愿汝为今之名士也。”^②陈本以经济气节自负，现听座师勉励，更是深受鼓舞。

陈在南菁肄业，其出众的才华，给南菁师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赵椿年晚年回忆起这位已故学友时，称赞陈“通经史，治古文，精义瑰词，必传于后”。^③

陈玉树中举后，数应会试不售，后大挑教职，但陈是用心用世之人，要他去做一个不与世事的教官，有违本心，所以始终没有赴任，终其身，未任一官半职。“平居耽学乐道，不慕荣利”，当世公卿慕其才学，“争先礼聘”，“皆坚辞不就”。

丙申(1896)应本邑知县之请，纂修邑志，成《盐城县志》十卷。

陈玉树对家乡故人一往情深，虽不肯做他乡教官，却义无反顾地服务于故乡的教育事业，应邀主讲盐城尚志书院。书院改学堂，仍执掌教鞭多年。对盐邑莘莘学子“勉教教诲，赤心正人，气象森严如泰山，而中怀慈祥和惻怛”，“学者罔不敬而惮之”。当年亲炙门下的蔡云万，称赞其师“学术朴茂，以经史实学倡导后进”，而“及门诸生均为本邑优秀分子”。回忆自己当年受业情形：“偶有请业，先生欣然以告”，但平时则“道貌岸然，沉默寡言笑”。^④

甲辰(1904)秋，应两江总督周馥之邀，担任三江师范教务长，但莅事仅十七日，便拂袖而去，其中原委，其侄陈钟凡说是“诸生凌蔑教条”，其友李详也说是“以礼责诸生，诸生哗然”，“惕庵即襍被归”。毕竟时局不同了，学生也不可能像陈玉树当年在南菁书院那样循规蹈矩，一心专做学问了。但陈玉树对此无法理解，感慨“士习

① 陈玉树：《后乐堂文钞续编》附录，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④ 蔡云万：《蛰存斋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颓坏”，希望能重振尊师重道的学风，写成《教育刍言》三卷。

乙巳(1905)，曾应邀入广东布政使程仪洛幕，仅数月而已。归家后不久，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招，再赴广东。陈玉树目睹当时“世变日棘”，而在下“国人之言民权者，号召徒众，期于旦暮急进”，陈如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对此持保守态度，认为这样做，是“不惜以国家为孤注”。而官场仍醉生梦死，不知应变，所谓“官吏又怵于祸变务为深闭固拒”。这样就形成“上下激荡，寝成相持之局”。陈玉树希望民间百姓的痛苦万状的隐情能上达当局，而官场中更应激浊扬清，认清形势。于是，“取新旧两者之说并折之”，写成《民权释惑》二卷。

陈在广东督府游幕约一年，便因中风返乡，几个月后，不治身亡，死前还写成《米禁问答》一卷。

如前所述，陈玉树晚年曾二次南下广东，先后在督抚幕中约二年。之前一直隐居乡里，服务桑梓，只要是有关乡里公益之事，总是任劳任怨，奋勇直前，哪怕遭人误解，深受委屈，也义无反顾：“若修天妃闸，请罢设台捐，严定米禁诸役，皆焦神苦思，亲犯不韪。”李详称赞他“以一儒生号呼当路，咸亮其志，俾底于成。萧然往来，绝口荣誉，清如夷惠，勇过贲育，非君孰能任之”。直至病危，仍念念不忘民生疾苦：“病既危笃，咙胡寤语，犹以米禁为念。”^①

陈玉树精通经史，是学者；又是诗文大家。他的诗文，充满忠烈之气，多精义瑰词。肄业南菁时，正值所谓“同治中兴”后，“海内可称粗安”，但陈玉树深悉社会弊病，对外国列强的潜在威胁，更是有清醒的认识，这些都反映在他的诗文中，而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怪其无哀而戚”。及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割地赔款，陈玉树痛心疾首，“发为文章，语益壮烈”。所写诗歌，有揭露时弊，也有歌颂仁人志士的。《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七律共十首，录第十首：

国恩养士重山河，赢得衣冠间谍多。吴昊呼朋潜入夏，惟庸遣使远通倭。
春官辛苦载桃李，秋实荒凉老薜萝。十载楚材零落尽，九重南望泪滂沱。^②

第三首、第四首则分别歌颂为国捐躯的左宝贵、邓世昌，第四首有句云“苦战谁援冲突将，楼船血溅海涛红”，尤为感人。

陈玉树的诗有时写得明白如话，却又韵味隽永，如《江上送别》：

江雨初过江花香，江月欲堕江风凉。此时送客江上去，江水悠悠江路长。

① 李详：《大挑教谕拣选知县陈君墓志铭》，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② 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十首之十，《后乐堂诗存》卷一。

我亦江头作客人，客中送客最伤神。登楼不见帆行处，但见白云挂江树。^①

有可能是陈玉树读书南菁、作客暨阳时所作。陈少年时亦有风流缠绵之作，如《秦淮忆旧》有句云：“风动帘钩肠欲断，如闻环佩响叮当。”^②是道学面孔下的真性情的流露。

陈玉树学有本原，故其为文“驰辨博喻，取证前古，烂然溢目”。^③陈肄业南菁书院时，曾上学政王益吾师《请毁奄党毛一鹭碑文启》：

昔明政不纲，奄寺用事，熏庙曠眊，委鬼獶猖，杀戮忠良，觊觎神器，毒流薄海，祸延奕世。元气朘削，明社以墟。虽当时以磔其尸，而后世犹怀厥愤，祁门张瑗所以奏请划其墓，仆其碑也。彼魏忠贤者，本阉杯之质，秉阴邪之姿，叨窃非据，恣睢固宜。使非彪虎之徒，似蚁附羶，如蝇集臭，抱薪以助其燎，掘泥而扬其波，亦未必毒焰熏天，狂烂沸地。乃知鬼域啸凶，鹰犬搏噬，罪实同于卖国，恶乃浮于元凶。

生昔游学暨阳，见学署堂壁有阉党毛一鹭碑记，不禁愤填胸臆，欲借击建福之雷，剉斯顽石。综核一鹭为人，早掇巍科，历膺臚仕，以士林而谄附权珣，丽逆案而名在戎籍。普惠之生祠可建，虎邱之山石贻羞。吕纯如之譖周忠介，则不知其妄；于杨维斗之救周忠介，则喑无一词。迨义民聚哭而鼓噪，旗尉仓皇而奔逃，一鹭则匿厕全躯，飞章告变，借倡乱而磔五人于市，复上书以安忠贤之心，是其甘心附逆，罔知廉耻，较之呼九千岁、列四十孙者，殆无以异。

即以莅吴而论，既抚民而得罪于民，岂校士而有功于士？未可以提学之故，遂留其论撰之文。夫猛虎文彩彪炳，益张厥威；鸩鸟羽毛紫绿，不掩其毒。苟有文而无行，当以人而废言，纵非诋辞，亦为疥壁。

当时罹珣祸者，如李忠毅、缪文贞皆产暨阳，至今綈楔巍峨，行人瞻仰。是邦素号忠义，何地可容垢污？且媚阉而荣者之恶不讨，即忤阉而死者之愤不申，缪、李两贤行且衔悲林下。急宜铲削遗文，昇投烈焰，书其罪以榜通衢，为之记以垂来世。彰瘡之义以明，蕲兢之风可挽，此亦正士习、作士气之一端也。

生素怀忠义，疾恶若仇，临启无任急切之至。^④

① 陈玉树：《江上送别》，《后乐堂诗存》卷一。

② 蔡云万：《蛰存斋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案：此诗《后乐堂诗存》似未收。

③ 李详：《大挑教谕拣选知县陈君墓志铭》，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④ 陈玉树：《请毁奄党毛一鹭碑文启（上学政王益吾师）》，《后乐堂文钞》卷七。

陈玉树此启，直追张溥《五人墓碑记》风骨，百年后读它，犹觉忠烈之气扑面而来。

陈玉树所作诗文，生前就已结集刊行者，为《后乐堂文钞》九卷、《诗钞》一卷、《续钞》九卷，“大旨以明天道、正人纪、致郅治为宗，无关当时之务、六经之旨者，一切不为。律以亭林顾氏之学，有同符焉。”而顾炎武为学，本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宗旨。陈玉树为自己的诗文集取名“后乐”，当然是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后乐堂文钞三集》六卷，以及《汴游笔记》一卷、《粤游笔记》一卷，尚未见刊本。

关于《粤游笔记》，王欣夫藏有雷瑄手跋之钞稿本，称“《粤游日记》二卷一册”。王说：“此记光绪癸卯应广东布政使之聘入粤，自九月十三日启程，至岁暮而归。广州为通商大埠，其时吏治民风，刻剥奢侈，有积重难返之势。”又抄录笔记中陈玉树之言：“时岑春煊为总督，锐意欲澄贪墨之风，而上下相蒙，无济于事，方且与桂抚柯逢时意见僻驰，多所掣肘。”最后王说：“凡此记载甚详，可作晚清史料，不仅游记而已。”^①

陈玉树是南菁书院高才生，更是盐城地区的杰出人物，李详说：“余往谓盐城得县以来，自臧子源、陆君实后，文章行义，未有如君者。”^②

谢钟英 孟 森 丁国钧

谢钟英

谢钟英(1855—1901)，字钟英，以字行，武进县罗墅湾人。谢之祖上世代为医，其父谢润，字葆初，县学生，因“早得手振病，遂弃举业，专攻医学”，“施济贫病，乐而不倦，族党钦其行谊，推为宗正”，“遗著有《医林纂要》数十卷”。^③

谢钟英六岁时，“洪杨难作，避地江北泰兴县，随太孺人拾菜根为食，朝出暮归以为常”。^④迨战乱平定，返乡，“故庐仅存，风雨不蔽”。此时谢钟英“年十岁，尝为小贩以炊家”。一年后，母亲又不幸病亡，谢钟英与父亲相依为命，而亲属凋零，贫病无靠。“隆冬犹御夹衣，年二十，始制一袍。夜覆一衾，阅十七年未更易。”^⑤谢钟

①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二，《粤游日记》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512页。

② 李详：《大挑教谕拣选知县陈君墓志铭》，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七十五。

③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谢润谢钟英传》。

④ 唐文治：《谢君钟英家传》，《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同此。

⑤ 张元济：《谢钟英先生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十八，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4—1265页。

英刻苦劬读，二十二岁补县学生员，便“设帐授徒”，凡东家藏书富有者，谢钟英尽皆读之。

谢钟英上承乡先生恽敬、张惠言、李兆洛遗绪，然亦不墨守阳湖文派规制，“为文上规韩非、国策，下逮昌黎、眉山，不屑屑以宗派鸣也”。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十二，入南菁书院肄业，益钻研故籍。为文踔厉风发，肆外閤中。学政王先谦器赏之，评其文曰：“熟于操纵离合之法，于此道三折肱矣。”还说：“善为史论者，南有谢钟英，北有袁銜。”^①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武进谢钟英(以字行)，治史学、古文、輿地，不坠常州先辈家法。”^②

唐文治回忆与谢钟英同学南菁书院的情景，尤为真切感人：

当光绪癸未、甲申之交，吾省学政瑞安黄漱兰先生于江阴设立南菁书院，长沙王益吾先生继之，招罗俊彦，宏奖风流。于是，大江南北，人才鳞萃，时则有若吴县曹君元忠、江阴章君际治、淮安陈君玉树、丹徒陈君庆年，皆一时名俊。

余于乙酉岁滥竽其间，君后余一年而至，相与考古证今，上下其议论，君尤慷慨自负，出语惊座人，有时彼此纵饮，放论高歌，旁若无人者。江阴古称芙蓉城，君尝大言“吾为石曼卿芙蓉城主”，余笑语之曰：“与其为曼卿，曷若为六一居士？”君瞠目曰：“吾文学老象，子于庐陵，其庶几乎？”太仓朱君映奎谓之曰：“君以名为字，后代子孙宜如何讳？”君曰：“何害？他日当称谢文襄公可矣。”其自命若此。

谢钟英在南菁肄业时，见到《水经注》有些河流缺考，而胡渭、赵一清等地理学者所辑录的遗文，谢认为舛误百出，于是撰写了《补水经注洛水泾水武陵五溪考》(一卷)，立即受到行家的好评，被王先谦收入《南菁书院丛书》第四集。

后举戊子(1888年)优贡，旋中本科举人。入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幕，深得信任，“论事论政，深相契合”，在署凡八月。后随黄赴湖北，张之洞问黄彭年“幕府杰出者谁”，黄以谢对。黄逝于任，张之洞即延谢为两湖书院斋长。

谢钟英生平致力于輿地之学，“纂《三国疆域志补注》，以洪北江先生《三国疆域志》为蓝本，旁考历代地志，而折衷于陈寿《三国志》，综其事迹年月，用作定准”。及在两湖书院，“虔集尤夥”，“日夜考订，成书一十九卷，都凡三十余万言”。此书一

① 李详：《袁淡生传》，《学制斋文钞》卷二，《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页。案：袁銜，泰州人。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出,识者见而叹曰:“北江先生有知,前贤畏后生矣。”

光绪十八年(1892)入京会试,与同乡吴稚晖相识。吴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这位南菁学长的外貌与言谈:

同城谢君钟英自南来,在前庭一揖。至晚,相晤于孟公所。人甚朴素,布棉袍褂,皆半旧,土做布鞋,水晶无边铜脚眼镜,须根满嘴,腰肢硬直。伊与孟公谈别后事,并出所撰《补洪稚存三国疆域志并注》五巨册稿本示人,意甚得。又言必称不通,然谈及人之巧文者,往往以作者自负,盖纯以质直朴野自处,人亦以是重之也。

所作书,略一翻阅,颇具苦心。考据家多巧取证佐,往来凿通,此君殆可免矣。^①

吴稚晖称谢“质直朴野”,很敬重他。对于谢所撰书,也大加称赞。吴稚晖平素不轻易许人,说谢钟英于“巧取证佐,往来凿通”的弊病“殆可免矣”,已是很高的评价了。

谢钟英的史学成就主要就是这部《三国疆域志补注》的撰写。陈寿的《三国志》原本无志无表,后人间有补续。清儒洪亮吉曾作《补三国疆域志》,有功于陈书,但缺漏讹误亦在所难免,谢钟英指出:“洪氏原本《郡国志》、《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旁及《水经注》《通典》、《元和志》、《寰宇记》,而《国志》反见遗漏,虽云纂辑,乖乱实多。”^②谢认为,洪亮吉为补作三国疆域志,搜集他书资料很广泛,却偏偏没有从陈寿《三国志》本身就地取材,《三国志》虽无地理志,但在纪、传中有不少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载,洪氏忽略陈书本身,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谢钟英就在洪书的基础上,“审其是非,折衷《国志》,自州郡至于关津镇戍,废置分合,必求故事以实之。根究时事,缺疑著是,意在甄明,非关抵隙”。但《三国志》叙百年之事,而“百年之内,置场无常”,洪书中所征引之书“纷纭异说”,只能“择善而从,正位辨方,务令今古相等”,谢钟英不禁感叹道:“抉择之难,盖甚于采集矣。”谢用力十年,易稿五次,三年精心结撰,终于完成了经营多年的学术著作《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十五卷、《大事表》一卷、《疆域表》二卷、《志疑》一卷,共十九卷,内有七十多张图。谢钟英画

^① 《吴稚晖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

^② 见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之“凡例”,《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案:《郡国志》,当指(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司马彪书今佚,然八志(包括《郡国志》)尚存,被(梁)刘昭补入范曄《后汉书》内。

疆域图,受到王先谦的指导和启发,他说:“长沙祭酒王先生曰:‘洪志缺误,病在无图,若取两汉志为根,绘图稽合,以北江为前导,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后谢钟英将当时的府县疆域用虚线画,三国时的郡国疆域图用实线画,虚实分明,开卷了然。谢钟英为洪书作补注,非为争胜,而是“意在甄明,非关抵隙”,书成后,在书前写上了“阳湖洪亮吉撰,后学武进谢钟英补注”的识语。

癸巳(1893)春,受台湾巡抚邵友濂聘,渡海,遇台澎兵备道顾肇熙,留充台南盐务总局提调。谢钟英“综核名实,剔除积弊,去巨蠹十余。时请托之风孔炽,甚至有以苞苴金帛啗君者,君屹然不为动”。在台湾一年多(十五个月),由谢初上任时的“库无余资”,至受代离去时“积银多至百余万”。^①

甲午(1894),湖南巡抚陈宝箴耳闻其名,奏调入湘,委文南洲厅,清丈洞庭湖沙田。谢“躬自督率,虽风雨烈日不少懈,豪滑有梗阻者,惩治之,吏役咸敛手。克期蒞事”。返省城长沙,王先谦称赞这位昔日的南菁门生“公平精细,为同时奉委者冠”。

陈宝箴也赞扬谢钟英强毅耐劳,通达时事,“奏保以知县,送部引见”。唐文治当时正服官京师,“阅邸钞,见湘抚陈右铭中丞荐君‘强毅耐劳,通达时事,考绩称最’,余大喜,以为君得展所长矣”。^②正当唐文治为这位南菁同窗庆幸前程远大时,事情却起了变化。

戊戌政变,陈宝箴落职。谢钟英匆匆从京师返湘,欲与陈同去,为陈所劝阻。“君怏怏留滞宦途。会大吏檄君办理矿务,语不合,遽挂冠归。”谢钟英后在苏州授徒自给,“与诸生讲学,以义理、文理、事理为三大纲领,于性理诸书及古文、资治通鉴外,深有会于王阳明先生致良知之学,以为精深宏大,无为而无不为,圣道端在是矣”。

谢钟英“少时过于刻苦,劳心又太过,遂得胃病,中年后,病益深”。^③终于不治,辛丑(1901)五月,病逝于苏州。

唐文治后来为谢钟英作《传》时,开首便说:“其特立不朽者,厥有两端:曰文章,曰政绩,而吾友武进谢君为兼得之。”谢钟英文章有《三国疆域志补注》,精博绝伦;政绩则有其才而未尽其用,惜哉。谢居官清廉,“以幼时饱受锻炼,故壮岁膺臬仕,

① 张元济:《谢钟英先生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十八,第1264—1265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唐文治:《谢君钟英家传》。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

能自守如寒士。尝自言：“惟俭养廉。不滥用，斯能不苟得也。”^①

在南菁书院时，谢钟英与陈玉树为同窗，相知甚深，均以经济气节自厉。两人都受知于江苏学政王先谦，选戊子（1888）优贡，并均于该科中举，为乡试同年。八年后，陈玉树复谢钟英书，回忆南菁友谊之难忘，并又商讨学术之不同：

自著雍困敦（案：戊子）之秋，秣陵判袂，不聆渠诲，八艾陬涂。回忆暨阳共研，江路同舂，雪泥尘蹊，散如烟雨。昔迹谅直，不知悛悻，今索居愆滋，望益无径，求如前此之乐，胡可洵也。……

执事谓宜塾创自强，海崇西学，识时镜机，伟哉渊乎。然不佞尝谓为国之要，首正人心，国无人不可谓国，人无心不可谓人。彼谨守长乐老、太平翁之心法者，心固亡矣。即胡广中庸、王珪三旨，心亦奚存？以不克自保其心之人，而欲责以保人之国，是犹未能举寻仞之挺，而欲使扛百钧之鼎，三尺髻稚当亦哑然。……^②

时陈玉树主盐城书院，大概谢钟英认为书院要“创自强”、“崇西学”；而陈则认为“为国之要，首正人心”。可见，自甲午战争之后，不少中国知识人的观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晚年倾心阳明之学的谢钟英，也同时主张“创自强”，“崇西学”，不应墨守成规，而要“识时镜机”。

谢钟英逝世的那年，他的同乡孟森正肄业于南菁书院。孟森日后的明清史研究，超前迈后，享誉学界，而其在南菁的攻读，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

孟 森

孟森（1868—1938），字莼生，别号心史，阳湖人。自幼负大才，拓弛不羁，有“清狂”之名。累应有司不得志。其所（作）制举文逼近天、崇，尝言：“海外擅此艺能名家者，如康有为、郑孝胥、张謇、刘可毅辈不满十人，而我则未遑多让。”^③

孟森于八股文的写作很自负，对两个弟弟又照顾有加。光绪辛卯（1891）乡试，孟森自谓其文必能中式，以其弟孟昭常初次入闱，孟森戒之曰：“汝之制艺脱稿后，须由我过目，当为修改。”孟昭常依其言。及号门开，孟森来，则袖其稿而去，以其自撰之稿易之，孟昭常怏怏不得已，互易其文。榜发，孟昭常中式，而孟森则落第。

及甲午（1894）乡试，孟森又率其弟孟鑫入闱，又预戒孟鑫文稿必先由我过目，

① 张元济：《谢钟英先生传》。

② 陈玉树：《与武进谢钟英书》，《后乐堂文钞》卷六。

③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传》。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同此。

孟鑫佯诺之，属草毕，急誊清于卷。及孟森又来易稿，则已无及，孟森含怒而去。及榜发，孟鑫中副车，而孟森仍不第。

戊戌(1898)，孟森与其弟孟昭常同人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肄业，兼任中、小学教员，时总理为何嗣焜，与孟为同乡。孟森以“顽固”自负，对校中课程多所訾议，教务长见之，不悦。何嗣焜不得已，调孟森至译学馆，主持译务，有日人为助手，因此得略通日文。

辛丑(1901)，进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及壬寅(1902)，南菁改为高等学堂，森仍以“顽固”自负，阴结年长学生多人反对上课。丁叔衡山长为之不悦，意欲去之，森闻之，先辞职而出。蒋维乔于此事有如下记载：

堂中肄业诸生，皆是秀才或举人，年最少者，亦在二十以上，故多反对上堂听讲者，遂分新、旧两派。新派以余及常熟丁芝孙(祖荫)、无锡顾述之(倬)、黄芝年(以仁)为首领；旧派以武进孟莼生(森)、梅今裴(调鼎)为首领。新派主张上课，旧派主张不上课。丁总教习(旧称山长，现改今称)则左袒新派，卒至孟、梅二人，无形中取消学籍，中途退堂。^①

后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聘孟森为纪室，待以上客。孟森感激知遇，为撰《广西边事旁记》，于孝胥之成绩极力推崇。孝胥罢官时，资送森及昭常兄弟俩赴日本留学速成法政，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②孟森自此即留意政治，不若以前之“顽固”矣。

留学归后，正值清廷已下诏预备立宪。森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政法书，兼主持《东方杂志》。未及数载，又出而主持《时事新报》。

辛亥革命风潮起于武汉，波及长江下游。上海一埠，为全国所注目。苏浙名流张謇、汤寿潜为物望所归，同盟会中人亦注意两人之举动。有赵凤昌者，与张、汤素相结纳，乘机怂恿两人电请清廷劝令退位，并介绍孙文、黄兴与张、汤握手，而孟森实往来奔走其间。孟曾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起草誓师檄文，表达其立宪派的政治主张，他在檄文中称“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如此则“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

^①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叙光绪二十八年(1902)事。

^② 案：不少有关孟森的论著，叙述孟之生平，将孟之赴日留学时间定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今姑从张惟骥说。

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①

民国成立后，被推为临时参议院之江苏代表，是为孟森涉足政治之始。然孟森不善辞令，其见解又往往与人不合，与政客相处稍久，渐渐厌之。临时参议院解散后，即不复出，而从事著述。

孟森治学严谨，守乾嘉朴学矩矱，重学界公德，他曾与冒广生鹤亭的信中说：

近有妄人作《红楼梦索隐》，纯以《板桥杂记》串合金陵十二钗，以董小宛与清世祖为宝、黛，真异想天开，荒谬已极，亦当有以驳正之否？董歿于庚寅，年二十七。世祖时年十二，正摄政薨逝之年。豫王已前卒。刘三秀非豫王所娶。皆彰彰可考也。^②

信中所提“妄人”，乃蔡元培也。事关学术公德，竟不得不对这位时任教育部长、北大校长的辛亥元老也出此不逊之词。后孟森于1915年撰成《董小宛考》，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六卷，后收入《心史丛刊三集》。该文澄清了当时对《红楼梦》种种异说，为小说考证建立一历史方法的基准。^③

孟森与张謇交往甚深，民国《南通县志》由南通范铠于民国三年（1914）纂成，时南通县知事为宜兴储南强，范、储二人均为南菁书院先后同学。数年后，张謇又请另一位南菁院生亦是挚友的孟森“校订前失”，自己则“复排百冗，日校为课”，于民国十年终将该志续成完帙。^④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军北伐，平定苏、浙。苏省主席钮永建聘孟森为秘书。钮永建与孟森虽是南菁同学，但入院先后相差十年之多，估计两人相识应在南洋公学。钮永建和孟森先后翻译过日人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在学术上也算是有过一段因缘。孟森对苏省事务，常有所建白，然而，不一年，又因某事离职。

1929年，执教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两年后，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专教明、清间历史。孟森得以其暇纵览北京各图书馆藏书，及明清间之档案。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刚收藏一部《朝鲜李朝实录》，知者不多，故阅读者很少，常去借阅者仅孟森和吴晗二人。孟几乎每天都步行去图书馆阅读钞录，寝馈其中。当时孟森已年近七旬，犹终日伏案，孜孜不倦，偶有所得，欣然忘餐。

① 孙家红：《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何龄修编：《孟心史学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9页。

②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页。案：“世祖时年十二，正摄政薨逝之年。”原标点为：“世祖时年十二，正摄政，薨逝之年。”误，径改。摄政，多尔袞也。

③ 吴相湘：《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何龄修编：《孟心史学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9页。

④ 张謇：《南通县志》之《续纂后传》。

孟森在北大与胡适接触较多,互相敬重。作为老辈学人的孟森很尊重年轻留洋学者胡适的见解,常与胡适谈论时事与学术。譬如,关于“尊经”的问题,孟森是在南菁书院受过经学训练的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士大夫,若谓不出于六经,试问古来更有何物为制造之物?”胡适则认为,此问题甚大,不容易有简单的解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总之,六经不足为“旧士大夫之来源”,尤不足为新的领袖人物的来源。^①又如,关于《水经注》戴震有否抄袭赵一清的问题,胡适很看重孟森的考据功夫,相信孟森认为戴钞赵的结论确凿无疑,虽然后来胡适于此问题的研究有反复。

抗战爆发,孟森留守北大。民国二十六年冬,发现患胃癌,住进协和医院。二十七年初,卒于北平。享年七十一岁。

孟森著作等身,是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其取得的成就,有些方面即便今人也很难超越。孟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刊行者,有专著《清朝前纪》,《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记》,散篇论文则辑为《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政论文集刊》。其他专著如《广西边事旁记》,《霜猿集校订补注》,《汉书古今人表通检》以及对唐宋历代史事和《水经注》考证等单篇论文,均尚未重印。

丁国钧

丁国钧(1855—1919),字秉衡,常熟县人。生平学行,见曹元忠所作《家传》,略云:

随学使者至安徽衡文,闻黄先生主南菁讲席,以三礼教授,乃归里受学,元忠始与君相见,引为同志。因论齿十年以长,遂兄事之。

时同门友治经之外,有通州盛寿山治音韵,静海崔聘臣治算术,武进谢钟英治舆地,其后各自名家。惟君治《晋书》,发篋出汲古阁本,则密行小字,朱墨灿然,皆君历年钩稽群籍所心得,遂成《晋书校文》,黄先生序以行世者是也。

暇又探讨经典,蒐罗史志,旁及类书、释藏,加以考核,成《(补)晋书艺文志》,见者服其精博,以为钱竹汀之补《元史》,侯君谟之补《汉书》不是过焉。当是时海内士夫为志者,有华阳杨中书叔峤,钱塘吴侍讲炯斋,闻君此书,咸欲以

^① 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五册《胡适文存四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2页。

一见为幸。

岁甲午，座主冯侍郎联堂、黄编修叔颂典试江南，至以两晋艺文发策，冀获得君。顾君以场前先以活字版印所为志，遍赠同试者，随至不可辨识。及榜发，又下第。侍郎、编修相顾愕眙，曰：“此命也。”

明年，长沙龙侍郎芝生视学江苏，见君文，亟赏之。任满，上疏举君精通经术，请以训导用。^①

在南菁书院，黄以周为《晋书校文》作序，对该书体例深表赞赏：“秉衡初欲注《晋书》，乃先参校各本，是正其文，补脱删衍，悉有依据，而事迹有违盭，见闻有踳驳，搜求今古书之存佚者，以备扬推。其书体例与吾家《史记》校本相若。”^②

丁著《补晋书艺文志》，素称精博，日本学者市邨谦士牧曾为该书作序：“往于友人处见侯康补《后汉》及《三国》艺文二种，惊为盛业，今又获睹是稿，中国史学之盛，彬彬莫与京矣。”推崇丁著“体例之善，搜采之博，较侯康二《志》殆有谓‘韶’谓‘武’之判，必传于后，无疑也。”^③

丁国钧屡试秋闱不中，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苏学政龙湛霖保奏以训导用，“旋授仪征训导，识拔刘申叔于幼年”。则丁国钧还是刘师培早年的老师，且有识拔之恩。王欣夫与丁国钧相识，并问学于丁，受教甚多。王记：“余于一九一九年秋冬间视大姊于虞山，先生故有姻联，日与邵伯英松年、邹介修纯福诸老辈茗话于枕石轩，而先生教告尤殷。”^④丁国钧曾校洪亮吉《四史发伏》的顾湘小石山房刊本，“全书朱笔灿烂，用功殊深”。王欣夫在虞山“曾假是书，照临一通，略得校史之方”。王“其后校读《通鉴》逾十年，先生所启也”。

王在虞山逗留不久，“岁暮旋苏，约明春偕赴沪，谒艺风，至南京助校杭州丁氏所藏宋本《晋书》。乃未几而讣音至矣”。缪荃孙也是丁国钧在南菁书院的老师，1919年逝世于上海，而常熟距沪不远，丁竟未知老师噩耗，还想陪同老师赴南京校读宋本《晋书》，丁氏一生于《晋书》可谓用情专、致力深矣。

丁国钧随即由同乡翁炯孙推荐，入王同愈湖北学幕三年。王对丁极为尊敬，称其“积学之士”，“博闻强识”，并在其日记中屡提到“丁秉翁”行踪。王同愈还郑重记

① 《四史发伏》十卷，清常熟丁国钧手校本并跋，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第470—471页。案：据王说，曹元忠所撰《丁国钧家传》为其所藏者，只是残稿耳。

② 黄以周：《晋书校文叙》，《傲季杂著》五《文钞》卷二。

③ 《补晋书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影印版。

④ 《四史发伏》十卷，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第470—471页，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录丁国钧说汲古阁事，虽迹近小说，亦可备一谈资：

虞山丁秉衡国钧学博，博闻强识，能谈乡邦黎献。余督学荆楚时，邀同襄校，校艺之暇，辄与纵谈今古，时获异闻。其言汲古阁主人致富事，足供纪述，今叙于下：

初，毛一寒士，应童子试，舍于逆旅，夜如厕，见道左井上覆一笠，揭视笠下，悬一铎。怪之，仍覆置井上，却舍数武，蹲伏暗隙，以覘其异。俄一伟岸丈夫来井边，旋四顾，索得毛，曰：“子何窥我隐？”毛惊惧，力白之无。曰：“子无诳。”已而提灯烛毛曰：“子相颇不俗，能从吾游乎？”毛异其言，姑诺之。其人再三丁宁，告以居停而去。毛固少年喜事者，且亦正无聊赖。诘朝造访寓庐，北面执弟子礼甚恭。其人喜，曰：“稚子可教。吾少受异人术，能于千里外袭取人财物，今授汝术宜秘之。”不数年，毛赀雄于乡。毛每出，必乘官舫，盛供张，俊仆十数辈，起居服御状若贵胄。至夜，短衣窄袖，越城闾如履门闾，担囊揭篋，悄乎返舟，长年僮从皆不知也。是时，江南北巨室辄被盗悬案累累，迄不得踪迹。以是拥厚赀者，咸有戒心。有某富室，养力士以自卫。时毛已家贍志足，亦虑有万一之失，为世笑戮，誓不复为。而涎某富甚久，思一作冯妇。先日往探进止，力士已觉之，密白主人曰：“日有华服客屡过吾门，必有异，夜宜戒备。”而毛自谓莫予知也。逾垣入，落网中，铃索大震，五兵蜎集，毛窘甚，且拒且跃，且自讼。正危迫间，有执长枪者猛力上刺，着毛革靴底，毛借刺力跃而起，乃得脱，仓皇遁归，心胆俱警，自是辍业。

明末盗贼蜂起，所在剽掠，毛富名噪甚，家居常熟之南湖滨，四无邻舍，乃散家赀，广刊古籍，养劊刷氏数百辈，列屋成市，盗贼不敢犯，家赖以安。

有老翁者，其裔孙也，与秉衡之祖为莫逆交，一日醉后，为述先世事甚详，不稍讳。秉衡乃得之祖庭云。

此亦藏书家一大掌故也，爰亟录之。^①

丁国钧一生藏书、校书、著书，至老不倦。其所校书有时亦为他人所窃名者，如其校清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跋云：“章先生是书，余喜阅之。偶有所见，率于书眉行间，杂志数字，以便查检，同人颇有假阅者。某君在省垣，自夸曾校治此书，出以示人，共相倾倒。不知即录余识语也。余不忍发其隐。后之见此本者，得勿转

^① 王同愈：《榭缘日记》，第253—254页。汲古阁主人事，则见《榭缘随笔》，第456页。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疑由某君本传录乎？一晒。秉衡识于注晋书室。癸巳冬孟。”^①虽自称对抄袭事付之一晒，然心中不快显而易见，因后人如不明就里，还会反过来怀疑丁氏抄袭“某君”者。

赵椿年晚年提起这位南菁同窗，称“常熟丁秉衡国钧，治史学、词章，深于《晋书》，则丁国钧也娴于词章。除《晋书》研究的专著外，丁国钧尚有《荷香馆琐言》、《疑雨集注》等笔记、文学作品行世。

笔记《荷香馆琐言》的手稿本，经上元宗舜年、常熟丁祖荫校过。王欣夫说，该笔记“虽一鳞半爪，亦有俾掌故”。如“《李高阳遗事》条云：庞幼庵中丞言穆宗病亟时，先召李文正，后召沈文定。谕沈谓遗诏已付李师傅。沈出询之，文正唯唯。及大渐后，文正忽不认有遗诏云。庞为文定婿，此事亲闻之文定者。”^②庞鸿书是丁国钧的乡前辈，沈桂芬的女婿。丁所记此“琐言”当离史实不致太离谱，是所谓“有俾掌故”者。难怪张舜徽引述《荷香馆琐言》时，称丁“师事定海黄以周、江阴缪荃孙，故为学有端绪。”^③

丁国钧曾为明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作注，历时数十年，始成定本。友人李详为作序，称：“今之嗜次回诗者，能诵其词，试诘以某隶某事，往往瞠目致谢，无他，凭虚易循，征实难悉也。余同门友丁君秉衡，以馀事注此，舟车所至，携以自随，历数十年，始写有定本。余请而观之，则一一疏豁，略无滞疑。次回所误用者，如‘窃铁’、‘同栏’诸条，能证其误之所由。又考次回所与往来者，综其贯履，其人多不通朝籍，君乃展转得之，可谓甚难。”^④

丁国钧还为李详的笔记《媿生丛录》作过注，然未见刊行。丁之《荷香馆琐言》与李之《媿生丛录》，可称晚清笔记的上乘之作，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

庄蕴宽 赵椿年 夏仁虎 庄蕴宽

庄蕴宽(1867—1932)，^⑤字思缄，号抱闷，晚称无碍居士，江苏阳湖人。“庄氏

① 《隋经籍志考证》十三卷，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第948—950页。

② 《荷香馆琐言》手稿本，不分卷（一册），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第998—1000页。

③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8页。

④ 李详：《疑雨集注·序》，《李审言文集》，《学制斋文钞》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03页。

⑤ 冯飞编：《思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称：“丙寅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则公历为1867年1月3日。案：庄之生年，习见1866年，实误。

世为江南大族，经学文史代有述作，自明以来，俗称常州四大姓，庄、刘、吕、赵者也。”^①父士敏，字仲求，号玉馥，佐吴越幕府者十年，后署福建霞浦县事，死于任，亏官帑三千金。闽浙总督何璟与仲求为道义之交，乃宽慰其孤，不必介意，当令受代者弥补亏空。母泣诏二子曰：“若父为廉吏，常恨仕宦者侵帑，今骨未寒，岂可累人。”乃罄衣饰变值，得千余金，又积僚友贖千余金，解官偿所亏。何公怆然曰：“庄氏有母，吾友固不死矣。”^②父死时，庄蕴宽仅十三岁。

庄蕴宽读书岐嶷，每发议论，惊其长老，不以规矩自绳，或比之于“狂生”。他父亲在日，恐怕他日后说话口没遮拦，惹来祸患，就取“金人三缄其口”之意，给他取了“缄三”这个字，后改“思缄”。庄蕴宽“天资聪颖，读书过目成诵”，^③而家中“藏书极富，所藏先哲手翰，如皋文先生朱批汉书之类，亦多得以纵观博览”，^④因此，他学问很有根柢。可惜，写文章常常不肯遵循制艺规矩，因此，自十七岁开始应院试，却三试不第。光绪十一年（1885），二十岁，以监生名考入南菁书院，所识多知名士。十二年，仍肄业南菁，与唐文治订交。学政王先谦岁试常州府，将庄拔取入学。《年谱》称：“是岁，先生以‘惜抱’名再应府院试，虽名次在前，迄以未能居首为憾。”^⑤但后来传言则谓：

（王先谦）按临阳湖，庄惜抱以考童应试，时应试者几及千人，额仅二十有二，及榜发，惜抱名列第一。学政例须对考童致勉励语，而传话“留‘案首’单见”。惜抱趋至，先谦在阶端相迎，连许其才，邀入室谈话，且谓“汝之名原取姚姬传‘惜抱轩’之义，究有相袭之嫌”，遂为改名蕴宽。^⑥

传言虽不能必信其有，但庄蕴宽受王先谦赏识却甚真。十三年，“先生试五次，均列第一，王以‘隽才’褒之。住南菁书院”。

光绪十四、十五年，庄蕴宽两应江南乡试（十五年为恩科），未中。十五年（1889），应广东乐昌县知县蒋氏之邀，“冒风雪，到馆已仲冬”。“在馆整理卷牍，兼

① 赵叔雍：《庄蕴宽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九，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462页。

② 吴翊寅：《庄母寿庆室记》，《曼荼罗花室文诗词》卷二。案：据《思缄公年谱》，庄士敏八月逝世于霞浦时，长子泽诚正应江南乡试。十月，士敏弟叔方来福州偕庄思缄母子扶柩返常州，泽诚亦以疟疾未赴闽迎丧也。“泣诏二子”云云，乃行文习惯耳。

③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⑤ 冯飞编：《思缄公年谱》。案：以下引文如不注出处者，均同此。

⑥ 《郑逸梅选集》第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案：“按临阳湖”，非是，常州府考棚在江阴。

治骈文。”庄蕴宽治骈文，乃家学渊源，其父士敏为晚清骈文常州派巨擘，官福建时，就以常州派骈文正宗嫡传而自豪，“见人必自称‘江苏常州阳湖庄’，曰：即此已骇退侬夫矣”。^①庄蕴宽事母至孝，在广东所得束修全都寄回家中，自己则靠卖文来度过异乡客地的艰苦岁月。不多久，庄便省亲返里，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江南乡试副贡。后赴广西浔州知府幕。期间又两次进京，甲午北闱乡试未中，但在京城结识了不少维新派人士，与文廷式等人过从甚密。二十一年，以同知指省广西。明年再赴广西，入广西巡抚幕两年。

二十三年（1897），署百色直隶厅，明年赴任，“先生初临民，日夕坐堂皇听讼，案无留牍。自校士课，优给奖犒，士民皆欢悦”。二十五年卸任。二十六年任广西善后局总文案，深得布政使李兴锐赏识。二十七年，署平南县知县，“催科抚字，两鬓以斑”，以至感叹“州县果不易为之”。二十八年二月，卸任，被两广总督陶模以过班知府调赴广东。时越南河内开博览会，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称，此时孙中山和陈少白潜赴河内，而两粤官吏庄蕴宽等四人奉督、抚命，亦至越南参观。庄与知县姚绍书去拜访了陈少白，并对陈说：

初已疑为康徒之梁启超，今乃知为《中国日报》主笔陈少白，吾等在粤日读贵报，获益良多，每日论说中精到透辟之语，尚能背诵一二。

冯自由还提别提到：

庄蕴宽更纵谈革命，痛言“非革命不能救国，吾等以官为食，欲罢不能，如有机缘，亦可相机反正，他日革命军到广东时，吾二人当先引领就戮，毫无反悔”云云。

冯又说：

己酉（1909）冬，李书城偕龙州道庄蕴宽自广西至香港取道赴沪，书城访余于《中国报》，求见黄克强。蕴宽偕行，谈次殷殷问少白近状，并细述当年在河内订交情事，以行期匆匆，未获与少白一见，深以为憾。^②

二十九年（1903），吴稚晖因“苏报案”亡命海外，船至香港，“会晤陈少白、冯自

①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1页。案：刘称“庄思缄尊人仲述先生”似误。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109页。案：冯自由叙述此事结束后，还加了一点感想，认为辛亥革命时，“蕴宽以参加义举，后尝被举代理江苏都督，其为少白早年感化之力欤？”然而《思缄公年谱》则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四十岁，“法领以安南将开农业博览会，邀先生往，先生以公务繁剧辞，旋派刘旭、萧宽往，旬日归。”《年谱》恐误，河内开博览会在二十八年（1902）。

由”等，“陆尔奎自广州来，携港币六百元馈赠”，“此款为陆尔奎、方子仁、庄蕴宽各二百”。^①此时正在广州的陆尔奎、方怡、庄蕴宽，均为吴稚晖的南菁同窗，又是常州旧友，纷纷伸出援手。

光绪三十年(1904)，在廉州(今广西合浦)和广州，领军剿匪，并在广州办武备学堂。三十一年(1905)正月，擢升广西梧州知府，八月卸任。九月调任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前任为郑孝胥)。庄“于治军缮器，昕夕无少懈”。军政之余，颇留意教育，建立学校多所，在龙州办起了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政法学堂，建立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每躬往演说，并请南菁旧友钮永建等主持学堂和新军。又创立女校和图书社，分别向上海、东京购置书籍，以开风气。

当年，革命党人策划反清起义，往返于广西、越南，而龙州适为交通要道，庄蕴宽给予革命党人极大的方便。庄蕴宽回忆黄兴请见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余督广西边防，有僧张守正求见，余知为克强，嘱岳生宏群接待之，未与面也。钮惕生方为教导团团团长，夙与之善，告予，以克强将出国而乏川资。因厚赙之，并派兵护送出镇南关。克强固请一见，予不之许。^②

《思缄公年谱》，刘旭在该年行事下，则加一注语，可与庄本人的回忆相印证。刘云：

本年夏秋之交，忽有署刺曰“张守正”者来龙州谒旭，谓在日同学，疑焉，试引进，则黄軫(黄先生兴原名)也。欲介见先生，谋在龙州创发革命。先生以时机尚早，情势所不容，曰：“革命固深愿，顾仅一龙州倡，徒糜烂地方，安足成事？不如待机再谋。留黄一宿，资金二百以行，事乃寝。迨先生之去也，翌年，始有革命军攻袭镇南关之役。”

三十三年(1907)，当黄兴为策动镇南关起义而出入关隘，遭遇险情时，庄蕴宽又暗底下与法国教堂商量解救：

诸生阴策革命，蕴宽知之，佯若不闻。孙总理引为同志，驰电道意，且忽莅境，将造谒，蕴宽急止之。镇南关之役，先烈黄克强出入关隘，几为逻者所得，则与法国教堂谋而阴纵之。^③

① 杨恺龄：《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页。

② 庄蕴宽：《黄兴信函题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第3期。

③ 张惟襄：《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该年六月，庄母逝世，庄蕴宽奔丧返里。三十四年（1908）赴广西，充广西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与钮永建、蔡锷等协力筹备，编练新军。秋，派赴日本考察，招收中国留日士官李书城、陈之骥等数十人赴广西武备学堂和边防军任职。宣统元年（1909），正月回国，五月赴广西，因与广西巡抚等官员政见不合，十二月，辞职归，从此离开了大清官场。庄蕴宽“以文人知兵，佩印绶，肇建粤西武功”，后来“桂军名将接踵负天下盛名”，庄“筭路蓝缕，实有以启之也”。^①

宣统二年（1910），应上海商船学校校长唐文治之邀，赴上海就任该校教务长。三年（1911），武昌起义，庄蕴宽积极参与上海光复、江苏独立的活动。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之子赵叔雍记道：

武昌事起，即奋袂将事，移居惜阴堂，晨出晡归。已去发辫，与孙、黄、张謇、汤寿潜、宋教仁、陈其美、钮永建、顾忠琛、洪承点共定大计。^②

庄蕴宽还亲自从上海赶赴武汉，晤见黎元洪、黄兴。庄蕴宽回忆当时情景：

辛亥武昌起义，予为江浙两省代表，至鄂晤黄陂。黄陂派小轮送予到汉阳，与克强相见。克强帕首短衣，自行间回营，握手相劳告，喜极出涕，出粗粝共食。食毕，复乘轮过江。冒险情形，今回忆之，犹历历如昨也。^③

李书华则说庄蕴宽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

而上海光复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来鄂，……他告诉我来鄂的真意，是请黄先生回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先生是国内外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先生早赴上海。^④

民国元年，因庄蕴宽胆识过人，不畏强御，又有在两广“知兵”的阅历，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庄“昼接宾客，夜理案牍，恒至彻夜不眠”。但庄只做了三个月的都督，便告病辞职，自称：“予以不扰民、不增兵、不借债三事相约，故道不行。”庄蕴宽在江苏都督任上，做了一件被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称赞的好事，马回忆：

①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② 赵叔雍：《庄蕴宽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九。

③ 庄蕴宽：《黄兴信函题跋》，《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

④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0页。

复旦开学不久，便遇着辛亥革命。复旦学校被军队占领，大家就带着全校学生跑到无锡。……革命后，我们又把学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没有校址，于是我就写了一封呈文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请他把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庄很好，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儿子伯行先生对我大发其少爷脾气，说我不该强占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并不是我抢占他，而是庄氏批准的。……^①

马相伯最后还幽默了两句：

用李文忠公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民国二年(1913)，庄蕴宽被任命为浦口商埠督办。不久，入京任都肃政史(相当于前清的都御史)。四年(1915)，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庄蕴宽“既纠弹‘筹安会’，复手书密札数千言，苦口规劝，时人均为蕴宽危”。^②

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病死，庄蕴宽出长审计院，任内，清廉自洁，嫉恶如仇：

庄思缄为审计院长，有某官伪造单据，浮报用途。审查钩稽，尽得其破绽。庄咨国务院惩治之，院以其人已辞官，可置弗议。庄坚欲获其人，依法申办而后已。院不理，乃入告总统，虽格不能行，而闻者肃然。^③

审计院“闲曹冷署，往往累月不名一文，所幸僚属咸体院长情况，不加苛索。间有所得，发给俸食，亦自厮养、办事员而科员、科长，按成递配，往往本人一无所获。因是阖署咸钦其盛德，虽无升斗之储，亦永永追随勿去”。时挚友赵椿年任副院长，“多谓为难能，亦终与共甘苦”。^④

当时，庄蕴宽兼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的董事和故宫图书馆馆长，那些觊觎国宝的军阀对他十分忌恨。庄平时喜直言放论，又在报章上撰文，嬉笑怒骂，抨弹无忌，终于招惹鲁督张宗昌，对庄蕴宽下手了。庄之外甥吴景洲亲历险情，记道：“(1926年12月1日晚)王琦忽派宪兵至大院胡同逮捕庄先生，形势异常严重。”前不久，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就因在报纸上抨击军阀而先后遭宪兵司令王琦抓捕，惨

① 马相伯：《一日一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②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③ 陈澧一：《新语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④ 赵叔雍：《庄蕴宽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九，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462页。

遭枪杀。此时庄无辜被抓，真是命悬一线。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和一些有力人士的营救，庄才免遭毒手，然而，庄因此事痛失爱子。吴沉痛写道：

中表宅仁，舅氏之长子也，新自德意志归，时肺病初见痊可，乃以与王琦之副官相持一夜，及第二日之周旋来宾，第三日往各亲友处道谢，而疾复增剧，咯血甚多，终于不起。宅仁明敏有为，时亦在内部与余同室服公，迄今思之，犹为腹痛，舅家人损失可知矣，吁，可悲也。^①

最后，吴不禁感叹道：“当时政纲废弛，军阀横行，概可见也。”

庄蕴宽晚年潜心研究佛教，亲受常州天宁寺长老冶开高僧传戒。庄仰慕杨文会，亦在北京创设刻经处，流通佛典。

庄蕴宽于民国十六年(1927)辞去审计院长职务，明年南归，应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钮永建之邀，任江苏通志局编纂委员会总纂，常务编纂张相文、金鉞等亦均是南菁旧人。

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庄蕴宽痛感国事凋蟪，忧心如焚，宿疾时作，病终不起。民国二十一年(1932)逝世于故乡，葬于常州公墓。

赵椿年闻听噩耗，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文，对庄氏一生和两人的友情作一总结：

呜呼！五十年前，识君之日。天挺雄姿，食牛气夺。针芥自投，松柏相悦。顾塘觅渡(君家觅渡桥西，余家顾塘桥北)，距犹咫尺。藏修既同，息游亦逸。百钱买醉，河沼走月。踈躞宵分，犹不忍别。归后联床，啸歌尔室。维颊有芹，薄言采撷。我衿已青，君翮犹铍。至于再三，卒居第一。澄江学舍，复共簪笈。清景难忘，归航夜雪。我馆虞阳，与君相失。日寄一书，至今成帙。追溯生平，此为最密。弱冠以后，征衣四出。我官京国，素化为缙。君游岭表，握权运奇。文经武纬，鬼设神施。逾镇南关，直法兰西。布德中夏，抗稜四夷。岩扃重闭，边马不嘶。鸡鸣过客，乃有泽、睢。会逢时变，皆为世资。重君行谊，奉若严师。始居金陵，进取是规。龙(幡)[蟠]虎踞，镇以老黑。继谋合一，终归燕畿。朝阳鸣凤，畀君宪司。力争政体，巩我国基。移掌计院，审核度支。我后承乏，驂靳相随。并门九载，无异下帟。谗邪忽来，横逆何期。君已病痹，益濒于危。遂决舍去，如驥脱馭。言旋言归，复我林墟。吴郡图经，久尘鱼蠹。艺风蒙香，

①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积稿未具。以君賡之，商略待布。书局东山，会城北固。焦先瓜庐，松寥可处。汗青头白，仍未迄功。天乎不吊，倏遽凶凶。我闻君疾，乃在去冬。重腿太甚，忧心忡忡。及春遽逝，哀痛弥胸。生不得视，歿不得逢。今当会葬，又不克从。眼枯心悴，行室神通。遥申薄奠，冀达幽宫。

赵叔雍在惜阴堂亲见这位乡前辈，后为之作《传》，叙述形象生动，录二节如下：

庄蕴宽躯体短悍，双目炯炯，口大髯疏，直憨敏干，廉正公忠。自幼受学，即好为疑古之论，口如悬河。讲解文史，每立新意，非圣谤贤，咸不之恤。常日渺视政术，痛排荣利，否臧人事，不少假借。

而又玩世疾俗，一言之发，闻者绝倒。山水清娱，偶事游览，亦无多恋，自雁荡归来，或询龙湫之胜，则曰：“差似壮夫立而小遗耳。”^①

像庄蕴宽这样特立独行、率性直行的人物，在那个时代确是不多见的。

赵椿年

赵椿年(1868—1942)，字剑秋，号春木，阳湖人，因其常州祖居距离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故居仅数十步之遥，所以晚年又自号“坡邻老人”。赵椿年祖上赵翼，是乾隆甲戌(1754)一甲三名进士，其宦宦生涯并不算显赫，但文名卓著，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赵椿年是赵翼的五代孙，所以其南菁学友夏仁虎称他“仍世清德，甲第婣媿，门业鼎盛”。^②

赵椿年的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常州今文学派巨擘刘逢禄的曾孙女，世传经学。外祖父刘翰清(字开生)“尤精三礼”。赵椿年自称：“先妣饜饩庭闻，能通经史大义，熟习古人诗文，授不肖以汉唐小诗甚多。”^③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就口授以诗，而赵居然能理解其大概意思。五六岁入家塾，三年读完四书五经，十三岁肄业常州龙城书院，为文惊其长老，咸目为神童。十六岁补县学生员，学使瑞安黄侍郎体芳激赏之。岁试冠军，食廩饩，调取肄业南菁书院。这时，他与庄蕴宽友情最笃，“几无一日不见，亦时下榻其家”。但庄蕴宽的考运没有赵椿年好，屡试秀才不中，直至进了南菁书院，在王先谦任上，才崭露头角，屡试第一而入学，这就是庄去世后，赵为其所写祭文中“我衿已清，君翻犹铄，至于再三，卒居第一”所反映的当时情况。

① 赵叔雍：《庄蕴宽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九。

② 夏仁虎：《武进赵公椿年暨原配吕夫人合葬墓志铭》，卞孝萱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二，第97—99页。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以下引文出处同。

又据赵自称，“甲午科试，正场首列”，发落之日（宗师于试竣之日集诸生训勉，谓之发落），黄体芳将赵椿年招至案前，勸勉有加。“是年食廩饩，调赴南菁书院肄业。”则赵应于光绪十年（1884）下半年即入南菁，比唐文治还早了半年。

赵椿年在南菁书院师从黄元同先生，黄很看重这位年轻学子，赵回忆：“及门中，于蔚芝及余，极所期许。刻所著《礼书通故》时，列分校诸生之名，令蔚芝校第一卷，余校第二卷，所以勉之也。”蔚芝，唐文治也，赵、唐两人在南菁书院通谱结交。黄先生还谆谆教导赵椿年：“汝年最少，学问都可做得，但十年、廿年一瞬即过，须深自刻励。”赵椿年在南菁书院肄业四年，至晚年对书院生活还留恋不已，曾作专文《覃研斋师友小记》纪念南菁师友，并保存课卷数份：“元同师手评经古两课卷具存。今日观之，誉过其实，后逊于前，真气日离，浮光日甚，所以至老无成，负师门矣。益吾师手评三次甄别卷亦尚存。”

光绪十四年（1888）中戊子科举人，明年春离开南菁，赴京会试，未售，“留都过夏，乡先辈潘文勤、翁文恭两公争致之”。^①不久，考取内阁中书，“历充委署侍读、本衙门撰文、国史馆校对、玉牒馆分校，兼管中书科造敕房事务”，“甲午，奏调随办五城团防”，“玉牒告成，得旨俟截取同知，后以知府分省补用，并加盐运使衔”。当时，黄体芳官通政司，仍为“清流襟领”，赵椿年是其入室弟子，“恒与清议”，“然洞观大局，不为偏激之论、自求速化，而益研心于经世之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戊科进士。当时赵“既夙工书，又为诸钜公所器重”，都希望他能如其祖上赵翼那样入军机处，从章京做起，“更登甲第”，但赵椿年认为“国势阽危，祸患方亟，非躬历仕途，通习时政，无以应兹世变。乃决意乞外，呈请以知府分发江西”。江西巡抚松寿夙闻赵名重一时，立即延入幕中，让他处理机要事务。庚子之变，“袒拳密诏至赣”，松寿询问赵的意见，赵说：“曷姑秘之，此局恐非久也。”不久，“两宫西行，前诏遂寝”。

辛丑以后，复行新政，赵椿年“精心擘画”，以致有人认为当时江西之财政、吏治为各省第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闻各省推行新政莫善于赣，特取其草令，两湖仿行焉”。后赵任牙厘局提调三年，又临时代理瑞州府事。

壬寅（1902），商部初设，南菁同学太仓唐文治佐理商部，特疏奏调，函电交促。赵椿年于明年“应诏北上，改官商部郎中，派参议上行走”。此时，宣统元年，推为资

^① 夏仁虎：《武进赵公椿年暨原配吕夫人合葬墓志铭》，以下引文出处同。

政院议员。

辛亥革命起，南北议和，杨士琦充北方内阁议和参赞，力挽赵椿年同行。南方民军议和代表中，有参赞钮永建，钮是赵椿年肄业南菁的后先同学，而今在谈判桌上，竟互为对方。

民国元年，赵椿年任农商部参事。二年（1913），简任财政次长。五年，任税务处会办，再任财政次长。六年，任崇文门税务总监督，任内，整顿吏治，革清宿弊，结果“商怀吏畏，而长官亦处脂不润矣”。八年（1919），任审计院副院长，不久，又代行院长职务。时院长为庄蕴宽，两位挚友又相聚在一起，昔日的同学变成了同事，两人共事九年。民国十七年（1928），政局复变，赵椿年已年过六十，终于谢绝一切职事，离开了官场。但赵椿年“贞不绝俗，隐不忘世”，“凡民生国计之大者”，当局“顾问所及，多所献替”。

赵椿年虽已致政，犹居旧京，此时终于有空暇整理旧业，刊刻《覃研斋石鼓十种考释》一卷，《诗存》三卷，生平所为金石题跋，亦渐次整葺。晚年在北平《中和》月刊上发表的《覃研斋师友小记》、《续记》，是对青少年时在江阴南菁书院读书生涯的深情回忆，也是关于南菁书院的珍贵史料，至今读来，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怀念母校的学子拳拳之心。此《记》一出，便受到南菁诸友的重视，远在上海的单镇便立即购置一册，称赵记“叙述南菁源流颇详”，自己购存，以便时时浏览。

赵椿年很重友情，吴县张一麀于民国年间亦宦游京师，其幼子为璧便“自幼养于友赵椿年家”。^①

1942年，赵椿年逝世于北京，与其“四十年同官同游”的挚友上元夏仁虎悲痛万分，前往吊唁。据夏仁虎儿媳林海音回忆：

公公和赵椿年老伯友谊最为亲密，我们结婚便是请他证婚。“赵椿年”这三个字，在北平的许多书籍、古玩、文具店的招牌匾额上，常常可以见到。他的字体清秀，一如其人，是一位标准的旧式文人。

记得赵老伯过世时，公公前往吊丧，在棺前顿足大哭，十分悲痛。回家后，婆婆见公公满面通红，神情紧张，知道他是因好友的死，过于悲伤刺激，立刻请了熟识的蒲伯扬大夫来家诊治。^②

① 黄炎培：《张仲仁先生传》，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附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② 林海音：《枝巢老人的著作和生活》，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7页。

夏仁虎为写《墓志铭》，称：

回念少年读书南菁，君为都讲，先腾达去。洎官商曹，始朝夕相过从。四十年同官同游，先后复同佐司农，掌邦计，同致政留京师，文酒之会，无三数日不同座席。君性拗谦，有所作，必先以草相商而后出，文章之蹊境志趣亦同。君之歿也，余视含殓焉。

《铭》曰：

君之德，温以栗。君之学，缜以密。观世事，透坚壁。投艰巨，不夷嗟。处脂膏，润弗及。覃研汉、宋及金石，绸缪国计兼治术。生平所学与私淑，北翁北平南常熟。退闲晚岁恋京邑，崆峒访道高轩集。闺中唱和若松雪，岁寒老友有近局。无疾而逝归其宅，泐铭幽圻后之责。

夏仁虎与赵椿年与在京师“四十年同官同游”，致政后又同留京师，诗酒文会，几无虚日。一旦老友去世，情何以堪。然而，二十年后，当夏仁虎去世时，恐怕已无南菁老友凭棺哭吊了，看来，赵椿年还是幸运的。

夏仁虎

夏仁虎(1874—1963)，字蔚如，号啸庵，又号枝巢，上元县人。夏出生于书香门第，宦宦世家。嫡堂伯父夏家镐官至刑部右侍郎，^①父亲夏家镛则一衣青襟，教读为生。夏仁虎六十岁时所作自述诗有云：“吾父幼孤露，奉母出艰危。中年耽著书，老作诸侯客”，^②则夏仁虎出生时，家境亦渐贫寒。夏仁虎三岁识字，七岁撰联，十一岁作文，时称“神童”。然屡困于童试，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他十八岁那年，始入江宁府学，时江苏学政是杨颐。明年，溥良主持岁考，夏仁虎补廪膳生。二十一年(1895)入南菁书院肄业，时年二十二岁。

夏仁虎肄业江阴南菁书院的情况，晚年曾作诗提及：

累试皆前茅，古学一郡冠。学使选高材，令入南菁院。家贫少征逐，闭户事铅槧。独踞藏书楼，简篇任浏览。(同院生多贵家子弟，酒食征逐甚繁，余不能同，惟日坐藏书楼，泛览载籍，学识始少进。)肄业将二载，学识少进展。^③

① 夏仁溥之己丑科江南乡试殊卷，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案：仁溥乃仁虎之长兄。

② 夏仁虎：《六十自述百二十韵》，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125页。

③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134页。

诗中的学使，当指龙湛霖。夏在南菁时，主讲经学者是黄以周；主讲古学者，前为林颐山，后为王亦曾。^①夏仁虎在南菁读书很刻苦，不事征逐，终日徜徉于藏书楼中，泛览载籍，学识大进。同学中应有汪荣宝、丁福保、蒋维乔、孙毓修、缪楷诸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明年赴京朝考，后以七品小京官分刑部学习，有诗为证：

丁酉逢萃科(余时年二十四)，遂登拔贡榜。戊戌来京师，射策上春殿。授职小京官，秋曹学裁判。^②

夏仁虎虽然年纪轻轻，已官居七品，但还不满足自己的科举出身，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千里迢迢返回家乡南京，参加江南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中了举人：

吾犹志科名，归举鹿鸣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科，以《和约》中“三年内京师不能举行科举”，因请假回南京应试中式。)

诗中，和约，指辛丑和约。夏仁虎本可在京师应顺天乡试，因条约有此限定，故夏只得南返，所幸如愿中了举人，科名又上了一个台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部新设，夏仁虎由刑部保送，考取记名商部章京。时刑部保送考取商部司员中，还有吴县单镇，是夏仁虎的南菁学弟。^③而南菁学长唐文治、赵椿年此时在商部分任丞、参，是他们的上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并入工部，又新设邮传部，夏仁虎借调入邮传部任郎中，曾草疏裁撤驿站：

新部入工商，(由刑部保送，考取记名商部章京，分工务司，兼领两科。因念工业以度量衡为根本，草拟奏疏，又派修订矿章主任。)头角少自见。奏定度量衡，矿章订采探。颇得能事名，邮传职又转。(邮传部初立，复借调入部郎中，创办交通银行，拟订一切章制。限制甚严，虽部中长官，不能随意调动。失长官意，遂辞去兼职。)终忤长官意，投闲久置散。犹思效区区，草疏裁驿站。(时已办邮政，全国驿站皆为虚设，岁糜国款甚巨，草拟《裁撤驿站奏疏》。)^④

后又曾记名御史，但因清末官制改革，夏仁虎并未真正就职。夏总结清皇朝和

① 夏仁虎之丁酉拔贡殊卷，在书院肄业师一栏中，有黄、林、王三师的名字。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

②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134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30辑。

④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135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自己在清朝的官场生涯，是“清末十四年，一事未卒办”。

民国，先后任盐务署秘书，国会议员，财政部参事、次长、代理总长，国务院秘书长，深得张作霖器重。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逼至北京，张作霖退出关外，夏仁虎亦淡出官场。张作霖仓皇离京时，如不是夏仁虎机敏，“权词”劝说，故宫宝物可能会被张带往关外：

南军称北伐，一哄鸦雀散。(张仓皇出关，余见故宫外集大车数百辆。询其故，则将举故宫宝器携带出关。大吓，入见张，权词谓故宫宝器历年盗窃抵换，皆非原物，一篇烂账，正无办法。今若仓皇携走，将来此案皆归关外矣。张大悟，立命不准擅动，幸得保全。)大风倒梧桐，自有人评判。

夏仁虎有感于张作霖知遇之情，所以会有“大风倒梧桐，自有人评判”之语。当夏闻听张作霖在皇姑屯惨遭毙命，曾写有《一夕》七律一首，末句云：“感恩犹未何从涕，端为中原惜霸才。”似有惋惜之意。^①

夏仁虎是张作霖主政北京时期的北洋政府政要，却自称“仕宦三十年，所至无一当”，还是应该“还我儒素身，读书补未见。决计早退休，余力事述撰”。^②自脱离官场后，夏便与挚友数人，文酒诗会，撰述自娱。由于“赋闲既久，生活不足，有屋二区皆售去”。后应聘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坚辞伪职。在京日，与南菁学长赵椿年友情最深。

共和国成立后，夏仁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据说，毛泽东主席曾为“广陵散”事，与夏仁虎有过通信往来。夏仁虎晚景凄凉，“因双目失明而陷于写读具废的境地”。《文汇报》记者谢蔚明因约稿事与夏有过交往，谢晚年回忆：

我最后一次走访时，正值旧历年末，他嘱咐家人检出木刻本《知不足斋丛书》，托我代觅买主，我当即把身边的人民币，留下部分返程车费，取出三十元作为书款，约合当时一位工人月薪，交给老人，他谦逊地收下。……我乘三轮车回家，塞得满满的，使我动弹不得。^③

夏仁虎才华横溢，早年受乡前辈陈作霖等人赏识，后又经南菁书院深造，学术亦有根柢。夏仁虎著作很多，有诗文集《枝巢编年诗稿》、《枝巢文稿》等，有掌故著作《旧京琐记》、《旧京秋词》、《清宫词》等，有地方志如《北京志》、《玄武湖志》、《秦淮

① 王景山：《夏仁虎受知于张作霖始末》，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228—230页。

②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135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谢蔚明：《闲话枝巢老人和周作人》，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211页。

志》等，有《碧山楼传奇》、《五色花》等戏曲小说，有《枝巢四述》等讲学著作。^①

夏仁虎逝世于1963年，生前自撰墓铭：

家金陵，祖大禹。仁无文，虎无武。好读书，不泥古。为文字，鲜可取。曾仕宦，无所补。老而归，无所苦。自题碣，识其所。^②

吴敬恒

吴敬恒(1865—1953)，原名朮，字稚晖，别字拙盒，阳湖县雪堰桥镇人。吴后来说起其在南菁时“名朮，字稚晖”的原因：

余虽不好为诗，顾未尝不好诵人之诗。余学南菁日，固名“吴朮”，命字曰“稚晖”，老犹残存此字。名朮之故，因二十岁前，偶得《谢宣城集》精本，好其诗极笃，至取稚晖之名自名。^③

吴稚晖六岁丧母，家境贫寒，随外祖母陈氏带回无锡外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所以，不少人都以为他是无锡人。七岁入塾读书，十四岁，开始学作八股。十八岁，因处境日窘，开始设馆授徒。光绪十年(1884)，二十岁，本想在无锡应童试，却被人告发冒籍，只得回原籍应阳湖县试。经过这次窘辱，他以后尽管一口“我俚无锡”方言，在填写籍贯时，却必填阳湖、武进(入民国，阳湖并于武进)。^④他倒也没对此事耿耿于怀，常笑着对问起的人说：“说我是武进人可以，说我是无锡人也可以，总之是中国人。”

吴稚晖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二十三岁时才入阳湖县学，自称：“余不能诗，亦不好为诗，故年二十有三，著学籍。”^⑤明年，与袁蕴生成婚于雪堰桥老家。

光绪十五年(1889)，吴稚晖二十五岁，正月赴江阴应南菁书院甄别，以古学第一名入院肄业。于是吴立即回无锡散馆，不再做私塾先生了。当他第一天进南菁书院谒见山长黄以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先生的座右铭：“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八个字给吴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自称从此终身奉为圭臬，始终不渝。

时在南菁书院肄业者，据吴回忆，有丹徒陈庆年，金匱孙揆均，无锡范蠡、许士

① 王景山：《关于夏仁虎的著作》，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第230—235页。

② 王景山：《国学家夏仁虎》，书前图版。

③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第277—280页。

④ 陈洪校订，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八《附录》。

⑤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第277—280页。案：自乾隆起，童试，例考五言六韵诗一首，吴可能就卡在应制诗上了。

熊、高翔、杜嗣程，上海钮永建，阳湖吴翊寅，丹阳王英冕，元和汪荣宝，泰兴姚鹏年、金鉞，籍上海而家泰兴之赵世修，籍六合而家江宁之田其田等，陈庆年为斋长。^①

吴稚晖在书院读书很用功，连女儿出生都顾不上回家看望。自己曾在读书笔记中也这样说：“钞书至一点钟，闻江上轮舟鸣气管东驶。”“拼命读书，不免伤身。”^②其表侄陈洪则在其校订的《年谱简编》中写道：

先生与钮永建肄业南菁书院时，每于课余之暇，偕钮永建日索书院藏书以读。先生之浏览方法为：首诵其序，继览其文，再摘录其菁华。主藏书者为一皤然老者，甚厌先生之烦，但又心喜其勤，故每见先生至，必强笑相迎，先生述当时索书之情状曰：“吾初读书，为采典撷句，增饰文词而已。继而悟读书之要，必先分类，而后考其系统，明其界说，遂能学以致用。”^③

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中举。十八年京师会试不中，仍回南菁读书。该年十月，因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而掷石于轿，引起纠纷，吴稚晖被迫离开肄业四年的南菁书院，事见第六章第二节之“遗闻轶事”，兹不赘。吴稚晖事后很感懊恼，三年后在日记中仍提及：“彼事犹可愧。癸巳，余追击江令之舆，责其经文庙不降舆，大兴讼事。”^④

次年考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与南菁旧友王英冕同住正谊书院。吴稚晖虽在紫阳书院肄业，仍不能忘情于南菁，心中十分郁闷，他自称此行“勉来吴市，效逋臣之故事，作流妓之生涯”，并将此一阶段日记题名为“吴市余生”。^⑤吴后在其《自订年表》中，光绪十五年(1899)至十八年(1892)这四年，均记“宿南菁”，而十九年(1893)则记“流寓苏州”，^⑥这“流寓”两字包含了多少辛酸。吴在苏州仅数月，便仍回无锡坐馆，教读好友廉泉的两个弟弟。甲午、乙未两次会试均不售。期间，曾由陆尔奎推荐，馆天津汪洵家，教读其子侄。二十二年(1896)，返南，馆吴县教官陈容民家，课读其子，并应课紫阳书院。吴形单影只，饮酒解闷，在日记中写道：

余素不嗜饮，至吴，以无聊甚，曾独饮数次。古人云：“酒可解忧”，渐魅其

①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案：姚鹏年籍如皋，而非泰兴，两地同属通州，吴此处回忆小误。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日记》，七月十七日，第83页；八月初六，第95页。

③ 案：陈洪之父陈育乃吴稚晖之表兄，与吴同应南菁书院甄别，故其所述，当真切可靠。

④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山川人物》之《南菁以后日记》丙申八月十三日，第625页。案：“追击江令之舆”事，在壬辰(1892)十月，非癸巳年，吴误记。

⑤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癸巳日记》，第154页，“吴市余生”。

⑥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五《山川人物》之《自订年表》，第2496页。

说,而又不甚好也。余性好动,喜曹偶,有生以来,作客者七八年矣。居江阴,居苏州(癸巳住正谊书院),居京师,居天津,皆有偶,从未有此次来吴之孤寂者。入室则主宾相敬如桎梏,出门则遍国中无与立谈,偶有通姓名一二人,皆居隔数里,且志学皆异,相见亦少趣。居家则俗人填委,作客则索居无俚,正不知如何恰好。^①

二十三年(1897)吴辗转天津,任北洋大学国文教习,吴学问深湛、教法新颖,深得学生欢迎。蔡元培日后也说:“前在北洋大学时,同学无愿治国文者,后经吴先生讲授,则人人兴会淋漓,吴先生于教授实有特长。”^②年底,吴赴北京,与友人廉泉同去走访康有为,吴问康,中国目前何事最坏,康答是小脚、鸦片、八股。吴很赞同,认为中国如不除去此三害,则无可救药。吴身体力行,下一年就没进会试考场。

二十四年(1898),南归,应聘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吴稚晖和钮永建等建议学校购买军火,训练学生,组织军队,总理何梅生不允。二十七年(1901)春,因主张由教习和学生共同治校,与南洋公学继任总理张元济意见不合,辞职,并请求学堂补助旅费赴日本自费留学,获允。时隔半年多,后任总理沈曾植于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九日两次写信给督办盛宣怀,还提起吴稚晖想要组织学生军的事,并诉说吴稚晖、白作霖虽已离校而影响仍不易消除:

学生私会,蟠结甚牢,教习为之魁,前所辞退之白运霖,则执牛耳者也。……(前以二班不入操场,出谕戒谕,随得一禀,力请操枪,依然吴稚晖故智也。)

公学二班生为吴、白二教习煽惑,私自去者三四人,在者犹扰扰不安,生事相继,监起居与账房皆为所困。^③

吴稚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勤读期间,程家桢、吴禄贞等邀钮永建同往横滨拜访孙中山,钮永建就邀同寓一室的吴稚晖同往,吴不愿,因为他早在报纸上听到过孙文的名字,对孙提倡的反清革命很不以为然。这次来日本,“临行前,有人劝他剪辫发,他勃然大怒,说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剪掉。”他对钮说:“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见他。”^④关于此事,吴稚晖四十年后为悼念挚友蔡元培逝世而作文提及: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丙申日记》,第497页。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1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案:白运霖,疑是白作霖之误。白是吴稚晖南菁同学,又是南洋公学同事。

④ 蒋梦麟:《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三期,1964年3月。

余等八股先生，一面虽自小即有杀鞑子之快意观念，然一面以顶戴赴洋水中殉难为难能，故至甲午以后，受倭寇之创，新恨旧仇，虽一时交并，终徘徊于维新变法，未能决取革命之途径。故辛丑在东京，犹未肯随钮惕生先生共候总理于横滨。及闻钮先生盛赞总理之人格，方始疑惑革命非即江洋大盗之造反。^①

冬，应两广总督陶模之邀，与钮永建回广州，在广雅书院旧址筹办广东大学堂，钮则在黄埔筹建广东武备学堂。

二十八年(1902)四月，吴带领刚招进的部分学生赴日留学。吴这次广东之行，可能是首次接触官场，但使他看清了清廷官场腐败，无可救药，宪政实行无望。他说：

辛丑冬，去广东筹备广东大学堂，梁任公先生特从北海回至东京，以多事相嘱，且以藩署为通信处，然余未敢通过一信，……然余在粤五月，见官场之腐败，愈知清廷之不可振作。壬寅再回东京，嘱范静生、蔡松坡两先生转告任公，告宪政之无望。

六月，因驻日公使蔡钧不允自费留学生钮瑗等人入成城军校，与东京留学生发生冲突，吴与孙揆均被驱逐出境。吴悲愤难忍，留下绝命书，放进信封中，信封上自书“其言也然”四字。在押解途中，纵身跃起，奋而跳入护城河中。警察七手八脚慌忙将他救起。这时刚到日本的蔡元培唯恐吴稚晖再出什么意外，特地赶来亲自护送他回国。梁启超亦自横滨来送行。吴稚晖虽然以身殉国未成，却声名大振，而其绝命词也不胫而走，流传海内外，词曰：

信之以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谋，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②

吴经此事变，思想渐趋激进。回国后，便经常在上海张园演讲，痛斥清廷腐败；并在《苏报》上撰文，鼓吹革命。吴稚晖口才极好，演讲极富煽动力，听众“心不知其何痛，鼻不知其何酸，眼不知其热，而此两行亡国之泪，竟欲不滴其不能”。有人评论道：“今年(1903)三四月间，吴稚晖在张园开许多的会，我也听过几次，才晓得革

① 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1964年5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杨恺龄撰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命就是这么一事情。”^①马叙伦也说：“清末光绪二十八、九年间，俄、法皆有事于我，上海爱国之士日聚张园，号召民众，以谋救止。太炎与蔡子民、吴稚晖无会不与。稚晖演说，辄如演剧者东奔西走，为诸异状。”^②

二十九年(1903)六月，“苏报案”发，吴稚晖又一次出了国门，经香港到伦敦，这次是因“戴罪在身”而被迫亡命海外了。章太炎、邹容则锒铛入狱。三年后，章太炎出狱，邹容已牺牲于狱中，章太炎悲愤难忍，大骂吴稚晖，说己之被捕，是由于吴之告密。章、吴两人为此大打了一场长达多年的笔墨官司。吴实在是被冤枉了，“以事实证明，章太炎所指吴稚晖告密实为诬陷”，^③这在史学界恐怕是不会有疑义的了。

吴稚晖船至香港，阳湖同乡又是南菁同窗的陆尔奎、方怡、庄蕴宽各赠吴二百元，由陆从广州亲赴香港交给吴稚晖，此举无疑雪中送炭。吴到英国后，勤习英语。1905年3月，孙中山到伦敦，获悉吴之地址，亲自登门拜访，此为孙、吴相见订交之始。冬，吴稚晖加入同盟会。据说，当曹亚伯出示盟书，内有“当天发誓……”语句，吴大笑，说：“我辈革命，则革命耳，岂可学康有为之所为。”后听同坐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吴即大悟，立书盟词一纸给曹亚伯。^④

1907年6月，吴与张静江、李石曾筹备半年多的《新世纪》杂志在巴黎出版，吴任主编，内容都为鼓吹革命和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这份周刊前后共发行一百多期，吴发表文章最多。

1912年，民国建立，吴受孙中山之邀，由欧返国。1月4日，自上海赴南京，与孙中山同室卧起四天，即返沪。吴稚晖一生抱定宗旨，不愿在政府担任任何官职，但也并不是说他不问国事。齐如山回忆：

我与先生，是于前清光绪三十几年，在伦敦初次相晤，又在巴黎盘桓了数次，后又几年未见。至民国初年，先生到北平，不断晤谈，见先生作事，永远以轻松及滑稽的办法处之，实在可佩。一次宿于舍下，乃得畅叙，我偶问先生：“古今来最佩服何人？”先生曰：“除孔子不算外，后来的人，我最佩服者，为汉留侯张良，因为他一生不忘国事，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然不要地位，不要权利，若人人能如此，国家焉有不强盛、不太平之理？像古今来许多隐士，则皆非吾

① 转引自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

② 马叙伦：《石屋馀论》，《民国丛书》第3编第87种，上海书店影印，第43页。

③ 唐振常：《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2页。

④ 陈洪、陈凌海：《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吴稚晖先生全集》附录。

所取，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而只自己鸣高，请问国家要这些人作什么？”^①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鼓励青年学生到海外去勤工俭学这件事上。据朱东润回忆，他于1913年上南洋公学附中时，吴稚晖劝他住在吴自己办的留英俭学会中。朱晚年于1976年写的《自传》中，还记下了他青少年时与吴稚晖交往的一段往事：

吴不到五十，比一般人高些，扁圆脸，留着八字须，一口无锡口音。《金陵春梦》里把他写成矮个儿，说明作者没有和他见过面。（《公论报》社论作者张继、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四人之中，吴稚晖是总负责者，下午先到，总是最后一个出去。写社论，看校样，和排字房打交道，都由他一个人经手。我住留英俭学会，吴邀我参加工作，我是欣然同意的。……通常由我初校，由吴二校。吴经常要在付印后回去，常常吩咐我先走。^②

1918年，吴担任唐山路矿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前身）国文教员，曾邀请胡适来校演讲，并留胡适同住教员宿舍，长谈教育问题。这时，吴提出在海外创办大学的主张，经过努力，也终于有了成果，在法国里昂成立了中法大学。在这所勤工俭学学校中，有不少人接受马列主义，日后成为中共党内的领袖人物，这当然是吴稚晖始料未及的。

吴稚晖还与现在的故宫博物院的建设有点渊源。1924年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将溥仪赶出了故宫，各路军阀都对故宫内的宝物垂涎三尺，当时各界人士对如何保护这些国宝，都感到颇为棘手。吴稚晖躬与其役，任劳任怨。吴景洲回忆当时情景说，当清室“请求酌量取出若干，以资应用”时，“余与吴先生同任查报物品之役”，“吴先生亲自点查交与，自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兀立朔风中，逐件唱交，为役甚苦，余则随时照料而已”。^③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由吴稚晖起草了后来所谓的总理遗嘱，并在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随孙科等人在上面签字证明。孙去世后，吴参与治丧活动，并为孙执绋送葬，为左绋九十一人执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吴稚晖在广州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总司令蒋介石授旗并致训词。从此，吴便积极扶蒋反共。1927

① 齐如山：《稚晖先生逝矣》，《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② 《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71页。案：《公论报》是在“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创办的反袁报纸。

③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年4月，吴稚晖在上海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察紧急会议时，提出“查办共产党案”，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党籍，并将此举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又与蔡元培等人同住在总司令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大造舆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稚晖积极投入抗战，对卖身投靠日寇的汪精卫口诛笔伐。吴写文章，嬉笑怒骂，率性任为，还不时夹有粗言俗语，据说，他这是受到一本名叫《何典》的书的影响，这书的开头就有一句粗话：“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

吴稚晖晚年以鬻字所得为其生活的一个来源，他擅长书法，兼备数体，尤以篆书著称，被誉为民国四大书家之首。

1949年2月，上海面临解放，吴稚晖辞别妻女，飞赴台湾。史学家唐振常叙说此事：“吴氏家无恒产（吴稚晖生活简朴，世所共知），满室惟书籍”，去台湾，“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张纸，那是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央大学校长的委托书（时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蔡、吴向为挚友，任命老友为校长，当是两人一生交谊中唯一的一次上下任命关系，这个任命终于落空”。^①蔡生前对吴一直赞美有加，当年章太炎与吴为“苏报案”笔墨大战时，蔡曾为吴辨误：“余久与吴稚晖友，深知其为人勇猛、坚忍、克苦，牺牲其家之利益，而专心一志以从事于利他之事业，历久而不渝，虽古之大禹、墨翟，殆无以过也。”^②

1953年10月，吴稚晖逝世于台北，遵其遗嘱，骨灰盒海葬于大、小金门之间。吴的遗嘱是死前二年写好的，写的都是家事，并写明经济上收支平衡。遗嘱写好后，至临终，身边又馥了点钱，他希望把这点钱送给亲戚，于是最后在遗嘱上加了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吴稚晖在学术文化上颇有建树。他早年读书时，就发现中国文字识字较难，见字不能读出音来，以致造成文盲很多的状况，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认为可以采用在汉字旁注音的方法。以后他一直为“语同音”努力，1913年，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读音统一大会，吴选为议长。在会上制定注音字母，审定常用字读音，手编第一部《国音字典》。

胡适认为吴稚晖上承清代顾炎武、颜元、戴震，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吴稚晖崇拜科学，早在伦敦，就写有《上下古今谈》这部科学小说。但他的重要思想却

① 唐振常：《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2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8页。

是由《一个新信仰的宇宙及人生观》^①表达出来。该文发表于当时张君勱与丁文江等人“玄学”与“科学”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稚晖在文中“鼓吹物质”，坚信精神离不开物质，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暂局，历史是不断进化的，若说“有少数古人胜过今人，我可以相对承认，但从大部分着想，就是孔二先生，说不定及不来梁任公大先生、梁漱溟二先生。至于一般普通人，可坚决地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吴还严厉抨击了宋明理学，说由于它的产生，“中国的道德反而低下，把中国民族变成一个懒族”，所以，“我们中国已迎受到两位先生——赛先生（科学）、台（案：今通译作“德”）先生（民主），还要迎一位来做我们孔圣人续弦的周婆的，叫做穆勒儿（moral，道德的）姑娘的便是。”这样，可以让“穆姑娘治内，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台先生请他经国惠民。”

吴稚晖旧学根底深厚，但却曾说过“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的话。蒋梦麟回忆：

（1922年）我在法国里昂，一个借法国旧炮兵营房为校舍的中法大学里讲演，时先生任校长。我想在外国留学，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我就说几句鼓励他们读中国书的话。我讲完后，他老先生急遽的大步登上台来，圆溜溜的两眼似乎突了出来，迸出两道怒火，这眯眯佛（弥勒佛）顿时变成了牛魔王，开口便说，某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这次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么？那么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②

吴稚晖大概并不是真正反对读中国书，他曾应胡适之邀，给年轻人开了张必读的中国书的书目单子。他之所以要说“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的话，实在是太希望中国提倡物质、提倡科学了。三十年代，教育部整顿削减文、法类学校，他就曾为唐文治开办的无锡国专向教育部长王世杰说过情：

……对于国内只有一二之古董，导致入于死地，此又不可不网开一面，于无法中应为设法者。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处于过渡时代，诚有蹙额为难者矣。故弟当日戏告汪先生曰：“我是主张投线装书于毛厕中三十年者”，然激宕之言，为极度紧张之词耳。设当时诚一致采纳，至今已三十年矣，则大炮、机关枪不可胜用，国货、重工业不可胜数，无严重之外患，此时尽听迎线装书于毛厕之中，尊孔读经，可曰“此其时矣”。故共觉文、法可缓图，线装书仍应投入毛厕

① 《吴稚晖学术论著》，《民国丛书》第3编第87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蒋梦麟：《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三期，1964年3月。

耳。但当时弟欲投线装书于毛厕，私心亦何尝不望有最少数之人守候在茅厕边，将欲投者窃取而私藏之，以备三十年后之欢迎。今日犹本此旨，文、法添校，自然绝对制止，若少数文法之校已成立者，非有自犯之大罪，微因迫之而然者，则软性救济，在所必要，因留之以备三十年后为欢迎之藉耳。故贵部尝有讶其矛盾者，弟实一贯，微曲折耳。……^①

王世杰于1971年发表吴稚晖三十多年前给他的这封信，并加了一个按语：

此系民国二十三年吴稚晖先生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事致鄙人之函，……部方因有一方面增设实科（案：理、农、工、医），一方面对上海及其附近不良大学及独立学院等下令停止者，不下十数单位，而无锡国专，部中亦有令其暂停招生之拟议，吴先生因作此长函。……外间对吴先生夙曰“屏弃线装书卅年”之语颇多误会……吴先生喜为滑稽之言，其本意应为线装书之研究不容中断，否则继起研究无人，惟可俟大局好转之后再行提倡。……

吴稚晖肯为唐文治下说贴，固如王世杰所说的，吴本来就不想让线装书的研究中断，只是世人为他平时的“激宕之言”、“紧张之词”而看走了眼。然而，唐、吴两人的南菁情谊在其中是否也起了点作用呢？

吴稚晖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

借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及人生观》的结束语来结束本文：“悠悠宇宙将无穷极，愿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钮永建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一作铁生)，一字孝直，上海县马桥镇之俞塘人。“俞塘西与华亭接壤，南邻近歇浦，洪波浩渺，鱼龙曼衍，帆影轮声，前后相接，沿浦丛簧古木，间以疏柳，夏日蝉鸣其间，尤具逸响，饶稻米丝蚕水族之利。民间富裕，谦让有礼，皞皞如也。”

“十六岁，初应院试不售，愤而咯血，益发奋苦学”，“至光绪十五年(1899)，二十岁，再试，以案首入泮，调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三年。”^②其挚友吴稚晖回忆在南菁，

^① 王世杰：《吴稚晖先生关于“投线装书于毛厕”的解释》，《传记文学》第18卷第6期，1971年6月。

^② 杨恺龄：《钮惕生先生家传》，《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08页。案：同是杨恺龄所作《年谱》，则云“凡三载有余”，《年谱》近是，钮肄业南菁实近四年。

“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钮永建。永建来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龄天才，为杨颐所拔。颐取永建所为古文词，邀番禺梁鼎芬评定，鼎芬尤礼重焉”。^①

钮永建“年少喜骑烈马，一日，纵辔出江阴县城北门，鞍忽裂断，被掷入路边枯水池中，幸无所伤，且身体仍屹坐鞍上。适吴朏同时亦已追踪而来，目睹奇迹，欣然高话曰：‘惕生，你的骑马本领，真是天授，大可学习陆军。’”启发钮永建弃文习武之志愿。^②

光绪十八年(1892)，因掷砖瓦江阴知县乘輿事，与吴稚晖、王英冕等离开南菁书院，事见第六章第二节之“遗闻轶事”，兹不赘。吴、王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钮则回家乡，肄业于正经书院。^③此时，钮经常阅读《外国公报》、《泰西新史揽要》等西学书刊，眼界大开，开始关心时事。他读到《万国公报》上刊载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非常佩服孙中山的胆识和睿智，虽然这时两人还未相识。

光绪十九年(1893)应江南癸巳恩科乡试，中式举人，时年二十四岁。

甲午中日战争后，钮终于“毅然弃文习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投考湖北武备学堂，以第一名录取，接受德国式军事教育四年”。吴稚晖说“永建弃书肄剑，入湖北军校，鼎芬为监督，左右之甚至”，^④钮始终得到梁鼎芬的赏识。

四年毕业后，钮永建留鄂无所事，便向南菁旧友求助。时亦在湖北的陈庆年，于戊戌年(1898)十月二十八日致书南京钟山书院院长缪荃孙，为其说项：“鄂省武备学堂收效亦难。昨纽惕生永建来细谈，日内拟舍而之他。过金陵尚欲入城一谒函丈。此君品学尽可为学堂汉教习。”^⑤陈、钮都是缪荃孙主讲南菁书院时的学生，陈赞赏钮的品行，缪当然了然于胸。过了数月，陈又于次年己亥(1899)四月初二日询问老师：“见在高等学堂已否开学，额数满否？万一惕生能来，需候缺否？学堂关订各教习，如有全单，极以得知为幸。”^⑥钮在写信给陈的同时，也去信吴稚晖：“如有其事，沪中及他所均可，且幸留意，以须后命。”后来钮并未去南京，而是回到了家乡上海，执教于经元善所办的两等学堂。次年(1899)又助经元善创办女学堂，任教

①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第277—280页。案：吴记钮入学时间略误。

② 杨恺龄：《民国纽惕生先生永建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来自《家传》或《年谱》。

③ 案：此据杨编《年谱》。

④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

⑤ 陈庆年致缪荃孙信第五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962—963页。

⑥ 陈庆年致缪荃孙信第六通，《艺风堂友朋书札》，第963页。

务长。暂充南洋公学师范班教习。其间，在家乡创办强恕学堂（前身为吴会书院）。秋，又赴武昌参加选送日本留学生的考试，梁鼎芬适主其事，钮永建“成绩优异”，“以第一名录取，得保送日本，专习军事”。

庚子事变以后，钮在日本“激昂愤慨，奋志革命”。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程家桢、吴禄贞之邀，赴横滨拜谒孙中山，长谈甚欢。不数日，孙中山亲至钮永建住处明凌馆答访，遂相订交。

钮永建后应两广总督陶模之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吴稚晖由日本同赴广州，吴筹设广东大学堂，钮筹设广东武备学堂。旋即返回东京，编行《江苏杂志》，鼓吹民族主义。

次年，与无锡秦毓鎰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创立军国民教育会。关于此事，冯自由有如下记载，说“钮永建惕生时在东京，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结果，当钮将此想法告诉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等人时，遭到拒绝。钮永建“愤懑不胜，一日访秦毓鎰，滔滔述其主张，秦及叶澜等赞成之，且允联名为发起人，永建大喜，即在秦寓草传单，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钮永建等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如雷”。最后，“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等一百三十余人签名，愿意“日日操练，备赴疆场”。秦毓鎰亦是钮的南菁学友。

当时，留日学生对北洋大臣袁世凯还抱有幻想，公推钮永建、汤尔和二人为特派员，回国劝说袁世凯出兵抗敌，事情当然不可能有结果，相反，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还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联系兵操，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泪。”^①钮永建创建拒俄义勇队，后虽未达初衷，但革命思想却由此举在留日学生中得以更迅速广泛的传播开来。

光绪三十年（1904）三十五岁，应南菁学长、广西兵备道庄蕴宽之邀，赴龙州任边防大营总文案兼设教导团，筹创广西陆军小学，成立广西新军。宣统元年（1909）清廷得密报，命两广总督缉捕钮永建，亡命海外。由香港乘船赴德国柏林，考察德国的军事教育及新式武器。

宣统三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钮永建束装归国，以备再起。武昌起义消息传来，钮永建刚到上海，便率领敢死队攻打上海制造局，解救陈其美。后转赴松江，策动松江提督所部水陆军队三千余人就地起义，成立松江军政府。又夤夜走访虞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4页。

洽卿，借款交徐绍楨，推举徐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又策动镇江光复，并率部直捣南京，宣布独立。随即，又以参赞身份随同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参与南北和议。

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委任钮永建为参谋本部参谋副长（参谋总长为黄兴），并代理部务。1913年“二次革命”时，钮以总参谋长指挥围攻袁军坚守的上海制造局，以众寡悬殊，不克。6月，钮永建退守吴淞炮台，与袁政府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的舰队对峙。朱东润回忆此事，说钮永建“矮墩墩，面色苍黑，在南菁书院读书时就自诩为将才，又到日本留学”。当时，“黄兴走了。吴淞口外的刘冠雄和吴淞炮台的钮永建直接联系。刘冠雄的意见是：军舰是国家的，炮台也是国家的。炮台击沉军舰，是国家的损失；军舰炸毁炮台，也是国家的损失。既然南京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守住南京炮台也于人民无益，因此他建议钮永建放弃炮台，安全退出，保全了炮台，也保全了军舰，其实都是保全人民的利益。钮永建一考虑，刘冠雄虽然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但是几天以来，始终没有攻击炮台，所说的话也合情合理。总司令不知哪里去了，自己犯不着无目的地损害人民的利益。他接受了刘冠雄的意见，自动退出。于是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员大哗，有的不客气地说钮永建叛变投敌了。居正自荐，接替钮永建的任务，去吴淞炮台布置一下。可是刘冠雄已经登陆，去也无济了”。^①

二次革命失败，钮远赴日本，远游欧美，宣扬“北廷辱国腐败，不遗余力”。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帝制自为，钮永建东返，“为谋团结起见”，建议孙中山“先包容各派，只以行动一致倒袁为当务之亟”。还致书远在美国的吴稚晖，竭力劝说他先回东京：“袁氏帝制之说日见成熟，欲请先生及蔡、汪两先生回东主持一切”，“私意窃幸三先生之能回东京，共任挽救民国危局之责”，还相信吴稚晖“亚东虽危，亦断无坐视不救之理，故甚以为三先生之东来为然”，甚至“倘时局果至最急时，则亦不能俟先生等之复函，或将径筹川资汇欧，肃君等归也”。撰写钮之年谱的作者不禁感叹道：“亦见其忧国之切，谋国之深也”。

民国六年，袁世凯病亡。钮永建奉孙中山之招，至广州。七年（1918）一月，特派钮永建为参谋次长（总长为李烈钧）兼兵工厂厂长。十二月，在广州遇刺，“突遭凶徒发枪袭击，弹自臀部穿出”，所幸无大碍，回上海养伤。“以后数年，驰骛南北，或潜策反正，或密勿大计。”其中，“潜策反正”者，便包括冯玉祥军。

^① 《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71—72页。

民国十五年，纽永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驻沪特派员，策动上海工人起义，接应北伐。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纽永建任政府秘书长，并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秘书长。明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主政三载。又前后调任行政院内政部部长，考试院铨叙部部长三年，复选任为考试院副院长十年之久。又膺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

在台湾，“享高年，犹矍铄康强，娓娓健谈如少壮。笃守基督教义，自律俭朴，数十年如一日”。纽永建是在民国二年（1913）就加入基督教的。1965年12月逝世于美国，享年九十六岁。

钮永建早年治学勤奋，学有根柢，在南菁书院时，就以高材生闻名远近，以致院长黄以周重校《晏子春秋》而采纳钮永昭的校记时，还说“钮惕生永昭更为详校，今采其说之精覈者”云云，竟误认钮永昭为钮永建了，亦可见惕生之名头之响亮。钮永昭实是钮永建之兄，亦肄业于南菁书院。

钮永建在南菁书院著有《前汉记校释》、《后汉纪校释》各三卷，得到黄以周的赞赏，黄说：“《两汉记》钮孝廉永建有校本，颇为详核。近又寻见丁明经秉衡晋书校文”，将来如果“能多得丁、钮数辈，各取一史治之，十七史校勘记庶或及身见之。同学诸子勉旃”。^①希望南菁诸生以丁国钧、钮永建作为榜样，各校一史。钮永建的《两汉记校释》后被江苏学政溥良于光绪二十年（1894）刻入《南菁札记》丛书，时纽已因擢江阴知县座轿事离院矣。

不过，在书院中日治训诂词章，钮永建志不在此，他在南菁书院曾与吴稚晖谈论到这个问题，吴稚晖在壬辰（1892）日记中记道：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黄院长亲征日记，补书五月日记讫。晚，赴邮航回家，铁臣、迈卿送至河干，聚语方桥。余曰：“考据功夫皆利人，于己无益。”铁臣曰：“今之读书者，犹人之父多集义训，不以自责，专取教子，如乾隆诸老考定各书，曰：将以便后学者之读也。而后学者即我辈也，岂料我辈亦曰：吾将考定各书，以便后者之读。”^②

可见，钮永建尽管在南菁书院精研经古，很有成绩，并得到老师的赞许，但他并不真想一辈子如“乾嘉诸老”那样“考定各书”，而“经世致用”才是他最终的目的，这或许可为他日后终于走上从政的道路，作一个内在的学理上的解释。

① 黄以周：《晋书校文·叙》，《傲季文钞》卷二。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壬辰札记》，第67页。

汪凤瀛 汪荣宝

汪凤瀛

汪凤瀛(1854—1925),字志澄,号荃台,元和人。其父汪亮钧,字秉衡,号和卿,廪贡生,署华亭县教谕、镇江府教授。汪凤瀛弟兄四人,凤瀛居三。汪凤瀛年轻时肄业南菁书院,“从定海黄先生学,通群经大义。”^①有《干禄说》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得州判,入粟,得中书舍人。”光绪十七年(1891)随仲兄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其仲兄“汪凤藻,号芝房,壬午科南元,癸未科连捷进士,翰林院编修,同文馆算学教习、纂修官,出使德、俄、奥、和等国参赞官,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②汪凤瀛作为其兄的随员,被奏委署理参赞官。

回国后,汪凤瀛客湖北,入湖北补用道蔡锡勇(字毅若)幕,“有所撰拟,皆曲中肯綮”。^③因蔡锡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重要幕僚所谓“总文案”,所以张之洞会看到汪凤瀛所撰文字,“竦然异其文,询知出先生手,风左右喻指令入幕”。汪当时没有立即答允。“已而庚子北方拳变起,军书旁午,乃径札委督署洋务文案。时幕府人才填咽,而先生实总其成。每一文稿出,文襄击节叹赏。”关于汪凤瀛任张之洞洋务文案事,章炳麟亦有如下叙述:

光绪末,八国联军入宛平,东南戒严,总督张之洞闻君达治体,招置幕府。之洞卧起无几式,午夜或有所召命,虽监司必揽衣奔赴之,而君子参佐尤亲,治奏牍,论文史,几无寐时。当是时,督府权重,参佐任事者或俾睨诸大吏,君顾敕慎,不以骄人也。^④

尽管汪得张之洞信任,仍十分“敕慎”,不敢“骄人”,但有时也免不了会与同僚发生冲突。罗振玉于庚子年(1900)被张之洞任为湖北农局总理兼农校监督,时农校提调为汪凤瀛,汪“则历陈学生窳败,教习不尽心讲课,惟事诛求,意主停校”。罗则认为校事尚可为,只需改革,便“面谒文襄,陈二事:一请斥不职译员,暂觅替人,以后废除,令学生直接听讲;二请拨地为实验场以资实验”,“文襄大悦,允所请”。次年(1901)“提调已改充幕僚,忿乡人不停校以实其言也,致乡人数上谒,请拨马

① 章炳麟:《前总统府高等顾问汪君墓志铭》,《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一,第68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汪荣宝之丁酉拔贡殊卷,顾廷龙编:《清代殊卷集成》。

③ 张一麀:《汪荃台世文七十寿序》,《心太平室集》卷五。以下引文出处同。

④ 章炳麟:《前总统府高等顾问汪君墓志铭》。

场地，皆不得见。暑假返沪，遂再三辞职”。^①

汪凤瀛处事不激烈，善体民心，于两湖士类有阴德，张一麀称：

庚子年，唐才常创“自立会”，将于鄂中起事，谋泄被获，士大夫列名党籍者甚多。先生乘机焚其簿，始告文襄曰：“穷治必兴大狱，灭其迹则人心自安。”文襄叹息而罢。^②

汪凤瀛治事勤敏，精力过人，张之洞倚如左右手：

汉上繁华甲海内，幕府诸彦或不免游燕之娱，独先生坐处有常，不徇习俗，以节署为家。文襄善夜谈，或至天明乃寝，先生晨接见宾客，昼治文书，夜白事，漏尽则假寐待日，其精力有过人者。中间文襄权篆两江，及入都议政，无役不从。

汪凤瀛先后署黄州、汉阳、武昌府篆，而兼幕府如故。汪在督幕，“入参机要，出绾大郡”，虽小心谨慎，但“忌者日多”，于是，“称疾解印绶，前后居幕府共七年，鬓发浩然矣。”后张之洞入中枢，屡电招，不往。

不久，真知常德府，最后知长沙府。宣统年间，长沙抢米风潮起，事参见本章《王先谦传》，巡抚以下皆被遣，汪凤瀛亦得降级留任。会遭父忧，去官。不二年，清亦亡矣。

民国成立，袁世凯请他出任政府高等顾问。在北京，“细事未尝有所建白，竟以沮帝制，义声动天下”。^③关于这“沮帝制”事，章炳麟有如下描述：

项城袁公既尸大总统四年，与群下议帝号，始有“筹安会”。吏民矍眙，佞辞百端。府高等顾问元和汪君移筹安会，称“七不可”。方属稿，以示诸子。诸子皆踴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虽然，恐不免虎口。”君不应。明日，复问，曰：“已发矣。虽死市曹，吾分也。”书出，袁公以君辞直不能罪，而朝野始知有大法。

章炳麟与汪凤瀛的两个儿子荣宝、东宝有故交，时章正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亲闻其事：

炳麟与君先后直总统府充顾问，帝制议起，炳麟方以牾被囚，得无冒絷。闻君移书，心义之，然未尝一识君。少尝与荣宝游，而东宝又吾弟子也，故知君

①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卷上，《雪堂类稿》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② 张一麀：《汪荃台世丈七十寿序》。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章炳麟：《前总统府高等顾问汪君墓志铭》，以下引文出处同。

事稍详。

而时任袁世凯总统府机要局长的张一麐更是亲历其事：

乙卯，“筹安会”忽张异帜。一日，先生袖其“七不可”之说，造余寓，命奉以进。余曰：“余备员禁近，理宜面折廷诤。公何为者？”先生笑曰：“吾既为此文，预备往军政执法处去矣，子其为我达之。”^①

张一麐也竭力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险遭不测，故张将乡先辈汪凤瀛引为同道，对汪提出“七不可”极为推崇。二十年后，张回想此事，不禁感慨系之：

时群蜚刺天，忠而被谤，是文出，人人先生危，然亦竟以不危。帝制议寝，而全国已骚然矣。由今思之，使用先生之言，何止军队之复杂，财政之危殆，民之憔悴于虐政，迨今日而无术回天耶？然则先生当日之批鳞抗议，视死如归，有足以动风雨而泣鬼神者，岂可求诸寻常得失之林耶？

章炳麟也以历史的眼光来评解汪凤瀛致书“筹安会”之事，认为汪凤瀛必将名载民国历史，他在《汪凤瀛墓志铭》中写道：

以为无道如矢，史鱼之直也；乳鸡搏狸，仇牧之勇也；卷怀以去，蘧瑗之卓也。其大节宜在民国史。而君未尝自伐，惧岁久湮没，故次其事，书于幽宫。

革命党人刘成禺也有同感：“此文遍传南北，为反对改变国体二大至文之一，民国史案必读之文也。”^②刘后来著书，纪洪宪事，就将汪凤瀛所写《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全文录入书内。

汪凤瀛弟兄四人清末皆官知府，故有“一门四知府”之称。如论“功业”，当然以汪凤瀛为最，尤以反对帝制而名载史册。论“科名”，汪凤瀛则略见逊色。其长兄汪凤池，号药阶，同治癸酉科拔贡，光绪乙亥恩科举人；其仲兄汪凤藻，号芝房，光绪壬午科南元，癸未科连捷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弟汪凤梁，号兰楣，己卯科举人，庚寅科连捷进士，翰林院编修。而汪凤瀛仅是一拔贡耳。不过，拔贡十二年一考，得之殊不易。当时，还有一个关于汪氏“垄断”元和县拔贡的科名小掌故，章钰说：

苏府属元和县为长洲县分县，定例：长、元拔贡共一额，长洲列前，元和籍与此选者较少。同治甲子，苏城克复，督、抚、学三大吏疏请长、元两县每届各拔一名，部议核准。于是，籍元和者，同治十二年癸酉得者，为吾友汪袞甫之世父药阶先生凤池。光绪十一年乙酉得者，为袞甫之尊人荃台翁凤瀛。洎二十

^① 张一麐：《汪荃台世丈七十寿序》。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6页。

三年丁酉，则袞甫荣宝嗣之。以后则科举停罢。当初中外合词：若专为汪氏昆弟父子然者。此吾乡科名小掌故也。^①

这里，章钰所说的“吾友汪袞甫”，即汪荣宝，乃汪凤瀛嫡长子，克绍箕裘，更胜于蓝。

汪荣宝

汪荣宝(1878—1933)，字名彦，号怀之，又号袞甫，晚号太玄，元和人，汪凤瀛之长子。汪荣宝出生时，其母“梦人授以珊瑚剪刀，故小字‘梦珊’云”。^②资禀绝人，博涉群籍。“九岁毕群经。十六从大儒定海黄先生游，研精故训。”“为文夷犹清典，自以上嗣陆机，视江、鲍蔑如也。”肄业南菁书院时，因才学出众，深受诸同窗钦慕，丁福保就说：“同学中以汪袞夫年最少，余自愧不如远甚。”^③汪荣宝也庆幸能得到大师黄以周的教诲，离院后还感慨道：“荣幼承庭诰，粗解篇翰，周汉儒书，尤所耽慕。长游大师之门，私淑先贤之绪，徵明保氏之教，旁求博士之法”云云。^④

甲午后，张一麀仿京师强学会，在苏州设苏学会，“同人中如邱公恪震、汪袞父荣宝皆少年奋发，感慨激昂”。^⑤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时“年犹未冠，为各直、省拔贡中最少年”^⑥。“逾年，朝考，除七品小京官，签分兵部。”汪荣宝少年为宦京师，英姿焕发，自称：

吾年弱冠初为郎，自喜卓犖能文章。摘华发藻归古训，上规汉晋卑三唐。酒酣英辩辄惊座，语挟稜锜铍干将。同乡贵官皆却走，心赏独有司勋张。……^⑦

而据章钰回忆，此时的汪荣宝，“才地迈人，駸駸日上，老辈以韩桂舫尚书封——先以乾隆丁酉元和县拔贡出身，扬历中外，官至极品——为袞甫颂之，固熟在人口也”。^⑧

① 章钰：《汪袞甫乡试落卷跋》，《四当斋集》卷五。

② 章炳麟：《故驻日本公使汪君墓志铭》，《太炎文录续编》卷五下，《民国丛书》三编 83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同此。

③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述》，附《历代古钱图说》末，上海书店 1986 年影印版。

④ 汪荣宝：《法言疏证序》(己亥)，《金雍琳琅斋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0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3 页。

⑤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维新之潮”，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⑥ 章钰：《汪袞甫乡试落卷跋》，《四当斋集》卷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18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6 年版。

⑦ 汪荣宝：《思玄堂诗集》之“哀张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0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⑧ 章钰：《汪袞甫乡试落卷跋》。案：韩封以拔贡官至刑部尚书，晚年自订年谱，称：“由拔萃起家”，“自郎官游长秋卿”，《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20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当时，才华横溢的汪荣宝，很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改为外务部）、吏部左侍郎许景澄的器重，汪称“谬以文章契，都忘年辈辽”，竟成忘年之交。庚子事变，许含冤被杀，汪荣宝沉痛回忆：“今年三月，余乞假出都，别公旅邸，清言娓娓，移晷忘倦。临行，公致锦段、时表之属，余以小别不足辱赆，固辞。五月中，余为公撰《褚君墓志》成，因寄公书，戚然于丧乱之方多，继见之无日。书去，无报，而公遂以七月三日见法矣。”^①汪写诗悼念，相信许景澄会流芳百世：

犯难知无幸，捐躯亦自伤。平生有语默，此举系存亡。板荡归天道，贞艰作士常。朝衣碧血在，百世有余芳。^②

庚子前后，汪赴上海入南洋公学为师范生。在公学，汪荣宝结识了蔡元培、章炳麟等一大批学者、革命者，吴稚晖则是南菁学长。不久，汪“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治东西洋历史，旁逮法政”。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政治倾向不一，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汪荣宝倾向前者。日俄战起，“主革命者，阴部署国民义勇军，有所规划，君与焉”，然而，态度似又不甚坚决。壬寅（1902），曾加入留日学生中鼓吹革命的东京青年会，但后来与党人渐疏远。^③

汪荣宝在日本与叶澜合作编撰成《新尔雅》一书，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西学新语的词典，向国人传播西方的政治、法律和教育。

汪荣宝归国后，仍官兵部，并应任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的邀请，为诸生讲授近现代历史，诸生皆服其淹博。讲课时自编讲义，后勒成《清史讲义》一书。三十年代中期，黄濬回忆当年受教情景：

光绪甲辰，先生为教习，授史学。予才弱冠，先生二十余岁，从日本归，短发新剪，束以丝绦，议论森起，意气绝盛。^④

汪荣宝后改授巡警部主事，迁民政部参议，充资政院议员。宣统初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被捕，将置极刑，汪荣宝“阴左右之，得毋死”。在议院，所发议论，朝野所重。陈庆年于辛亥年八月致书汪荣宝，称：

去年资政院开议时，常常在报中见我“袁甫大呼”四字，近以中央教育会又数见“孙雄大呼”，我敬爱之同学，天假之鸣，詎非大快。惜不佞只能作纸上观，

① 《许侍郎哀词》三首之三，诗中注语，汪荣宝：《思玄堂诗集》，第23—24页。案：汪为许代作之《褚君墓志铭》，则收入《金薤琳琅斋文存》。

② 《许侍郎哀词》三首之一，汪荣宝：《思玄堂诗集》，第23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同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9页。

④ 黄濬：《花随人圣龕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不能作壁上观也，恨恨！^①

汪荣宝竭力主张推动清末新政，变法图强，但在某些守旧派人士眼中，“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才华”，甚至骂他为“主持新法罪魁”，是“诸奸”之一。据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②

宣统三年(1911)三月，汪荣宝任协纂宪法大臣，与李家驹起草修订，出力最多，所以章太炎会说“清末宪法，君属草为多”，然而，尚未公布，清朝便灭亡了。

民国元年(1912)，汪荣宝复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民国二年，准备制定国歌，汪荣宝将《尚书大传》之《卿云歌》作些改动，便成了国歌，词云：“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且昼且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最后一句是汪荣宝添上去的。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南北对立，汪荣宝先后为袁草拟了南北方媾和条款，以及各类交涉文稿和善后文件。袁很器重汪荣宝的才学，欲加重用，但汪看出袁欲帝制自为的野心，且时局动荡，便请求外任，及早抽身。据说，当时“梁启超曾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汪荣宝则提议在宪法上加上‘总统于辞职后，应受刑法上之追诉’一条。皆为袁所深不喜”。^③

民国三年，汪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兼考察西洋各国宪法。当袁世凯欲就帝制，将汪从法国召回(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汪也随比利时政府迁至法国)，询问汪荣宝外间舆论时，汪正色答曰：“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袁大为沮丧。汪仍回大使任。

民国七年(1918)出驻瑞士公使。期间，曾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巴黎和会。十一年(1922)，派驻日本公使，奉使整整十年。汪荣宝精通英文、日文，在处理日常繁忙的外交事务之余，还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外交研究工作。他曾在日本东京写信给张元济，请商务印书馆代为搜集外人所著的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籍，以作研究。张元济后回信：“属代搜集吾国出版以西文论述中日交涉之书，弟于此道茫然。当托胡君适之代为选择，据述，亦颇罕见。”^④

① 陈庆年辛亥年八月十三日致汪荣宝书，转引自陈登丰：《横山先生年谱》。案：陈庆年与汪荣宝在南菁书院，名为同学，谊兼师友，汪称陈为问业师，见汪荣宝之丁酉拔贡硃卷。

②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4、86页。

③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袁世凯之欺人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④ 张树年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4页。案：张回信时间为1919年12月25日。

在日本“悉得其阴谋牙蘖”。屡与政府沟通，不得要领，遂萌退意。张元济写信劝阻：“渴想吾兄驻节东邻，久孚物望，折冲樽俎，正仗槃才，何乃高引为怀，急流勇退。想中枢倚重，亦未必遽赋《遂初》也。”^①不久，万宝山事起，汪荣宝罢职回京，终赋《遂初》也。未一月，“九一八”事变发生，自是“不复论国家事”，二年后，郁郁以终。章炳麟对于汪荣宝奉使日本的十年，有如下描述：

自民国兴，邦交独日本最剧。君故学于日本，识其士大夫，奉使十年，悉得其阴谋牙蘖。二十年春，东三省难将作，君上书告变，外交部以为妄。君请遣使赴东京核实，使者归而吉林万宝山事起，韩人暴变，部令君行视。君亲历抚谕，尽得其实，方具草陈覆，遽罢君归，未一月，日本兵陷沈阳。君时在北平，主者闻变，仓皇招君议，君力言宣战，斥迁延避寇为非计，不省。君愤甚，自是不复论国家事。

章炳麟还引故四川督军陈宦言：

今日之败，坐枢府非其人，诚得中材主之，折冲尊俎但任衮甫有余矣。

汪荣宝是著名的外交家，还是位才气纵横的诗人。在北京服官时常与常熟张鸿、吴县曹元忠等唱和，诗风宗李商隐，是“吴下晚唐诗派的健将”，所作诗“高者沉博绝丽，低者熏香抹艳”。后又学宋，“以荆公、东坡为不可及，自作亦转趋平澹”。^②

汪荣宝诗文在清末均属一流。其诗用典多，尤以今典殊难理解，己亥年写成，记隔年戊戌事的《有感》五古两首、《重有感》七律十首，如无史家笺释，后来读者不易读懂，此类有感而发之诗，《思玄堂集》内比比皆是。倒是《商君》一首浅显易懂，录如下，以见汪荣宝对时局的愤慨之情：

公孙才调亦堂堂，新法千言在抑商，岂识邯郸有豪贾，却将奇货视秦王。^③

汪荣宝的文章“夷犹清典”，章炳麟称“当世骈体文，衮甫第一”。^④汪于学术、文学，最崇拜江都汪中，所谓“为文上规陆机，下亦比踪容甫”。他于己亥（1899）作《〈述学〉题词》一文，中说：

……维清中叶，古学大兴，群公先正，主持风气于上，老师宿儒，发扬谏训于下。时海内学人，回易其意，出辞斐然，依于前典。荀慈振采于上京，稚威蜚

①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4页。案：汪信写于1929年11月18日，张复信为当月25日。汪是为邮购之《四部丛刊》明示收书地址事，写信与张的。

② 钱仲联：《近代诗钞》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4页。

③ 汪荣宝：《思玄堂诗集》，“商君”，第12页。

④ 汪东：《金薤琳琅斋集后序》，附汪荣宝《思玄堂诗集》后。以下引文出处同。

声于衡闾，巽轩鹰扬于海岱，渊如凤鸣于江东。美哉璠玕，孚理交胜，俾彼云汉，为章于天矣。

及至冲融醇茂，一唱三叹，无意薪工，与古冥合者，独吾家容甫有其胜焉。观其埋迹淮海，则光气自腾；客游诸侯，则声华藉甚。噫歆之作，只字重于千金；冯虚之铭，鸿文冠于三绝。求之并世，犹罕其伦，何况宋明，畴与抗手者哉。且夫瑰辞朴学，事非一涂，文儒世儒，厥流各异，故有经传洽轨，絀于语言；亦有飞文染翰，疏于考订。君天才所造，备及两家，既文丽卿云，亦学穷淹籍。故诤古则经神避席，正俗则愚顽解颐，释疑则晦义资以复明，表微则孤学赖以不坠。又且辨析天口，语妙时人，涉笔吐辞，自然渊雅。累章盈牍，无病繁芜。信所谓博及群书，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者欤？

余束发受书，实好斯作，宦游所至，未尝不携以自随。每有论撰，辄复奉为法式。而学不逮思，才不称志。发卷循览，若有神契。搦管自为，去之弥远。故知弩马十驾，虽不迷于向往；夫子奔軼，终有窘于步趋。不图为乐，遂至于斯。望洋向若，惟有窃叹。愚才既竭，聊复书之。^①

汪荣宝确也如汪中那样，聚“瑰辞”、“朴学”于一身。南菁学长胡玉缙就称道他：“同邑汪君袞父，夙治声音训诂之学，又工词章，今之孔巽轩、孙渊如、汪容甫也。”^②汪著有《思玄堂诗集》、《金薤琳琅斋文存》等诗文集，又有《法言义疏》等学术著作传世。

汪荣宝国学深湛，又深通外文，曾用俄国学者钢尔泰的方法，借助于梵音，撰写《歌戈鱼虞模古音考》一文，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1923年第2期上，论证了唐宋以前“歌”、“戈”韵主元音读a，魏晋以前“鱼”、“虞”、“模”韵主元音也都读a。该文开首便说：“人生最初之发声为阿(a)，世界各国字母多以阿为建首，阿音为一切音之根本，此语言学之公论也。”因他通晓西国文字，又懂梵文，论证得心应手，文末最后很自信地说：“然则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异日倘有得匈奴西域诸国之古史，以考证司马、班、范诸书者，循吾说以求之，其于人名、地名之即合，思过半矣。”^③他的研究成果，引

① 汪荣宝：《金薤琳琅斋文存》（手稿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② 胡玉缙：《法言义疏·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音考》，《金薤琳琅斋文存》，影印稿本第135—168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

起了学术界古音学上的一场大辩论,赞同者有钱玄同等,反对者有章炳麟等,但赞同者居多。直至今日,该文仍是语音研究学者的重要参考论文。

然汪荣宝致力最多、用情最专、化时最长者,乃在《法言义疏》一书。早在南菁书院肄业时,汪荣宝就好读扬雄《法言》,潜心研究多年,后写成《法言疏证》一书,并求教于乡前辈叶昌炽。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汪衮甫以所著《法言疏证》相质,吾乡后起中杰出才也。”时汪二十二岁。后经十多年的补充修改,终于于辛亥年(1911)铅印排版刊行于世。叶昌炽于乙卯(1915)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汪衮甫参议荣宝寄所刻《法言疏证》,疏通证明,训诂尔雅,王氏《广雅》、钱氏《方言》之亚也。”^①将其人其书比作乾嘉汉学巨擘王念孙《广雅疏证》和钱绎《方言笺疏》。

然而汪荣宝意犹未尽,以为《法言疏证》一书“谬误疏漏,不可胜数”,毅然重作,又经过二十年时断时续的改订,于《疏证》增益十之六七,成《法言义疏》一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不幸遭“一·二八”之祸,稿本随商务印书馆炸毁。汪时已罢官在家,遭此打击,并未灰心,重新“收拾方逸,更定体例,严订程课,为之不辍”。^②他对家人说:“此书竟成,虽死无憾也。”^③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完成全书,书成后十八日,汪荣宝终因劳累过度,撒手离开人世。总计汪荣宝自开始治《法言》起,中经《疏证》,至《义疏》撰成,断续相继,历时四十年,引书三百种,成一家之言五十万字,该书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了。学术界对《义疏》评价很高,胡玉缙说该书“一字务求其来历,一义务取其旁通”,“实事求是,随在见汉学家师法”,“匪惟(扬雄)功臣,抑亦知己也已”。^④黄侃则在该书《后序》中说:“扬子之书,历千载而得先生为之疏释,皎然如晦之见明。”

汪荣宝诗文好,学问好,人品亦好。费行简(沃丘仲子)对他同时代人时出苛论,而评价汪荣宝则说:“荣宝工词章、擅考据,亦重志节。”^⑤如同叶昌炽称扬雄为“莽大夫”一样,章炳麟对扬雄的品行也很看不起,但对极为钦佩扬雄的汪荣宝却评

① 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361页。案:叶昌炽还推测汪氏“刻书之意”,乃“为莽大夫平反,亦自伤所遇也”。

② 汪荣宝:《法言义疏·自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黄侃:《法言义疏·后序》。

④ 胡玉缙:《法言义疏·序》。

⑤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价很高,说汪“其学也,子云;其行也,子云何足以云”。^①

丁福保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号畴隐居士,无锡丁巷人。六岁入家塾读书,自称:“余天性甚钝,幼读四书,日仅三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诵。”^②他天性好动,童趣盎然,根本没把心思花在四书、五经上。他说:“余冬日喜放风筝,恒奔逐于荒墟间。夏间喜捕小鱼,辄徘徊于溪边柳下,每在近水之处,开小沟约长二、三尺,俟小鱼结队而来,则以巨砖塞其出口,以为大乐。”^③

十三岁开始,听他兄长丁宝书讲解《左传》、《史记》、《汉书》、《文选》、徐、庾等书,丁宝书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天晚上要读到三更才准就寝,丁福保也由此学业大进。当时与丁宝书“流年相若,谈说文史”的吴稚晖回忆:“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即通治汉魏六朝数十百家之文。”^④丁福保也说:“余兄长余八岁,故其友若裘葆良、吴稚晖、陈仲英、孙寒厓、廉南湖、俞仲还先生等,皆年长于余有至十岁以上者,余追随诸先生后,饱闻雅言闳论,得益良多。”^⑤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丁福保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⑥早在少年时,丁福保就十分向往到邻县的这所书院读书:“余十四五岁时,闻邑中之好学者,皆肄业江阴之南菁书院,治考据词章之学。余虽年幼,亦心焉慕之。”^⑦

数十年后,他在1942年上海“南菁六十周年纪念会”上做了演讲,可以看出他对书院的深厚感情:

余今日所讲,为余入南菁书院之旧事。六十年前士子,惟识科举,中国实际上长处,一无所知。及南菁既立,始讲求经世有用之学,一时东南之学者风靡,故当时学子,以考取南菁为荣。

见院中藏书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适五都之市,可以荡目遨魂,披发吾十年章替,狂喜无已。手钞院中藏书目一册,而私自祝曰:“他日果能处境稍裕,必

① 章炳麟:《故驻日本公使汪君墓志铭》,《太炎文录续编》卷五下。

②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第5页。

③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第4—5页。

④ 吴稚晖:《寒厓诗集序》。

⑤ 《丁福保自述》,《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之一。

⑥ 案:南菁章程,只收举、贡、生、监,丁福保此时尚未入庠,估计不算书院正式课生,随读而已。

⑦ 上海瀚兰中学:《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自印本,1942年。以下引文出处同。

照此书目尽购之。”

丁福保在书院阅《四库提要》、《读书杂志》、《汉学师承记》等书，始识治学门径。搜集各种《说文》，拟编《说文诂林》，即以是年为始。

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无锡县学生员，已二十三岁了。丁入学较晚，吴稚晖则写信鼓励他：“多作童生一天，即志气消短一天，可不留意乎哉。”丁回忆考秀才的情景，至晚年仍胆战心惊：

呜呼，县试之苦，言之心悸，自三鼓入场，至明日三鼓缴卷，精力衰茶，意气消沉。谚云：人在矮屋中，那得不低头。斯语亮矣。由初试至终场，凡五次。再应常州府试，亦如之。末应江阴院试，则监场末吏，拧状如虎；应试诸生，畏缩如鼠。此景此情，时复入梦，亦大可怜矣。^①

丁自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三年(1897)四年中，一直馆廉泉家，以教读为生。丁福保自称：“廉氏藏书颇多，余寝馈其中者数月，自是颇有志于藏书，惜无力，不能多购。”虽束修不丰，但得读未见之书，也很满意。此时，丁福保治经史外，兼习勾股测量等法，对数学发生了兴趣。二十三年(1897)受父亲摧迫，丁氏兄弟赴江宁应乡试，未售，返回家乡，始知父亲已于他们进考场后两天便去世了。丁自叙此事：“应试南京，吾父病肺而死，不及亲自含殓，由是抱憾终天。”^②这给他极大的刺激，以后，他“绝意功名，誓不复再应乡试者”。

丁福保自父亲死后，家境更为贫困，年终，想到亲戚家借钱过年关，但出于读书人的自尊心，开不出口，毅然掉头返家，伤心之下，竟然“发愤读《史记·货殖列传》，诵声彻户外，即除夕、元旦亦不辍”。自此，萌发了“货殖”(经商)的念头，认为读书人用这种手段来谋生，也终比那些“为官者夺民以肥己”的可耻行为要正当得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谒见近代大数学家华蘅芳于金匱县荡口镇，谈代数学甚久。以算学考入南菁书院，受业于华世芳先生。华世芳是华蘅芳之弟，时为南菁书院主讲算学的院长。这是丁福保第二次进南菁。

时南菁学长杨模正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该年二月，聘请丁福保任埃实学堂算学教习。在埃实学堂三年的教书生涯中，丁福保撰写、刊刻《算学书目提要》、《卫生学问答》二书，是为丁氏刊书之始。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丁福保辞算学教习，赴苏州东吴大学堂肄业。暑假后患

①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

②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述》，附《历代古钱图说》后，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病,久不愈。丁福保自幼体弱多病,又患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顽疾的困扰,固然使他痛苦不堪,但也使他萌发了学习医药的兴趣。经老师华蘅芳介绍,丁去上海受业于华的表弟新阳赵静涵。赵是当时的名医,曾译述过一些西方的医学著作。丁通过自身体会,觉得通过日译医书来学习西医,容易奏效,因此下决心学习日语,就取投考盛宣怀创办的东文学堂,以优异成绩录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李希圣的推荐,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丁福保入京,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兼生理卫生学教习。丁福保很感激李希圣,称他为“第一知己”,丁说:“先是,亦园见余所著书,乃力荐余于张文达公前,故文达聘余来京主讲席,亦园先生实为余第一知己也。”^①丁福保在译学馆,很受学生欢迎,张百熙称赞他“讲授精勤,生徒翕服”,^②又恐怕丁为保住秀才功名,要回家乡应学院试,而耽误了译学馆的功课,还特别致信与江苏学政,准予免考岁试。

丁授课于译学馆约两年多,终觉得“匏系都门,非余所好”,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暑假后,竭力辞馆,遂荐教习数人以自代。译馆学生数百人及馆中各同事皆送至汽车站,俟车轮徐动,犹随车送行,直至汽车远去,始归。”丁福保白云:“余学问甚肤浅,以此收场,可云幸矣。”

丁福保南还,在上海整理书业,出版《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数学书籍,丁称“吾国算书之有详草始此”。丁于刊书之外,兼为人治病。

宣统元年(1909),赴南京应两江总督端方主持的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不久,端方特派丁福保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同时,盛宣怀也特派他为调查日本东京养育院冈山孤儿院专员。丁福保随即东渡扶桑,参观了日本帝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东京小石川养育院等处,调查了日本办理医科学校、孤儿养育院的情况,了解了日本在医药方面的先进技术。

丁福保在日本考察一月,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搜访到了国内早已散佚的唐代僧人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和辽代僧人希麟所撰的《续一切经音义》十卷。这二书保存了不少古代的文献资料,“由于《一切经音义》所采各书,不少今已不存,而所据唐前唐初之本,又文字审正,足证近时各本的讹脱,对经史疑义,求之注疏不能解决者,亦可通过对本书的查考获得佐证,豁然明晰。”^③可惜,该书我国

①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记光绪三十一年事。

② 《丁福保自述》。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正续一切经音义》之“重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早佚，丁福保感叹道，在清代，“当时海禁未开，日本虽有如此惊人秘籍而不获闻于世。使吾国乾嘉诸老而早见及之，正不知其欣喜为何如也”。^①丁将此书从日本携回，石印重版，以广流传，此举正如他所说：“既有功于古人，又有益于学者，实一举而两得也。”

宣统三年(1911)，全家移居上海。丁福保在上海行医，自建丁氏医院一所，中西医结合运用，名声大盛。这时，他已运用西方医学的诊断方法，并采用了X光、显微镜等近代医疗设备。他主张借鉴西医，改良中医。又认为如借资日本，较欧美更为便利，因为日本的古代医学，如同其他文化一样，深受中国的影响。

丁福保依据日文的医药图书，先后编译了七八十种医疗卫生基础理论、内外各科诊断护理药物等方面的医药书籍，合称为《丁氏医学丛书》，并在他创办的“医学书局”先后出版。这套丛书后来在德国、意大利的展览会上获得最优等奖牌。

丁福保还发起组织了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发行《中西医学报》，开展中西医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为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医学，做出了贡献。

丁福保设医院，行医术；又开书局，译医书，真是大展其“货殖”之才。然而，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他有了较丰裕的收入，陆续购藏了各类图书，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丁福保一生编撰了数十百种学术著作，不可谓不宏富矣，但他却很谦虚地认为，有保存价值的，不过数种而已。他曾经说过：

回溯自三十五岁来上海，至今已二十三年矣，其所刊之书，若算学、医学，虽有数十种，皆带时间性，时过境移，宛似已陈之刍狗，无足述者。所刊佛书二十余种，惟《心经精义》、《六祖坛经笺注》及《佛学大辞典》稍有可存之价值。此外，如《陶渊明诗笺注》、《老子道德经笺注》、《静坐法精义》等，皆单本小种，不足挂齿。近十余年来，专致力于《说文诂林》一书，所费三万数千金，劳且靡矣。^②

丁福保自以为“稍有可存之价值”的《佛学大辞典》和《说文诂林》，确实流传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丁福保早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时，就已读过不少佛学书籍，深受影响。后来于1916年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就开始信奉佛教，吃斋茹素，研究佛学，笺注佛经。在遍阅诸佛教经典的基础上，“选择诸经中之专门名词，先去其复见者，而后

① 丁福保：《正统一切经音义序》，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述》。

释其意义,示其出处。以第一字之笔画,分别部居,略如《骈字类编》,而严密其体例,使检查者可一索而得之。”^①又参考了数种日本佛学辞典,终于编撰成《佛学大辞典》一书,于1922年出版发行,“全书共收三万余条辞目,内容包括佛教典籍、专著、典故、术语、名词、名僧、史迹等,每条辞目下均注明其类别,解释辞义,征引出处,重要的专名则注以梵文或巴利文。”^②这部三百万字的皇皇大著,至今仍是佛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丁福保耗时最长、致力最深的当推《说文解字诂林》一书的编撰。早在南菁书院读书时,他就开始搜集有关《说文解字》的各种著作。后来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萃集了治《说文》诸家学说及其他著作中论及《说文》的文字,撰成《诂林》一书,引书达一百八十二种,连殷墟文字(甲骨文)、鼎彝款识(钟鼎文)、《正始石经》(魏晋石刻)等,也都一一分类,附于各字之下。共成一千零三十六卷,计有七千六百余页,装订六十六册,1928年出版发行。后又汇集了未收的有关《说文》的其他四十六种,续编成《说文解字诂林拾遗》。

关于《说文解字诂林》的价值,于右任说得比较通俗:

《说文解字》为研究国学必备之书,自逊清乾嘉以来,关于《说文》之著作,不下一二百种,学者如欲检查一字,非遍检各书不可,而单文零义之散见于各家文集及笔记中者,一时尤难检阅。今丁君编辑《说文诂林》,合原书一千余卷,囊括有清一代许氏之学,汇为渊海。检一字而顷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说皆备,凡各书之所谓某为正字,某为借字,某为古文,某为异文等,昔人穷老尽气而不得者,今费半小时即可得之,所以此书不仅集许学之大成,实亦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也。^③

不过,后来学者对此书也有非议之词,如张舜徽说,丁福保此书“直以浆糊、剪子分属多人,为之粘贴以成编,谓为‘资料丛钞’可也,岂得目为著作乎?”^④丁福保的南菁学长胡玉缙说得中肯一点:“余谓丁书虽陋,可备翻阅。”^⑤胡精通训诂音韵之学,治《说文》当然比丁精深,故讥丁“陋”也很正常,但他也没有抹煞丁的功劳,称该书“可备翻阅”。至今,该书诚如于右任所说的“实亦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

①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之“自序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佛学大辞典》之“出版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

③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第125页,《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

④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⑤ 胡玉缙:《法言义疏序》,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点校本。

也”，还是治文字训诂学者的案头必备的主要参考书。

《说文解字诂林》出版后次年，丁福保特地给他的新居起名为“诂林精舍”。

丁福保治学兴趣十分广泛，他收藏了很多古代的钱币，利用这些实物，进行学术研究，自1938年起，陆续编印了《古钱大辞典》、《续编》、《古钱学纲要》和《历代古钱图说》等有关古钱币的专著，其中，《古钱大辞典》被称为与丁氏的其他两部著作《说文解字诂林》、《佛教大辞典》鼎足而三的力作。

丁福保还编印了不少古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如《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等，至今都是研究文学、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很好的资料参考书。

丁福保一生都很关注慈善事业，中年信佛后，更是悲天悯人，乐善好施。他曾先后在上海佛教医院、上海福幼院、古钱学会等慈善机构或学术团体任职，对社会慈善事业作出过较大贡献。

丁福保是位藏书家，一生嗜书如命，他常常质产典田，奔走购书，即便倾家所有，也在所不惜。至1919年《佛教大辞典》初稿完成时，就已有十余万卷藏书。但他并不自拥书城，仅为一己之用，而是经常以捐赠为乐。他赠给上海市政府图书馆一万五千卷，后又再赠；震旦大学木刻本二万八千余册，震旦大学还特地为之设立“丁氏文库”，专门收藏丁氏赠书。他的家乡无锡县立图书馆及他曾教过书的埃实学堂，也都收到过他捐赠的不少图书。他珍藏的十余种宋元善本书籍，赠与了北京图书馆。

丁福保还把收集珍藏多年的一部分古钱币，分别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光华大学和震旦大学，供专家们研究之用。

抗战胜利后，他将房屋田产悉数捐给亲友和佛教组织。他曾对人说：“本无一物带来，亦将无一物带去。”^①

丁福保治学通博，兴趣广泛，数学、医学、佛学、文学、古钱学、文字学及伦理道德等各个学术领域，无不涉猎。据统计，他“先后编纂的译著有算学书十种，健康长寿法书二十六种，文字学九种，文学诗词八种，古钱学八种，杂著九种，佛学三十四种，医学七十五种，德育十种，道学二种”，^②种类、数量之多，当世无匹。

①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诂林精舍一席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② 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第八章第六节“丁福报及其《佛教大辞典》”，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

丁福保一生,可用他自己在《自订年谱》中经常说的四个字来概括:“行医、刻书。”当时有人评价他的医术:“其拟方用药,斩钉截铁,视他人为神速,今之良士兼良医也。”^①至于其编书刻书,李详则称他“以编书为服饵”,当作强身健体之道了。李详说:

仲祐为南菁书院高材生,体弱善病,从事上古医书,参以东西经验药物,因持西医名世。而编定书籍,不中程不止,每日殆无少时为行散岸愤之乐,然仲祐颜色加润,不为之损,意者其以编书为服饵,具有道微,未可知也。^②

丁福保行医刻书,济世利民,功在当代,利泽后世。

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武进县人。蒋出身贫寒,其父蒋祖德“九岁入塾”,“十三岁弃儒习工”,曾一度以“鬻薪贩甑”为生。^③对于自己的出身低微,蒋维乔从未讳言。据李详说:

武进蒋氏族姓繁衍,其门材阔闳,闻之久矣。晚交蒋竹庄维乔,颂之曰:“君故名家大族也。”竹庄从容而言曰:“吾家别于他蒋,由高祖以上,不辨世系。老父以贫故,习工业,生维乔兄弟,厕名士夫间,皆老父余荫所及,非有重世显贵,列于膏粱著姓。”

后李详自己也觉得好笑:“九品中正之废已久,余犹期竹庄以世胄,此游方之内流俗人之见耳。”

蒋维乔颖悟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因家贫,无力从良师。虽喜读书,却又不喜做八股文。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从友人处借得一部《曾文正公家书》,逐日细读,“始知世间有义理、词章、考据等学问,乃大喜。决以段、王、江、戴之训诂,为班、扬、左、郭之文章”。^④

蒋维乔于光绪十八年(1892)入学,是年二十岁。后偶应乡试,辄不中,蒋亦不以为意。“是时,上海制造局译出科学书籍”,蒋“见而喜之,从事研究,向者所好之小学词章,亦稍稍辍置矣”。

① 陈灏一:《新语林》,“巧艺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李详:《历代诗话续编序》,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李详:《武进蒋少颖先生传》,《学制斋文钞》卷二,《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57—958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④ 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卞孝萱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第390—399页。以下引文出处同。

二十一年(1895)由江苏学政龙湛霖调入南菁书院肄业。蒋在《因是先生自传》中称:

江阴有南菁书院,学使黄漱兰先生所手创也。院中专治经史舆地、古文词章等学,为全省最高学府。秀才考列前茅者,方得进院肄业。院中有十万卷藏书。各生有斋舍一间。每月有膏火。肄业其中者,皆大江南北之优秀分子。先生于二十三岁,以岁考第三名调入书院,得从定海黄元同山长游。遂潜心经子,并肆力于古文。如是五年,学业稍有成就,不若向者之泛滥无归矣。

蒋在南菁书院肄业五年,有《书龚定盦古史钩沉论》、《沿海形势今昔异宜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后书院改高等学堂,又进学堂习新学近两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蒋维乔跟随其师南菁学堂的理化教员钟观光到了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并参加革命演说活动。次年又担任教育会所办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的国文教员,章太炎教三、四年级,蒋教一、二年级,不受薪水,校中仅供膳宿,蒋维乔与章太炎二人全靠翻译日文以自给。

“苏报案”发,爱国学社解散,蒋受蔡元培之托,维持爱国女校的正常教学。从此,蒋认定“救国根本,厥在教育”,而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①便正式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以后约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小学教科书的编辑上。自光绪三十年(1904)至以后的两年中,他与商务同仁编完并出版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一套十册,风行全国。自此,中国开始有了一套自己的具有近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教科书。

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首先拜访蒋维乔,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蒋在短时间内协助蔡元培,制定教育法令和教育部官制,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事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至二目红肿”。后蒋随蔡北上,任教育部参事。

次年,汪大燮出任熊希龄内阁的教育总长,蒋与汪意见不合,拂袖南归,仍回上海入商务印书馆。蒋因此事博得“方正”美誉:“蒋竹庄官教育部参事,一日,以公事请示堂官,堂官曰:‘是不可行。’蒋力争,堂官曰:‘吾不欲行,便不行。’蒋怫然曰:‘独不容参事参一事耶?’遂辞官南归。”^②

蒋重回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编书之余,蒋维乔写成

①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以下引文出处同。

② 陈瀚一:《新语林·方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了二部风靡一时的养生著作《因是子静坐法》和《废止朝食论》。所谓“静坐法”，据说起源于道家的导引术，但蒋的静坐，与佛学也有血缘关系。蒋自幼多病，后来他一面研究老庄学说，一面身体力行，又依据佛教的童蒙止观法，采用天台宗止观，练习静坐法，数十年不间断，不仅医好了“咳嗽咯血，百药罔效”的肺疾，身体还日益强健，以致登山临水，遍游海内诸名胜。蒋维乔决心要用科学的道理来说明“静坐法”对养生的作用，便写成了《静坐法》此书。《废止朝食论》，顾名思义，就是要废止早餐，每日仅进二餐，避免饮食过量而对人反而有害。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当然值得商榷，但在当时，作为经验之谈，还真有点影响。

民国五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请，先与黄炎培等人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归国后，重返教育部任旧职，掌管教育法令，事务清闲，蒋便投入佛学研究。他除了从不间断去听高僧谛闲法师的讲课，还阅读了大量的佛经和有关佛学著作。自此于佛学造诣渐深，习静之功亦与日俱进，真所谓佛道双修。

九年，被简任江西省教育厅长，不就，留教育部为编审员。

十一年，在倡议“苏人治苏”的舆论下，就任江苏省教育厅长。蒋自叙其中原委：“民十年，倡‘苏人治苏’之议，韩君国钧以本省人出任省长，各方面欲得一本省人而向无党派者任教育厅长，不约而同，咸注意于先生。”^①蒋推辞不掉，就在离京南下前，于江苏同乡所开的欢送会上，宣布了四点教育政见：“办事惟凭公理，对各方面绝不敷衍；用人以人材为标准；经济公开；亲自赴各县观察。”蒋后来也是这样做的。至十四年离任，蒋在南京任职三年，排除了派系林立的省议员的种种纠缠，对江苏教育作了一些整顿，苏省教育日有起色。

蒋此时对佛学兴趣有增无减。当时南京内学院正由欧阳竟无居士开讲“唯识论”，教育厅长蒋维乔就成了该院的一名特殊的弟子，“听讲二年余，未尝一次缺席”。蒋还应东南大学的邀请，为该校开设佛教课程，每周亲自赴校主讲佛学。蒋自称“余在南京，备有三种人格：一为行政官，二为教师，三为学生”。

民国十四年，北洋政府内部纷争，省长易人，蒋亦被免职。后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波，蒋维乔经友朋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等人劝说，只得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猛精进的佛教信念，勉为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在时局混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蒋维乔惨淡经营，“整顿内部，筹划经费”，终于使“校务蒸蒸日上，风纪

^① 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以下引文出处同。

肃然”。

蒋任东南大学校长期间，还亲自为该校学生讲授诸子、佛学等数门课程。在授课期间，他撰写了《道教概说》、《杨墨哲学》二书。

民国十六年三月，北伐军攻下南京，蒋维乔告别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愿多闻世事，而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的撰写。

他在《中国佛教史》的自叙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我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然而，“研究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是为教理之辅助，岂可忽乎？”^①

这就是蒋维乔撰写《中国佛教史》的起因。但当时国内尚未有人做过这项工作，他只得“借资于东籍”，“以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纲》为依据”。但蒋维乔也指出《支那佛教史纲》的不足，在《史纲》的基础上又作了以下几项开创性的工作：

一是“检阅《正续藏经》，于其错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二是“北魏之南北石窟造像，及隋时静琬所刻之《石经》，为佛教史上重大事实，原书无一语涉及。今特补叙一章（第十二章《造像与石经》）”；三是“历史通例，应详于近代。原书于清代之佛教，略而不言，盖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是一大缺点。今于近世佛教史，自清代至民国，特补叙两章（第十七章《近世之佛教》，第十八章《近世各宗》）”。“清代以后佛教史料，至为散漫，苦无可据之典籍。今于官书及私家记述，尽力搜罗外，复致书南北各丛林，详细调查。鱼雁往返，颇费日力”。书信采访，当然耗时费力，但也获得了第一手“活”的宝贵资料。

蒋维乔征文存献，筚路蓝缕，终于在1928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佛教史，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蒋维乔定居上海后，不愿多闻世事，每年春秋佳日，必与二三友侣出游名山，以致光华大学聘蒋讲中国哲学，却为蒋拒绝，而称“年来读书看山，不愿与学校发生关系”。没有想到，就在写定《中国佛教史》的这年冬天，一生积蓄的养老金一万数千金，为人亏倒，以致蒋无以为生。无奈之下，只得于次年秋天，应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后文学系）教授，折节重为教读生涯，先后共二十余年。

^①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蒋在光华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佛教概论”等课程。抗战前的八年中，他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备课，虽然忙碌紧张，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学术专著，也正是在这时完成的，如《佛教概论》、《佛学纲要》、《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宋明理学纲要》和《吕氏春秋汇校》等，其中也有是与其学生共同编撰的。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入日寇铁蹄，蒋的生活和工作更为艰辛，但他从未在敌伪的胁迫下屈服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上海光华大学被迫停办，转入地下。七十高龄的蒋维乔同时担任诚明文学院、诚正文学社和鸿英图书馆三处的领导工作，不堪重负。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是日伪方面加紧了对他的直接诱胁，日本特务机关的人还亲自登门拜访，要蒋维乔到日伪主持的所谓暑期讲习所去讲学，被蒋当场断然拒绝。事后，日伪仍不死心，竟使出欺骗手段，在报纸上登出蒋参加暑期讲习所的假新闻，蒋随即也请记者刊登“报端所载，或系传闻失实”进行回击。八年抗战，蒋维乔在敌占区内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在上海复校，蒋维乔任该校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然而，他对时局完全失望了，因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贪污狼藉，大失人心。而物价直线上升，人民生活，如水深火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维乔以77岁高龄出席了苏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和常任副主席。后来，被委以政府参事。1958年，阅尽人间沧桑的蒋维乔，不幸逝世于上海寓所，享年86岁。蒋之死因，也有说是因为其子（郑逸梅则称其爱孙）被补划为右派而萌生去意所致。

蒋维乔和丁福保这两位南菁学友，幼年时都体弱多病，但都得享大年。郑逸梅写有《蒋维乔、丁福保的长寿比赛》一文，节录如下：

丁福保先生和维乔丈为海上二老，幼年时都体弱多病，人寿保险公司拒绝他们来保寿险，恐防保了要赔本的。岂料他们能自己锻炼，丁福保主张呼吸新鲜空气，冷天开窗睡眠，人们拥暖炉，他却在庭院间散步乘风凉。蒋维乔主张规定时间日事静坐。结果二人精神旺盛，都成为健康老人。二人均坚持自己的主张，各不相下，最后赌一东道：“谁先死便是谁失败。”请我作为他们的见证人。经事实证明，丁福保卒于一九五二年，蒋维乔卒于一九五八年，静坐法占了上风。^①

^① 《郑逸梅选集》第六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290页。

郑逸梅在文末还很惋惜地说：

维乔晚年，还是矍铄似伏波当年，可是一旦突然恶化，缘由是家庭发生一大变故，受到严重的刺激，一代哲人，也就离世而去了。惜哉！

蒋维乔著作宏富，除前述各种外，还有《因是子游记》、《长寿哲学》、《大乘广五蕴论注》、《圆觉经亲闻记》等书刊行于世。其《自定年谱》、《日记》、《文集》稿本均藏于上海图书馆。蒋维乔每天写日记，持之以恒，从不间断，即称《因是子日记》，内容包罗万象。当初张元济乘商务印书馆影印《越缦堂日记》之机，劝蒋维乔亦将其日记整理付梓，因其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惜未成功。

纵观蒋一生的治学道路，由儒而道、而释，虽似曲折，却很清晰。他留给后人数百万字的有关教育、哲学（包括佛学）、养生等方面内容的著作，是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入研讨。

金天翮

金天翮（1873—1947），字松岑，吴江县同里镇人。初名楙基（在南菁书院肄业时便是用的这个大名），后曾改名天羽，中年后，又自称天放楼主人，号鹤望。

金松岑祖上“皆仕，未大显，以德行称重乡里间”。^①金松岑“年十八，补县学官弟子员高等，府试获隽”。^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江苏学政瞿鸿禨按试苏州，识拔金松岑，调南菁书院肄业：

善化瞿侍郎鸿禨按试江南，得先生所为《长江赋》及《西北舆地图表》，遽大称赏，檄调南菁书院肄业，选充学长。当是时，大江南北材贤知名士，皆集南菁，相与谈析道艺，高会文酒，疑义竞起，互矜人艰僻以取胜所不知。先生顾年少，一旦拔置都讲列，居恒自谨敕，日闭户诵习，不与同舍颉颃，默识潜悟，学以大殖。

该年，朝廷正准备开设经济特科，瞿鸿禨便保举陈三立、丁立钧、华世芳、孙诒让等十五人，“又于江苏士子中择优附送六人”，而这附送的六人全是南菁书院院生，金松岑亦在内，瞿学使给出的考语为“舆地、兵学，皆能讲求”。^③后因发生政变，新政推翻，经济特科并未举行。不久，金因祖父年老，辞院归养。金松岑在南菁书

① 徐震：《贞献先生墓表铭》，《广清碑传集》卷二十。

② 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行状》。

③ 瞿鸿禨“保举经济特科片”，《瞿鸿禨奏稿选录》，《近代史资料》总83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

院曾辑《西域兵事》，补顾祖禹《读书方輿纪要》，未成。^①有《汉弃珠崖论》、《太学上书讼朱穆论》、《论宋建中初政》、《书王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后》、《书龚定盦古史钩沉论》、《中俄界约考》等课作收入《南菁文钞三集》。

金松岑在家乡就同川书院之讲舍，立自治学社，还创设理化音乐传习所，又斥资办明华女校。自治学社后改为同川两等小学，南社诗人柳亚子即毕业于此校，柳后来还写诗赞诵老师：“同川衣钵谁能同，心折堂堂天放翁。”^②吴江之有学校，自金松岑始。

金松岑又赴上海，结识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党人，加入兴中会，写有《女界钟》、《自由血》等书，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又撰写《孽海花》这部著名小说的前六回，后由常熟的曾朴续完，曾朴也由此得享大名，但金松岑筌路蓝缕之功却很少有人提起。金还将日人宫崎寅藏所著的颂扬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邹容撰写《革命军》时，金松岑曾出资助刊。

“苏报案”发，金松岑返乡，“仍主学校事”，“暇为乡人督治团练，著短劲装，缚缚佩刀，以什五法部勒子弟”，“绳莠民又绝严”。不料江南水灾，“乡农嗷呼，劫米于市，莠民乘之，因毁其家。”于是金只得离乡寓居苏州，重拾旧业，“发篋读古人书，所业益进。吴之士问学称弟子者，踵于门”。这时，在弟子眼光中，“先生长躯，瘦削立，疏髭眉，貌清臞而晰，目短视而阅读如电扫。博通多识，为文章闲逸，摇笔波涌，当世能诗文数十辈，虑莫出先生右，声称藉甚”。

民国成立，膺选为江苏省议员。又与宜兴的南菁同学储南强，积极谋划成立太湖水利委员会，金松岑认为，江南治水，必先治湖，因太湖乃吴越诸水之渊藪。围田壅湖，则是目光短浅、只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应该拆毁圩堤，还田于湖，“不与水争势”。然而，金的意见不见重视，只是以后人们才明白，金“所言农田水利，当时或见迂阔，而后无不验。”后来，金还担任过二年的吴江教育局长，一年的江南水利局长，但因“峭直刻方为干戾时俗态，以是蹇困无所合”。

金松岑既无意于当世政务，“颇欲修明经术”，以“存绝学、正人心”。于是与寓居苏州的李根源、陈衍、章炳麟等发起，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成立国学会，推张一麀为会长，李、陈副之。著籍为会员者近千人，来自十八行省，金松岑与章炳麟“迭主讲论学，尤相推许”。后因经费短绌，书生意气，不免言语酿隙，章太炎便自组

^① 李猷：《金天翻传》，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卷二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郑逸梅选集》第六卷，第349页。案：郑逸梅在苏州亦曾问学于金松岑，称老师。

“国学讲习会”，而金、李、陈仍主办国学会。

1937年，日寇入侵，金便隐居不出，仍不废吟咏。敌伪屡次威逼金出任伪职，遭峻拒。后赴沪，出任光华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金松岑重返苏州，回到他的天放楼上，闭户不出，“惟二三志士时至其室，至则视天画地，论军事，谓倭之败，可翘足待也”。^①

抗战胜利后，金松岑目睹政府腐败，民生日艰，心情极为愤懑。家又连遭不幸，爱孙、次子相继去世，金终于支撑不住，抑郁离世。门人私谥“贞献”。

金松岑“天才踔厉，词藻缤纷，而又好壮游。所至，名公巨卿无不倒屣。眼界广，境地高，故其诗沈雄奇伟”。金也很自负，曾对后辈友人说：“我诗夙以大家自期，今知其不可，甘退而居名家矣。”^②诗界对金松岑评价很高：“金天翻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他的诗“可与《人境庐媲美》”，“诗歌成就达到了他的时代中的顶峰”。^③

金松岑晚年好《易》，“年五十，从吴门曹叔彦先生元弼游。其仪适，具受业弟子红帖，修攀之日，行跪拜礼，师中坐，受之不辞。时松岑诗名已满江浙，而师之年仅长五龄。嗣是每岁首必叩贺无间，吴人以为美谈。”^④曹元弼也是金松岑的南菁学长。

抗战期间，南菁同人在上海租界，恢复南菁中学，托名“漱兰”，为纪念创始人黄体芳也。1942年，南菁书院六十周年纪念，书院老门生丁福保、金松岑等亦都参加，金松岑特作七古一首《漱兰中学六十周年纪念》，以示怀念母校之情，诗作手迹见上编第四章第五节之“校庆活动与老课生手泽”。金松岑所作诗文，今已大都收入《天放楼诗文集》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11月整理出版，但这首回忆南菁书院的诗，恐仍游离在外。

① 徐震：《贞献先生墓表铭》，《广清碑传集》卷二十。

② 沈其光：《耕粟斋诗话初编》卷四。沈称：“戊午，余游吴中诸山归，过松岑寓庐。松岑曰”云云。

③ 钱仲联：《近代诗钞》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3页。

④ 沈其光：《耕粟斋诗话三编》卷一。

第九章 南菁书院历年学友录

南菁书院留存至今的资料不多,1935年由南菁中学校务主任孙振主持编成《南菁略史》,其中附有《南菁历年学友》名录,是珍贵的书院史料。

1932年1月,江苏省教育厅任命孙揆均出任江苏南菁中学校长,经校董会再三敦劝,孙始允就职,时校董会主席为吴敬恒,两人都是原南菁书院高材生。然而,孙揆均很少到校,^①实际主事者为校务主任孙振。^②孙振在1935年编《南菁略史》时,辑录历年学友名录附在书内,孙称:“廿一年春,振奉寒厓先生之命,来澄主持校务,暇时检寻校中旧藏文件,得书院膏火清册、历年同学录暨学生名籍表册各若干,爰集同人,分期整理,旁稽博采,草成本录。如书院时代之在院名籍,十四、五两年,全部散佚,征引无从。即有名籍者,舛漏亦多。蒙倘前辈诸公暨新旧学友,详加校订,俾得随时修正,实深欣幸。又本录编辑校对,韩君韞修最为辛劳,特附志焉。”^③

孙振编成《学友录》后两年,抗战爆发,南菁遭受重创,“书院膏火清册、历年同学录暨学生名籍表册”这些原始资料,连同《皇清经解续编》全部刻板,全部毁于战火。而孙编《学友录》尚留存至今,也就成了后人查找书院课生名录的唯一宝贵的资料。

《南菁历年学友》中,前面三个部分为(一)书院时代(按在院年份排列),(二)江苏全省高等学堂时代,(原注:因无毕业生,从阙。)(三)南菁文科高等学堂时代。

书院时期的学友名录,自光绪十一年(1885)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止,约一千二百余名。江苏全省高等学堂时期,无名录。南菁文科高等学堂时期,有预科

① 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陈以鸿老先生回忆,三十年代他在校学习期间,从未见过孙校长一面。然而因孙揆均名声极大,所以,数十年后,仍会有校友提起这位孙校长。三十年代肄业南菁中学的汪曾祺,于1990年代曾回母校踏勘,后留《樱花》诗一首,还提到这位孙校长。

② 有说孙振乃孙揆均之侄子,然孙揆均是无锡人,而南菁历年教职员名录中,孙振的籍贯为武进。不可解也。

③ 孙振编:《南菁略史》,南菁中学铅印本,1935年。

第一届四十九人，预科第二届七十一人，分别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和十二月毕业。

然而，两届预科毕业，是在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而非南菁高等文科学堂时期，因高等文科实际上并未开成，清皇朝便灭亡了。孙编《学友录》此处叙述有误。

书院学友录仅载有课生姓名(有些尚录字号)、籍贯(有些连籍贯亦付阙如)，有些还注明功名，如生员、廪生等。极少数人尚留有当时的通讯地址。

书院学友录的记载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而书院开学在九年(1883)秋，那时已有课生入院肄业，故本书对此也作了一点课生在院肄业时间的厘清辨正的工作。

孙揆均长校，校务主任孙振编写学友录时，因距书院创建时已有五十多年，资料多有遗失，故课生名录有所遗漏，亦势所难免。现收集有关资料，对书院历年学友名录作了一些补充，对众多课生的学行也作了一点考证。然一鳞半爪，难惬人意，亦实属无奈，读者鉴谅。

书院时代

光绪九年(1883)秋入院

案：原《学友录》大都在十一年(1885)

曹 俨 字公望，江阴县人，诸生。七岁孤，家贫，训蒙养母，兼自课。从弟钟彝官山左，调蜀中，招往游，崎岖万里，文境益奇，数以古学列优等。邃《周髀算术》，得宋景昌(案：李兆洛主讲江阴暨阳书院时的及门弟子)之传。所撰《补江阴县志日出入时刻表》及《中星更录》，南菁书院山长南汇张文虎刊行之。^①

冯诚中 (1858?—?)，字逊时(一作圣时)，嘉定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江南乡试举人。^②有《释升阶让登先登例》一篇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冯 铭 字箴若，江阴县人。南菁书院经董。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常州

①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案：《学友录》曹俨在光绪十三年。

② 案：《学友录》冯诚中名在光绪十二年。冯诚中之光绪乙酉科乡试试卷，南菁书院肄业师中有张文虎、黄以周，据改为光绪九年。闵萃祥《游鹅鼻嘴》(《八指诗存》上卷)五律四首之三，末两句：“所欣得良伴，攀陟有同心”，闵自注：“同行者为华若溪、冯圣时、周敬修、王斗槎、雷谱桐。”则逊时亦作圣时。闵萃祥是在光绪九年(1883)随其师张文虎来江阴南菁书院的。鹅鼻嘴是在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山，与闵同游者均为南菁同学。

府学岁贡，就职训导。在院肄业多年，凡南菁刻书，校讎为多。有《论程征君记车制得失》、《论阮官保考车制得失》、《汉艺文志序六艺九种家数篇数异同考》、《金口木舌赋》、《太学生执经代手版赋》五篇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耿葆清（1857—1932），字德照，号伯齐，又号齐贤，后改名道冲，华亭县人，工部尚书张祥河之外孙。在南菁书院师从张文虎、黄以周。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朝考一等，授七品小京官，官户部主事。清亡，即归。同郡后辈沈其光回忆：“鼎革归，就张温和公松风草堂旧第，结松风诗社。平生尤耽书，晚年双目失明，犹能瞽光弄笔。索书者多，亦不自矜重也。先生为人，不立崖岸。论者谓其人品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云。”^①尤擅章草。著有《炊莢子感旧初集》，编有《炊莢子七十寿言》。

华世芳 见《名人传》。

雷补同（1860—1930），字协臣，号谱桐，娄县人。幼颖悟，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肄业上海龙门书院，师从刘熙载，治词章。“学使者黄体芳见其文，大器之，调南菁书院肄业。”^②受业于张文虎、黄以周。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松江府学拔贡，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签分户部广东司行走。十四年（1888）戊子科顺天乡试中式，经考试，充总理衙门章京。二十七年（1901）升外务部考功司员外，后累迁至外务部右丞，时在丁未（1907）。该年秋七月，出使奥国大臣。庚戌（1910）回国，即以母老乞养为词告归。鼎革后，杜门不出。民国六年（1907），曾被推为松江地方志总纂，旋辞去。逝世后，唐文治为作《墓志铭》，称其“为人通敏沉默，案牍洽熟，因应咸宜”。又叙两人公谊：“余与君同官户部六年，同官外务部五年，每商榷公牍，评量是非。”“丙午岁，与君一别，不通音问二十余年，沧桑之感彼此同之。闻君噩耗，不禁百端之交集也。”雷著有《味隐存稿》，味隐，晚年自号也。雷有《桃曰胆之解》、《新绿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刘富曾（1847—1928），字谦甫，仪征县人，世居扬州。祖文淇，父毓崧。兄弟四人，富曾居三。“刘氏自文淇以治《春秋左氏学》名海内，毓崧、伯兄寿曾纘承其业，三世并列传《国史·儒林》，人以比东吴惠氏。”^③刘富曾早年曾就读于江宁钟山、惜阴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优贡，十四年（1888）戊子科江南乡试举

① 沈其光：《餅粟斋诗话·初编》卷四。

② 唐文治：《雷君谱桐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③ 民国《江都县新志》卷八《人物传》。以下引文出处同。

人。富曾渊源家学，平生于治经外，兼攻畴人术，遥与金匱华蘅芳氏相应和。“初授徒于家，继乃友教四方，成就弟子甚众。”“馆南陵徐氏、汉阳洪氏最久。”辛亥后，寓居上海，为吴兴刘承幹校雠群籍，“所校书以《宋会要》为最致力”，“杀青甫竟，而富曾年近八十，归老里门矣”。富曾“性孝友”，“礼敬寡嫂，抚遗孤有恩”，“性廉介，非义不取”。扬州后辈学人董玉书称刘富曾读书用功：“暑夜读书不辍，将足藏之瓮中，以避蚊蚋。”还称赞他谦逊有礼：“有人就询故事，辄娓娓以告，无德色。”说他“途中见有字纸，不拘墙隙灰堆，必检拾归而焚诸炉。”甚至称他是圣人：“谦甫天性孝友，笃行君子也。乡人称为刘三圣人。”^①曾为徐乃昌所延，纂《南陵县志》。刘逝世后，南陵徐乃昌为撰《墓志铭》。

刘翰（1861—1904），字淮生，后改名懽，武进县人。树屏之弟。“自幼颖异，读书数行俱下。年十五，父命之习商，颇以为苦，久之，逃归。树屏为言于父，令卒读。未两年，补县学生，旋以廩贡中式光绪己丑恩科举人。懽于制艺词赋、应试之文，无一不工，试辄冠其曹。所为诗古文，清微澹宕，修然意远。肄业江阴南菁书院，藉膏火自给。久益厌弃，去之鲁，学所谓刑名钱谷者，哑然曰：‘治事之术，乃如是乎？’不一年，更弃去。客河督许公幕，许调抚粤东，懽亦归里。旋以誊录议叙知县，需次河南。懽为人坦率简易，遇人无款曲，无矫饰，不习官场脂韦，以故在豫数年，无所遇。尤与藩司延祉不相得，假差往河北，最后至禹州办矿，禹州牧某复崎龇之。懽所如则阻，则亦安之，益致海上新译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诸书研读之以自励。甲辰九月，病歿于开封，年四十有四。懽形貌魁伟，学问杰出，在三刘中最不得志，以贫病客死他乡，人尤惜之。”^②

南菁同学赵椿年晚年回忆：“武进刘淮生翰，文章闳丽，益吾师有‘韩潮苏海’之褒，与兄葆真可毅、葆良树屏齐名，称‘三刘’，早卒。”^③刘翰似无文集存世，但他的一篇《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为韵）却不胫而走，竟远至浙江绍兴，成为鲁迅童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教材。^④该文是南菁书院的古学甄别试

①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案：刘翰为光绪十五年（1899）己丑恩科北榜举人，张《稿》误作“光绪癸巳恩科举人”，径改。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④ 事见鲁迅《朝花夕拾》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刘翰该文实收在王先谦所编《清嘉集》中，陈以鸿先生对此做过一番考证，并加以整理标点，见陈以鸿《〈清嘉集〉访求记——从鲁迅先生一篇文章谈起》，《江阴文史资料》第16辑，1995年10月。

卷,得超等第八名。真不知得超等前几名的,又是如何的文采斐然,惊艳绝伦。刘翰有《食哉解》、《寡兄寡妻解》、《其诸解》、《鞠躬解》、《韦元成论》、《蒋济论》、《九曲池泛舟赋》七篇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柳预生 (1862—1917),字立凡,丹徒县人。诸生。生而敏慧,承父学,通医术。治《尔雅》、《禹贡》、《春秋》,皆有成就。工书法,于唐贤名家,专心博览。著《京口柳氏宗谱》六卷。

钱承煦 (1854?—?),字叔懋,金匱县人。肄业书院时,有课艺《拔茅茹以其汇解》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

沙从心 (1850—1903),字循矩,一字晴举,江阴县人,南菁同学、翰林院编修章际治之姊丈。“幼时遭洪杨乱,曾充衣肆学徒,供洒扫职。已而弃商就儒,弱冠后即游于庠,食廩饩。”^①“肄业南菁书院。学使王先谦刊《续皇清经解》,校讎者多。”^②在书院“为训字斋斋长”,“凡诸同学寄卷寄题,悉一身任之。”^③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十四年戊子科举人。任礼延书院经董,继又兼南菁书院董事,“职整理沙田事,此坍彼涨,造圩筑堤,事尤繁曠,君擘画缜密,院产于以巩固。”故《江阴县续志》称其“性坚忍,任事、为文,一以切实,不尽其力不止。”惜所著遗稿零落,仅有《夏五服周九服异同考》、《孟子游齐梁先后考》、《释秀》、《释说文克字》、《二十四向原始》数篇书院课作,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孙泰圻 字询刍,无锡县人,光绪乙酉(1885)江南乡试中式第三十八名举人,^④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举人于光绪十六年拣选知县报捐同治衔,充会典馆汉誊录全书过半议叙”,“以知县分发各省试用二年,照例题补。”^⑤后分发两湖。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泰圻任湖南商务局总办,在湖北汉口创办福华(一说为福丰)烟草公司,并开办汉口初等商业小学堂。

唐浩镇 (1864—1921),字傅郑(一作郭郑),一字辅程,号养吾,无锡县人,唐锡晋之堂侄。“年十八,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廩饩,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⑥光绪十

① 唐文治:《江阴沙君循矩墓志铭》,《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

③ 唐文治:《江阴沙君循矩墓志铭》,《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以下引文出处同。

④ 孙泰圻之江南乡试试卷虽存,惜缺履历。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⑤ 网上资料:数位典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明清史料,《吏部为汉誊录注册事》。

⑥ 唐文治:《宗兄郭郑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以下引文出处同。案:《学友录》原在光绪十六年,据唐浩镇之光绪癸巳恩科乡试硃卷,受业师栏中有南菁书院院长张文虎,故可推断,唐早在光绪九年秋已入南菁书院肄业。

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举人。二十二年(1896)“丙申援例纳费为郎中,分工部。”三十年(1904)“甲辰考入商部,旋调邮传部借补员外郎,任邮政司司长。寻保实录馆撰著称旨,获赏御书福寿字、江绸袍褂,一时以为荣焉。”“幼承庭训,常以行善为志。”光绪年间,不辞劳苦,施赈于直隶、陕西等省。辛丑,提调京师五城施医局,“素通医理,遇重症,亲为切脉施药。”苏北灾荒,“冒雪走穷乡,夜露宿,当事者叹为艰苦卓绝,他人莫能及。”又施赈黑龙江,“隆冬冰雪,没踝凛凛,然堕指裂肤,交通梗塞,君勇往趋事,不避艰险。”丁巳,北数省大水灾,又施赈于静海、沧县等邑,归而告唐文治:

舟触翁仲,遇遇无捨,几瓦碎不得免,幸值他小舟登焉。又触大树癩,游鱼巢其上,风荡舟簸,遥闻于邑声,棹近,有老妪伏屋脊饮泣,手一绳,坚不能释,饮以米汤,稍能言,问其故,则曰:“吾持吾子吾妇尸也,若释手,则漂流去矣。”亟救之归。呜呼!天时人事之交迫,浸成巨灾,百姓惨苦之状,当道者乌能知之,即知之,又乌能走穷陬僻壤,出九死以拯之耶?

“言已,不觉泪交于睫也。”戊午,湖南兵灾,又冒炎暑施赈于长沙。“综君前后施赈计六次,凡五省,历数十州县,全活不下数十万人。”

辛亥革命后,因唐浩镇与总统黎元洪是儿女亲家,将大用,然唐“退然若不胜,仅相从于文字之役”。唐患中风,医治罔效,终于不起。友朋同志都感叹道:“惜哉,不复见善人矣。”

唐锡晋 (1847—1912),字桐卿,晚号潜叟,无锡县人。一生竭力从事于义赈事业。同治四年(1865)“乙丑入学为诸生,设帐授经二十余年。每至于孝弟忠爱之节,未尝不流涕,反复为弟子切言之也,学者皆为之感动”。^①十一年(1872)壬申恩贡。光绪十一年(1885)“戊子,选为安东教谕”。安东,今江苏涟水。“淮、徐、海水灾,饥民就食南下,安东适当其冲。”唐锡晋“罄所积俸钱以振,又牒大府,告亲友,集捐于苏、沪、常、镇间,得数万金”。亲自带领诸生,勘察灾区,分发赈灾物资,心力俱悴,“夜分须发半白”。山东有灾,唐集款自江苏购棉衣数万套,浮海往救,“破浪行二十余日,帆樯倾折,绝粒不兴”,灾区百姓得救。“庚子之变,京师骚动,乘舆西狩,关中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唐锡晋与同人集资四十万,冒雪入秦,勇进益勤。事讫还官,唐“以劾邑令贪残,坐落职”。后因“士民吁诉”,复官,改授长洲县教谕。此事

^① 徐世昌:《清故长洲县教谕唐君墓碑铭》,《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三,以下引文出处同。

原委，端方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上奏《开复被参教职折》叙述详细：

淮安府安东县教谕唐锡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内，……以不知检束奏参革职。该教谕去官之际，即据该县绅耆数十人以其在任十六年，于一切善举，如施药济贫、恤嫠育婴等事，皆竭力筹办；光绪二十二三年，安东大水，二十四五年，早稻歉收，该教谕均为倡捐募振，活人无算；平日秉性谨严，能得士心，并无劣迹等情，分赴督臣、学臣衙门禀诉。……该教谕系由上年禀揭前任安东县知县吴大照种种贪劣，经本任督臣魏光燾委员查访属实，将吴大照撤任奏参。当时复据吴大照以该教谕占住书院，不得士心为词，互相禀揭，是以一并参革。查该县教官本无衙署，借住书院已非一日，近因议将书院改作学堂，曾据该教谕禀经批准，暂留旁舍栖止，以待建屋迁移。是其居住书院，曾经禀明有案，与平空占据不同；若谓其不得士心，何以去官之日，士民纷纷为之禀剖。……是该教谕平日政声才具均有可观，一旦废弃，不特人才可惜，且亦无以服士民之心。……①

一无权无势的县学教谕，不惜同归于尽，竟将一“种种贪劣”的破家县令拉下马，其勇气实在可嘉。不过，唐锡晋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义赈事业。

马其昶赞扬唐锡晋“晨闻灾，暮电遐迩，不待顷而赈集。尝竭天下力以澹一隅，不假官吏，奔走急难，如赴私亲，号曰义赈，此古所未有也”。②《清史稿》记“锡晋治赈，自乙亥至辛亥，凡三十有七年，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以及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其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歿后，众思其德，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③民国八年，家乡无锡专祠建成。唐锡晋死后，先后为写祭文的有袁世凯等，送匾额和挽联的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④

徐乃桢（1860?—?），字衡三，号少瑜，太仓州人。光绪癸未(1883)岁试一等四名，古学闾属第一，补增生，调入南菁书院肄业，先后师从张文虎、黄以周。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太仓州学拔贡。⑤肄业南菁书院时，专治词章。

① 端方：《开复被参教职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四，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488—491页。
② 马其昶：《唐桐卿先生传》，王树枏：《故旧文存》卷三，《陶庐丛刻》本。
③ 《清史稿》卷452，列传239，《唐锡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案：《清史稿》称八省，而据马其昶《唐桐卿先生传》，“其振地为行省九，为府州县五十有六。”
④ 详见民国十二年刊行的《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
⑤ 徐乃桢之乙酉拔贡卷，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袁康 字竹一，宝山县人，监生。袁希涛、希洛之伯父。“幼禀颖异，博闻强识，淹贯经史，尤精小学，以诗古文辞鸣。为苏松太道应宝时所赏，牒送龙门书院肄业，^①先后拥皋比者多理学名儒。康辙造其堂奥，同学奉为都讲。中年后，常闭户著书，尝为《万国公报》编译泰西近事，世称善本。晚遭变政，一以扶植伦教为志。性本温夷，教授生徒无疾言遽色，老而益恬。卒年七十有五。著见《艺文》。”^②袁康曾游幕于外，光绪壬寅(1902)曾入广西学政吴敬修学幕，然因学政丁母忧，履任一月即归。^③

张树蓂 (1859—?)，字景尧，号茁喈，一号拙嘉，镇洋县人。“少聪敏，善词赋，踔厉风发，试辄冠其曹。”^④“为文浩博俊迈，有宽裕之致。说经能得纲领。”江苏学政黄体芳尤器重之，光绪壬午(1882)备取优贡生第一名。南菁书院建成，即檄调入院肄业。唐文治回忆：“方黄漱兰先生初建南菁书院，君及毕君(案：毕光祖)与余肄业其中，常共宿舍。君年较长，余最少，相与上下议论，不可一世，盖君之抱负非庸人所能知。”当光绪中叶，士务帖括，张虽喜文学，顾不屑谐于此，居恒研究时务，尝慨然大言：“捐纳行而天下无人才，掣签行而天下无吏治，此世之所以浑浊也。”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朝考入选，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湖广司行走。然而，张“与时不合，暇辄痛饮，竟以病酒卒于京师。”唐文治作挽联：“野鸟至，主人去，太傅何心，竟忍一朝委躯命；解嘲难，覆瓿易，子云复作，再成数卷畔牢愁。”唐文治解释下联出处：“君好谐谑，见余著述，笑曰：‘如予所作，正覆瓿耳。’”盖伤之至也。

张树蓂曾在苏州王颂蔚家做过西席，教过王颂蔚的儿子王季烈。^⑤张有《汉县道说》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张锡恭 见《名人传》。

张之纯 (1854—?)，字尔常，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恩贡，安徽候补直州判。^⑥张为人豁达大度，为童生作认保或派保时，不甚计较保银，故人多

① 袁于同治七年(1868)入龙门书院，与胡适之父胡传同学，问业于大儒刘熙载。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十三。

③ 殷葆诚：《追忆录》，《江阴名人年谱》中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④ 唐文治：《张君拙嘉传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王季烈之光緒三十年甲辰会试卷的“受业问业师”栏内称：“张茁喈夫子讳树蓂”，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据此，光绪甲辰(1904)，张已亡故。

⑥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三《选举志》。

“心重之”。^①民国初，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多种书籍。著有中学教科书《文字源流》、《文字源流参考书》（教员用），民国三年出版；《中国文学史》，民国四年出版。^②《评注诸子菁华录》，民国五至七年出版发行，书末介绍说：“本馆特聘江阴张之纯先生编辑是书，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之次序，共选十八家，就原书采尤选录，详悉评注，并细加圈点。读者得此可以参考，可以自修，诚文学家之宝筏也。”所谓十八家，是指《晏子春秋》、《荀子》、贾子《新语》、《春秋繁露》、扬子《法言》、《老子》、《文子》、《庄子》、《列子》、《鹖冠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孙子》，每篇有简注以明音义，有眉批以言文法，多出己意，不引前人评语。张又辑《江阴倭寇旧闻》，民国八年出版。

张之纯在南菁书院肄业多年，有《周子隐入吴寻二陆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又有《毋雷同解》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张之纯曾请老师黄以周为其父作《张君午亭家传》，黄后将此文收入《傲季文钞》卷六。

章际治（1855—1923），字琴若，江阴县人。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九年，入南菁书院，先后师从张文虎、黄以周，“元同先生素好朴学，尤器重君，延为斋长”。己丑（1899），考取内阁中书，留京供职。后馆于李经畬邸中，甲午后，随李赴上海。章早在南菁书院时，即“与金匱华君世芳交，故已邃于数学”，在上海“获交西士傅兰雅，商榷于格致书院，学乃大进。购置中西算书，悉心雠校，补缺正讹，听夕不倦，遂卓然成家焉”。^③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京师大学堂教习。“癸卯（1903），诏改书院为学校，邑人交推君为礼延（高等小学堂）校长。”丁未（1907），吏部侍郎、原江苏学政唐景崇（1903年至1906年在任）奏以君为南菁高等学堂监督。该年冬天，入都引见，授职翰林院编修。不久归乡，督理南菁校务。江阴诸绅以君望重，推为教育会会长。“先后为南菁校经画不遗余力，或因校产琐事，赴江北、川沙横沙，泛一叶扁舟于洪涛巨浪中，风雪飘摇，罔所顾怯。”因风疾辗转，逝世于癸亥七月。

章际治于算学，能“融贯中西，蔚然成一家言。所演细草，蝇头精楷，积数巨册，

① 殷葆诚：《追忆录》，己丑年（1889）记入学后认保、派保索银事。

② 该书关于戏曲，有这样的观点：“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不多久，便遭到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的批评，认为把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看作是因果的关系，全在缺乏历史观念。

③ 唐文治：《章君琴若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以下引文出处同。

其幼学不厌如此。”^①存《笔算数学》、《代数备旨详草》各二卷。著有《浮翠舫杂稿》二卷。同在南菁肄业的赵椿年，曾从章际治改八股文字，赵晚年回忆老师：“师后与余同取中书，同中戊戌进士，选庶吉士，不散馆，不出山，自讲帙以至易箠，始终在南菁，可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君子矣。”^②

章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解》、《读汤誓》、《洛邑成周王城考》、《书皇帝解》、《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解》、《礼不下庶人说》、《见君无不执笏其义何据》、《车上建旗说》、《释秀》、《郑康成不入儒林传说》、《地丁原始》、《蒋济论》、《吴都赋蕉葛升越解》十三篇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章钟亮（1845—？），字恂斋，号虞欽，晚号芦髯翁，江阴县人。章钟祜之堂兄。光绪九年入南菁书院肄业。^③二十年（1894）“甲午举人，候选教谕。伟躯干，性和平。与人交，以诚相接。昆弟五人，友爱倍挚。兄歿，抚孤成立。操守严，不苟取。喜吟咏，生平刻苦嗜学，领乡荐时，年已五十矣。课徒四十年，成就甚众。著有《纪元编》一卷，《墨稼庐文存》二卷，《宣哲集》十四卷，《墨稼庐诗草》五卷，《词存》一卷。至《墨痴倡和集》二卷，则与直判张之纯号痴山合两人所作而名也。”^④

章钟祜（1866—1937），字砚芳，号畊复，又号师涂，江阴县人。章钟祜、钟祥之弟。光绪九年入南菁书院，^⑤在院近二十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优贡，朝考二等，以教职用，署南汇县训导。^⑥不久，入黑龙江巡抚幕，司笺奏。民国初年，任掘港场场长。第一届保免县知事分发安徽，改分江西。荐任高审厅书记官长，三年考绩，以简任职存记。晚年悬壶京市。旋返里门，入邑人所创诗文社团——陶社，分任编校事宜。丁丑战事起，日寇侵邑之顾山（按：时章避难于顾山女婿家），殉焉。著有《师涂斋诗文集》，海内题者甚众。^⑦有《青龙江访萝月山房》诗刻入《南菁讲舍文集》，《拟庾子山春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卷六。

周维桢 字敬修，江阴县人。初入书院，便引导南菁同学松江闵萃祥等数人登

① 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甲子）》，《旧京文存》卷八。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③ 《学友录》在光绪十七年，然章钟亮之光绪甲午科乡试硃卷，有受知师：黄体芳，蒙取一等，兼取南菁肄业；王先谦，蒙取一等，兼取南菁住院，杨颐，蒙取南菁住院。受业师：南菁山长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据此推断，其应于九年秋即已入院肄业，但取得住院生资格，始于王先谦任内。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

⑤ 《学友录》在光绪十二年，然其光绪癸卯科优贡硃卷，南菁书院受业师中有张文虎，据改。

⑥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三《选举》。

⑦ 谢鼎镛：《陶社题名录》。

临长江南岸之鹅鼻小山，江阴名胜也。闵有诗记此事：“所欣得良伴，攀陟有同心。（同行者为华若溪、冯圣时、周敬修、王斗槎、雷谱桐。）”^①

周召齐（1850?—?），字肆南，号濂生。丹徒县人，镇江府学生，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江苏拔贡第一名，丙戌朝考二等第五名，候选直隶州州判，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中式第二十一名。^②宣统元年（1909），荐举孝廉方正。^③辑有《藤沙小志》。

光绪十年（1884）

案：以下题名，《学友录》大都置在十一年（1885）。

毕光祖（1864—1931），字振楣，号枕梅，太仓州人，毕沅之后。十五岁入太仓州学。“谭文艺，发语名隽，倾倒座人。才思横溢，遇经史要难，老师宿儒不能解者，君略省览，即了其义。”^④光绪甲申（1884）试于南菁书院，经学、古学皆第一，黄体芳高兴地说：“大江南北，涉猎之学，当以此生为最，太仓毕氏有传人矣。”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优贡。十四年（1888）戊子科顺天乡试举人。后游幕广东。张之洞督两湖，礼延入幕，颇倚重之，荐保知县。癸卯（1903），随张之洞入京，为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后佐施肇基办路政。辛亥后，绝意仕进，“方啜茗赋诗弈棋以自遣，一庐风雨，晏如也”。毕光祖“文高旷雅瞻，诗尤隽逸。顾著作零落，不自收拾”。有《汉书传儒林不传文苑说》、《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曹元忠 见《名人传》。^⑤

陶承潞（1853—1889），初名毓麟，字子绂，吴县人。同治辛未（1871）入县学。黄体芳创设南菁书院，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苏州府附郭三县，才三数人，而陶承潞据首。^⑥其南菁同学胡玉缙回忆书院应课事：“子绂亦熟友，凡院课时，检得各书，人问之，无不告，谓在乎运用。而于他人之自秘者，恒意轻之。此亦足觐其态度，尤足为徒事钞胥者警也。”^⑦陶于乙酉（1885）未得优贡，是其一大恨事，原委可见戴姜福

① 闵萃祥：《游鹅鼻觮》五律四首之三，最末两句。见闵萃祥《八指诗存》上卷。

② 周召齐之甲午乡试硃卷履历栏内，受业师有张文虎、黄以周。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

③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十一《选举志》。

④ 唐文治：《毕君枕梅传》，《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七。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学友录》在光绪十二年，据曹元弼所撰《曹元忠家传》，曹元忠十年即被黄体芳调取南菁书院。

⑥ 汪之昌：《陶承潞传略》，《青学斋集》卷三十一。汪是陶之母舅。

⑦ 胡玉缙写在汪之昌所作《陶承潞传略》后的案语。

(十七年在院)事略。陶有《南海解》、《陶侃讨苏峻论》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杨模 (1852—1915),字范甫,号蛰盒,无锡县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时称“无锡杨范甫模,治史学、词章”,为院中翘楚。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就职直隶州州判。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延杨模任汉文教习。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因黄仲弢推荐,延聘充任湖北自强学堂国文教习。二十年(1894)杨模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延充山西武备学堂监督兼总教习。二十四年(1898)创办无锡最早的私立学堂“埃实学堂”开学,实为中国新式私立学堂之始。杨模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东游日本,考察学务,阅半载归。并曾一充京师大学堂历史兼地理教习,后仍回籍专心综理学务。两江总督刘坤一,特转奏请旨嘉奖,奉旨颁给“乐育人才”匾额。三十年(1904)因办学经费与米商冲突,发生“毁学”事件,杨模住宅竟遭放火拆毁。后复应张之洞之邀,至湖北专办监督“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援例以内阁中书用。三十三年(1907)冬,改补入都,充学部总务司职。不久,复兼京师大学堂讲席,“昼课诸生,夕编讲义达旦,积时触发旧疾,遂于辛亥(1911年)请假归里”。民国四年卒。遗著有《蛰庵文存》上下两卷(其中所收《七洲洋赋》^①,艺林传诵。)、《埃实学堂创始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师范修身学小儿性质述》及《锡金学校重兴记事》等集行世。^②杨模有《七洲洋赋》、《公惭卿卿惭长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赵圣传 见《名人传》。

光绪十一年(1885)

案:原《学友录》自该年始见题名。

蔡承禧 泰兴县人。

曹元弼 见《名人传》。

曹辅臣 字凤冈,金坛县人,从汤之鼎学。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工诗赋,尤留新乡里文献,有《吉光片羽集》若干卷。

陈炳林 泰兴县人。

陈炳英 泰兴县人。

① 据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七洲洋赋》是光绪十年(1884)南菁书院古学甄别题,得第一名者为武进刘毓麟,然《南菁讲舍文集》未收刘作,所收者分别为杨模、李安所作的两篇。

② 杨恺龄:《杨氏三叶传记碑志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陈春魁 盐城县人。

陈国霖 字雨人，泰兴县人。廩贡生，安徽候补县丞。与南菁同窗顾锡中合著《国朝贡举年表》三卷。有《卯雏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陈堃吉 江阴县人。

陈 浏 (1863—1929)，字亮伯，号筠崑，又号寂园，晚号定山，江浦县人。“幼有异禀，读书颖悟绝伦，目十行并下。八岁就外傅，一日，诣读偶迟，师诃之曰‘傍午学生方入塾’，意欲属对以难之也，公应声曰‘向晨天子已临朝’，一座皆惊，由是有‘奇童子’之目。”^①年十四，补县学生。“庚辰岁试，以通《周官经》、《左氏传》，为学使黄体芳所识拔，遂食廩饩。”旋肄业南菁书院，同学有“惊才绝艳”之誉。^②

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朝考第一，用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深得尚书薛允升器重，“出所著《唐律》全文属其校勘”。后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仍秉刑部浙江司主稿。陈入译署，黄体芳出了大力：“初，瑞安黄公以文章气节名天下，公出门下，服膺其绪论，益自矫厉。瑞安亦深奖植公。”“瑞安生平高伉自异，从不低首权门为人游说，独以公为材可任外国事，至乘笨薄车周游诸贵人，为之延誉。于是公名列置第三。”

庚子(1900)后，改官外务部郎中，掌榷算司印。戊申(1906)四月，以京察一等，外简福建盐法道。莅闽三载，岁课倍增。主度支者“方肆诛求，四方馈遗不绝于道。公自持无私财，丝毫无所与。又盛气凌之，见于案牍。竟不安于位，投劾去官”，“然弹劾者亦谓嵯课为天下最”。

民国三年(1914)，梁敦彦管交通部，延掌秘笈，兼权电政司长。六年(1917)，入广东巡按使朱庆澜幕府年余。旋应国史纂修之聘，居京师数年。庚申(1920)冬，黑龙江省长官朱庆澜再招至游，寓居哈尔滨、吉林多年。

陈浏“貌魁梧，广颡虬髯，与人大睨高谈，声若洪钟，豪迈不可一世。有所不快，必使气凌其上，不为势位屈。而爱才服善，出于至诚，虽寒峻常折节下之。故能得于君子，而难于小人”。但他与丹徒刘鹗(著《老残游记》者)的一段过节，明显曲在陈浏，令人遗憾。友人钟广生叙及此事：“光绪季年，津镇铁路议起，丹徒刘君铁云

① 钟广生：《清授资政大夫福建盐法道陈公行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同此。案：钟作《行状》，据邓之诚所代撰《哀启》为蓝本。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逆策地形必改道津浦，乃醖资买入洲地数万顷以待之，已而亿中。公怒其罔市利，执持短长甚力，刘坐此得罪，地多没人官。”钟又评说此事：“平心而论，刘之亿中，若六博然，欧美谓之投机，非必谓罪，所谓匹夫怀璧者也。”至晚年，钟还曾与陈辩说此事：“余尝与纵论前事，惜其为计之疏，而又怪其快意当前，坐致颠困而不悔也。岂非天哉！”

陈浏在京分纂清史时，与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邓之诚过从甚密，收邓之子为义子。邓之诚称：“先生工诗文，豪于饮，弄藏匱瓷甚富，著书曰《匱雅》，重译遍于海国。而之诚与有同嗜，暇日同过海王村，评泊制作真贋，相与上下其议论，酒酣以往，旁若无人。”^①

陈汝恭 字子寿，句容县人，名儒陈立子。幼承家学，笃实勤劬，博综群书。在南菁书院时，院长黄以周深器之。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句容陈子寿汝恭，名父（卓人先生，著《公羊义疏》）之子，亦治朴学。（携其弟子田自耘其田来，甫过十岁，见余等皆歉称先生，而目光炯炯，若俯视一切者。后与刘申叔师培同治汉学，文亦法汉魏，惜不永年也。）”曾从事淮南书局，与独山莫绳孙、黟县汪宗沂最契合。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岁贡。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宁设立江楚书局，缪荃孙任总纂，陈汝恭等为分纂。署兴化训导、甘泉训导。^②卒于扬州。著述宏富，惜皆未付梓。有《蜀志首二牧说》、《赋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程源清 泰兴县人。

崔朝庆（1860—1943），字聘臣，通州静海乡人。十五岁入学，从通州人顾韵芳、马勿庵学习词章和数学。二十六岁入南菁书院肄业。^③院长黄以周认为崔之算学可与华世芳相比。^④有算学课作两篇刻入《南菁讲舍文集》，有《读四元玉鉴记》一卷刻入溥良主编的《南菁札记》。后在京师任国子监算学助教，教过光绪皇帝数学。崔曾入同文书院学习，通晓日语。

光绪二十八年，出任江宁高等学堂算学教习。时国子监催令到署补缺，两江总督刘坤一特为附片上奏，称崔已启程赴京，“嗣因行抵江宁省城，留充省学教习，未能北上”，“臣查算学一门最为切用，现当造就师范，教课需人。合无仰恳天恩，俯念

① 邓之诚：《陈母侯寂园太夫人六十双寿文》，《陈浏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续纂句容县志》卷七中《科贡表》。

③ 《南通市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0 年版。又据民国《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马毓璠传》附崔朝庆：“静海崔朝庆年十三四，举秀才，喜算数，亦从毓璠游，其后朝庆所业，遂复绝于时。”

④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南通崔聘臣朝庆，通算学，元同师以为华若溪之亚，今无知之者矣。”

学务紧要，崔朝庆准其暂留差遣，出自逾格恩施。除分咨查照外，谨会同江苏巡抚臣恩寿附片陈请，伏祈圣鉴训示”云云，硃批：“着照所请。”^①崔在江南高等学堂执教四年，崔自称：“宁垣钟山江舍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吾师缪艺风先生总持教务，朝庆与东台杨冷仙、丹徒支树屏、靖江范简甫同掌数学一科。自癸至丙，计已四历寒暑。”^②

光绪二十九年(1903)溥良以崔朝庆精通畴人术，保奏经济特科。后崔朝庆执教于各地学校，并创办数学社团和数学杂志，对近代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崔朝庆还参与商务印书馆《数学辞典》的编辑。崔一生著述颇丰，有《数学智珠》、《读代数术记》等，并有数学译著多种传世。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二(1933)年还出版了他编纂的《中国人之宇宙观》。

崔朝庆重师门，念情谊，他不愿北上京师国子监补缺，而宁肯留在江南高等学堂讲学，恐亦与其南菁老师缪荃孙担任该学堂总教习有关。而他于光绪三十年与南菁同门顾鸿闾合词呈请黄以周编入国史儒林传，更是古谊可风，令人感佩。然而，崔朝庆持身严正，当光绪甲午、乙未间，因溥良保荐，进京应试，总署堂官张荫桓听说崔朝庆算学“造诣精深”，“遣人示意，欲罗而致之门下，崔大忿曰：‘何物伧荒，乃欲我师事之耶！’张怒，遂黜之。”^③

范循让 靖江县人。疑即为崔朝庆所称与崔、杨同执教算学于江南高等学堂之“靖江范简甫”者。

方怡 字子顺，阳湖县人。“幼失父母，无遗产，随兄游学。兄卒，益肆力于学，攻考据、掌故、诗古文辞，与举子业并进，有心得，穷究世界政治、艺术以自辅，尤潜研推算。”^④光绪九年(1883)入学成诸生。南菁同窗赵椿年说他“博学工文，有干济才”。^⑤十七年(1891)举优贡，应廷试，列一等，用知县，分发广东。初客粤东，不甚得意，有诗句云：“羞争鸡鹜餐余粒，愿视牛羊后者鞭。”^⑥后官广东秀水，两广总督陶模很器重他，招入幕，主奏疏。曾代陶模草奏“请裁内监，以祛千数百年积弊”，

① 网上资料：数位典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明清史料，“刘坤一片”，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奏。

② 江南高等学堂《数学课艺》，崔朝庆所作序言。学堂刊刻本。

③ 易宗夔：《新世说·忿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

④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

⑤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⑥ 孙雄：《庄思缄同岁蕴宽属题秋窗述旧图》，《旧京诗存》卷四。孙说：“子顺太守怡，与余癸巳同年，又为南菁书院同学，忻合无间。”方怡为光绪十九年癸巳副贡，故孙称“同年”。

事虽格不行，“而传草海内，一时雒诵，想望风采，其文，怡笔也。”^①方怡督粮广州，断绝苞苴。不久复治盐政，晋升知府。又“提调学务，并筹办一省警察。广州学校增进，窃盗寝息，皆怡手定条章”。后任总督岑春煊调使方怡总理军事学校，军校离开广州较远，方怡仆仆往来，大热天“督操于野，被雨，衣尽濡，左右劝罢，不从。不十日，而病不起”。光绪癸卯(1903)，南菁同学吴稚晖因“苏报案”遭缉逃亡英伦，途经香港，方怡赠银二百。方怡著有《韩庐文钞》。

顾安泰 如皋县人。

顾宝畴 字伦叙，江阴县人。“弱冠补诸生。事父母婉曲承顺，为母澣中裙，涤厕踰，无难色。庚申之乱，出入锋刃，屡濒于死，卒全节以归。综理义塾宾兴，节浮费，绝请托，里中寒峻咸受其惠。遇忠孝节义诸事，悉发之于诗。为学务求实际。学使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甄录通省经学，仅得优等者五，宝畴与焉。著有《秋园文集》一卷，《诗集》五卷。”^②有《春秋宫词》五首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顾书城 字芝田，一字紫田，江阴县人。廪贡生。品端学邃。解经有依据，论史有特识，并擅长古文词。游庠后，屡蹶场屋。长沙王先谦督学江苏，应试，以经义作制艺，始获见赏，列第一，食饩。常、昭两邑世族争延课子弟，师严道尊，故其名尤播于虞山琴水间。^③南菁同学赵椿年之塾师。^④遗有《抱璞斋经说》、《史论》、《诗文杂著》若干卷。

顾锡祥 (1850—?)，字仁卿，如皋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又兼西席多年。博学多才，尤擅诗学，有《移园诗说》传世，著《说易》多卷，缺资未及付印。有《贲无色也解》、《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章讲义》、《管夷吾平戎于王论》、《周孝侯论》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顾执中 扬州府学诸生。与南菁同窗陈国霖合著《国朝贡举年表》三卷。

韩泰东 泰兴县人。

蒋激 字月坡，通州人。

金谷元 字莲溪，盐城县人。读书善求间。自入学成诸生，应学政经古试，十

①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以下引文同。

②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

③ 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时，还提起顾书城：“常熟因杨思赞姑丈同福之招(姑丈为咏春祖姑丈沂孙之子，安徽贵池知县告病归)，令余与辛孟表弟同学，延江阴经师顾先生书城(忘其字，讲李申耆先生学派者)，授辛孟读。”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④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儒林》。

一次均第一。黄体芳“督学至淮安，每经一题，以试多士。莲溪作十三解而出。”黄以周在南菁“叹为奇才”。^①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官正蓝旗教习。^②后外放四川昭化知县。归里后，创办莲溪小学。民国二年(1913)，金谷元等创立孔教会，并捐资修大成殿及文峰阁。^③金著有《求知斋经解》，光绪十一年南菁书院刻本；《说文读曰例》一卷。另有《申说文龙战于野义》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李安 (1858—1909)，后名审之，字少伯，又字榭庵，号磐硕，通州静海乡人。举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十五年(1889)己丑科顺天乡试举人，十六年(1890)庚寅科进士。“官户部陕西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更外交部主事，充储材馆提调，稍稍见知于王公贵人，然卒不获显。”^④后李安与张謇等在吕四、静海间从事垦牧，颇有收益。庚子年，以乱请假返乡。接连遭逢父母之丧，从此不再出仕。“及光绪三十一二年，县众推审之与謇等更长教育，启盲辟塞，致其勤恳，吕四诸校及农商诸会无虑皆审之所手定也。”所著有《草堂诗》四卷，《养真草》、《咏史五排》、《南游草》各一卷。在书院肄业时，有《辨同裳色说》、《七洲洋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李逢辰 泰兴县人。有《二十四向原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李经莹 元和县人。

李以炳 (1853—1930)，字虎臣，镇洋县人。少时孤贫，资禀颖异。初习商，年二十九入庠。精通水利、经史，资历、学识俱优，曾被南通张謇聘为西席，课读其子侄。先后任南通师范、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等校教授。助办湖北堤工，治水赈灾。在湖北学堂任教四五载。生平著作颇多，惜未付印。^⑤

李兆庆 字吉甫^⑥，号善馀，丹阳县人。光绪乙酉(1885年)优贡，署山西高平、榆次知县，升用同知直隶州。^⑦李兆庆虽僻宦山西，却很关心时务，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曾在山西储才馆写信汪康年，称阅读《时务报》后，“顿使山陬僻壤耳目一新”，又称“仆本南人，屡游沪上，通观中外大局，凡心所欲言而格格未吐者，读大报而实获我心矣”。还“拟《敌情》一首”，投稿《时务报》，希望用手中之笔“以写

① 黄以周：《与金莲溪书》，《傲季文钞》卷三。

② 光绪《盐城县志》卷九《选举》。

③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三《民俗》。

④ 民国《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琅村：《张謇致李虎臣函笺释》，南通博物苑网，<http://www.ntmuseum.com/shownews.asp?id=838>。

⑥ 吉甫《南菁学友录》作“吉人”。

⑦ 《丹阳县续志》卷十三《仕进》。案：《续志》称李字吉甫，《南菁学友录》则作“吉人”。

胸中抑郁之气”。^①

李钟珏（1854—1927），初名安曾，字平书，一字君玉，号瑟斋，又号且顽。原籍苏州，生于宝山，上海县学廪生。李平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入龙门书院肄业，师从著名学者刘熙载。其间，受蔡尔康之聘，襄助《字林沪报》笔政，撰写时论。光绪十年（1884）应学使观风试，受黄体芳赏识。入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经学大师黄以周。^②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优贡，明年朝考一等，以知县用。应友人邀，十二月至广州，十三年（1887）赴香港、澳门及西贡、新加坡等地考察政治经济，成《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后被元和江标刻入《灵鹫阁丛书》。光绪十五年（1899），入都应北榜乡试，受报子骗，谎言中六十三名举人，实仍未中，李平书自嘲云：“余六下南闱，两下北闱，得此半日之举子，于愿已矣。”^③乃循例报部掣签，签分广东。开始了十年广东官场生涯。

李平书在广东臬署当差三年，至二十年（1894），始得署陆丰知县。二十五年（1899），署遂溪知县，却因广州湾事件被革职，反因此声名大振，被张之洞招致幕中，李自叙：“南皮之招余，不在笔札，尝语人：‘李某乃办事才。’又云：‘国家即不畀以官，亦当养之终身。此余入幕之原因也。’”二十七年（1901），任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提调。在督幕闲暇时，圈点《灵枢》、《素问》医书，成《读素随笔》两卷。

二十九年（1903）返上海，出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三十年，与陈莲舫创办医学会，欲治中医西医于一炉。三十三年（1907）李平书担任上海商团公会会长，首倡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清末上海，李平书办事之多，影响之大，士绅中无出其右。

辛亥革命时，立宪派的李平书，力主“不能守闭关主义”，与革命派联合。上海光复，李平书居功厥伟。民国肇建，李担任上海军政府民政长及江苏省民政总长。谢事后，遇民国二年“护法之役”事，李避难日本。李自述：“癸丑一役，保卫闾阎，嫌疑蒙难，据东三载，始返故邦。”后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在昆山创办蚕桑学校，后逝世于昆山。

李平书操守清厉，道德高尚，一生由其手经过的银钱不知凡几，然到晚年自刊

① 李兆庆致汪康年信：“兹于理牍余闲，拟《敌情》一首，上尘藻鉴。”后又写信说：“前寄芜函并附拙稿，谅登青睐。兹拟《约章》一首，再寄贵馆，……观近来新译之书，不觉借管城子以写胸中抑郁之气，工拙非所计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7页。

② 李钟珏之乙酉优贡殊卷，肄业师中有黄以周。然《且顽七十岁自叙》未提入南菁书院事，大概李平书非南菁住院生，仅应课而已。

③ 李平书：《且顽七十岁自叙》，《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以下引文出处同。

《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时，却囊中羞涩，全靠友朋资助。

著有《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上海自治志》等。李平书逝世后，上海地方人士为他铸一铜像。多年后，黄炎培撰书题记：“先生名钟珏，字平书，上海人，公元一八五三年生。肄业龙门书院，达识勤事。清末，历主粤东县政，廉干善教。尝主遂溪，练民团抗法兵入犯，因以褫职，然卒使遂溪、吴川勿为旅顺、大连、威海卫续。归办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首创，兴利扶弊，规模弘远。辛亥，上海响应，以其智且勇，指挥赞助，迅奏厥功，奠定东南大局，保全无数民命与物力。一九二七年歿，公谥‘通敏’，范像永念。中华民国纪元三十五年八月。”^①该铜像毁于文革。

凌绍濂 字心莲，太仓州人。

刘奉璋（1854—？），字志宜，号我山，宝应县人。刘出身于经学世家，曾祖父刘台拱，丹徒县学训导，乾嘉年间著名学者，世所称端临先生者也。其父刘书云，咸丰六年进士，改内阁中书。刘奉璋在南菁书院时经学、词章兼治。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十四年（1888）戊子江南乡试中式，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户部主事，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改外务部榷算司郎中，三品衔记名海关道。^②刘奉璋学有本源，深得当时著名学者沈曾植的赞赏。当盛宣怀要请人为他编纂《中庸衍义》以备进呈时，沈曾植向他推荐了刘奉璋，称“刘峨山以经义润色时务，文章渊雅，纂集尤其所长。公欲编《中庸衍义》，若付此君，必可速成巨制”。^③数月后，又致信盛宣怀，称刘为“骏足”：“刘峨山农部昨自江宁来恭贺宫保之喜。其书已纂成二卷，纯正该博，真得进呈体裁。此君长于经学，又长文牍，罗织左右，胜植十倍，公亦有意乎？此真骏足，非骏骨矣。”^④刘著有《学庸正义》，大概就是此时撰成的。刘奉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返南菁，不过，此时他的身份已是南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了。刘任总教习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可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刘宗淇 清河县人。

卢求古 字羲侣，号介臣，泰州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举优贡，朝考一等，以知县签分甘肃，历补隆德、宁夏、皋兰等县知县。初署高台知县，开濬黑水河，农田资灌溉，得沃壤数千顷，期满，士绅坚请留一岁，上官破格允之。隆德僻处万山

^① “光复上海有功的李平书”，《郑逸梅选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5页。

^② 《宝应县志》卷七《科贡表》。

^③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与盛宣怀书。

^④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八日，与盛宣怀书。

中，士习孤陋，有书院，无名师，求古莅任，身任教授，与诸生讲论，捐廉购书籍，皮藏讲舍，阅三年，学使者叶昌炽典试陇东，称隆邑生童文艺为陇东五邑冠。在甘省垂二十年，平冤狱，靖伏莽，政绩大著，累经大吏奏系以道员升用。辛亥光复，以病乞归，杜门不出。^①有《释涪涪》、《李郭同舟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马为瑄 盐城县人，岁贡生，苏州训导。^②

潘彭龄 丹徒县人。

戚金奎 (1860—?)，字吟仙，号星湖，泰州人(原籍丹徒)，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

钱基森 字子立，金匱县人。

钱荣国 字缙甫，江阴县人。岁贡生，权苏州府学教授。幼读能通经义，长并通《灵》、《素》诸书。肄业南菁书院，益从事著述，著有《诗书易三经讲义》、《礼记丧服传今释》、《诗经白话解》、《论孟通俗解》、《伤寒论汇解》、《春雨堂诗钞》若干卷。^③有《申诗谱天子诸侯燕群臣皆歌鹿鸣合乡乐义》、《自卿以下外朝内朝考》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沈文瀚 字海秋，泰兴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1894)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曾应沙元炳之邀，主纂民国《如皋县志》，未成而去世。有《问谷对冰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孙锦标 (1856—1927)，字伯龙，号慕庐，通州人。廪贡生，曾任常熟县学训导。近代语言学家，著有《南通乡音字汇》、《南通方言疏证》、《通俗常言疏证》、《自怡轩杂著》等。据朱东润回忆，他在1919年至1927年间任教于南通中学和南通师范学校时，与孙伯龙同事，“南通文教界也有一些罕见人物。中学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孙伯龙，年龄六十出外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深刻的造诣，所著《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确实有本有源，不同凡俗。但在教学方面问题不少。一次作文课上，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犁星没水生骨说’，学生实在做不下去，班长请求在课后写作，由教务室代收。过了几天，孙先生又来了，教务主任搭讪着说：‘老先生出的题目太难了，学生做不出。’好在孙先生很圆通，这一次就大家不追究了”。^④

① 民国《泰县志》卷二十七。

② 陈玉树：《后乐堂文钞》卷九《马君衣庭墓志铭》。

③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文苑》。

④ 《朱东润自传》。

孙廉清 字冀良，通州人。

唐文治 见《名人传》。

汪凤瀛 见《名人传》。

汪开祉 (1866—?)，字鹤龄(一作鹤龄)，号燕公，新阳县人，久居苏州，汪之昌子。南菁书院肄业时，有《皆踞转而鼓琴解》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曾以候补知府分发直隶。《县志·选举表》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举人”下称：“汪开祉，鹤龄，新阳，通州学正，直隶候补知府，长芦运司运同。”^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任天津府官立中学堂会办。一年后，直隶总督袁世凯附片上奏朝廷，称汪开祉“品端学粹，练达老成”，“堪以留省补用”。^②

王虎卿 字召穆，高邮县人，王念孙后裔。少承家学，制艺诗赋独出冠时。食饩后，十列优等。肄业南菁时，有《释入门揖人揖先入》刻入《南菁讲舍文集》。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称“高邮王绍穆虎卿，英思壮采。”^③光绪乙酉(1885年)拔贡，朝考，钦用知县。宦游蜀省，见重于廉访游公，屡委查办重狱，颇得情实。后署江安县，立义学，实仓廩，修城垣，建炮台，砌火药库，创团练，得精锐数百人，以防奸宄。次年，邻县土匪窃发，即借其团兵定之，而江邑晏然。旋以与地方权要齟齬，镌官去。^④既归，课耕教子，杜门谢客，有所感，辄托于文词以见志。年七十一卒。著有《逸园杂著》，待梓。^⑤

王 尤 (1850—1892)，字西农，号云梅，亦号小亭，通州人。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十二年(1886)丙戌科连捷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1892)赴京应翰林院散馆考试，途中，病逝于天津。由同乡友人范当世等经纪其丧，归柩故乡。^⑥有《先进野人后进君子解》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王志铭 江阴县人。

① 民国李传元主纂：《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九《选举表》。

②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二日，袁世凯片奏：“兹查有候补知府汪开祉……，到省一年期满，例应甄别。……臣查该员汪开祉品端学粹，练达老成，……堪以留省补用，俟有应补缺出，照例序补除。”数位典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明清内阁档案。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三百八十三，“光绪二十二年，革四川署江安县知县王虎卿、署盐源县知县吴以诗职。”则王虎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5)便革职返乡了。

⑤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四《文苑》。

⑥ 范当时《范伯子诗文集》附录二《年谱简编》：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二月，友王尤(云梅)以庶常应散馆试，由南通经沪来津，二十九日病卒。先生与同乡戴祥元合力纪其丧事，并归其柩。

吴肇嘉 字仲懿，如皋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窗，称“如皋吴仲懿肇嘉，熟精选理。”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上编纂《清嘉集》，收录《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两篇，一篇为刘翰所作，另一篇即为吴肇嘉所作，评语为：“奇情郁古，壮采铄金。”吴为范当世之内兄，吴逝世后，范作挽联：“人尽嗟其才，类我类我；天遽夺之命，丧予丧予。”有《食哉解》、《申说文龙战于野义》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邢世章 字信孚，江阴县人。

徐敦穆 太仓州人，光绪七年辛巳(1881)恩贡生。^①著《宝笏堂诗集》二卷。徐敦穆可能做过太仓同乡河北深州知州钱溯耆的幕友。^②清末，主要由太仓等江南文人在京师成立的诗社“南园赓社”，徐敦穆、钱溯耆都在内。民国年间，与纂《(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

徐麟翔 字石生，通州人。

薛嘉楹 江阴县人。

杨世沅 (1852—?)，字芷湘，号蘅皋，句容县人。在南菁肄业时，有《二十四气原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沛县教谕。^③著有《句容金石记》，收入他协纂的《续纂句容县志》。

姚彭年 (?—1892)，字寿侯，号小宾，如皋县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窗，称“如皋姚小宾彭年，诗文皆极艳丽”。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明年(壬辰)赴京，春闱不第，便留在京师，以待下次会试。邀入武进费念慈(己丑翰林)家中课读其子，西席东家，很是融洽。不料主宾相处未久，姚竟病歿于费家。^④消息传至家乡，其“未及文定”之未婚妻，“遂以守贞终其身”。^⑤姚有《释说文克字》、《读蔡邕

① 《太仓州志》卷十《选举》。

② 据《光明日报》2004年6月28日，《深州市出土清代“义仓图记”碑》一文报道，义仓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落成。所立碑文由太仓名士徐敦穆所作，隶文镌刻。时深州知州为钱溯耆。

③ 民国《续纂句容县志》卷七《科贡表》。

④ 《清神类钞》“迷信类二”之“姚寿侯梦自墙隙出”：“如皋姚彭年，字寿侯。性好洁，斋舍无纤尘。光绪辛卯，举于乡。壬辰春闱不第，留京待再试，为武进费念慈太史课子，主宾甚相得。一夕，忽自梦身衣礼服，从费宅旁舍之墙隙，步行而出，醒而告人。未几，瘵小疾，遽不起，人始悟其将死也。盖俗例人死，非本宅之家属，其出殡，不得以枢自正门行，必坏墙而出之也。”

⑤ 《清神类钞》“贞烈类一”，“姚小宾未婚妇守贞”：“如皋姚小宾孝廉彭年方悼亡，而捷于乡，有为媒介同邑某氏女为继室者。议成矣，未及文定而北行。光绪壬辰卒于京，某日成殓，其家中方为之纳采。是夕，女梦一美丈夫三揖之，谆囑珍重，且曰：‘今误卿终身矣。勿过悲，当俟之再世耳。’言既而杳。未一句，讣至，女感其诚，遂以守贞终其身。”

惊枕铭》、《拟唐王子安慈竹赋》、《宣房塞兮万福来赋》、《拟郭景纯游仙诗》、《寒柳》、《蟹簪》、《拟王渔洋三国小乐府》刻入《南菁讲舍文集》；有《舜驾五龙以腾唐衢赋》、《谏苑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姚启寅 如皋县人。

姚锡光 (1856—1921?)，字石泉，一作石荃，丹徒县人。在南菁时，“讲求经世之学，文亦隽杰廉悍”。^①王伯恭回忆：“姚石泉同年锡光，丹徒名士也，尝问余小时读何书开蒙，余答以《四书》、《五经》外，以朱子《小学》为主。姚曰：‘败矣，此等书寓目如油入面，终身摆脱不去，充极其量，亦仅成一乡党自好之士耳，于国于家皆无补也。’”^②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官内阁中书。游历日本。充天津武备学堂教习兼监督，后北洋大僚均出其门。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湖北陆军学堂监督。姚后任安徽石埭、怀宁县知县，和州知州，累保道员。^③清末历任陆军部左丞、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初年，任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兼署总裁，后调口北宣抚使，参政院参政。著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各国兵制考》、《筹蒙刍议》等。其中尤以《东方兵事纪略》最为后人称道，“窃谓言中日战事者，实以此书为最佳，叙事固翔实，文笔亦雅洁，迥非他书所可比拟。”^④

殷俊 泰兴县人。

查兰 常州府学。

张盛传 靖江县人。

赵椿年 见《名人传》。

周熙元 字吉吾，江阴县人。

朱绿藻 江阴县人。

朱铭孟 (1862—?)，字重雅，泰兴县人，廪膳生，候选训导。朱铭盘之弟，行二，小铭盘十一岁。曾入湖南学政陆宝忠幕。光绪十六年(1890)，与兄朱铭盘同客金州张光前军幕。^⑤

朱尔楷 江阴县人。

朱维城 靖江县人。

① 赵椿年：《覃研室师友小记》。

② 王伯恭：《螭庐随笔》，“姚石泉同年”，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3页。

③ 张一麀：《心太平室集》卷二《姚石荃皖中公牍跋》称：“公尝为令皖中，廿七月三易其地，所至有能名。”

④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论中日战事纪载各书”，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94—1095页。

⑤ 朱铭盘：《桂之华轩遗集》，附其外甥郑肇经权伯所作《纪年录》。

朱映奎 字星仲，镇洋县人。南菁求学时，同学谢钟英，名钟英，字亦钟英。朱映奎与他开玩笑，问道：“君以名为字，后代子孙宜如何讳？”^①

朱祖荣

邹之幹 如皋县人。

左溥 淮安府学。

光绪十二年(1886)

蔡宝廉 (1861—1945)，字竹泉，号彦水，泰兴县人。光绪五年(1879)入学，后在家乡设塾课徒。光绪三十年(1904)廪贡生就职训导，改捐兵马司副指挥，后以知县签分安徽补用。民国，赴山西省任省会警察厅总务科科长，旋改任警正，委充省长公署秘书，委署潞城县知事，裁革地方杂捐苛税。致仕返乡后，曾任本邑县商会主席。晚年从事慈善事业。

陈铭撰 靖江县人。

陈庆年 见《名人传》。

陈维骥 泰兴县人。

陈玉树 见《名人传》。

丁国钧 见《名人传》。

范 铠 (1869—?)字秋门(一作胄门)，号酉君，通州人。赵椿年说：“南通范秋门铠，治词章，为肯堂当世、仲林钟之弟，亦三范齐名。”范铠曾入湘抚陈宝箴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以知县分发山东。辛亥革命后，弃官返里。范铠自称：“宣统三年，革命军之起，余方任濮州，而河决南岸民堰，盗贼所在为大群，焚掠自恣。”“而省帅方苦多事，尤无能顾卫及濮。至民国元年六月，即上书乞退，及十月，遂弃官而归。”^②范铠归里后，于民国三年纂成《(民国)南通县图志前纂》。“秋门善古文，工书，学张濂亭极得神似。”^③

房 镛 泰兴县人。

钱筮离 (?—1890)，字仲常，江阴县人，喜九流杂说，南菁书院肄业时与吴稚

① 唐文治：《谢君钟英家传》(辛巳)，《茹经堂文集四编》卷七。

② 范铠：《(民国)南通县志前纂续传》。

③ 沈云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下卷《通州三生——朱铭盘、张骞、范当世》，第6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张濂亭，张裕钊也，通州三范之授业师。

晖友善，曾为吴算过命，吴一直珍藏钱为他和妻子所写的命书，“因推此者为光绪己丑同住南菁书院之钱公仲常手迹难得，故存之也”。^①

沙毓瑾 江阴县人。有《问汉藏图籍秘书有几处》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金文樑 (1852—?)，字养和，号企桥，别号倚雪，元和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乡试举人。有《读陈氏毛诗传疏》刻入《南菁讲舍文集》。著有《蝴蝶诗三百首》。据说尚著有《周易郑注辑》、《尚书郑注辑》、《诗经丛说》、《读史杂录》、《倚雪庐诗抄》、《抗虹轩词抄》、《一切经音义引书目》。^②

六祖浚 字凤明，江阴县人。

潘诵威 字笏潭，元和县人。在书院治词章。

邵元晋 字康侯，号文卿，常熟县人。在院时，曾参与校勘《皇清经解续编》。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贡。^③

申濩元 (1857—?)，字商音，号辛簋，又号稊巢，元和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④官福建罗源知县。有《读毛诗日记》收入《学古堂日记》。

沈凤翔 江阴县人。

盛如林 字寿山，盐城县人，通经韵之学，著有《音韵辩证》等书。居大冈镇，负德望。民国后卒。^⑤其南菁同窗好友曹元忠回忆：“时同门友治经之外，有通州(案：应是盐城。)盛寿山治音韵，静海崔聘臣治算术，武进谢钟英治舆地，其后各自名家。”^⑥光绪三十年(1904)，盛如林还与留日学生郁馨山在家乡发起办学，创建了大冈进化高等小学。

孙同康 (1866—1935)，字师郑，号君培，后改名雄^⑦，昭文县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昭文孙师郑同康(后改名雄)，治经学、词章。初到院时，即见有注

① 吴稚晖：《命书批注》，《全集》卷十六《杂著》，“余不喜九流杂说，此命书两张，余与内人之命书也。胡以存之？因推此者为光绪己丑同住南菁书院之钱公仲常手迹难得，故存之也。钱名筮离，江阴人，长余二十余岁，庚寅春物故。丁酉四月重检。此两纸系己丑年所写(其时美尚未生)，去今五十九年，存此，时在丁酉四月，亦已五十一年。今黏出，则为丁亥四月五日清明。钱先生庚寅以肺病物故，不及见余辛卯乡举。”第303页。

② 此据金文樑之光绪己丑恩科乡试试卷所引，实际成书与否，不可考。

③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七《选举志》。

④ 申濩元之光绪辛卯科乡试卷。《学友录》称籍贯吴县。

⑤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人物》，第453页。《学友录》称籍贯东台。其南菁同学曹元忠则称其为通州人，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二，第471页。

⑥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二，第471页。

⑦ 孙本名同康，康即东汉大儒郑康成(玄)，后因恐人疑其希康有为，故改名雄。

《论语》一书，后不复见，盖削稿矣。^①其后著作甚多，诗文尤胜。与蔚芝及余均为同谱。”

后“游京师，客其乡人尚书翁同龢所，与会稽李慈铭莼客相过从。”李慈铭对孙之骈文很赏识，称“此经生之文，异乎瑰词也。”为加点定，辑成《师郑堂骈体文存》上下两卷，共十七篇。又因翁同龢的介绍，随李文田侍郎按试承德府，读李著《元秘史注》后，写了一篇《读〈元秘史注〉书后》，深惬李心。李叹曰：“拙著《元秘史注》本极猥鄙，然经通人一览，抉摘无遗，惟博文彊记于平时，故能提要勾玄于一日。”^②

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顺天乡试中式第二名，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会试中式，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吏部文选司主事。张之洞管京师大学堂，奏派为文科大学监督。孙雄又“辑近人诗，约得二千余家，为《道咸同光四朝史诗一班录》，无贵贱老幼与相识不相识，旁搜博采，每人缀以小传”。

辛亥革命后，孙触目皆碍，感叹道：“乐崩礼坏诗亡日，国破家倾籍没身。”自注“籍没身”：“吾家自先高祖吉士公以下均占籍昭文，今已归并常熟，无昭文籍矣。”^③后“戢影旧都，粥文糊口，凡廿有四年。”^④孙著有《师郑堂集》、《旧京文存》、《诗存》、《读经救国论》等。

也有传言指责孙雄之文行者，称孙之乡先辈翁同龢自开缺回籍后，晚景凄凉，“其门生故吏官京师者，多贵幸用事，闻其贫，相率醮资托昭文孙雄寄献(雄亦同龢弟子，学骈文，宗孙、洪派)。既得资，尽干没之，不以告同龢”。^⑤

孙同康在南菁时，有《方领曲领解》、《汉五行志书后》、《赵受韩上党论》、《宋吕祉论》、《李郭同舟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汪 济 (1866—1902)，字作舟，一字酌周，号掌文，东台县人。光绪十四年

① 案：据黄以周《与孙君培书》(《微季文钞》卷三)：“刘楚楨作《论语正义》，采辑古说，不拾唐以后之人言，此自命为汉学者也。于义理之精微，罕有所得，即训诂考据亦多疏失。今贤弟作《论语郑注集释》，已成十五，书中一一引用刘氏说，奉以为圭臬，甚至刘氏谬驳郑注，亦以为其语详尽，而不敢发一言以剖郑注，是何好之深也。……”则赵椿年所云“注论语一书”，恐即是《论语郑注集释》，孙在南菁书院时，已成一半，然经黄以周审阅后，认为孙氏此书“不敢发一言以剖郑注”，不甚看好，估计孙氏知难而退，如赵氏所说“盖削稿矣。”然孙氏之会试试卷，余寿沧所撰《常熟孙吏部传》，在所列孙之著作中，均有《论语郑注集释》一书，则恐又不如赵氏所说“后不复见”也。

② 钱基博：《现代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4页。以下引文同。

③ 孙雄：《旧京诗存》卷一，《旧都感事二首》之二。

④ 余寿沧：《常熟孙吏部传》，卞孝萱：《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四。

⑤ 胡思敬：《国闻备乘》，“翁师傅晚景”，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9页。又案：孙之同乡费行简直斥孙为“文人无耻者也”，似为过甚之词，见《近代名人小传》。

(1888)戊子科举人,大挑二等以教职用。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扬州汪作舟济,治词章,兼通星卜堪舆之术,戊子中式,即以《诗经》艺‘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用形家言,为李若农师所取也。”^①李文田很欣赏汪济,当汪济谒见座师时,“极言罗经须悬观方准,李抚掌叹服”。^②罗经到底是平观还是悬观才准,好像对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气类相赏”。当时汪济“与黄先生以周同见,黄为李公庚午浙闈所取士,顾谓黄曰:‘君与我共有此门生,此奇士也,宜善视之。’”汪济“文词玮丽俊发,为同辈冠”,但后来“栖迟偃仰,学不复进。又溺于道佛符篆,有时超然遐想,复好声色”,终于“季世风会辄之而遽摧抑至死。”其友李详为之不平:“余谓此读书种子,愆其猖狂妄行,凡有诬诟,悉加之济,持之不得其平,济虽死,目不瞑焉。”汪济居乡授徒,“谈轨革壬遁之学,复论文字源流,轩眉抵掌,诸弟子屏息瑟缩以听。”^③光绪二十三年(1897)汪济与友创办东台“三贤书院”,后改为学堂。汪著有《周易卦本反对图说》、《八角磨盘吟》、《震斋集》等。

王家屿 靖江县人。

吴聘珍 字达璋,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有《闾宫末章先路寝后新庙说》、《汉地理志都尉志补遗》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吴前楣 华亭县人,1927年7月至1928年4月,任嘉定县长。^④

吴玉庚 吴县人。

奚绍声 字锡三,武进县人,在院治经学。有《伯相名士须材解》刻入《南菁文钞二集》。著有《扬子年表》等,而《锡珊文稿》二卷已佚。

谢钟英 见《名人传》。

殷寿辰 字赞枢,盐城县人。工书,与族祖载丹齐名。砥砺廉隅,言笑不苟。精研《史》、《汉》,湛深经术,意志落落,不与时流为伍。著有《禹贡直解》、《禹贡略图》。^⑤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案:汪济之友李详在《汪作舟传》中也说:“人之好尚,无贤不肖必有气类相赏,际时而动,迫则应之,以泄其蕴。济涉形家言,适其举主顺德李文田,用‘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发题,济以是获售。”

② 李详:《汪作舟传》,《李审言文集》,第942页。以下引文同。

③ 李详:《药裹慵谈》之《记东台之游》。

④ 《嘉定县志》卷二十一,第二章第二节《县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人物》。

尤廷桢 无锡县人。

尤桐 (1867—?)^①,原名廷桢,字幹臣,无锡县人。尤桐记肄业南菁事:“时同住院者皆绩学宿儒,而余以新进少年抗衡其间,每作课卷,辄为山长定海黄元同先生以周所激赏,往往拔冠其军。”有《读荀子性恶论》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乡试、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乡试,两中副榜。“乙巳,任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员,选辑汉文读本。”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历任法部主事,邮传部主事。民国成立,任交通部主事,升任佥事,任交通部总务厅文书科科长。尤桐自云:“余官交通部先后凡十七年,鞠躬尽瘁,自问为他人所不及。”又称自己一生,可用六字概括:“新学问,旧德道。”

张炳 泰兴县人。

张复泰 江阴县人。

张涵中 长洲县人。

张炜 泰兴县人。

张应元 江阴县人。

赵世修 字韵臣,上海县人,世为邑中望族。寓泰兴。“其祖赵继勋官泰兴教谕,因家焉。世修生长泰兴,同治十三年(1874)入邑庠,旋食廪饩,肄业于南菁书院。”^②赵世修肄业南菁十余年,屡任斋长,有《山川能说赋》、《四目灵光赋》、《王式以诗谏赋》、《金陵怀古》、《拟王渔洋三国小乐府》等诗赋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又有《谏苑赋》、《赵阅道以金带劝赈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还有《春秋黄池之会发微》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其同窗好友赵椿年晚年回忆赵世修,不无伤感,称赵世修:

为人极伉爽。负才不遇,转而作达,大有“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之概。自戊子(1898)别后,至三十二年(1906)余再入都,君已在五城中学授国文矣。^③总教习为闽县林琴南纾,气类相合。于是京师极盛,友朋之乐,游燕之娱,天下所无,君亦得发摠意气。已而学堂易人,委贲某局,又有更张,欲归无

① 案:《学友录》作光绪十三年,据其《自述》:“未几,奉学院檄,特调赴江阴南菁书院住院肄业,月给膏火,遂以丙戌正月襍被入院,住章字斋。”《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无锡图书馆藏。则尤桐入南菁书院,在光绪十二年。

② 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县志》卷十五《人物》下。

③ 赵世修教国文于五城中学的时间,据民国《上海县志》称:“泊辛亥(1911)国变,搁笔走燕京,为五城中学讲师。”与赵椿年的回忆有数年之差。未知孰是。

计，余亦无以慰君之意，抑郁致疾，卒于松江会馆，葬于万柳堂旁会馆之义园。其长子时在京，后亦不知何往。诗稿尚多，身后启篋检视，已为人携去，君诗遂无传，岂传不传真有命邪？余记其寄友人美洲一律，亦忘其半，仅颈联“醉后常思旧肝胆，年来不见好头颅”，结句“海水太长情太远，可能魂梦共为娱”四句而已。《清嘉集》中刻其律赋数首，益吾师有“体洁词高，唐赋正轨”及“妙相纷罗，文人慧业”之褒，亦可以见君之文学矣。^①

《(民国)上海县志》称其晚景凄凉，歿不能归葬故乡：

赵世修尝语同郡友人，谓“吾死，必瘞吾于陶然亭畔，树短碣曰‘上海诗人赵世修之墓’，与香冢为邻，于愿毕矣。”颀頔数年，歿于云间会馆。同郡友人为谋葬所，金曰：“陶然亭四周荒冢累累，夷为平陆者无限，设子孙不能以时祭扫，则墓不可保。”于是遂葬于广渠门外云间郡馆义地，然非韵丞意也。^②

松江张锡恭闻听京师噩耗，作诗一首遥哭南菁旧友：

旧德承恩大，忠臣裕后长。（君为损之先生后人。）遭时偏溷浊，齎志托清狂。落拓留人海，温柔岂我乡（君馆京师，放浪于醇酒妇人。）清芬何以继，一睽杳茫茫。^③

赵世修“为文沉博绝丽，得江山雄直之气。岁、科试，辄冠侪偶，顾屡蹶乡闾，郁郁不得志，抑塞磊落之气恒流露于诗”。^④赵去世后，诗稿大多散失，所存无几，后南菁书院好友青浦张家镇为之刊印，即《韵臣诗存》一卷是也。^⑤

光绪十三年(1887)

包亦庚 丹徒县人。

曹学诗 字友白，丹徒县人，恩贡生。幼聪颖，读书目数行下，院试辄冠其曹。肄业南菁书院，学益进。其南菁同学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旧友，还记得曹在书院“治算学、词章”。有《问日必逾五月而再食晋书天文志泰始二年九年并再食在四月内曷故》刻入《南菁讲舍文集》。曹学诗乡试屡荐不售，遂就职直州判。入都谒选，已掣得甘肃秦州府，将领凭赴任，适母病，电至京，遂乞假归，终身不出。生平湛思

①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②④ 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县县志》卷十五《人物》下《赵世修传》。

③ 张锡恭：《遥哭赵韵臣》，《茹茶轩续集》卷一。按：诗中所称“损之先生”，赵文哲也，乾隆年间，殉难于木果木之役。

⑤ 沈其光《蚌粟斋诗话三编》卷一：“有遗诗一卷，雄老为鹄贖刊行之。”案：张家镇字雄伯。

劬学，工诗、古文词，尤于天文、地舆、测算诸艺，穷精探讨，丛稿盈篋。晚得末疾，未及荟萃成书而歿，士林惜之。^①

陈懋恒（1836—1916），字子贞，丹徒县人。陈庆年之父。性孝友，劬于学。光绪壬午，授徒越河，闻母疾笃，惶遽至无锡，已更数医，无效。急祷于华祖庙，中夜辄往，连祷数夜，竟愈。尝语家人曰：“凡事神，诚则格。”越六载，母卒，懋恒毁几灭性。长兄懋言早歿，久在浅土，不知其处。粤乱定，懋恒数冒风露寻之，果获。弟懋龄歿，无余资，百计为营丧葬，抚其室家。长兄、二兄歿后，贫甚，乃迎长嫂、二嫂于家，谨事之。弟懋采歿于杭州，时懋恒年已七十有二，奔赴恸哭，哀感路人。生平极俭约，恒训子曰：“道光壬寅之祸，实阶厉于一奢，尔当奉为严禁。”年八十一卒。^②陈懋恒比其子陈庆年晚一年到南菁。^③著有《明代倭寇考略》，辑《京口掌故丛编》等。^④

陈世垣（1867—？），字允怀，一字薇云，号季藩，元和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

程 镛 字仰苏，吴县人。有《克字仪父说》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程之驥（1844—1890），字范卿，丹阳县人。天性孝友。在南菁书院治算学，所著《开方用表简术》，王先谦奇赏之，刊入《南菁书院丛书》第四集。有《古量深尺内方尺其实一鬲臂一寸其实一豆以今量为之鬲内方用今营造尺一尺其深及臂当得几何》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四年（1888）曾出任浙江宁波甬上书院教习。

程骏通（1860—？），字竹森，号二范，后改名祖蔚（光绪甲午乡试，即用祖蔚名），武进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

承旭祺 武进县人。

高德培 吴县人。

顾懋熙 字葆生，无锡县人。

胡玉缙 见《名人传》。

黄恩煦（1855—？），原名尔征，字镜涵，号渊甫，青浦县人。光绪十七年

①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十三《文苑》。

②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十二下《人物四》。

③ 《横山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至江阴甄别，父以失馆故，冀投一卷，与先生偕”。

④ 《横山先生年谱》，光绪十七年（1891），“父子贞公从辛卯至壬辰，钞集先辈记道咸兵事书为《京口掌故丛编》。命先生广搜乡哲遗著，以存一方文献”。

(1891)辛卯科举人。“少承庭训，肄业龙门书院，治经贯彻汉宋诸儒解说，并研核性理音韵之学，俱有深造。院长兴化刘熙载深器之。郡守陈遽声创建融斋书院，聘恩煦主讲席，又经理云间书院及育婴堂事务，皆详慎有则。余山东麓有乡贤陈眉公白石山房遗址，将为教堂所侵，恩煦诣县请勘勒石，卒获保全。恩煦性恳挚，与人交，相浹以诚，然望之俨然，邑人士无不以道学目之。著有《扶雅堂诗文杂钞》。”^①在南菁书院，所作《黄钟宫为律本赋》、《汉章帝诏群儒选高材生受古学赋》收入《南菁讲舍文集》。

黄荣桂 镇洋县人。

姜汝济 (1862—?)，字作舟，一字虚舟，阳湖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故友，称姜“诗人也，惜不永年”。

雷 璠 (1871—1941)，字季生，又字涵初，号君曜，又号君尧，华亭县人。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称“华亭雷君曜璠，习经学，治词章，为张闻远弟子”。雷在南菁书院虚心好学，称南菁同学雷补同、黄恩煦、赵世修为“受业师”，而称张锡恭、姚彭年、唐文治、陈庆年、陈汝恭为“问业师”。^②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雷璠后进入报界，别号娱萱室主，笔名云间颠公、缩庵老人等。初任扫叶山房编辑，编有《清人说荟》初编、二集各二十种，《娱萱室小品》六十种等。后任申报馆编辑多年。熟谙掌故，勤于著述，到老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家藏乡榜文献颇多，熟悉地方史料。民国六年，续修《华娄县志》时，曾撰有《艺文志稿》，辑有《松乘》初稿。又辑录晚清至抗战前松江大事，名《松江志料节抄》。尚有笔记手稿《我生七十年》、《五十年之回顾》及《日记》(六十一册)，皆有文史价值。此外，编选有《近人诗录》四卷、《近人词录》二卷。笺评有《详注春在堂尺牍》等。其他著述，有轶事小说《清代官场百怪录》百篇、《伤逝录》、《旧德录》四册，《砚话》、《印话》、《弈话》等各一册。^③还著有《文苑滑稽谈》、《蓉城闲话》，辑有《闺秀诗话》、《说梦》等。

李宝潜 武进县人。

刘宗向 字挹青，江阴县人，寓居海门厅。《续厅志》有《传》：“刘宗向，字挹青，又字蛰存，江阴廩贡生。天才卓越，可倚马万言。文效徐、庾，遣辞比事，奕奕生气远出。诗沉潜玉溪、梅村，典丽而不掩慷慨淋漓之致。词似稼轩。性豪放不羁，有

① 钱崇威纂，金咏榴续纂：《青浦县续志·附编》，民国二十三年刊本，第863—864页。

② 雷璠“戊子科乡试珠卷”，顾廷龙主编：《清代珠卷集成》。

③ 《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所得辄尽。历游李经方、张荫桓、岑春煊幕，一时文士，多与之交。晚年抑塞，佐垦务塞外，歿张家口。庄蕴宽经济其丧。遗稿散失。”^①刘歿后，“经济其丧”的庄蕴宽，是其南菁同学。另一南菁同学赵椿年，与刘亦同窗情深，晚年回忆：“挹青与余同谱，性尤骯髒，任气敢言，遇意所不可，指斥不稍假借，顾有热诚能急人之难，人亦以此多之。以困于有司，拙于生计，思学白圭、计然之术，游粤游燕，冀有所遇。在粤，得沈子封提学曾桐之助，办《砭群丛报》两年。在燕，于晋矿、芦盐、蒙城有所规画，皆不能成，嗒然南下，不久即卒。才华极富艳，诗学义山，有集义山诗数十首在余处。文学王仲瞿。未知有遗稿否？”^②

陆咸清（？—1890），字耕莘（一作庚星），镇洋县人。唐文治回忆：“余自为童八九岁时，即识庚星，总角嬉戏辄相共。迨庚星弱冠，诗名藉甚，里闾长者折节与交，余稍稍远之。既闻庚星贫甚，颇蹶弛为不羁之行，余遗书谏之，庚星殊不以为忤，而两人踪迹益疏阔。癸未之春，庚星应岁试，受知于瑞安黄夫子之门，乃遂划除浮夸，敛华就实，为文务规先正，不屑屑干时誉，而贫益不能自存矣。丁亥、戊子之间，余肄业南菁书院，庚星乃辄就余谈经，余时与买舟共赴澄江。时庚星因贫，气颓丧甚，余辄激励之。一日，庚星谓余：‘吾文学桐城，庶几寿世。’余笑谓：‘子之文，成则为刘海峰，不成则龙翰臣、吴仲伦之流亚耳，岂能行远。’庚星爽然，久之谓：‘子诚知我，吾文幸待子以传耳。’己丑春，庚星始娶妇，特屏俗尚行古礼，余实赞成之。既余应礼部试下第，旅馆津沽。迨庚寅夏计偕归，而庚星已于是年三月以贫病死矣。余往吊之，入其门，登其堂，念畴昔之谊，不知泣下之沾襟也。逾数月，闻庚星之妇陈氏又以殉节死，余益悲之。”^③

陆咸清遗稿由唐文治嘱李颂侯选辑编次，成《庚星文稿录存》、《诗稿录存》，并作为序，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刻行世。

吕德忱（1854—1907），字子恂，东台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举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家乡倡建景范书院，废科举后，改设小学堂。

徐孚吉（1867—1903），字少石，一字元尹，海门厅人。“以光绪辛卯（1891）副贡，中甲午（1894）科举人。颖慧绝伦。幼承家学，经、史、子靡不究心，旁逮九章、輿地，尤精训诂，著有《尔雅诂》二卷，刻入《南菁书院丛书》。古文辞法昌黎。庚子乱

① 刘伟纂：《（民国）续海门厅图志·寓贤列传》。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③ 唐文治：《陆庚星遗稿序（甲辰）》，《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

后,礼部会试迁河南,孚吉应试,歿开封,年三十七。遗稿散佚,张謇为搜得若干篇印行,名《元尹诗文集》。”^①

缪抡俊 (1866—?),字迈人,一字曼臣,号西溪,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署河南新安县知事。光绪三十年(1904),发起创办范贤初等小学堂(即今张家港实验小学前身)。三十一年(1905),倡议创办西式学校,将原有之梁丰书院,改为梁丰两等小学堂(即今梁丰高级中学前身)。

庞鸿济 字芝香,钟瑚子,常熟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苏州府学岁贡。^②

庞鸿瀚 常熟县人。

邵曾鉴 (1865—1896?)^③,字心炯,宝山县人。“幼稟庭训^④,天资颖异,读书能钩元提要。弱冠以县试第一补诸生,旋食饩。鹿邑王树棻、长沙王先谦皆以国士相遇。肄业龙门书院,所交咸一时名俊,争奇其才。自是益沉酣古籍,不屑屑以占毕见长。其文辞浸淫庄骚,邈然于尘埃之表。古选近体则出入魏晋三唐,莫与抗手。辛卯,应秋闱试,首场艺已出房,主试者称其不食人间烟火。因大母丧,闻耗遯反,人皆叹其数奇。性磊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亦时出稿本,就正有道,再三改窜,不厌求工。元配金氏,名藻芬,字玉霏,亦妙解文义,伉俪相得。早赋悼亡,侘僚无聊,遂自放于酒,愈好为曼声之吟,以摅哀戚。比再娶,已呕血成瘵,然见道益深,所录自省之言,直抵宋儒之藩,为老师名宿所不能道。疾革,检其零稿,举火焚之,而以所藏善本书分赠知交,口占联语自挽而卒,^⑤年仅三十有二。著列《艺文》者,率赖亲故搜集,而得其诗文书词,经同学选刻,余皆手录偶存。”^⑥现存《艾庐遗稿》四卷,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是南菁同学唐文治醴金为之刊行的。

宋之芬 海门厅人。

汤慕伊 字聘莘,江阴县人。

① 刘伟纂:《(民国)续海门厅图志·耆旧列传》。

② 《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七《选举志》。

③ 唐文治:《邵君心炯传》:“丙申年得呕血病卒,享年三十有二。”《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案:据南菁同学曹元忠起草的《助邵心炯丧启》(《笈经室遗集》卷十五)中说:“岁乙未(1895),某等客京师,闻宝山邵君之赴”云云,则邵卒年曹元忠与唐文治所说不同,相差一年,未知孰是。今从唐说。

④ 唐文治:《邵君心炯传》:“父讳如燧,字羲人,绩学励行,同治庚午举人,光绪癸未应礼部试,病卒于烟台舟次,其生平事实,载宝山县志。”

⑤ 唐文治:《邵君心炯传》:其自挽联有“好学短命,何敢望回”之语。

⑥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十四。

王恩浩 (1865—1915),原名乃肖,又名燕,字颂平,江阴县华士镇人。常州府学生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大挑一等,拣选知县。宣统二年,热河法政学堂毕业,加五品衔。历任热河都统署调查局委、热河兵备道署粮饷局委员。返乡后,任梁丰学堂国文科首席教员,地方自治会副议长。著有《严恕斋诗文集》二卷,辑有《古今文钞》六卷。^①

王思仁 长洲县人。

王有德 (1858—?),字太立,号康吉,吴县人。任过翰林院孔目。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有《牢中解》、《表记子言之说》、《释爻》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吴寿萱 字志钧,吴县人。生平喜舆地、算学,其算学贯通中西,有《治算学日记三种》(《垂线互求术》、《平方和较术》、《叠征比例术》各一卷),刻入《学古堂日记》。《江苏省舆图》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书局刻印,由吴寿萱担任测量计算。南菁书院改高等学堂,吴寿萱回母校任测绘算学分教。^②学生无锡程宏远在日记中赞扬吴教习教学得法:“(光绪癸卯,1903年)四月初一日,晨起,温西文,朝粥毕,照例上堂。下午,又上堂学算,吴教习出筹二十五枝,演与瞿君健斋看,因瞿身弱多病,勤学不辍,用心颇苦,故教以筹算之法,谓用筹则可不必劳心。我谛视之,尽得其术,觉一转移间,不知省却多少心思,嘉惠后学实非浅鲜。盖筹算本是古法,而吴教习所用之筹,连平立两方亦可不用心思,一望而得,真奇妙无匹矣。归号,演习一番,心颇乐焉。”^③

吴翊寅 (1851—?),字孟斐,一字拗菴,又号悔龠。阳湖县人。肄业南菁时,有《蜀志首二牧说》、《唐节度使建置分并考》、《宋史理宗纪论曰……》^④、《拟唐王子安慈竹赋》、《拟沈休文桐柏山金庭馆碑铭》等刻入《南菁讲舍文集》。

“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广东知县。博学多闻,又洞识时务,其所言皆有

① 包国良主编《华士镇志·近现代名人传》,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6页。

② 王钟琦:《癸卯乡试殊卷》受知师栏内有:“吴志钧夫子印寿萱,无锡候选知州,现南菁测绘算学分教。”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

③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④ 题目冗长,全录如下:《宋史·理宗纪》论曰:“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子《四书》,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实自帝始,庙号曰‘理’,其殆庶乎?然理宗知真德秀、魏了翁、吴潜之贤不能用,知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之奸不能去,依附强元,借报宿愤。顾乃会师定约,无异海上之盟,疆圉日蹙,国随以亡。然则理学竟无益于国乎?抑正心诚意不能治国平天下乎?史臣著论,抑扬不得其实,岂与道学立传,皆有私意存其间乎?试详论之。”

本之论，而毕生未得展其怀抱。少受诗学于江夏钱桂林，年少气盛，多纵横跌宕之作，自写胸臆，不规摹古人。逮饥驱四方，得林峦之趣，涉风涛之观，眺览吟赏，未尝以生事撻其虑。治经治史，著书多种。后与屠寄同辑《常州骈体文录》，即今之传本。”^①

赵椿年晚年回忆南菁同学，称“阳湖吴孟飞翊寅，工骈文，与屠敬山寄相埒”。其实，吴之经学尤其是对《易》的研究也很精深，著有《易训故述》六卷、《彖传大义述》一卷、《周易消息升降爻例》、《易汉学考》二卷、《易汉学师承表》一卷，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93—1895）广雅书局刻本，时吴正在张之洞幕中。吴还著有《汉置五经博士考》及诗文集《曼荼罗花室全集》等。

徐瀛 字步蟾，江阴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科常州府学恩贡，就职直州判。

殷松年 字墨卿，丹徒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优贡，任靖江、青浦等县学训导，浙江补用知县。工诗文，善书法，曾任教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有《王会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郁棣萼 字咏唐，江阴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岁贡。郁“幼颖悟过人，好学不倦。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廩饩，邑中长老咸以大器目之。先生益殚志精研，自六经外，旁逮历史、诸子百家，靡不搜讨。治古文辞，壹以桐城姚姬传先生为宗，曰：此文章正轨也。平居出所学授生徒，为人师历四十年。自澄江教读外，尝客槀川、客蓉城、客毗陵，绛帐所莅，皆以姚氏考据、词章、义理三者不可偏废为主旨，而一归于有用。”^②

张恩庆 镇江府学。

章元治 字耕士，江阴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科恩贡，就职直州判。

章钟枯 号绍庭，江阴县人，章钟祚、钟祥之兄。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拣选知县。

赵金第 丹徒县人。

周濛 泰兴县人。

周钺（1859？—1909）^③，字左麾，号百迟，上元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

①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卷九。

② 唐文治：《江阴郁咏唐先生家传》，《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五。

③ 案：周钺之戊子科优贡硃卷，自称“咸丰己卯年六月初四日生”。李详《药裹慵谈》卷二《周左麾》，称周“于戊申十二月病没”。

子科优贡，十九年(1893)癸巳科举人。周自入学后，在外肄业各地书院十多年，因转徙不定，有名列书院而不与课试者，或虽与试而日后忘记师长姓名者。周钺是时文高手，常为富贵子弟作枪手，且为枪手中之卓卓者，所代中者不知凡几，以为生计。^①又在外游幕多年，所奉府主有淮扬海道谢元福、河南巡抚刘树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光绪末年，官河南南阳府知府，履任才三月，为巡抚陈夔龙劾罢，据其好友李详说，“非其罪也”。^②

庄蕴宽 见《名人传》。

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1888—1890)

案：《学友录》称“光绪十四、十五两年文卷散失，无从查考，暂缺”。然经考索，十六年题名中，亦有十四、十五年便已入院肄业者，故可认为十六年的题名，乃是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年的题名。

鲍凤嘉

蔡宝楚

蔡嘉贞

曹猷

陈开骥 字晋翼(一作俊逸)，长洲县人。肄业南菁多年，有《释坤二爻义》、《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左传大武六章与诗序异何说》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又有《郑注禹贡引地理志不本班志说》、《周官平肆展成奠贾说》、《经传交聘礼考》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副榜举人。曾应浦起龙后裔之邀，整理《酿蜜集》。“原稿断烂讹斂，几不可读，陈孝廉开骥理董之为四卷。”^③书成后，于光绪二十四年，陈开骥继潘遵祁后，为《酿蜜集》又作一序，称“先生之于学，犹蜂之于华，撷菁英，去糟粕”，而感慨“晚近之士，或专习举业，或争治异端，而于‘实事求是’之道茫无所得，是有愧于二田先生。”完全是其师元同先生口吻。

达李 (1865—1919)，字继聘，通州人。在南菁书院肄业十余年之久，为黄以周嫡传弟子，经学湛深。课作《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解》、《释

① 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下《科场舞弊》，第192—193页，中华书局，2007年4月。

② 李详：《药裹慵谈》卷二《周左庵》，第27—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③ 《酿蜜集》，费念慈序中语，费序置于陈开骥序后，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论语太师挚适齐章义》、《拟宋广平梅花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讲义》、《周官平肆展成莫贾说》、《仪礼篇第考》、《齐论语问王疏证》、《汉博士刺六经作王制考》、《释黄钟之宫》、《书顾氏春秋刑赏表后》、《尔雅篇目考》、《万子即万章说》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清末，张謇等筹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时，达李亦为参与者之一，后任该校国文修身经学教员，专督同学读《左传》、《史记》、《文选》及许书，于治朴学门径，言之綦详。不久遽歿。昔日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学监兼同事曹文麟闻讯，挥泪写下《达继聃先生哀辞》：“文麟小时震惊达继聃先生之名，十余年前先生谢南菁学校事归，主教乡里，始常与之遇。岁己酉，文麟任职通海公立中学，先生适转任至校，于是昕夕相处。”曹文麟称达李“深于训诂之学，贯通诸经。而于《礼》考订尤严密，江南北人士咸推尊之。顾为人无涯岸，处人以和，无少长智愚如一。或谈诸大作，含宏并纳，令听者雍雍然忘其在经师侧焉。”^①

丁蓬山 字宝生，泰兴人。有《书洛诰先杀后裸与礼记然后迎牲不同何说》、《任正衡任考》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董为章

杜渊

范翰涇 无锡县人。

范 蠡（？—1895），字素行，无锡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其南菁同学吴稚晖很敬重他：“素行之制行，曹辈中无其偶。好克己，外和，内介绝，以故积忧成喉病。”后来范蠡“在南菁书院举斋长，旧人皆易其年少，谄让之，以故稍通方”。二十一年，进京会试，不第。归，染病死。死后，竟遭诬患梅毒。吴稚晖为之愤愤不平：“伤哉，吾友如素行者，圣门颜渊之徒，犹且被诬至此，歿后，道路传笑。虽读书之士，识与不识，皆为申辩，无如里巷细民，不胜告，且不屑与争也。小人之污诬大贤，其计遂行。”^②肄业南菁时，治经学，有《释坤二爻义》、《仕于冷官解》、《诗序鹿鸣群臣嘉宾四牡皇皇者华使臣说》、《申论语郑注祭祭自血腥始义》、《张皋文仪礼特性少牢两篇图正讹》、《论程易畴刘楚楨两家释谷异同得失》、《释单篆》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冯明馨 字德吾，通州人。

① 《通中人·红楼记事·通中史话》，<http://www.ntzx.cn/HTML/tzr/gqcs/tzsh/>。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乙未日记》，第448—449页。

冯善徵 字子玖，通州人。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二等一名。“善徵黧面长身，若武人。南菁书院高材生。尝为南洋公学教员。以拔贡举经济特科，用知县，补四川荣阳。捐升道员。锡良调充奉天度支参事。后亦入程德全幕（案：程时任黑龙江巡抚）。袁政府时，久任统率办事处参事，后为国务院秘书。亦质厚温雅”，“并无浮嚣豪纵之行，在迩来名士中，几曙星硕果矣。”^①陈衍称赞冯所作诗“甚雅健，多古体长篇，有《黄河铁桥歌》最工，不靠新名词，能将新题目写得逼肖”。^②冯有《达庐诗录》一册行世。

高汝琳（1869—1933），字映川，无锡县人。高攀龙裔孙。光绪二十年副贡，直隶州同。钱基厚（钱基博之孪生弟）之岳父。^③有《释颐卦二四五爻颠颐拂经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高翔（1870?—?），字集安，无锡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科举人。保升道员，直隶全省学务处编译委员，北洋督练处文案。又出任吉林督练处参议、陆军讲武堂监督、吉林敦化县知县、吉林督练公所副官并兼巡防营务处提调，署吉林新城府知府。入民国，任长春县知事、吉林县知事，道尹存记，吉林政务厅厅长。

顾成章

顾鸿闾（1855?—?），字惕吾，号泽轩，通州人。肄业南菁时，屡任斋长，治经学，有《孔子乾初象传一阳释九之龙下释初之潜辞简义赅传中类此者颇多试条举之》、《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变而玩者爻之辞也解》、《诗序鹿鸣群臣嘉宾四牡皇皇者华使臣说》、《申先郑陈殿置辅说》、《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一节义疏》、《释论语太师挚适齐章义》、《两汉循吏多深经术论》、《释汉书面雍面封》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后由江苏学政龙湛霖保奏“经术精通，学有家法”，特旨以教谕用，分发句容县。光绪三十年（1904）主纂《续纂句容县志》。光绪末年，顾鸿闾与同乡又是南菁同学的孙倣等地方士绅，在家乡办起了金沙初等小学。顾著有《说文段注订误》二卷，《周官疏证》十二卷，似是早年著作，未曾刊行。

顾敬莹 无锡县人。

①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卷上《官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

②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③ 钱基厚：《孙庵年谱》卷下：“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十七岁。外舅高先生卒，回忆甲子冬夜，围城相守，不觉泣下沾襟也。叔兄（按：钱基博）特为作传。”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200册，第503—508页。

顾锡璜

顾 质

郭建南

郭锡恩

郭镇清

韩汉东

韩云骏 (1874—?),字邃青,号萃清,长洲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官陆军部主事。

何锡晋

何允彝 字砚卿,江阴县人。有《申虞注至临义》、《申郑注枯杨生莫义》、《申毛传或肆或将义》、《灵星考》、《释刳蚶》、《杜工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赋》、《苏东坡放鹤亭记赋》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胡同颖 (1864—?),字枕叔,号继高。昭文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进士。常州府教授。改捐知县,分发安徽。^①著有《王肃伪古文尚书证》二卷,《班志补都尉考》一卷,《元史征俄罗斯地名考》一卷,《明史外国传辨讹》一卷,《寒柏斋骈文》二卷。^②

华彦钰 (1867—1898),字相卿,金匱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廷试列二等,以就职州判用”。南菁同学王家枚称“其为学也,博赅九流,蹟探众妙,涉孔、郑之藩篱,窥班、马之堂奥。经穷《周髀》,悟积矩之理;书删《墨子》,备应变之方”。真是“综其学识,迥迈时流”。又“雅好词章,兼工分隶”。不但植根旧学,又能与时俱进,“先是,君肄业南菁讲舍,学使龙公湛霖知君具倜傥之才,通中西之法,咨送沪上机器制造局,研究新机,讲求实事,制器尚象,思补司空于六官。”“君尤究心于声光热电诸理,而于化学尤专尚焉。”“将以设庠授徒,致知格物。”^③在日讲训诂词章的经古书院,华彦钰竟然究心于声光热电的研究,很是难能可贵。惜英年早逝,未尽其才。

黄金堂

金 弼 (1869—1950),字式金,号蘅蓑。泰兴县人。肄业南菁时,有《朱博论》、《拟韩孟斗鸡联句》刻入《南菁讲舍文集》;有《左传引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与

① 丁祖荫等:《重修常昭合志》。

② 胡同颖:《光绪乙未科会试殊卷》,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

③ 王家枚:《华相卿别驾谏并序》,《重思斋遗著》。

周官族联刑罚相及不同何说》、《书洛诰先杀后裸与礼记然后迎牲不同何说》、《氏族先后辨》、《汉地理志都尉治补遗》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会考江苏优贡第四名,朝考一等第十五名,钦用知县。十九年(1893)癸巳乡试中举,二十一年(1895)乙未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金鉞应泰兴县令龙璋之邀,出任泰兴襟江书院总教习。三十年(1904)任如皋县安定书院院长。同年,应江苏学政唐景崇之聘,回母校出任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监督(校长)。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派赴日本考察教育约半年时间。入民国,被乡人推为泰兴县民政长,主政两年,创办泰兴孤儿院。民国三年(1914)冬,就任江西彭泽县知事,三年后,弃官回乡。金鉞曾分别于宣统元年(1909)和民国七年(1918)、十七年(1928),三次被聘为《江苏通志》编纂,撰成《江苏艺文志》,精博罕匹。还先后主纂过泰兴、如皋、通州等地方志,均称佳志。著有《江山小阁诗文集》。

孔昭惠

李继钦^① 字文安,江阴县人。增贡生,候选州同。

李景韩

李树滋 字雨春,盐城县人。陈玉树弟子,曾与其师辑辑谕旨之有关变法者,都为二卷,名曰《自强宝诏》。^②有《释大房名房义》、《申先郑陈殷置辅说》、《张皋文仪礼牺牲少牢两篇图正讹》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李绪基 字丞承,江阴县人。

林之祺 (?—1896),字静安(一作晋安),号纯庵,金坛县人,寓居溧阳。^③肄业南菁时,为斋长。有《卿大夫朝君与朝其私臣二者孰先》、《王享诸侯有无车迎辨》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刘邦霖 (1857?—?),字泽人,号亦峰,一号震临,如皋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副榜举人。

陆翰云

陆燧

缪楷 (1865—?),字啸仙,号少修,江阴县人。肄业南菁十余年,有《燕义宰

① 又见《学友录》二十七年。

② 陈玉树:《与常熟张退斋先生(瑛)书》,书尾左渠之注,《后乐堂文钞》。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丙申日记》:“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君静安,讳之祺,金坛籍,居溧阳,己丑同肄业江阴。今日在岐伯书中,闻君于初一逝世,感念旧游,不觉哀悼。”第543页。

夫解》、《读张皋文仪礼图》、《梅目解》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又有《穀梁释词》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江阴县续志》有传：“缪楷，字啸仙，光绪丁酉拔贡。性孝，善体亲心。甫成童，能背诵十三经，故经学尤粹。廷试归，多病，闭户潜修，著作日富。有《尔雅稗疏》二十卷(已刊入《南菁丛书》^①四卷)，《玉篇笺证》十卷，《诗经大义》八卷，《经余随笔》二卷，《缪文贞编年纪事》一卷，《江阴方言》一卷。”^②据缪自述，还著有《说文骈枝》一卷，《淮南子许叔重注辑述》四卷，《夫移华馆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③缪楷著作大多未曾刊行。

民国二十三年，江阴陶社刊行他的《经余随笔》二卷，同乡后辈又是南菁同学的谢鼎镛校字并为作《跋》：“右缪啸仙先生《经余随笔》二卷，即先生南菁札记也。南菁章程，凡内课诸生，例于月课外更呈札记，以觐学识，即其后改书院为高等学堂犹然。清光绪辛丑，余于末学受知大同李相国师，犹及与先生同讲舍者数载，读书遇有疑义时，辄就正于先生，承先生指示无少吝。先生性沉默，寡言笑，惟与朋辈谈学术，辄口若悬河，恒滔滔不穷，朋辈咸敬惮之。先生平生著作甚富，其《江阴方言》刻入《县续志》，《尔雅稗疏》刻入《南菁丛书》，其余如《玉篇笺证》、《诗经大义》诸书，先生歿后，不知稿存何所。甲戌夏，吴亦愚太史以是编送社，嘱附刻《先哲遗书》中，并谆谆以笃念故人俾有所托为言。回首前尘，曷胜怅惘。夫以先生是编论，初不过随手札记，以免遗忘，非有志著述也。然即编中各条观之，摭心得，识异闻，探小学之精，纠前人之谬，其有功经史诸书不少。他若补金粟香同转《艺文志》，以及蟠龙山、望姨桥、卓锡泉诸条，亦有关乡邦掌故，足备他日志乘之采，固非寻常随笔所可同日语。海内学者谓先生著作，堪以继美艺风，良然。独念绩学如先生，生前仅仅以拔萃贡成均，固未足偿其所学。而身后萧条，更无勤求遗稿之人。独赖太史之搜辑、之保存，俾此一编不至遽饱蠹鱼之腹。此则杀青既竟，不能不叹想夫太史风义之高也。甲戌初秋，冶盦谢鼎镛识。”^④

钮永建 见《名人传》。

钮永昭 字复生，上海县人，钮永建之兄。“永昭，字挹晖，马桥人。世章子。弱冠入邑庠。以兴学、办实事为己任。设俞塘公学、广利蚕桑公会。肄业南菁书

① 案：此非《南菁书院丛书》，实乃溥良所辑《南菁札记》。

② 《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儒林》。

③ 缪楷：《丁酉拔贡硃卷》履历，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④ 案：谢跋中，吴亦愚太史，即江阴吴增甲，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缪楷南菁同学。金粟香，即著《粟香随笔》之金武祥也。

院,所学除经史外,医、易、星纬。”^①著有《晏子春秋校释》,院长黄以周激赏之。

庞炳文

钱福那 字鹤侪,靖江县人。^②

钱麟书 (1860—1930),原名际安,字子瑞,又字史才,号立刚。金匱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乡试举人。官安徽绩溪知县。遗著有《麟洲全集》。

秦宝钟 (1862—1924),字寿生,号鼎臣,无锡县人。“光绪七年无锡第一名秀才,贡生。甲午后,绝意仕进,博览维新变法书籍,协助杨模创办埃实学堂,多所规划。与裘廷梁、俞复等组织励志学会,推为副会长。历任河南、广西、湖北、北京、常州和无锡三师等校教师四十年。又工书画,尤擅山水。(锡山秦氏文钞)”^③

秦勋震 字闰生,有《朵颐解》、《梅目解》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沙棠 字月舟,江阴县人,同治八年(1869)己巳入江阴县学。

沙元炳 (1864—1927),字健庵,如皋县人。肄业南菁时,有《宋史理宗纪论曰……》、《王式以诗谏赋》、《拟唐韩退之短灯檠歌》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十八年壬辰科会试中式贡士,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后辞官返乡,家居奉亲,不入仕途。在家乡创办如皋师范学堂等。又追随张謇创办实业,投资南通各厂、上海各轮船公司以及沿海各垦牧公司。在如皋创办电灯公司、医院、碾坊、钱庄、中药铺等。辛亥革命后,推举为如皋民政长。民国二年(1913)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长,坚辞不就。主持编纂《如皋县志》,并有《志颐堂诗文集》行世。又著有《尔雅郭注拾补》一卷,“仅就郝义行《义疏》、叶蕙心《古注斟》二书,已多证其非是”,学者称该书所引诸条,犹如臧庸辑《汉书音义》,“都由研审得之,不滥不漏”。^④沙元炳似亦是瘾君子,其南菁学长雷瑁,说起文坛逸事,隐约提到沙元炳:“如皋实业学堂学董沙某,某科太史也,堂中因侵占东岳庙房屋,添置四斋,庙僧不服,赴县诉之,沙嘱县令答僧五百,逐出。好事者拟一联戏之,云:‘东岳庙菩萨搬家,去到奈何天上;西学堂词林董事,如游华胥国中。’因沙素有烟瘾,尝于堂中设公座点名,忽瘾发,呵欠大作,故以是戏之也”。^⑤于此亦可见清末地方士绅办教育,时时与宗教界人士因庙产等财产诸事发生冲突。沙元

① 《上海县志》,二十六篇,文化,民国书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案:《江阴青衿录》,光绪十二年丙戌岁案,有钱氏。钱似是江阴人。

③ 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三编》,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④ 王欣夫:《蛾术轩篋藏善本书录》之《辛壬稿》卷一,第427—428页。

⑤ 雷瑁:《文苑滑稽谈》卷一,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22页。

炳晚年皈依佛教,据称,“颇悔从前改广福寺为议会,迁移佛像有赞成之过。命其子进,出三千金,于东门广慧庵改建佛殿,以赎前愆”。^①

邵鼎声

邵清儒 字正蒙,江阴县人。

沈宝相

沈宸锡 江阴县人。

沈逢瑗

沈 灏

苏梦星

孙国桢 (1862?—?),字木疆,号筱川,又号幹臣。常熟县人。苏州府学增广生。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任户部主事。早年著有《壮学室类稿》。

孙 傲 (1867—1952),字谨臣(一字瑾丞),晚年自号沧叟,通州金沙乡人。肄业南菁时,为斋长,有《释礼经自酢例》、《五年再相朝解》、《诸布诸严诸逐解》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孙傲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至三十二年(1906)四月,任太仓州宝山县训导。^②后入四川道台周善培幕,转任青神县知县。宣统二年(1910)辞官返金沙,在家乡兴办教育,据说一生共办了四十余所各类学校。^③民国建立,任江苏省议会议员、副议长,东渡日本考察。民国十六年(1927)后,退出政坛,息影上海,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擅书法,少时学邓石如小篆和石鼓文,壮岁后专研甲骨文字。逝世后,其南菁后辈学友戴克宽作挽联,中有“达穷皆千古”句,有人称道“‘达穷’五字,奖括大节,他人未尝言也。”

孙揆均 (1866—1941),又名道毅,字叔方,号寒厓,无锡县人。孙于光绪十五年(1889)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同负笈南菁,与吴都当过斋长。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优贡,旋中本科举人,官内阁中书。明年,南菁挚友范蠡不幸早逝,吴稚晖很伤感。接着又听说另一南菁挚友孙揆均也生病了,“为忧悼,疑其逝也。觉叔方

①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沙健庵居士往生记》,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续修宝山县志》卷十二《职官志》。

③ 沈其光《解粟斋诗话·五编》上卷:“壬辰秋,海上诗坛连丧名宿二人。……沧师,光绪癸卯举人,宝山训导,四川青神知县,以廉节著。为学治《公羊春秋》,书工殷墟文。其在故乡创办学堂,有四十余处之多。辟园建楼,藏书数十万卷,经乱俱烬。晚岁南下避兵,赁居一楼,粥书自给”云云。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再歿，生此寂寞之世，太觉无聊。夜枕上成挽语云：‘知我者，从此尽；为亲在，迟君来。’”^①后闻孙无事，才放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与吴稚晖同赴日本留学，六月，因保送同学入成城学校遭驻日公使蔡钧拒绝，吴、孙二人竟遭驱除出境。孙后人陕西、甘肃、察哈尔等地官府担任文案工作。

民国年间，孙常与友人廉泉等诗词唱和，刊于报章。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建立，孙曾任江阴县县长，半年辞去，即随蔡元培赴南京任教育部简任秘书等职。后任母校南菁中学校长数年。现代名作家汪曾祺三十年代曾肄业南菁中学，晚年故地重游，吟诗一首，忆当年南菁满园的樱花，亦忆移植日本樱花至南菁的校长孙揆均。诗云：“昔未识樱树，初识在南菁。一夜东风至，出户眼增明。团团如绛雪，簇簇似朝云。寸池水如染，甬道草更青。此非中土产，舶载自东瀛。谁为植此树？校长孙揆均。一别六十载，皤然白发生。攀条寻旧梦，三嗅有余馨。”^②

孙揆均一手漂亮的瘦金体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据说，廉泉(孙之表弟)夫人吴芝瑛书写经文，甚至为挚友秋瑾所书碑传，均由孙代笔。朱东润对孙揆均的书法也很赞赏：“孙揆均我也认识，字叔方，和一般前辈无锡人一样，平易近人，做事也很圆通，写的瘦金体，在神韵中更觉劲健。”^③孙为诗亦庄亦谐，信手拈来，有诗集《寒厓集》行世，吴稚晖为作长序。

孙鸣埭(1868—1928)，字鹤卿，以字行，无锡县人。钱基博表兄。“邑廩生，赴闈试，屡荐不售，遂以恩贡生历江西同治，捐升道员。”^④清末，担任沪宁铁路勘路委员时，得知内情，大量购地，铁路开筑，附近房地产暴涨，孙因获巨利，成为孙氏家族首富。后投资银行、实业，开办电灯公司、缫丝厂、面粉厂、纺织厂等。辛亥革命，无锡光复，孙出任锡金军政府财政部长，后任无锡县商会会长、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设溥仁、慈善、养济等会，以故惠泽遍于乡间”。“而其有功于名教者，尤在办国学院一事。”

无锡国学专修馆原创设于惠山之麓，然师生“退息无居”，于是孙鹤卿在金匱县学旧址上，“修复明代尊经阁，别建斋舍，俾诸生迁徙其中”。不久，创始人施省之以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乙未日记》，第448—449页。

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揆均主南菁中学时，汪曾祺正求学于此。据汪诗中自注：“我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曾就读南菁中学。南菁历史甚久，创校至今已一百一十五年。”则汪写此诗当在一九九七年前后。汪曾祺：《江阴漫忆·樱花》，《汪曾祺全集》卷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③ 《朱东润自传》，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5页。

④ 唐文治：《孙君鹤卿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以下引文同此。

事中辍，孙鸣圻遂主董院事。孙对唐文治说道：“迩来正道沦胥，燕朋逆师，燕僻废学，风纪荡然，伊于胡底。幸赖吾院为一线之绵延，学者尚知孝悌亲师之谊。十年而后，庶几其有豸乎？”后时事艰难，“黉舍飘摇”，唐文治屡萌退意，孙很难过，恳切地对唐文治说：“公尽心力，我尽财力，患难相依，彼此幸无渝也。”唐文治很感动，于是请钱基博相助教学，“由是风雨晦明，弦歌不辍。吾数人者，心相印而道相同也。”无锡国专后来培养出众多人才，孙鸣圻与有功焉。

孙 渊

汤心焕 靖江县人。^①

唐志益 号汝虞，六合县人。精西算。肄业南菁时，有《吴越之间有巨区赋》、《春秋宫词》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曾在安徽芜湖米厘局官员方硕辅家做过西席。^②

田其田 (1875?—1924?)，字自耘，号北湖，籍贯六合县而家住江宁。生有夙慧，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毕五经，学使王先谦激赏之，补诸生，令肄业南菁书院，因得窥所藏图书，学益进。田初进南菁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赵椿年回忆：“句容陈子寿汝恭，名父(卓人先生，著《公羊义疏》)之子，亦治朴学，携其弟子田自耘其田来，甫过十岁，见余等皆歎称先生，而目光炯炯，若俯视一切者。后与刘申叔师培同治汉学，文亦法汉魏，惜不永年也。”^③田在南菁肄业多年，与吴稚晖、孙揆均等交好。田家境贫寒，南菁诸友对他多有照顾，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乡试，无锡、金匱中举者，将官府所发“杯盘银”悉数赠与田其田。^④田为人意气甚盛，颇躁弛，有狂名，然内行悖笃，教养弟妹，覆荫宗族，人以为难。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朝试既不获隼，遂厌弃举业。田所为文赋，奇丽恣肆，有不少诗文发表在《国粹学报》上，其中《论文章源流》颇为人所重。田长于舆地之学，张之洞督鄂，编纂全国舆地图，田应张之聘，出游湖北。据说与大名士易顺鼎交情匪浅，甚得庇佑。

田其田曾遭受牢狱之灾。李伯元记其事：“田其田，狂士也。一日，某督忽命首

① 案：原学友录仅有一名录。汤是靖江人，殷葆诚：《追忆录》：壬辰年，“正月，赴南菁甄别试，遇靖江汤心焕君，旧同门也”。据补籍贯。

② 殷葆诚《追忆录》：“甲午，三十三岁，……是夏……米厘局方观察(名硕辅，河南人)西席六合唐志益君(号汝虞)，为南菁昔日同门，精西算。他乡旧雨，无意重逢，其乐何极。”

③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④ 吴稚晖记道：“叔、仲、素、惠、侣、文，杯盘银送田自耘了。”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锡报》，第152页。案：孙揆均、俞复、范蠡、廉泉、许士雄、许同范六人，除廉泉附课应试外，都是南菁住院生也。

县拘之，求其罪状，则有江西某绅来信，谓田曾著《革命军》，某督信之，故遂逮之赴讯。已而电致江西巡抚，请饬知某绅前来对质，则江西巡抚茫无头绪，回电有“江西一省无此绅士，谅系捏名伪造，合行照覆”云云，某督嗒焉若丧，释田出狱。”^①

辛亥革命后，田仍不得志，归居南京玄武湖，著有《北湖土物志》一文。不久，田即北上，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理，后逝世于北大教任上，年五十。^②孙揆均闻听噩耗，赋诗哭之：“破帽黄衫志意奢，五年憔悴客京华。穷冬一夕白喉死，天下几人青眼加。玄武湖荒空泛宅，田横岛远不回车。凄凉有妹收兄骨，病马寒条共叹嗟。（‘病马系寒条’，北湖《冬柳》句也，南湖时时诵之。）”^③田身后凄凉，留下一妻二子一女，均由其未曾出嫁之妹供教养之资。吴稚晖曾为之致信于南菁同学汪荣宝，乞其一伸援手。摘录吴信：“田北湖先生，其逝去已有年，遗不慧之老嫠一，遗孤子二，孤女一，皆其不嫁妹所看护教养”，“北湖之妹本执教鞭于通州，因老弱在京为累，弃教席摒挡为豆腐小厂于草厂胡同，近亦折阅。”“前日田北湖之妹来弟寓，十五年来未一面，齿豁头秃，憔悴一姬，想见其支持一家之艰苦。”^④想来汪荣宝不会置之不理，因汪与田亦南菁同窗，丁酉拔贡同年，友情甚笃。在京日，汪荣宝常有诗与田唱和，汪《送田自芸南归》有句云“白首论交心似月，青灯惜别泪为河。何时同醉钟山下，濯足江流一夜歌”，可见两人交情亦非同一般。^⑤

王家枚（1866—1908），字寅伯，号吉臣，江阴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起入南菁书院，在院肄业多年，为高材生，有《拟黄文江秋色赋》、《拟宋之问明河篇》、《拟韩退之短灯擎歌》刻入《南菁讲舍文集》；又有《王会赋》、《为我佳处留茅庵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还有《论弭兵会》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书院山长缪荃孙说他“攻词章骈俪之学，胎息醇古，不作唐以下人语”。^⑥南菁同窗又是同乡的缪抡俊也说：“自瑞安银台创建南菁讲舍，高材俊宿，郁然云集。邦人士浸溉输灌，皆蒸蒸有砥学砺行之概。君既负时誉，旋入南菁为上舍生，大肆力于经史，为有用之学。凡声音、训诂、诗、古、骈骊诸体，罔不殚精研究，披躐堂奥，以

①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案：狱事恐并非如此简单，隐情待考。

② 此据夏仁虎《田其田传》所说，未确知其生卒年月。缪荃孙、冯煦、庄蕴宽、吴廷燮：《江苏省通志稿》第十册，卷七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孙揆均：《闻北湖客死京邸诗以哭之》，《寒厓集》卷三。案：南湖，廉泉也。

④ 吴稚晖致汪荃甫函，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七《杂著》，第691页。

⑤ 汪荣宝：《思玄堂诗》，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第9页。

⑥ 缪荃孙：《王生吉臣家传》，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卷十九，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6页。

是发为文章，渊雅典赡。前后学使者莅江，君必首蒙奖拔，而茂名杨侍郎、宗室溥尚书在督学任，器君尤甚。光绪甲午举于乡，旋充南菁都讲，君益厚自期待，力窥于古之作者，冀有以自见，成一家言。详稽博览，精择而约取，尤留意于乡邑文献，有所得，必条举札识之。故年未四十，所纂辑已哀然成帙，多可问世之作矣。性嗜书，在南菁久，所得膏火资悉置书籍，异编佳本，尤不惜购以重值。家故多庋藏旧本，经兵燹，存者十一，益以君前后所置，卷盈累万。君日治文史，夜则篝灯披览，漏则过三下，寒暑靡间，虽舟中行路，卷不释手，盖君之笃于学如此。”^①

王家枚中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并未服官，仍一直在南菁攻读。后援例得主事，分度支部浙江司行走，才北上述职。不幸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病歿于京师，其弟家枢北上扶柩回籍。南菁学长章际治为作《墓铭》。乡前辈又是南菁老师的缪荃孙为弟子作《家传》，内云：“荃孙主讲南菁，见君拟《唐黄文江秋色赋》，知其酝酿深厚，不为考试所囿者。遂常与君谈，喜其事事皆有本原。迨去南菁，得一书则相告，如《杨氏杂诂》、《沙定峰诗集》，皆从君录副；如《李忠毅公年谱》、包文在《易玩》等书，皆倩君物色之。”缪荃孙于文末感慨道：“吾邑自宋及明，不乏大著作及收藏家，至国初，则在武、阳、锡、金、宜、荆之下。”为挽此颓波，自己与二三同志“竭力搜罗前辈著作，得则互相钞送，尚有锢蔽不肯借者。后至南菁，方知王君吉臣有同嗜焉。君所钞如《（崇祯）江阴志》，所刻有沙定峰、翁霁堂诗文等集。方以为吾辈日衰，有君为之后劲，庶足挽吾乡之积习乎？孰意年不中寿，薨华易谢，祝予之痛，情何能已。”^②王家枚著有《重思斋文集》六卷，《国朝汉学师承记续编》一卷，《贡息甫先生年谱》一卷，《华墅镇志》四卷，《梓里咫闻录》二卷。又喜阐扬先哲，辑《重思斋丛书》，选刊《定峰文钞》二卷，《赐书堂诗集》一卷，《龙砂诗存》二卷及其祖、父诗词各一卷。

王清墀 字翼丹，江阴县人。

王仁俊 (1866—1914)，字籀卿，号扞郑，一号幹臣。吴县人。肄业南菁书院时，经学亲炙于黄以周，于金石、目录、辑佚之学，则受益于缪荃孙为多。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十八年(1892)壬辰科连捷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吏部主事。庚子后，张之洞办《楚学报》，聘王仁俊为坐办，章太炎为主笔。章撰

① 缪抡俊：《王家枚家传》，王家枚：《重思斋遗著》卷首，宣统元年活字本。

② 缪荃孙：《王生吉臣家传》，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卷十九。

文排满六万言，差点被捕下狱，幸亏王仁俊在旁婉解，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①王仁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署理湖北宜昌、黄州府知府。张之洞创办湖北存古学堂，王仁俊聘为教务长。后苏州学古堂改建为存古学堂，王即奏调回原籍任职，主讲文学。王自嘲为“吴楚两存古，江湖一散人”。三十四年(1908)，任学部图书局副局长。^②其间，王仁俊又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三年(1914)一月卒于北京。^③“家本寒素，通籍十余年，书籍碑版外无长物。治经宗许、郑，以保存国粹为己任。中年邃于金石文字，其藏书处曰‘籀觚篋’。”^④

王仁俊著作等身，有数十种之多，如《说文解字考异订》、《周秦诸子学术源流考》等；汇编有《西夏艺文志》、《西夏文缀》、《辽文缀》等；校有《白虎通义集校》、《汉书艺文志校补》等；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经籍佚文》等。王仁俊“曾创为一书，曰《格致古微》”，该书“自九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之书、百家之集，凡有涉于西学者，博采而详论之，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⑤俞樾固然对该书是赞不绝口，但也有现代学人说王仁俊虽有学问却不明智：“许多有学问的人，从阮元以下至王仁俊，差不多都犯了太爱国的毛病。”(毛子水《中国科学思想·引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仁俊在担任学部图书局副长时，亲见伯希和所携敦煌经卷，后著《敦煌石室真迹录》，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文献资料集。

王英冕 (?—1895)，字迈卿，一作曼卿，丹阳县人。王英冕“幼颖异，嗜学，不与群儿嬉”。“家夙贫，父歿后弥甚，迈卿力学不少衰。肄业江阴南菁书院，月获膏火，尽举以奉母。母林宜人知迈卿嗜书，复剖其半归迈卿为买书资，而自帅诸女，以十指左日用。迈卿在南菁时，有同学友得家书，若重有忧者，迈卿征知之，为贷若干金，寄其家，初不令友知也。后友得家书，始知之，叹曰：‘天下之友，皆如迈卿，东汉

①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章太炎被杖”，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26—127 页。

② 王仁俊致缪荃孙书第二通：“受业去春在鄂，请以罗田姚彦长同年接存古学堂教务之席，即回苏创办存古，与元和叶菊裳前辈、吴县曹复礼太史分任经、史、文三学，于四月开学。……冬初，冰师招留学部。途中曾有口占：‘冬烘还有砚，春梦已无尘。吴楚两存古，江湖一散人’之句，夫子闻之，得无莞尔。……受业现为图书局副局长，与云南编修袁树五同事。……宣统纪元元旦。”《艺风堂友朋书札》，第 532—533 页。

③ 案：《吴县王捍郑先生传略》(《辽文萃》卷首)：“(癸丑)十二月十四日，竟易箠于北京兵部窟之石碑胡同寓舍，享年四十有八。”则王歿于公元 1914 年 1 月 28 日。

④ 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俞樾：《王幹臣格致古微序》，《春在堂杂文》六编七。

独行之风不足数矣。”^①王英冕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乡试中举。明年,壬辰科会试未中,挑取汉誊录官。癸巳(1893),与吴稚晖同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近一年。甲午(1894)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该年冬十二月,因哭弟早卒,伤哀过甚,竟不支,卒于家。吴稚晖与王英冕同在南菁书院肄业四年,友情深厚。吴时在京师,闻噩耗,悲痛欲绝,在日记中写道:“惟思其志,哀其遇,可悲甚矣。曼卿材智十倍于我,我昔者与之共处,常畏其拘,然离之数日,辄难己之乐与不善人居而兴叹矣。嗟乎,我固无足成器,然持有良友,或可稍免罪戾,今何如乎?”“如死友者,负贞德,怀瑰才,尚死,小子诚偷生,无谓甚矣。”^②半年后,吴稚晖与南菁同窗杜嗣程同赴丹阳谒拜王英冕母,代曼卿收拾零墨。据称王英冕有《赏析斋类稿》存世^③,或许是南菁同学整理而成的。王在南菁肄业时,有《篱鹑泽颍赋》、《著作林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王蕴亨

王瓚

王兆芳 (1867—1904)^④,字漱六,通州金沙乡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举人,大挑教谕。“肄业南菁讲舍,笃嗜定海黄元同所为书。元同有疑义,辄与商榷,以为畏友。”^⑤王兆芳《遗曲园先生书》(《文体通释》卷首)也说:“既而从定海黄先生游,昕夕亲炙者十载。”章太炎则认为,在黄以周众多南菁门弟子中,通州王兆芳尤亲。^⑥而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说,王兆芳曾为其师作《行状》,可证章太炎之说不虚。王兆芳曾编过一本《敬季子粹言》,记录其师讲学诲人之言。王兆芳中举后,“家居教授,著有《公羊质文异礼疏证》一卷,《经义徵学》四卷,《古今异鉴》三卷,《教育原典》六卷,《霞山精舍文献记》一卷,及其他杂文甚富,年三十八卒。”^⑦

关于王著《教育原典》,黄绍箕评价较高,在光绪三十年(1904)与陈庆年的书信中这样说道:“通州王君兆芳,为黄元同先生弟子,闻其著有《教育原典》(专述周以前教育事,原名《帝王学校考》),电约北来时已病剧,口授‘闻命即来’四字,未及发

① 冯煦:《王迈卿传》,《蒿盒续稿》卷三,第466页。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一《山川人物》之《乙未日记》,第415—416页。

③ 《丹阳县续志》卷十四《儒林·王英冕传》。

④ 王之卒年,据范当世《哀王兆芳漱六》一诗及黄绍箕《与陈善馥书》,均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南通县图志》说王“年三十八而卒”,故王之生卒年可大致推断如此。

⑤⑦ 民国《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

⑥ 章炳麟:《黄先生传》。

而逝。^①昨其书已寄来,礼学多闻师说,甚精熟,条理完密,深足为拙撰教育史之助,拟刊行以昌我国粹,振起学风。此君与日本著《孔子研究》之蟹江义丸,皆年未四十,遽尔奄忽,岂天之明融中学,尚非其时耶?”^②王兆芳另一著作《文体通释》,亦以“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抵西术之长,而西术之长不足以抗我儒道之大”为宗旨,研究古今文章形态,是清末重要的一部文体学专著。王死后,范当世写诗示哀:“……王生盛名誉,谈经著述早。陈谊必镌吾,亦足资旁讨。其人内精悍,形容若村媪。李亦茁壮躯,理合致寿考。何图数日间,亟病两俱夭。……”^③范说王“内精悍”云云,则王兆芳被时人称为“两脚书橱”(意指个子矮,学问大)的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

王肄业南菁时,有《隶古定考》、《拟张孟阳剑阁铭》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吴曾僎 (1871—1902)^④,字尊彝,又字娶斋(一作纲斋)。江阴县人,常州府学生,光绪丁酉科(1897)经魁王恩浩之妹夫(王恩浩于光绪十三年肄业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论选知县,考取景山教习,钦加四品衔,例授中宪大夫。惜英年早逝。

吴 朏 见《名人传》。

向 震 字贡之,江阴县人。

谢恩灏 字纯甫(一作莼赋),阳湖县人。肄业南菁时,所居斋舍与江阴殷葆诚为邻。有《申两邦执牛耳说》、《释拊相名相义》、《绵蕪习礼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举人。

邢国宾 字用舟,江阴县人。

邢启云 字曼青(一作曼卿),通州人。“诸生,肄业南菁讲舍,从定海黄元同游,日与同里顾鸿闾、王兆芳、孙傲相砥砺者也。尝岁试第一,闻父病,即徒步归,父责之曰:‘儿安心以微名疏罔极耶?’年三十六卒。王兆芳次其遗文,附以高济霖、王

① 王兆芳致冒广生信:“汴梁一别,又阅两月,……足下由苏入京,必为弟谋。弟已定有进京之志,而进止之间,已与樵孙商论数次,犹未敢遽行者,以未奉明示故也。”《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案:“汴梁一别”,说明王、冒二人均参加了在开封举行的癸卯会试。由此信可知,王兆芳在癸卯(1903)五月,即已决定出山,惜一年后猝死而未竟其志。樵孙,未知何人,待考。

② 黄绍箕:《与陈善馥书》,俞天舒辑:《黄绍箕集》,《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第118页。

③ 范当时:《哀王兆芳漱六李鹏飞云垂》(光绪三十年甲辰,里居病中作),《范伯子诗集》卷十九。

④ 常熟博物馆藏民国三十七年让德堂《延陵吴氏宗谱》卷十三《世系表》:吴增僎“生清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十一日(1871年1月1日),卒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七月十四日(1902年8月17日),享年三十三岁”。案:此资料由常熟张耀宗先生提供,特志感谢。

彦和之作，名曰《三秀集》。”^①在南菁肄业时，有《释颐卦二四五爻颠颐拂经义》、《诗序鹿鸣群臣嘉宾四牡皇皇者华使臣说》、《释论语太师挚适齐章义》、《端午不用午日》、《祖逊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赋》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徐洪度 字又生，通州人。南菁诸生龢金刻老师黄元同所著《经训比义》时，徐亦列捐款者名单中。

薛重光 字仲雄，无锡县人。有《释论语太师挚适齐章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薛重煦 字叔豪，改名秉成，无锡县人。有《庙见奠菜祭祢辨》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严通 清河县人。有《口箴》、《目箴》、《耳箴》、《鼻箴》、《四肢箴》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杨崇本

杨馥

杨光昌

杨佐治 如皋县人。

姚湘

姚起凤 字理笙，无锡县人。

殷葆诚 (1862—?)，字协平，江阴县人。出外游幕多年，其在芜湖关道幕最久，曾被袁昶聘为西席，襄办笔墨及教读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体芳主安庆敬敷书院，过芜湖，袁昶接风，曾命殷作陪。席间，黄体芳向中江书院院长汪宗沂道及李鸿章，宾主尴尬，殷记此事甚详，殷说：“一日，袁师柬约汪仲伊山长、吕筱苏编修(两人皆仲韬学士庚辰同年)陪洗尘之宴，吕先期赴宁国，所至惟汪一人。谈笑甚欢，侍郎之酒逾量矣，嗣道及李合肥，侍郎忽变色，大声询汪曰：‘汝为安徽人，试公言此人之善否。’汪窘甚，支吾其辞。侍郎顾余而问：‘何案游庠，何年补廪，住南菁若干时’，并及江阴琐琐，若甚不愿听汪言也者。爽师遂借此呼饭，以间其辞。(近阅某种小说亦载此事，完全失实，余与林、袁两君为当日陪席之人，耳闻目睹，知之最确，何尝有筱苏在席种种答语乎。)”^②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任(江宁)江南高等学堂中文地理教习，又聘为江苏通志局分纂。民国，任陆军部科长。著有《追忆

^① 《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

^② 殷葆诚：《追忆录》。

录》，实自订年谱也。

于炳渊 金坛县人。

于长庆（1857—1929）字笛生，江都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民国《江都县新志》有传：“于长庆，字笛生，世居东乡塘头。祖暹春、父振骐，并见前志。长庆兄弟四人，于次居仲。幼随父兄读书，劬于学，恂恂无子弟过。年二十，以县试第一补诸生。翌年，夏文襄同善督学江苏，按试扬州，长庆观风、经古俱名列闾属第一，遂食廪饩。其后凡七应岁课试，五冠其曹，调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光绪辛卯，拟取优行贡生，旋中是科乡举。戊戌，公车入都，适会朝局之变，党祸起而外患日迫，长庆睹时势知不可为，而堂上春秋高，伯兄齐庆官翰林，不能归，乃绝意进取，里居闭门，奉亲外，则唯以课耕著书为事，自此足不履城市凡三十年。

“方长庆肄业南菁书院时，获良师友之益，通群经，而于许氏学尤有心得，尝手录诸家注，分别异同，都为若干卷。近海上丁福保氏所刊《说文诂林》，亦同此例，其书视长庆为宏富，福保居都市，悬重金以征集群书，而或司缮写，或任校讎，其事易，长庆篝灯秉笔，穷数十年之力，长编甫具，而出自一手，其事难也。别有《杞盒脞录》若干卷，皆平生阅世与观我所得随手辄记者。

“于氏为江都故家，相承诗礼，长庆兄弟辈多贵显，而独甘以隐遁终所居。塘头位江都之极东，近古海陵。长庆霭然儒者，貌恭而色温，与人言，呐呐如不出诸口，而诚意所感，乡人化之，雀鼠之争，往往得一言而息。自奉俭约，恒刻于己，而戚族里党间缓急多倚之。沧桑而后，古风荡然，独此一方犹有存者，人比之郑公之乡焉。以己巳五月卒，年七十有三。子二，宝麟、宝甲，并贤孝，甲先长庆卒，士论惜之。”^①

郁奎章 江阴县人。

张南云 字霞浦（一作雅甫），江阴县人。光绪十五年（1899）入学。其弟张南翀于民国十年编选《江阴青衿录》时，张南云为作序。序中提及明清鼎革之际的一段科举掌故：“明清鼎革后，邑人以反抗清师，故均不愿应试。顺治三年丙戌补行二年乙酉科试，应童子试者，仅九人，学使陈昌言特为取进八名，以示博取之意。是年岁试，复由县学详请督抚、巡按会题准岁科考试各取进八十名，后不为例。又经邑令刘淳劝考试，报考者亦仅八十一人，遵题案取进八十名。”^②至今读来，心有余痛焉。

^① 民国《江都县新志》卷八《人物传·于长庆传》。

^② 张南翀：《江阴青衿录》，其兄张南云序，民国十年（1921）排印。

张士希（1869?—?），字学渠，号伯贤，娄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壮游大梁，晚年经乱，铄羽而归。民国初，为淞沪护军使署记室，无何，抑郁以卒。”张士希善诗，却与时调不同，“近时云间诗多喜宋派，而张伯贤孝廉孔瑛独好唐音。云间诗多清微凄苦之词，而伯贤独务高远激越之调，此其不同者也。”^①

张绶清

张西翰 字慕渠，江阴县人。

章元浩 字养吾，江阴县人。增贡生，署华亭县教谕。^②

章元溥 字逸珊，江阴县人。

章钟祥 字嘉甫，江阴县人。

赵良荫

赵良箴 字竹咸，海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自称肄业南菁时，蒙选课艺，待刊入《南菁文集》。^③

赵清瑞 字冰焕，江阴县人。

周恒

周肇基

朱鸿燾

祝鼎培 字崧龄，江阴县人。

祝廷华（1871—1939），字丹卿，号毅臣，江阴县人。出生书香世家，其祖父善诒，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举人，内阁中书。工书法，善文艺。及门多知名士，如吴县王同愈，晚年回忆其师，因友人向他提起，所以“略知师门近事”，知道老师的孙子“廷华，号丹卿，癸卯进士，今年约六旬外”。^④很是欣慰。祝丹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壬寅科举人，二十九年（1903）连捷癸卯科进士，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留京半年，以祖母病，乞归乡，不复出。家居，兴办实业，合资开办华澄布厂、利用纱厂，独资经营裕澄布厂。祝丹卿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历任礼延学堂监督、县教育局、县劝学所所长、母校南菁中学校董。二十年代，又与地方人士创办征存中学。丙子年（1936）冬天，他对受邀来访的南菁书院老学长唐文诒说：“吾国文化陵夷殆尽，白

① 沈其光：《榘粟斋诗话初编》卷六。

② 《江阴县续志》卷十三《选举表》。

③ 赵良箴：《癸卯乡试殊卷》，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

④ 王同愈：《榘缘随笔》，《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话文字充斥党庠，国民气骨由雅而俗，志节自高而卑。吾所谓征存学校，征古经、存古学也。”^①喜为诗，从福州陈衍学，与友朋组织陶社，“集大江南北知名士，主持风雅”。又刊印地方先哲遗著，以《江上诗钞》为最著。凡桑梓义务，知无不为，为无不尽。抗战爆发，流寓泰州，歿。

光绪十七年(1891)

查德基 字南卿，长洲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

陈承澍 (1871?—?)，字益飞，号一蜚，又号挹霏。青浦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优贡第三名。署浙江富阳县知县。光绪二十八年《富阳县志》，陈为作序。陈辑有《策论经义》二卷。《青浦县续志》有传：“陈承澍，字挹霏，幼颖异，工词章，文名籍甚。光绪辛卯优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浙江，补宁海，历署富阳、象山等县，丁母忧，去职。服阙，洊升知府。承澍机警多谋，善应变，官富阳时，邻县新城、桐庐、分水有愚民揭竿仇教，承澍率小队驰赴富新接壤之青龙桥镇，镇慑之，并诣新城会谋防堵，以是两县境内教案帖然。大府以承澍当事急，不以越疆出位为嫌，称之曰能。辛富三年，兴学堂，治盗贼，办积谷，课农桑，主修县志。去官日，士民感德焉。著有《来蝶轩诗文稿》。”^②

陈铭荃 字亦芬，靖江县人。南菁肄业多年，有《论语子罕言子所雅言解》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又有《郑注禹贡引地理志不本班志说》、《穀梁受经于子夏考》、《论语好解小慧申鲁读》刻入《南菁文钞三集》。民国年间，曾任靖江生祠小学校长。

戴姜福 (1870—1936)，字响五，号绥之。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优贡第一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戴氏一生事略，见其弟子曹岳峻所撰《先师戴绥之先生事略状》，全录如下：

先生姓戴氏，讳姜福，字绥之。系出皖之休宁，雍正间由浙入松江，再迁至吴之木渎。曾大父讳文荣，大父讳运亨。父讳国仁，恒经商于外，同治甲子，粤难初平，乃谋旋里，过陈墓，遇友人卖所贖货，遂留焉。赁姜氏屋，姜母徐太夫人以女妻之，自是始为陈墓镇人。生先生，以姜氏乏嗣，故命名取兼祧两姑之意。幼而岐嶷，在乡塾已颖异脱俗，读书过目十行辄下，有神童之誉。又秉父

① 唐文治：《江阴祝丹卿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七。

② 钱崇威、金咏榴纂：《青浦县续志·续编》，民国二十三年刊本，第897—899页。案：《续志》体例，收录人物下限为民国七年，则可推断陈应逝世于1918年或之前。

教，以艰苦卓绝为立身之本，以摒绝浮华为治家之要，以不忤不求为应世之方。故生平孤标耿介，取予不苟，落落不与世合，皆庭训然也。

年十一，入吴县学。补廪膳生，县学训导程公绂奇其才，字以孙女。学政黄侍郎体芳谓先生必成大器，挈入京，进国学。光绪乙酉，考选优贡。逾十七载，壬寅举于乡。宣统辛亥，通判夔州。入民国，为审计院书记官。自是淹滞不得达。毕生精力悉萃于学，尝谓“为学宜通俗识大义”，以是训诲后进，孜孜不倦，耳提面命，必使沕悟而后已。于群书靡不博览贯通，而于经史、地理、小学皆详原竟委，自成一家。所著有《大学直说》一卷，以《礼经》篇目注释；《论语类编》十篇，以经籍互注，未竟而绝；《郡县史纲》三卷，起自秦政焚书，迄于宣统辛亥，三十六甲子，分六期百节述之；《帝系》一卷，由秦迄辛亥；《鉴纲》十卷，起三皇，迄有明；《神州疆理》两卷；《地形》一卷；《韵类》一种，分甲乙丙丁四帙；《华字原》一种，不分卷，详论《说文》源流；近年为武林叶氏编述《说文谐声谱》，有《谐声谱校记》一卷，费时九阅月而毕；其他医筮诸术，皆有撰述。

平居自奉俭约，笔耕所入有余，即周戚党，不留宿储。有古人子，颇为当道某所倚任，思有以贍先生，谓某方求贤若渴，愿以多金聘先生，请勿过绝之。先生色然曰：“吾与吾徒朝夕讲贯为乐，脩脯虽瘠，衣食尚不能尽，多金奚未者，且子欲吾与鸟兽同群乎？”卒不应。其特立独行类如此。峻于己巳年随侍几杖，已将十稔，不能阐扬学行于万一。今则鲁殿灵光，倏焉已邈，天丧斯文，谓之何哉。

先生有妹四人，父歿时三人尚未字，先生皆为相攸，嫁于名族。妻程安人随先生赴夔时，覆舟歿于江。继妻同邑周庄王安人。妾某氏，早故。又妾周氏，无子。以同治庚午孟冬十六日辰时生，中华民国丙子孟冬十六日午时卒，享年六十有七。遗书数十种，著者十种，易箒时命峻为整理。受命悲怆，不知所云，深惧薄植，弗克负荷，谨为之状。前国务院简任职存记、内务部主事、受业吴县曹岳峻谨状。^①

戴姜福曾是著名书法家启功的老师。启功回忆“我的几位恩师”中提到过戴，他说，戴姜福先生字绥之，江苏人，别号“山枝”，其意是影射自己为戴南山的支派。

^① 《苏州地方志·志书博览·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据编辑者称，“该资料由程毅中先生提供”。苏州地方志网，<http://www.dfzb.suzhou.gov.cn/index.htm>。

戴南山名世，明末人，著名学者，清初以“文字狱”被杀。可见戴先生的家学渊源。前清时戴老师很早就从政界退下来，以教书为生。他曾做过赵尔丰的秘书，辛亥革命时，赵尔丰在四川被杀，戴老师一家便从成都逃了出来，由重庆坐船东下，由重庆坐船东下，在滟滩堆不幸翻船，戴师母遇难，后来戴老师娶了戴师母的一个丫鬟做小太太，照顾他的生活。戴老师到北京后，到东单的赵家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赵家即赵尔丰的儿子赵叔彦，戴老师教的是赵叔彦的儿子赵守俨，后来他成为中华书局的栋梁之材。^①

启功提到的戴老师的另一位学生赵守俨，其子赵珩在“怀念父亲”一文中也提及戴姜福，称其父赵守俨“幼年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而是在家中延师受业。蒙学过后即从戴绥之先生读文字学、训诂学，复讲《礼记》、《老子》、《孙子》等。这位戴绥之先生教授时间最长，他使用的讲义《字原》保存至今”。^②戴在清末是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幕僚，民国年间又当起其孙赵守俨的塾师，有缘也。

戴姜福于光绪十一年(1885)被黄体芳擢拔优贡(全省仅六名)，虚岁才十六；而曹元弼该年擢拔贡，亦仅虚岁十九，当时传为佳话。时隔数十年，亦曾肄业于南菁书院的苏州陈希濂，还写诗歌咏其事：“记得宗师拔擢公，曹冲、戴德号神童。髫龄朝入成均选，多少耆龄拜下风。(戴姜福、曹元弼，一优、一拔，皆在髫龄。)”^③

然而，当时亦有“耆龄”不甘心“拜下风”者，如新阳汪之昌，就曾为其外甥陶承潞不得优贡而愤愤不平，他述说此事：“吴县某秀才，其父习艺事，其子幼时略诵四书五经，夸于同业。同业之子弟罕有诵经书毕者，群称‘神童’。某大令素好事，闻以为诚然，延誉俾入学。至是游扬于侍郎，得以优生贡成均。而甥又不与。”^④这里，“吴县某秀才”便是当时“群称神童”之戴姜福也。

董为锦

杜嗣程 (1871?—1903)^⑤，字孟兼，号香如，无锡县人，常州府学生。光绪十

① 《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案：对照曹撰《事略状》，某些细节略有不同，如覆舟之大致时间、地点等，两存之可也。然所说戴“家学渊源”则误，其父乃所谓“习艺事”者也。

② 赵珩：《怀念父亲》，载《赵守俨文存》文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2—480页。

③ 陈希濂：《“记得”诗——咏清末民初之苏州》第廿九首，《苏州地方志·志书博览·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

④ 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三十一《吴县学廩膳生员陶子戴传略》。

⑤ 案：杜之生年，据杜氏癸巳恩科乡试卷；卒年，《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赴英前后之日记》，于1903年11月8日，记道：“孟兼在今日逝。”第742页。

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举人。曾入上海南洋公学。又在文明书局编写过小学教科书。杜嗣程曾刻有《通雅集》，将蔡元培浙江乡闈之作，作为该集压卷。吴稚晖叙说刻此书原委：“当余尚未知有江洋大盗孙汶前五六年时，却知有蔡元培者，浙江闈星中有三篇怪八股，能得风气之先，意其人或一怪诞厮弛之士，不知当时彼乃二十三岁之间恂恂儒者。吾友丁芸轩先生录其文。杜孟兼先生刻《通雅集》，以为压卷。……《通雅集》者，怪八股之特刊，一时模仿以得隽者，癸巳、甲午两科，有数百人之多，清真雅正之八股家，太息以为文妖。……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是亦所谓文化运动，抛一香烟罐粗制之炸弹也。”^①

范 祎 (1866—1939)，字子美，号韶海，元和县人。自小有“神童”之称，十三岁便入学。肄业南菁时，有《封人解》、《读金史交聘表》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科乡试举人。甲午后，范祎由传统的经学研究转向其他领域，常在《苏报》、《实学报》、《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新政。庚子年(1900)，与创办《万国公报》的林乐知相识，范祎开始全盘否定传统的经学和理学，从欣赏“西艺”、“西政”，进而接受“西教”。他说：“西国何以富强？曰政治也，学问也。政治之善若宪法，学问之善曰格致之属。斯皆然矣，亦知非其本源乎？本源奚在？曰在真教化，……耶稣基督乃真教化。”(范祎“论人有治理万物之权”，《万国公报》，复刊卷165(1902年10月)，总34册，21268页。)辰寅(1902)，成为《万国公报》的编辑，林乐知晚年重要的代笔。并于该年偕全家洗礼，成为基督徒。入民国，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主编《青年进步》杂志。晚年，提倡“基督中国化”。^②

高镜蓉 (1854—1904)^③，字鉴之，盐城县人。^④岁贡生。民国《续修盐城县志》有传：“世居花垛村，父岑，字晓楼，工诗，著有《晓楼诗钞》，见前志。镜蓉资禀钝笃，少读书，不能速记，然性强识，颖悟过人。善属文，知人论世，裁量古今得失，虽老宿不逮。受业山阳谷廷松之门，廷松深器之。操坚攻苦，博览经史群籍，融会贯通，所诣益进。学使王先谦按试至郡，称其学冠冕淮北，声誉藉甚。与陈玉澍及兴化李详

① 吴敬恒：《四十年前之小故事》，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转引自《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摘自《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http://www.bdconline.net/zh-hans>。

③ 李详《药裹慵谈》卷六“高鉴之”：“鉴之以寒疾五日卒，年五十一，时光绪甲辰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④ 《学友录》作无锡人，误，径改。

交最挚，时相过从，论学商榷，研讨无间晨夕。慷慨好义，急人之难。事父孝养备至，至父歿居丧，一遵古礼。著有《文心雕龙集注》及《诗文集》等。”^①

挚友陈玉树称：“盐邑之孝廉、明经暨廩膳增广附学诸生不下七八百人，而论者必推高君镜蓉之学行。”^②另一挚友兴化李详曾详记高镜蓉事：“余侨盐城，所友事者，陈君惕庵之外，有高君鉴之名镜蓉，盐城岁贡生。王逸吾先生视学淮安，鉴之试古学《据吴仁杰说考张释之为廷尉年》，列第一。茂名杨蓉浦提学尤赏鉴之，邀入南菁书院，时以山阴甜酒及金华兰薰饷之。鉴之自伤其老，无以酬杨。攸县龙侍郎湛霖按临江苏，值考拔贡年，鉴之列前茅，侍郎宴诸生，观其齿貌，预为选拔地。阅鉴之册籍，年几五十，已开名单，复将鉴之名圈去，鉴之郁郁。”“鉴之体如笨伯，能背诵《韩集》、《杜诗》，熟精《两汉》，说之靡靡可听。善为史论，有数篇刻入杨、溥两提学试牍中”云云。^③

高人俊（1867—？），谱名德培，字仲厚，号栽之，又号载之。吴县人，苏州府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候选直隶州州判。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

管俭垣 字徽伯，如皋县人。九岁，日读《左传》六十行，背诵无一字讹错，有“江北才子”之称。

方履庠 靖江县人。

何榕

黄廷璧

姜文超

金咏榴 字剑花，青浦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江苏咨议局议员，众议院议员。民国初年曾任嘉定县民政长。金乃报坛耆宿，先后主《申报》、《新闻报》笔政。继南菁同学吴江钱崇威总纂《青浦县续志》，荐戴克宽、沈其光助纂，戴亦南菁学友也。该志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行于世。金咏榴老寿，重游泮水。

李瀚 字企中，无锡县人。

①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人物》。

② 陈玉树：《与成涣庭书》，载《后乐堂文钞续编》卷九。

③ 李详：《药裹慵谈》卷六“高鉴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两”字误作“雨”，标点亦有误，径改。

刘 鸮^①

吕人骏

裴熙琳 字萸芳(一作雨舫),长洲县人。肄业南菁书院多年,有《穀梁释词》、《书冯林一折南漕议后》、《广以工代赈说》刻入《南菁文钞三集》。书院后期同学金松岑称他在院时“广交际,玩世不恭,时饮酣使酒骂坐”。^②学政瞿鸿禨于戊戌年保举经济特科时,又于江苏士子中择优附送六人,裴熙琳亦在内,考语为“资质英敏,究心外交”。^③裴还与章钰、汪荣宝、张一麐等在苏州组织《苏学会》。裴后在河南开封主持过学堂事务。

钱学乾 字仰乔,青浦县人。清末,在家乡兴办学堂。辛亥革命后,继徐彭龄出任青浦县民政长。创办公立医院等公益事业。

秦曾潞 (1870?—?),字彦俦,号杏衢,嘉定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二甲八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清末,充法律馆译书处校理官。民国,曾在段祺瑞内阁任佥事。

秦曾源 (1872?—?),字汉澂,号心逵,又号辛揆。嘉定县人,秦曾潞之堂弟。其父毓麒,江阴县学教谕,故随其父居江阴学舍。治学于南菁书院的同时,亦肄业于同城的礼延书院,亲炙院长陈熙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

秦瑞玠 (1873—1948),字晋华,无锡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优贡,朝考一等,用知县签分河南。肄业南菁时,有《论普法之战》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后东赴日本留学,法政大学毕业。光绪末年,文明书局编撰“蒙学教科书”时,秦瑞玠为撰写外国历史(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教科书。还翻译过不少日人撰写的法学著作。清末,选为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

民国初年,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兼法制审查会理事。后任江苏吴县地方审判厅推事,并署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又任农商部参事、农商部首任商标局局长,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曾入商务印书馆。著有法律著作多种。

阮惟和 字子衡,奉贤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乡试举人。民国年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任庶务长。著有《元秘史地理今释》。

① 未知是著《铁云藏龟》、《老残游记》之丹徒刘鸮否?

②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页。案:金松岑是光绪戊戌(1898)撤调南菁书院,则裴熙琳此时恐是第二次进院了。

③ 瞿鸿禨:《保举经济特科折》,《瞿鸿禨奏稿选录》,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83号,社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沈逢璟

宋 焕 字镜湖，通州人。

孙 倬 字士模，通州人。

唐济镇 (1871?—?)，字若川，金匱县人，唐浩镇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洪培叔子，敏而好古，强学不怠。未弱冠，已与兄浩镇腾蹕士林，为侪辈推敬。尝欲为通经致用之士，俾以功名见。光绪甲午中式经魁，为户部主事，贵州、山东各司主稿，趣公疲神耗竭，不觉，未中寿而歿，闻者惜之。济镇自少即好篆籀，于汉隶尤工，手书《诗品》，哀然成秩，厂肆帖贾，雕版流传，为学者所珍。”^①

王家槐 江阴县人。

王懋吉

王学渊 (1861—1928)，字惺三，一字源泗，号雷溪，铜山县人，徐州府学生。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优贡，十九年(1893)癸巳科顺天榜举人。诗文、书法造诣皆深。晚年曾参与修纂民国《铜山县志》。

王雍熙 (1863—?)，字可南，号伯禾，晚号通庵。吴县人。癸巳科乡试堂备，候选训导。著有《通庵笔缘》三卷、《庚申惜吟》二卷。

王聿修 铜山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王藻冕 丹阳县人。

吴隆吉

徐公辅 号伯匡，青浦县人。廩贡生，任高淳县教谕。

许世熊 无锡县人。

于文华 (1874?—?)，字擷春，号实秋，泰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

袁 煦 海门厅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俞武功 吴县人。清末在家乡任镇董，兴办教育，主持蒲庄小学堂。

张 藩 (1871—1909)，字柅垣，号树屏，如皋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曾助沙元炳创设“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任副办。三十年(1904)赴日本考察教育，撰成《甲辰东游记略》。三十二年(1906)，捐内阁中书。宣统元年(1909)在京师患病，匆匆返乡，不治身亡。

^①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张希龄

赵鸿仪

赵人镜 字艺经,无锡县人。工诗文,善书法,尤擅擘窠,气势沉雄。

赵学琴

朱昌鼎 (1853?—?),字锦雯,号子美,一号紫嫩,华亭县人,松江府学生。甲申(1884)甄别南菁书院,取列古学。杨颐任江苏学政,观风取列特等,己丑岁试一等一名,庚寅科试一等二名,调赴南菁书院肄业。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恩贡。^①朱昌鼎酷嗜小说,尤爱读《红楼梦》。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曹雪芹所撰《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傅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几九百种,尤熟精《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经字少画,即为红也。朱名昌鼎,华亭人。^②

朱昌鼎著有《一乐居文稿》、《屯窝诗稿》。

朱世豪

光绪十八年(1892)

白毓崑 (1868—1912),字雅徐(一作雅雨),号铕玉。通州人。祖、父均为塾师,学界名流。毓崑十八岁入学,后肄业南菁书院,治古学,专攻地理。《县志》称:“诸生,尝怀挟奇策,慨然欲有所为于四方。及宣统季年之冬,遽只身说滦州军,欲以应武昌,而要约南军蹕海袭据山海关,用以速共和之成,遂遇害。其族侄作霖更多艰阻,得其尸以归,邑人葬之于狼山,欲以媲古烈士曹项,然识与不适,莫不惜其才,以为死此,未足为毓崑壮也。毓崑幼颖妙,能强识,其大父钟爱之,日为杂说故事,每以意论断,惊其座人。既长,入南菁书院治古学,嗣入南洋公学师范院,就聘于澄衷学堂数年。北游天津,任北洋女子师范及法政各校教习,所至生徒悦服,人人自以为得良师。与桃源人张蔚西创地学会,刊行杂志,学者宝之。顾毓崑之意,

^① 朱昌鼎庚寅科恩贡硃卷,见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

^② 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册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92页。

既习于北方，尤爱其风气刚劲，谓其人足与有为，遂卒以此殒命。”^①白执教于北洋法政学堂时，李大钊是其学生。白就义前，赋诗一首：“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气志相连。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民国肇建，赠白毓崑陆军上将。白毓崑任教北洋法政学堂时，李大钊是其学生。

白作霖 字振民，通州人，白毓崑族侄。白在南菁书院时，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同学。有《遁人解》、《释歆》、《释说文牛马字义》、《祖述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进南洋公学师范院，又与吴、钮等同学兼同事。由于吴、白等人作风新派，与时任南洋公学总理的沈曾植发生冲突，沈曾植与盛宣怀的信中提到此事：“学生私会，蟠结甚牢，教习为之魁。前所辞退之白作霖，则执牛耳者也。”^②二十天后，沈又在另一信中说：“公学二班生为吴、白二教习煽惑，私自去者三四人，在者亦扰扰不安，生事相继，监起居与帐房皆为所困。”^③白不久离开南洋公学，即执教于澄衷学堂。白与胡适之兄为南洋公学同学，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读书。胡适回忆：“我进的第二个学堂是澄衷学堂”，“这时候的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总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学，他见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劝我进澄衷学堂。光绪乙巳年（1905）我就进了澄衷学堂。”胡适认为，自己虽在澄衷仅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对白作霖管理学校的方法大加赞赏：“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因为考试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故每个学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这种编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现在办中学的人参考的。”但不久，胡适就与校方发生了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④胡后来进了中国公学。白作霖不久也离开了澄衷，北上京师，充京师译学馆提调，

① 民国《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

②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十九日（1901年12月29日）沈致盛函。

③ 据《年谱长编》，此函写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九日（1902年1月18日）。

④ 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75页。

内阁中书。入民国，任教育部佥事，转任视学。

白作霖翻译过不少有关教育和法学的西方著作。他于光绪辛丑、壬寅间将日本人著的《各国学校教育制度》译成中文本，大概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比较教育的译作。白作霖又将日人寺内颖之《各科教授法》与儿崎为槌之《小学教授法》，合编译成《小学各科教授法》一书。他还将美国人古德诺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比较行政法》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京译书社出版，一百年后，该白作霖译本被列入“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月重刊。

曹 鋈

曹 铨 字衡之，无锡县人。光禄寺署丞銜。无锡师范学堂教员。民国年间，曾任教于无锡国专。

曹元达 字花农，吴县人，元忠胞弟，苏州府学庠生。绩学孝行，不幸早逝。著有《白华阁文集》、《唐本说文考》。^①曹元忠曾对南菁学友张锡恭说：“吾弟元达，字花农，禀性最纯，吾父尝病亟，吾弟刲股以进，吾父病良已，而吾弟遂得疾，因以不起。”言已，辄呜咽。^②

陈葆生 宜兴县人，陈其年之后。善诗文，游幕在外，不废吟诵，有《独学庐诗》、《梁园集》，杨寿枏为作序。

陈 煦

陈玉璘 字君佩，靖江人。

丁国华

韩保徵 丹阳县人。有《盈胸演代》一卷，刻入溥良所编《南菁札记》，光绪二十年江阴学署刻本。

何允升

胡常惠 字仪鰲，华亭县人，“少以诸生肄业学古堂，研求训诂，博涉文史，所为文，散不逮骈。已游学日本，颇主种族革命，归为学校教员。敦笃质厚，有长者风。”^③著有《仪鰲漫稿》。

① 曹元忠：《甲午乡试卷》。

② 张锡恭：《曹母马太夫人八十寿序》，《如茶轩续集》卷二。

③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案：《小传》作“胡常德”，与丁传靖合传。

蒋元庆（1867?—?）^①，字志范（一作子蕃），号鯽楼，常熟县人。其为学也，贯穿百家，经学尤为深邃，年轻时能背诵十三经注疏。在南菁书院，有《先心退臧于密解》、《申两郑执牛耳说》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又有《论语好解小慧申鲁读》、《说文始一终亥说》、《书冯林一均赋议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蒋元庆说经，汉宋会通，独抒己见，学政龙侍郎评定为全省经学第一，选登丁酉科拔贡。明年戊戌（1898），应贡入都。据蒋自述，“值翁师相罢官，朝考已高列，保和殿覆试除名，传闻某权臣诋为翁之同乡而摈除也。回到南菁，先学长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归国，福建学政秦侍郎延聘襄校试卷，遍识闽中人文。”^②后回家乡办学务，因“新旧不和，自咎临事卤莽”，“猝被拳殴”。旋任教于“江北师范学堂”，又转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约两年。调入学务公所，升科长。江苏巡抚“保送进京，考授京官，签分学部”，蒋即“乞假回籍”。入民国，家居，后任教上海同济大学约二十年。抗战爆发，曾一度入“自治会”，然“仅视力所及者，检点图书馆存籍，清点文庙彝器，修葺损坏学宫”。蒋不久“立即悔悟”，及早脱离。光复后，因蒋“未为伪官，不起诉”。

蒋元庆经学湛深，且多才多艺，李猷记常熟书画家，称蒋“讲古文，风趣横生，自比于长沙叶德辉，盖好冶游，好作对联，意颇相同也”。“才思敏捷，撰白话滑稽对联顷刻成联，每每令人喷饭，渠则引为笑乐。精研《说文》，故写篆书，其体不名一家，然合经说，从无错误。行书自谦不佳，不为人书，然笔札精雅劲敛，因多写篆书故，用笔在吴清卿、杨濠叟间。先生以经学著，故作书少，流传不多。”^③其著作《读小戴礼卢植注日记》、《读尔雅日记》有学古堂刻本，《后汉侍中尚书涿郡卢君年表》、《鯽楼烬余稿》有钞本。

李 达

李光祖

李汝霖

李永年

厉钟麟（1865—1937），字玉甫，号板桥老人，丹阳县人。光绪二十九年

① 案：据蒋元庆《鯽楼老人自述》：“岁在庚寅，老人年八十四矣。”则蒋之生年似为 1867 年。卒年不详。《自述》附《鯽楼烬余稿》卷末。

② 案：据《自述》，蒋虽选丁酉（1897）拔贡，明年（戊戌）入都应试，却因翁同龢开缺回籍，遭牵连而未授官，仍回南菁肄业，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福建学政秦绶章学幕，才离开南菁。秦是嘉定人，客寓苏州，秦任福建学政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二年（1906）。蒋后考授学部京官，已在丁酉拔贡十年之后，时在光宣之间也。

③ 李猷：《抗战前常熟书画家略述》，台湾《传记文学》第 17 卷第 5 期，1970 年 11 月号。

(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热心公益,募捐建桥。民国年间,赞助辟公园、办电厂等公共事业。参与《丹阳县续志》修纂。

刘恩棠 字树嘉,通州人。

潘昌煦 (1873—1958),字春晖,号由笙,一号芯庐,元和县人。肄业南菁时,有《诗序鹿鸣群臣嘉宾四牡皇皇者华使臣说》、《汉儒编辑礼记自大小二戴外复有几家试详考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赴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任法制局参事,大理院推事兼庭长,代理大理院长。后离开政界,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潘著有《芯庐遗集》。潘的书法宗欧、虞,极负盛名。

钱人龙 (1868?—?),字卧公,号幼逵,一号友夔。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官安徽舒城县知县。民国元年,曾任江苏奉贤县民政长。著有《读毛诗日记》(学古堂刻本)、《说文经字考疏证》。

钱同寿 (1867—?),字复初,号敬持,华亭县人。松江府学生。肄业南菁时,有《申毛传或肆或将义》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清末,曾供职礼学馆,与南菁诸友修《大清通礼》,马其昶称其“君子人也”。^①入民国,以遗民自居。著有《待烹生文集》^②,后与张锡恭《如茶轩续集》合刊为《云间两徵君遗集》。

商文伟 靖江县人。

石 铭 (1869?—?),谱名丰瑞,字金名,号怀觐(一作怀瑾),溧阳县人^③。肄业南菁时,有《端午不用午日》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科乡试举人。

宋宝渊 字冶卿,江阴县人。

孙 揆 阳湖县人。清末和民国时期,编有多种音乐、体操等教科书。如与徐传霖合译日本人田村虎藏所著的《中学乐典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编《表情体操法》(又名《唱歌游戏》),收入《强国丛书》中。还编有《体操讲义》等教学用书。

孙宗弼 字伯南,元和县人。学者,教育家。曾入湖南学政江标幕。返乡后任

①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宣统初年朝士》,胡“辛亥进京时,访友于马通伯”。马称“华亭钱征士同寿”等三人,“皆君子人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7—128页。

② 案:钱自称,自辛亥后,“吾辈今日真《西铭》所谓‘无所逃而待烹’者”。

③ 《学友录》称丹阳,误,径改。见石铭:《癸巳科乡试殊卷》,又见吴稚晖:《壬辰札记》。

苏州府中学堂的国文老师,学生有顾颉刚和叶圣陶等。顾很仰慕孙,曾向孙借过姚际恒的《伪书古今考》,该书对顾今后治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清末,孙宗弼曾任苏州存古学堂经学分教,总教为曹元弼。顾颉刚欲追随孙师,便投考存古学堂,因答卷语斥郑注而未取。^①

汪兆元

王徵泰

吴思慎 通州人。

许同范 (1869—?)^②,字文伯,许珏长子,无锡县人。肄业南菁时,有《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说》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乡试副贡生。与吴稚晖、孙揆均、俞复等为同窗好友。清末,出使俄国参赞銜商务委员。民国,署理外交部庶政司司长,先后派驻日本神户总领事、朝鲜新义州领事、仁川领事,调任驻苏联庙街总领事。

徐国俊

徐士元

杨崇德

杨庚

于贻庆

张鼎荣

张福保

张懋修

张毓英 (1870?—?),谱名本佑,号继斋,别号得魁。青浦县人。光绪壬寅(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

周钟华

朱骏

朱念椿

朱树禧

朱元勋

邹兆麟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② 据《迁锡许氏宗谱》,许同范生于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869年1月8日。

光绪十九年(1893)

曹家达 (1866—1937),字尹孚,又字颖甫,晚号拙巢,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悬壶海上,不乐仕进。曹为近代名医,属经方学派,在上海行医时,曾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弟子众多。工诗善画,尤擅长画梅。丁丑,龙华战事起,挈眷返里。邑城沦陷后,寇入其家,以骂贼不屈死。著有《气听斋诗词集》、《汉乐府评注》。其已刊行者,为《曹氏伤寒论》、《梅花百咏》。又长于骈体,胎息汉魏六朝诸家,惜多散佚。癸未(1943),陶社辑《丛编》甲稿,仅得七篇,名之曰《气听斋骈文零拾》。^①曹遇难后,南菁同学蒋维乔为曹作传,现录《曹颖甫先生传》如下:

江阴昔有南菁讲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业于此,或深通经术,或擅长词章。其为人,或笃厚淳谨,或风流放诞。乙未年(1895),余与颖甫先后入南菁,而余以“狂”名,颖甫以“憨”名,人皆呼为“曹憨”,颖甫曰“善”,亦辄自称“曹憨”焉。余之初遇颖甫也,彼此眼高于顶,覩面不语。既而在宜兴储南强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强温文倜傥,同学中皆乐就之,与余尤称莫逆。南强指之曰“此曹颖甫,诗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憨耶?”颖甫则应曰:“是也。”余斯时因养病习七弦琴,略知数引,颖甫闻琴,大喜,每日至余处静听之。尝云:“曹憨向不肯下人,今于君乃心折矣。”颖甫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壬寅(1902)登贤书。科举废,即绝意进取,征选知县不应。常藉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画似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洒落,含道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焉。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

余于癸卯(1903)离南菁赴沪上,即与颖甫音问隔绝,但闻辛亥革命时,颖甫以巾裹发,不肯去辫,乡人有谋用利剪剪之,则乘夜遁至沪上,久之方归。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为江阴县代表。颖甫于某,论亲则姻叔,论谊则业师,闻之,突诣某所,诘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贿,而作此无耻之事耶!我江阴人之颜面,为汝剥尽矣。”某大惊,急曰:“无此事,无此事。”

1927年以后,余息影沪渎,则颖甫已悬壶市南,而托迹于韩康矣。盖颖甫

^① 《陶社丛编丙集·陶社题名录》,陶社刊行,1944年。

之治学也，不深造则不休，中年肆力于医，乡人亦莫知之。及其应世，凡他医所谓不治之症，颖甫辄着手愈之，且于富者有时不肯医，于贫者则不取酬，且资其药。颖甫之同门友庄翔声有妾，患盲肠炎，颖甫居沪之南，庄居沪之北，路远不便，颖甫则自雇汽车，载其妾以归，为之朝夕诊视，病已十去八九，而患者有嗜好，讳而不言，致未固其元气，病遂革。家人谋归之，颖甫止之曰“不可”，卒歿于其家。殓殮既毕，颖甫亲登庄君之门，叩首谢罪，其义使之行类如此。孟河丁氏，世业医，创医校于海上，延颖甫主讲座，虑其高傲不可曲也，颖甫乃怡然就之。其授课也，携水烟筒，纸媒一把，且吸且讲，以《伤寒》、《金匱》深文奥义，抉择隐微，启迪后进，学者亲炙其绪余，咸心悦诚服，而忘其举动之离奇矣。颖甫年七十，曾开筵祝寿，与余过从之密，如在南菁时。

“八一三”变作，即返里，久无音耗，数月以后，其婿来沪，则言颖甫已骂贼死矣。先是，江阴城破，有敌酋入其室，颖甫尚与之笔谈，未有他变。及敌兵蜂拥而至，辱及妇女，颖甫则肆口大骂不止，敌举枪毙之，且剖其腹，呜呼！烈矣。余欲为文传之，以未悉其事状，久而未就。今始得其崖略，故著于斯篇。颖甫姓曹，讳家达，一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江阴人。著有古文、骈文，《气听斋诗词集》、《梅花集》、《伤寒发微》、《金匱发微》，后三种已渍行。……^①

陈崇牧 字念慈，江阴县人，名诸生。壮年游幕外省，晚设帐怡园。工词章，惟性疏懒，诗不甚作，作成后，复随手弃去为可惜云。^②

陈晋 字夕康，泰兴县人。民国年间，生活在山西太原。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向母校南菁中学邮赠书籍十二种，计三十九册，内有陈晋自著三种：《说文研究法》、《龟甲文字概论》（一名《契学概论》）、《尔雅学》。其他大都为晋人著作，如阳曲傅山青主《霜红龕集》（四十卷八册）等。^③

陈懋诜 字桂一，元和县人。曾入南洋公学肄业。

丁宝书（1865—1935），字云轩（一作芸轩），号懒道人、幻道人，无锡县人，丁福保之兄。光绪十九年（1893）恩科乡试副贡。据说，他为应付科举考试，曾熟读八股名文三千篇。还手录当时广为流传的蔡元培所做的“怪八股”，由其友杜嗣程刻入《通雅集》中。丁宝书还是个画家，笔下之花鸟虫鱼，栩栩如生。戊戌变法期间，

① 江阴政协《江阴文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10月。

② 《陶社题名录》。案：怡园主人即江阴祝丹卿也，陶社主持人。

③ 见《南菁略史》附“赠书志谢”启事，南菁中学民国二十四年编纂。

在家乡与吴稚晖、俞复等人创设学堂，自任国文教习。又编写蒙学教科书，负责书中的插图。后又在上海与廉泉、俞复、陈育等创设文明书局，兼任书局附设的小学教员。他临摹古今名画，成《古今画苑》一册，由文明书局出版。他临摹的另一画集《张子祥课徒画稿》则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年以后，研究佛学，写成《大乘起信论解》。另著有《北溪字义心解》。其诗画作品则有《芸轩画萃》、《丁芸轩题画诗集》。

费彬璘

高济生

葛文钟

顾鸣歧 字韵梧，通州人。

韩鲁东

韩兴东

胡常忠

季光瑾

江国墀

姜世纶

姜毓琦 字萼楼，通州金沙场人。

姜毓芝 字兰亭，通州人。

蒋绍棠 通州静海乡人。

李从龙

李联珪（1872—1927），字颂韩，镇洋县人。问学于同乡唐文治。“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廩饩，试辄冠其侪。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先后受业于吾娄王先生紫翔、定海黄先生元同之门，声誉藉甚。继又受业于吾友吴县曹君叔彦，曹君大器之。颂韩遂从事于三礼之学，深有所得。”后“纳贡为郎，签分法部主事”。唐文治主政商部时，李联珪“调任商标局，并佐崇文门税务，皆井然有序”。唐文治出长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李被聘为该校国文科长，任教多年。^①著有《养庐诗文稿》、《国策编年读本》评注本。

林珑文

卢典 字心简，江阴县人。

^① 唐文治：《李颂韩家传》，《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七。

陆锦燧 (1864—?),字寄农,号晋笙,长洲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科乡试举人。据张一麇回忆,陆此科中举,完全凭借了张的“庇荫”。原来,张当年坐馆陆氏,同时应苏州各书院月课,某次月课题为“子曰巍巍乎”两章,张作两卷,皆超等而矮(超等六十名,在下半段者名曰“矮超等”)。而张坐馆的学生之一,便是陆锦燧的侄儿。乡试时,陆锦燧便以张作课艺为夹带,碰巧头场首题就是“子曰巍巍乎”两章,于是,陆就全抄张之原作一卷,张一麇之弟张一鹏,则抄其兄原作之另一卷,结果两人此科乡试都中。^①陆锦燧曾作宰福建崇安、山东济阳。陆氏中医世家,民国年间,陆锦燧便脱离政界,悬壶海上。陆医术高超,著述颇丰,辑著有《景景医话》等多种。然对西医持排斥态度。年轻时所作《读尔雅日记》,有学古堂刻本。

陆士奎 (1868—1917),字耀星,号平甫,一号涤如,无锡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乡试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授知县。曾任安徽英山、桐城、凤阳等县知县。著有《颐萱堂诗文集》。

秦世超 字元甫,通州人。有《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说》、《诗序鹿鸣群臣嘉宾四牡皇皇者华使臣说》、《五雀六燕赋》刻入《南菁文钞二集》。

秦曾康

沈恩孚 (1864—1944),字信卿,号虚舟,又号葶梧。籍吴县而居嘉定。幼颖异,博览群书。年十五,入吴县学。年十八,授读于沪,肄业龙门书院,与袁康、李钟珏、姚文枏齐名,卓然负时望。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后任宝山县学堂总教习。龙门书院改师范学校,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任监督。主持江苏教育总会,发起全国教育联合会,推为首席。辛亥革命,“进言于苏抚程德全,请首先响应”。^②江苏独立,任民政司副司长。民国六年,简湖南教育厅厅长,辞不就,说:“国家患求官之人多,社会患服务之人少。”与黄炎培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其间,被选为上海市议会议长,任职十年之久。筹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负责董理上海同济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创办鸿英图书馆。沈逝世后,其婿胡厥文哀集遗著,为编《沈信卿先生诗文集》。

孙覲墀 字季瞻,无锡县人。

孙绍璟 字与可,通州人。

① 张一麇:《古红梅阁笔记》“丙戌会试至癸巳超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② 蒋维乔:《沈信卿先生传》,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

唐继盛 字仲芳，吴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举人，官法部主事。^①

陶世凤 (1852—1933)，字端翼，号端一，金匱县人。光绪十五年(1899)己丑恩科乡试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会试第一名进士(会元)，朝考后钦点主事，签分兵部。调吏部，旋调度支部。官京曹时，连遭父母丧，回籍守制，期间，任东林学堂总理。辛亥后归乡，闭门读书，不问政事。

童斐 (1865—1931)字竹如，又字伯章，宜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清末民初，任常州府中学堂国文教员、学监，后任该校校长十二年之久。二十年代，应张寿镛之聘，赴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童斐精通音乐，教授得法，弟子深受其益。钱穆晚年回忆常州府中学堂童斐教授国文课事：

又余班上国文先生为童斐伯章老师，宜兴人，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而上堂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

钱穆又回忆童斐传授昆曲事，称当时“学校课余特设游艺班，分为多组，令诸生自由选择”，钱选修昆曲：

由伯章师教导，笛、笙、箫、唢呐、三弦、二胡、鼓、板诸乐器，生、旦、净、丑诸角色，伯章师皆能一一分授。……(余)自后遂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呜呜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年逾七十，此好尚存，实为余生平一大乐事，则乃伯章师当年之所赐也。

钱穆受童斐老师影响，本来还想“以所了解于中国文学之心情来改治戏剧”，准备“观赏当代平剧百出，为之发挥，著为一书，借以宣扬中国文学传统部分之内蕴。”然而因“离开大陆，亦失去机会”，钱穆不禁感叹道：

伯章师为余启此机，而余终未能遂此业，思及每为恍然。^②

童斐在光华大学，除国文外，仍教授音乐戏曲课程，尤重昆曲。其间，著有《中乐寻源》一书，该书受到吴梅的推崇。钱基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说：

宜兴童斐伯章，亦以文人而工度曲，引商刻羽，细校豪芒，纂有《中乐寻源》

^① 民国《吴县志》卷十五《选举表七》。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5—66页。

一书，备论八十四调之源，乐器弦管之法，以及聆音作谱之方。复取古代旧籍，一一为之厘订，上自《关雎》，下至唐诗、宋词、南北曲，灿然毕具。梅（案：吴梅）读之而称曰：“苏祇婆琵琶入中国，适当雅乐亡佚之时，四丹二十八调，为后世言燕乐者之祖。惟七角调名，大抵居吟宫之位，非角调之正声，尝疑而不得其解。及读斐所著论琵琶借角之说，始悟南北词之角调，皆沿琵琶旧称，而古时七角正音转多堙晦。得斐一言，而深谷峭壁夷为康庄，不亦大可快耶？昔凌氏（案：凌廷堪）《燕乐考原》、陈氏（案：陈澧）《声律通考》所论金元乐名之异同，宫调正犯之要妙，多有前人未发者。顾释理而遗器，审音而略谱，未能如斐之明且备。”^①

童斐还著有《虚词集解》一书，是他多年从事国文教育研究成果的结晶，杨树达编纂《词铨》时，也将此书作为参考而加以利用。^②

童斐是位成功的教育家，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家钱穆外，语言学家吕叔湘、刘半农，音乐家刘天华等，都是他在常州中学堂的及门弟子。

王仁业

王锡辰 吴县人。

吴元熙

吴增元（1870—1961），字汀鹭，晚号馥叟，江阴县人。廪贡生，分省补用县丞，保升知县，赏戴花翎。在南菁书院肄业十年。因恪守南菁书院章程，坚持认真撰写日记，而得到山长黄元同赏识。^③有课作《论英脱构衅事》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吴自光绪二十九年，投身实业、教育。先与邑绅祝廷华等创立华澄布厂。后与江浙沪富商合资创立利用纱厂，机器均由英国进口，为当时最新颖者。规模达一万二千锭。吴增元又捐资与地方士绅创设辅延小学，数年后，在校学生已超千人。辛亥革命，清社既屋，被推为江阴军政府民政部长，实邑宰也。民国年间，又创设电厂，创办电话局，在长江边筑趸船码头和煤栈，督修澄（江阴）锡（无锡）公路，集股创办澄锡汽车公司、澄锡轮船公司。吴增元还出任南菁中学的校董会主席。留美学者王伊同颂扬吴氏对家乡的贡献：“先生之于吾澄，兴学校，建实业，他人所不为，先

①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② 杨树达：《词铨·序例》称己书“上采刘、王，下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之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吴汀鹭：《八十回忆录》，《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93年10月。

生挺身为之，义之所在，倾囊以赴，所以利群者甚溥。”“先生诚人杰矣哉！”^①

夏雨人

谢起凤

徐安仁 字子山，号樵孙，通州人。有《汉十月大饮礼考》、《韩丞相论》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又有《仪礼篇第考》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许树枌（1861—1941），字白也，别号情荃，又号画隐。如皋县人，岁贡生。许树枌“少负才性，有驰骋当世之志，走马击剑，因自号曰江东说剑生”。“调入江阴南菁书院，见器于山长黄元同。南菁为大江南北名士渊海，黄氏经术盖世。先生交游广，德艺益醇。通经致用，则大肆力于政教、兵农、食货诸事。科举废，长如皋安定小学，教习师范、中学，兼学监。又襄办本县教育、农政、水利，总董城自治会。清社既覆，参议地方军政，长县署警务、实业，课督工厂，修县志，钜细毕举。”许树枌于乡邦事业，与张謇、沙元炳等地方士绅交相倚重；而诗词、金石、书画、则与樊钟祥、陈三立、章一山诸海内名流，豪素往来无虚月。“端居一室之中，艺交遍海内，皆有时名，负绝艺。”许“晚岁，书画精绝”，又“不屑意当世，益笃念故旧，尤惓惓往岁南菁书院诸同舍生。”吴江金松岑于许树枌为南菁后进，自称“余生晚，肄业南菁之日浅，先生辗转达书问，申之盟好”，虽遭丧乱，“顾时时倦念故人”，“音驿渐通，复辗转与余通书问，隔江相劳苦”。金称许树枌其人“须鬓潇洒，如魏晋间人，而服膺儒术”，“其于文艺盖天赋也，要其成名当在书画”。^②而江都董玉书也说许“年老，以诗书画神交天下士，书札往还，邮简如织，海内无不知有‘画隐’者”，又称许“著有《读五千年未见书楼丛谈》、《画隐院文赋诗词钞》、《劫余吟》”。^③

徐训

严达

颜伟

杨百城

杨百朋

杨名浩 靖江县人。

姚鏞 通州静海乡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恩贡。

① 王伊同：《吴汀鹭传》，《江阴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98年10月。

② 金松岑：《文清先生许君墓表》，《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2—1094页。

③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姚祖泰（1866—1928），字安甫，晚号半轩，阳湖县人，世居阳湖北夏墅镇。幼好学，年十八，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乡试中式副榜。在里教授生徒，讲解字义，必根据小学，连类引申。科举废后，在家创办学聚两等小学，又主该乡钟英小学教务，均能尽心启迪。嗣迁居城内，开门讲学，师事者众。教人首重立品，从游之士，均无浮嚣卑陋习。书法宗颜、柳，酒酣疾书，笔力遒劲，求者益夥。卒于民国十七年，享年六十有三，著述颇富，均无梓行。^①

于文凤

俞复（1866—1931），字仲还，无锡县人。在南菁书院肄业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故俞于经世致用之学钻研甚深，其同学吴稚晖说：“仲反今以黄翼升《长江图》遍阅，又以胡文忠《地图》遍阅，戚继光《兵书》细看，殆所谓善摹风气者耶？”^②有《蚕室近川说》刻入《南京文钞》。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与吴稚晖等人创办三等学堂。又与廉泉、陈仲英等人创办文明书局于上海，任经理。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推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无锡光复，俞复出任民政长，数月后离任。在上海成立“灵学会”，并出版《灵学杂志》。发起成立“少年进德会”，参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民国十六年（1927），任无锡县县长。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晚年目盲，遂退隐不仕。俞复与吴稚晖相友善，吴劝之学方苞，“故仲还有所作，辄情诚意挚，受望溪之影响甚大焉。”“及稚晖贵显，绝不往访，稚晖造其门，亦不答拜”，人询其故，曰：“贵以访贱，无伤于贵；贱而访贵，显见不安于贱，而品斯下焉。”其“学养之富，道义之高”，为人称道。^③俞复工书法，擅颜体。

张 燮

张一麀（1868—1943）^④，字崢角，号仲仁，原号颂仁，元和县人。父张是彝，光绪庚辰（1880）进士。张一麀于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乡试中副榜第二名，时年十五，该科监临为两江总督左宗棠，称“此小子将来当有出息”。十月，按惯例到江阴谒见江苏学政黄体芳，黄此时已决定奏设南菁书院，便对张说：“汝可以选入院中

①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杂著》，《锡报》，第148页。

③ 《郑逸梅选集》第四卷，“俞仲还盲目奇闻”，第471—472页。

④ 案：据张一麀《乙酉顺天乡试硃卷》自填履历，生于同治丁卯（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历应为1868年1月22日。

读书。”然明年张因跟随父亲北上,不及入院。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顺天乡试中举。父时宦直隶,一麈随侍正定县。己丑(1889),赴京会试不售,返乡,教馆授读,并应课苏州各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戊戌变法,张一麈仿京师强学会,亦在家乡组织苏学会,并创设中西学堂,研求新学。庚子(1900)应四川学政吴郁生之聘,入四川学幕两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闰五月,入京师应经济特科廷试,取一等第二名,以知县发往直隶补用,自此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北洋幕府八年,张自称“凡旧幕友所不能办之新政,几无役不从”。^①

辛亥革命,江苏光复,张应都督程德全之邀,南返任江苏民政司长。寻又北上,任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深得袁世凯信任。袁欲称帝,张入谏,反复陈说利害,并辞机要局长职,袁仍授张为教育总长。任内,推行注音字母不遗余力。云南护国军起,袁世凯急忙自废帝制,其废帝制文告,仍出于张一麈手笔。据说,袁死前曾对张一麈说:“你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你。”^②后军阀混战,张一麈在家乡“以江苏父老之托,奔走斡旋,虽苦口婆心不足以消弭凶顽黷武之祸,而在江南一带,群凶似犹有所顾忌”。日寇入侵,张在苏州欲组织老子军,激励民众抗战,且谓:“既有童子军,何不可有老子军以协助抗战乎?”^③苏州沦陷,张一麈拒任伪职,乔装老僧出围,由上海、香港转赴重庆,出任国民参政员,“秉持正义,意态坚定”。^④民国三十二年,逝世于重庆,国民政府挽以“江左耆英”之额,蒋介石为制祭文,备致尊崇,黄炎培为作传。遗作《心太平室集》,顾廷龙独任编校之劳,唐文治为作序,末曰:“凡百君子,读君之文,慕君之节,必有仰高山而景行行止者已。”^⑤

张一鹏 (1873—1944),字荀颂,号云抟,^⑥元和县人,张一麈之胞弟。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举人。后与陈懋治等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肄业,未数月即归,与兄一麈创设小学堂于唐家巷。后赴日本留学,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归国后,历任法部主事、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云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也有对张一鹏等之青云直上颇不以为然者,如其南菁同学陈希濂曾写诗嘲讽:“记得东瀛求

① 张一麈:《古红梅阁笔记》,“初入北洋幕府”,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②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侧面看袁世凯”,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0页。

③ 张一麈:《古红梅阁笔记》,附录:汪懋祖《追念江左耆英张仲仁先生》,第82—86页。

④ 张一麈:《古红梅阁笔记》,附录:梁漱溟《纪念张仲仁先生》,第71—72页。

⑤ 张一麈:《心太平室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

⑥ 案:见张一鹏《癸巳恩科乡试硃卷》,名一鹏,字云抟,义出《庄子·逍遥游》。凡关于张一鹏的资料有作“云博”、“云搏”者,似均误。

学回，居然平地一声雷。速成法政初归国，高坐堂皇判事来。（游学东洋有速成法政而为法官者。）”^①民国年间，张一鹏任江西财政厅厅长，北洋政府署理司法部次长、代理司法总长。后在上海开业律师，推举为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四十年代，张一鹏曾任日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后视察监狱时感染斑疹伤寒去世。张一鹏求学时著有《读毛诗日记》，学古堂刊本。后编过《普通教科书》，还译有《刑事诉讼法》，著有《汉律类纂》等。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是其孙婿。

张荫谷（1874?—?），字渠升，一字渠孙，号麻亭，通州静海乡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

章锡奎（1869—?），字仰苏，一字松盒，号星颢，又号席帽山农，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河南候补知事，署理汝宁府通判。工诗画，与赵清瑞冰盒、谢鼎镕冶盒有“江上三盒”之称。著有《松盒诗抄》初、二编行世，馀待梓。^②

张之彦 字籽岩，泰兴县人。

赵翰渊 字楚书，江阴县人。

郑凤仪

朱若琮

朱永玮

周德馨（1867?—?）字兰佩，一字丰玉，号仲芬，又号俊公，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优贡。官湖北知县。工书画，尤善画兰。喜欢收藏古钱、古镜，颜所居曰“千镜万泉楼”。

周在镐 字颂甫，江阴县人。

光绪二十年（1894）

蔡俊镛（1876—?），字韵笙（一作云孙），元和县人。苏州府学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时年十九，才气横溢，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多年，有《各国产煤铁考略》刻入《南菁文钞三集》。曾官河南知县。丙午（1906）秋，创办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俗称草桥中学），苏州教育会推举蔡为第一任校长。

① 陈希濂：“记得”诗——咏清末民初之苏州第七十七首，《苏州地方志·志书博览·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案：诗中虽未点名，但锋指张一鹏，显而易见。

② 《陶社丛编丙集·陶社题名录》，陶社铅印本，1944年。

蔡其苏 字仲和，江阴县人。

蔡文森（1872—1948），字松如，一字处默，无锡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入学。二十年（1894）附课南菁。“戊戌（1898），肄业南菁书院，山长丹徒丁叔衡先生立钩，深契之，拔武进赵君闾及文森为正、副学长，奖掖倍至。”^①有《鲁两生论》、《东晋国势论》、《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沿海形势今昔异宜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游日本两年，入普通预备学校，选补科学。癸卯（1903）回国，与弟蔡文森和杨荫杭等人在家乡组织理化学会，聘日人为讲习，自己做翻译，为邻省培养了众多小学理科教员。曾任县立师范学校校长一年。丁未（1907）由胡雨人介绍，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编译员，自此服务商务印书馆十六年。参与编辑《辞源》、《新字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蔡文森编译了《十六国议院典例》等书。壬戌（1922），投身实业的兄长蔡文鑫，因新开设庆丰纺织公司，而原九丰面粉公司管理乏人，蔡文森只得辞商务书馆事，返乡主政九丰面粉公司。然弃学从商，实乃无奈之举，非蔡本愿，蔡自述：“予既弃儒服贾，寸长尺短，各有所施。商人机诈，雅非所习。凿圆枘方，深苦扞格。南郭之讥，无所于道。”抗战爆发，避难于上海，与唐文治、丁福保诸南菁学友时相过从。

曹赞勋 字翼臣，无锡县人。

曹元吉 字谦六，通州人。

陈霖溥 字亦屏，无锡县人。

陈名翰

陈希濂（1867—1945），字吐玉，号麟书（一作聆诗），又号琢孙，元和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曾署宝山县训导。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任江阴县学教谕，丁艰，服阙后于宣统二年（1910）再任。辛亥革命后，陈希濂失去官职，返回苏州，受晏成中学、东吴大学之聘，任教国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担任吴县公款公产处副主任、吴县救济院副院长等职，其间著有《吴门百咏》、《美人百咏》等诗集，而其《记得》七绝八十二首，咏清末民初之苏州，则是地方志之绝好史料也。经济学家茅于軾是其外孙。

^① 蔡文森自述，《锡金游岸同人自述汇刊》。

程肇基 (1869?—?),后改名适,字茂东,号肖琴,一字寤淑,别号臞仙,荆溪县人。有《鲁两生论》、《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禁黄金出口议》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考选安徽知县。著有《蛰盒丛钞》。

承 祜

达 孚 (1874?—?),字尹旁,号羲中,通州人,达李胞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中式副榜,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

达 孝 通州人。

方名甲 字冠臣,江阴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恩贡。

冯 澂 (1866—?),字涵初,号清渠,通州人。光绪辛卯(1891)录取南菁书院住院生,在书院肄业十二年,壬寅(1902)离院。其间,兼应宁波辨志、上海求志、格致各书院课。性喜格致之学,在院研习中外天算。又通过书信往来,得宁波辨志文会的算学掌教黄炳屋教诲尤多。清末民初,在泰州、南通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后,冯以清遗民自居。冯著作繁富,有《春秋日食集证》、《算学初稿》、《光学述墨》、《矿学述管》等。冯在学术上持“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格致之学,在中国的古代著作中都能找到源头。

葛 璜

葛元勋

龚铭凤

顾栋臣 (1869—1913),字眉良(一作枚良),号衡斋,无锡县人,顾宪成后裔。自小家境贫寒,依母十指针蒲糊口度日。其父充军新疆,死于戍地,顾乃间关万里,扶柩归葬。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国文教习,两年后,调学部,参与制定各级学堂章程。补实业司主事。创办算学研究会。升补普通司员外郎,兼政治学堂算学教习。宣统元年(1909)任宪政筹备处总办。次年升补郎中,官学部普通司司长。任资政院议员。民国建立,选为众议院议员。著有《算草》、《算学讲义》、《求恒斋日记》等。经济学家陈翰笙为其女婿。

顾倬基 (?—1930),字桓託,通州人。擅书画,负盛名。

顾思永

韩 珪 吴县人。曾任苏州存古学堂教习。

韩庶徵 (1866?—?),字修甫,丹阳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

胡葆元

黄炯寿 子冈，通州人。

江泽远

姜定澍

蒋宝丰 (1862? —?)字寿丞，号谷年，金匱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

金谷春 (1866? —?)，字煦亭，号蓉谿，盐城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署山东峰县、曹县知县。

金 镕

刘承均 靖江县人。

刘嵩泉

李声希

李元蘅 字亦杭，通州人。曾赴日本留学，后主事南通小学。

孟效邹 江阴县人。

潘维鳌

秦树隍 (1862? —?)，字乐庭，号凤岩，一号松石，无锡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著有《读史摘误》、《算学丛谈》。

裘昌年^① (1869—1931)，字岐伯，金匱县人。以文章书法闻名于邑中。民国年间，曾一游孙传芳幕。

任锡韩

商 序

沈齐贤 字张伯，长洲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学习。

沈维骥 (1856? —?)，字季调，号子良，别号资諒。长洲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举人。民国三年，创办苏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盛大椿

孙传骥 (1869? —?)，字启庵，号上之，又号尚志。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

^① 原《学友录》作裘昌龄，金匱人。案：龄、年义通，据《无锡名人辞典》改。

孙桂攀 字小峰，通州人。

唐棣荣 自称秦南逸叟，江阴县人。附贡生，候选训导。

陶 成

万恩泽

王福熙

王家枢 (1869—1920)，原名家槐，字卓臣(一字竹丞)，号已仲，江阴县人。王家枚胞弟。于家乡华墅镇设立养正学堂，选刻课本。宣统元年(1909)任省谘议局候补议员。提倡实业，创办布厂。

王梦榴 字丹实，泰州人。以设塾授徒为业，善书，尤精小楷，曾作书赈灾。

王世源

王兆桂

王宗浚

吴葆瑛 字惠甫，江阴县人。

吴声俊

吴增甲 字达臣，号亦愚，又号亦渔，江阴县人，吴增元胞弟。肄业南菁时，有《荀彧论》、《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进士馆毕业，奉派赴日本考察。易代后，隐居不仕，著有《亦渔诗文钞》。任江阴陶社社长。

吴佐璜 (1863—1936)，字子铭，号叔惠(一作叔渭)，无锡县人。光绪己丑(1889)入县学。曾游幕山东、东北各地多年，其中吉林新城知府高翔为其无锡同乡、南菁同学。入朝鲜釜山，助袁世凯笔札。协助开办延吉中学，兴复启秀书院。民国建立，历任吉林省署、各县科长。生前辑印《青年德育金鉴录》、《锡山先哲言行录》、《净居诗录》等行世。^①

向 瑛

徐秉成 (1866? —?)^②，字泰生，武进县人。廪贡生，候选训导。呈请注销职贡，仍归附生，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武进县学拔贡第一名。

徐友仁 字子文，通州人。

徐佑成 字涵生，阳湖县人。有《补恨楼词》二卷，乙未刊本。

①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② 徐秉成之宣统己酉拔贡殊卷，称“同治四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公历为1866年1月11日。

许士熊 (1869—1920),字梦占,一字吕肖,无锡县人。肄业南菁时,有《申虞注至临义》、《张皋文仪礼特牲少牢两篇图正讹》刻入《南菁文钞二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后赴英国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拣选知县,历充两广学务处委员,考察宪政大臣随员,邮传部科员,驻日使馆参赞官。入民国,任教育部秘书,政事堂参议,后任审计院副院长。译有《欧洲各国变法史》、《英国通典》。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其女婿。

席慰慈

许潮 武进县人。

许樾 字北荫,号少仙,无锡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优贡,官知县。

薛万英 溧水县人。

杨崇幹 字滋生,泰兴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

杨世芬 字宸甫(一作震甫),武进县人,常州府学生。^①曾主纂《花氏宗谱》十四卷,民国七年木活字本。

杨寿朴 字兰樵,金匱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

杨寿棠 字诗侯,金匱县人。

姚祖颐 (1867—1934),字养斋,祖泰胞弟,乡人称为“二先生”,阳湖县人。清光绪壬寅(1902)岁贡生。设馆教授蒙童,后主持三河口高山书院多年。颇负文名,著作有《学聚堂》等。

姚树柅

应燧

余宏淦 (1860? —?),字润书,号夔钦,一号揆卿,昆山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著有《读尚书日记》(学古堂刊本),《新编沿海险要图说》、《新编长江险要图说》等。

余鸿均

虞世英

郁馨山 盐城县人。留日学生。清末,与盛如林等创办“大冈进化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任盐城县教育会会长、教育局局长。著有《壮学斋文集》和多种化

^① 案:黄以周《经训比义》同门校勘姓名,杨世芬列入江阴人名单,字绳武。

学、农学著作。

张秉彝

张承荣 字峙门，宝山县人，岁贡生。肄业龙门书院、南菁书院，精研汉学，并从太仓唐文治习诗、古文辞。苏抚陈派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及教育事宜，旋入明治大学法政科毕业，奖举人，授七品小京官。民国初年，任本县地方审判庭主簿、候补推事。未几，调补外交部主事，署佥事。嗣随刘镜人赴海参崴襄理外交，勤劳太过，染中风症，卒，年四十七。著有《清十朝条约》^①。

张东烈 字子辉，泰兴县人。所著《代数盈胸细草》一卷，收入溥良所编《南菁札记》，光绪二十年江苏学署刊本。光绪戊戌（1897），江苏学政瞿鸿禨曾保荐张“专司格致，力求新理”。民国二年（1913）曾任广西全县知事。

张绘辰

张继良 后改名兰思，字双南，常熟县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进士，选庶吉士，改官莱芜知县。^②

张联芳

张庆桐（1872—？），上海县人。在南菁书院肄业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给知识界极大刺激，张决定弃旧改新。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入京师同文馆，选学俄文。几年后，派赴俄国留学。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其间，张将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译为俄文，出版后，分赠俄国政要、报界和文化界名流，其中包括大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迅即回信，张庆桐是与托尔斯泰通信的第一个中国人。三十二年（1906）张回国后，踏入仕途，曾以副使的身份，随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出席海牙和会。后任北洋工务局会办。民国初，任外交部特派黑龙江交涉员。后转任新疆阿尔泰办事长官，因处理兵变遭议，撤职回京。张著有《俄游述感》。

张润熙 字淦生，江阴县人。

张庶蕃 江阴县人。

张树培

张廷寿 字少槎，江阴县人。著有诗文集《独学庵集》三卷，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书后有陈名珂跋云：“先生晚年每提壶过市，垂目跬步，若不胜举足者。然

① 吴霞修、王钟琦纂：《（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十四《事略》、卷十五《艺文》。

② 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七《选举志》。

踽踽凉凉，亦不与人相周旋。乡之人每指而相告曰：‘此张仙也。’寔寔乎忘其名矣。盖其文章书画，本毫无人间烟火气，而风骨又兀傲不群，视人有若将浼焉之况。”

张文藻（1869—1937），字子惠（一作子伟），无锡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副榜。在家乡设塾授徒多年。光绪、宣统年间，任苏州东吴大学教席两年。清末民初北上东三省多年，曾往吉林任磐石铜矿职。后因直奉战争事起，由北京返乡，执教辅仁中学十多年。遗著有《庸隐庐文存》、《诗存》、《联存》等数册。^①

张翼雍

张永炜

章仁治 字挹峰，江阴县人。

章锡朋 字咏莪，江阴县人。

章振书

章钟华 字萃文，江阴县人。

赵寿椿 字鹤年，无锡县人。书画名家，尤擅山水。

赵寅恭 字协卿，无锡县人。纂修《锡山赵氏宗谱》十四卷，清宣统元年（1909）木活字本，十八册。

周学源

朱楚善（1869—1941），字子翹，一字湘颿，又字鍊盒，晚号香晚，宜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优贡。清末，任教北京清华学堂。后与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创办立达学社，曾任社长，是大同大学创始人之一。抗战期间，任上海民立中学国文主任，与在沪南菁校友屡有唱和。

朱铭忠

朱占魁

祝平治 靖江县人。

祝书根 字味三，江阴县人。

左 榘 字松樵，盐城县人。岁贡，署浙江德清县主簿。甲午战争后，随其师陈玉澍，鼓吹变法图强。入民国，任盐城学会干事，致力于地方教育。又与季龙图创办贫女教养院。

^①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

保厘东 字少浦,通州人,廪贡生。少孤贫,力学能文。然喜负责(债),无纤钜,不知所以为偿计。岁寒风雪,夫妇相慰劳,意豁如也。尝客游,穷而归,师事范当世,治诗、古文辞,遂为高第弟子。嗣受知于顺天府尹孙宝琦,奏以候选训导充顺天府中学总办,后竟以劾去。及宝琦巡抚山东,遂以图书馆优养之。鼎革后,任农商部主事,卒于官。^①保厘东任山东省图书馆坐办时,于辛亥年曾编有《山东省图书馆藏书目录》。

蔡养默 字持志,无锡县人。

蔡 樾 字荫楷,无锡县人。纂修《蔡氏蓉湖支谱》,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陈椿森

陈定祥 (1874?—?),字渭士,新阳县人,^②寓居苏州。民国年间,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撰有《黄陶楼先生年谱》等。

陈公溥 号剑泉(一作鉴泉),溧阳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特用直隶州州判。^③

陈茂治 字颂平,元和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卯科乡试副榜,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拣选知县。二十三年(1897)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院,与同学杜嗣程、沈叔逵等为南洋公学外院合编《蒙学读本》三册,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自编教科书。该教科书第三册的“编辑大意”中说:“泰西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之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身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首次提出德、智、体并重的教育大纲。充南洋公学教员及附属小学校长。后任直隶督署文案,又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及高等女学堂教员,日本留学生监督处庶务科科长。民国年间,任教育部审查处审查员、佾事、普通司科长。又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务委员,与黎锦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

陈佩实 字少衡,武进县人。有《离经辨志论》、《汉志九流不列兵家说》、《班固西域传赞诋汉通西域之失其言得失若何》、《东晋国势论》、《论明代官制得失》、《诸史作四裔传语多失实略证》、《书盐铁论后》等课作收入《南菁文钞三集》。

① 民国《南通县图志》卷十九《列传一》。

② 《学友录》作吴县。

③ 光绪《溧阳县志》卷八《选举志》。

陈锡恩 字荫生，通州人。

戴得龄

丁福保 见《名人传》。

丁志

丁祖荫（1871—1930），字芝孙，号初我，又号一行，常熟县人。元和张一麀称丁“状貌清癯，恂恂无疾言遽色”。但是，只要“闻一善，见一义，则奋迅趋附如不及”，所以“同辈咸推重之。邑有大政，咨而后行”。丁祖荫“自为诸生，以劬学博览闻于时，不沾沾为科举业”。后“用高第选入南菁书院，出定海黄元同、丹徒丁叔衡诸先生之门，与院中高才生相切劘，其学益进”。“尤留心当世治乱之故，不以笃旧自矜。”张一麀回忆与丁祖荫结交之始：“清光绪甲午、庚子间，世变益亟。谄时务者率深闭固拒，敝帚自珍。君独联合同志，倡设中西学堂于城中。是时一麀与家弟一鹏，在苏亦设苏学会与中西学堂。长老或骇为大力，君独贻书通问，风雨相闻，是为余与君纳交之始。”“厥后风气日开，凡常熟禁烟、劝学、县自治，次第发动，皆以君为之魁。江苏初设谘议局，当选为议员。又斥私财，独力开办丁氏小学校，造就学子无虑千百，终其身不渝。”丁祖荫在家乡威望甚高，“人有所求，未尝不量力扶助，而不以为功。乡里有争端，得君一言立解”。

辛亥革命起，“邑中无主”，“邑人公推为县民政长”，“民以大安”。“终其任，所得俸悉捐作县治、路灯之用。”调吴江县知事，“弊绝风清，成绩为全省冠”。后“谢事旋里，遇公事仍不少休”。丁祖荫“于学无所不窥，尤精于目录校讎之学”，为韩国钧校《海陵丛书》，为瞿良耜校先哲遗著，精深绝伦。曾主纂《重修常昭合志》。自著有《一行集》若干卷。^①清末，丁在常熟组建竞化女学校。在上海主编《女子世界》，与曾朴、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和《小说林》杂志。丁祖荫生前藏书极精极富，多有善本，然世人知有丁氏“缙素楼”者不多，因丁氏藏书经战乱丧失殆尽也。

董瑞椿（1870—？），谱名迪根，字俪蕙，号楸堂，别号仪郑，吴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副榜举人，直隶州州判，学部调派图书局行走，奏留以七品小京官用，普通司行走，专管农科大学工程监修事宜，图书局编书科教育股总核兼编纂。奏请为额外主事，筹备中央教育会事宜。民国年间，任教育部直辖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员，内务部编订礼制会会员，政事堂礼制馆

^① 张一麀：《常熟丁芝孙先生墓志铭》，《心太平室集》卷三。

馆员，充吉礼主任编纂，荐任内务部佥事，充典祀司第一科科员。著有《读尔雅日记》、《补》各一卷，学古堂刻本。

杜应震 字鲁麟，常熟县人。清末，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国文、修身教员，其南菁同学白毓昆则任历史、地理教员。民国初，任吴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校长。

费廷璜 字玉如，吴县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优贡，荐辟安徽补用知县，推选为江苏谘议局议员。民国年间，做过律师。著有《读〈说文〉〈玉篇〉日记》，学古堂刻本；《小谟觴馆骈文补注》。所辑汉卫宏撰《古文官书》一卷，收入溥良《南菁札记》(光绪甲午江苏学署刊本)。

费元浩

费元相

冯纘勋 字仲华，太仓州人。太仓州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凤恭宝 号永未，吴县人。光绪丁酉(1897)陪取拔贡。清末，曾就职于清驻意大利使馆。民国初年，任外交部条约司第三科科长。著《读毛诗日记》一卷，学古堂刻本。

顾该基 字此豪，通州人。

顾家驹 著《泰西舆地四字鉴》，南清河王氏《小方壶斋》本。

顾兰佩 字纫秋，通州人。

顾沐润 (1866—1898)，字闰水，又字振新，号丐亏，无锡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常州府学第二名。著有《隐鸿杂著》，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顾允升

何长庆

贺焕章 字赓云，后改名俞，丹阳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癸卯(1903)会试，挑取誊录。游学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奏调大理院行走，补民科第二庭推事，兼署总检察厅检察官。在任即选道，赏戴花翎。^①

胡受锡

华釐瓚

华申祺 (1870?—?)，字实甫，一字实符，无锡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光绪末年，华申祺曾翻译日人著作，编成《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由

① (民国)胡为和等主修、孙国钧等主纂：《丹阳县续志》，卷十三《仕进》。

学部审定，文明书局出版。民国初年，华申祺曾任锡金教育研究会（后改称锡金教育会）会长。

黄彬琳 字玉如，镇洋县人。著有《春绿寓吟集》（民国 21 年太仓黄氏铅印本）。

黄厚生

黄元吉 字肇成，震泽县人。有《荀彧论》、《中西算器考》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辰举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举人。

吉秉钧（1866—？），原名金兰，字懋德，号秉钧，后以号行，丹阳县人。光绪末年，毁庙兴学，创办丹阳烈帝庙小学（今丹阳第三中学前身）。

季福田

江荫椿

蒋寿祺（1866？—？），原名运升，小字允吉，字颐庵，号蕴深，青浦县人。“天资颖异，未弱冠，补县学生。”“蒋寿祺骈文宗法六朝。尝肄业紫阳、南菁书院，所交皆大江南北知名士，与云间杨葆光、南汇于鬯尤善。”“寿祺骈文宗法六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朝考一等，授七品小京官，签分吏部文选司。”然而，“就京曹未久，以忧归”，从此不再出山。“平居屏绝尘事，惟以著述绘事自娱，人谓不坠芝隐山人余韵云。”^①

蒋维乔 见《名人传》。

金祖焯 吴江县人，金松岑之族叔。

金祖泽（1869—？），字承哉，又字齐范，号切山，一号砚君，吴江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清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孔宪和（1877—？），上海县人。曾任驻日使馆、驻比利时使馆随员。民国年间，曾任外交部参事。

李青藻 字梦花，青浦县人。“廩生，居县治西，幼敏慧，文不加点，试辄优等，亦肄业南菁，与（蒋）寿祺并称高才，早卒。”^②有《鲁两生论》、《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李士琦（？—1930），字镜宇，昭文县人。廩生，捐县丞，分浙江，署桐庐县丞。

①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十六《文苑》。案：芝隐山人，蒋寿祺曾祖父蒋清瑞，著有《退结庐诗存稿》三卷、《退结庐诗遗稿》三卷。

② 民国《续修青浦县志》卷十六《文苑》。

民国年间,参与编纂《重修常昭合志》。李士琦书画俱佳。

廖光裕

林亮功 丹阳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刘国模 字范庭,江阴县人。

刘树屏 金坛县人。

刘维燮 靖江县人。曾任江苏通志局分纂。民国年间,与上海姚文栋等发起孔教会,联名上书国会,力争孔教为国教。与范汉光总纂《靖江县志稿》。

刘益燮

陆炳章 (1875—1920),原姓王,过继陆氏,^①字菊裳,太仓州学优廪。肄业南菁书院、省城学古堂。有《汉书百官公卿表大义述》、《魏孝文迁雒论》、《论历代互市得失》、《续龚定盦古史钩沉论》、《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积谷防弊策》、《书曾忠襄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后》、《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等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为院中高材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科优贡,钦用教职。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乡试副榜举人,考授法部七品小京官,后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曾署常熟县教谕,调署苏州府学训导兼理教授。后在苏州充江苏省官立法政学堂教习。民国初,任江苏都督府提法司总务科长。后在苏州当律师,竟“以从西医割痔丧生”。陆炳章诗“格老气苍,不肯苟作”。^②

陆朝琮 字礼南,镇洋人。

陆冠群

陆培惠

陆增炜 (1873—1945),字贻美,号彤士,镇洋县人。出身世家,从兄增祥,道光某科状元。陆增炜“具夙慧”,“擅辞章”,时太仓姚鹏图(案:姚亦肄业于南菁书院)“亦髻龄秀发,与君颀颀,乡人有‘东姚西陆’之目”。^③陆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会试第一名,经殿试、朝考,钦点主事,签分刑部云南清吏司。庚子后,晋安徽司员外郎,洊升民政部卫生司郎中,选陕西兴安府知府,值辛亥革命,未赴任。入民国,徐世昌当总统期间,陆曾任总统府秘书

① 见其弟王泽永之己酉拔贡硃卷。又,南菁学友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王炳章。

② 沈其光:《解粟斋诗话初编》卷五。

③ 唐文治:《太仓陆君彤士墓志铭》,《茹经堂文集六编》卷六。

长。后“日与旧都二三知己，啸咏排遣，以文字自误”，卒于北京。

陆曾业（1867—1948），字勤之（一作芹芷），后改名起。太仓人，优廪生。“应秋闱，屡荐不售。”陆“仁慈乐善，施与不倦”，“平居见义勇为，亲族中有贫乏者，赡养之惟恐不及”。陆又天性好学，居北京时，“入法政大学肄业，昕夕劬学，浸至咯血入医院”，乃辍学。施肇基官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原哈尔滨关道），陆入其幕三年。后应唐文治三次电邀，南返任上海南洋大学庶务科长。“民国初年，先生往游冀北天津，白河泛滥，大浸稽天，先生昼夜跋涉，跣足行水中，力救难民。”施肇曾（施肇基之兄）督办陇海铁路时，函招陆曾业“佐理其事”，“又襄路务者数年”。民国十四年，江浙齐鲁之战，太仓适当其冲，“炮火所及，玉石俱焚，先生奔走号呼，筹款筑室，以庇乡人，全活甚众”。后施肇曾与唐文治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延请陆为该校总干事。唐日后追忆道：“缔造艰辛，倚畀益重，而先生往来于娄江沪渎之间，又几阅寒暑。”对于陆之为人，与其共事过的两位南菁学长都赞不绝口，太仓毕光祖说：“凡人所不能为者，惟陆君能为之，且高尚廉洁，岂常人所能及。”阳湖庄蕴宽说：“若陆君者，可谓先之劳之，且能无倦。”综二人之言，可以概陆之生平矣。^①

路珩 宜兴县人。廪贡生，浙江直隶州知州。

路鸿甲 宜兴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恩贡。

吕国铨

马敬培（1865—1931），字兆芹，号厚之，溧阳县人，廪贡生。清末，任溧阳劝学所所长，倡办学堂，普及教育。投身实业，创办溧阳缫丝厂。又开设树艺公司，植树数十万株。推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年间，马敬培仍一秉初衷，十分关心邑中公益事业。兴修水利，修堤筑圩，赈灾救济，无役不与。

梅调鼎 字今裴（一作景裴），武进县人。蒋维乔称初入书院时，与梅调鼎等新派友朋鄙视八股，“皆放浪不羁，里中皆目之为狂士矣”。^②有《田畴论》、《李晟论》、《钦定储贰金鉴书后》、《书章实斋文史通义后》等刻入《南菁文钞三集》。然书院改学堂时，曾被蒋视为“新派”、引为同道的梅调鼎，却与蒋维乔意见相左，而与孟森一起不愿上堂听课，从而离开南菁。

倪宇梁^③（1862？—？），字长龄，号涤源，又号笛沅，娄县人。光绪二十三年

① 唐文治：《陆勤之先生家传》（戊子年作），《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五。案：陆与唐为儿女亲家。

② 蒋维乔：《竹翁自定年谱》，光绪十八年（1892）。

③ 案：《学友录》题名仅有名“宇梁”，缺姓“倪”字，据倪宇梁之丁酉拔贡硃卷补。

(1897)丁酉科拔贡。

潘浩 (1864—?), 宜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三十年(1904)甲辰科二甲进士,改庶吉士。在江苏办理学务三年期满,于三十四年(1908)授职翰林院编修。

潘瀹 (1866—?), 字杏菽,号倚云,宜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

潘洵

潘绍周 (1866? —?), 字凯生,号挺生,荆溪县人。“幼失怙恃,长嫂周氏勤劬抚育,至于成立。天资俊迈,工举业,绝近韞山堂。”光绪八年(1882)壬午中式本省乡试第八名举人,然而“累试春闱不第”,“以授徒自给”。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才成进士,授即用知县,分发广西,权知宣化县。“会土寇猖獗,绍周染瘴疠,不能视事,移疾归。”弃官返乡后,“仍拥皋比,子弟庆得师”,然而“绍周竟以数奇,郁郁致疾卒,年四十有三”。潘得进士后,其实做官的时间很短,反而“家居日多”。又多才多艺,“于制艺外,旁涉诗歌词曲,皆有新意”。潘绍周的棋艺甚高,“客京师,与国手对,让绍周二子,连败之,国手叹服”。潘“所著有《混沌录》、《西宅吟草》、《漱芳集百种曲》诸稿藏于家。”^①

潘致祺 溧阳县人。

潘祚元

庞文俊

钱承驹 字季常,无锡县人。光绪后期,文明书局推出中国第一套《蒙学教科书》共十四种,钱承驹编纂了其中的四种:天文、地理、地质、格致。无锡学务处成立时,钱是学务经董之一。

钱鸿弼

钱寿琛 (1865? —?), 字甘学,号畊玉,常熟县人,苏州府学优廪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捐员外郎,分吏部。

瞿树榕 靖江县人。清末,推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瞿树本

瞿树霖 靖江县人。

^①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九中《文苑》。案:韞山堂,指清乾隆时八股文名家武进管世铭。

任承弼 (1869?—?),原名传谟,字伯显,号柏轩,一号右铭。宜兴县人。河东河道总督任道镛之孙。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官内阁中书。

任承沆 (1875—?),原名传杰,字卓人,宜兴县人。任道镛之孙。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进士。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兵部武库司主事。民国年间,曾任蒙藏局佥事、第一司司长,历办西藏议员选举,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各选举事宜。升参事、总务厅主任。

任锡周 (1874?—?),字裔庠,号子泰,一字育庠。荆溪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89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

单嘉荣 字雨人,通州人。

沈世贞

沈树珊 江阴县人。

沈惟明

施赞唐 字琴南,宝山县人。廪贡生,分发试用训导。“家贫少孤,力学,九岁以属对获偶。年十余,即授经里中,弱冠游庠,岁、科试辄列优等,古学两冠郡属。嗣食饷,肄业南菁书院。光绪乙巳,倡设罗阳两等小学,任校长。赞唐才识敏卓,熟谙本邑水利,清末,开浚荻泾,多所规划。其他兴革事项,当道咸取决焉。尝赴日本游历。辛亥后,易名‘稿蟬’,作诗五篇以见志,并颜其室曰‘蜕尘’。倡结小罗浮吟社,与诸耆旧怡情诗酒,不问世事,仍授经自给。协修《续志》,未定稿,卒,年六十三。著见《艺文》,有《吴兴家萃辑存》、《聊复轩诗存》一卷、《蜕尘轩诗存》二卷、《四红词》一卷、《蜕尘轩诗余》二卷,均已刊。”^①

史国琛 (1870?—?),字献甫,号怡秋。荆溪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就学南菁书院。当书院改高等学堂时,史仍继续留校肄业。喜算学,有《中西算器考》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在院已撰有《乘方公式》、《级数开方》、《割圆汇通》、《天学杂俎》等天算著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中式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工部。清末,任度支部主事。

史悠泽 宜兴县人。^②廪贡生,清末,官浙江天台知县。

宋景濂

^①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十四《人物志》。

^② 《学友录》作武进,误,径改。见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八《选举志》。

宋树槐（1867—1926），原名有文，字又乡，一字幼湘，又字荫三，号觚倩，宜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入民国，归隐乡里。

孙立瀛 号静涵（或作静安、循翰），常熟县人。工词章，曾编《茹古堂分韵试贴》和《茹古堂鸡跖集》。

孙蓉镜 字荫梧，无锡县人。有《鲁两生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

孙毓修（1871—1923），原名学修^①，字星如（一作恂如），号留庵，室名小绿天，自署绿天翁、小绿天主人，无锡县人。孙毓修初入南菁时，约在光绪十三年（1887），不算正式院生，因尚未入学也。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考中秀才，才正式入院肄业。孙前后肄业南菁约十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聘苏州中西学堂教习，其间，向传教士学习英文。二十九年（1903）返回母校南菁（此时已改为高等学堂）执教英文，仅三月。后经过几年的游幕生涯，孙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进商务印书馆工作，直至逝世。孙在商务的十五年中，前期主要从事编译，后期则是古籍的搜集、鉴定和出版。孙主编《童话》丛书，前后有一百余种，茅盾称孙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孙参与了《共和国教科书》的编写，与他人合著有《外国地理讲义》，而他进商务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地理读本。孙毓修在清末著有《图书馆》一书，于《教育杂志》上连载，受到蔡元培的激赏，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图书馆学专著。孙又精版本目录，著《中国雕版源流考》，主持编印《涵芬楼秘笈》，助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孙毓修是主持编纂《四部丛刊》的实际操作者。

孙元兰

汪鸿藻

汪荣宝 见《名人传》。

汪树宝 元和县人。汪荣宝之嫡堂兄弟，绩学早世。

汪曾保 字谱薰，镇洋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王大猷

王凤璘（？—1898），字彬儒，镇洋县人。“为学喜博览，尤好群经、诸子。”^②与唐文治比邻而居，“春秋佳日，落月停云，诵读之声相和也”。后中光绪十九年

① 1935年所编《南菁学友录》，孙毓修出现两次，一次为光绪二十一年，所用名为孙学修；第二次为二十五年，所用名为孙毓修。编者误认为两人，而不知孙学修亦即是孙毓修也。无锡方言中，学、毓音同。

② 唐文治：《王君彬儒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1893)癸巳恩科举人。不数年,因咯血病卒。

王凤玮

王庚颺

王乃昌 字炽甫,镇洋县人。

王汝诚 字伯明(一作伯铭),江都县人。“十六入邑庠。肄业江宁钟山、江阴南菁书院,为高才生。九试乡闈不售,遂绝意进取,课弟及子侄。光绪癸卯,第汝许举于乡,诸幼弟亦各成立,乃大喜。汝诚虽蛰居江村,然以济人利物为务。辛丑,江州水灾,汝诚办理振抚,并亲董筑堤之役,备及劳瘁也。若训练乡团及保节恤孤诸义举,知无不为,为无不力。歿之日,里人来吊者,皆哭失声。年五十馀。著有《移竹居诗稿》四卷。”^①在南菁书院肄业时,同门助资校刊其师黄元同《经训比义》,王亦参与。

王如谅 王汝诚之弟。

王树声 (1876?—?),字获百,号亦秋,又号立吾,崇明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897)丁酉科拔贡。

王鑫山

王颐庆

王蕴登 (1870?—1926?),字步瀛,号甍峰,无锡县人。廪贡生。工诗。清末,曾任《点石斋画报》主编。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王蕴登曾任经理。民国初年,任交通部佥事等职。

王曾懋

王宗毅 (1863?—?),字屋生,号缙笙,又号切盒,上海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

魏葆澄 阳湖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三十二年(1906)出任山东临清直隶州邱县知县。

吴秉文

吴长吉 泰兴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5)泰兴县商会成立,吴被推选为会长。

吴诚 字理吾,晚号理翁,江阴县人,诸生。先后肄业南菁书院及苏州学古堂,精算术,在南菁时与东台杨冰相伯仲。杨冰长于创,诚工于因,皆各极其胜。晚

^① (民国)钱祥保主修、桂邦杰总纂:《江都县续志》卷二十五,《人物传》第七《补》。

年卜宅无锡以终。平生事业，致力于教育为多。^①

吴 璠 字剑泉，荆溪县人。笃学工文，兼擅词赋。庚寅(1890)恩贡生，就职直隶州州判，分发浙江。浙江巡抚任道镛以经济特科荐，不赴。历主浙中诸名公幕府，皆器之，而喻观察兆蕃尤与相得，兆蕃授藩司，璠亦以保举升知县。寻奉檄署鄞县。会国变，弃官侨居上海。浙江奉化士民夙闻其贤，赴沪请长民政，弗许。四明报馆闻之，延为主笔，借以发抒愤懑，多所规刺。所著有《铁花文集》、《新谐铎》、《铁花馆笔记》、《补眉山馆诗抄》、《多闻景见录》十余卷，待梓。^②

吴曾僊 (1872? —?)，字尊彝，又字褻斋。江阴县人。常州府学廪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③

吴增佑 字子迪，江阴县人。

吴佐清 丹徒县人，岁贡。光绪三十六年(1906)丹徒成立教育会，吴曾任会长。清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箫麟征 字谷如，常熟县人。有《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论》、《书冯林一均赋议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箫 燮

谢 沅 后改名保衡，荆溪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科乡试举人。

徐翰琦

徐敬仪 后改名俟，宜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河南光州直隶州州判。

徐守清

徐翔翰 宜兴县人。

徐有麟

许康瑞 字肖岩，宝山县人。立品端谨，弱冠从师受举业，理境清澈。游庠后，益刻苦攻书，自寻门径。文辞淹贯经史，旁及百家言，兼以选学辅其词采。既侑于庠，以古学受知于学政龙，檄调南菁书院肄业。家故不丰，无力留院，居家设帐授徒，馆谷膏奖所入，悉供堂上甘旨。岁有余贲，辄购书籍。性喜奖进人才，虽非其及门，有所

① 《陶社题名录》，谢鼎镛编：《陶社丛编丙集》，1944年铅印本。

② 民国《光宣宜兴续志》卷八《选举志》，卷九中《文苑传》。

③ 学友录原有备注：世居江阴县东乡七房庄，现居后厝。

请益，恒善诱不倦，士气为之振奋，多所成就。终年鲜辍学之日，暇则就古檀林拈韵赋诗，提倡风雅。天资不及邵曾鉴，而力学过之。未几，病瘵歿，年亦三十有二。^①

许铭甲 后改名钺，荆溪县人。增贡生。官热河知县。

许同甲 荆溪县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岁贡。

许作霖

薛彬

薛凤钧 (1867—1941)，字淦夫，号梅隐，吴江县人。工辞翰，小楷尤精美。加入金松岑等组织的雪耻学会，鼓吹维新变法。曾任同里镇兴业电灯厂经理。

薛铭敬 常熟县人。

薛珠

杨立本 金坛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科乡试举人，拣选知县。

杨守祐

杨体仁 (1869—1957)，字静山，号宛叟，泰兴人。肄业书院时，有《书史记游侠传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曾被保荐经济特科。民国时期，选为江苏省议员，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从政之暇，肆力书学垂三十年，于汉唐诸碑用力尤勤。后寓居上海，鬻书为娱。

杨同元 常熟人，杨泗孙之子。

杨文渊 字少平，无锡人。

杨忠

杨钟钰 (1869—?)，字章甫，无锡县人。安徽候补直隶州州判。民国年间，辑书多种，对释道类书籍情有独钟，著有《觉世宝经中西汇征》、《治平统鉴》、《环球名人德育宝鉴》等。

姚鹏图 (1872—1921)，字纯子，号柳屏，又号古风，镇洋县人。“少聪慧绝伦，每日读书百余行，背诵无遗”，与陆增炜有太仓“二才子”之称。^②太仓长辈则称其文“文法灵警、词华茂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中举，年才二十。屡应会试不第，于戊戌(1898)大挑一等，用知县分发山东，然到济南后，久未得差，甚不得志。^③曾以

①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十四。

② 唐文治：《姚君柳屏传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以下引文同此。

③ 陆增炜致冒广生书：“柳屏同时北上，勾留匝月，即赴山东。孤身作宦，颇觉可怜。到省至今，未得差委。屡有数来，甚不得志。”《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随员身份被派赴日本参观考察，写成竹枝词《扶桑百八吟》108首。姚后在山东历署邹县、沾化、聊城等县。清末，山东省建图书馆，姚鹏图作为山东提学使兼图书馆提调罗正钧的幕僚，日夜襄理此事，为功尤伟。入民国，任山东巡按使内务科长，当是时，武人枋权，姚怏怏不得志，弃官去。后入京，充国务总理钱能训秘书，任内务部礼俗司司长。遽以疾歿于京寓。唐文治称姚去世后，“文稿零落，仅存诗稿若干卷，内有《扶桑百八吟》，首尾尚完好，友人无锡杨君味云为排比之，印行于世，深感其友谊之挚云”。据杨寿柅《序》称：“姚柳屏《扶桑百八吟》者，故友姚子柳屏之所作也。君以骚雅之才，任辘轳之役”，“乙巳之冬，与君同使东瀛，雪夜围炉，出示此编，命为弁语。人事蹉跎，晷序飘忽；何图一诺，遽隔千秋。青枫关塞，何处招魂；白发江湖，凄然感旧。乃与汪子袞父、陆子彤士，共取是编，为之校印。”^①则参与校印者，尚有姚鹏图之南菁同窗陆增炜、汪荣宝也。

叶人驥

勇敬輿 字师曾，无锡县人。

尤金鏞 (1868—1957)，字亚笙，通州人。尤曾以第一名入通州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南菁书院肄业，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章句之学与古典诗词，颇多研究。擅诗文，知书画，小楷精雅。有《周官平肆展成莫贾说》、《穀梁受经于子夏考》、《谨权量说》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后南菁书院改高等学堂，仍留学堂，除继续研究经史词章，还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尤金鏞负笈南菁，前后约有十二年左右的时间。尤毕业后返乡，执教于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校和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所教课程包括国文、化学、物理、生物，兼职做南通翰墨林书局编辑。尤曾翻译日本人藤井乡三所著《物理学公式》，1907年于翰墨林书局出版。又编译日人大幸勇吉所著《近世化学教科书》，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诗词文集似未曾刊行。南通博物苑的第一任苑长孙毓与尤金鏞为郎舅之亲，而孙亦是尤在南菁书院肄业时的同学(见光绪二十七年名录)。尤金鏞另见南菁高等学堂第一届预科毕业生名录。

于 瑾

余克明

郁芳润 (1867—?)，字漱之，号叔愚，江阴县人。常州府学廩膳生。光绪十九

① 《姚柳屏扶桑百八吟·序》，杨寿柅《苓泉居士自订年谱》后附《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举人,浙江候补盐大使,未赴任。民国年间,充县主计课课长。

郁文盛 字宝森,奉贤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贡。

袁宏训 字昂之,无锡县人。

张葆馨

张炳翔 (1859—?),原名翔,号叔鹏,又号忍盒,长洲县人。出生富商之家,世传药业。苏州府学生。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举人。清末,在苏州创办养育小学。入民国,曾开办张养济制药所。撰有《中西医药通论》、《医药丛话》等医学著作。张精研《说文》,著述繁富。家资丰厚,素喜藏书,1960年代,其后裔捐其藏书近万册于苏州图书馆。^①

张萃祥

张光彝 苏州府学廪生。清光绪后期,创办大同女子两等学堂。

张济川 字仲劬,丹徒县人。^②

张茂炯 (1875—?),字仲清(一作颂清),号君鉴,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进士,任户部主事。宣统间任度支部军饷司司长。民初,任盐政院总务厅长,财政部参事,调盐务署参事。纂成《清盐法志》三百卷。年未五十即告归。茂炯工吟咏,有《艮庐词》、《吴门百咏》存世。

张慰祖 (1873? —?),字砚胎,号伯愉,吴江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优贡第三名。三十二年(1906)肄业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著有《穀梁大义述补阙》。^③

张 熾

张宗华

赵葆森

赵玉森 (1868—1945),字瑞侯,因嗜酒豪饮,自号醉侯。丹徒县人,廪生。无意于科举,四处求学。二十五岁起,进南菁书院肄业,“南菁有五大楼的书,他便在书堆里又沉浸了三年”。^④二十九岁离开南菁,又赴上海南洋公学教读,后在南京方

① 孙中旺:《也谈张炳翔》,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史志资料选辑》第29辑。

② 原无字号、籍贯。《经训比义》同门校勘姓名,有“丹徒张济川仲劬”,据补。

③ 案:《穀梁大义述补阙》实为其师胡玉缙所著。

④ 赵同:《醉人为瑞——记我的祖父赵醉侯》,《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7年12月,第87—100页。

言学堂教书。宣统年间，应马相伯之邀，任上海复旦公学历史学教授。民国二年，入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五年，北上执教于清华学堂，教授文史，几近十年，教学认真，学生们背地里都叫他“赵老虎”，罗隆基、闻一多、浦薛凤等均为其高足。清华返乡后，不再出，以诗酒自娱。著有《月华草》等诗文集。

郑虎文

郑祖泽

周德坚

周镜澄

周士滨

周世恒

周世颺

周寿遐

周熊 江阴县人。

周以南

周志韩 字紫函，宜兴人。“少颖异，能文工书，得重闱欢心。弱冠补诸生。从游甚众，门下多知名士。事父谨，父怒，辄自投长蹠。父歿，有宿逋未偿，引为己任，冀当得以报。”宣统己酉(1909)，常州府学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黑龙江。“志韩念边省少闲冗，宿愿或易酬，遂不辞而往。既至，仅获常委，郁郁不乐，未几卒。士林惜之。”^①

朱锦绶 字建侯，吴县人。有《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举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举人，官山东候补知县，省视学。著有《读史记日记》(学古堂刻本)等。

朱其扬 (1867? —?)，字显名，一字继眉，号霁湄，荆溪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朝考以教谕用。

朱蓉照

朱汝明

朱树云

朱文澜

^①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八《选举志》，卷九上《孝友》。

朱赞臣 (?—1912),字声扬,奉贤县人。民国元年(1912)任奉贤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长约一年,逝世。

朱振瀛 宜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三十年(1904)甲辰科进士,曾任陆军部遴选材料科长。

朱钟骥

朱祖炳

朱祖怡 (1873?—?),字绮斋,号启七,丹徒县人。监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安徽候选知县。

祝平康

庄礼柔

庄模 武进县人。

邹登泰 (1877—1931),字文卿,号闻磬,无锡县人。少时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工制艺词章。光绪丙申(1896)入学。宣统元年优贡生。民初,选为无锡议会副议长。先后执教上海南洋(交通大学前身)、震旦、大同等校,先后出任务本女中、育才中学校长。著述有《五经统系考》、《说文部首疏证》等。

邹洪纲

邹祖荫 元和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入湖北学政王同愈幕,随王同愈按试宜昌事毕,游三游洞,石刻题名。^①曾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湖北工艺学堂中学教习。二十八年(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五十年代初,尚生活在上海。

光绪二十二年(1896)

保汝梅

鲍庆熙 丹徒县人,于民国十二年修《新安鲍氏承风派支谱》,即鲍皋支系。

蔡国瑞

曹国桢

曹毓瑞 江阴县人。

陈 镛

^① 宜昌三游洞前室右壁上,王同愈篆刻文字如下:“光绪戊戌十一月戊辰,元和王同愈校士宜郡,事毕,偕常熟丁国钧、……吴何元秉、元和邹祖荫、蒋寿祖来游。同愈记。”《三峡晚报》2013年12月22日。

陈灿琳

陈冠群

陈 经 (1878—1927),字礼庭(一作鲤庭或荔亭),江阴县西乡葫桥镇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书院改为学堂后,又进南菁学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第一届预科毕业。后又肄业于北京法律学堂,以第二名成绩毕业,派为大理院推事。1911年,江阴光复,地方士绅推举陈经组织临时法院,后省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江阴地方审判厅长,这是江阴正式成立司法体制之始。后调北京高等审判厅任推事兼刑庭庭长。民国三年(1914)调任福建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陈即向司法部建议,各县承审员应改由省统一考试后,由省审判厅根据考试成绩遴选委任,经批准,福建立即实行。陈在福建推行司法改革不遗余力,对贪污渎职的县知事等官员,查究属实,即请省当局辞职归案讯办,前后被惩戒的有十余人。又将一直由行政官员办理而弊端丛生的烟案,改由法庭处理。又募集捐款,办理思明新式监狱,各地仿效。在任五年,奠定福建司法体制的基础。离任时,地方人士为他在福州公园建立纪念碑。后调任江西。又调绥远,因病未赴,请假还乡养病。十四年(1925)直奉交战,陈经与其他几位士绅为免生灵涂炭,奔走于枪林弹雨中,进行调停。战后任江阴兵灾善后会会长,抚存恤亡,兼筹并顾。后因司法部电促销假,匆匆北上,接任大理院简任推事近三年。1927年冬因肺病逝世于北京。^①

陈庆林

陈人杞

陈廷骏 通州人。

陈 漳

陈作楷

程廷鳌

成寅亮

储桂山 字馨远,泰州人,侨居如皋。曾肄业于上海格致书院、求志书院、宁波辨志文会和江阴南菁书院。^②后又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编有《皇朝经世文续新编》。

丛振宗

达金韶 通州人,达李之堂叔。

① 陈鸿佑:《夏港葫桥三兄弟》,江阴政协文史委编《夏港记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储桂山致汪康年书第一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8页。

达寿增 通州人，达李之堂兄。乡试屡荐不中，附贡生，钦加五品衔候选布政司理问。辛亥革命，同乡白毓昆牺牲后，达寿增作挽联：“拼掷好头颅，洗我辈书生腐气；竟成大游侠，开中华民国先声。”

达 孳 字幼猷，通州人，达李之弟。攻苦力学，积劳病卒。

戴蓉芬

邓夔龄

邓建勋

丁怀桀 苏州府学廪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秋六月乙卯，以遵命捐助棉衣，准其为母建坊。

丁玉山 泰兴县人。

董增祿 高邮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

范 罕 (1874—1938)，字彦殊，通州人，范当世长子，名画家范曾之祖父。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两江高等学堂，上海圣方济各学堂毕业，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修业，中央大学高等预科毕业、大学部法科毕业。历充南洋三等学堂汉学教员，山东高等师范学堂英文、历史教员兼教务长，南通五属公立中学教务长。保用训导，加捐知县。民国改元，任农商部秘书。著有《蜗牛舍诗》等。

方保东

冯 鼎

高傅霖

高树人

顾澹淇

顾仰基 字昂干，通州人。七岁时咏狼山诗，中有“登高疑日近，望远觉天低”句，脍炙人口。著有《器隐诗话》、《南通五山胜迹记》。

顾元起 曾任民国《如皋县志》分纂。

顾震福 (1872—?)，字竹侯(一作祝侯)，山阳县人。父顾云臣，翰林出身，曾官湖南学政。顾震福家学渊源，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民国年间，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冯沅君为其弟子。顾震福学识渊博，著述丰盛，于经学、小学均有造诣，王先谦称“所著书搜辑宏博，裁择精深，致功于经训字说，可谓勤矣。”^①

^① 王先谦：《顾竹侯所著书序》，《虚受堂文集》卷六，案：顾震福乃王先谦督学江苏时拔取入学，其父顾云臣与王先谦又是会试同年。

所著有《小学钩沉续编》、《三家诗遗说续考》、《方言校补》等十多种。晚年有《跬园诗钞》结集。顾震福自幼爱好灯谜，人到中年，嗜之甚笃，并建立参与各种谜社，晚年还出版谜集《跬园谜刊》。

郭晋蕃

韩兆魁（1868?—?），字晋卿，号镜清。长洲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二十四年（1898）肄业南洋公学。曾官湖北知县。著有《群经田赋考》三卷，《群经朝觐会同聘礼通义》四卷，《考工记车制申郑》四卷，《礼记校勘记》四卷。^①

侯必昌 上元县人。^②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曾与刘师培、柳诒徵等任两江师范学堂历史舆地教员。江宁学者陈作霖去世，侯与丁传靖、云书等写挽诗纪念。

胡渊

黄彦升

黄瓚

季淦

纪蔚森

江保傅 字隽侯，元和县人。光绪壬辰（1902）举行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京师法律学堂毕业，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入民国，历任大总统府取文处委员，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

姜定元

姜毓璋

蒋葆良

金鸿翔

李滨

李瑞霖

李元藻

刘瀚清

刘绳铭

① 见韩兆魁之丁酉乡试卷所列著作目录。

② 《学友录》作江宁。

刘师苍（1874—1902），字张侯，^①仪征县人，世家扬州。“曾祖文祺，祖毓崧，皆优贡；考寿曾，两中副贡。三世治经，入《国史·儒林传》，海内荣之，方吴门惠氏。”“君幼负异禀，读书过目成诵，九岁而孤，叔父良甫（案：贵曾）抚同己子，以养以教，无一日之离。”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选拔贡生，名满江淮间。是秋，中式该科举人。益以经策淹通负重望。“家无余财，资馆谷为养。”诗宗杜工部，其诗甚豪而谦抑不自炫。“无子弟过，并无名士气。”“貌秀美而短视，衣履朴素，不类扬人。居平无他好，惟多蓄古泉。”“暇则以析疑问难为乐，每发一义，辄惊其长老。”“经术、词章，艺无不精。熟《元秘史》，于历代西域地輿瞭如指掌。”仪征训导常熟丁国钧荐君经济特科，辞不就。丁乃刘之南菁学长也。

“壬寅科送良甫子（案：刘师培）及诚甫子应省试，过江乘轮船，于八月初三日夜半溺，即君生日也，年二十有九。士林识与不识，无不痛惜之。”刘师苍“尤有著作才，能传家学，已著有《周语注补》，辑《元代帝王世系表》数种，皆未卒业”。^②

刘师苍歿后，其叔富曾（字谦甫）为写墓志铭，称刘氏四世治《左传》，“方将与之陈书发篋，掇拾丛残，共编定先世遗文矣。今已矣”。铭有句云：“江流几时竭兮，哀此恨永永安有穷焉，我铭汝，汝有知否耶？”^③白发人哭黑发人，沉痛至极。刘富曾亦是南菁学人也。

刘师苍“博及群书，常喜在吃饭时候，将《儒林外史》摊在桌上消遣”，而刘师培“也好看小说词曲，见到《儒林外史》，自然爱不忍释了。两人常谈熟人中，某人像书中何人，以为笑乐”。^④此乃经学世家中一段趣话也。

卢庆奎

罗逢吉 字鸣谦，通州人。

罗辉祖

罗毓棠

吕淦金

裴鑫山

① 刘师苍名字之来由，据李详说：“张侯世传左氏学，故师汉计相而字其姓焉。”李详《药裹慵谈》卷三，第57页，“刘张侯”，江苏古籍出版社。案：张苍，西汉丞相，主计，封北平侯。

② 袁懿：《刘张侯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十二。

③ 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④ 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第29页。

邱 林

钱恒凤

钱铭槃

邵 棻

沈恩鸿

沈 祺

沈兆驹

石 华

宋葆麟 溧阳县人，曾任教于常州中学。

宋经湛 奉贤县人。1912年10月，任共和党奉贤分部副部长。

孙恩缙

孙恩绪 如皋县人。^①民国年间，如皋建公园，孙捐田亩。

孙翰宗 盐城县人，民国七年(1918)，选为江苏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

孙 鑽

孙开泰

汤鼎杰 靖江县人。

汤国光

汪于澧

王谌谋 (1871?—?)，字野庭，号少卿。泰州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官两浙试用盐大使。

王念曾 (1875—?)，字嘯欧，宝应县人。刑部主事。辛丑(1901)以参赞随那桐出使日本。河南试用知府。清末任巡警部警务司员外郎。改任民政部承政厅员外郎，记名参议，疆理司郎中，候补四品中堂。入民国，任内务部佥事，民治司第一科科长。

王文裕

王永图

王增祥

吴宝和 泰县人。

^① 《学友录》作南通。

吴宝森

吴鸿整

吴会云 (1871? —?), 字际青, 一字霁卿, 号晓濂, 盐城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吴景鸿 字子逵, 通州人。

吴敬德

吴林森

吴师曾

吴佑之

吴肇璜 字西垣, 如皋县人。戊戌变法时期, 撰有《连俄连英皆非长策论》发表在《格致新报》(第9册)。光绪末年, 曾主持由县令和地方士绅合力创办的艺徒学堂。

吴祖濬

夏仁虎 见《名人传》。

萧阳来

谢鼎臣 字襄九, 号西桥, 丰县人。宣统元年(1909)拔贡, 署河南裕州知州。辛亥革命后, 历官南阳、郾城县知事。曾率乡兵与白朗军作战, 卒于任, 终年四十四岁。谢善诗能文, 著有《西桥诗文集》。

谢誉桐

邢启才 字衍初, 通州人。光绪末年, 日本法政速成科卒业。

徐家棣

徐恒濂

徐 森

徐 壘

徐元甲

徐云梁

严有耀

杨承熙

杨从谦

杨赓元 (1866? —?), 原名载赓, 字柳春, 号良孚, 吴县人。光绪二十年

(1894)甲午科乡试副榜。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度支部,记名军机章京,官主事。历充度支部币制局稽核股帮办,通阜司银行科科长,纸币科科长。民国年间,任财政部泉币司代理第三科科长,荐任佥事,第四科科长。著有《读毛诗日记》、《读尔雅日记》(学古堂刻本)。

姚嵩年

杨允升 字迪生,铜山县人。早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举行辛丑、壬寅并科会试进士,授职内阁中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邮传部咨调改补电政司七品小京官,历充邮政司规划科、统计处正科员,升补参议厅学务科科长。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署理检察厅书记官长。后宦游南北,郁郁不得志,卒于成都。杨允升善诗,工古今各体,诗文大都散佚,其南菁同窗丰县谢鼎臣为辑录《骑鹤客诗存》一卷,大多为年轻时肄业南菁时所作。

杨兆鹏

易用仪

于 璜 泰兴县人。

袁绍昂 字性之,别号杏红馆主,通州人。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游幕山东,名震齐鲁。其同乡又是南菁同窗的保厘东,在山东图书馆坐办任上,曾编纂《山东图书馆辛亥年藏书目录》。时隔五年,袁绍昂在此基础上又重新编纂成《山东图书馆重编书目》,为世所重。袁绍昂在二三十年代,续成《济宁直隶州续志》,又主纂了两部山东地方志《济宁县志》和《荣成县志》,称善志。袁绍昂诗文俱佳,撰有《杏红馆酬世文钞》、《杏红馆诗钞》、《词钞》等。

于希濂

张东林

张 镐

张 俊

张丽生

张一鸿 元和县人。张一磨之嫡堂兄弟。

张 滢

张藻祥

张祖綵

赵 端

赵培庠 (1869? —?),字子周(一字芷洲),号养吾,又号梦华,阜宁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

赵维城 字芝山,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二十六年(1900)庚子科优贡,官四川彭县知县。民国初年,任四川长寿县知事。

郑祖铭

周本培

朱邦彦 字潞生,山阳县人。

朱鸿绶 字采之,宝应县人。岁贡生,同知衔候选直隶州州判。著有《师竹斋赋钞》、《砚秋轩笔记》。

朱铭恩

朱其濬 字剑泉,宝应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

朱云翰 字次屏,宝应县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

曹熙元

曹裕津 泰兴县人。

曹元炜

程其文

储青绾 字花锄,宜兴县人。有《田畴论》、《郭泰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达 享 字用歧,通州人,达李、达孚之弟。肄业南菁书院时,有《书史记游侠传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书院改高等学堂时,达享为学堂专斋头班生,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

邓 鸿

冯 笈 金坛县人。

冯兆昌 字口盒,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举人。

过宗唐

蒋 标 (1865—1943),后改名士栋,号留春,无锡县人。乡居则与族弟蒋士荣研求数学理化。时值维新,风气初开,光绪丙申(1896),以算学、汽学二科录取入县学。历任东林、作新、荣氏女学等校校长。著有《算学余谈》、《思枣室算稿》、《日历指南》及续刊等。肄业于南菁高等学堂的陈作霖,曾问学于他。陈自称:“算术一

科，曾于戊戌年受业于蒋师留春门下，故已略知一二。”又于1931年发起编写《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陈说：“辛未十月十日，锡金两县现存游庠者举行聚餐会于铁路饭店，蒋师留春、孙君锡承发起汇刊自述。”^①

金 圻 如皋县人。

韩有徵

黄金台

李元俊

林得中 丹阳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科优贡。

刘 铿

刘 煌

刘 毅 (1876?—?)，字小珊，号述文。阳湖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

刘永昌 常熟县人。

刘 棫

陆增祜

潘 任 (1874—?)，字毅远，号希郑，常熟县人。光绪维新时，曾任常熟县中西学堂总理。纳贖为湖北试用按察司司狱，署通山县典史。后任江南高等学堂教习。终身治朴学，著有《孝经郑氏讲疏》、《宋元儒学讲义》、《希郑堂丛书》等。

庞树松 字樗农，号独笑，常熟县人。庚子年(1900)，曾与黄人等组织成立“三千剑气文社”(后并入“南社”)。又与黄人在苏州创办《独立报》。民国二年，参与讨袁的二次革命。

浦邦彦

钱学坤 (1875—1940)，字静方。青浦县人，钱学乾之弟。宣统元年(1909)岁贡。后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专攻警务。辛亥光复，主《青浦报》笔政。其兄钱学乾任青浦县民政长，助兄筹划县政。后不问政事，日以读书著述为乐。钱学坤对明清小说极有研究，成《小说丛考》一书。

瞿士勋 字冕垓，靖江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肄业期间，任班长，曾“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

^① 《陈作霖自述》，《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民国印本。

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结果总监督特出惩戒告示，称：“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①瞿后于三十三年(1907)京师大学堂毕业。

睢国襄 民国元年(1912)，任丹阳县议事会议事长。

孙家薰

田德屿

万鼎年

汪绍芬 吴县人。

汪毓桢

王大猷

吴 凤

吴鸿奎

吴 拭 (1878? —?)，字希敬，号亚轩，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科并科乡试举人。广东候补知县。民国初，署福建南平光泽县知事。

吴彤锡 元和县人。宣统元年(1909)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毕业，举人，官内阁中书。

谢恩鸿

熊远图

徐从礼

徐 湘

许达坤

许 械 (1866—1932)，字少宜，号伯荫，无锡县人。光绪庚寅(1890)入学。曾入河南永城县令周世臣幕，主讲该地书院多年。返乡后，先后任埃实、东林学堂校长。入民国，曾任无锡县教育科长。著有《悬瓢轩丛稿》。

杨葆全

姚际唐 字鸿庆，江阴县人。算学家。

^① 参见《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戒告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案：《野叟曝言》一书乃乾隆年间江阴夏敬渠所著，流传不广，抑瞿士勋或于江阴南菁书院读书时所得而携往京师耶？

姚树圻

叶祖鼎 (1867—1937),号子久,吴县人。肄业南菁书院时,得识朱启铃。民国年间,朱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叶祖鼎应邀任编译科长。后曾至京绥铁路任事,年迈始归。叶诗文俱佳,尤擅书法,出入柳、苏,挺拔而略见丰润,吴郡一带甚重之。^①

张葆芬

张继祖 震泽县人。

张家镇 (1868—?),字伯圭,号容伯,又号雄伯。青浦县人。南菁书院高材生,有《郑注禹贡引地理志不本班志说》、《李晟论》、《西国国债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清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起,苏州独立的消息传到青浦,为稳定地方局势,张家镇认为,以重组政治机构为当务之急,在县议事会的旧文昌官集议,公推前刑部主事,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徐彭龄为本县民政长(即县知事),立即入署办公,再上请苏州加委。徐彭龄亦是南菁学友。张家镇“在南菁书院时与上海赵韵丞(世修)最莫逆。所为诗亦相似,俱以豪放见称”。所作诗“皆非庸流吐属”。^②

张南薰 字建夫,江阴县人。

张时良

张维新

张佑清

张毓瑾

张之幹 丹阳县人。

郑翼堂 字子仰,江阴县人。

周学仁

朱凤仪 泰兴县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

贝寿同 (1876—1941),字季眉(一字季美),吴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肄

① 严修楨:《叶祖鼎传略——角直名人(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4ce830101cay6.htm。案:原文“南菁”误作“南浔”,“朱启铃”误作“朱企乾”,均径改。又,瞿鸿禛是朱启铃姨丈,叶祖鼎肄业南菁时,瞿正督学江苏,朱或亦随瞿在江阴,故朱、叶二人得相识于南菁书院也。

②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三编卷一。

业上海南洋公学。三十年(1904)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期间参加同盟会。二年后游学英伦。宣统二年(1910),入德国夏洛顿槃大学学建筑,1914年毕业归国,是中国近代最早学习西方建筑的工程师。任北京司法部技正,中国银行顾问。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引进西方的建筑科学教育。今北京欧美同学会会所,为贝寿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三十年代,整修浙东沿海盐场,任台州盐务局长。贝聿铭为其从侄孙。

蔡 振 武进县人。

陈 泰 泰兴县人。

陈延昌 仪征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科优贡。

陈延武

褚光宣 泰兴县人。

丛炽昌

丁德森 泰兴县人。

丁桂山 泰兴县人。

董 铨 武进县人

方 书 武进县人。

方 毅 (1883—1958),字叔远,武进县人。在商务印书馆参与《辞源》的编纂。《辞源》编成后,因陆尔奎眼疾不能工作,方毅接任辞典部主任。后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辞源》的修订工作,出版《辞源续编》,收录辞条三万余,主要是当时新出现的名词解释。如果说《辞源》正编“为研究旧学之渊藪”,那么续编则“为融贯新旧之津梁”。《续编》编纂极为严谨,引书均注明出处,“于类书中可疑之辞,多不敢引用”,“所采经、史、子各条,不仅补列篇目,并一一校对原书。版本不同者,同时或参校数本。其佚文佚书未能对证原书者,则指明某类书引某书,以存其真”。对于新名词,“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学说”,“皆详其源委”,但“不加论断”。^①后来,《辞源》有正续两编合订本出版。

龚敬钊 字伯伟(一作伯威),无锡县人。民国年间,曾任吴江县立中学国文教员。

何国恂 字敬夫,丹徒县人。善算学,有《论方程正负》等多篇算学课作刻入

^① 方毅:《辞源续编说例》,《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三十年前后，任教于江宁师范学堂，编有《宁省师范学堂算学课艺初编》一卷，作为为学堂课本。

何奎昌 武进县人。

黄 灿 无锡县人。

黄 琮

黄 冈 吴县人。

蒋维钟（1868—1899），字岳庄，武进人。蒋树德次子，蒋维乔仲兄。幼颖悟，嬉戏时即不苟去与。树德尝曰：“吾有五子，若皆使读书，吾力弗胜，当择其一以栽培之。”故（长子）维瀚既辍读，习工。维钟年十三，亦继之。维钟郁郁不得志，工事余暇，辄手一卷不辍。尝得咯血症，弱冠后益剧，父命在家养疴。偶见其弟维乔案头有畴人之书，维钟一览辄能明了，曰：“余学文不成，将学数。”不数月，尽通其义。年余，学益精。时邑中创设致用精舍，维钟应数学试，获选，乃弃工肆，入舍肄业。极深研几，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师友皆惊叹。然以用力过勤，肺疾日益深，或劝以数学过费脑力，应舍之，悉心静养，则曰：“余失于文而得于数，苟有成就，虽死无憾。”竟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歿，年仅三十有二。遗著有《曲线新说》、《堤积术辨》各一卷行世，^①袁俊德辑《富强斋丛书续全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小仓山房石印本]有收。

廉 铭

冷世铨 泰兴县人。

刘汇清

刘树德 金坛县人。

刘元弼 号松之，通州人。陈衍称他“文似孙可之”，然“艰于生计”，故所作诗文“言之怆然”。曾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两年，辞归时，赠某生诗云：“天涯磊砢两诗人，从此相忘重怆神。直似去官犹恋阙，不知何处著吟身？……”^②

卢 彬

马家骏 泰兴县人。

马绍康 丹阳县人。

孟当如 武进县人。

^① 张惟襄：《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附《蒋树德传》。

^②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潘恩元 字丹仲，通州静海乡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举人。

潘肇元 字昕伯，通州静海乡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

瞿汝刚 武进县人。

任为仪

任为霖 字雨楼，如皋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为如皋简易师范教习，次年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进修算学。回国后在原校教算学。宣统二年(1910)任如皋县教育局会长。与他人合作创办《如皋白话报》，免费分送城乡各镇。三年(1911)被选为如皋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其子任铭善后执教之江大学，治三礼，亦算是南菁黄元同的再传弟子了。

沙曾达 字君敏，晚号江上散翁，江阴县人。优廪生。著有诗集《澄江咏古录》，收七绝六百余首，均为咏江阴风物之作，民国癸酉(1933)刊行。

单镇 (1876—1965)，原名绍镇，字叔荪，后改名镇，字束笙。吴县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苏州府学。二十四年(1898)，岁试第一，并取得经古，学政瞿鸿禨调入南菁书院肄业，有《书薛庸斋文集后》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二十八年(1902)壬寅，拔取全省优贡第二名，旋中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乡试第二名举人。^①二十九年(1903)，赴河南开封，应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中式，旋赴京师殿试，中进士，分刑部湖广清吏司行走。后考取商部，派保惠司办事，授职主事。升员外郎、农工商部工务司郎中。民国初年，任工商部秘书长兼总务厅厅长，派江苏财政视察员，署江苏国税厅筹备处处长，任江苏审计分处处长。后回京任审计院第三厅厅长。十六年(1927)后，退隐归里。应总纂庄蕴宽之请，任《江苏通志》分纂。期间，又应唐文治之聘，任无锡国专教授。二十年(1931)聘为吴县公产处主任，后又任吴县救济院院长。民国三十年(1941)在沪南菁同学由唐文治等发起，曾三次聚餐，单镇均与焉。^②

单镇还差点成了俞樾的孙女婿。俞樾的长孙女，即俞陞云太史的女儿，于甲辰(1904)某月，议归商部主事单镇为继配，“事已垂成矣，主事仿泰西婚嫁之法，索其曾孙女诗稿、手制针线、小照片等件，为太史所知，大怒，议遂中绝，并谓如此荒唐，

① 案：该科江南乡试第一名轮安徽，解元为安徽绩溪曹清泉，故单镇名为亚元，实为江苏第一名举人。

②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

从来未有”。^①

沈保善 阳湖县人，沈保枢之弟，亦善算学，曾为其兄校订《曲线剩义》等数学著作。

沈保枢 字子璇，阳湖县人。善算学，与其弟沈宝善均肄业常州龙城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华世芳。曾游广西学政幕，并任广西大学堂算学教习。著有《容圆通义》、《曲线剩义》，收入《阳湖沈氏算学二种》。

沈鸿声 常熟县人。

沈树本 上海县人。

孙春雷 字企渊，吴县人。其南菁同学单镇曾说：“光绪二十五年，仍往来江阴肄业南菁书院，孙企渊君春雷时时结伴同行，资性英敏，颇能博览，遂与订交。”^②有《西国国债论》、《论美西战事》、《论英脱构衅事》、《论美禁华工事》等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陶忠淮 吴县人。

汪仁溥 吴县人。官浙江金华县知县。民国年间，任海盐县知事。

汪廷襄 (1877—?)，字湛青，金匱县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毕业归国，应学部试，奖给举人，授农工商部七品小京官。民初，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后任交通部佥事，路政司总务科长。

王景琦 (1878—1960)，字容庵，号蓉湘(一作蓉纒)，江都县人，出身富宦之家。扬州府学廪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正科辛丑恩科举人，以知县分发广东。民国后归里，曾推选为江苏省议员。善书，“楷法工秀，兼共吟咏”，“每与诗社之会，出语高人一等。晚年书法益道逸，求书者户限为穿”。^③五十年代，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吴彤恩 吴县人。

邢本镛 字式金，江阴县人。

徐斌 武进县人。

徐虎臣 江宁县人。

许国英 (1875—1923)，字志毅，后改名指严。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为上

① 刘声木：《苕楚斋五笔》卷一“俞樾行古道”，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3页。

②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③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海南洋公学中院国文教员。后经蒋维乔推荐,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编辑,编有《中学国文史学讲义》、《国文评注》等教科书。民国五年(1916)应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赵椿年之邀,任该部机要秘书(赵椿年、蒋维乔均是许之同乡又是南菁同窗学长),落落寡合,终以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归沪上,以编辑掌故、创作小说为业,间亦订润鬻书(许的书法道秀古逸),然生活仍贫困潦倒,自谓“兔毫秃尽身垂老,换得人间卖命钱”。著有《清史讲义》(与汪荣宝合著)、《新华秘记》、《南巡秘记》、《十叶野闻》、《三海秘录》等数十种,真可谓著作等身,难怪许死后有人说:“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矣。”^①许为谋生,常借小说之笔法,而编造历史故事,如《石达开日记》一书,如“吕四娘刺雍正”故事等,便是许的“杰作”。明清史专家孟森(亦是许指严的同乡和南菁同窗),便曾批评过许:“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有失记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歿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②

许建标 常熟县人。

许咏仁 字颂慈,江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常州府学岁贡,就职训导。教授里门,造就甚众。喜吟咏,宗乾嘉诗风。曾执教于苏州振华女校,自言赴苏时,不忘携带蒋士铨、赵翼、袁枚三家诗集。^③著有《评月轩诗集》行世。

许毓麟 娄县人。

薛梦非 无锡县人。

薛升祺 苏州府学生。

薛序镛 (1878—1918),字笙伯(一作洗伯),吴县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学。二十八年(1902)以贡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下年年底,派赴英国留学,在曼彻斯特大学、伦敦维多利亚大学攻读印染、纺织、钢铁冶炼及机车制造四门专业共八年,获硕士学位。民国元年(1912)回国,先后在汉阳钢铁厂和唐山机车车辆厂任职,在唐山厂任总工程师、副总监、总监。民国七年(1918)突患急病,死于任上。^④

严保诚 (1878—?),字练如,武进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当会长

①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第140—141页。

② 《孟森学术论著——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③ 吴研因《题许颂慈乡先辈〈评月轩吟稿〉二首》之二,有句“尝集乾隆蒋赵袁,自担行李到苏垣。(颂慈执教振华女塾,自言篋中有蒋心馥、赵瓯北、袁简斋三家诗集。)”云云,《江上诗钞续》卷十五,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

④ 潘家晋,《最早赴欧学习现代工业技术的苏州人——薛序镛及其一家》,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史志资料选辑》第29辑。

的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开办爱国女校,严保诚与钟宪鬯等担任数理化教员,蒋维乔等人讲授文史。严又任过上海小学师范学校校长,兼上海务本女塾师范科、中学科教员。民国年间,任教育部佾事、会计科科长。

杨 贤

郁棣华 江阴县人。

章 锦

张东楼

张嘉树 字宣誉,通州人。

张 铨 泰兴县人。

张诵清 (1877—1945),后改名素,字穆如,亦字次醒,又字挥孙,号婴公,丹阳县人。镇江府学廪生。张素天资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光、宣之际游上海,执笔《南方日报》和《新闻报》,加入南社。后应友人之邀,至东北哈尔滨,主持《远东报》。又应辽宁复县知事程廷恒之请,主纂《复县志略》,于民国八年(1919)修成,次年刊行。张素在白山黑水间盘桓十余年。父丧南归,又应友人请,往返于苏、浙、沪,佐政、治史,还参与上海交通银行行史的编纂。抗战爆发,避难上海。贫病交加,仍不废吟诵。胜利前夕,逝于沪上。遗著有《草间集》、《闷寻鸚馆诗钞》等。

张文廉 泰兴县人。

张有琳

赵鹏程 泰兴县人。

朱恩昭

朱锡麒

朱祖彧 丹徒县人。

庄曾谧 武进县人。

邹呈桂

光绪二十五年(1899)

丁传靖 (1870—1830),字秀甫,一字湘龄,号岱思,又号闾公,出身宦宦世家,丹徒县人,镇江府学生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副榜。时叔父丁立钧主讲南菁书院,丁传靖亦入南菁肄业,然时间不长,有《书顾氏春秋行赏表后》。刻人

《南菁文钞三集》。

宣统二年(1910)经陈宝琛荐举,官礼学馆纂修。这时,丁传靖“年四十,始至京师,一时老宿倾衿,名公倒屣”。^①当时亦为礼学馆纂修的诗人陈衍,称丁传靖:

公事礼学馆,喜为诗,学梅村,有《击筑草》一卷,兹采其有新意者数首。《偶成》:“徐福当年早见儿,载书东渡去如飞。哪知异代焚坑祸,转在童男泛海归。”于留学生之蔑弃旧学者,可谓谑而虐矣。^②

丁传靖工诗文,擅戏曲,以《沧桑艳》传奇最负盛名,传诵一时,以致坊间私下石印贸利,引起一场有关知识产权的官司。郑逸梅叙说此事:

丁传靖以陈圆圆事,谱为《沧桑艳》传奇,木刻赠人,甚精雅,但印数不多,上海扫叶山房主人见之,贸然石印出售。传靖与之交涉,由雷君曜出面调解,且出扫叶山房书目,请传靖于书目中任意选择,悉以奉贻,遂了一重公案。迄今《沧桑艳》木刻原本已无存,幸此石印本得以流传。^③

民国后,丁传靖任江苏督军冯国璋幕僚。袁世凯称帝失败,冯国璋代总统,他随冯到北京任总统府秘书。在北京、天津时,与陈宝琛过从甚密,陈宝琛称:

君言止端和,学诵渊茂,雅有先世遗风,尤精贯乙部之学,纂述至老不止。所为诗文,贍华典切。于剥复之交,辞义能持体要。长庆古风、四六文最为世所称颂。君既自伤不遇,益与世寡合,顾独与余亲。余自还朝以来,畴昔知交,凋零已尽,而所识世家后进,学行不失先辈矩度如君者,殆未获其匹。^④

丁传靖的骈文极受时人推崇,无锡杨寿枏说丁传靖:

能以沈郁苍凉之气,成闳博玮丽之文,并世才人,殆罕其偶。樊山丈与余书曰:“以吾所知,独步江左,惟有丁髯耳。”余谓闇公之才,似胡石笥;以副贡终,遇亦相类。貌似陈迦陵,若开鸿博科,髯当超群轶伦矣。^⑤

杨寿枏一再将丁传靖与胡天游和陈其年相比,为其落落寡合而深感不平。当丁逝世后,杨写挽诗:

君才胡石笥(君文章博丽,仅中副贡,荐入礼馆,身世与稚威略同),君貌陈

① 杨寿枏:《丁闇公骈体文序》,《苓泉居士自定年谱》附《云在山房骈体文诗词选》。

②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③ 《郑逸梅选集》第三卷,第207页。案:雷君曜即雷瑄,丁传靖南菁学长也。

④ 陈宝琛:《丁君闇公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四十一。

⑤ 杨寿枏:《丁闇公骈体文序》,案:樊山,樊增祥也。丁传靖留长髯,时称“美髯公”。胡石笥,胡天游也。陈迦陵,陈其年也,亦留长髯。

迦陵(君银髯盈尺,相者谓似其年,余戏语君,若开鸿博科,髯当超群绝伦矣)。虽膺礼馆辟,未遇鸿博征。晚经沧海变,忠愤常填膺。白衣唐罗隐,皂帽汉管宁。……^①

丁传靖又“精贯乙部之学”,他编纂的《宋人轶事汇编》,至今仍是研究宋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郑骞在《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一文中说:“关于资料方面,有一部书,大家常用的,就是《宋人轶事汇编》。这部书是很出名的,研究宋代的人,几乎没有不用它作参考书。”尽管此书在现代学人眼中也有不少毛病,如所引资料虽然注明出处,但有删节改动。然而,还是“大家都用,也不能不用”。^②

丁传靖是藏书家,于佳书百计罗致。陈庆年在其日记中记载:

丁因代拟答史馆函稿,屡争润笔,谓“重改则等两篇,须加倍送酬”。前已允增《世说新语》矣,又意在必得《东坡七集》。复允之,犹未足,公言欲得洋钱。文人之不可向尔如此。^③

两人是同乡,陈于丁还是南菁学长,然经学湛深的陈,私下称文采斐然的丁是“文人”,颇有讥讽之意。不过,丁之藏书后来因由其子丁瑗捐献公家而大致保存下来,而陈之传经楼藏书却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书亦固有幸有不幸也。

丁传靖著述宏富,达数十种之多。

傅春官 字荇生,室名晦斋,江宁县人。“幼孤,能读父书,多藏善本。”^④清末民初,为宦江西,官江西浔阳道,江西劝业道尹、九江道尹,监督江西农工商务和矿业,所著《江西农工商矿务记略》四种,收入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中。傅早先还著有《金陵历代建置表》,乡前辈陈作霖阅后,“叹为史才”,并为作序。傅为保存乡邦文献,刊行《金陵丛刻》,收录十七种。

管祖式 字伯言,上元县人,^⑤有《桑孔张汤合论》、《宋史道学传原本范书党锢传说》、《书顾亭林先生郡县论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管曾为同窗亡友程先甲撰《墓表》。

韩兆鸿 (1868—1954),字孟飞,号渐仪,江宁县人,江宁府学廩膳生。光绪二

① 杨寿桐:《挽丁圃公三首》之二。

② 郑骞:《永嘉室杂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③ 陈登丰:《横山乡人日记》,“1914年12月12日”。

④ 刘世珩:《金陵历代建置表·序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⑤ 《学友录》作江宁,据《南菁文钞三集》径改。

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科优贡第一名。民国年间,曾任江西省税务局局长。1953年,聘为江苏文史馆馆员。

何蟪生 后改名宾笙,字芷舲(一作稚苓),号青羊居士,斋名青羊镜轩。丹徒县人,世居扬州东关街。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拣选知县,游历日本,分发安徽。著有《新政刍言》,为冯中丞赏识。旋调法部,派往贵州考试法官。民国后任蒙藏院佥事。工诗善画,精鉴别金石。某年航海南归,海舶遇险,遂波沉而逝。”^①何宾笙与陈衡恪(师曾)是书画挚友,曾为陈的《北京风俗图》题跋甚多,其子则为陈的入室弟子。

贺国荣 丹徒县人。

侯福昌

黄守孚 (1878—1931),字允之,号佛时,又号蓬公,嘉定县人。清末廪生。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三年,攻读法政。回国后,任嘉定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黄对国文教育有过深入的研究,任上海集成图书局编辑时,自己编撰过多部国文教科书,风行一时。光绪末年,任嘉定县选举事务所副所长,推动地方自治。又被推为县农会会长。辛亥革命时,组织嘉定县同盟分会,参与地方事务,推进革命。民国二年,任江苏省议会秘书长。曾主持发行嘉定《嚆报》,主笔上海《新申报》。民国八年(1919),选为江苏省议会会员,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担任嘉定私立普通小学校长。其后主《新江苏日报》笔政,任省公署秘书,编辑《省政公报》。民国十六年(1927),辞职归里。后省政府委任其为青浦县长,辞不就。返乡后,任修志局协修,编纂《嘉定县续志》。黄守孚还襄助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曾与本县士绅在上海创办中华珐琅厂,生产的搪瓷产品享有盛誉。民国十七年后,任过农民银行分行经理。

黄守恒 字许臣,嘉定县人,黄守孚之兄。有《汉志九流不列兵家说》、《宋史道学传原本范书党锢传说》、《禁黄金出口议》、《拟辑约章成案例言》、《俄人屯兵阿富汗论》等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氏昆仲在家乡创办女子普通学堂,黄守恒亲作校歌。黄守恒弟兄还对学部所颁教科书加以评点,出版了《教科书批评》。民国元年(1912),组织中国同盟会嘉定分会,黄守恒任会长。黄守恒曾撰有《定盦年谱(稿本)》,收入《碑传集补》卷四十九。

^①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案:冯中丞,金坛冯煦也。

黄在中 如皋县人。

黄在中 子子堃，后改名惺，溧水县人，寓居宜兴。“性沉默厚重，读书过目成诵，行文好为湛深之思。游庠食饩，累试优等。充南菁书院高才生。院固富藏书，恣其浏览，所谓皆经世之学。有《皇朝武功记盛书后》、《西国听讼用律师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旋改高等学堂，复精研西籍，于数理尤多心得，前后主讲如丹徒丁立钧、宝应刘奉璋、富顺宋育仁，皆亟称其才。毕业归，任知新、经正两校教授，士论翕然。病废退居，仍治学不辍。著有《知困录》、《甦民文集》待梓。”^①又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名录，惟子堃作子坤。

黄宗幹 (1865—?)，字子楨(一作子贞)，号仲勉，上元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

江祖荫 (1861—1928)，仪征县人，世据扬州。江祖荫谦谦君子，是个纯粹的读书人。虽终其身一领青衿，人却称之为“江大圣”。《志》称：

字子云，世居郡城，籍仪征。父征祥，笃行君子，见前《志》。祖荫少敦笃，无子弟过，天资不高而劬于学，所得悉由困勉入，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憚也。久之，博通经史，兼善词章。年二十，补诸生。越三年，应岁试，瑞安黄侍郎体芳以“齐人将筑薛”命题，士子唯诵朱注，不知薛久为靖郭君封邑，以为齐初取其国而城之。祖荫援古注，并征引《战国策》文，以正其误，为侍郎所激赏，遂食廩饩。其后，每试辄高等。善化瞿相国鸿禔督学江苏，时岁试扬州合属经古，命题为《盐赋》，祖荫举历代盐法利弊，以史论之体为有韵之文，洋洋数十[千]言，相国拔置第一，其赋为一时传诵。祖荫九应布政司试，未售。年逾四十，始以例贡太学，注选训导，人咸为祖荫惜，而祖荫视之澹然也。科举既罢，乃以文学教授学校子弟逾二十年，最后同列皆少年新进，而以老师宿儒介其间，唯祖荫一人。性嗜书，他无所好，遇有善本，恒节衣缩食购之，自少至老，日手一编，非疾病未尝释篝灯，诵读伊吾之声时彻户外。六十后，有劝其节劳者，自言“平生乐此，不以为罢，舍读书外，不复知人间有何等事也。”以戊辰七月卒，年六十有八，乡之人以无所质疑问故，辄思念不置云。^②

乡后辈董玉书也称江祖荫：

亲承义训，锐志勤学，于经史子集无不浏览，博闻强识。偶与同学谈论，罄

①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九中《寓贤》。

②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九《人物传》。

其源流，娓娓不倦，众皆倾倒。而性特谦和，不以学问自矜，人以“江大圣”称之。惜久困场屋，竟以明经老。著述颇富，稿多散佚。^①

金懋基 见《名人传》。

刘鲁瑛 靖江县人。

毛治源 字涤川，嘉定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毛治源等人将家乡的震川书院改办为震川小学堂，为嘉定第一所公立小学。毛后来任南洋中学、复旦大学国文教师。

潘鸣球 (1873—1932)，字颂虞，一字受平，号霞青，又号杏森，别号慰荻。阳湖县人。有《欧史不伪朱梁论》、《论宋建中初政》、《论弭兵会》等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初任东台县教谕。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进士，钦点知县，签分河南即用。三十四年起，历任河南沈丘县知县、禹州厘税局总办。民国，任河南高等审判厅推事，沁阳县知事，署商城县知事。北伐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邮包税局代局长。善书法，得二王之神韵，有遗稿《养和堂类稿》等。

彭世襄 (1868? —1903)，字应奎，号赞臣。吴县人。有《鲁两生论》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请假回籍，到家即卒。俞樾为写挽联，前有识语，称：“其家以会试墨卷与赴状同投，亦可悲矣。”

钱崇威 (1868? —1966?)字重修，号自严，震泽县松陵镇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东渡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授编修。民国初，任江苏省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未几，洁身引退。编纂《(民国)沭阳县志》。“晚年寄寓海上，以卖字为生，他书法挺秀，从矩度中具有超逸神韵，和寻常一般科甲中人板滞的馆阁体不同。……因此墨迹流传，蜚声南北。”^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寓上海。曾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上海文史馆馆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接受南菁中学教员采访，回忆书院事，是当年课生在南菁书院学习、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岂料在文革运动中，他因受无知竖子的殴辱，气愤致疾死，年九十有九，距百龄只差一岁。”

^①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一，第18页。

^②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第778—780页，“清代最后一个太史公钱自严”。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钱 淦 (1875?—1921?)^①,字印霞,号镜如,宝山县人。“幼从父学,博闻强识。弱冠,擅文辞,尤致力经世之学。”^②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送进士馆习法政,继由学部奉派赴日本入法政大学毕业,返国大考,列最优秀,授编修,并记名遇缺题奏”。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起,地方公推为县民政长,实行三权分立。民国元年(1912)冬,改任县知事,“益整理财政,一切公开”。在任两年,“额定俸给外,丝毫不苟取。其治事虽极琐屑,必详究其原委,人有怀疑义者,复为之反复辩论,务使涣然。批判公牍,不轻下一字,虽至夜分,不厌不倦”。后调充省公署内务司统计处主任,转任财政部新税处筹备员。但钱淦“厌倦京尘”,终于“谢辞归里”。捐母寿资,又募集基金,在家乡创办贫民习艺所。民国六年(1917)选为省议会议员,援应有国库拨济议案,争得宝山县海塘大修、岁修经费,“民力以纾,险工以固”。又应聘出任《续修宝山县志》总纂,成十九卷。修志事竣,又出长本邑交通事务局,“一年之间,筑成南北路线六十余里,桥梁涵洞咸备”。又测定东西干线,“当时筑路事属创始,其所遇种种障碍”,“淦以一身当其艰,昕夕擘划,力任应付,终于积劳猝患脑充血症,卒于局,年四十八”。

秦毓钧 (1873—1942),字祖同,号平甫,别号一鸣,金匱县人。有《书史记货殖传后》、《班固西域传赞诋汉通西域之失其言得失若何》、《疏浚江南河道议》课作收入《南菁文钞三集》。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师范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上海《申报》、《时报》工作,入中华书局参与编纂《中华大字典》。后回锡,任《锡报》总编,又创办《无锡新闻》报。秦毓钧曾任过无锡县图书馆长,编纂有《无锡图书馆书目》、《锡山秦氏文钞》等书。

瞿葆刚 字健斋,武进县人。在南菁书院肄业时,有《纵横论》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沈秉乾 (1863—1933),号惕斋,后改名铸,泰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进士馆毕业考试列最优秀,历任工部、农商部、礼部主事,礼学馆协修,军机章京,邮传部科员兼编制处纂修,保升员外郎,司法部发给律师证书。不久,归乡经营保泰钱庄。宣统三年(1911)被公举为泰州商务分会总

① 据钱淦之甲辰恩科会试硃卷,生于同治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推算公历为1875年1月1日。然硃卷自填官年,往往少填岁数,不甚可靠,故存疑。

② 吴葭、王钟琦修纂:《宝山县再续志》卷十四《人物志》。以下引文出处均同此。

理。光复后，家居不仕。著有《杜诗言志》等。

孙毓修 即孙学修，无锡县人，见《学友录》二十一年。

王德坤 字少棠，号髯鹤，丹徒县人，廪贡生。侨寓江都仙女镇。王德坤学问渊博，早负盛名，从游者众。瞿鸿禛考校镇江府属生员，拔取阖属诗古第一。晚年移居郡城扬州，尝与冶春诗社之约。间精岐黄。年逾七十卒。著有《望江堂诗集》，手自编订，为京口词人之冠。^①

王乃屏 字展为，六合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日本师范学校毕业。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年间，参与六合县续志的编撰。

王宗筠 (1866—?)，字志清，山阳县人。廪贡生。终身务馆授读。曾与地方士绅创办淮安县南溪小学，著有地方志《崔堡小志》，另撰有诗文稿多卷。

徐昂 (1877—1953)，初字亦轩，后改字益修，号逸休，通州人。自清光绪末年起，开始在家乡任教，先后供职于通州师范、南通中学、女子师范等校。后赴杭州任之江大学任国学教授。抗战期间，任无锡国专(沪校)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自沪返乡。在乡坚守民族气节，拒受伪职和馈赠，称“饥犹择食”。抗战胜利后，在家整理一生著作，成《徐氏全书》，于1952年出版。徐益修治学严谨，精通群经，尤以对《易经》和声韵学的研究，造诣至深。文则宗桐城。徐一生教学，高才弟子众多，如魏建功、陆侃如、蒋礼鸿、陈从周、沈云龙等。

徐彭龄 (1872—1929)，字商贤，号企商，青浦县人。松江府学廪膳生。张家镇妹夫。有《书史记游侠传后》、《汉弃珠崖论》等课作收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会考优贡生，旋中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进士，以主事分部学习，随即公派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光绪三十三年(1907)返国，获学部进士馆考列最优秀，授刑部主事。辛亥革命起，被推举为青浦县民政长。不久，引咎辞职，赴北京任司法部参事、司长，大理院第三庭推事兼庭长。任内，秉公裁判，不畏权贵，清廉自洁。后因病离职，寄寓苏州为执业律师，因病复发而卒。

余建侯 字东屏，丹徒县人。有《欧史不伪朱梁论》、《论明代官制得失》、《沈文肃请办京师积谷论》、《问乡勇剿贼原起》等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①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三，第144页。

张葆元（1872—1940），字蕴和，以字行，娄县人，松江府学廪生。调入江阴南菁书院，以学行兼优任斋长，有《班固西域传赞诋汉通西域之失其言得失若何》、《书盐铁论后》、《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书朔方备乘后》、《喀尔喀四汗图说本孰为精善试详言之》、《东三省疆界变迁考》等刻入《南菁文钞三集》。旋又保送至京师大学堂。后因科场失意，乃转求新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将所得资料悉数提供松江府中学堂创办时作为参考。

民国元年，松江地方人士李芑香、朱叔建等创办《政论报》，蕴和任编辑。后应聘任上海《申报》编辑，长期任该报副总主笔，与总主笔陈景韩轮流写时评，称“松江两支笔”。为文谨慎，以稳健著称，笔名“默”。民国十九年，陈辞总主笔，由张继任。“九一八”后，所写时评，站在抗日立场上表达民意。1937年冬，上海沦为孤岛后，日伪要做新闻检查，蕴和与申报同人一致反对，宁可停刊，拒绝检查。次年《申报》改挂美商哥伦比亚公司招牌复刊，以美人阿乐满为总主笔，始改任副总主笔。在《申报》数十年，别无嗜好，惟爱端溪古砚，收藏百余方，著有《砚说》一卷。^①

张方中（1867—1932），本姓方，过继张家，后仍认祖归宗，改姓名为“方还”，寓归宗意也。字惟一，晚号虬庵，新阳县人。^②清末，方还出任过昆新教育会、昆新商会的会长，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辛亥革命起，方还推为昆山县民政长。后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上海招商局公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还曾出任过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秘书。逝世后，邑人筑“惟一亭”纪念他。方还诗文、书法均有造诣，书宗颜体，古拙绝伦。

赵宽（1863—1939），字君閔，号止扉，又号传侯，赵烈文之子。阳湖县人，寄寓常熟。

“幼趋庭帷，即注意致用之学，不屑屑于举业。父惠甫先生具经世才，参赞曾文正戎幕，仕畿辅，有循吏名，中年乞骸，侨居常熟天放楼，庋藏古今图书。宽博览群籍，沉浸其中，读书娱亲，并研究金石文字。肄业南菁书院时，任斋长，有《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论》、《魏晋以中正九品取士论》、《宋太祖纳女真贡马论》、《宋史道学传原本范书党锢传说》、《皇朝武功记盛书后》、《营垒图说书后》、《俄人屯兵阿富汗论》等收入《南菁文钞三集》。

① 《松江志》卷三十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亦提到方还之事，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页。案：包天笑称方还是昆山人，也不误。清末民初，昆山、新阳仍合并为昆山县。

“年逾五十，以诸生由瞿鸿禨学使保荐经济特科，旋以知县分发浙江，历知嵊县及富阳县事，孜孜求治，勤恤民隐。受代后，先后任赣抚李兴（铭）[锐]、江督端方幕僚，于地方政事多所擘画。民初，一度管榷震泽，并任职江南官产处有年。旋即归田，以著述自娱，随冯梦华辑《江南通志》。晚年，益潜心考订之学，题识家藏金石版本几遍。虽患咯血症及左目失明，仍勤阅览，不稍休息。二十六年事变，忧愤国事，得中风疾，流离迁徙，避申就医，卒于沪，享年七十有七。宽为日记，凡若干卷，异文轶事，排日记录，待印行世。”^①

周 焯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卞綉昌（1873—1946），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猥龠，仪征县人，寓居扬州，湖南巡抚、闽浙总督卞宝第之次子，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女婿。卞綉昌之入学、食饩，均在江苏学政龙湛霖任内。卞宝第任湘抚时，龙湛霖曾因事参劾卞，至是，尽释前嫌。^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派充日本横滨、长崎领事，湖北道员。辛亥革命后，即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卞綉昌喜吟咏，工书法，是隶书名家，乞书者户限为穿。

丁锡福 字响卿，海州人。书院改学堂后，仍在南菁肄业。有《书史通申左篇后》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科优贡，其南菁同学无锡程宏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廿五日的日记中，记丁考取优贡事：“海州人丁锡福字响卿，庚子优贡，向在南菁。定例，考取优贡之后，须向学院领取贡单，方可进京朝考。去年丁远道来此，学房科索费过巨，未曾领归，在途遇风，船被覆没，人几溺死，故恨入骨髓。现朝考期近，房科知不可缓，即将贡单赍送来堂，丁见之大怒，旁人亦代抱不平，该房科无可奈何，狼狈而去，挽同堂课生江阴人谢某为之说项，丁竭力艰拒，不鸣一钱，纷纷扰扰，尚未了结。”^③学署小吏，贪婪勒索，竟一至于此。

陆 蕖（1872?—?），字荷展，元和县人，陆润庠之堂弟。其南菁同学钱崇威晚年回忆书院生活，说陆蕖“文章写得快，常常名列前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优贡第二名。奏保经济特科。曾官湖北知县。辛亥革命，奉贤县光复，陆蕖被推为财政长。民初，选为奉贤县议事会议长，第一届江苏省议院议员。

① 张惟襄：《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②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③ 程宏远：《南菁日记摘抄》。案：文中“江阴人谢某”，疑指谢鼎镛。

裴 柟 字梓青。

单毓元 泰州人。江苏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任南通国文专修学校教师，江苏通志局分纂，泰县教育局局长，泰县中学校董会会长。主纂《(民国)泰县志稿》，稿成于民国二十年(1931)，共三十卷。

童振藻 (?—1939)，字仲华，淮安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分发云南补用知县。清末，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曾任昆明市政府秘书、省长公署秘书、省政府秘书处兼实业科长等职。1922年，任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筹备组成员。后又在云南省立中学、云南省立师范学校任教。童振藻还于1918年至1926年间出任当时的著名社团——云南学会理事长，潜心研究云南历史和地理，成果硕著、著述繁富。童振藻主纂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志《昆明市志》，于1934年铅印出版。童倡导和主持云南各县地志汇编，全省共有117个县完成地志汇编117种。童自己还编著了第一部云南地方志目录《云南方志考》，该书共收录方志及相关书目四百余种。童潜心研究云南边疆史地，编著了第一部云南地震专著《云南地震考》。还著有《云南温泉志补》、《云南土司考》等。童客居云南几近三十年，晚年由滇迁寓杭州，仍著作不辍，有《钱江九姓渔户考》、《牂牁江考》、《浙民衣食住问题之研究》等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王炳章 金坛县人，曾为南菁同学溧阳宋葆麒作传，宋见光绪《学友录》二十七年。

许振鹏 字云程，海州人。

杨 润 (1877—1938)，字雨田(一作玉田)，阜宁县人。杨出身于商人家庭，天资过人，好读书。府、县试均第一，肄业南菁书院。科举废，曾就读于南京的法政学堂，并参加南社。民国初年，曾官直隶道尹、通判，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京结识靳云鹏。1919年秋，出任靳云鹏内阁财政部印制局局长。杨润还曾参与煤矿、油厂等企业的投资和管理。逝于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

鲍宗源

蔡宝经 泰兴县人。

曹家泰 字裔伯，江阴县人，曹家达之弟。

曹文凤 泰兴县人。

陈昌元 泰兴县人。

陈铠秀 江阴县人。

陈廷鳌 泰兴县人。

陈锡琨 字砚香，江阴县人。

陈耀 靖江县人。

陈颐 泰兴县人。

程炳熙 (1864—1911)，字子炎(一作芝岩)，一字光辅，武进县人。“光绪(己)[乙]酉举人，拣选知县。秉性诚笃醇厚，尤重然诺。工诗文，下笔不苟。其文深厚真挚，一如其人。恽次远侍郎提督广东学政，延聘襄阅试卷。后在沪协助何嗣焜创办南洋公学，担任经史教授。兼任某书局编辑。盛杏荪宫保重其才，聘任教读，终身未他就。以清宣统三年病卒，年仅四十有七。著有《赘庵诗集》若干卷，未刊行。”^①执教南洋公学时，与同事又是南菁同学的张相文合译《万法精理》，大概是最早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中译本(不完全本)。

程起鹏 (1871? —?)，原名新俊，字万里，号抟霄，长洲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曾官浙江江山县知县。

程肇祥 宜兴县人。

储钟海 宜兴县人。

戴慈恩 无锡县人。

戴蔚善 无锡县人。

丁效忠 东台县人。

费揽澄 (1879—1925)，字安定，号伯坝，又号觉迟，震泽县松陵镇人。光绪三十年起便与王葵、沈叔明等创办多所小学堂。任吴江县劝学所所长。民国初年，与薛凤昌创办吴江县立中学。费是吴江教育界先驱，1925年费病逝后，柳亚子等撰挽联：“为一乡教育物望所归，奈何早逝；于全国痛哭元勋之际，又悼先生。”因该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故有“痛哭元勋”云云。

费廷瑚 吴县人。

顾秉忠 江阴县人。

顾迺德 通州人。

^①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

顾 倬 (1872—1938),字述之,无锡县人。三岁而孤,自幼受母教甚严。十四岁起就因家贫课徒自给。二十一岁中秀才。后又肄业于无锡东林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侯鸿鉴一起以地方公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一年。归国后,任东林学堂监督三年。赴上海任中国图书公司编辑,又应聘北上入直隶提学使学幕。宣统年间,又与友人华实甫、蔡松如在家乡合办女子职业学校。宣统三年(1911)顾倬出任“官立江苏第三师范学堂”监督,仿效日本东京师范学校,制订规章制度。民国二年(1913)添办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场所。顾倬任三师校长十年,于1922年春辞职告退。写成《学潮研究》数万言,由中华书局出版。1929年冬,应江苏农民银行之聘,任无锡分行经理。抗战军兴,避地长沙,欲与友朋筹办商业专科学校,不幸患痢疾不治,于1938年7月逝世于长沙。

杭开第 通州人。

侯鸿鉴 (1872—1961),字保三(一作葆三),自号病骥老人,无锡县人。十六岁便设帐授徒,并借“东林书院官师课、上海格致书院时务课、宁波辨志文会经古课膏火、花红,维持家食”。“年十八九,曾两度应童子试暨阳,落选,醉跃江流,同伴救起返里。”^①此时,侯虽未入学,“偕许士雄同应江阴南菁书院经史课,取膏火以佐家食”。但侯已“研求新学,则纵览物理、化学,自习梅氏《算学丛书》、《几何原本》、《四元玉鉴》”。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肄业,“习法文,半日读书,半日教授中院生”。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侯才考上秀才,自称:“应戊戌岁试,以经古学受知于瞿宗师鸿襪,入邑庠。”时已二十七岁了。己亥(1899)补廪膳生。创办务本小学。“附课南菁书院,以膏火济家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顾倬、秦毓均一起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毕业回国,任家乡竣实学堂史地理化乐歌教员,后继任校长。又创办竞志女校。后任江苏省视学多年。其间,于宣统元年(1909),就南菁高等学堂学监半年。又应江西提学使王同愈邀请,任江西省视学。侯工诗词,曾加入南社。辛亥光复,任无锡县临时议会副议长。后应教育部之邀,入京商讨教育诸案。创办无锡图书馆。七年(1918),赴闽任厦门集美师范中学校长。后又受教部委查东三省教育。十三年(1924),“孑身作环球九万一千余里之游,经日、美、英、法、比、德、意、瑞、印、埃、越十一国”,考察各国教育。十七年(1928),又赴福建,任教育厅秘书,代厅长,筹备省图书馆。后返乡就江苏省教育厅秘书、第四科科长。

① 侯鸿鉴自述,《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同此。案:暨阳,江阴古称。

侯鸿鉴一生以推行教育,创办学校为宗旨,清末创业时,“艰难筹措,牺牲一切,知有校而不知有家”。然而“办学痛苦,负债累累”,侯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岁聿云暮,购莲蓬手枪,决心殉学。”办学艰难,由此可见。侯在三十年代的自述中,感叹道:“昔年手创七校,今存者仅一竞志。”无锡竞志女校至1953年才改校名。

侯鸿鉴著作宏富,已出版者,据其自述,已“有教育丛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种教本,《病骥文存》、《诗存》、《反省草》,各种旅行记,共五十六种”。侯鸿鉴为保存乡邦文献,辑有《锡山先哲丛刊》。侯又酷爱书籍、文物和标本的收藏,惜其藏品均毁于“八一三”之役。

黄以仁 (?—1944),字芝年,无锡县人。肄业南菁时,曾师从理化、生物教师钟观光,并和同学武进蒋维乔、无锡顾倬追随钟观光加入中国教育会。蒋维乔回忆此事:“一日,蔡元培、蒋智由自沪致电先生,述及组织中国教育会,请先生率同学加入。维乔与顾倬、黄以仁二人欣然入会,且欲追随先生赴沪。”^①当钟率诸生由江阴渡江,至对岸靖江后,因当天靖江无轮赴沪而事不果。不久,黄以仁即赴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黄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与杜亚泉等人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历时十二年,于民国七年(1918)出版。全书附图一千余幅,辞说四千余条。撰述者列名虽有十三人之多,但黄以仁是唯一植物学专业出身的。据说,黄还是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1年,日本植物学家就已发表了黄以仁所采集的植物标本名录。黄以仁后在河南大学任教,是中国知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抗战期间,黄以仁以古稀之年,拖着病躯,随校迁徙,于颠沛流离中,历尽苦难,终告不支,逝世于河南荆紫关,时在1944年夏。

江炳奎 吴县人。

蒋宝章 无锡县人。

孔昭晋 (1865?—1936),字康侯,号守谦,吴县人。光绪十五年(1899)己丑科乡试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张一麀兄弟、章钰、汪荣宝等共同发起成立苏学会,倡导变法。孔还直接参与办报,为中国最早的文摘报《集成报》作序言。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庚子恩正并科会试进士,进馆肄习法政三年,又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由江苏巡抚奏准在籍办学,孔昭晋在苏州城创办小学堂二十多处。辛亥革命爆发,与地方士绅尤先甲、江衡等人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孔在

① 蒋维乔:《钟宪鬯先生传》,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八。案:又据蒋维乔《竹庄自定年谱》,渡江至靖江欲乘轮赴沪者,除钟、蒋、顾、黄以外,尚有常熟丁祖荫,时在1902年3月。

南菁书院时,有课作《荀彧论》、《广以工代赈说》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雷 斌 字君彦,华亭县人,雷璠之弟。与其兄合编过《闺秀诗话》、《闺秀词话》。民国年间,任过松江图书馆馆长。曾与好友集资购得地方珍贵文物《松江邦彦画像》,捐赠于松江图书馆。

李继钦 江阴县人。又见十六年《学友录》。

刘福祥 常熟县人。

刘谷仪 字筱亭,通州人。光绪二十七年,有数学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三十二年,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

刘如墉 靖江县人。

缪炳组 (1873—1905),字冕卿,江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缪在南菁求学时,已不囿于旧时经史之学,“畴人之学,喜窥其藩;哲学之书,亦研其旨。思欲综贯经史,会通中西,不惮钻求,务穷精力”。缪不但以文学驰名,且具有干济之才,所谓“姚崇世务,以小试而见奇;陈平擘画,以分肉而称善。明以烛理,公以存心。断事深鉴棼丝,振裘务当挈领。一言徐出,众论翕然。充是才也,可以任繁剧、奏循良,参军国之谋,膺交涉之务”。可惜天不假年,“以先祠之事急于清理,冒暑远行,感而成疾”^①,竟不治身亡,年仅33岁。

倪建第 靖江县人。

倪寿龄 吴县人。清末,编译《女学唱歌乐》,由上海文明书局于1906年出版。屡遭清廷学部以提倡自由结婚,“有伤女教”而查禁。^②

潘汝钊 字勉初,江阴县人。

钱沐华 通州人。

秦同培 字于卿,无锡县人。民国年间,编撰多种中小学教科书,如《国民学校新修身教授法》、《初等小学新修身教授法》,译述《天然生活法》、《精神卫生论》等,评注读本《左传》、《汉书》、《国策》等,大都由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出版。秦还于“凭经验所得及个人闻见,采摭集合而成”《撰联指南》一书,出版后深得读者喜爱。

秦毓璠 (1879—1937)^③,又名念萱,字冕甫,号效鲁,无锡县人。光绪二十五

① 祝廷华:《缪炳组传》,《(光绪)东兴缪氏宗谱》,缪幸龙编:《江阴东兴缪氏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四)易俗歌”之婚姻部分,《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48卷,第24—26页。

③ 此据冯自由说,《革命逸史》初集,“秦毓璠事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130页。

年(1899),曾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学习,遭记大过一次。^①后自请退学。^②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与张继、黄兴等组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并任《江苏》杂志总编辑,从事反清活动。回国后,于甲辰(1904)赴湖南讲学,宣扬革命,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众举黄兴为会长,秦毓鎣副之。又赴安徽、广西组织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任锡金军政分府总理。民国元年(1912)一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秦毓鎣兼任总统府秘书。民国二年(1913),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秦毓鎣遭捕入狱,家遭籍没,其继母病中闻耗,卒致不起。秦痛不欲生,在狱中得句云:“柝声敲断还家梦,灯影独窥怜母心。”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秦被释放出狱。秦在狱中三年,成《读庄穷年录》一书二卷。秦毓鎣分别于民国元年、二年、十六年、十七年四次出长无锡县政,后因病辞职,征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卒于家,春秋五十有九。

沙曾诒 字诵先,江阴县人。^③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奖以内阁中书用,改学部七品小京官。沙曾诒曾翻译日本小川银次郎所著的《中等西洋史教科书》,由文明书局于1904年出版。民国初,沙任财政部库藏司主事、金事上办事员。

沙煦 字和斋,江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优贡,浙江试用知县。

盛善登 江阴县人。

宋葆麒 (1870—1928),字曦桥(一作羲樵),溧阳县人。廪贡生。“任溧阳学务十余年,多所振举。”擅行草,能篆刻,“常灯地夜阑,犹奏刀铮铮然,虽隆冬盛暑弗辍。其家人或止之,则曰:‘我自乐此也。’”遗《拙樗印存》十册。平时“喜言诗,顾不苟作。谓:‘天地间皆诗料,但已被前贤掇拾净尽,何用更作为?’间一涉笔,绝可贵。又不留稿,故其诗多不传。”年五十九卒。宋与南菁同学金坛王炳章交谊深厚,没后,王为之作传,称“(宋)不妄交游。独与余交垂四十年,朝夕过从,欢如昆季。”^④

① 吴稚晖:《南洋公学记事稿》,民国前十三年,“九月九日,中院三班生秦毓鎣,亦以文词侵郭教习,戒不听,明日记大过。郭教习痔发,不入课堂”。《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二《文教》。案:吴述此事,似袒秦而不直郭。

② 据冯自由说,秦之自请退学,“以在校倡议举行孔子诞辰纪念,见恶于美人福开森”,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秦毓鎣事略”。案:冯说当亦有据,然吴稚晖所记秦毓鎣因“以文词侵郭教习”而被记大过,或为其退学之直接动因。

③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三《选举表》字作“诵先”。《学友录》作“诵仙”,籍贯则误为武进人,径改。

④ 宋一洲整理《宋葆麒先生传》(《崇仁里宋氏宗谱》卷之五),溧阳图书馆网, <http://www.lylib.net/index>.

孙光圻 无锡县人。民国元年九月,无锡县议事会正式成立,孙光圻任会长。

孙靖圻 (1876—1959),字子远,自号次玄,无锡县人。晚清废科举,兴学校,锡金学务公所成立,孙靖圻等为学务经董,在城乡各地创建多所小学。辛亥革命,任无锡县民政长。北洋政府时期,委为武进、靖江等县知事。曾任国会议员。

孙廷嘉 武进县人。

孙守圻

孙荫墀 无锡县人,清末及民国年间,服务于家乡教育界,曾在匡村中学(今锡山高中)任教。

孙荫培 无锡县人。常州府学增生。编著《最新中国铁路全志》,于光绪三十三年(1903)上海商学会出版,据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本产业志。

孙 钺 (1876—1943),字子鈇,通州人。南菁书院肄习经学。有《论日本变法》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东文学堂,专修日语。次年转入通州师范学习。张謇为规划公共植物园物色筹建人才,经通州师范监理江谦和日籍教师木村中治郎推荐,未等结业,即负责工程建设。三十一年(1905),植物园改为博物苑,继续负责苑务。孙钺征集文物,制作标本,编订篇目,集历史、美术、自然诸项,供通师师生教学之用。民国元年(1912),南通博物苑(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单独开放。第二年,孙钺任主任,兼任通师博物教师,后又任南通学院农科讲师。孙在南通博物苑近三十年,一生都献给了博物馆事业。孙钺著作颇丰,有《日本文法教科书》、《用器画》(与其弟孙杞合作)、《养牛》、《养羊》、《造林全书》、《植物病理学》、《中等农业昆虫学》。晚年撰写《南通植物志》,未成。^①

孙祝耆 字叔久,武进县人。师从华世芳,研习数学。编纂过中学和师范用《代数学教科书》,由中华书局于1914年出版。又著有《成功之代数》等数学书籍。

唐 演 字湘和,阳湖县人。^②肄业书院时,有《荀彧论》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唐忠行 (1879?—?),原名忠渊,字景岩,别号慕梁,吴县人。孔昭晋妹婿。曾肄业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曾在冯国璋幕府办理机要事务。

唐宗愈 (1878—1929),字慕潮,无锡县人,附贡生,唐锡晋长子。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法政专门毕业,曾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法政速成科,学习金融法政。历任

^① 《南通市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学友录》作武进,据《南菁文钞三集》径改。

户部河南司主事，度支部员外郎。赴东北，出任东三省法政学堂总教习，会办奉天大清银行，总办长春、江宁等处大清银行。民国年间，曾任黑龙江财政厅长，督办劝业银行。后绝意仕途，继承父业，专心从事赈灾事业，公推为全国防灾委员会主任，足迹遍及苏、冀、豫、鄂、湘、鲁、皖、蜀、陕、甘等省。唐宗愈还从事法律、经济学图书的编纂翻译工作。早在光绪末年，他就翻译了日本学者所著的《法律关系》、《纸币论》等。

陶恩章（1876?—?），字怵斋，号簪杏，元和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宣统二年（1910），考试举贡，以内阁中书用。民国二年（1913），应署江苏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单镇之邀，任该处科员。单镇转任江苏审计分处处长，陶亦随之任审计处科员。后赴京任审计院书记官，在书记室机要科办事。

王曾荫 武进县人。

王定甲 吴县人。

王观 金坛县人。王与时主《时务报》之汪康年有姻亲关系，曾为南菁书院应时务课事，写信给汪：“敝省南菁讲舍，文宗于六月特课，依经济六门命题，内有理财一题云：‘山西铁路矿物定借洋款，归义、俄两国商人兴办，与中国利源损益若何？’按此，想近今之事，见闻所囿，茫乎未知。因想贵馆《时务报》必早著有论说，用寄一洋，乞择论及此事者代购数册，付局寄下，并祈惠赐谕言，将中国利源损益所在，指示一二门径，俾知趋向。”并请汪寄至“江阴南菁讲舍内印书局”。^①

王敬铭 江阴县人。

王士桢 镇江府学生员。

王文持 吴县人。

吴夔宣（?—1917?），字次皋，后改名策，江都县人。《志》称：

幼聪颖，学诗、古文辞，笔意警峭，异于常人，业师许为雋才。策抱经世志，自视欲然，益自奋励。光绪癸未（1883），补诸生，逾年食廪饩，文名益噪。戊子（1888），就馆宁波榷署。乡试屡荐未售，乃改习兵家书，能通大义焉。乙未（1895），自浙返扬，郡守沈锡晋延科其子。壬寅冬，徐宝山督带五岸緝私各营，聘掌文牒。宝山任侠自喜，有声江淮间，策初识之于京口舟中，即劝其检束徒

^① 《汪康年师友书札》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53 页。

众,建树功业,宝山大感动,益加敬礼。迨宝山督办两淮缉私营务处兼带新胜水师营,尤倚策如左右手。缉务得力,淮盐畅销,策之计画居多。辛亥(1911)九月,孙天生扰乱扬城,劫运库,纵狱囚,逐官吏,全城恐怖,时宝山在镇江,策急电招之,越一日,宝山率兵来扬靖乱,捕天生置之法,地方赖以安堵。时里下河伏莽极多,策建议请宝山亲率兵往剿,而自任保卫扬城之责,阒阒安业,间阎无惊,皆策之力也。宝山部将边振新跋扈妄为,率队入富家搜财物,又擅杀龙振江,复带兵围策住宅,时宝山督队往泰县剿匪,扬州空虚,危险万分,策从容定变,诱振新于瓜州舟次,毙之,亲拊循其部众。逾年,宝山遇炸歿,策伤感之余,遂致终朝惘惘,丁巳冬病嗽卒。^①

吴人达 (1885?—1950?),泰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丁文江一起被泰兴知县龙璋选送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奖举人出身。应聘赴晋,任山西法政专门学堂教务长。民国年间,受山西督军阎锡山之邀,充任秘书。吴人达精通日文,译著有《尧舜时代之制度》、《法律顾问》、《虞美人》、《明代豪杰传》、《军旗美谈》等,他的第一部著作《东语大观》,写得通俗易懂,是学习日语的入门书。吴人达才学出众,也很自负,泰兴籍学者朱东润于1950年代初,曾见过这位同乡前辈,说他“言大而夸”,并记下了吴晚年的一件趣事:

那时泰兴的一位刘家请客,刘家谈起他们的祖父刘统勋,也是一位孝廉公,可是一生不得志,后来郁郁而终,吴人达手挥卫生棒,肯定地说:“没关系。待我做篇文章,刻在集子里,刘大先生就可以不朽了。”这话说完,刘家的后人深深地一揖:“一切都烦吴老伯的清神。”事有不幸,半年之后,吴人达就死了,文章没有做,集子没有刻成,那位刘举人难免终于朽掉。^②

吴廷珍 武进县人。

吴一凤 元和县人。

须毓珍 无锡县人。

徐点撰 武进县人。徐年轻时曾从学于华世芳,故善算学,在当时的常州城极负盛名。吕思勉少时曾问业于他,而吕之学生钱穆亦与他有过一段师生之缘。清

① 陈肇荣修,陈懋森纂:《(民国)江都县新志》卷七《人物传二·吴策》。

② 《朱东润自传》,第44页。统按:朱文中称刘统勋,疑误,可能是刘焕勋。刘焕勋是光绪癸巳科举人,泰兴人,而山东诸城刘统勋、刘墉父子乾隆年间名头太响,人所习知,故朱行文时出此笔误。抑或泰兴亦有此同名同姓之人?

末，钱穆肄业常州府中学堂时，徐点撰曾临时代课数学一科，时间虽短，给同学们的印象却很深。钱穆晚年回忆：

先生为人，落拓不羁。首次上课堂，身穿深红色长袍，口中衔酥糖半块，糖屑溢两唇，手掌中尚留酥糖半块。然诸同学震其名，一堂静默，恭敬有加。先生在堂上不多发言，而时出狂笑声。一同学练习课本上一题，未知演法，上台问，先生狂笑曰：“此易耳，得数当系何。”竟不告此同学以演法。此同学苦演始获解，然最终得数亦竟如先生言。

先生上课不久，诸同学愈益加敬。闻先生将去职，乞留。先生曰：“汝辈旧老师当来，我特应急耳。”因笑曰：“倘使他拜于我门下，亦与诸君同学，我亦不留。”

先生最后一堂课，手持书八本，乃先生自著书，告诸生：“我尝从学于无锡荡口镇之华蘅芳、华世芳两先生，今班上有荡口镇同学八人，当各赠我所著书一部以为纪念。”先生即下讲台，首以一本给余，余坐讲堂之第一位，其余皆在后座，先生一一走就其座授之。先生平时似乎高瞻远瞩，双目在云汉间，俗情世事，全不在眼，乃不意其知班上有从荡口镇来者八人，余七人皆姓华，独余不姓华，亦从荡口镇来，又各知其坐位，此诚先生怪中之又可怪者耶。课后，余读其书，茫然不解，今已不记其书名。后学几何，大喜之，然于数学终未入门，亦不知先生书今日尚有人领会否。然先生为人风格特具，终使余不能忘也。^①

徐公修（1870？—1939），字迈生，又字品之，号慎侯，青浦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乡试举人。徐公修八股文写得很好，“夙工帖括，与金剑花、张雄伯两孝廉、陈挹霏贡士俱蜚声场屋，互争雄长”。又喜吟诗，“平生诗名颇高，然性卞急，不耐深思。鼎革以后，牵于四方社课酬应，邮筒唱和，几于无日无诗，并其游览登临之作，遂逾万首”。诗作虽多，稍欠推敲。在邑中创苔岑社，“远近闻风附和。文酒之欢，月必数举，拈题分韵，相与评赏，以为笑乐，亦一时之盛也”。^②辑有《公羊精义》、《青浦入泮题名录》。著《〈江左校士录·律赋〉注释》、《求志居日记》、《读史千咏》等。

徐锦章 靖江县人。

徐兆璜 江阴县人。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5页。

^② 沈其光：《研粟斋诗话续编》卷六。

徐蒸义（1874—1908），字念慈，以字行。后又改字彦士，别号觉我、东海觉我，昭文县人，廪生。醉心维新，与张鸿、丁祖荫等在家乡创办中西学社，研讨学术。后又筹款创建高等小学堂、进化女校，自任教员、校长。喜欢算学，曾发起组织数学同盟会。又通英文、日文。光绪三十年（1904），与曾朴、丁祖荫等在上海创设《小说林》社，徐念慈任《小说林》杂志编辑主任。他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内容有科幻、军事、冒险等方面。由于徐念慈文史根底深厚，又喜爱科学，懂外文，思想敏锐，这促使他很早就特别对著译科幻小说发生兴趣。徐念慈在翻译了《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谭》后，自己又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因此，徐念慈被学界视为中国近代科幻小说的先行者。徐在上海还先后兼课竞存公学、爱国女校、尚公小学，积劳成疾，于光绪三十四年逝世。一年后，《小说林》社倒闭。

徐政仪 后改名，荆溪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生，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分礼部。南菁同学程宏远记徐政仪拜客事：“宜兴县生徐政仪拜客，片用西式，众人嗤之。”时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四月初八日，书院已改学堂也。^①

许玉庭 苏州府学生。

许毓麒 娄县人。

薛保驛 字望暹，无锡县礼舍镇人。

薛光镔（？—1936），无锡县人，清末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日本法规丛书——《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其中商法的“银行”一章，便由薛光镔译校，详尽介绍了日本从1882年至1900年颁布的18部银行法及实施细则。^②薛归国后，于宣统三年（1911）授七品小京官。北洋政府时期，曾任福建高等审判厅推事。国民政府时期三十年代，任福建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病逝于任上，省会各界送一纸“德被八闽”素幛。^③

薛梦吉 无锡县人。

薛咏杖 无锡县人。

杨冰（1871—1913），字冷仙，东台县人。天资聪颖，爱好算学。先从东台戈右衡学，后入南菁书院深造，从静海崔朝庆学。有《中西算器考》、《读海宁李氏对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② 李婧：《法学构建进程中的近代银行法研究》，“晚清银行法研究的兴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九卷第2期，2009年2月，<http://www.docin.com/p-646259434.html>。

③ 陈鸿鏗：《福州旧时的律师和律师公会》，《闽都文化》杂志2013年第3期。

数探源书后》等多篇算学课作刻入《南菁文钞三集》。光绪二十七年冬，被聘为江南高等学堂算学教习，并派赴日本考察学制。自此，杨在南京任教十年，期间，曾赴济南任山东高等学堂算学讲习，为期不长。民国二年初，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候选人，选举的前两天，突然患病去世。孙中山命人敬送花圈，南菁同学吴稚晖撰墓表，黄炎培撰祭文。崔朝庆吊唁时挥泪说道：“冷仙数学天才，胜我多多，不幸年轻先我而去。”沉痛至极。杨冰是我国二十世纪初有很深造诣的数学家，所著《植树九行图》，当时便大受日本数学家称赞：“即此一篇，便可与西人之共点性及共线性并传。”数十年后，南大数学系主任周伯垞教授仍对杨冰作出很高的评价：“先生治学严谨，其学术思想与近代发展的组合数学，亦有若干暗合之处，七八十年前有此水平，诚属难得。”

杨冰的传统旧学根底亦很深厚，乡前辈翰林院编修夏寅官曾这样称赞杨冰的文学成就和他的孤独性格：“冷仙所作诗词清奇独体，不同于古人。曾作《仿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不逊于蔡氏原文，其文悲惋凄凉，不忍卒读。冷仙天性冰冷彻骨，诚如其名。喜独坐精默。”^①

杨成能（1877—1969），又名新诚（一作性诚、星城、星岑），字橐吾，晚号百耐困叟，武进县人。光绪末年（1908）至辽东。入民国，曾任沈阳图书馆馆长，后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杨是吕思勉的表姐夫，介绍吕于1920年初亦进该校任教三年。1922年，杨成能应邀赴大连，主编《东北文化月报》。1926年，综合性的社团组织宗风学社在大连成立，杨自任社长，除经常举行诗社雅集外，还组建觉民学校。但该学社仅存在约两年时间。1927年杨回沈阳，曾任省政府秘书。杨成能文史书画均有造诣，有《石谱百图》刊行于世，并著有《非非想》、《铁窗鸳侣》、《工夫市》等各种小说。杨又精通日文，译有《满洲发达史》、《东北开发史》等。一生不废吟咏，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尚有诗作以油印本流传于世。逝于北京。

杨惠元 字厚孚，吴县人。

杨德元 吴县人。疑即杨惠元。

杨寿杓（1874—1937），字少云，号楚孙，别署衡意，金匱县人。杨与南菁学长华世芳交谊深厚，“常随其杖履，时相唱和，交谊在师友之间。世芳作古，楚孙遂有风骚无主之感。”后留学日本，与侯毅始等组织“思古诗社”，参加该社的日本诗人，

^① 杨振民、杨振勋：《祖父杨冰事迹概略》，《海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5月。案：杨冰籍贯东台县禾稼庄，现属海安县仇湖乡。

对杨的诗才大为折服，有“天际飞鸿，下有瞻仰”之概。宣统年间，任北京《宪报》编辑，很负声誉。辛亥革命，和邑人创刊《锡报》。民国二年，又独创《新无锡报》，二十六年（1937）停刊，而杨悒悒不乐，不久逝世。杨寿杓平时作诗不自珍惜，随作遂弃。其弟子于师死后，竭力搜罗，得诗二百余首，成《杨楚孙先生诗集》，由杨之亲友集资刊行。^①

杨 琬 字茗玉，东台县人，杨冰之族兄。杨琬因杨冰之保荐，曾留学日本。二十年代做过东台中学校长。日本人来犯之时，宁死不屈。

杨 永 字漱春，东台县人，杨冰之弟。也留学日本，攻习数学。归国后，曾执教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姚祖晋（1881—1930），字康锡，后改字之鹤、公鹤，以字行。阳湖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姚是南菁书院高材生，才思敏捷，同学都很敬佩他。比姚晚进南菁两年的无锡程宏远，在癸巳（1903）四月初八日记中说，同学中“以姚为尤奇，年少才长，独不沾染习气，斯可为敬。每作文，不起草稿，提笔捷书，不加思索，句句奇警，且考据精详，令人莫窥底蕴”。^②对于姚祖晋之月课拔冠，钦佩之至：“经，姚康锡第一；史，李秉良第一，均议论纵横，笔意开展，不愧一堂之冠。”又记下半月第二次月课的完成情况：“十九日，搜索枯肠，至午饭后告成。姚康锡昨日饮酒高卧，今晨始动手，洋洋数千言，顷刻而成，甚以作文为乐。人一己百，对之且羨且媿。”日记最后居然发出“子弟苟非上智，慎勿令其读书，徒苦无益也”的感叹。有《齐论语问王疏证》收入《南菁文钞三集》。

姚祖晋后在乡里协助其兄姚祖泰（姚祖泰先于光绪十九年入南菁书院肄业）兴办钟英小学，率领乡人推倒庙里的菩萨，腾出房子作校舍。清末，至上海谋生，长期供职于司法界、新闻界，间亦涉足政界，与章太炎交好。曾任《申报》主笔。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编写高等小学教材《地理》四册。编撰有《华洋诉讼例案汇编》、《中国监狱史》、《上海闲话》、《上海报业小史》、《上海开埠史》等。姚祖晋当时被称为上海滩一代名儒。

殷履亨 元和县人。

尹文灿 泰兴县人。

①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报坛耆宿杨楚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页。

②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之《南菁日记节钞》，家印本，1953年。案：程于癸巳（1903）入院，时南菁已改学堂，而姚祖晋是书院时期课生，此时仍留在南菁，继续其学业。

余适均 武进县人(江阴?)。

张治清 常熟县人。

周 璆 原名珍,荆溪县人。附贡生,安徽知县。

周仁毅 字镐声,后改名逖,武进县人。著有《镐声文牍》。

周仁撰 武进县人。

周书丹 江阴县人。

朱宝琛 泰兴县人。

朱介曾 字士詹,晚号石公,江阴县人。增贡生,议叙通判,吏部仕学馆毕业,派署京师地审厅推事,补初级厅推事。后以考取县知事分发湖北,补授宜城县知事,历署鄂城、巴东,均著政声,以简任职存记。幼工词章,弱冠后律赋尤擅场,侪辈叹服。^①

朱世增 宝山县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

恩 华 (1872—?)^②,字咏春,京口驻防,镶红旗蒙古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连捷中进士。吏部主事,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任学部员外郎、总务司司长。资政院议员,弼德院参议。入民国,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历任政事堂主计局参事,蒙藏院副总裁、司法部次长。恩华喜欢收藏八旗人著作,凡见一书,必多方购置。后编成《八旗艺文编目》一书,“欲考八旗人著作者,将手此一编,不暇外求矣”。^③

季龙图 (1872—1950),原名瑞章,字景范,盐城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三十年(1904)甲辰科会试进士。派赴日本东京大学法政科学习。归国后,任内阁中书、刑部(后改法部)主事,并教授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在家乡任自治公所所长。入民国,任江苏省高等审检厅江北厅厅长,后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抗战时寄寓上海,直至去世。其间,与南菁同学时有唱

① 谢鼎镛编:《陶社题名录》,《陶社丛编丙集》,1944年铅印本。案:缪荃孙《江阴近事录·仕宦表》称:“署湖北宜城县知事,调署建始。”

②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跋》云“八月上旬,又为华七秩初度”,而该跋写于“重光大荒落”,即辛巳年(1941),故推算其生年为1872年。

③ 宝熙:《八旗艺文编目·序》,恩华:《八旗艺文编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和。季龙图在家乡热心教育，光绪年间便创办新式女子学校“养正女塾”。创立盐城县教育学会。民国年间又先后发起募捐创办盐城贫儿教养院和贫女院，技艺、文化并教。还创办苏北孤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季还投身家乡的实业建设，修建了盐城第一条公路，创立盐城最早的印刷厂。抗战期间，在上海创办培明女子中学和灵芝中学。建立慈善机构上海瞽目救济会。

蒋武森 字东搏，常熟县人。

焦如霖（1870—？），又名焦山，字傅臣（一作辅丞），仪征县学生。宣统二年（1910）优贡，朝考二等，以补用知县分发山东。当过典狱官。曾东游日本，学习生物学，编译《脊椎动物问答》一书。曾在扬州多所学校讲授国文，还担任过江都县师范讲习所所长、教育会会长。焦体形魁梧，声如洪钟，又擅围棋，通武术，据其邑人杜召棠记载：“焦辅丞如霖，性豪爽。诗文敏捷，如其性。幼时有一技，顺风驰数十武，急停后，两足可不着地，踏空退行若干步，但非大风时不能试之。此亲为余言者。”^①故焦还担任过扬州公共体育场场长。

陆长康 字凤荪，江宁县人。自1903年起，担任三江（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历史教习多年，期间，曾派赴日本留学。

缪承金 字丽生，六合县人。南菁同学程宏远记其南菁讲堂宣讲事：“（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因钦定学堂章程有每月朔望教习率诸生上堂宣讲圣谕一条，今日始遵章举行。晨起后，设公案于讲堂，教习东乡立，诸生依次排立于下，讲者南向，据案宣讲，其人姓缪，名承金，字丽生，江宁府六合县人。”^②缪后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理数分类科，宣统元年（1909）毕业，优等，奖举人，中书科中书。”“民国二年（1913），北京分科大学校文科毕业，最优秀，奖文学士。”^③

庞友兰（1874—1947），字馨吾，原名庆先，笔名古愚、老丐，阜宁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任县明达中学堂国文教员。宣统二年（1910）内阁中书。三年（1911）改任民政部七品小京官，分会计科。辛亥革命后，弃官归里。民国元年（1912）任阜宁县筹备国会选举事务所所长。民国三年（1914）被举为东坎市商会会长兼清乡市董。民国八年（1919）奉委为江北苇右营垦务局局长，仅一年即辞职家居。民国十八年（1929）

① 董玉书：《惜馀春轶事》，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16页。

②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③ 民国《六合县续志稿》卷十三《科贡表》。

总纂阜宁县志，三年成稿，后于二十三年（1934）印行《阜宁县新志》。抗战期间，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庞友兰就任新成立的阜东县参议长，与军长陈毅时有唱和。抗战胜利后，于土改复查中，竟被枪决。庞友兰善诗能文，著有《古愚诗文钞》。书法精妙，誉满盐阜。

沈 夔

唐乃钊 字康甫，山阳县人。南菁同学程宏远称其“品学兼优”，并在日记中记唐突发病昏厥事：“（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山阳唐乃钊，字康甫，居道字一号，昨夜忽而昏厥，良久乃醒。据医云，肝阳上动，须静养数天，即可无妨。晨起，总教特临慰问，同乡亦往探望，已精神爽健，起坐如常，咸为惊喜。”^①时南菁总教为刘奉璋，刘亦是书院老课生也。

童富康 山阳县人，淮安府学廪生，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曾赴日留学。清末，参与立宪运动，在江苏宁属咨议局筹备所担任科员。

邢辉栋

云 书（1874—1948），鄂尔图特氏，字企韩，号仲森，后以字行。京口驻防，蒙古正白旗蕙印芳署佐领下附生。云书自称，其祖先“乾隆二十八年奉命移驻京口，兵燹后，谱牒散佚，高祖珠尔杭阿以上名讳失考。”^②祖父为廪贡生，父为江苏补用直隶州知州。云书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入镇江府学读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亥科乡试举人，后入南菁书院深造。三十年（1904）甲辰科会试进士，入翰林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毕业，升翰林院侍讲，宪政筹备处提调。辛亥革命后，补授肃政厅肃政史，裁缺后，改任正白旗蒙古副都统，结识张作霖。1922年，委云书奉天省印花税局局长。1925年，辞职回镇江，孙传芳荐其任长江税务总稽查，无须到署办公，优游林下。喜吟诗，与当地士绅相唱和，尤与赵玉森醉侯交往最密，赵亦是南菁书院课生（见二十一年名录）。抗战期间，告诫后辈不得出任伪职。1947年，云书作《自述》云：“综计一生，无补于清室，无补于民国，并无补于乡邦。清风明月，了此一生。”自称“晚年学佛，以自全焉。”^③云书刊印著作有《渾水清音集》、《关外杂诗》、《汉隐庵诗草》、《梦溪吟社》一、二、三集。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② 云书之光绪丁酉科乡试硃卷。案：据硃卷，云书生于同治癸酉年十二月初十日，则公历应为1874年1月27日，而非如常见资料所说的1873年。

③ “镇江最后的进士”，《镇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1993年10月。

周国士

朱邦杰 淮安县人。与朱邦献为堂兄弟。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优贡,署浙江桐乡县知县。

朱邦献 (1878—1932),淮安县人,光绪癸卯(1883)进士、云南顺宁府知府朱占科之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举人。民国年间,任天津盐业银行经理。

庄增藩**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彦彬**

陈允升 字猷君,金坛县人。

程宏远 (1874—1936),字瑞生,号颂嘉,无锡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南菁肄业一年。曾任教无锡荡口果育小学。入民国,先后执教于无锡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荣氏女校及上海爱国女校,服务教育界三十载。有《宝砚斋遗稿》存世,1953年家印本,其中《南菁日记节钞》记叙南菁学堂事,极有史料价值也。南菁同学青浦戴克宽,于程逝世后撰有《程君颂嘉行状》,内称程“在菁校时,布衣一袭,道貌岸然,朋辈戏以程夫子呼之。余与同学且同斋舍,风雨连床,往往清谈至夜。午时或一尊陶然,弥见温克。或吸兰州小烟,嘘气成云,谈兴益复飏举,盖其真率也如此。”^①

董郁宽

冯国鑫 (1883—1920),字一帆,号灵南,昭文县人。同盟会员,南社社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庠生。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授法科举人,考取内阁中书,人大理院学习推事。民国初,任武进县检察厅长,升江苏高等分厅监督检察官。“二次革命”时,黄兴委冯代理都督,后遭通缉。民国六年(1917年),复任职于浙江第一高等审判分厅,卒于任。著《现行新刑律详解》、《白苹香馆诗钞》、《宣城秋雨录》等。

黄熙曾 字敬舆,华亭县人。

刘章达

^①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1953年家印本。

陆鸿吉（1882—1971），字尹甫，吴县人。家境贫寒，十三岁便当乡塾教师。十五岁入学。后从张一麀学。二十岁，应岁试，补廪生，调取南菁书院。后在家乡出任初等实业学堂校长。宣统元年（1909）公费东渡日本留学，攻读财经，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①民国二年（1913），应同乡又是南菁学长单镇之邀，先后任江苏国税厅筹备处科员、江苏审计处科长兼簿记讲习所主任。在南京期间，为华严庵题楹联：“于此间得少佳趣，微斯人吾与谁归。”民国三年八月，由单镇推荐，赴北京任审计院核算官。^②后入财经界，先后任苏州农民银行、中华银行经理。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选为苏州市政协委员，整理编写苏州文史资料。

闵 櫟 字行之，华亭县人。

潘芳名 字骏声，淮安府人。无锡程宏远记南菁事：“同堂潘芳名者，字骏声，淮安府人，持扇来属书，此真问道于盲矣，辞不获命，为之转托于俞君韵兰。”^③

戚震瀛 字小蓬，山阳县人。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著有《京华百六竹枝词》，宣统三年刊本。

沙志衍 字怀甫，江阴县人。沙从心之子，沙亮功之弟，诸生。京师大学堂、南菁高等学堂肄业，日本巢鸭宏文师范毕业。与章际治之子章霖等创办辅延学校，造就甚众。历任师范讲习所、南菁中学教员。著有《小桃源诗抄》。

沈承憲 苏州府学生员。

王钟琦（1879?—?），字泳深，号奏云，又号醉芸，宝山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乡试举人，就职州学正，国史馆议叙同知，签分山东荐保补缺，后以知府用，山东河工研究所提调。回江苏任吴淞货物税公所委员、淞沪警察厅卫生所科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宝山县视学。入民国，简任职存记，分鲁留苏，任用县知事，省会警察厅科长、督察长，江苏全省警务处秘书科长、视察长。^④

吴传鼎 铸禹，吴县人。

吴辅助 高邮州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优贡，浙江建德县知县。民国初年，出任本县民政长，仅半月即辞职。后任县农会会长、任劝学所所长。曾选为第一届、第三届江苏省议员。邑人修《三续高邮州志》，吴任修志处提调。

① 陆承曜：《潺潺清流——纪念先父陆尹甫》，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史志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

② 单镇：《桂荫居自订年谱》。

③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④ 见《续修宝山县志》卷十二、《宝山县再续志》卷十三《职官志》，王钟琦之癸卯乡试硃卷。

吴山秀（1880—1957），字樵长，阳湖人。宣统二年（1910）任常州府中学堂国文教师，自此与学校风雨同舟四十余年，培育学子无数。周有光回忆，求学常州中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吴山秀老师。学校有次请吴山秀演讲，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吴一上台，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了“各人演讲”。当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吴山秀在解释这些文章时发挥了自己的思考，给学生印象深刻。吴山秀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能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学生看白话文，写白话文章，在中文课上灌输“五四”运动的思想。^①吴山秀工诗文，尤喜读杜甫、元好问的诗。且好音韵之学。曾引《说文》来解释自己的字“樵长”之意：“许氏训‘樵’曰：‘散木。’‘樵长’云者，犹言不材之木之尤者耳。”^②吴有古人风义，尽管自己生活也很艰难，还不时向他人如南菁同学青浦戴克宽伸出援手，所以戴的同乡诗友沈其光称赞吴“晚遭丧乱，修羊益瘦。然笃于风义，虽从井救人不悔，盖今之热腹人也”。五十年代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薛宪清

徐荫曾（1876?—?），字琢孙，号慕郭，别字憩庭，上海县人，徐光启十世孙。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河南候补直隶州州判。

杨祐庆 字绍周，江都县人。

杨 芑 高邮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优贡，旋中本科举人，保举以知县用。

于廷栋

郁振域 字梅阁，镇洋县人。程宏远记其初来南菁，月试即得第一：“（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初三经史课发案，我在特等，超等第一名郁振域，镇洋人，新调到堂，未匝月。”^③宣统元年（1909）己酉，郁在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部试，授司务。

赵钰树 字少枫，东台县人。

周颐昌 字寿甫，江都县人。“世居东乡周家楼，年十九，补诸生，能文章，有声庠序。善化瞿相国鸿谿督学江苏时，赏其才，调入南菁书院肄业。颐昌讲求经史之学，读书有得，辄随手记录，成杂记盈篋。会改书院为学堂，颐昌本旧学以求新知，

① 周有光：《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沈其光：《餠粟斋诗话三编》卷一。

③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于通财一门尤有心得。方拟东渡求学，以妻丧子幼，不果于行。乡居数年，地方凡有兴革，率以身先。尝有剧盗数人，潜逆旅中，将乘夜劫其乡富室，或侦知之，密以告，顾昌纠乡人，出不意掩捕之，无一漏网者。其临事果决如此。事母许以孝闻，处兄弟友爱无间，年三十有七卒，士论惜之。”^①

朱锡琛 献之，仪征县人。肄业南菁时，课卷屡居前列，同学程宏远称其为“品学兼优，能撑持此守旧之局者”之一。^②

朱 燿

《学友录》补遗

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

江 衡 (1852—?)，幼名善宜，字霄纬，元和县人，与金匱华世芳为中表兄弟。光绪九年(1883)入院肄业。^③光绪十四年(1888)与弟江标同中戊子科举人，二十年甲午(1894)恩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官陕西城固县知县。清末曾任元和县高等小学堂监督。民国时，任苏州府官立中学监督。江衡晚年侨居无锡，时唐文治主讲无锡国专，兼任无锡私立中学(今无锡三中)校长，请江衡主持无锡中学校务。江衡博综旧闻，贯通新学。素精算学，著有《句股演代》二卷，刻入《南菁书院丛书》，还著有《句股朴说》一卷、《学计韵言》一卷、《天算答问》十卷。译有《算式集要》四卷、《铎影法》一卷。

李继钊 (1855—?)，字静安，号淡成，又号岱臣，江阴县人，附监生，南菁书院董事冯铭之姊夫。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④云南试用盐大使^⑤。

刘可毅 (1855—1900)，原名毓麟，字葆真，武进人。其父“为商界伟人，名重江淮间。性豪侠，财随手辄尽。”刘毓麟“少失母。读书不屑屑章句之学，其于背诵

① 陈懋森编纂：《江都县新志》卷八《人物传前志补遗》。

②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本。

③ 《南菁书院丛书》第四、五两集所收均为南菁高材生之作，而江衡之《句股演代》即为该《丛书》之第五集第二种。又据唐浩镇之光绪癸巳恩科乡试硃卷，其履历栏内所记南菁书院的受业、问业师中有张文虎、江衡等，故可断定江衡于光绪九年入院。

④ 李继钊之甲午科顺天乡试卷之履历栏内：“咸丰四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又，受业师栏中有南菁书院掌教张文虎，故可知李于光绪九年即入南菁肄业。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⑤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三《选举》。

了无以异人也。比弱冠，贯串群籍，尤熟于本朝掌故，及咸同中兴诸将帅之渊源派别，下至术数家、小说家、一切纤闻琐事，一寓目，即无只字遗忘。或举以相诘，应声辄答。汪同年颂年戏谓“刘大记，丑而博。”虽谑言，而实录也。其文章，初好为骈骊，多奇字拗句。已而大肆力于汉魏，而得其雄深奥衍之气”。黄体芳校士江左，“一见洒然异之，以为刘越石、陈同甫一流人也。引之坐前，抵掌高论。”^①刘可毅于光绪九年(1883)入院肄业，文名藉甚，深得黄体芳赏识。赵椿年回忆：“书院首次甄别，古学题为《七洲洋赋》，刘葆真首列，其时尚名毓麟，后改可毅。”^②刘还是同乡董康之授业师。^③

光绪十一年乙酉科拔贡。十三年，由黄体芳函荐，入江宁布政使许振祎幕。“奉新幕下多人才，宾从往来，文酒游讌无虚日。”^④宾主十分相得。十五年己丑科乡试中式，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试第一名。“座主常熟翁叔平忻然语人曰：‘吾得刘生，目尚不盲也。’”^⑤关于刘可毅得中该科会元事，可算是清末科场一段掌故。据说，主考官翁同龢钟意之人乃是通州张謇。夏仁虎记道：“壬辰常熟主礼闹，搜张季直簪之卷甚力，某房得苏籍一卷，古雅朴茂，同座传观相嗟异，谓必张卷，拔冠群士。暨唱名，则武进刘可毅也。遍询诸房考，无知此名者，常熟甚懊丧。刘字葆真，亦世家宿学，向在许仙屏河帅幕。初名某，旋梦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字模糊，但辨右为‘受’，临试更名焉。暨中式，入谒常熟，询其家世，并省为宿学，亟为延誉，一日而名满都下，遂与馆选。后刘常疑‘毅’字近‘殺’（杀），同辈亦以‘可杀’戏呼之，颇有怀刑之惧。庚子拳乱，竟被戕矣。”^⑥

刘可毅“工诗古文，湛深博大，出自天授。于经史大义、中外近情，循流讨源，贯澈首尾，旁及艺物裨乘，一名一物之微，大叩小叩，无不应者。尤熟于中兴兵事，酒酣耳热，激直慷慨”。^⑦刘可毅“为人慷爽无城府。遇流俗人及新进少年，礼下之，惟恐不当意。一见王公贵人有势力者，辄抗言庄论，不屑为软媚之态以相迎悦”。^⑧所以仕途不畅。以贫，不能久居京师，仍入许振祎幕，随之入豫、入粤。后由孙家鼐奏

①④⑧ 刘树屏：《伯兄葆真家传》，《刘葆真太史遗集》卷下。

②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

③ 董康之己丑科会试试卷，履历栏内所列受业师中有刘毓麟，称：“刘葆真夫子印毓麟，光绪己丑恩科举人。”则弟子比老师早一年释褐。顾廷龙：《清代试卷集成》。

⑤ 唐文治：《刘君葆真传》，《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

⑥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六《考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⑦ 张惟骧：《毗陵名人小传》卷九。

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庚子年(1900),义和团起,刘可毅送家眷南归,返途中遇害,骸骨无觅。^①遗稿大多散失,其堂弟葆良“伤君之亡,骸骨不返,掇拾莲幕代言之笔,琐院应试之文,得数十篇,厘为二卷”,^②即《刘葆真太史遗集》上下两卷,缪荃孙为作《序》,称两人“意气既投,金石同嗜,过从益密”,然今仅存此区区数十篇,且其中不少“莲幕代言之笔,琐院应试之文”,不禁又感伤地说:“此何足以传君哉!”

唐文治后为作《传》,文末论曰:“余与君初相识于书院时,谈经论史,商论古今,旁若无人者如昨日事耳。拳祸作,余时避地京师北山之阳,鹤唳风声,几不能免。及出,闻君死,则大戚,泣下不能已。”

刘法曾 (1857—?),字心伯,号挚纯,一字穉尊,泰州人。壬午(1882年)科副取优贡,明年,调赴南菁书院肄业。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举人。^③

闵萃祥 (1849—1904),字颐生,华亭人。南汇张文虎的入室弟子,光绪九年(1883),随其师在南菁近半年。同门弟子张锡恭称其“平居澹泊,布衣蔬食,泰然自得。长于治生,而家无余钱。文笔雅洁,而未尝应试。晚岁以赈捐得太常寺博士衔,非君所好也”。^④“君既传南汇之学,百氏之书靡不钩考,而得其要。善古文辞,深入南汇之室,其神合处,几如淄渑。”光绪初年,协纂《华亭县志》。又参与修纂《松江府续志》事,“绘一郡舆图,于水道考核尤详”。编《郑雅》若干卷,撰王建《宫词注》若干卷。“生平未尝入官署,而民瘼之大者,辄道有力者决行之,乡民隐受其福,而不知君所为也。”文章朴茂渊懿,著有《式古训斋文集》四卷。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二十一有《传》。

孙启泰 (1864—?),字瞿仙,号叔平,又号东萍,上元县人,江宁府学生。光绪九年入院肄业,十一年乙酉科拔贡生,旋中该科乡试举人。^⑤

万康 (1851—?),字湘生,号季乐,又号寄麓。光绪九年入院肄业,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⑥官浙江景宁县知县。^⑦

① 据在京常州籍同僚顾毓鼎、朱启勋、董康等,在刘惨遭横死后一年多后,所呈《请恤呈稿》中说:“去岁拳匪滋事,以该编修在大学堂当差,目为西学,欲得而甘心。该编修于五月二十日因事出门,遭乱民于途中掣之而去,拥至通州,遂无下落。事后访查,知已被戕身死,情形甚惨”云云。

② 缪荃孙:《刘太史集序》,以下引文同。

③ 刘法曾戊子江南乡试试卷,顾廷龙:《清代试卷集成》。

④ 张锡恭:《闵颐生传》,《茹茶轩续集》卷六。以下引文出处同。

⑤ 孙启泰之乙酉乡试试卷,受业师中有:“张文虎,前主讲南菁书院。”

⑥ 万康之光绪乙酉拔贡试卷,履历:“父贡珍,道光辛巳举人,癸未进士,官湖南巡抚,大理寺卿。”书院肄业师有张文虎、黄以周。顾廷龙《清代试卷集成》。

⑦ 《(光宣)宣荆续志》卷八《选举表》。称:万康“原名栝”。

汪锡增（1858—?），谱名龙琛，字季航，上海县人。光绪九年入院肄业，十一年（1885）乙酉拔贡。^①民国初，曾继叶景沅任上海敬业中学校长。

王廷樑（1854?—?），原名廷柄，字斗槎，号柱臣，娄县人。光绪九年肄业南菁书院时，与松江籍同学数人曾游江边鹅鼻嘴，闵萃祥有诗记其事。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乡试举人。^②

顾仰熙 字穆之，盐城县人。与陈玉树友善。“负文誉，善教授，门下多知名之士。事亲孝，居母丧，以守礼称。”与高镜蓉、殷寿辰先后肄业南菁书院，称高材生。^③

茅谦^④（1948—1917），字子贞，号肺山，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入湖南学政张燮钧幕。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选授高淳县学训导，改河南候补知县，保用直隶州加知府衔。入民国，聘为清史馆协修，曾任广东图书馆长。著有《肺山诗文集》、《水利刍议》若干卷。茅谦“顾身杰立，高气伟视，杂论经笈史事、朝野政俗”，“若河泄而渠决，大声震教室”。^⑤桥梁学家茅以升是茅谦的孙子。

姚熙（1855?—?），字诵穆，一字仲墨，号敬候，通州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优贡。^⑥后以知县用。

姚文枬^⑦（1857—1934），字子让，一字尔梅，又字农盒，上海县人。父姚元滋以大挑举人一等，署浙江杭州府富阳县知县。兄姚文栋，有名于时。姚文枬早年肄业龙门书院，受业于刘熙载，与张焕纶、沈恩孚、李平书、袁希涛等人同门。光绪壬午优贡，乙酉举人。姚文枬何时入南菁书院，待考。不过，张一麀提起南菁书院高材生，确有姚文枬在内：“然江南人才渊薮，以南菁为最，吾乡若曹元弼、胡玉缙之经学，曹元忠、金天翻之词章，皆一时之选。他郡如武进之刘可毅、谢钟英，无锡之孙揆均，松江之姚文枬、于鬯、赵世修，并负物望。”^⑧

晚清民初，姚文枬历董上海城邑各项公事阅二十年，于地方自治、教育事业贡

① 汪锡增之乙酉拔贡硃卷，受业师中有张文虎，前主讲南菁书院。

② 王廷樑之乙酉江南乡试硃卷，受业师中有张文虎主讲南菁。

③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人物》。

④ 当年陈庆年、茅谦向江鄂编译书局总纂缪荃孙推荐柳诒徵时，据柳诒徵说：“两君皆缪先生南菁书院门下士，故同荐吾于缪先生。”柳曾符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⑤ 柳诒徵：《里乘》二十五《茅子贞先生墓志铭》。

⑥ 姚熙之光绪戊子优贡硃卷，其书院肄业师栏内有黄元同。姚为该科优贡第六名。

⑦ 案：王先谦视学江苏（1885—1888）时，捐横沙岛万亩沙田给南菁书院的姚文枬，字访梅，浙江嘉兴人氏，是另一人，年龄要比上海的这位姚文枬大上三十多岁。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两人同名同姓，字号又相近，且都与南菁书院有关，故有相关资料将二人混为一谈的情况。

⑧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黄漱兰视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献甚大。民初选为众议院议员。主纂民国《上海县续志》。

范本礼（1855—1894），字荔泉（一作礼泉），号涤新，上海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优贡。范本礼“年十五游庠，入龙门书院，精研性理，并究心经史、舆地、掌故、算术等学。同院张焕纶创正蒙书院，本礼任教授，以开办费绌，不受修者一年，并捐助校用杂物。教法不严厉而人自恪遵。嗣崇仰湘乡曾氏，取‘涤公新吾’意，自号涤新。戊子（1888），受督学王先谦知，以优贡考取教职。寻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台抚邵友濂聘襄幕事，综理案牍，辑民抚番，诸多规画。甲午七月闻继母讣，冒海警归，以毁卒，年止四十有一。”^①

王先谦刻《续经解》时，范本礼参与校讎，复校达 166 卷之多。范有《吴疆域图说》三卷刻入《南菁书院丛书》第四集。

于 鬯 见《名人传》。

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1886—1890）

包祖同 字晓村，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缪荃孙主书院古学讲席时，费念慈致信与缪，请补包为住院生，费说：“弟有友名包祖同，（子丹先生之子，境况极累，年过四十，极肯用功，而苦于衣食之类，如得住院，便可专心矣。）肄业南菁，未得住院，如开课名次稍前，能为补入否？凭文试士，不敢妄置一辞也。”^②后果如愿，缪荃孙发第一次古学课卷，包祖同第一。^③

陈 育 字仲英，无锡人。吴稚晖之表兄，与吴同年（1889）入院肄业，现代作家陈源之父。清末民初，陈育后与无锡同乡廉泉、俞复、丁宝书等创办上海文明书局，陈管理财务。朱东润回忆：“1912 年暑假后，由陈源介绍入文明书局当校对。主持人廉惠卿，从未到场。总经理是俞仲还，副经理是丁云轩，总账房是通伯的父亲陈仲英，书局里称为‘三大宪’。都是无锡人，态度诚恳，办事认真，具有创业精神。”^④

董 康（1867—1947），原名寿金，字授经（一作绶经、绶金），号诵芬室主任，武进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十六年（1890）庚寅科进士。官任刑部

①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八。

② 费念慈致缪荃孙信第九十一通，顾廷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第 366 页。

③ 据缪荃孙日记，该年十月九日，“发第一课，以包君祖同卷首选（晓村）。”《艺风老人日记》。

④ 《朱东润自传》，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

主事、郎中。参与清末修律活动。又出访日本，考察刑事诉讼、裁判所、监狱、死刑执行等制度，回国后，主持编译多种法律资料，参与《大清律例》的修改，力主刑罚的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废除凌迟的奏折，就出于董康之手。董还参与其他法律的编纂修订，光绪三十年（1908）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据说也出自董康之手。

辛亥革命，董康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回国后，三任大理院院长，一任司法总长。完成《刑法修正案》的编纂。曾因查处财政部债券贪污案，颇得民心，出任财政总长。有人称其为“董圣人”。民国十五年，提倡地方自治，遭孙传芳通缉，再次东渡日本避难，遍访藏书机构，广交汉学家，辑录汉文书籍，写成名作《书舶庸谭》。回国后，在上海当律师，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有民国四大法学家之首的美誉。不久，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法科及国学研究所教授。著《中国法制史》。抗战爆发，董康先后出任日伪华北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司法要职。抗战胜利，被捕入狱，民国三十六年病逝于医院。

董康才情横溢，又精通目录版本之学，喜藏书、刻书，所刻书籍精美绝伦。董康曾编《曲海总目提要》，被学界认为可与王国维、吴梅鼎足而三。

胡炳益（1867—？），字谦冲，又字复修，号钝槌，又号钝叟，别号镜沂。昭文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二甲四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廉泉（1868—1931），字慧卿，号南湖，金匱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曾官户部主事、郎中。精诗文，嗜金石书法。在家乡无锡资助开办学堂。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应用先进印刷技术，编印新学教科书。著有《南湖集》等。

于玉峰（1872—1889），早逝，年仅十八。时王先谦离开江阴才一年，闻耗叹道：“于生可怜之至。”^①于玉峰在南菁，曾执弟子礼于同窗唐文治。于玉峰歿后，唐文治为编次遗稿，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作序。序中记两人友谊十分感人：“光绪戊子之春，余与玉峰始相见于江阴南菁讲舍，时玉峰年十七，亭亭玉立，心已器之。既玉峰过余，谈理学大旨，心折余言，遂执弟子礼。……爰进以周程张朱诸先儒性理之书，并告以忠孝礼仪、躬行实践之旨，玉峰喜甚，拳拳服膺，益自砥砺，以为天下之道在是矣。……余己丑下第，暂馆津沽。冬间得同年章君琴若书，谓玉峰以病歿矣。余大惊悼，为出涕者数日。”唐文治为之感慨不已：“夫寿命之丰啬，虽气数之适

^① 王先谦致缪荃孙书第四十二通：“于生可怜之至。金君（案：泰兴金弑）不记何时入学？从前兄未物色及之，可知疏漏。江都有王景沂，已补廩，年少能文，然亦瘦弱可虑。人才辈出，惟秀实乃慨快耳。”

然，而余独怪夫举世汶汶之中偶有能不为风气所转移者，天每摧折之，以至于死，是真大惑不可解者。当戊子、己丑之时，士大夫咸摭拾琐言，张皇碎义，以期揣摩当道者之耳目，而玉峰独能深信余，毅然不顾世俗人之好尚，相与从事于声希味淡之中，以潜研夫身心性命之学，是真能不为风气所转移者，乃由此已中造物之忌。悲夫，玉峰之死，岂特于氏之不幸，固吾党之不幸也。”^①

张相文（1867—1933），字蔚西，桃源（今泗阳）县人。早年多蒙桃源教谕无锡堰桥胡丽荣提携。光绪十二年（1886），王先谦按临淮安，张相文岁考以第二名入学。先后在桃源县令及桃源训导家当西席。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上海南洋公学，充师范生兼教留学班（小学），学习日文。与傅运森、白作霖合译《列国岁计政要》，编《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达二百余万部，出乎意料，由是海内谈地理者无不知之”。^②“教科书”名称的出世，自张始。三十三年秋，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之聘，充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主持校务（校长为傅自兼）。三十四年与白毓昆等人创立中国地学会于天津，任会长，主持其事约二十年之久，出《地理杂志》至百余册。民国元年，选为国会议员。六年，应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国史馆编纂，兼授中国地理沿革史。九年，研究佛学，拜谛闲为师，辞北京大学事。十七年，南游，在家乡淮阴中学演讲，演讲中“对于现在政党之满街贴打倒帝国主义标语，有所指摘。谓环我为邻之帝国主义者，无不较我为强，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危道也。”被某青年谓为反革命，几遭不测。十八年，庄蕴宽为江苏省通志局总纂，张相文被聘分纂，任水利、宗教二门。晚年，因高血压，终于不治，逝世于北京。

孟森为作《墓表》，其中记有两人交谈治学事：“君又尝言‘力学最宜于壮岁，而三十以前，局于应试之文，读书已晚。迨稍窥门径，精力渐衰’，辄以为恨。”孟森有同感，“故相语尤契”。张著有《南园丛稿》，赠送孟森时，还很遗憾地说：“余所学不专，未能原本《六经》，为学人开广大之门。”孟则“亦不以君为过谦”，“然前无承藉，一抒心得，品诣固当在讲宗派、矜门面者上也”。^③钮永建曾作挽联，前有识语：“蔚西先生，江阴南菁讲舍时同学，湛深舆地之学，持论宏伟卓绝，诚国学中有数之巨子

① 唐文治：《于玉峰遗稿序（甲辰）》，《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

② 张星煌编：《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

③ 孟森：《张君蔚西墓表》，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八。

也。去春，建至北平仅三日，彼此过从甚欢。诂仅逾年，遂已作古，感怆何已。”联云：“精史地，与亭林宛溪异曲同工，江国久盟心，把剑谈玄钦上舍；诉衷肠，记去岁春明班荆道故，燕云重聚首，边氛满地哭斯人。”^①

凌学攸（1862—1918），原名霄，字伯升，号溉泉，无锡县人。肄业南菁书院。又从俞樾游。附贡生，内阁中书衔，候选州同知。喜游历，通经史，藏书甚富。著有《溉泉楼诗文词稿》。^②

吴凤翮 光绪十五年（1899）在院肄业时，得缪荃孙赏识，两次古学月课连得第一。^③

薛饒五 字受兼，江阴县人。光绪十五年（1899）前后，在院肄业。^④民初，曾主持续修《江阴薛氏族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

储南强（1876—1959），字铸农，晚号简翁，宜兴县人，廩贡生。在南菁书院肄业时，与蒋维乔同学，蒋称“南强温文倜傥，同学中皆乐就之，与余尤称莫逆”。^⑤民初，先后任宜兴县、南通县知事。后脱离官场，返乡，开发建设宜兴古迹善卷洞和张公洞，解放后捐献给国家。平生富收藏。1953年，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其侄储安平幼失怙恃，储南强恪尽世父之责，养之教之，储安平终身感铭。

华同揆（1869？—？），原名阳，谱名钰，字梓敬，号函一，武进县人。常州府学廩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乡试举人。^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

蔡文森（1879—1956），字禹门，无锡县人。蔡文森之弟。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学，肄业南菁书院。次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后离校入爱国学社。返乡，创设无锡城北、城南两小学。光绪三十年，创办理化研究所，附设锡金公学。该年冬

① 张相文：《南园丛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② 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③ 《艺风老人日记》，己丑，“三月廿五日，开学，出课题，发二月廿五日课期案，以吴凤翮为第一。”“四月十日，发二月廿五日课期案，以吴生凤翮为第一。”

④ 《艺风老人日记》，己丑，“六月二日，门人……薛受兼饒五来见。”

⑤ 蒋维乔《曹颖甫先生传》，江阴政协：《江阴文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10月。

⑥ 华同揆之光绪丁酉科乡试试卷，肄业师栏内有黄以周、林颐山。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

赴日本东京，二年后考入京都医学专门学校，五年后毕业回国。辛亥革命，任沪军都督府军医课长。后在上海南市设立诊所。民国二年，任苏州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次年组织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参加医学名词审查会工作，兼任附属医院院长。后迁寓上海。任上海医师公会副会长、全国医师公会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投资五洲药厂。1956年聘任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陈允中（1875—？），字权均，金坛县人。少时天资聪颖，“为瞿鸿禨所赏识，入南菁书院，由是得与大江南北豪杰交游，而学乃益进。”后游学日本。归国后，曾任师范学校校长。“兼为本省筹办苏属地方自治。同时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及武昌起义，君躬与都督府参谋，于军事多所擘画。民初，当选为众议院议员。”^①

顾侑基（1864？—？），字燕绥，号饮虞，一号芳孙，通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举人。^②

孟森 见《名人传》。

潘敦先（1868—？），字叔重，号符生，吴县人。潘遵祁第三子。肄业南菁书院时，与吴江金松岑同学，金称“叔重恂恂有贵公子态”。^③光绪二十四年（1898）江苏学政瞿鸿禨保举经济特科时，于江苏士子（全为南菁书院院生）中择优附送六人，潘为其中之一人，瞿的考语为：“潘敦先，吴县，留心时事，亦知西文。”^④贡生，江西候补同知，署庐陵县知县，二品衔直隶候补道。著有《小三松堂诗集》四卷附杂著一卷。

沙彦楷（1875—1970），字武曾，一字伯躬，宜兴县人，回族。早年就读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京师法律学堂毕业，两浙补用盐大使，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分厅推事，充民庭庭长，改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署民二庭庭长。民国二十年，选为国会议员。后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⑤抗战胜利后，组建民社党革新委员会，任副主席、主席。1949年9月，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孙锡皋（1880—1912），字鸣仙，无锡县石塘湾人。性好学，手不释卷，尤喜读史，过目不忘。光绪二十四年入学，继肄业南菁书院。次年转学上海南洋公学，旋

① 佐藤三郎辑：《民国之精华》，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辑。

② 顾侑基之癸卯恩科乡试试卷，书院肄业师中有黄以周、林颀山。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

③ 金松岑：《气听斋诗抄序》。

④ 瞿鸿禨：《保举经济特科片》，《瞿鸿禨奏稿选录》，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3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因学潮退学，回里任东林学堂教师，并义务兼课于竞志女校师范学堂。1909年任竣实学堂校长，多所擘画。次年推为锡金教育会副会长，助编《锡金白话报》，提倡科学和白话文。辛亥光复誓师之日，率竣实学堂学生参与。精于史地，文明书局特约编辑史地教科书。^①

吴曾源（1870？—？），字守经，号伯渊，又号九珠，吴县人，苏州府学生。嘉庆壬戌科会、状吴廷琛之曾孙。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②官内阁中书。

许朝贵 嘉定县人。有《论明代官制得失》刻入《南菁文钞三集》。

郁慕侠（1882—1966），青浦县人。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民国初年，曾在求实小学、龙门附小任教。1913年进入报界，先后供职于《时事新报》和《沪报》，并任汉口《武汉商报》、天津《益世报》、北京《晨报》等报馆的通讯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文管会编纂。1961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③

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时代^④

案：南菁高等学堂预科，《学友录》共记录两届毕业生。第一届预科毕业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主持考试者为最后一任江苏学政唐景崇，毕业人数为四十九人。第二届预科毕业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主持考试者为首任江苏提学使周学模，毕业人数为七十一人。两届毕业时间仅相隔八月。学堂时期的学生，不少都经历了书院和学堂这两个学习内容和形式大有不同的时期，但具体到各人的入院肄业的时间，则已很难一一考证。

据无锡陈作霖的回忆，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江苏学政唐景崇到校举行毕业考试，取最优等者四名，第一、第二分别为江都叶惟善和丹徒叶玉森，江苏人士称为“南菁二叶”；第三、第四则分别为盐城李禀良和陈作霖自己。二叶由清廷奖给拔贡，而陈则与李因学年不足，改奖优贡。^⑤

陈作霖与李禀良，没能与“南菁二叶”那样被奖给拔贡，而只是改奖优贡，是因

①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二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8页。

② 吴曾源之丁酉科乡试试卷，书院肄业师栏内有黄以周、林颀山。顾廷龙：《清代试卷集成》。

③ 《上海鳞爪》之“出版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学友录》原作“南菁文科高等学堂时代”，实误。说见前。

⑤ 《陈作霖自述》，见《锡金游序同人自述汇刊》，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无锡图书馆藏。

为“学年不足”。而陈是书院实质上改为学堂的第一年(1902)调入学堂,那么,二叶早在书院时期即已进院肄业了,只是具体入院时间不详。又如通州达亨,也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预科第一届毕业,但他于二十三年(1897)即已入南菁书院肄业,一人名字,两见于《学友录》。

可见,1906年南菁高等学堂两批预科毕业的学生中,一定有不少早在书院时期就已在南菁攻读经史词章的了,所以,仍录题名如下,或可补书院名录之缺。并一如对书院课生那样,稍作考述。

《学友录》中,少数毕业生原有“通信处”者,现仍照录不误。

预科第一届

案:该名录有可能是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时的名次排列的。如列第一者,为江都叶惟善,叶当时以第一名毕业。镇江叶玉森以第二名毕业,则列第二。时有“江南一叶,江北一叶”之誉,或称“南菁二叶”。

叶惟善 (1876—1925),字治谷(亦作贻谷),“甘泉廩生。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毕业,奖励贡生。清末任两淮师范学堂(案:学校在扬州)堂长。鼎革后,任江都县督学,县署第三科科长,劝学所所长,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案:校在海州,今连云港。叶于1920年创办)校长等职。耿介无私,明敏勤慎。任劝学所所长时,清查学田,扫除积弊,恒于风雨寒暑中不辞劳瘁,亲赴偏僻乡隅,考察各校,人敬畏之。某年当选省议会,初选时贿选风行,每票值千金,君投己名一票而出,可见其节概。工骈散文,诗赋尤脍炙人口,为冶春后社知名之士。以精历史名,著有《师范学校历史》,已于某书局出版。诗词文赋稿未刻。卒于民国十四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①

叶氏为当时扬州文人所结诗社“冶春后社”中知名人士,乡后辈杜召棠对叶之行事尚有更为刻画入微的描绘,可与前辈董玉书所述相印证:“叶贻谷惟善,工词赋,喜吟咏,廩膳生。读书南菁书院,卒業归。当时老辈如臧宜孙等,以其年少,忽视之。一日七唱第三联为‘凝蟹’二字,全体无佳句,君得冠军。自此刮目相看,名大噪矣。其联如下:‘山馆翠凝苔藓路,霜盘紫蟹菊花天。’君尝当选为江苏省议会初选当选人,时公然买票,最高价千金以上,最低亦酬百元。君寓旅邸,户限为穿,

^①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补录》,第190页。案:《南菁学友录》称叶惟善之籍贯为江都,因民初甘泉已并入江都也。

不胜其烦，皆笑颌之。投票出，语人云：‘吾友良多，因限选一人，不能列举，无已，乃书己名。乡人信吾而选吾，吾亦信乡人之所信而选之也。’耿介如此。又尝任江都劝学所长，以严厉名。时各小学不能按时授课，偶遇风雨，寂无一人。君每于风雨中或大雪纷飞时，破晓而往，虽隔数十里，弗计也。凡旷职者必停聘，风气为之一振。”^①

叶氏曾于民国元年(1912)任省立第五师范(校在扬州)学监兼授文史。1922年，应南菁同窗，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蒋维乔之邀，由连云港返回扬州接任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前身)校长，直至病逝。此两校后合并为省立扬州中学。叶惟善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任用教师，尤重师德，他说：“资格虽好，学识虽富，教学不热心，等于零。众望不孚，其人言行必有不是之处，岂能为人师表！”旅居台湾的凌绍祖在《忆第八中学》一文中说：“叶校长，扬州人，为一饱学知名之儒者。态度严肃，工作认真。平时喜着长袍马褂，沉默考查各位教员之教授法、各班级学生上课之秩序以及课外活动情形。有时在校内任何场合，一转头即可见其正在身旁，既注重学生学业，更注重学校风气，抱‘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信条，为全校师生敬爱之老校长。”旅居美国的陈广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叶惟善，他说，扬州八中前校长李更生，身宽体胖，健步如飞，后校长叶贻穀先生，瘦骨嶙峋，大眼灼灼，精神充沛，工词赋，以严厉闻名。叶氏遗稿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②

叶惟善之长子叶秀峰(学香)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统局局长。

叶玉森(1880—1933)，字红于(一作荻渔)，号中冷，丹徒县人。祖先为满洲旗人，乾隆年间脱离旗籍定居镇江。叶玉森天资颖拔，年未弱冠，即与赵声同案入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第二名毕业于南菁高等学堂。宣统元年(1909)优贡，年底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在日加入同盟会。某日游靖国神社，见到日本在甲午、庚子战争中所俘获中国战利品，不禁含泪而出，郁郁不欢者多日。回国后，任教南京。民国初，任丹徒县议会议员，后任苏州高等法院推事兼监察庭长，与柳亚子友善，加入南社。不久，赴安徽任和县厘金局局长，又得柳亚子介绍入安徽督军倪嗣冲幕，旋为滁县县知事，调颖上县县知事，改任当涂县县长。因倦于宦游，又迫于生计，欲谋一枝之栖，经同乡好友吴庠介绍，于1925年到上海，任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长，时兼上海大学教职。

① 杜召棠：《惜馀春轶事》，广陵书社2005年版。案：臧宜孙即冶春后社社长臧谷。

② 顾一平：《诗人、教育家叶惟善》，载《扬州晚报》第B03版：老扬州，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1931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叶玉森仓皇逃难，受寒而得肺病，久治不愈，于贫病交迫中逝世。^①

叶玉森多才多艺，天资聪颖，好读书，藏书满家。诗文、书画、篆刻，乃至数学、音乐无所不精。著有《枫园画友录》、《春冰词》等。叶所著小说如《玉楼梦史》等则大都发表在民国初年的文学刊物上。在日本时，叶曾解解析几何难题。至今镇江图书馆收藏他的一册算稿，涉及微积分、代数、三角等领域。叶还创作、翻译了不少少年儿童歌曲，编纂出版《小学唱歌集》、《女子新唱歌》等。

然而，其最著名者，除诗文外，则推对古文字尤其是对甲骨文的研究，影响最大，著作最多。1925年，叶玉森手写《殷契钩沉》二卷石印，刊于《学衡》杂志二十四期，并出单行本，卷首有著名学者柳诒徵所写骈文序言一篇，以为此书有“辅经”、“坤史”、“彻籀”、“翼许”之长，而蒞渔用经生家法，故能为契学宗师。^②叶后又成《说契》、《研契枝谭》、《殷墟书契前编集释》、《铁云藏龟拾遗》等有关甲骨文研究的著作。叶去世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披览叶玉森遗著，缅怀故人，在《殷墟书契前编集释》扉页上题记：“蒞渔于契文多创获，贡献功伟，余所夙佩。廿二年春，史言所（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沪，得与往还，相交日深，蒞渔且有邀集同人创设契学会之议，余方联络故旧，从事组织，而是年秋，蒞渔遽以瘵歿，会亦中辍。悲夫！今披览遗稿，犹不禁为之扼腕太息也。”^③

李秉良 字守彝，盐城人。南菁高等学堂高才生，其同窗无锡程宏远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发前届课案，《经》姚康锡第一，《史》李秉良第一，均议论纵横，笔意开展，不愧一堂之冠。”^④对他很是钦佩。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第三名毕业。辛亥革命时，盐城上冈缉私驻军索要双饷，图谋不轨，李与另一士绅张逸笙秘密赴宁请愿，危机得以解决。^⑤

陈作霖（1881—1956），字湛如，号济民，又号真如，无锡县人。家住无锡小娄

① 据柳诒徵之孙柳曾符说，叶玉森仓皇逃难时，将珍藏的一千余片甲骨寄存在“同乡好友吴某处，不料及至事平，玉森至吴某处取物，吴竟云已不知去向，先生气急交加，本有气管炎及肺病，至一九三三年秋，竟以此去世”。柳曾符：《叶玉森先生事辑》，载《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7年12月。案：吴某，即指吴庠。当时，丁传靖、吴庠与叶玉森文名卓著，称“京口三子”，叶最年少。

② 柳曾符：《叶玉森先生事辑》，载《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7年12月。

③ 百度百科“叶玉森”条，<http://baike.baidu.com/view/210790.htm?fr=aladdin>。

④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事。1953年家印本。

⑤ 盐城市盐都区政协网，《记区政协委员张逸笙》，<http://www.jsydzx.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22>。

巷底田基浜。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学成秀才。二十八年,科试第一,遂食饩,并由江苏学政李殿林调入江阴南菁高等学校肄业。三十二年(1906)以第四名毕业。即应高淳县立高等小学之聘,担任该校英文理化等科教员。一年后改任丹阳县立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又应扬州两淮师范学校之聘,任英文教员。期间,曾赴苏州应提学司优、拔考试,“余忽患目疾,且连考四场,精神疲倦已极,面容未免憔悴,草草了事,自知无望,不意事后领取试卷,卷后被提学司书一拳大之‘烟’字,不禁大叫冤枉”,因陈“生平最不喜烟赌”。辛亥光复,陈入无锡军政分府担任文牍职务。民元(1912)被选为无锡县议事会副议长。后改就商业。1928年后,任无锡县公款公产管理处副主任、主任。^①又任无锡商会常务委员。(时商会主席为钱基厚。)

戴克宽 (1879—1964),字禹修,号果园,青浦县白鹤江镇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学为诸生,时江苏学政是瞿鸿禨。后入南菁书院肄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主持毕业考试者为最后一任江苏学政唐景崇,因成绩优秀,奖给优贡。戴克宽晚年赋诗自述:“科举废除学校兴,南菁高等许阶升,灌阳夫子亲临试,一纸文凭双手承。”诗后自注:“南菁高等预科毕业,江苏学政灌阳唐公景崇主试,得最优等,学部奏奖优贡,仍沿科举旧名目,然视科举中所得者,难易迥殊,滥窃虚名,恒用自媿。”^②尝一至河南任职,未几,即选赴东瀛考察教育。归国后,一任江苏视学。入民国,在家乡白鹤江镇创建青浦第一图书馆。二三十年代曾任青浦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秘书。参与《青浦县志》的续修,任协纂。果园复擅昆曲,在乡时,尝组“讴青曲社”。晚年家居沪上,文酒为乐,间以诗文授徒。1956年,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戴果园尝自购油印机一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请同乡张仁友等写刻,曾为诸多友朋油印著作十余种之多,无形中为保存文献贡献良多。这些油印本小楷秀逸,行格清朗,深受读者喜爱。戴喜吟咏,诗宗白居易。有《果园赠联录存》铅印本、《果园诗钞》油印本等存世。

于瀚清 字绍荃,泰兴县人。

陈锡桓 字子鹤,娄县人。

吴增祥 字玉芝,东台县人。

① 《陈作霖自述》,蒋标等辑《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无锡图书馆藏。

② 戴果园:《戊戌入洋六十周年书感十首》之第五首,写于1958年5月,油印本。见新浪博客网,且居且读《续谈戴果园》,2010-3-9, <http://blog.sina.com.cn/elephantelephant>。

达享 字用岐，通州人。家住南通西大街。前见学友录光绪二十三年（1897）。

杨承流 字谏如，江宁县人。

蔡钺 字有虔，号焦桐，武进县人。家住常州千秋坊蔡家场。蔡是南社社员。曾任浒墅关蚕桑女校教员。

黄在中 字子坤，溧水县人。前见学友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

蔡琳 字允之，昆山县人。

史华袞 字补山，江都县仙女庙镇人。扬州冶春后社成员。民国年间，曾任过安徽蚌埠电灯公司经理。

徐藻 字友莘，泰州人。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时，奖给优贡。宣统己酉（1909）扬州府学拔贡。

缪文治 字咏莘，泰州人。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时，奖给岁贡。

尤金镛（1868—1957），字亚笙，通州人。前见学友录光绪二十一年（1895）。

陈经（1878—1927），字礼庭（又作鲤庭、荔亭），前见学友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

金家禄 字伯瀛，吴县人。家住苏州饮马桥堍石家湾。据说，金家是汉代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后裔。金家禄曾由岳丈家出资，助其赴日留学。归国后，因生性淡泊，不肯踏足官场，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教，直至病故。^①

李品三 亦湘，泰兴县人。

杜肇纶（1883—1958），字经侯，娄县人。于南菁高等学堂毕业后，又肄业于苏州存古学堂，学堂经学总教曹元弼称其“诗礼之学，卓然经师”。^②杜肇纶“兀兀毕生，著书满家”，“遗稿赠上海图书馆保存，则几世无知者”。^③著有《汉读声类》、《说文通话》等，又应湖州刘承幹之邀，佐史学总教叶昌炽校刊《宋蜀大字本史记》，成《校勘记》二册。

陈锡恩 字荫生，通州人。

王翌儒 字道明，泰州人。家住泰州姜堰镇。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

① 杨飞：《1919年，一户匈奴后裔》，2008年06月29日，南湖新闻网，<http://nhnews.zjol.com.cn/nhnews/system/2008/06/29/010526640.shtml>。

②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案：王称杜肇纶“一九五八年正月卒，年七十六”，故推杜之生卒年如上。

③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第172—173页。

时，奖给岁贡。民国元年，南菁同学徐藻等在泰州中学堂旧址创办县立师范讲习所，王翌儒任所长。

杨良駉 字济君，丹徒县人。家住镇江城内惠安寺巷。

季丰 字孙南，太仓州人。

王雅驯 字播言，江阴县人。

沙亮功 字岩采，江阴县人。南菁书院经董沙从心之长子，沙志衡之兄。沙从心父子兄弟多人在南菁肄业。沙亮功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三十四年(1908)戊申考取贡士，法部会计司主事。民国元年任司法部金事时，于中国第一次中央司法会议上，提出“专审员之设备案”，以期在符合当时国情的情况下，力争司法、行政分开。由日本法学教习口授，中国法律界人士笔述的中国最早的检察专著《检查制度》的出版面世，沙亮功也参与其中。

戴克仁 字春韶，青浦县人，戴克宽之弟，兄弟二人同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县学成诸生，又同时于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

施祖恒 (1873—1937)，字桂冬，崇明县人。堂名培桂。光绪十九年(1893)入学，廪贡生。民国年间，参与修纂《崇明县志》，任“分纂”。施崇尚新学，热心地方教育事业。1922年，他利用住宅创办私立弘达中学，1927年停办。乡绅蔡申甫称赞他是“吾崇教育界山斗”、“学界导师”。儿子施侠，字剑秋，于1941年复办宏达中学。

张嘉树 字宣誉，通州人。

王家瑞 字雪亭，丹徒县人。

胡允恭 字寅阶(一作尹谐)，号畏龠，丹阳县人，家住丹阳东门外龙船湾。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一届毕业，奖给岁贡。南社社员。

耿树藩 字小坡，泰兴县人。

张力培 字幼禾，崇明县人。

史成 字锡擎，武进县人。

刘谷仪 字筱亭，通州人。前见《学友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

袁牧 字守之，东台县人。二十年代，曾任东台县教育局长。

滕九成 字子韶，盐城县人。

唐邦治 (1875—1953)，字子均，室号思岷庐，晚年又曾使用唐均为名，丹阳县人，寓居镇江。光绪十五年(1889)入学成诸生，时年十五。然屡应乡试不售。

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奖给岁贡。后任教于南京学堂,授国文、经学、小学。宣统三年(1911年)被马相伯聘为吴淞复旦监学。民国初,任职丹阳、溧水等地,办理狱案。民国四年(1915年)考取县知事,派往山西,但未曾亲理县政,遂于民国六年辞职,闭门辑述清代史事。民国十年(1921)聘为清史馆协修,分订表谱,纂《军机大臣年表》等。史稿完成后,又先后撰成《清史稿传姓韵编》、《艺文志撰人姓韵韵编》、《读稿札记》并《附编》。尹石公于五十年代跋朱师辙《清史述闻》时说:“协修唐邦治夙号表谱专家,赵尔巽延之家中,获见玉牒,独成《清皇室四谱》,出版于中华书局,为世所重。而大臣、藩服、督抚各表订正尤多,全稿统归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唐极为推崇,亟盼学界关注其学术成果的整理出版。^①清史馆散,唐曾赴天津讲学。后被聘为《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分纂,仍任表谱的分订。又受聘于交通银行,总纂行史。然二志均虽稿已粗成,因局散而未竟全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持节自守,闭门读书,著述不辍。胜利后,被聘为镇江人文征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辑集镇江沦陷期间资料。1953年4月逝世,葬于镇江京岷山。唐邦治一生著作等身,有数十种之多,除前已列举外,尚有《历代帝王年表》、《清年表》、《唐藩镇检姓韵编》、《帝王庙谥年讳谱》、《江苏六十一县沿革谱》、《王子安秋日登洪府滕王阁宴饯序详注》、《许丁卯诗谱》等。唐邦治治学,仍沿清汉学家方法,广集材料,语必征实,尤注重于人文。他所著各种表、录,不像同类著作仅列人名,而是在每个人名第一次出现时,附注出身、官历、爵谥、年寿等,对读者方便甚多。^②

孙 铭 字新盘,泰兴县人。

杨崇幹 字滋生,泰兴县人。

杨良驷 字星房,丹徒县人,家住镇江白莲巷。

毕人夔 字志颀,太仓州人,家住苏州阊门内申衙前四十八号。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著有《唐诗韵释》、《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张恩枢 字星薇,丹徒县人。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尹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参考书目:《镇江市志·人物传》,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丹阳县志·名人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又参考“丹阳文化网”,发布日期:2006-12-12 20:51:40, <http://www.212300.com.cn/NewsShow.asp?id=467>。

俞亮 字蕴兰，元和县人^①，家住苏州娄门北街。俞善书，在南菁时曾为同学书写扇面。^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优贡。

徐为焕 字少文，静海县人。

张袞 字辅臣，静海县人。

袁骧勤 字子龙，兴化县人。

谢鼎镛 (1878—1960)，字幼陶，号冶盒，江阴县人，家住江阴城内文昌巷四号。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奖给岁贡。易代后，历官靖江、泰兴、武进地审厅推事，浙江东阳县法院检察官兼代首席职务。回里后，偕祝廷华等发起陶社，主持刊政，辑《陶社丛书》、《江阴先哲遗书》、《江上诗抄》补续编。续编未及刊行，因乱散佚。著有《梓闻漫拾》正续编，《骥渚吟》、《襟江咏》、《兰陵集》、《京岷集》、《闽赣游草》、《东阳集》、《集陶诗》、《冶盒诗文钞》。其因乱散佚者为《续梓闻漫拾》、《闽赣游草》、《东阳集》，余均刊印行世。抗战胜利后，旅居无锡，任省立无锡师范文史教员。1953年，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据曾问学于谢的陈以鸿先生回忆：“先生为人正直，处事果断。对学生要求严格，绝不姑息。”做事认真细致，“每写好一封信，照例要将信封上地址姓名逐字读出，而且读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无误，方才放心寄出。”“先生虽然一不居高位，二不拥巨资，只是一介寒儒，却享有崇高的威望。往往地方上发生难解决的纠纷，先生出面，便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先生公正无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以致之。”^③

预科第二届

任厚琨 字瑶阜，兴化县人。民国《兴化县志》：“庠生，精医学，侨寓东台。岁试列优等，擢入南菁书院肄业，专研经史、水利。历任运河督办公署咨议、运河工程局评议、江苏水利局参事，厚琨俱为民请命，知无不言。长东台商会时，适大军过境，厚琨奔走应付，几遭不测。民国辛未，洪湖泛滥，往返呼吁无虚日，亲驻危堤，督夫抢险，及堤决，商办善后，四出乞赈，积劳过度，以咳血病歿，年仅五十一。著有《经学历史讲义》、《水利刍言》、《蜗庐诗抄》、《蕴庵文存》、《内经概要》、《伤寒阐微》、

① 见民国《吴县志》卷十七《选举表九》。《学友录》作吴县，因民国初年起元和已并入吴县。径改。

② 程宏远：《南菁日记节钞》，光绪廿九年四月十七日，“同堂潘芳名者，字骏声，淮安府人，持扇来属书，此真问道于盲矣。辞不获命，为之转托于俞君韵兰。近数年来，士大夫竞谈时务，书画两项已成广陵散。”

③ 陈以鸿：《我所知道的谢幼陶先生》，《江阴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98年10月。

《幼科指南》、《任氏验案》。”^①任厚琨任东台县安丰高等小学校长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者），正在该校求学。

任桂森 字馨山，甘泉县人^②，家住扬州买春巷。拔贡。

汤肇曾（1877?—?），字子敏，号筱许，甘泉县人^③，居住扬州北柳巷。唐景崇督学江苏时，汤肇曾以岁试舆地学正案等一名，调入南菁高等学堂。后由江苏提学使周树模拔取高等学堂预科，并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以最优等第三名毕业。汤肇曾后于宣统元年（1909）由江宁提学使陈伯陶考拔己酉科优贡第八名，宣统二年（1910），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省补用。汤工诗文。^④

曹学曾 字鲁南，泰州人，家住泰县（民初，泰州改称泰县）姜堰镇。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后，又肄业于苏州存古学堂史科，宣统三年（1911）毕业。民国十一年，泰县成立国学研究社，研究经史，韩国钧等任社长，曹学曾与卢求古、徐藻等被聘为评议员。

赵翰藻 字丽彬，江阴县人。

乔炳（1873—1951），字世清，号仲麟，盐城县人。乔炳青年时即创业经商，以贩卖并加工建材（或棺木）为业，历经十年，得以发达。宣统二年（1910），乔炳与夏嵩在楼夏庄创建私立开明高等小学。宣统三年，炳又出资在乔家祠堂前建房多间，开创乔舍小学。民国初年，荐为盐城县农会会长。十年，与名儒胡应庚同被荐任盐城县地方款产经理处董事。十四年（1925），夏嵩捐地近百亩，乔炳则将多年经商所集悉数尽出，建楼房九十余间，在楼夏庄共创群英中学，为当地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二十一年，推举为中国红十字会建阳分会会长，任职期间，尽心尽责，大行善举，百姓受益，上下称道，国家总会曾授予该会奖旗一面，银鼎一座，县长携众亲赴乔舍，送“当仁不让”匾额。抗战期间，继夏嵩接任群英中学董事长。抗战困难时期，捐出学校全部化学设备，帮助新四军兵工厂研究子弹、手榴弹的发火装置，因而两度被共产党政权选为县参议员。^⑤

① 民国《兴化县志》卷十三《人物志》。

② 民国《甘泉县续志》卷十七《选举表第二》。《学友录》作“江都”，因民国初甘泉并入江都故也。径改。

③ 《学友录》亦作“江都”，径改。

④ 参见汤肇曾之宣统己酉科优贡硃卷所载履历。又，《宣统政纪》卷四十，“宣统二年八月庚辰，谕内阁，优生考列一等之……汤肇曾……，以知县分省补用。”又，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第65页，称汤“安徽知县”。

⑤ 《建湖名绅——乔炳》，建湖新闻网，<http://www.jhxww.gov.cn/article/html/835.html>。

何寿恒 字如六，江都县人。

戴春芸 字亦庵，阜宁县人。

陈龙章 字企周，青浦县人。

金真诚 字济时，盐城县人。

张璧 字持白，盐城县人。民国年间，曾在家乡执教，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学生。胡乔木在鞍湖小学求学时，读乡先辈陈玉树（南菁早期课生）《后乐堂集》后，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读“七夕”》的文章，深得国文老师张持白的赞赏。^①而乔冠华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时，对国文老师张持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主张也感到十分新鲜。^②

何荣桂 字佩宣，江阴县人，家住江阴城内南街。三十年代，曾任江阴救济院副院长。

于炳勋 字少甫，仪征县人，家住镇江薛家巷五十七号。民国年间，曾出任江西宜黄县、江苏沛县知事，三十年代，供职于江苏省民政厅，曾执教于上海法政大学。

吴宝璜 字伯扬，松江人。

苏倬 字卓人，铜山县人。

葛槃 字仲迈，东海县人。

缪文彬 字质君，泰州人。

吴祖森 字茂叔，溧水县人。

梁鸿耀 字汉章，嘉定县人。辛亥革命，嘉定军政分府成立，梁鸿耀等人为参谋。

陈亮采 字铁仙，泰兴县人，通信处为泰兴北门外丁大胜药号。

黄文中 字志云，溧水县人。

金咏梧 字凤冈，青浦县人。

于树深（1883—1950），字小川，仪征县人，寄寓镇江，通信处为镇江西门大街三二二号。清末于江阴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后，承袭其父于学源的遗产姓氏钱庄，经营近30年。投资商业最著的有沅记糖栈。民国二年（1913）与人合资创设的

① 《风云才子故乡情：胡乔木与盐城》，2014年1月1日，盐城史志网，http://szw.yancheng.gov.cn/ycyx/mrzg/201401/t20140101_376268.html。

② 罗银胜：《才情人生乔冠华》“少年时代”，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大源油饼厂，为长江下游各埠第一个机器榨油厂，出口豆饼远销南洋、日本等地，在国际市场有较高声誉。后因经营不善而闭歇。于树深曾任镇江商会会长、江苏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江苏省议员、国会众议员等。他热心于公用事业，曾经管京口救生会和瓜镇义渡局数十年，拯溺甚多。并在于氏宗祠内设立忠肃小学。擅诗词，是南社和海门吟社社友。江南土改开始，于树深率先响应，献出全部田地，当时新华社在报道中称他为镇江市的开明绅士。^①

沈绍曾 字省吾，泰兴县人。

于宝麟 字颂阁，江都县人，通信处为扬州塘头镇。

管国柱 字石臣，如皋县人。管从师于张謇，张謇曾称“国柱，吾弟子，有文而贤，与兄国光，委蛇孝友”。^②

丁牧 字济农，泰州人。

陈谔 字士轶，通州人。在家乡南通中学执教国文多年。据学生回忆，抗战时期，日寇肆虐，陈自选《多尔袞致史可法书》和《史可法复多尔袞书》作为教材，对史可法驳斥多尔袞，讲解时尤为着力，影射之意至为明显。^③

高蕴辉 字炳星，青浦县人。

陈邦杰 字幼岩，松江人。

居福万 字石涛，后改名福焜，宝应县人，通信处为扬州太平桥西二号。服务乡梓教育数十年。曾任省立第五师范界首分校的训育主任。抗战期间，参加冯氏补习团，为失学青少年补习国文，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半个世纪过去，学生还念念不忘这位夫子。

范重光 字韵笙，江阴县人，通信处为吴县城内。

丁鹏振 字翼清，无锡县人。

蔡培 (1884—1960)，字子平，无锡县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并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参加南社，任众议院议员。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参事、航政司司长。1935年，任内政部民政司司长。1939年后，投靠汪伪政府，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汪伪驻日大使。抗战胜利后，判决无期徒刑。

① 参考《镇江市志·人物传》，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张謇：《管氏先坟记》，《如东大观——文化篇（二）·旧体诗文辑录》，如东政协网，<http://www.rdzx.gov.cn>。

③ 季修甫：《忘不了你啊，陈士轶老师》，2012年4月17日，《通中人》网，<http://www.ntzx.cn/HTML/tzr/szff/nwse/2012/04/17/1612006798.html>。

1949年后，仍收监于上海，1956年送医院治病，1960年病故。^①蔡投敌前，颇有声誉，张一麀还在文中提到过他：“培毕业于南菁书院暨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京师、黑龙江、河南、湖北等省要职，并有声于时。”^②

高联升 字梯云，如皋县人。

管国光 字砺冰，如皋县人，管国柱之兄，弟兄俩南菁同届毕业。

吴景鸿 字子逵，通州人。

陈喜麟 字稚西，泰州人。

顾偿基 (1881—1955)，字赋予，号幻公，又号愧父，通州人。通信处为南通凤凰桥。出身于书香门第，“南通四才子”之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学成诸生。三十二年(1906)南菁高等学堂预科第二届毕业，后又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攻读。顾偿基是教育家，先后在省立七中(今南通中学)、崇敬中学、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等任教。抗战爆发，新四军东进后，一直在共产党根据地任校长，表彰为“八老”之一。人民共和国成立，任南通中学第一任校长。曾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所著尚存《幻公遗稿》、《杂稿》手稿。

张漱泉 字鸣玉，后改名漱荃，江阴县人。通信处为江阴南街育婴堂西首。张是江阴清末民初时期的名书法家。

张士杰 字逊时，无锡县人。通信处为无锡北门外通惠桥。在无锡执行律师事务。

夏期秉 字国钧，盐城县人。

蒋荟森 字韵芳，通州人。

祝廷瑞 字桢卿，江阴县人。通信处为江阴城内南所巷二十七号。祝廷华(见十六年《学友录》)之弟，工书法，与兄齐名。晚称“江上墨隐”。著有《墨隐庐诗抄》，待梓。^③

刘宝书 字霭庭，靖江县人。

沈超 字轶凡，江阴县人。

郁振垓 字橘庭，镇洋县人。

潘诵绂 字簪友，吴县人。

① 赵永良主编：《百年无锡名人图谱》，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② 张一麀：《心太平室集》卷三《蔡桂初先生墓志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1页。

③ 谢鼎铭：《陶社题名录》。

杨宜甲 字益黎，通州人。

华昌寿 字少纯，无锡县人。通信处为无锡城内映山河。二三十年代，任无锡县政府第一科科长。曾推举为无锡茧业公会主席委员。

过养基 字莘耕，无锡县人。

贺志成 字功甫，金坛县人。

张思永 字受之，娄县人。

范绍文 字夔臣，通州人。

童佐良 字君遂，江都县人。二十年代初，任安徽颍上县知事。

周佐时 字志伊，青浦县人。民国元年(1912)，青浦县实行自治，重选议员，周志伊等当选。民国二年(1913)9月初，“二次革命”倒袁失败，周佐时遭通缉，判刑两年。^①

赵鼎昶 字仲雄，江阴县人。

徐光祖 字蓝生，松江人。

洪 铨 后改名詮，字巽九，仪征县人，通信处为扬州板井巷。二十年代，曾任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三十年代，执教于省立镇江师范学校。

郑忠辅 字保东，武进县人。

蔡 炎 字樵溪，武进县人。

耿念南 字雅兰，常熟县人。

卢 钰 字式如，江阴县人。

沈企侨 字惠田，又字溪桥，江阴县人。通信处为江阴城内中街。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次年入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宣统二年毕业，即应广东唯一的高等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之聘，开设图画手工科，开华南地区高等美术教育之先河。后在省立无锡师范学校任教。二十年代，沈创办南京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南京美术专门学校。三十年代，曾任威海卫专员公署教育科科长。沈企侨是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

谢容怀 字登俊，武进县人。

平邦济 江阴县人。

杜葆珩 字鲁璠，娄县人。

^①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青浦县志·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巫宝涟 字镜湖，金坛县人。

章臣柱 字友石，江阴县人。

金保恒 字福庭，江阴县人。

宋时保 字潜声，娄县人。

《学友录》人名索引

一 姓名按拼音字母排列。

二 姓名后括号内的数字是其正在书院肄业的年份(光绪年号),如白毓崑,在B栏内找到:白毓崑(18),即表明他于光绪十八年(1892)正在院肄业,再去查看他在该年的学友录内,有无事迹记载。

三 如姓名后无数字,则表明他在《学友录》的《补遗》中。

四 第一、第二两届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生,姓名后加(一)或(二)。

B

白毓崑(18) 白作霖(18) 包亦庚(13) 包祖同 保釐东(21) 保汝梅(22)
鲍凤翥(16) 鲍庆熙(22) 鲍宗源(27) 贝寿同(24) 毕光祖(10) 毕人夔(一)
卞絳昌(26)

C

蔡宝楚(16) 蔡宝经(27) 蔡宝廉(12) 蔡承僖(11) 蔡国瑞(22) 蔡嘉贞(16)
蔡俊镛(20) 蔡琳(一) 蔡培(二) 蔡其苏(20) 蔡文森 蔡文森(20)
蔡炎(二) 蔡养默(21) 蔡钺(一) 蔡樾(21) 蔡振(24) 曹辅臣(11)
曹国枏(22) 曹家达(19) 曹家泰(27) 曹铨(18) 曹文凤(27) 曹熙元(23)
曹学曾(二) 曹学诗(13) 曹俨(13) 曹猷(16) 曹裕津(23) 曹毓瑞(22)
曹元弼(11) 曹元达(18) 曹元吉(20) 曹元炜(23) 曹元忠(12) 曹壘(18)
曹赞勋(20) 查德基(17) 查兰(11) 陈邦杰(二) 陈葆生(18) 陈镡(22)
陈镡(13) 陈炳林(11) 陈炳英(11) 陈灿琳(22) 陈昌元(27) 陈承澍(17)
陈崇牧(19) 陈春魁(11) 陈椿森(21) 陈定祥(21) 陈谔(二) 陈公溥(21)
陈冠群(22) 陈国霖(11) 陈晋(19) 陈经(22) 陈开骥(16) 陈铠秀(27)

陈堃吉(11) 陈亮采(二) 陈霖溥(20) 陈 浏(11) 陈龙章(二) 陈懋恒(13)
 陈懋洗(19) 陈懋治(21) 陈名翰(20) 陈铭荃(17) 陈铭撰(12) 陈佩实(21)
 陈庆林(22) 陈庆年(12) 陈人杞(22) 陈汝恭(11) 陈世垣(13) 陈 泰(24)
 陈廷鳌(27) 陈廷骏(22) 陈维骥(12) 陈希濂(20) 陈锡恩(21) 陈锡桓(一)
 陈锡琨(27) 陈 煦(18) 陈延昌(24) 陈延武(24) 陈彦彬(29) 陈 耀(27)
 陈 颐(27) 陈玉璘(18) 陈玉树(12) 陈 育 陈允升(29) 陈允中
 陈 漳(22) 陈作楷(22) 陈作霖(一) 成寅亮(22) 承旭祺(13) 承 祎(20)
 程 镡(13) 程炳熙(27) 程宏远(29) 程其文(23) 程起鹏(27) 程廷鳌(22)
 程源清(11) 程肇基(20) 程肇祥(27) 程之骥(13) 程祖蔚(13) 储桂山(22)
 储南强 储青瑄(23) 储钟海(27) 褚光宣(24) 丛炽昌(24) 丛振宗(22)
 崔朝庆(11)

D

达 孚(20) 达金韶(22) 达 李(16) 达寿增(22) 达 享(23) 达 孝(20)
 达 孳(22) 戴春芸(二) 戴慈恩(27) 戴得龄(21) 戴姜福(17) 戴克宽(一)
 戴克仁(一) 戴蓉芬(22) 戴蔚善(27) 邓 鸿(23) 邓建勋(22) 邓夔龄(22)
 丁宝书(19) 丁传靖(25) 丁德森(24) 丁福保(21) 丁桂山(24) 丁国华(18)
 丁国钧(12) 丁怀荣(22) 丁 牧(二) 丁蓬山(16) 丁鹏振(二) 丁锡福(26)
 丁效忠(27) 丁宝山(22) 丁 志(21) 丁祖荫(21) 董 康 董楸宽(29)
 董 铨(24) 董瑞椿(21) 董为锦(17) 董为章(16) 董增禄(22) 杜葆琦(二)
 杜炳光(12) 杜嗣程(17) 杜应震(21) 杜 渊(16) 杜兆纶(一)

E

恩 华(28)

F

范本礼 范 铠(12) 范 罕(22) 范翰涇(16) 范 祎(17) 范绍文(二)
 范循让(11) 范 蠡(16) 范重光(二) 方保东(22) 方履庠(17) 方名甲(20)
 方 书(24) 方 怡(11) 方 毅(24) 房 镕(12) 费彬璘(19) 费揽澄(27)
 费廷瑚(27) 费廷璜(21) 费元浩(21) 费元相(21) 冯诚中(9) 冯 澂(20)

冯鼎(22) 冯国鑫(29) 冯明馨(16) 冯铭(9) 冯善徵(16) 冯笈(23)
冯兆昌(23) 冯纘勋(21) 凤恭宝(21) 傅春官(25)

G

高德培(13) 高傅霖(22) 高济生(19) 高镜蓉(17) 高联升(二) 高人俊(17)
高汝琳(16) 高树人(22) 高翔(16) 高蕴辉(二) 葛璜(20) 葛槃(二)
葛文钟(19) 葛元勋(20) 耿葆清(9) 耿念南(二) 耿树藩(二) 龚敬钊(24)
龚铭凤(20) 顾安泰(11) 顾宝畴(11) 顾秉忠(27) 顾偿基(二) 顾成章(16)
顾栋臣(20) 顾该基(21) 顾鸿闾(16) 顾家驹(21) 顾敬莹(16) 顾兰佩(21)
顾懋熙(13) 顾鸣歧(19) 顾沐润(21) 顾迺德(27) 顾书城(11) 顾思永(20)
顾倓基(20) 顾锡璜(16) 顾锡祥(11) 顾锡中(11) 顾濬淇(22) 顾仰基(22)
顾仰熙 顾侑基 顾元起(22) 顾允升(21) 顾震福(22) 顾执中(11)
顾质(16) 顾倬(27) 管国光(二) 管国柱(二) 管俭垣(17) 管祖式(25)
郭建南(16) 郭晋蕃(22) 郭锡恩(16) 郭镇清(16) 过养基(二) 过宗唐(23)

H

韩保徵(18) 韩珪(20) 韩汉东(16) 韩鲁东(19) 韩兴东(19) 韩有徵(23)
韩云骏(16) 韩兆鸿(25) 韩兆魁(22) 杭开第(27) 何国恂(24) 何奎昌(24)
何蟪生(25) 何荣桂(二) 何榕(17) 何寿恒(二) 何锡晋(16) 何允升(18)
何允彝(16) 何长庆(21) 贺国荣(25) 贺焕章(21) 贺志成(二) 洪铨(二)
侯必昌(22) 侯福昌(25) 侯鸿鉴(27) 胡葆元(20) 胡炳益 胡常惠(18)
胡常忠(19) 胡受锡(21) 胡同颖(16) 胡玉缙(13) 胡渊(20) 胡允恭(一)
华昌寿(二) 华鼈瓚(21) 华申祺(21) 华世芳(9) 华同揆 华彦钰(16)
黄彬琳(21) 黄灿(24) 黄琮(14) 黄恩煦(13) 黄冈(24) 黄厚生(21)
黄金台(23) 黄金堂(16) 黄炯寿(20) 黄荣桂(13) 黄守孚(25) 黄守恒(25)
黄廷璧(17) 黄文中(二) 黄熙曾(29) 黄彦升(22) 黄以仁(27) 黄元吉(21)
黄在中(25) 黄在中(25) 黄瓚(22) 黄宗幹(25)

J

吉秉钧(21) 纪蔚森(22) 季丰(一) 季福田(21) 季淦(22) 季光瑾(19)

季龙图(28) 江保傅(22) 江炳奎(27) 江国墀(19) 江 衡 江荫椿(21)
 江于澧(22) 江泽远(20) 江祖荫(25) 姜定澂(20) 姜定元(22) 姜汝济(13)
 姜世纶(19) 姜文超(17) 姜毓琦(19) 姜毓璋(22) 姜毓芝(19) 蒋宝丰(20)
 蒋宝章(27) 蒋葆良(22) 蒋 标(23) 蒋 澂(11) 蒋荟森(二) 蒋绍棠(19)
 蒋寿祺(21) 蒋维乔(21) 蒋维钟(24) 蒋武森(28) 蒋元庆(18) 焦如霖(28)
 金保恒(二) 金谷春(20) 金谷元(11) 金鸿翔(22) 金家禄(一) 金懋基(25)
 金 圻(23) 金 镛(20) 金 弑(16) 金文樑(12) 金咏榴(17) 金咏梧(二)
 金真诚(二) 金祖輝(21) 金祖泽(21) 居福万(二)

K

孔宪和(21) 孔昭惠(16) 孔昭晋(27)

L

雷补同(9) 雷 斌(27) 雷 璠(13) 冷世铨(24) 李 安(11) 李宝潜(13)
 李 滨(22) 李秉良(一) 李从龙(19) 李 达(18) 李逢辰(11) 李光祖(18)
 李 瀚(17) 李继钦(16) 李继钊 李经莹(11) 李景韩(16) 李联珪(19)
 李品三(一) 李青葆 李青藻(21) 李汝霖(18) 李瑞霖(22) 李声希(20)
 李士巧(21) 李树滋(16) 李绪基(16) 李以炳(11) 李永年(18) 李元衡(20)
 李元俊(23) 李元藻(22) 李兆庆(11) 李钟珏(11) 厉钟麟(18) 廉 泉
 廉 铭(24) 梁鸿耀(二) 廖光裕(21) 林得中(23) 林亮功(21) 林珑文(19)
 林之祺(16) 凌绍濂(11) 凌学放 刘邦霖(16) 刘宝书(二) 刘承均(20)
 刘 鸷(17) 刘恩棠(18) 刘法曾 刘奉璋(11) 刘福祥(27) 刘富曾(9)
 刘谷仪(27) 刘国模(21) 刘 翰(9) 刘翰清(22) 刘 煌(23) 刘汇清(24)
 刘 铿(23) 刘鲁瑛(25) 刘如墉(27) 刘绳铭(22) 刘师苍(22) 刘树德(24)
 刘树屏(21) 刘嵩泉(20) 刘维燦(21) 刘益燦(21) 刘 毅(23) 刘永昌(23)
 刘 械(23) 刘毓麟 刘元弼(24) 刘章达(29) 刘宗淇(11) 刘宗向(13)
 柳预生(9) 卢 彬(24) 卢 典(19) 卢庆奎(22) 卢求古(11) 卢 钰(二)
 六祖浚(12) 陆炳章(21) 陆曾业(21) 陆朝琮(21) 陆冠群(21) 陆翰云(16)
 陆鸿吉(29) 陆锦燧(19) 陆培惠(21) 陆 蕖(26) 陆士奎(19) 陆 燧(16)
 陆咸清(13) 陆增祎(23) 陆增炜(21) 陆长康(28) 路 珩(21) 路鸿甲(21)

罗逢吉(22) 罗辉祖(22) 罗毓棠(22) 吕德忱(13) 吕淦金(22) 吕国铨(21)
吕人骏(17)

M

马家骏(24) 马敬培(21) 马绍康(24) 马为瑄(11) 毛诒源(25) 茅谦
梅调鼎(21) 孟当如(24) 孟森 孟效邹(20) 闵楫(29) 缪炳组(27)
缪承金(28) 缪楷(16) 缪抡俊(13)

N

倪建第(27) 倪寿龄(27) 倪宇梁(21) 钮永昭(16) 钮永建(16)

P

潘昌煦(18) 潘敦先 潘恩元(24) 潘芳名(29) 潘浩(21) 潘滢(21)
潘鸣球(25) 潘彭龄(11) 潘任(23) 潘汝钊(27) 潘绍周(21) 潘诵绂(二)
潘诵威(12) 潘维鳌(20) 潘洵(21) 潘肇元(24) 潘致祺(21) 潘祚元(21)
庞炳文(16) 庞鸿瀚(13) 庞鸿济(13) 庞树松(23) 庞文俊(21) 庞友兰(28)
裴枏(26) 裴熙琳(17) 裴鑫山(22) 彭世襄(25) 平邦济(二) 浦邦彦(23)

Q

戚金奎(11) 戚震瀛(29) 钱承驹(21) 钱承煦(21) 钱崇威(25) 钱福那(16)
钱淦(25) 钱恒凤(22) 钱鸿弼(21) 钱基森(11) 钱麟书(16) 钱铭槃(22)
钱沐华(27) 钱人龙(18) 钱荣国(11) 钱筮离(12) 钱寿琛(21) 钱同寿(18)
钱学坤(23) 钱学乾(17) 乔炳(二) 秦宝钟(16) 秦曾康(19) 秦曾潞(17)
秦曾源(17) 秦瑞玠(17) 秦世超(19) 秦树镗(20) 秦同培(27) 秦勋震(16)
秦毓钧(25) 秦毓鏊(27) 邱林(22) 裘昌年(20) 瞿葆刚(25) 瞿汝刚(24)
瞿士勋(23) 瞿树本(21) 瞿树榕(21) 瞿树森(21)

R

任承弼(21) 任承沆(21) 任桂森(二) 任厚琨(二) 任为霖(24) 任为仪(24)
任锡韩(20) 任锡周(21) 阮惟和(17)

S

- 沙曾达(24) 沙曾诒(27) 沙从心(9) 沙亮功(一) 沙 棠(16) 沙 煦(27)
 沙彦楷 沙毓瑾(12) 沙元炳(16) 沙志衍(29) 单嘉荣(21) 单毓元(26)
 单 镇(24) 商文伟(18) 商 序(20) 邵曾鉴(13) 邵鼎声(16) 邵 葵(22)
 邵清儒(16) 邵元晋(12) 申濩元(12) 沈宝相(16) 沈宝善(24) 沈保枢(24)
 沈秉乾(25) 沈 超(二) 沈辰锡(16) 沈承恣(29) 沈恩孚(19) 沈恩鸿(22)
 沈逢璟(17) 沈逢瑗(16) 沈 灏(16) 沈鸿声(24) 沈 夔(28) 沈齐贤(20)
 沈 棋(22) 沈企侨(二) 沈绍曾(二) 沈世贞(21) 沈树本(24) 沈树珊(21)
 沈惟明(21) 沈维骥(20) 沈文瀚(11) 沈兆驹(22) 盛大椿(20) 盛如林(12)
 盛善登(27) 施赞唐(21) 施祖恒(一) 石 华(22) 石 铭(18) 史 成(一)
 史国琛(21) 史华袞(一) 史悠泽(21) 宋宝渊(18) 宋葆麟(22) 宋葆麒(27)
 宋 焕(17) 宋经湛(22) 宋景濂(21) 宋时保(二) 宋树槐(21) 宋之芬(13)
 苏梦星(18) 苏 倬(二) 睢国襄(23) 孙传骧(20) 孙春雷(24) 孙祖烈(9)
 孙恩缙(22) 孙恩绪(22) 孙光圻(27) 孙桂攀(20) 孙国楨(16) 孙翰宗(22)
 孙 鏞(22) 孙家鼐(23) 孙锦标(11) 孙覲墀(19) 孙 傲(16) 孙靖圻(27)
 孙开泰(22) 孙揆均(16) 孙立瀛(21) 孙廉清(11) 孙鸣圻(16) 孙 铭(一)
 孙启泰 孙蓉镜(21) 孙绍璟(19) 孙守圻(27) 孙泰圻(9) 孙廷嘉(27)
 孙同康(12) 孙锡皋 孙学修(21) 孙 剡(18) 孙荫墀(27) 孙荫培(27)
 孙玉声 孙 渊(16) 孙元兰(21) 孙 钺(27) 孙祝耆(27) 孙 倬(17)
 孙宗弼(18)

T

- 汤鼎杰(22) 汤国光(22) 汤慕伊(13) 汤心焕(16) 汤肇曾(二) 唐邦治(一)
 唐棣荣(20) 唐浩镇(9) 唐济镇(17) 唐继盛(19) 唐乃钊(28) 唐文治(11)
 唐锡晋(9) 唐 演(27) 唐志益(16) 唐忠行(27) 唐宗愈(27) 陶 成(20)
 陶承潞(10) 陶恩章(27) 陶世凤(19) 陶忠澍(24) 滕九成(一) 田德琦(23)
 田其田(16) 童 斐(19) 童富康(28) 童振藻(26) 童佐良(二)

W

- 万鼎年(23) 万恩泽(20) 万 康 汪曾保(21) 汪凤瀛(11) 汪鸿藻(21)

汪 济(12)	汪开祉(11)	汪仁溥(24)	汪荣宝(21)	汪绍芬(23)	汪树宝(21)
汪廷襄(24)	汪锡增	汪毓楨(23)	汪兆元(18)	王炳章(26)	王曾懋(21)
王曾荫(27)	王湛谋(22)	王大猷(21)	王大猷(23)	王德坤(25)	王定甲(27)
王恩浩(13)	王凤璘(21)	王凤玮(21)	王福熙(20)	王庚颺(21)	王 观(27)
王虎卿(11)	王家槐(17)	王家枚(16)	王家瑞(一)	王家枢(20)	王家琦(12)
王景琦(24)	王敬铭(27)	王懋吉(17)	王梦榴(20)	王乃昌(21)	王乃屏(25)
王念曾(22)	王清墀(16)	王仁俊(16)	王仁业(19)	王汝诚(21)	王汝谅(21)
王士楨(27)	王世源(20)	王树声(21)	王思仁(13)	王廷樑	王文持(27)
王文裕(22)	王锡辰(19)	王鑫山(21)	王学渊(17)	王雅驯(一)	王颐庆(21)
王翌儒(一)	王英冕(16)	王雍熙(17)	王永图(22)	王 尤(11)	王有德(13)
王聿修(17)	王蕴登(21)	王蕴亨(16)	王 瓚(16)	王藻冕(17)	王曾祥(22)
王兆芳(16)	王兆桂(20)	王徵泰(18)	王志铭(11)	王钟琦(29)	王宗筠(25)
王宗浚(20)	王宗毅(21)	魏葆澄(21)	巫宝涟(二)	吴宝和(22)	吴宝璜(二)
吴宝森(22)	吴葆瑛(20)	吴秉文(21)	吴曾偃(16)	吴曾源	吴 诚(21)
吴传鼎(29)	吴 凤(23)	吴凤翔	吴辅助(29)	吴鸿鳌(22)	吴鸿奎(23)
吴会云(22)	吴景鸿(22)	吴夔宣(27)	吴林森(22)	吴隆吉(17)	吴聘珍(12)
吴前楣(12)	吴人达(27)	吴山秀(29)	吴声俊(20)	吴师曾(22)	吴 栻(23)
吴寿萱(13)	吴思慎(18)	吴 眺(16)	吴廷珍(27)	吴彤恩(24)	吴彤锡(23)
吴一凤(27)	吴翊寅(13)	吴佑之(22)	吴玉庚(12)	吴元熙(19)	吴 鋈(21)
吴增甲(20)	吴增祥(一)	吴增佑(21)	吴增元(19)	吴长吉(21)	吴肇璜(22)
吴肇嘉(11)	吴祖森(二)	吴祖潜(22)	吴佐璜(20)	吴佐清(21)	

X

奚绍声(12)	席慰慈(20)	夏期乘(二)	夏仁虎(22)	夏雨人(19)	向 瑛(20)
向 震(16)	萧麟徵(21)	萧 燮(21)	萧阳来(22)	谢鼎臣(22)	谢鼎镛(一)
谢恩灏(16)	谢恩鸿(23)	谢起凤(19)	谢容怀(二)	谢誉桐(22)	谢 沅(21)
谢钟英(12)	邢本镛(24)	邢国宾(16)	邢辉栋(28)	邢启才(22)	邢启云(16)
邢世章(11)	熊远图(23)	须毓珍(27)	徐安仁(19)	徐 昂(25)	徐 斌(24)
徐秉成(20)	徐从礼(23)	徐点撰(27)	徐敦穆(11)	徐孚吉(13)	徐公辅(17)
徐公修(27)	徐光祖(二)	徐国俊(18)	徐翰琦(21)	徐恒濂(22)	徐洪度(16)

徐虎臣(24) 徐家棣(22) 徐锦章(27) 徐敬仪(21) 徐麟翔(11) 徐乃栢(9)
 徐彭龄(25) 徐 森(22) 徐士元(18) 徐守清(21) 徐为焕(一) 徐 湘(23)
 徐翔翰(21) 徐 堦(22) 徐 训(19) 徐荫曾(29) 徐 瀛(13) 徐友仁(20)
 徐有麟(21) 徐佑成(20) 徐元甲(22) 徐云梁(22) 徐 藻(一) 徐兆璜(27)
 徐蒸乂(27) 徐政仪(27) 许朝贵 许 潮(20) 许达坤(23) 许国英(24)
 许建标(24) 许康瑞(21) 许铭甲(21) 许士熊(20) 许世熊(17) 许同范(18)
 许同甲(21) 许咏仁(24) 许玉庭(27) 许 械(23) 许毓麟(27) 许毓麒(27)
 许 樾(20) 许振鹏(26) 许作霖(21) 薛保昇(27) 薛 彬(21) 薛凤钧(21)
 薛光镠(27) 薛嘉楹(11) 薛馈五 薛梦非(24) 薛梦吉(27) 薛铭敬(21)
 薛升祺(24) 薛万英(20) 薛宪清(29) 薛序镛(24) 薛咏杖(27) 薛重光(16)
 薛重煦(16) 薛 珠(21)

Y

严保诚(24) 严 达(19) 严 通(16) 严有耀(22) 颜 伟(19) 杨百城(19)
 杨百朋(19) 杨葆全(23) 杨 冰(27) 杨成能(27) 杨承流(一) 杨承熙(22)
 杨崇本(16) 杨崇德(18) 杨崇幹(20) 杨从谦(22) 杨惠元(27) 杨 馥(16)
 杨 庚(18) 杨庚元(22) 杨光昌(16) 杨祐庆(29) 杨立本(21) 杨良駉(一)
 杨良驷(一) 杨名浩(19) 杨 模(10) 杨 润(26) 杨世芬(20) 杨世沅(11)
 杨守祐(21) 杨寿朴(20) 杨寿杓(27) 杨寿棠(20) 杨体仁(21) 杨同元(21)
 杨 琬(27) 杨文渊(21) 杨 贤(24) 杨 芑(29) 杨宜甲(二) 杨 永(27)
 杨允升(22) 杨兆鹏(22) 杨 忠(21) 杨钟钰(21) 杨佐治(16) 姚 鏊(19)
 姚际唐(23) 姚彭年(11) 姚鹏图(21) 姚启寅(11) 姚起凤(16) 姚树圻(23)
 姚树栢(20) 姚嵩年(22) 姚文栢 姚锡光(11) 姚 熙 姚 湘(16)
 姚祖晋(27) 姚祖泰(19) 姚祖颐(20) 叶人驥(21) 叶惟善(一) 叶玉森(一)
 叶祖鼎(23) 易用仪(22) 殷葆诚(16) 殷 俊(11) 殷履亨(27) 殷寿辰(12)
 殷松年(13) 尹文灿(27) 应 燧(20) 勇敬舆(21) 尤金镛(21) 尤廷楨(12)
 尤 桐(12) 于宝麟(二) 于炳勋(二) 于炳渊(16) 于 鬯 于翰清(一)
 于 璜(22) 于 瑾(21) 于树森(二) 于廷栋(29) 于文凤(19) 于文华(17)
 于希濂(22) 于貽庆(18) 于玉峰 于长庆(16) 余克明(21) 余宏淦(20)
 余鸿均(20) 余建侯(25) 余适均(27) 俞 复(19) 俞 亮(一) 俞武功(17)

虞世英(20) 郁棣萼(13) 郁棣华(24) 郁芳润(21) 郁奎章(16) 郁慕侠
郁文盛(21) 郁馨山(20) 郁振垓(二) 郁振域(29) 袁宏训(21) 袁康(9)
袁牧(一) 袁绍昂(22) 袁骧勤(一) 袁煦(17) 云书(28)

Z

张葆芬(23) 张葆馨(21) 张葆元(25) 张璧(二) 张秉彝(20) 张炳(12)
张炳翔(21) 张承荣(20) 张萃祥(21) 张鼎荣(18) 张东烈(20) 张东林(22)
张东楼(24) 张东镇(21) 张恩庆(13) 张恩枢(一) 张藩(17) 张方培(一)
张方中(25) 张福保(18) 张复泰(12) 张镐(22) 张光彝(21) 张袞(一)
张涵中(12) 张绘辰(20) 张济川(21) 张继良(20) 张继祖(23) 张家镇(23)
张嘉树(24) 张俊(22) 张丽生(22) 张联芳(20) 张茂炯(21) 张懋修(18)
张南薰(23) 张南云(16) 张庆桐(20) 张铨(24) 张润熙(20) 张盛传(11)
张时良(23) 张士杰(二) 张士希(16) 张绶青(16) 张树莫(9) 张树培(20)
张庶蕃(20) 张漱泉(二) 张思永(二) 张涌清(24) 张廷寿(20) 张维新(23)
张炜(12) 张慰祖(21) 张文廉(24) 张文藻(20) 张西翰(16) 张希龄(17)
张锡恭(9) 张熾(21) 张相文 张燮(19) 张一鸿(22) 张一麀(19)
张一鹏(19) 张翼雍(20) 张荫谷(19) 张滢(22) 张应元(12) 张永炜(20)
张有琳(24) 张佑清(23) 张毓瑾(23) 张毓英(18) 张藻祥(22) 张之纯(9)
张之幹(23) 张之彦(19) 张治清(27) 张宗华(21) 张祖綵(22) 张葆元(25)
章臣柱(二) 章际治(9) 章锦(24) 章仁治(20) 章锡奎(19) 章锡朋(20)
章元浩(16) 章元溥(16) 章元治(13) 章振书(20) 章钟祐(13) 章钟华(20)
章钟亮(9) 章钟祥(16) 章钟祚(9) 赵葆森(21) 赵椿年(11) 赵鼎祖(二)
赵端(22) 赵翰渊(19) 赵翰藻(二) 赵鸿仪(17) 赵金第(13) 赵宽(25)
赵良荫(16) 赵良箴(16) 赵培庠(22) 赵鹏程(24) 赵清瑞(16) 赵人镜(17)
赵圣传(10) 赵世修(12) 赵寿椿(20) 赵维城(22) 赵学琴(17) 赵寅恭(20)
赵玉森(21) 赵钰树(29) 郑凤仪(19) 郑虎文(21) 郑翼堂(23) 郑忠辅(二)
郑祖铭(22) 郑祖泽(21) 周本培(22) 周焯(25) 周德坚(21) 周德馨(19)
周国土(28) 周恒(16) 周镜澄(21) 周璆(27) 周仁毅(27) 周仁撰(27)
周士滨(21) 周世恒(21) 周世颺(21) 周寿遐(21) 周书丹(27) 周维楨(11)
周熙元(11) 周熊(21) 周学仁(23) 周学源(20) 周颐昌(29) 周以南(21)

周 滢(13) 周 钺(13) 周在镐(19) 周召齐(9) 周肇基(16) 周志韩(21)
 周钟华(18) 周佐时(二) 朱邦杰(28) 朱邦猷(28) 朱邦彦(22) 朱宝琛(27)
 朱昌鼎(17) 朱楚善(20) 朱恩昭(24) 朱尔楷(11) 朱凤仪(23) 朱鸿绶(22)
 朱鸿翥(16) 朱介曾(27) 朱锦绶(21) 朱 骏(18) 朱绿藻(11) 朱铭恩(22)
 朱铭盘 朱铭孟(11) 朱铭忠(20) 朱念椿(18) 朱其潜(22) 朱其扬(21)
 朱蓉照(21) 朱汝明(21) 朱若琮(19) 朱世豪(17) 朱世增(27) 朱树禧(18)
 朱树云(21) 朱维城(11) 朱文澜(21) 朱锡琛(29) 朱锡麒(24) 朱 耀(29)
 朱映奎(11) 朱永玮(19) 朱元勋(18) 朱云翰(22) 朱赞臣(21) 朱占魁(21)
 朱震瀛(21) 朱钟骥(21) 朱祖炳(21) 朱祖荣(11) 朱祖怡(21) 朱祖彧(24)
 祝鼎培(16) 祝平康(21) 祝平治(20) 祝书根(20) 祝廷华(16) 庄曾谧(24)
 庄礼柔(21) 庄 模(21) 庄蕴宽(13) 庄增藩(28) 邹呈桂(24) 邹登泰(21)
 邹洪纲(21) 邹兆麟(18) 邹之幹(11) 邹祖荫(21) 左 榘(20)

参 考 资 料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

《清史稿》，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1988年。

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

素尔讷《钦定学政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1993年。

《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何圣生《檐醉杂记》，杨寿枏编《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

徐再思《澄江旧话》，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梁章钜《退庵随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7年。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包世臣《李凤台传》，缪荃孙《续碑传集》卷73。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3编，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年。

俞天舒编《黄体芳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民国丛书》第五编94—95，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光绪刊本，1986年。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

程宏远《宝砚斋遗稿日记》之《南菁日记节钞》，1953年家印铅排本。

董沛《正谊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康祺《郎潜记闻》，中华书局，1984年。

顾廷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

胡珠生编著《孙锵鸣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朱孔彰《半隐庐丛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刘可毅《刘葆真太史遗集》，宣统二年刊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铭盘《桂之华轩文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

罗家伦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五《山川人物》，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1969年。

张文虎《鼠壤餘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闵萃祥《式古训斋文集》、《八指诗存》，清光绪三十四年海上刊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

黄以周《傲季杂著》，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刊本。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王先谦著《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

俞樾《春在堂随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徐世昌《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 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刻本，光绪十四年。
- 陈衍《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
- 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俞樾《春在堂杂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5、6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伯元《南亭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
-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许进、徐苏编《陈庆年文集》，南海出版社，1996年。
- 孙雄《旧京诗存》、《旧京文存》，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 汪之昌《青学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北京图书馆影印，2003年。
-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
- 耿云志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阮廷卓《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台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
- 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岳麓书社，1885年。
- 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民国六年铅印本。
- 柳曾符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2002年。
- 殷葆诚《追忆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1999年。
-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
- 卞孝萱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
- 溥良《南菁札记》，江苏学署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
- 李详《李申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 王伯恭《蟋庐随笔》，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 张寿镛纂《清朝掌故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三辑，台

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

王家枚《重思斋遗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瞿鸿禛《超览楼诗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汪荣祖著《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卞孝萱《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

瞿鸿禛《恩遇记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1970年。

《丁氏族谱》,镇江绍宗楼藏。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常州旅沪同乡会铅印本,民国三十三年(1944)。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周树模《沈观斋诗》,宣统二年石印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陈邦彦《自勉斋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

陈玉树《后乐堂文钞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凯龄《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十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 《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 陈玉树《毛诗异文笺·自叙》，《南菁书院丛书》第五集，光绪十四年刻本。
- 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
- 王桐荪等编《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缪幸龙《江阴东兴缪氏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姚鹏图《扶桑百八吟》，杨寿枏《云在山房丛书》十四种，1928年铅印本。
- 沈其光《餠粟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郑逸梅选集》第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郑逸梅选集》第四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郑逸梅选集》第六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吴恭亨《对联话》岳麓书社，2003年。
-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 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浏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
- 曹元弼《复礼堂集》，民国六年刊本。
-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 张锡恭《茹茶轩续集》，《云间两徵君集》铅印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玉缙《许廌学林》，中华书局，1961年。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
-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 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 《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39—1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李伯元《南亭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
- 《清代名人家书》，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97年。
-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1998年。
- 吴庆坻《焦廊脞录》卷八，中华书局，1997年。
- 李详《药裹慵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马相伯《一日一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
- 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 罗继祖《两启轩笔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陈桥驿《邨学札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
-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 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
-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
- 夏仁虎《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
-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
- 《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 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 刘禺生《世载堂杂记》，中华书局，1960年。
- 陈贽《睇向斋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吴飞《张闻远先生学述》，作者赠电子版。

- 胡玉缙撰、吴格整理《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2002年。
- 于鬯《香草校书》，中华书局，1984年。
-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陈灏一《新语林》，上海书店，1997年。
- 《朱东润自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 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
- 张祖翼《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
- 牟润孙《蓼园问学记》，《学林漫录》第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
- 蔡云万《蛰存斋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 何龄修编《孟心史学记》中华书局，2008年。
-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55年。
-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冯飞编《思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吴翊寅《曼荼罗花室文诗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
-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7年。
-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
-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书店，2000年。
- 王景山编《国学家夏仁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
-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 马叙伦《石屋馀渚》，《民国丛书》第3编第87种，上海书店影印。
- 唐振常《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罗家伦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

1969年。

杨恺龄主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

《吴稚晖学术论著》，《民国丛书》第3编第87种，上海书店印行，1989年。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雪堂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章钰《四当斋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章炳麟《太炎文录续编》，《民国丛书》三编8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述》，附《历代古钱图说》末，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汪荣宝《金薤琳琅斋文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1998年。

张树年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

钱仲联《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

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慧琳《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7册。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

李详《历代诗话续编序》，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树枏《故旧文存》卷三，《陶庐丛刻》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易宗夔《新世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
-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李平书《且顽七十岁自叙》，《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
- 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沈云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 钱基博《现代文学史》，上海书店，2004年。
- 钱基厚《孙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20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张南幽编《江阴青衿录》，民国十年排印。
-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赵永良编《无锡名人辞典》二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 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三编》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
- 赵永良主编《百年无锡名人图谱》，新华出版社，2013年。
- 雷瑛《文苑滑稽谈》，广陵古籍刻印社印行，1994年。
-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九州出版社，2012年。
- 冯煦《蒿盒续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俞天舒辑《黄绍箕集》，《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98年。
- 金松岑《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蒋元庆《髡楼烬馀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谢鼎镛编《陶社丛编丙集·陶社题名录》，1944年，陶社刊行。
-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 杨树达《词铨》，中华书局，1954年。
- 赵统《江阴明清学政》，江阴政协文史委编《江阴历史文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赵统《江阴书院史话》，黄山书社，2005年。
- 江阴政协文史委编《夏港记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方毅《辞源续编说例》，《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 《孟森学术论著——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江上诗钞续》，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

郑騫《永嘉室杂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傅春官《金陵历代建置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

董玉书《惜馀春轶事》，广陵书社，2005年。

周有光《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张星烺编《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张相文《南园丛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佐藤三郎辑《民国之精华》，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杜召棠《惜馀春轶事》，广陵书社，2005年。

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明）冯士仁修，徐遵汤等纂《（崇祯）江阴县志》。

（清）蔡澍修，罗士瓚续修《（乾隆）江阴县志》。

（清）卢思诚等修，季念诒等纂《（光绪）江阴县志》。

（清）杨家骥等修，冯煦等纂《（光绪）溧阳县续志》。

（清）刘崇照修，陈玉树纂《（光绪）盐城县志》。

（清）张绍棠修，萧穆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

（民国）陈思主修，缪荃孙总纂《江阴县续志》。

（民国）李传元纂《昆新两县续补合志》。

（民国）王祖畚纂《（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

（民国）胡为和等督修，高树敏总纂《三续高邮州志》。

（民国）戴邦楨等监修，冯煦总纂《宝应县志》。

（民国）胡为和等主修，孙国钧等主纂《丹阳县续志》。

（民国）林懿均等修，胡应庚等纂《续修盐城县志》。

（民国）范铠纂《南通县图志》。

（民国）李公简等修，李详等纂《续修兴化县志》。

（民国）严伟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

- (民国)张玉藻等修,高颀昌等纂《续丹徒县志》。
(民国)钱祥保主修,桂邦杰总纂《江都县续志》。
(民国)陈肇燊修,陈懋森纂《江都县新志》。
(民国)王景涛监修,单毓元总纂《泰县志稿》。
(民国)张仁静修,钱崇威等纂《青浦县续志》。
(民国)缪荃孙等纂《江苏通志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民国)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续修宝山县志》。
(民国)吴葭等修,王钟琦等纂《(民国)宝山县再续志》。
(民国)丁祖荫等纂《重修常昭合志》。
(民国)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
(民国)刘伟纂《续海门厅图志》。
(民国)曹允源等纂《吴县志》。
(民国)周志靖主纂《光宣宜荆续志》。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丹阳县地方志办公室《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南通市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
昆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包国良主编《华士镇志》,方志出版社,2009年。
孙揆均编《南菁略史》,江苏省立南菁中学自印本,1935年。
上海漱兰学校编《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1942年铅印本。
《江苏省南菁中学百年校庆专刊》,自印本,1982年。
江苏省南菁中学编《南菁校史》(1882—1997),自印本,1997年。

-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3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83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

孙毓修《绿天清话·南菁旧感》，《小说月报》第三年第七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陈鸿铨《福州旧时的律师和律师公会》，《闽都文化》杂志2013年第3期。

陈希濂《“记得”诗——咏清末民初之苏州》，《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31辑。

杨振民、杨振勋《祖父杨冰事迹概略》，《海安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5月。

柳曾符《叶玉森先生事辑》，《镇江文史资料》第13辑，1987年12月。

“镇江最后的进士”，《镇江文史资料》第25辑，1993年10月。

白坚《我爱清流阮嗣宗——阮式生平述略》，淮安市政协《文史专辑》第17辑。

蒋维乔《曹颖甫先生传》，《江阴文史资料》第4辑，1983年10月。

吴汀鹭《八十回忆录》，《江阴文史资料》第14辑，1993年10月。

王伊同《吴汀鹭传》，《江阴文史资料》第19辑，1998年10月。

陈以鸿《我所知道的谢幼陶先生》，《江阴文史资料》第19辑，1998年10月。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北平《中和月刊》第2卷第3期，1941年3月1日。

凌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1964年10月。

凌鸿勋《交通大学十年忆旧(二)》，台湾《传记文学》第1卷第4期，1962年9月。

蒋梦麟《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传记文学》第4卷第3期，1964年3月。

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传记文学》第4卷第5期，1964年5月。

李猷《抗战前常熟书画家略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5期，1970年11月号。

王世杰《吴稚晖先生关于“投线装书于毛厕”的解释》，《传记文学》第18卷第6期，1971年6月。

赵统《卢文昭和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王大学《清末民初江南地方慈善组织的经营实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1895—1927)》，《近代史学刊》(第2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张伟然、梁志平《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

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48卷。

李婧《法学构建进程中的近代银行法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九卷第2期，2009年2月。

王景山《夏仁虎的科举之路》，北京《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9日。

后 记

本书是在十三年前所写书稿的基础上增订而成。记得在 2001 年，南菁中学为缅怀书院辉煌，并筹备下年的 120 周年校庆，我由江阴高中被借调至该校约一年有余，至 2002 年写成《南菁书院志(稿)》。

写稿期间，得到了南菁中学虞德范、夏锡良诸位领导的支持和老友童峰等老师的帮助。尤为难忘的是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对我的提携与关爱。当时王先生正在整理张元济先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我亦有幸参与其中，承担了多种《校勘记》的迳录抄写的事务。每年寒暑假，我都提着装满 20 世纪 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校勘记》手稿的箱包，往返于济南与江阴之间，每次都吃住在王先生家中。王先生和伯母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王先生对家乡的南菁书院充满自豪感，对我写书院事，深感欣慰，时时对我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他认为，所有书院时期留存资料，都不应作为附件，而应作为正文写入书中；对某些关键词语，不能率尔操觚，如“汉宋兼采”、“汉宋调和”，似相近却大有区别，运用时应慎重。如今，王先生逝世多年，墓草已宿，而他老人家当时诲人不倦的情景，仍时在目前，永难忘怀。

当时，书稿写成后，学校内部印刷若干册。远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王伊同先生阅读全稿，指正书中不少谬误后，慨然为写序言，并期待付梓。王伊同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毕业于南菁高中，他对自己的母校自然充满感情，与我书信往来，时时赐教。他曾先后应恒慕义、包华德之邀，撰写过不少篇清代、民国名人的传记，其中就有一些南菁书院的学人，如王先谦、董康。所以，他对我的指导具体而微，我对他的敬重和感激也与日俱增。南大的徐雁平先生虽缘慳一面，也曾通信对此稿提出了很多具体中肯的意见，如希望能将南菁书院放在当时的学术大环境中来考虑等等。诸位师友的深情厚谊，十多年来，无时或忘。然窃以为成稿仓猝，内容单薄，故迟迟不敢贸然出版，以免灾梨祸枣，贻笑大方。

十年后，有幸结识北京大学吴飞先生。吴先生温文尔雅，待人真诚；学识渊博，

见解独到。他正在研究清末学者张锡恭,对张早年就读的南菁书院很感兴趣。他认为我先前做的事很有意义,鼓励我尽快完善书稿。于是我俩之间常书信往来,商讨书院事。我时时请益,吴先生反复详告,不惮烦也。他还经常提供相关资料供我采用,如很多种清人文集,只要我提出,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学术研究,不厌其烦为我寻找。又如书院课生的经古课卷,弥足珍贵,在各大图书馆恐怕也不会有收藏,吴先生慨然赠阅。前不久,吴先生还趁我北京探亲之际,特邀请几位同仁好友,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乔秀岩、陈壁生、刘宁、陆胤诸位先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乔秀岩先生还纠正了我的增订书稿中的不少错误,我非常感谢他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吴飞先生的鼎力相助,也许此时拙稿还静躺在书篋中,而难有出版之日。此次出版,吴先生又慨允写序,他很谦虚,对我的溢美之词也颇多,实不副厚望,深觉惭愧。

数年来,我还得到了浙江舟山张岬、程继红、韩伟表,慈溪王孙荣,上海陈以鸿、虞万里、柳和城、叶舟,苏州胡皎明、顾迁,无锡朱刚,东台吉家林、柳书咸和江阴郁志刚、缪幸龙、顾青诸位好友的种种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责任编辑孙莺先生对于该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劳,纠谬勘误,反复校对,为人作嫁,却默默无声。我很感谢她!

最后,还要感谢南菁中学的资助出版,感谢过建春、杨培明两位校长。过校长钟情于南菁文化,对我的工作一直很热心关注;杨校长对于该书出版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

如今,书稿出版在即,然心有惴惴焉。笔者见闻狭隘,学识浅陋,故讹误谬论,在在皆是,早先灾梨祸枣、貽笑大方的担心,恐仍不能免也。亟盼读者赐教为荷。联系邮箱:kzhaol9@163.com。联系电话:0510-86990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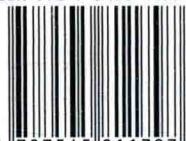
赵统谨记

2015年5月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学术/文献
ISBN 978-7-5458-1179-7



9 787545 811797 >

定价：8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